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上]

(1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上册

目 录^{*}

第十四卷说明	IX- XXXII
弗·恩格斯。军队 (ARMY)	5- 50
弗·恩格斯。副官 (ADJUTANT)	51- 52
弗·恩格斯。阿耳布埃拉 (ALBUERA)	53- 54
弗·恩格斯。阿尔马 (ALMA)	55- 59
弗·恩格斯。明火枪 (ARQUEBUSE)	60- 62
弗·恩格斯。艾雷 (AIREY)	63
典·恩格斯。阿斯佩恩 (ASPERN)	64- 70
弗·恩格斯。攻击 (ATTACK)	71- 75
弗·恩格斯。阿富汗 (AFGANISTAN)	76- 85
弗·恩格斯。鹿砦 (ABATIS)	86
弗·恩格斯。炮座 (BARBETTE)	87
弗·恩格斯。棱堡 (BASTION)	88- 89
弗·恩格斯。刺刀 (BAYONET)	90- 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巴克莱-德-托利 (BAR-	

* 括号中是“美国新百科全书”刊载的条目的原文标题。——编者注

CLAY DE TOLLY)	92— 94
卡·马克思。贝尔蒂埃(BERTHIER)	95— 98
弗·恩格斯。阿尔及利亚(ALGERIA)	99— 110
弗·恩格斯。弹药(AMMUNITION)	11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卜尼格先(BENNIGSEN)	112— 115
卡·马克思。勃鲁姆(BLUM)	116— 118
卡·马克思。布里昂(BOURRIENNE)	119— 120
弗·恩格斯。会战(BATTLE)	121— 124
弗·恩格斯。BATTERY	125— 127
弗·恩格斯。露营(BIVOUAC)	128
弗·恩格斯。掩障(BLINDAGE)	129— 130
弗·恩格斯。堙墙(BONNET)	13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贝姆(BEM)	132— 135
卡·马克思。贝西埃尔(BESSIERES)	136— 13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博斯凯(BOSQUET)	138— 139
卡·马克思。布律恩(BRUNE)	140— 143
弗·恩格斯。爆炸弹(BOMB)	144— 145
弗·恩格斯。炮手(BOMBARDIER)	146
弗·恩格斯。炮击(BOMBARDMENT)	147— 148
弗·恩格斯。两桅小炮艇(BOMB-KETCH)	149
弗·恩格斯。炮艇(BOMB-VESSEL)	150
弗·恩格斯。防弹工事(BOMB-PROOF)	151
弗·恩格斯。军用桥(BRIDGE	MILITARY) 152— 156

卡·马克思。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	157— 16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西班牙舰队(ARMADA)	168— 1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艾阿库袭(AYACUCHO)	172— 17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吕歇尔(BLUCER)	174— 192
弗·恩格斯。炮兵(ARTILLERY)	193— 220
卡·马克思。毕若(BUGEAUD)	221— 224
卡·马克思。玻利瓦尔-伊-庞特(BOLIVAR Y PONTE)	225— 241
弗·恩格斯。战局(CAMPAIGN)	242— 243
弗·恩格斯。CAPTAIN	244— 245
弗·恩格斯。马枪(CARABINE)	246
弗·恩格斯。卡伦炮(CARRONADE)	247— 248
弗·恩格斯。霰弹(CASE SHOT)	249— 250
弗·恩格斯。燃烧弹(CARCASS) 251— 252	
弗·恩格斯。药筒(CARTRIDGE)	253— 254
弗·恩格斯。崖路(BERME)	255
弗·恩格斯。布伦海姆(BLENHEIM)	256— 257
弗·恩格斯。博罗迪诺(BORODINO)	258— 263
弗·恩格斯。比达索阿(BIDASSOA)	264— 269
弗·恩格斯。布达(BUDA)	270— 273
弗·恩格斯。桥头堡(BRIDGE-HEAD)	274— 275
弗·恩格斯。弹射器(CATAPULT)	276
弗·恩格斯。野营(CAMP)	277— 280

弗·恩格斯。库霍尔恩 (COEHOORN)	281— 283
弗·恩格斯。布里西亚 (BRESCIA)	284— 286
弗·恩格斯。缅甸 (BURMAH)	287— 294
弗·恩格斯。博马尔松德 (BOMARSUND)	2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贝雷斯福德 (BERESFORD)	296— 297
弗·恩格斯。骑兵 (CAVALRY)	298— 326
弗·恩格斯。筑城 (FORTIFICATION)	327— 353
一、永备筑城	327
二、围攻	349
三、野战筑城	351
弗·恩格斯。步兵 (INFANTRY)	354— 381
一、希腊步兵	354
二、罗马步兵	359
三、中世纪的步兵	363
四、步兵的复兴	365
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步兵	368
六、十八世纪的步兵	373
七、法国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的步兵	377
弗·恩格斯。海军 (NAVY)	382— 396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	397— 754
前言	401— 403
一、硫磺帮	404— 415
二、制刷匠帮	416— 426
三、警察作风	427— 459
1. 自供	427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430
3. 舍尔瓦尔	437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447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1859年6月26日 和27日)	451
6. 其他	456
四、泰霍夫的信	460—487
五、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488—490
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491—500
七、奥格斯堡战役	501—525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526—587
九、代理机构	588—622
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623—674
十一、一件诉讼案	675—716
十二、附录	717—754
1. 席利被骗逐出瑞士	717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724
3. 舍尔瓦尔	725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726
5. 诽谤	735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736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739
8.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739
9. 刊登在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上的布林德 的文章	741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741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742

12. 费格勒的 Affidavit	743
13. 维耶的 Affidavit	744
14. 摘自诉讼文件	746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749
16. 补遗	751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751
(b) 科苏特	752
(c) 艾德门·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	753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	755
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 声明	756— 759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760— 761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	762— 764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765— 766
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	767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768— 769
卡·马克思。给“自由射手”和“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770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 声明	771— 772
注释	775— 896

插 图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的雇页	3
阿尔马河会战(1854年9月20日)	57
阿斯佩恩会战(1809年5月21—22日)	67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十九世纪上半叶)	105
比达索阿河会战(1813年8月31日和10月7日)	265
“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399

第十四卷说明

第十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们给资产阶级的进步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和马克思的论战性巨著“福格特先生”。从写作时间(1857年7月—1860年11月)来看,这些著作同编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衔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时期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57—1858年)为已开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高潮、为一系列国家的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准备了基础。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消灭民族压迫,统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任务又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革命,欧洲无产阶级就成了革命地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战士。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完成由于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实现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造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步骤。

革命事变的临近,孕育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所表明的)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促使工人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在准备国际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战斗方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

理论的制定，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对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上的策略的论证，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的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规律性的揭示，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敌人的猛烈驳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十四卷发表的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捍卫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营垒中的诽谤者和诬蔑者的卓越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这在当时对马克思来说是维持生活的一个来源，而对恩格斯来说则是帮助伟大战友的一种手段）就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一样，是利用它们作为宣传（往往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合法机会。既然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的，他们也就竭力选择那些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给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美国新百科全书”上的条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这些条目时曾经不断地同百科全书的编辑（查·德纳等）的阶级局限性发生冲突，因为后者以虚伪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现党派倾向。尽管任意删改作者原文的编辑部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参考性质对革命的政论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仍然善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和体裁的文章中发挥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

给百科全书写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执笔的，虽然马克思被认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担了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马克思腾出时间去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

无产阶级领袖当时的主要理论任务。许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如“军队”、“步兵”、“骑兵”、“炮兵”、“筑城”、“海军”等占着中心地位。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军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概括的结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总结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阶级第一个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军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军事科学和军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许多知识部门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恩格斯把“研究军事问题”——如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专门学问之一。弗·伊·列宁把恩格斯称为伟大的军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分析当时的军队。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规律性的过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

决定的。马克思读了恩格斯的“军队”一文后，于1857年9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军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最初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以来军队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强调指出，古希腊的军队及其方阵战术，古罗马的军队及其较进步的军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促使该社会崩溃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结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军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骑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军队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编成的群众性军队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军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别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腐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来揭示这一规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

了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谈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倒了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军事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布伦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时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则被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257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 and 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

括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见“弹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露营”、“野营”等条目)等许多问题,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则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视军事技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军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细节在论述各种武器(“弹射器”、“刺刀”、“明火枪”、“马枪”、“卡伦炮”、“爆炸弹”、“霰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弹工事”等)和辅助的技术手段(“军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阐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军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军事技术的从属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规模武器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军事的作用的规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规律仅仅归结为军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强调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组成,军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训练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谈到骑兵会战时强调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见本卷第319页)。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预备队的存在,指挥的灵活性,统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评价了卓越的统帅、军事改革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评价中对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指出，杰出的统帅的活动决不取决于他们幻想的任意创造，而首先取决于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强调指出，统帅的作用在于善于运用武装力量的客观历史发展所提出来的进行战争和战斗的方式和方法，并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和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的军队的组成和战斗素质方面的变化。例如，恩格斯认为拿破仑的功绩就是他把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变为“一套正规的制度”（见本卷第 39 页）。同时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编纂历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统帅并把他们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统帅的活动都具有本人阶级根源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点。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见本卷第 376 页）。恩格斯强调指出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冒险主义成分，片面决定和失策，如庞大的纵队队形“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见本卷第 323 页）。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论述军事的短条目使他的长条目的内容得到充实和具体化。其中某些条目如“阿尔马”、“阿斯佩恩”、“比达索阿”、“博罗迪诺”等，分析了个别会战。一部分条目是恩格斯为了解释一系列军事术语和军事技术用语而写的。在恩格斯的“战局”、“会战”和“攻击”等条目中，包含了有关作战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战斗队形和预备队的运用的重要的军事理论结论。其

中有许多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许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做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军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条目）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指出，由于当时许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虑到许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提了提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场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

有不确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诺会战的结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做“巴克莱-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贬低了伟大的俄国统帅米·伊·库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许多发明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历史科学的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军事学术的贡献。

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许多文章都是谈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奴役并剥削亚非各国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险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们变成殖民掠夺的场所。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缅战争（1824—1826, 1852）的结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缅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占领了它的出海口（见本卷第287页）。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国派驻官吏的阴谋诡计，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别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谈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

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见本卷第 104 页)

恩格斯热切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民,他在条目中强调指出了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质和广泛规模。他满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险行为的可耻失败,详细地谈到了 1840 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评论那样,“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给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训,消灭了他们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国境。恩格斯在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统治时说,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从 1830 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军队、花了大量金钱去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法国的制度”(见本卷第 109 页)。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两个条目充满了作者对反对殖民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挠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条目虽然是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写的,但是,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它们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对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们要教育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

地和附属国的争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愿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外，还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许多条目。这主要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其中许多条目，如“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贝姆”、“博斯凯”、“布吕歇尔”、“贝雷斯福德”等，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库裘”（后一个条目论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传记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评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传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绘历史肖像的巨匠。

在马克思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贝西埃尔”、“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绘出拿破仑法国的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1789—1794年参加革命事件而后来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体的支柱的法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靠“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见本卷第95页）的革命，而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飞黄腾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成了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贝尔纳多特），成了愿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贝尔蒂埃）。马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仑的元帅的传记，提供了关于拿破仑第一帝

国资产阶级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残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仆——的嘴脸；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镇压法国工人、用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险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他领导了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镇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吕歇尔元帅传记是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在传记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统帅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吕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们认为“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见本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的“勃鲁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等条目，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传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的描述表明，马克思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同时，高度地评价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约瑟夫·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统帅艺术，后者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统帅”（见本卷第134页）。在“玻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1810—1826）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

指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偏见的书刊的错误材料，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评价。在这些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论的反波拿巴方针、他们的力求揭穿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资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仑第一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们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们依靠 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同时，马克思却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

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马克思在这些年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政党”（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9日写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诽谤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领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拚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谣中伤，是同普鲁士警探于1852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遥相呼应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诽谤。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

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本卷第453页）福格特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险性，还在于这本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间有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间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争取全国革命民主统一的尖锐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别重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信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在驳斥福格特的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不仅维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来。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揭露了他这个处心积虑的捏造者和诽谤者的嘴脸。针对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该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里，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作了简短的但内容非常充实的介绍。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风”、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里，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说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谈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非组织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个宗派集团采取的冒险密谋策略的危害性，并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马克思

举出科伦审判案，即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陷害以及其他许多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法令来做例子，揭露普鲁士警察国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运动而采取的卑鄙手段。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这本书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奠定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它同马克思所写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写的文章“最近的科伦案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马克思揭露福格特是一个恶毒的诽谤者和居心险恶的人时，揭示了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民人士中间的这位英雄的令人讨厌的整个面目。他揭穿了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指出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以及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间所扮演的那种不光彩的角色。在揭露福格特的时候，马克思巧妙地嘲笑了他作为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小资产阶级党团的典型的怯懦而狭隘的领袖之一，作为在革命后期由“残阙”议会搞的那个短命政府（“帝国摄政政府”）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1848—1849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许多章节里引用文献资料证明：诬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自己，在反革命的瑞士当局同工人组织、民主组织进行的斗争中，多次为瑞士当局效劳，干过警探干的勾当。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充满尖锐的嘲讽，鞭答福格特的世界观，即贯穿在他的自然科学著作中的那种肤浅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嘲讽不仅击中了福格特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整个德国

庸俗唯物主义者这一派(毕希纳、摩莱肖特等等)的要害。

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心点,是在揭露福格特在五十年代就已成了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本书第八、九、十各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庇护人和同谋者”)就是阐明这一问题的。马克思根据1859年3月,即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前夜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口头的和发表于报刊的言论,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证明,福格特的“研究”不过是把第二帝国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丹屠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上的东西用德文转述出来而已。马克思强调指出,福格特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正是他的主子们所需要的,他们用这些言论来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以便于拿破仑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按照马克思的精确说法,“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第二帝国的头目们在国外分设的代理机构有联系。福格特扮演着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的角色,他把“法国食槽”放到招募来的人的面前。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讽刺笔触勾画了福格特的“庇护人和同谋者”的嘴脸,其中也有像日内瓦政府首脑詹姆斯·法济这类人物,他直接同拿破仑第三进行勾结,出卖瑞士的民族利益。马克思揭露出福格特及其同伙是执行拿破仑第三阴谋诡计的鹰犬,指出福格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民主派人士中间充当执行波拿巴阴谋诡计的工具;同时,马克思提出警告说,波拿巴代理人有钻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危险。执政的资产阶级至今仍在广泛采用收买雇用代理人、御用文人和记

者等手法,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而马克思的抨击波拿巴代理机构的这一作品,在揭露这些手法方面,到今天还是一个典范。

马克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他在写这一著作时并不知道的、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完全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第二帝国崩溃以后法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路易-拿破仑的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福格特在1859年8月从这笔秘密费用中得到了4万法郎。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从揭露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的联系进而广泛地全面地揭露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45页),当时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帝国在全欧洲都布下了罗网,有一系列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许多国家——撒丁、普鲁士等——的统治阶级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倾向,露出了摹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的苗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看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似乎是对自己的许多反对拿破仑第三制度的政论文章作了总结。马克思发挥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就作过的对于波拿巴主义实质的深刻的分析,指出波拿巴制度的特征是:在各阶级之间进行看风使舵的政策、国家政权的表面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掩盖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利益的行为、利用军队中最反动的分子做主要支柱。马克思揭露反革命大资产阶级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进行统治的各种方法,指出第二帝国制度是警察恐怖、

投机倒把、军阀和无耻的冒险分子横行的王国，指出这一制度所使用的大量政治手段中包括讹诈、收买、露骨的煽惑、对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采用表面讨好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腐蚀某些社会阶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波拿巴制度的腐朽和脆弱，同时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已经走上绝路，第二帝国的统治集团希望用发动对奥地利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找到出路。同福格特和其他波拿巴主义宣传者的一切论断相反，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使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团伪善地用这面旗帜掩饰他们作战的目的，实际上是想用廉价买得的胜利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侵占意大利的土地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并阻挠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彻底揭穿了波拿巴集团玩弄的声名狼籍的“民族原则”这一骗人把戏的实质。路易·波拿巴冒充“民族的保卫者”，用民族利益进行投机，想把民族运动引上反革命的轨道并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和扩大它的疆界。事实上，路易·波拿巴对意大利的政策已经表明，第二帝国是真正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马克思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领袖听信了波拿巴的欺骗宣传，是对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利益的严重威胁。

马克思也痛斥了对世界政治有影响的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别是，他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代表帕麦斯顿的勾结，后者帮助拿破仑第三放手进行对意大利的冒险。马克思也揭露了为同样目的服务的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之间所签订的协议。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有关揭露波拿巴主义的部分，是反对反动势力企图恢复和利用已遭历史谴责的波拿巴主义传统、波拿巴主义政治的反人民手法的犀利的战斗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波拿巴主义的言论，是同他们为了以革命民主方式解决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权，是上述两国的民族统一和在国内实施必要的革命民主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福格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亲波拿巴的立场。马克思还指出，这种立场同受到自由资产阶级支持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所执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一致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一心想利用奥地利的削弱通过容克普鲁士领导下的王朝道路统一德国。马克思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抨击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言论，也是对向普鲁士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方面摇摆的“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一种答复。拉萨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实质上是为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政策进行辩护，并对普鲁士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统一德国的王朝道路表示支持。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鼻孔出气的”。马克思在自己的书中没有公开指出拉萨尔的名字，但是批判了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同拉萨尔的反无产阶级观点相对立的计划，就是通过人民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度的途径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同指望普鲁士胜利而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拉萨尔的策略相反，马克思“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列宁全集”中

文版第 21 卷第 120 页)。

马克思在驳斥福格特的准波拿巴主义对外政策观念的同时，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第八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里——用了大量篇幅来揭示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以便能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和掠夺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积极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即争取完全实现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也正是从这种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来阐明各种国际问题的。他坚决谴责掠夺和吞并的政策，揭露统治阶级外交所采用的恫吓和讹诈、粗暴地干涉小国内政、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的手法。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报刊的性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充当统治阶级反动政策的兜售者和对革命运动活动家的诬蔑、谣言的传播者。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波拿巴派报刊的卖身投靠、毫无原则和卑鄙下流；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见本卷第 619 页）。马克思也揭露了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认为英国“自由派的”报刊“每日电讯”是集社会秽物之大成的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他指出对于这家典型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估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

国的许多其他报刊。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下流作风，并刻画了那些文佞、老奸巨猾的政客和支配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狡猾的企业主的嘴脸。这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强有力的、尖锐性和准确性达于极点的揭露面之一。

揭露被马克思划为庸俗民主主义者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见他在1860年1月28日和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说，他所以要驳斥福格特，原因之一就是这能够把福格特所属的整个政治流派都揭穿。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就是德国的庸俗民主派。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必须驳斥庸俗民主派，是因为当时特别要紧的是捍卫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使它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德国民主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右转的趋势。从1848—1849年革命时起，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人物中有许多当时实质上已经干着叛卖的勾当）经历着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以及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相当大一部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附属物。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像福格特一样充当波拿巴集团和德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过去同恩格斯一起揭露过德国小资产阶级许多领袖们的庸俗民主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马克思，认为再次严厉地批判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自己对党的责任。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在诽谤家福格特的背后，除自由派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庸俗民主主义者。

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泰霍夫的信”、“附录”）里，马克思以幽默卓绝的笔触嘲笑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德国小市民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的狭隘、鄙陋、庸俗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谈到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戈克、卢格等人的“革命贷款”的投机冒险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那种离不开无谓的琐碎争吵的冒牌革命活动，实质上正好迎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味。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所引用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文艺作品中的警句和艺术形象，使得他对福格特以及其他工人运动敌人的批判更加尖锐和准确。“福格特先生”证明了马克思在文艺方面的高深造诣。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著作说，“这是你所写过的最好的论战性作品”。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是充满了党性和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的作品。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们那样贬低这一著作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所以保持着巨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波拿巴主义以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各种言论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热烈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和坚决回击共产主义的凶恶敌人的典范。

* * *

本卷收有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四十二个条目以及马克思针对福格特的诽谤而发表的四篇声明。这些条目中，“军用桥”以及“阿尔及利亚”这

一条目的片断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而这几篇声明曾作为附录收入 1936 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其余各条目都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第一版所刊载的“奥斯特利茨”是他人写的，“奥热罗”和“巴达霍斯”两个条目也没有充分根据证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因此本版都没有收入。1940 年的“军事历史杂志”第 11 期上刊载的“武器”这一条目，由于不能确证是恩格斯写的，也不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条目，除总论性的条目“军队”排在卷首外，都按写作日期顺序排阵列，而不是像百科全书上那样按标题字母的顺序排列。“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曾对恩格斯的某些条目有所增补，本版已删去，有关情况都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百科全书的条目原文，在个别场合下也附有增补的段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援引的非德文的文献，也同全文一样以俄译文刊印，原文在脚注中注出。如马克思引用文献时既用德文又用原文，原文则予以保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各个条目中和“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印错了的人名、日期、地名、引文等，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 and 实际材料加以核对，并作了更正。

关于会战和条约，重复出现时不再加注，有关的页码在地名索引中注明。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7年7月—1860年11月

卡·马克思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A
OF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VOLUME L
A-ARAGUAY.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346 & 348 BROADWAY.
LONDON: 16 LITTLE BRITAIN.
N^o DCCCLVIII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的扉页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军队¹

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在古代世界的军队中，我们有比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军队是埃及军队。它的光荣时代正好是拉美西斯二世 (Sesostris) 统治时期；在他统治的那个时期的许多遗迹上有记述他的功业的绘画和碑文，这些都是我们考证埃及军事状况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埃及军队分为两级：赫尔莫提布 (hermotybi) 和卡拉西尔 (calasirii)；在最盛时代前者有 16 万人，后者有 25 万人。这两级大概完全是以年龄或服役期限的长短而相互区分的，所以服满一定的年限后，卡拉西尔就转为赫尔莫提布或转为后备兵。整个军队都分驻在各个特别的军屯内，而且每个军人获得一大块土地作为对他服役的报酬。这些军屯主要分布在国家的北部，因为那里可能遭到亚洲邻国的攻击；只有少数几个军屯设立在尼罗河上游，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不是很可怕的敌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是在于它的弓箭手。除后者外，军队还有使用不同武器而且按武器类型分编为营²的各种步兵队：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步兵有许多战车支援，每辆战车上有武士二人：一名驭手，一名射箭手。在古迹中没有看到描绘骑兵的画。描绘骑马的人的唯一图画属于罗马时代，看来埃及人从他们亚洲邻国那里学会骑马和使用骑兵的这种假定是正

确的。在较后的时期，像从古代历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致的记载中所确切证实的那样，埃及人有了许多骑兵，它们和古代的一切骑兵一样，在步兵的两翼上行动。埃及人的护身器具是由不同材料制成的盾牌、头盔、胸甲或锁子甲。他们攻打城堡的方法有许多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的方法和计谋。他们有 *testudo* 或攻城槌、接近车³ 和云梯；加·威金逊爵士认为他们还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并善于挖掘地道，但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⁴。埃及人从萨美提克时代起就有了希腊雇佣兵，也屯田在下埃及。

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亚洲军队的最早的典型，这些亚洲军队为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的大片地区，曾打了一千多年仗。在这里和在埃及一样，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也是古物。根据这些古物判断，步兵装备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护身器具和攻击的武器通常都制造精良，而且外表比较美观。此外，还因为帝国幅员广大，所以这里的武器种类繁多。主要的武器是长矛、弓、剑和匕首。薛西斯的军队中的亚述人，从绘画上来看，也是手持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别致）、毡甲或皮甲和盾牌。战车依然是军队的重要部分；战车容纳二人，而且驭手要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绘画上可以看到许多战车兵都是披着长鳞甲的。此外还有骑兵，我们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骑兵。在较早的雕塑品上，骑手是骑在不备鞍子的马背上的；后来才采用一种像软马鞍一样的东西；而在一件雕塑品上则可看到像现今东方所使用的一种高马鞍。这些骑兵同波斯人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骑兵未必有重大的差别。这是一种轻装的、非正规的骑兵，冲锋时乱成一团，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所击退，但对于已经混乱或溃败了的军队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绘画上，骑兵在

队形中位于战车兵之后，而战车兵看来是一种贵族兵。步兵战术在运动的规则上和队形的排列上显然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是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列，这时，第一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在围攻城堡时，亚述人无疑是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和挖掘地道的，而从“以西结书”⁵中也许可以断定，他们构筑了一种类似土堤或土岗的东西——罗马 agger（堡垒）的雏形，以便瞰制被围的城堡。他们的活动碉楼和不动碉楼筑得和被围要塞的围墙一样高，或者更高些，以便瞰制围墙。亚述人也使用攻城槌和接近车；因为他们的军队人数很多，所以他们能够把整条小河改道，以便接近所攻击的要塞的薄弱部，或利用干涸了的河床，作为进入这个要塞的通路。巴比伦的军队似乎也 and 亚述军队差不多，但没有关于它们的具体详细材料。

波斯帝国的伟业归功于它的奠基者，即现今法尔西斯坦这个出骑手的地方的尚武的游牧民族，在这里骑兵一下子就获得了统治地位，在东方各国军队中骑兵从那时起一直到这些军队不久前采用现代欧洲式的军事训练时为止都占居这种地位。大流士·希斯塔斯普建立了常备军，以控制被征服的各郡和防止各郡的萨特拉普即总督的频繁的叛乱。这样，各郡都驻有在特派长官指挥下的警备队；此外，各城堡也驻有部队。供养这些部队的费用要由各郡担负。这支常备军中还包括皇帝的近卫军——1万名精选的、披着金碧辉煌的盔甲的步兵（“敢死队”A thanatoi）；出征时，一长列载着妻妾和仆役的车辆，还有载运粮秣和弹药的骆驼队伴随着他们；此外，在皇帝近卫军中，还有1000名戟兵，1000名近卫骑兵和许多战车，并且其中有些战车还备有尖叉。大规模远征时，这些兵力

尚不敷使用，还要在帝国各郡普遍征兵。这些形形色色的队伍汇合成一支真正的东方式军队，它包括了在装备和作战方法上不同的各种部队；有庞大的辎重队和无数的仆役随从。我们认为，希腊人所说的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就是因为有这些仆役的缘故。士兵根据不同的民族，分别武装以弓、梭镖、长矛、剑、狼牙棍、匕首、投石器等。各郡的部队有各自的指挥官；据希罗多德说，这些部队似乎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而且每由 10 人组成的战斗单位就有一名军官来指挥。⁶ 大部队或各路军队通常由皇亲国戚统率。在步兵中，由波斯人和其他雅利安族人（米甸人和巴克特利亚人）组成 élite（精兵）。他们武装以弓、中等长度的矛和短剑等；头上缠着类似头巾的东西，身穿铁胄甲；盾大部分用柳条编成。但是，这些 élite 同波斯的其余步兵一样，每次遇到人数极少的希腊部队，总是遭到惨败。这群动作迟钝的乌合之众只能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最初的方阵作消极的抵抗，马拉松会战、普拉迪会战、米卡列会战和温泉关会战⁷ 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在波斯军队中的战车，在极为平坦的地形上对付像波斯步兵本身那样的乌合之众可能还有用，但对付希腊人密集的长矛队或者对付适于在起伏地上行动的轻装部队，就毫无用处了。最小的障碍就可挡住战车。在交战的时候，马匹惊驰，不服驾驭，反而践踏自己的步兵。至于骑兵，那末在帝国较早的时期我们也很少有证据来说明它的质量很高。在适于骑兵作战的马拉松平原上，波斯人有 1 万名骑兵，但他们没有能够冲破雅典人的阵列。在较晚的时期，骑兵在格拉奈卡斯会战⁸ 中大显身手，那时它列成一线，突然袭击徒涉过河后登上河岸的马其顿纵队的先头部队，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把他们击退了。骑兵就这样在很长时间

内胜利地抵御了托勒密指挥下的亚历山大军队的前卫，一直到主力开到，轻装部队出现在它的两翼时为止，以后它由于没有第二线部队或预备队而不得不退却。但是在这个时期，波斯军队由于吸收了希腊成分，即由于薛西斯死后不久各个皇帝雇来了希腊雇佣兵而得到了加强；同时麦姆农在格拉奈卡斯会战中采用的骑兵战术也显然不是亚洲式的，即使我们没有可靠的史料，也可以大胆地说，它受了希腊的影响。

希腊各国的军队是我们在军队组织编制方面具有丰富而确实史料的第一批军队。可以说，战术史，特别是步兵战术史，是和他们一同开始的。我们不去讲荷马所描写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军事制度，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骑兵，显贵和头领跟同样显贵的敌人在战车上相斗或下车决斗，而步兵似乎也不比亚洲步兵强多少；现在我们就从雅典极盛时代的军队谈起。在雅典，每一自由民出身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只有那些担任公职的人，而在较早的时期，则还有第四等级即最贫穷的自由民，才能免服兵役。⁹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凡是年满 18 岁的青年都必须服兵役两年，特别是要担任边防勤务。在这个时期内，他们完成军事训练，以后一直到 60 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战争爆发时，公民大会规定应征人数；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实行 *levées en masse*（全民武装）（*panstratia*）。每年由人民选举将军（*strategi*）十人负责征召和建立这些部队，同时每一部落即菲拉（*phyle*）的成员则在一个专门的菲拉尔赫（*Phylarchus*）指挥之下编成支队。菲拉尔赫和塔克色阿赫（*taxiarchus*）即连长一样，也是由人民选举的。所有应征的人编为重步兵（*hoplitae*），用来编成方阵即有纵深的长矛手横队；最初军队完全由这种重步兵组成，后来增加了轻装部队和

骑兵，重步兵就成为军队的主要核心——决定会战结局的兵种。方阵有各种不同的纵深：我们发现有关于纵深为 8、12、25 列的方阵的记载。重步兵的装备包括：胸甲或甲冑、头盔、椭圆形的盾、长矛和短剑。雅典方阵的威力在于攻击；它以猛烈的进攻出名，特别是自从米太雅第在马拉松会战中规定攻击时要加快步伐因而步兵以跑步冲向敌人以后，就更是如此。但是在防御上雅典方阵不如比较坚实而密集的斯巴达方阵。在马拉松会战中，雅典的整个军队由 1 万名重步兵构成重装方阵，而在普拉迪会战中他们除 8000 名重步兵外，还有同样数量的轻步兵。由于波斯入侵的巨大危险，雅典不得不增加服役的人数；最贫穷的阶级——贫民——也列册当兵。后者组成轻装部队（gymnetae, psili）；他们或者完全没有护身器具，或者仅有一面盾；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梭镖。随着雅典权势的扩大，他们的轻装部队便为同盟者的军队¹⁰，甚至还为雇佣兵所加强。以射箭手和投石手著称的阿卡尔纳尼亚人、埃托利亚人和克里特人加入了军队。此外，并组成了介乎轻装和重装之间的部队——培尔塔斯特（peltastae），他们装备得像轻步兵一样，但能攻占和扼守阵地。然而，这种部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¹¹后被伊菲克拉特改编时，才有了很大的作用。雅典的轻装部队无论在定下作战决心时或者在执行决心时都因敏捷和迅速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某些场合，可能是在起伏地上，他们甚至可以成功地与斯巴达方阵相抗衡。雅典建立骑兵是在共和国已经富强的时代。阿提卡的山地虽不利于这一兵种，但由于与盛产马匹因而最先建立骑兵的地区——特萨利亚和贝奥提亚——为邻，所以不久希腊的其他国家也都建立了骑兵。雅典骑兵最初有 300 人，以后增到 600 甚至 1 000 人，由最富有的公民组成，甚至在平时也是

经常存在的。这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非常机警、敏捷和主动。在战斗中，骑兵和轻步兵一样，通常都配置在方阵的两翼。在较晚的时期，雅典人还编成了一支有 200 名马弓手 (hippotoxotae) 的雇佣兵部队。直到伯利克里时代为止，雅典军人是不领任何薪饷的。以后，他们才领到两个奥波尔 (此外还发给两个奥波尔作为伙食费，伙食由军人自行解决)，有时重步兵甚至可以领到两个德拉马。军官领双饷，骑兵领三份，高级军官领四份。仅重装骑兵在平时每年就花费 40 塔兰特 (4 万美元)，在战时则花费更多。战斗队形和战法都非常简单：方阵居中，兵士伸出长矛，并用盾牌掩护整个正面。他们向敌人的方阵进行全正面攻击。如果第一次攻击不能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则以剑进行格斗解决战斗。这时，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攻击敌人的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在敌人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奋战，利用敌人队伍中任何小的混乱。如取得胜利，他们就进行追击，如遭到失败，则尽可能掩护退却。他们还被利用来进行侦察和袭击，在敌人行军时，特别是通过隘路时，扰乱敌人，力图截获敌人的辎重和捕捉掉队人员。因此，战斗队形非常简单，方阵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方阵的较小单位之区分并不具有战术意义；这些单位的长官的任务只是监视方阵的队形，使其不致破坏或者在万一被破坏时可以迅速恢复。从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已指出雅典军队在波斯战争时期的数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期，参加野战的有 13 000 名重步兵，担任守备的有 16 000 人 (这是些最年轻和最年老的兵士)，另外还有 1 200 名骑手和 1 600 名弓箭手。根据倍克的计算，雅典派往叙拉古的军队有 38 560 人，后来去增援的达 26 000 人，共计约有 65 000 人。雅典在这次远征¹²完全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确实不亚于法国在 1812 年俄国战局中所

遭受的损失。

在希腊各国中，斯巴达是 *par excellence* (最) 尚武的国家。如果说雅典人的普遍体育训练是锻炼技巧和增强体力同时并重，那末斯巴达人则着重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把坚毅精神和保持军人荣誉看得比机警灵巧更为宝贵。虽然雅典人受到了在重装方阵的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的训练，但需要时他们也能在轻装部队中作战。相反，斯巴达人仅仅受到在方阵中作战的训练。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方阵决定战斗结局时，斯巴达人最后总是占上风的。在斯巴达，每一自由公民从 20 到 60 岁都列入军队的花名册。监察官 (*ephoroi*) 确定应征的人数，通常是从 30 到 40 岁的中年人中募集。和雅典一样，同一部落或同一地方的人员编在同一部队。军队的编制以莱喀古士所定的小队 (*enomotiae*) 为基础；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 (*pentecostes*)，两个中队合成一个大队 (*lochus*)，8 个中队即 4 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 (*mora*)。色诺芬时代斯巴达军队的编制就是这样；而在较早时期，编制则似乎不同。联队的人数不定，由 400 人到 900 人；据说有一个时期曾有 600 个联队。这些自由斯巴达人的各种不同的队伍编成方阵；构成方阵的重步兵武装以长矛、短剑和系在脖子上的盾牌。以后，克利奥米尼采用了加里亚的一种用带子缚到左肘上的宽盾，使兵士的两手能自由活动。斯巴达人认为，他们的兵士在战败归来时丢失盾牌是耻辱的；保存盾牌就证明：退却是完全有秩序的，方阵是完整的；而单个的逃跑者要逃命时，当然就不得不丢掉他那笨重的盾牌。斯巴达方阵一般纵深有 8 列，但有时可把一翼配置在另一翼之后，使方阵纵深增加一倍。兵士大概走得很整齐，也能作一些极简单的队形变换，例如，每一兵士向左右转来变换正

面,以左右转弯使一翼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等,但是这些队形变换似乎是在较后的时期才采用的。斯巴达的方阵和雅典的方阵一样,在它们极盛时代只是进行全正面攻击。方阵各列之间的距离如下:行军的为6英尺,攻击时为3英尺,而在迎击时则为 $1\frac{1}{2}$ 英尺。军队由一个国王指挥,他和他的侍从武士(damosia)位于方阵的中央。以后,当自由斯巴达人大为减少时,方阵的人数就由无全权的珀里俄科(perioeci)¹³中选拔的武士来补充。骑兵从来不超过600人,每50人成一支队(ulami)。骑兵只掩护方阵的两翼。此外,还有由élite(精选的)斯巴达青年骑手300名组成的一种队伍,但是他们下马作战,形成一种保卫国王的重装卫队。在斯巴达的轻装部队中有斯基里特人——阿尔卡迪亚附近山地的居民,他们通常掩护左翼;此外,方阵的重步兵还带有仆役——赫罗泰¹⁴,后者在战斗中应起先驱兵的作用。例如,在普拉迪会战中,5000名重步兵就带了35000名轻装的赫罗泰,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他们行动的任何资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人的简单的战术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列夫克特累会战¹⁵中,埃帕米农达斯曾以人数不多的忒拜军队与人数极多而从没有打过败仗的斯巴达方阵相周旋。在这里如采取通常的全正面攻击就意味着肯定的失败,因为这样会使埃帕米农达斯的两翼遭到正面较宽的敌人的包围。因此,埃帕米农达斯不采用横队进攻,而把自己的军队排成长纵队,向斯巴达方阵中国王所在的那一翼攻击。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地点上成功地突破了斯巴达军队的阵线;然后他调转军队向突破口的两侧运动,他从两翼迂回了方阵的被突破的阵线,使方阵不打乱它的战术部署就不能形成新的正面。在曼提涅亚会战¹⁶中,斯巴达军队增大了自

己的方阵的纵深，但忒拜纵队仍然又突破了它。斯巴达的阿革西拉乌斯、雅典的提摩太、伊菲克拉特和哈布里也在步兵战术上作了改变。伊菲克拉特改善了培尔塔斯特的编制，后者是一种轻步兵，但必要时能够成横队作战。他们手持不大的圆盾和木柄的长矛，身穿结实的麻布甲胄。哈布里使方阵的前几列兵士在防御中以跪姿迎击敌人的攻击。当时采用了充实的方队以及其他形式的纵队等，随之，各种战斗队形的展开，就成为初级战术的组成部分了。同时，各种轻步兵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希腊人还袭用了他们野蛮和半野蛮邻邦的各种武器，采用了马弓手、步弓手、投石手等等。这时期大多数兵士都是雇佣兵。富有的公民自己不服兵役，乐于花钱雇人代替。原来方阵主要是军队中只允许自由公民加入的民族部分，现在却混入了无公民权的雇佣兵，因而质量就降低了。在马其顿时代的前夜，希腊和它的殖民地，如同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瑞士一样，是兵痞和雇佣兵的市场。埃及法老在早期就成立了希腊部队。后来波斯国王把希腊雇佣兵部队编入自己的军队，使军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些部队的头目真正成了十六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式的人物。在这个时期，特别是雅典人，已采用了投掷石块、梭镖和火球的各种军用器械。伯利克里在围攻塞莫斯城¹⁷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一些这样的器械。在进行围攻时，在被围城堡周围构筑一道带有壕沟或护墙的包围线，同时把各种军用器械配置在城墙附近的瞰制阵地上。为了破坏城墙通常需要挖掘地道。在强攻时，纵队列成森纳斯皮斯姆（synaspismus）式的战斗队形，也就是外面的几列兵士把盾拿在前面，而里面的几列兵士则把盾举在头上，这样就形成一种防避敌人石弹的屏障（罗马人把这种屏障叫做 *testudo*）。

正当希腊兵法如此首先致力于用可随意摆布的雇佣兵建立各种新的灵巧的部队，致力于仿效或创立各种新的轻装部队而废弃古老的多立斯重装方阵（就在那个时代是唯一能够却敌致胜的）的时候，又兴起了一个帝国，它吸取了所有真正的改革成果，创立了一支由重步兵组成的军队，其规模非常之大，使得任何一支军队同它作战时，都不能抵御它的攻势。马其顿的菲力浦建立了一支拥有 3 万步兵和 3 000 骑兵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主要部分是大约有 16 000 或 18 000 人的大方阵，这种方阵是按斯巴达方阵的原则编成的，但装备比较好。希腊式小盾牌为加里亚式长方形大盾牌所代替，中等长度的矛也为长 24 英尺的马其顿长矛（sarisa）所代替了。这种方阵的纵深在菲力浦时代为 8 到 10、12、24 列。由于马其顿长矛很长，前 6 列中每一列如把长矛端平，就可使矛尖突出在第一列的前面。要使 1 000—2 000 人这样宽的正面整齐前进，就得有很好的基本训练，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操练。亚历山大最后健全了这种组织。他的方阵通常有 16384 人，纵深 16 列，每列 1024 人。16 人一行，叫做洛赫（lochus），由站在前列的洛赫果斯（lochagus）带领。2 个洛赫为 1 个第洛赫（dilochochus），2 个第洛赫为 1 个泰特拉赫（tetrarchy），2 个泰特拉赫为 1 个塔克色阿赫（taxiarchy），2 个塔克色阿赫为 1 个克森纳加（xenagy）即辛塔格马（syntagma），也就是纵横各为 16 人的一种队形。这是编队的单位；军队行军时，按克森纳加排成纵队，正面 16 人。16 个克森纳加，即 8 个潘特科西阿赫（pentecosiarchies）或 4 个希利阿赫（chiliarchae）或 2 个泰拉赫（telarchies），组成 1 个小方阵；2 个小方阵组成 1 个中方阵，而 4 个小方阵则组成 1 个大方阵，即所说的方阵。所有这些单位各有自己的指挥官。右翼的中方阵称

为方阵之首，左翼的中方阵称为方阵之尾或末。每当方阵需要特别稳定的时候，左翼即在右翼后占领位置；排成横 512 人和纵 32 人的队形。另一方面，后 8 列展开在前 8 列之左时，正面就加宽了一倍，纵深则减为 8 列。列与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与斯巴达的方阵相同，但密集队形很密，以致在方阵内单个兵士无法转动。交战时，方阵各单位之间不许有间隔：方阵形成一个绵密的正面，en mur-aïlle（像一堵墙似地）向敌人进攻。方阵完全由马其顿志愿兵组成，但在征服希腊¹⁸以后，希腊人也同样可以加入。所有的兵士都是重步兵。除盾牌和长矛以外，他们还佩带头盔和剑，虽然在这长矛如林的攻击之后，并不常常需要用短剑进行白刃格斗。但是当方阵和罗马军团相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方阵体系，自多立斯时代的早期起一直到马其顿帝国灭亡止，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缺乏灵活性。这些纵深和正面都很大的行列只能在平坦而开阔的地形上保持队形，并整齐地移动。每遇障碍，方阵就得排成纵队，但采取这样的队形，方阵就不能作战。此外，方阵没有第二线或预备队。因此，如果方阵所遇到的敌军分成为小部队，能够不打乱战斗队形即绕过起伏地，而且排成几线，可以相互支援，那末在这样的情形下，方阵就不得不在起伏地作战，在这里这个新的敌人就会把它各个击破。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贝雷会战¹⁹中所遇到的那样的敌人，他的两个大方阵显然是无敌的。除了重装的基干步兵外，亚历山大还有由 6000 名希拉斯皮斯特 (hyraspistae) 编成的近卫军，他们的装备更重：盾更大，矛更长。他的轻步兵由手持较小的银盾的阿尔革拉斯皮特 (argyraspidae) 和许多培尔塔斯特组成；这两种兵编成半方阵，其人数通常为 8192 人；他们既可以成散开队形作战，又可以像重步兵一样成横队作战，他们的方阵常

常也能做到这一点。马其顿骑兵从马其顿和特萨利亚的贵族青年中招募；后来希腊本土的骑兵队也加入了。骑兵分为连(ilae)，仅仅马其顿贵族就编成 8 个骑兵连。这种骑兵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重骑兵的那一类：他们戴头盔、披铠甲并有铁页护胫，佩长剑，持长矛。马也有铁甲护头。这种骑兵叫做卡塔夫拉克特(cataphractae)，深为菲力浦和亚历山大重视；后者在阿尔贝雷会战中曾用这种骑兵进行决定性的机动：他先击溃波斯军的一翼，并进行追击，然后绕过他们的中央，从后方袭击另一翼。这种骑兵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形：横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轻骑兵没有护身器具，持梭镖和轻的短矛；还有一种阿克罗巴利斯特(acrobalistae)，即马弓手队。这种兵担任警戒、巡逻、侦察等任务，总之是担任非正规的战斗行动。这种兵在色雷斯和伊利里亚部落中招募。此外，这两个部落还有几千人充当非正规步兵。亚历山大创立了一种新的兵，叫做第马赫(dimachae)，这是一种既可乘马作战又可徒步作战的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曾为后人所仿效。十六世纪及其以后几世纪的龙骑兵就完全是对这一兵种的摹仿，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种古希腊时代的两用兵比现代的龙骑兵能更顺利地完它的双重任务。

亚历山大用来征服从地中海至奥克苏斯河和萨特里日河之间地区的那支军队的编成就是这样。这支军队的人数，在阿尔贝雷会战时，有两个重步兵的大方阵(约 3 万人)、两个培尔塔斯特的半方阵(16 000 人)、4 000 骑兵和 6 000 非正规军，总共约 56 000 人。在格拉奈卡斯会战时，这支包括各兵种的军队共计 35 000 人，其中包括 5 000 骑兵。

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详细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甚至关于汉尼拔曾率领多少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也有争论。同亚历山大创建的编制相比较，他的后继者的军队并没有任何改进。在战斗中使用战象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因为这种动物怕火，它们对自己军队的危害甚于对敌人的危害。最后时期（亚该亚同盟²⁰时期）的希腊军队一部分是按照马其顿的样式，一部分是按照罗马的样式组织起来的。

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步兵和密集编队占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部分用于支援和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兵士的训练方法。因此，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马其顿方阵或者是努米迪亚骑兵。

在罗马，凡年龄在 17 到 45 或 50 岁的公民，只要不是属于最低的一级或者还没有参加过 20 次步兵战斗或 10 次骑兵战斗，就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通常选入军队的只是比较年轻的人。对兵士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兵士的体力。除了使用武器和作各种运动的正规训练以外，还广泛地练习跑步、跳跃、撑竿跳高、攀登、格斗、游泳——先脱去衣服游泳，然后携带全副装备游泳。每个兵士携带 40—60 磅的全副行军装备，以每小时 4 英里的速度作长时间的行军。军事训练中也包括练习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地构筑营垒。不仅新兵，而且军团的老兵都必须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样的兵士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在共和国的极盛时代，通常有两支执政官的军队，而每一支军队又由两个军团和同盟者的部队（其步兵人数与罗马同，骑兵比罗马多一倍）组成。召募新兵在卡皮托里山或马尔斯广场的公民大会上进行；从每一特里布斯²¹中挑选出同样的人数；这些新兵平均分配到4个军团里，使之满额。有些因年龄或多次参加战斗而免除兵役的公民常常重新志愿入伍。新兵举行宣誓后，即解散回家听候召集。召集时，最年轻的和最贫穷的编入轻装兵（velitis），其次的则按年龄和财产状况编入长矛兵（hastati）和主力兵（principis），最年长的和最富的则编入后备兵（triarorum）。每一军团有1200轻装兵、1200长矛兵、1200主力兵、600后备兵和300骑兵（骑士²²），共4500人。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又各分为10个中队（manipuli）即连，而每一个中队又补充以同一数额的轻装兵。轻装兵（rorarii, accensi, ferentarii）^①编成军团的轻步兵，与骑兵一起列于军团的两翼。长矛兵列为第一线，主力兵列为第二线；他们最初都装备长矛。后备兵为预备队，装备投枪（pilum），这是一种较短的、但是非常沉重和厉害的标枪。他们在用短剑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之前先向敌人的前列投标枪。每一中队由正百人长（centurio）指挥，副百人长则作为他的助手。百人长的等级由他在军团中的位置来决定；最低的是最后一个即第十长矛兵中队的副百人长，最高的是第一后备兵中队的正百人长（primus pilus），军团的指挥官不在时，他甚至负责指挥整个军团。通常 primus pilus 指挥所有的后备兵，同样，primus princeps（第一主力兵中队的正百人长）则指挥所有的主力兵，primus hastatus

① 站在后备兵后面的轻装部队、轻装轻助部队、弓箭手。——编者注

(第一长矛兵中队的正百人长)则指挥军团所有的长矛兵。在比较早的时期,军团由6个军事护民官轮流指挥,每人指挥两个月。在第一次国内战争²³以后,每个军团都设有次帅,他是军团的常任长官;护民官这时大部分成为担任参谋或行政职务的人物。三线兵士在武器上的差别到马利乌斯时代就消失了。投枪开始装备给军团三线的所有兵士,从此以后它就成为罗马人的民族武器了。以前由于年龄和服役年限长短而产生的三线兵士在质量上的差别不久也消失了。照萨卢斯提乌斯的说法,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梅泰鲁斯同尤古尔塔会战²⁴中。马利乌斯把军团的30个中队缩编为10个大队(cohortis),分为两线,每一线5个大队。同时,大队的额定人数增加到了600人,在primus pilus指挥下的第一大部队持有军团的鹰徽²⁵。骑兵像从前一样分编为小队(turma),每一小队有兵士30人和十人长(decurio)3人,其中第一人指挥小队。罗马步兵的护身器具是长4英尺宽2 $\frac{1}{2}$ 英尺的椭圆形的木盾,外包皮革,用铁钉铆合,中间有突起部分(umbo)以抵挡长矛的刺击。头盔是铜制的,一般后部较长以掩护颈部,用包有铜页的反带系在头上。约一英尺见方的胸甲,用鳞状的皮带由肩上套下,系在皮铠甲上。百人长的护身器具是包有铜页的锁子甲。右腿由于伸出时易受到佩剑的碰撞,因此用铜页包裹着。短剑用于刺杀比用于砍劈更多,所以除短剑外,兵士还携有一种重投枪,这种投枪的杆长4 $\frac{1}{2}$ 英尺,铁尖长1 $\frac{1}{2}$ 英尺,因此全长约6英尺,杆的横断面为2 $\frac{1}{2}$ 平方英寸,重约10或11磅。这种投枪投掷10—15步远的距离,它常常可以穿透盾和胸甲,因此几乎总能击倒敌人。轻装兵装备较轻的短梭标。在共和国的后一时期,当蛮族组成的辅助部队开始执行轻装部队的勤务时,这种步兵就完全消失了。骑兵装备有

和步兵相同的护身器具，并持有矛和较长的剑。但是罗马的民族骑兵并不是十分出色的骑兵，它们宁愿在徒步队形中作战。后来，它就完全被废除了，为努米迪亚、西班牙、高卢和日耳曼的骑兵所代替。

罗马军队的战术队形具有很大的运动性。列队时中队之间的间隙同每一中队正面的宽度相等，中队的纵深在 5、6 列到 10 列之间。第二线各中队配置在第一线各中队的间隙的后面；后备兵站得更靠后些，但正面已经是绵密的。根据情况，每线的各个中队可靠拢而形成绵密的正面，或者第二线的各个中队前出并填补第一线的间隙，最后，如果有较大的纵深时，每个主力兵中队站到相应的长矛兵中队的后面，使纵深加倍。当被迫同皮洛士的战象交锋²⁶时，所有三线都留有空隙，以便给战象空出一条穿过整个战斗队形的直路，而且每个中队都掩护前面的一个中队。这种队形在一切方面顺利地克服了方阵动转不灵的缺点。军团能在方阵不敢去的地形上前进和机动而不搅乱战斗队形，并且不致冒很大的危险。经过障碍物时，通常至多只需要一两个中队缩小正面，而且在几分钟内正面即可恢复。军团能用轻装部队掩护整个正面，因为他们能够在各线中队前进时通过间隙向后撤退。但主要的优点是军队排成了几线，可根据情况依次投入战斗。而采用方阵体系时，战斗的结局决定于一次突击。预备队内没有在失利时能加入战斗的生力军，——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没有预见到。军团可使用自己的轻装部队和骑兵，同敌人全线接战；它可以用第一线的长矛兵抵御敌人方阵的攻击，而长矛兵却不是那样容易被击败的，因为这首先必须把 10 个中队中的至少 6 个中队各个击破；它还可以出动主力兵疲惫敌人，而最后用后备兵去取得胜利。这样，统帅就掌握了对军队

和会战进程的指挥,而方阵则一旦交锋,就把全部力量推入其中,并且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如果罗马的统帅想要中止会战,军团的组成使他能够以预备队占领阵地,然后已投入战斗的部队可由间隙后撤,自行占领阵地。在一切情况下,总有一部分军队保持完整的队形,因为即使后备兵被击退,但他们后面仍有已排列起来的第一、二两线。当弗拉米尼努斯的军团在特萨利亚平原同菲力浦的方阵作战²⁷时,他们的第一次攻击一下就被击退了,但攻击一个接着一个;马其顿军队开始疲惫了,他们的严整的战斗队形部分地被削弱了;凡是显露紊乱征候的地方,就有企图楔入这个笨拙不灵的人群中的罗马中队出现。最后,当20个中队自翼侧和后方攻击方阵时,战斗队形就不可能保持住了,纵深的队形瓦解了,变成了四处逃窜的人群,会战终于失败。为了对付骑兵,军团排列成 orbis——一种以辎重居中的特殊的方队。行军中可能遭到攻击时,军团则排列为 legio quadrata——一种以辎重居中而正面宽大的特殊的长纵队。当然这只有在开阔的平原上,在可以照直运动的地方才能应用。

在凯撒时代,军团多半是在意大利利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来补充的。在同盟战争²⁸以后,公民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兵役的义务扩大到了整个意大利,因此,这时适于服兵役的人员便大大超过了需要。军饷几乎等于雇工的工资;因此,新兵绰绰有余,甚至不需要实行强迫征兵的办法。只有在特殊的场合,军团才在各省招募新兵;例如,第五军团就是凯撒在罗马高卢²⁹招募的,但后来这个军团的兵士 en masse (毫无例外地)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军团绝对没有达到过4 500人的编制人数;例如,凯撒的各个军团就很少超过3 000人。他们宁愿把新兵编成新军团 (legiones tiro-num——(新

兵军团)),而不愿把新兵和老军团的老兵混编在一起;这些新编的军团最初不允许参加野战,主要使用它们来警卫兵营。军团分为10个大队,每一大队有3个中队。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等名称仍然保存,它仅仅是为了按上述制度表明指挥官的等级;对于普通兵士来说,这些名称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每个军团第一大队的6个百人长有权参加军事会议。百人长都是普通兵士出身,很少取得比这更高的地位;由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组成的主帅本人的参谋部是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这些青年人会很快地提升到军事护民官一级,然后又提升到次帅(legatus)一般。兵士的武器仍然是投枪和短剑。除了装具外,兵士还要背负35到60磅的行李。携带行李的用具非常笨重,以致兵士在准备战斗时必须先把行李卸下。部队野营的用具由骡马驮载,一个军团需要500匹左右。每一军团都有自己的鹰徽,每一大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凯撒从自己的军团中选拔一定数量的兵士(antesignani)担任轻步兵,这些人员既要适于担任轻装部队勤务,又要适于在横队中进行近战。此外,他还有各省的辅助部队:克里特岛的弓箭手,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高卢和努米迪亚部队以及日耳曼雇佣兵。他的骑兵一部分由高卢部队组成,一部分由日耳曼部队组成。罗马的轻装兵和骑兵在这以前不久就消失了。

军队的参谋部由元老院任命的次帅组成;他们是主帅的助手,主帅派他们担任各独立部队或战斗单位的指挥官。凯撒第一次委派特任次帅为军团的常任指挥官。如次帅不敷分配,则由财务官(quaestor)担任军团的指挥。他本人主管军队的财务和军需,同时有许多官吏和传令官(apparitores)帮助他。参谋部还有派来担任副官和值日官的军事护民官和上述志愿入伍的青年(contuber-

nales, comites praetorii——(主帅的随从人员);但在会战时他们和普通兵士一样,加入由大本营的执法官(liictoris)、官吏、仆役、密探(speculatores)和传令官组成的cohors praetoria(主帅的随从大队)作战。此外,主帅还有一种由老兵组成的私人卫队,这些老兵是应自己的老长官的召唤而重新志愿入伍的。这种卫队在行军中乘马,但徒步作战,他们被认为是军队中的élite(精兵);他们掌管和保护vexillum——作为全军标志的旗帜。作战时,凯撒通常把军队列为三线:每一军团的4个大队为第一线,第二和第三线各3个大队;同时第二线各大队位于第一线各大队的间隙之后。第二线必须支援第一线;第三线是对敌人正面或翼侧进行决定性机动以及击退敌人决定性突击的总预备队。如果一旦因敌人向翼侧迂回而必须延长正面时,则军队只列为两线。至于列为一线(acies simplex(普通的战斗队形)),则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这样做,那时在大队之间不留间隙;但是在保卫兵营时,这种队形就成了常规,因为一线的纵深也仍然有8—10列,可以由垒墙上排列不下的兵士组成预备队。

奥古斯都完成了把罗马军队变为常备的正规军的事业。他把25个军团分驻在整个帝国内:8个军团配置在莱茵(他们被视为全军的主力——praecipium robur),3个军团配置在西班牙,2个军团配置在非洲,2个军团配置在埃及,4个军团配置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6个军团配置在多瑙河流域各省。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全部是在意大利本土征召的精锐部队,是皇家近卫军;近卫军起先由12个大队组成,以后由14个大队组成;此外,罗马城还有原先被解放了的奴隶组成的市警备队(vigiles(武装守卫))7个大队。除了这支正规军以外,各省仍必须编成轻装的辅助部队,这时他们大部

分已变成一种担任警备和警察勤务的民兵了。但是在受到袭击威胁的边境上,不仅使用这些辅助部队,而且使用外籍雇佣兵来担任战斗勤务。在图拉真时代,军团的数量增加到 30 个,及至赛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代又增加到 33 个。军团除番号以外,还按其驻地命名(L.Germanica, L.Italica(日耳曼军团、意大利军团)),按皇帝称号命名(L.Augusta(奥古斯都军团)),按神名命名(L.Primigenia, L.Apollinaris(丘必特军团、阿波罗军团))或按授予他们的奖章命名(L.fidelis, L.pia, L.invicta(效忠军团、虔信军团、无敌军团))。军团的编制有了一些改变。这时,指挥军团的人叫做司令官(praefectus)。第一大队在人数上增加了一倍(cohors milliaria(千人队)),军团的额定人数增加为步兵 6 100 人,骑兵 726 人;这是最低限额,必要时尚可增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cohors milliaria。Cohors milliaria 由军事护民官指挥,其余的大队则由护民官或 praepositi(长官)指挥;因此,百人长的官衔这时就成为下级指挥官的官衔了。通常参加军团的是释放了的奴隶、奴隶和各省居民,总之是各色各样的人。在意大利,只有禁卫兵才必须是罗马公民,但是以后这一规定也取消了。因此,军队中的罗马人很快地就被淹没在野蛮的和半野蛮的、罗马化的和非罗马化的成分的洪流之中了;只有指挥官仍然是罗马人。军队成分的这种恶化也立即反映在它的装备和战术上。重胸甲和投枪被取消了;造就世界征服者的疲劳的训练制度开始为人们厌弃;仆役和豪华奢侈对军队已成为必需,impedimenta(辎重)随着军队吃苦耐劳的精神的削弱而增加了。就像在希腊一样,衰落的特点表现在轻视重装的基干步兵,迷恋各种轻武器和搬用野蛮人的武器和战术。因此,出现了许多装备有各种各样的投掷武器的轻装兵(如 auxiliatores, exculcatores,

jaculatores, excursatores, praecursatores, scutati, funditores, balistarum, tragularum (辅助兵、前卫部队、长矛投掷手或梭镖投掷手、侦察兵、先驱兵、盾牌手、投石手、弩炮手、带索长矛投掷手)), 而据维格齐说, 骑兵改进的方向是仿效哥特人、阿兰人和匈奴人³⁰。最后, 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装具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 而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丧失罗马特征的军团的遗骸而前进了。

因此, 同日耳曼人对西方的征服相抗衡的, 就只有古罗马战术微弱的传统、它的可怜的残余了; 但是甚至这点可怜的残余这时也一扫而光了。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 也像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 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封建制度虽然按其起源来说也是一种军事组织, 但本质上却是和一切纪律不相容的。大诸侯及其军队的暴动和叛离是寻常的现象。给各首领下达命令常常成了喧嚷不休的军事会议, 因而要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所以, 战争很少在决定性的地段进行; 为了争夺某一地点, 需要许多次征战。在整个这一时期 (概略地指六世纪至十二世纪这个混乱时期), 唯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和十字军远征³¹, 而且无论这一次或那一次的军事行动都同样没有什么结果。

由封建的仆役和部分农民补充的中世纪的步兵, 主要是些长矛手, 他们大都无济于事。单枪匹马冲入这个没有保护的人群之中乱劈乱杀, 这是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骑士的拿手好戏。当欧洲大陆上的一部分步兵装备以弩的时候, 英国农民的民族武器则是大弓。这种大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 它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津库尔等会战³²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雨水常常

会使弩失效，而这种大弓却不怕雨，它可以把箭射出 200 码以外，只比旧式滑膛火枪的射程稍小一些。箭可以穿透一英寸厚的木板，甚至可以穿透胸甲。因此，大弓甚至对最初的轻火器也还长期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当时的火枪每装填和发射一次，大弓就可以连射六次；甚至在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还企图重新把这种民族的大弓列为战斗的武器。这种大弓对付骑兵特别有效，即使重装骑手的披甲可以防避箭矢，但箭矢却可以射伤或者射死马匹，从马上摔下的骑士会因此而无法战斗，并且常常被俘。弓箭手或者成散开队形，或者成横队作战。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全身披甲的骑士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有战斗力的、采用正规队形攻击的重骑兵。亚历山大的卡塔夫拉克特虽然也曾决定过阿尔贝雷会战的结局，但究竟是例外，所以在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它的传说了，而且在古代史的整个后一时期，步兵始终在战场上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因此，中世纪所赐给我们的唯一进步是骑兵的创立，我们时代的骑兵就是从那个时代的骑兵直接传下来的。然而这种骑兵的笨重程度，可以由下列事实来证明：在整个中世纪，骑兵是装备笨重、行动缓慢的兵种，而一切轻装部队的勤务和迅速的运动都是由步兵来担任的。不过，骑士并不常常成密集队形作战。他们宁愿一个对一个地决斗或者驱入敌人的步兵群中；因此，作战方法就又恢复到荷马时代了。当骑士成密集队形行动时，他们就或者成横队（骑士在第一列，比较轻装的侍从兵在第二列），或者成长纵队攻击。通常，这种攻击只有用来对付敌军的骑士（重装骑手）；如果对付步兵，这种攻击就是白白浪费兵力。马匹本身的披甲和骑手的披甲加重了马匹的负担，使它只能缓慢地作短距离的运动。因此，在十字军远征以

及在波兰和西里西亚同蒙古人作战的时期³³，这种行动缓慢的骑兵经常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中，最后终于被东方的行动迅速的轻骑兵击败。在奥地利和勃艮第对瑞士的战争³⁴中，重装骑手在难通行的地形上陷于困境，不得不徒步而行，并构成比马其顿方阵更为动转不灵的方阵；在狭谷中，敌人从山上往下滚木礮石，结果方阵的战术队形紊乱了，而后就被敌人坚决的攻击所打散。

到十四世纪，有了一种比较轻便的骑兵，一部分弓箭手为了便于移动，也乘马行进；但是由于使用了那种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火药，这些和其他一些改进，不久就成为无用的东西而被废弃或者具有另一种意义了。

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他们东面的各国人民那里学来的，后者却又是从最初的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在十四世纪上半叶，欧洲军队最先开始采用火炮；这是一种发射石弹的笨重的大火炮，只适用于围攻战。但是不久就发明了轻火器。1364年，意大利的佩鲁贾城有了500支轻火器，它们身长约8英寸；这种火器后来就发展为皮斯托尔（即手枪，因托斯卡纳省的皮斯托亚城而得名）。不久以后，又制造出较长和较重的轻火器——明火枪，和我们现在的枪相仿，但是，由于枪身短而重，明火枪只能射到很短的距离，而导火索是准确瞄准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此外，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到十四世纪末，在西欧任何一国军队都已有炮兵和装备明火枪的部队了。但是，新武器对整个战术的影响是极不显著的。无论是火炮或者是轻火器装填弹药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又非常笨重和昂贵，因此甚至到1450年也还不能代替弩。

但是封建制度的总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诸侯或者像在法国那样臣服于中央政权，或者像在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变成了类似独立君主的君主。下层贵族的力量为联合城市共同行动的中央政权所粉碎。封建的军队不再存在了，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编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但是这些雇佣兵，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们，很难使他们服从纪律，而且又不能很按时给他们发薪饷，所以惹出了很大的乱子。因此，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了由本国入组成的常备军。1445年，他征召了15个 *compagnies d'ordonnance*^①，每连600人，共有骑兵9000人，分驻在王国的各城并按时领取薪饷。每连分为100个长矛手组，长矛手组由重装骑手1人、弓箭手3人、侍从兵1人和侍童1人组成。可见，他们是重骑兵和马弓手的混合体，当然这两种兵在会战中都是单独行动的。1448年，他增补16000名自由射手归4个将军指挥，每人指挥8个连，每连500人。所有的弓箭手都备有弩。他们由教区征召和武装起来，而且被免除了一切捐税。这种军队可以说是近代的第一支常备军。

到现代战术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的末期，战术仍然是它脱离中世纪混乱状态时的那个样子，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由雇佣兵组成的大部分步兵装备有长矛和短剑、胸甲和头盔。他们在交战时密集成群，但是由于装备和训练都比封建的步兵好，所以在战斗中比较坚定而有秩序。定期征召的新兵和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显然比偶尔征召的新兵和封建仆役的乌合之众高出一筹。这

① 敕令连——根据国王的敕令而成立的骑兵连。——编者注

时，重骑兵也往往认为必须以密集的队形攻击步兵。轻步兵仍然以弓箭手为主，但在先驱兵中已广泛使用轻火器了。骑兵还是主要的兵种；重骑兵——裹以铁甲的重装骑手——已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由贵族担任，而且已从过去的骑士式和荷马式的作战方法转而采用密集队形的比较单调的攻击了。不过这时大家都认为这种骑兵过于笨重，于是就开始想出各种办法来建立一种比较灵便的骑兵。如上面所说的，马弓手势必已经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意大利和它的邻国开始采用一种非正规兵斯特拉底阿特（*stra-dioti*）——由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雇佣兵组成的土耳其式的轻骑兵。人们非常害怕这种骑兵，特别是在追击时。波兰和匈牙利除了模仿西方建立的重骑兵以外，还保留着本民族的轻骑兵。炮兵仍处于幼年时代。那时的重炮固然曾经运到战场上，但一经占领阵地，就无法转移了；火药很坏，弹药的装填既困难又缓慢，而用石弹发射，则仅能发射到很短的距离。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立刻在两个方面有了进步：法国人改良了火炮，西班牙人使步兵具有了新的特性。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使火炮变得相当灵便，不仅可以把它拉到战场上，而且可以在战斗时变换阵地，在军队移动时随军队前进（不过那时军队的移动并不很迅速）。因此，查理八世是野战炮兵的创始者。他的火炮装置在带车轮的炮架上，由许多马匹拉曳，比意大利人的笨重的旧式火炮（用犍牛驮运）不知要强多少倍。这种火炮给意大利步兵的长纵队造成极大的损失，以致马基雅弗利写他的“兵法”³⁵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想出一种队形来防止这种炮兵对步兵的杀伤。在马利尼亚诺会战³⁶中，由于这种火炮射击效果好、移动灵便，并且从翼侧阵地对瑞士军队的战斗队形进行轰击，法国国王弗朗

斯瓦一世才得以击溃瑞士的长矛队。然而，长矛在步兵中的优势消失了。西班牙人改良了当时通用的轻火器（明火枪），并用以装备正规的重步兵。他们的火枪（hacquebutte）是一种重的长管武器，枪膛可容纳重2盎斯的子弹，发射时架在叉架上。这种火枪所发射的子弹可以穿透最坚固的胸甲，因此它在同重骑兵战斗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当骑手落马，重骑兵就陷入混乱之中。每一长矛手连配备10—15名火枪手，在帕维亚会战³⁷中，他们射击的效力使联军和敌人都感到惊异。弗龙兹堡曾说，在这次会战中，这种火枪发射一次通常就射死几个人和几匹马。从此以后，西班牙步兵的优势就开始了，并且继续了一百多年。

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³⁸对军队的编制有重大的影响。不论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大大改善了各兵种。在这以前，每一个愿意加入雇佣军的人都必须自备全套装具和武器，并会使用自己的武器。但是在不大的地区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这场长期战争中，这种合适的新兵很快就感到不够用了。荷兰人不得不满足于他们所能搜罗到的体格适合的志愿兵，而且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训练。拿骚的摩里茨编写了近代第一部操典，从而为整个军队的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步兵又重新开始操练步伐了；他们已经变得更整齐划一和紧密了。这时他们被编为较小的单位：过去每一连有400—500人，这时减少到150—200人，并且10个连编成一个团。改良的火枪排挤了长矛；整个步兵有三分之一是火枪手，和长矛手混编在一个连内。长矛手只有在白刃格斗中才需要，他们仍然保留了头盔、胸甲和铁护手，火枪手则没有任何护身器具。长矛手通常排为两列，火枪手排为5—8列；第一列齐射后即后退，重新装弹。骑兵的变化更大，在这方面拿骚的摩里茨再次

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不可能建立由重装骑手组成的重骑兵，他就建立了轻骑兵。这种骑兵是他在德国招募的，装备以头盔、胸甲、护肘、铁护手和高筒靴；但是他们只有长矛，不能同重装的西班牙骑兵相抗衡，所以他就给他们装备双刃刀和长手枪。这种同我们现代的胸甲骑兵相近似的新式骑兵，很快就表明他们比人数较少和不太灵便的西班牙重装骑手优越，因为新式骑兵在这一群行动缓慢的重骑兵向他们猛扑之前，就可以射杀重骑兵的坐骑。拿骚的摩里茨像训练步兵一样精心地训练胸甲骑兵；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敢于在会战中变换正面和以小股或大股骑兵作其他的机动。阿尔巴不久也认为必须改善自己的轻骑兵；在这以前，轻骑兵只适合于成散开队形作战和单个格斗，但是在他的统率之下，这种骑兵不久就学会了像重骑兵那样成密集队形攻击。骑兵仍和从前一样，排成5—8列。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建立了一种新式骑兵——龙骑兵；在最初这不过是一种专门为了比较迅速的移动而乘马的步兵；但是经过了几年，当他们装备了适于步骑两用的装具后，人们就把他们当作骑兵一样来使用了。他们没有任何护身器具，也没有高筒靴，但是装备了骑兵用的双刃刀，有时也持长矛；此外，他们还带有步兵用的火枪或者较短的马枪。但是这种军队并没有实现在创建时所寄予他们的希望；他们不久就成为正规骑兵的一部分，不再当作步兵来作战了（俄国皇帝尼古拉企图恢复原先的龙骑兵，编成了既适于骑马作战又适于徒步作战的16 000人的一个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徒步作战过，一直用作骑兵，因此这个军现在已改编，作为骑马的龙骑兵而合并到俄国的其他骑兵中去了）。法国人在炮兵方面保持着他们已取得的优势。大约在这个时期，他们发明了一

种牵引索，而亨利四世还采用了霰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同样使他们的火炮简便并比较轻巧一些了，但它们仍然是笨重的，而口径和射程都适于进行有效射击的轻便火炮，那时还没有发明。

三十年战争³⁹开始了十七世纪伟大的军事改革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时代。他的步兵团三分之二由火枪手组成，三分之一由长矛手组成。有一些团则完全由火枪手组成。火枪制作得非常轻便，射击时用的枪架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古斯塔夫-阿道夫还采用了一种纸造的弹壳，使得装填大为简便。纵深的队形废除了；长矛手排为6列，火枪手则只排为3列。这些火枪手受按排和按列射击的训练。人数达2000或3000名的庞大的团减少到1300或1400人，编为8个连，而且两个团编成一个旅。他采用这样的队形，打败了常常编为30列（类似纵队或方队）的密集成群的敌人，他的炮兵使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骑兵也根据这样的原则进行了改编。重装骑手被完全废除了。胸甲骑兵取消了护肘和其他无用的护身器具，这就使他们更加轻便灵活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龙骑兵几乎总是当作骑兵来作战的。无论是胸甲骑兵或者是龙骑兵都只排为3列，并且奉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因射击耽误时间，而应当立即持双刃刀冲锋。他们分编为骑兵连，每连125人。炮兵也因为有了轻炮而改进了。虽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蒙皮炮曾闻名一时，但是没有维持多久。它们为四磅铁炮所代替，这种铁炮非常轻便，用两匹马即可运走；在火枪手发射两次的时间内，这种铁炮能发射6次；每个步兵团都有两门这样的火炮。这样一来，野战炮就分为轻炮和重炮两类；轻炮随伴步兵作战，而重炮则留作预备队或者在整个会战期间占领某一阵地。在这一时期的军队中已开始显示出步兵对骑兵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了。在1631年莱比锡

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步兵 19 000 人、骑兵 11 000 人，梯利有步兵 31 000 人、骑兵 13 000 人。在 1632 年吕特岑会战中，华伦斯坦有步兵 24 000 人、骑兵 16 000 人（170 个连）。火炮的数量也因为采用了轻炮而增加了；瑞典军队通常每一千名兵士有 5—12 门火炮；而在雷赫河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 72 门重炮的火力的掩护下强渡了该河⁴⁰。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上半叶，随着步兵普遍地采用刺刀，长矛和各种护身器具就完全废除了。大约在 1640 年法国发明的刺刀曾不得不和长矛相争 80 年之久。奥地利人最先用刺刀装备了他们的全体步兵，随后是普鲁士人；法国人把长矛一直保持到 1703 年，俄国人则保持到 1721 年。燧发机和刺刀几乎同时在法国发明，也是到 1700 年才逐渐为大多数军队所采用。它大大缩短了装弹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护火门上的火药免受雨淋，这就更加有助于废除长矛了。但是，射击仍然进行得很慢，兵士在整个会战期间通常最多能发射 24—36 发子弹；只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由于操典的改进，训练的改善，轻火器构造的进一步改良（特别是由于普鲁士最初采用的装弹铁探条），才使得兵士能以相当大的速度来射击。这就使得队形的纵深必须更加缩小，所以这时步兵仅仅排为 4 列。当时建立了一种 *élite*（精选的）步兵——掷弹兵连，他们原先是用来在进行白刃格斗以前投掷手榴弹的，但不久就只用火枪作战了。某些德国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已经建立了一种装备线膛枪的猎兵，而线膛枪是 1498 年在莱比锡发明的。这种武器这时与普通的枪并用，每个连的优秀射手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但是除了在德国以外，这种武器并不享有很大的声誉。奥地利人也建立了一种轻步兵，叫做潘都尔（*pandours*）。这是来

自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区^①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适于奔袭和追击，但从当时的战术观点来看，由于他们毫无训练，他们在正规的会战中就不适用。法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种非正规步兵，叫做 *compagnies franches*（自由连）。在各国军队里，骑兵的装备也减轻了。重装骑手完全消失了，胸甲骑兵只留有胸甲和头盔；在法国和瑞典，甚至连胸甲也废除了。步兵的射击效力和射速的日益提高，对于骑兵是非常不利的。不久，人们都认为这一兵种完全不适于持双刃刀向步兵冲锋；关于无法通过火线的观点当时非常流行，以致骑兵也养成了比使用双刃刀更多地使用马枪的习惯。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双方的骑兵如同步兵一样在相互之间进行火力战斗；骑马冲至距敌人 20 码的地方，放一排枪，然后全速猛冲，这被认为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但是查理十二坚持了他的伟大的先辈^①规定的原则。他的骑兵从不停顿下来射击；不管当面的是骑兵、步兵、炮队还是战壕，他们总是手持双刃刀冲锋，而且向来都是胜利的。法国人也放弃了新的战法，又单靠双刃刀来作战了。骑兵战斗队形的纵深更加缩小，由 4 列减到 3 列。此时炮兵减轻大炮的重量、使用弹筒和霰弹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个重大的新措施是把这一兵种列入军队的编制。在这以前，虽然火炮属于国家，但是操作火炮的人却不是兵士，他们组成了一种行业，炮兵不算是一个兵种，而算是一种手艺。炮兵军官没有军阶，与其说把他们归入有军官特权的贵族，不如把他们归入像裁缝和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但是，在这个时期前后，炮兵成了军队的组成部分，并且开始分编为连和营；操作

^① 古斯塔夫-阿道夫。——编者注

火炮的人成了正规的兵士，而军官也有了和在步兵及骑兵中一样的军阶。由于这种改革而造成的炮兵的集中使用和人员的固定，就给在旧制度下不能发展的炮兵学开辟了道路。

由纵深队形到线式队形的过渡，由长矛到火枪的过渡，由骑兵的优势到步兵的优势的过渡，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征战并随之开始了线式战术的极盛时期才逐渐完成的。他把步兵排为 3 列，使射击每分钟达到 5 发。在莫耳维茨⁴²的最初的几次战斗中，这种步兵就展开成一线，在奥地利骑兵刚刚击溃了普鲁士骑兵后，即以速射击退奥地利骑兵的各次攻击；消灭了奥地利骑兵以后，普鲁士步兵攻击了奥地利步兵，击败了他们，因而赢得了会战的胜利。在大的会战中从来不用方队去抵抗骑兵，即使采用的话，也只是限于步兵在行军中突然遭到骑兵袭击的场合。在会战中，步兵的外翼如果受到骑兵的威胁，通常认为只要延伸和折成 *en potence*（拐子形）也就行了。为了同奥地利的潘都尔作斗争，弗里德里希建立了一种类似的非正规的步兵和骑兵，但是在正规的会战中从来不依靠他们，他们很少参加会战。进行射击的横队缓慢地向前推进，就能解决会战。以前为他的前辈^①所忽视的骑兵，这时经历了充分的改革。它只排为两列，除了在追击敌人的场合以外，严格禁止射击。马术训练过去一直很少为人注意，而这时期受到极大的重视。各种队形变换必须跑步进行，因此要求兵士特别注意保持密集队形。弗里德里希的骑兵经过泽德利茨的努力压倒了当时的其他一切骑兵或者以前任何时代的骑兵：他们步伐的矫健、队形的整齐、攻击的勇猛、集合的迅速，这也是以后许多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时代的骑兵无法和它相比的。炮兵变得非常轻便，以致有些大口徑的火炮经受不起全装药的射击，因此后来不得不废除了。但是，重炮兵由于炮架质量不好而又笨重，组织也不完善，所以运动仍然十分缓慢和不灵活。会战一开始，他们就占领自己的阵地，有时虽向前变换阵地，但不能作任何机动。轻炮兵（编入步兵的团炮）配置在步兵横队的前面，即在营与营的间隔前 50 步的地方；它们和步兵一同前进，火炮由兵士拖着，在 300 码的距离用霰弹射击；炮的数量很多，每一千名兵士有 3—6 门。步兵和骑兵一样分编为旅和师；但是在接战后，军队几乎完全不进行机动，而且每一营都必须在总的横队中占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战术意义；至于骑兵，那末在攻击中，旅长在某种场合下可以机断行事；然而在步兵中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线式队形（步兵成两线居中，骑兵成两线或三线居于两翼）同以前几个时代的纵深队形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队形使尽可能多的人员能同时参加作战，因而发挥了步兵火力以及骑兵攻击的最大效力；虽然它在这方面很完善，但是正由于这种缘故，它就像紧身服一样束缚了整个军队。每个骑兵连、步兵营和每门火炮在战斗队形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队形无论在什么地方遭到破坏或者稍有混乱，就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行军中必须很好地予以组织，以便当军队为了宿营或者作战而展开时，每一单位正好处于预先规定的位置。因此，如果需要完成某种机动，就得全部军队都来进行；在只适于成线式队形作战的军队行动如此缓慢而且战斗队形又如此不灵活的情况下，要派遣部分兵力进行侧击或者建立专门的预备队以使用优势兵力进攻某一个弱点，那是不可能的和错误的。此外，在作战时，这种宽横队为了不破坏队面的整齐，前进得非常缓慢。帐篷总

是随军队前进，并且每晚都得打开；营地周围还得构筑轻型工事。军队由兵站来补给粮食，大量的野战面包房随军行进。总之，所携带的物资和其他辎重十分累赘，给军队的运动造成了现今不可想像的困难。但是，虽然有这一切缺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组织还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仿效它。军队的兵员补充几乎到处是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并辅之以欺骗和强迫的征集；只是在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后，弗里德里希才在各省实行强迫征兵的办法。

同盟国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⁴³开始后，法国军队由于军官的损失而瓦解了，军队总数不到 15 万人。敌军的人数多得多；于是法国就必须再行招兵，而且是以招收国民志愿兵的形式大规模地进行的；1793 年，这样的志愿兵大概至少有 500 个营。这些部队均未经过训练，而且也没有时间按照复杂的线式战术进行训练，并使他们达到成线式队形运动时所要求的那样完善的程度。尽管法国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但是同排成线式队形的敌人较量的一切企图都完全失败了。这就需要创立一套新的战术。美国革命⁴⁴表明，采用散开队形和散兵进行速射，即使是训练不好的军队也可以取得很大的优势。法国人仿效了这种方法并且以长纵队支援散兵，当大部分军队仍紧密地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种纵队里小的混乱不会有大的危害。法国人由于采取这种队形，以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扑而常常取得了胜利。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队形，由于军队缺乏经验，就促使他们在起伏地、在乡村和树林中作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但能找到避开敌人火力的掩蔽地，而且敌人的线式队形到这些地方也必然发生混乱；法国人没有帐篷、野战面包房等，这就使他们必须露营，靠从周围地区取得的東西为

生。这样，他们就有了一种运动性，这是为帐篷和各种辎重所累的敌军所没有的。革命的战争创造了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他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线式战术所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候，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一直到他们的敌人学会他们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编组自己的军队时为止。新制度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恢复了旧的原则，即每一公民必要时应当应征入伍，保卫国家，结果在全体居民中用大规模或小规模地强迫征兵的方法补充军队，——这种改变立刻使军队的平均人数比弗里德里希时代增加了两倍，并且必要时还可大大增加；其次，废除了野营用具，停止由兵站仓库供应军队的给养，实行了露营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因而增大了，其程度不低于因实行普遍兵役制而造成的数量的增长。在战术编制上，把步兵、骑兵和炮兵合编到军队的较小的单位（军、师）中的原则已成了常规。因此，每一个师就成为能单独作战、甚至对占数量优势的敌人也具有相当抵抗力的一支真正的小型军队了。这时，纵队成为战斗队形的基础；纵队作为贮藏所，散兵由那里派出，又回到那里去；纵队成为向敌军线式队形某一点攻击的楔形密集集团；如果地形和战斗情况有利于采取散开队形对付敌人时，纵队可作为接敌和以后展开的一种形式。由于三个兵种合编在一个较小的军队单位里，各兵种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斗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和纵队——的配合使用，这就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了。因此，现在任何地形都适于战斗；迅速判定地形的一切利弊，根据地形特点迅速地配置自己的军队，成了对指挥官的主要要求之一。同时这种

才干以及独立指挥的一般能力不仅为总司令所必需,而且为下级军官所必需。军、师、旅、独立部队经常处于使他们的指挥官不得不冒险行事的境地;战场已经不是配置在广阔的平地上、两翼有骑兵的连绵不断的步兵线了;现在,独立的军和师排成纵队,隐蔽在村庄、道路或丘陵的后面,彼此保持看来相当大的间隔,而在决定性时机到来之前,实际上只有较小的一部分部队参加互射和炮兵的决斗。战斗队形由于军队人数的增多和这种队形的采用而拉长了;从此再不必要在敌人面前派一列部队去填补每一间隔了,因为部队控制在手中,可以在需要时占领必要的位置。迂回翼侧现在已成为普通的战略机动;比较强大的军队可以整个楔入比较弱小的军队及其交通线之间,因此一个败仗就能使全军复没和决定战局的命运。当时惯用的战术机动是:当情况表明敌人已把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时,即以生力军进行中央突破。预备队在线式战术时期是不适用的,而且只会在决战的时机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量,而现在却成了借以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战斗队形不仅沿正面延伸,同样也向纵深扩展,从散兵线到预备队配置地点常常有 2 英里和 2 英里以上。总而言之,如果说新制度较少地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的形式主义,那末它却要求上自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而自拿破仑以来,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兵器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不大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各国军队很少有时间进行这种需要时间的改革。法军在革命前不久曾有两个很重要的革新。他们装备了一种缩小口径和缩小弹丸在枪膛内的空隙的新式步枪,同时这种步枪的枪托是弯的,代替了从前使用的直枪托。这种制造比较精良的武器,大大促使法国猎兵占据优

势地位,同时它还成为步枪的典型,在击发机发明以前,其余各国军队中所使用的步枪都是按照这种式样稍加改变而制成的。其次是格里博瓦尔简化和改进了火炮的构造。法国炮兵在路易十五时代完全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火炮有各种各样的口径,炮架是过时的,甚至构造的式样也是不统一的。格里博瓦尔在七年战争⁴⁵时期曾在奥军中服务,并在那里见过一些精良的火炮,所以他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使它们比较统一,改进了样式,而且大大地简化了整个火炮的构造。拿破仑就是用他所发明的火炮和炮架来作战的。在对法战争爆发时,英国的炮兵是最坏的,但以后也大有改进,虽然这种改进是逐渐的而且是缓慢的;他们首先采用了单尾炮架(后来为欧洲大陆的许多军队所仿效)和一种使步炮兵搭乘在前车和弹药车上的装置。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创建的骑炮兵在整个拿破仑时代被大力采用,特别为拿破仑本人所大力采用;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制定出来的。当战争结束时,就发现英国人的这一兵种是最有效的。在欧洲各大国军队中,只有奥地利军队以一种炮兵连代替了骑炮兵,在这种炮兵连中,炮手乘坐在专用的车辆上。

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仍然保存着装备线膛枪的特种步兵,而成散开队形作战的新战法使这种武器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枪特别流行,在1838年法国人加以仿造,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需要远射程的步枪。他们先建立了 tirailleurs de Vincennes (文森猎兵),以后又建立了 chasseurs à pied (猎步兵);这两种猎兵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的建立推动线膛枪大大地改良了,因此不仅射程,而且射击精度都空前提高了。这些改进使得德尔文、图温南和米涅闻名于世。在1830年到1840年间,大多数军队的

步兵都采用了击发机，而落在后面的照例是英国人和俄国人。同时，各国都努力于进一步改良轻火器和制造射程更远的可以装备所有步兵的枪。普鲁士人采用针发枪——一种由枪尾装填、射速大而且射程远的线膛枪；这种枪最初是比利时发明的，普鲁士人又大大加以改良。普鲁士军队所有的轻装营都装备了这种枪；在这以前不久，其余的步兵都装备着老式的枪，这些枪略加改造就成了米涅式步枪。英国人这次最先用最完善的步枪即恩菲耳德式步枪装备了所有步兵，这种步枪是米涅式步枪稍加改良而成的；它的优点在克里木战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在因克尔芒会战⁴⁶中挽救了英军。

在步兵和骑兵的战术方面，如果不把法国猎兵对轻步兵的战术作很大的改进这一情况和普鲁士采用的新的连纵队制计算在内，那是没有什么重大改变的；这种新的连纵队制由于具有巨大的战术优点，如稍加改变，不久就一定会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队形。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仍然保持着三列横队，英国军队自拿破仑时代起一直采用二列横队；普鲁士军队在行进中采用三列横队，而在作战时则大部分采用二列横队，另一列横队则由散兵和他们的支援队构成；法国军队以往采用三列横队，在克里木战争中改用二列横队，而这个队形现在正在全军中采用。在骑兵方面，关于俄国恢复十七世纪龙骑兵的尝试及其失败，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在各国军队的炮兵中，火炮的部件大有改进，口径、车轮的式样、炮架等也都简化了。炮兵学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但是没有任何重大的改革。大陆各国的军队大多数装备着六磅和十二磅炮；皮蒙特军队装备着八磅和十六磅炮，西班牙军队装备着八磅和十二磅；过去一直使用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法国军队，现在采用所谓路

易-拿破仑式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一种能发射较小的爆炸弹的普通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用来代替其他各种野炮。英国军队在殖民地使用的是三磅和六磅炮，但派往国外的军队现在只使用九磅、十二磅和十八磅炮。在克里木英军甚至有三十二磅炮的野炮连，但这种野炮经常深深地陷入土中。

现代各国军队的一般组织都是极相似的。除英国和美国以外，军队都是由强迫征召的兵士来补充的，这里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征兵制，耶人员在军队中服满一定的期限后，就永不再服役；另一种是预备兵制度，即现役期限短，但退为预备役后，将来还要在一定期限内再次应征入伍。法国是第一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普鲁士是第二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无论正规军或民军通常都是由志愿兵来补充的英国，法律规定，如志愿兵不足，民军可采取征兵制（即抽签制）来补充。瑞士根本没有常备军，整个武装部队由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民兵组成。外籍雇佣兵的招募至今在某些国家中仍然是常例：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甚至目前还保持着瑞士籍的团队；法国还有外籍军团，英国在大战时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现役的期限是极不相同的：瑞士是 2 周，德意志各小邦是 1 年半到 2 年，普鲁士是 3 年，法国是 5—6 年，英国是 12 年，俄国是 15—25 年。军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补充。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目前对于由普通兵士晋升军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实际上这样的障碍是很多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一部分军官必须从士官中补充；在俄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所以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在普鲁士，平时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军官官衔证书，这种考试就成为受教育不多的人的障碍；在英国，由普通兵士提升为军官是极个别的现象。为了培养另一部分军官，大多数国家

都设有军事学校,可是除法国以外,各国的军官并不是非经军事学校训练不可的。在军事教育方面法国军官走在前面,在一般教育方面则是普鲁士军官走在前面;英国军官和俄国军官则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落后。至于军队所需的马匹,据我们所知,普鲁士是马匹也要强迫征集的唯一的国家,同时马匹所有者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现代军队的装备和装具目前几乎到处是相同的。当然,在武器的质量和装饰方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俄国人是落后的,而英国人由于真正享有工业发达之利,则占居首位。

在各国的军队中,步兵都分为基干步兵和轻步兵。现在,前者通常都是步兵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轻步兵在各国都是少数。目前,法国轻步兵被公认为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轻步兵,它有 21 个猎兵营,9 个朱阿夫兵营和 6 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营。奥地利轻步兵,特别是猎兵,同样是非常好的;它有 32 个营,普鲁士有 9 个猎兵营和 40 个轻步兵营;但是后者不完全适应它们特殊的使命。如果不把 6 个猎兵营计算在内,英国是没有真正的轻步兵的;除了俄国的以外,无疑要算英国的轻步兵最不适于执行这种勤务了。可以说,俄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轻步兵的,因为它现有的 6 个猎兵营在它的庞大的军队中是微不足道的。

各国的骑兵同样分为重骑兵和轻骑兵。胸甲骑兵始终都列为重骑兵;骠骑兵、猎骑兵、chevaux-legers(轻骑手)算作轻骑兵。龙骑兵和枪骑兵在某些军队中视为轻骑兵,而在另外一些军队中则被视为重骑兵;俄国如果没有哥萨克,那末可以说根本没有轻骑兵。最好的轻骑兵当然是奥地利轻骑兵,即匈牙利和波兰族的骠骑兵。炮兵也是这样区分的,只有法国例外,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他们

只有一种口径。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根据火炮口径的大小，至今还区分为轻炮连和重炮连。轻炮兵又分为骑炮兵和步炮兵两种，而且前者是专门用来与骑兵共同行动的。如上所述，奥地利军队没有骑炮兵；英国和法国军队没有真正的步炮兵，他们的炮手都乘坐在前车和弹药车上。

步兵编成连、营、团。营是战术单位；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它是军队进行战斗的组织形式。因此，营在人数上不应当过大，以便营长能用口令和目力联络信号来指挥，同时也不应当过小，以便它能够在战斗中作为独立单位行动，甚至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也能够独立行动。因此，营的人数在 600 到 1 400 人之间，平均是 800—1 000 人。营分为连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各个机动单位、更好地对兵士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和更便于行政经济管理。实际上，连只有在对射中才起到独立单位的作用，而在普鲁士军队中则只有当排列成连纵队时，也就是当 4 个连中每一连都按 3 个排编成纵队时，连才具有独立单位的作用；这种队形要求每连有很多的人数，在普鲁士，每连有 250 人。营内连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就像连的人数不固定一样。在英国，每营有 10 个连，每连有 90—120 人；在俄国和普鲁士，每营有 4 个连，每连 250 人；在法国和奥地利，每营有 6 个连，每连人数不等。营合编为团，这与其说是为了战术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以及为了进行统一的训练；因此在战时同一团的各营常常彼此分离。在俄国和奥地利每团有 4 个营；在普鲁士有 3 个营；在法国只有 2 个营，后备部队除外；在英国平时大多数团仅有 1 个营。骑兵分为连和团。每连有 100—200 人，是战术单位和行政单位，只有在英国，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才把骑兵连分成 2 个排 (troops)。每个骑兵团通常有 3—10 个骑兵连。在英

国,平时每团只有3个连,每连大约120名骑手;在普鲁士,每团有4个连,每连有150名骑手;在法国,每团有5个连,每连有180—200名骑手;在奥地利,每团有6个或8个连,每连有200名骑手;在俄国,每团有6—10个连,每连有150—170名骑手。在骑兵中,团是战术单位,因为它拥有进行独立攻击所需的兵器,而且各连相互支援;因此骑兵团的人数较多,共有500—1600人。只有在英国,骑兵团的人数很少,因而他们不得不把四五个这样的团合编成一个旅;而奥地利和俄国的骑兵团在许多场合却又有中等旅那样多的人数。法国的骑兵团名义上人数很多,但是在战场上过去一直以较小的编制出现,这是因为他们马匹不足。炮兵编成连,只有在平时才编成团和旅,因为在战时炮兵连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是相互分离而且也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的。每连至少有4门火炮,但在奥地利,每连有8门火炮;在法国和英国,每连有6门火炮。猎兵和其他真正的轻步兵通常只编成营和连,而不编成团;这种兵的性质使他们不适于编成大的单位。工兵-地道爆破兵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只是军队中极小的一部分。目前只有法国军队例外,但是他们的3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一共只有6个营。在平时,大多数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较大的单位——旅、师、军——多半在战争爆发时才组成。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在平时也同战时一样保持有组织完全的、配备了高级指挥官的军队。但是在普鲁士,至少在没有动员整个军(这需要征集整个省的后备军)以前,这只是纯粹幻想中的东西;在俄国,如果部队真正缩编为团,那末最近的一次战争^①仍然表明,原来的师和军很容易混同在一起,所以这种编制

^① 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的优点与其说在战时，不如说在平时更有意义。

在战时，若干个步兵营或骑兵连合成一个旅：步兵由4—8个营合成，骑兵由6—20个连合成。军队如编有大的骑兵团，则这些团就完全可以代替旅；但是由于团必须派出一些部队执行师的任务，所以团的人数经常减少。轻步兵和基干步兵合成1个旅是有一定好处的，但轻骑兵和重骑兵却不能这样作。奥地利人几乎经常给每1个旅配属1个炮兵连。几个旅编成1个师。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师由3个兵种组成，例如：由2个步兵旅、4—6个骑兵连和1—3个炮兵连组成。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完全不把骑兵编入师，英国的师是全由步兵组成的。因此，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意在对他们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他们应当一有机会就把骑兵（相应地还有炮兵）配给师，但这一机会很容易错过，或者常常难于利用甚至无法利用。但是师属骑兵所占的比例在各国都是不大的，因此这一兵种的其余部分为了建立骑兵预备队都编为骑兵师，每师2个旅。在较大的军队中，2个或3个师、有时4个师编成1个军。甚至在师里没有骑兵和炮兵的时候，在这样的军里也经常有自己的骑兵和炮兵；而当师混合编成时，也仍然有由骑兵和炮兵组成的预备队，归军长掌握。拿破仑最先建立了军预备队，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全部编余的骑兵编成预备队骑兵军，包括2个或5个配有骑炮兵的骑兵师。俄国的预备队骑兵保持着同样的编制；尽管已经取得的效果同因这种编制而集中一地的大量骑兵很不相称，但是看来其余国家的军队在大战时也将重新采用这一编制。战斗部队的现代编制就是这样。但是，尽管废除了帐篷、兵站仓库、野战面包房和粮秣车，军队为了在作战中保证战斗力，仍然有由非战斗人员和车辆组成的大批辎重。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

问题，我们不妨指出，根据现行的操典，普鲁士军队 1 个军究竟需要多少辎重：

炮兵纵列：6 个车队，共 30 辆；1 个制药室，由 6 辆车载运；

舟桥纵列：材料车 34 辆，工具车 5 辆，锻工车 1 辆；

步兵辎重：车 116 辆，108 套马；

卫生辎重：车 50 辆（供 1600 或 2000 名病员使用）；

预备军需辎重：车 159 辆；

预备辎重：车 1 辆，备用马 75 匹；

共 计：车 402 辆，马 1791 匹，人员 3000 名。

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军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的任务是对军队行军所经过的或者可能经过的地形进行侦察和目测；帮助制定作战计划并且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军队不致丧失时机，不致引起混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因此，这些军官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们必须受过完备的军事教育，熟悉每一兵种在行军和战斗中的能力。因此，在各国，这些军官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并在高级军事学校中受严格的训练。只有英国人认为，军队中任何一个尉官或校官都能担任这种职务；正因为如此，英军司令部的水平最低，军队只能作最缓慢和最简单的机动，而指挥官如果一般地说办事很认真的话，他便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全部参谋工作了。师很少有一个以上的参谋，军有它自己的司令部，由一个参谋主任或参谋来掌管，而军团则有完备的司令部，由几个将军在专职的参谋长的领导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参谋长在必要时可以用军团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在英国军队中副官长和副参谋长隶属于参谋长；在其

他的军队中副官长同时就是参谋长。在法国，参谋长一人担任这两种职务，而为了执行每一种职务，又各有其特设的机关。副官长是军团全体人员的长官，他听取所属各机关和部队的报告并掌管纪律、训练、编制、装备、武器等方面的事务。所有的部属都是通过他与军团司令发生联系的。如果他同时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那末他就和军团司令共同制定本军团的作战和行军计划。至于进一步详细制定行军计划，则是副参谋长的职责，他负责详细计划行军、宿营、野营等具体事项。大本营里设有必要数量的参谋来侦察地形，草拟防御或进攻计划。此外还设有炮兵总监和工兵总监，分别管理所属部门；同时还有几个参谋长助理，在战场各地代表参谋长，还有一些联络参谋和传令官，负责传送命令和报告。大本营还设有军需总监和他的办事人员、财务官、医务官以及军事检察官即军法长。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是按这个样子组成的，但要简单得多，人员也很少；旅司令部和团司令部的人数更少，而营部则仅由营长、副官、一个军需官、上士文书、鼓手或号兵组成。

大国为了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指挥，除上述机构外，还需要许多其他机构。有负责征兵的官员和补充军队马匹的官员，后者还常常和国家管理养马场的机关保持联系；有军官学校、士官学校、步兵教导营、骑兵教导连、炮兵教导连、骑兵学校和兽医学校等。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铸造所以及制造轻火器和火药的工场；有各种兵营、军火库、仓库、要塞，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设备而且有负责管理的军官；最后，还有总军需部和总参谋部，它们管理全国的武装力量，因此比个别的作战军队的司令部和军需部有更多的人员和更为重要的职能。总参谋部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它通常下设战史处（搜集战史、过去和现在的军队编制等方面的材料）、测绘处（负责

绘制全国的地图和进行全国地形测量)、统计处等。统管所有这些机关以及整个军队的是陆军部。各国的陆军部编制都是不同的,但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职务范围却极广。现在试举法国陆军部的编制作为例子。它有七个部:(1)人事部,(2)军械部,(3)工程要塞部,(4)军需部,(5)阿尔及利亚事务部,(6)军务部(包括战史处、测绘处以及各科室),(7)财务部。直属陆军部的,有由将官、校官和专家组成的下列谘询委员会:步骑炮兵人事委员会,要塞勤务委员会,军医委员会,兽医委员会和民事委员会。这个庞大的机构就是如此,它负责现代头等军队的人员和马匹补充、给养、指挥和经常的扩充。这样的机构是和军队征集的人员的巨大数量相适应的。虽然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曾超过拿破仑在 1812 年拥有的那支庞大的军队(当时他有 20 万人在西班牙,20 万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有 45 万人和 1300 门火炮侵入俄国),虽然我们很可能再看不到在仅仅一次军事行动中集中 45 万人这样一支大军,但是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普鲁士在内,都能够召集、装备和训练一支 50 万人甚至更多的军队;虽然这些国家的军队不超过他们全部人口的 1.5—3%,但是在历史上他们从来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

美国的军事制度是主要依靠各州的民军和在情况需要时召集的志愿军来保卫国家的;主要用来维持西部印第安部落秩序的常备军,根据 1857 年陆军部长的报告,仅仅约为 18 00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8 月—
不迟于 9 月 24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副官

副官 (Adjutant)——军队中大小单位的指挥官的助手或 aide-de-camp。每个步兵营或骑兵团的指挥官通常都有一名副官；旅和师的指挥官、corps d'armée (军) 的司令官以及总司令根据其军衔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官。副官的职责是传达长官的命令、监督执行这些命令以及接受或汇集给长官的报告。因此，他所管理的多半是本军事单位的内务秩序。他规定本单位各部分的值勤次序，下达日令；同时他又像是长官的秘书，草拟给上下级指挥官的公文函件，把每天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加以综合，填写本单位的日志和统计表。目前，在军队的较大单位中通常都设有总参谋部派出的常设司令部，由“参谋长”领导，参谋长担负副官的较复杂的任务，而让副官只传达命令和调整本单位的内部勤务。但是在这种场合职责的划分在各国军队中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这里简直不可能作概括的说明。例如还举不出两个国家的军队，它们的 corps d'armée 司令官的副官的职责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些名副其实的副官之外，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根据君主制度的需要，设有许多伴随君主的侍卫长 (general adjutant)，他们除了侍奉君主一

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职责,而且就连他们的职权也纯粹是一种形式。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耳布埃拉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埃斯特勒马杜腊省的一个村庄和一条小河的名称，在巴达霍斯东南 12 英里。1811 年春天，英军包围了当时在法军手中的巴达霍斯，对这座要塞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围攻⁴⁷。贝雷斯福德率领约 1 万名英军和德军以及 2 万名西班牙军和葡萄牙军在阿耳布埃拉附近掩护围攻。苏尔特则率领一部分可以用于进攻的安达鲁西亚部队，在 5 月 16 日攻击贝雷斯福德。英军的右翼配置在圆形高地上，英军的中央和左翼配置在它的鞍形延伸部分。阿耳布埃拉河从正面掩护阵地。苏尔特一眼看出这一圆形山冈是制高点，是整个阵地的锁钥；所以他只在中央和左翼的对面占据阵地，而准备 en masse（以主力）攻击英军的右翼。贝雷斯福德不顾军官们的反对，把几乎全部英军和德军配置在中央和左翼，这样，山冈就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新兵防守。所以，当苏尔特的步兵以密集的纵队向山冈冲锋时，西班牙军很快就退却了，英军的整个阵地立即处于被包抄的境地。在这个紧急关头，贝雷斯福德还一再拒绝将英国或德国部队派往右翼，于是他手下的一名参谋^①自动命令约 7 000 名英军进攻。英军在鞍形高地的后面展开，

^① 哈丁。——编者注

进行射击，消灭了法军最前面的几个营；当他们接近高地时，发现占领高地的成长纵队的兵群没有地方可以展开，十分混乱。英军就向这些纵队推进。他们以横队的火力给予密集的兵群以杀伤；最后，当英军转入刺刀冲锋时，法军狼狈向山下逃窜。这一最后的冲击使英军付出了大约五分之四的兵员的代价——这也就是它的伤亡人数。但会战结局已定，并且苏尔特撤退了，虽然几天以后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也撤除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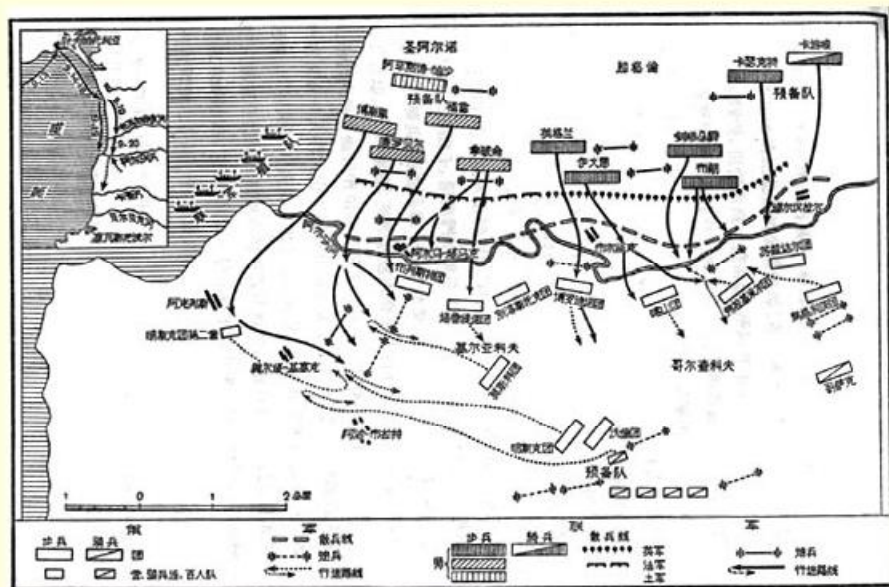
弗·恩格斯 阿尔马

阿尔马——克里木的一条小河，从巴赫契萨赖城郊的高地向西流入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之间的卡拉米特湾。河的南岸靠近河口那一带地势陡峭，整个南岸瞰制着对岸。在上次俄土战争中，缅施科夫公爵曾选择南岸为防御阵地来抗击联军在克里木登陆后马上就发动的进攻。

缅施科夫所指挥的军队有 42 个步兵营，16 个骑兵连，1 个哥萨克百人队，96 门火炮，共 35 000 人。1854 年 9 月 14 日，联军有 28 000 名法军（4 个师），28 000 名英军（5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和 6 000 名土军在阿尔马河稍北的地方登陆。联军炮兵的火炮和俄军的一般多——法军 72 门，英军 24 门。俄军阵地看来很坚固，但是实际上有许多薄弱地点。阵地的正面几乎宽达 5 英里，这对缅施科夫的数量不多的军队来说是太宽了。右翼没有任何依靠，而左翼（由于联军舰队的火力控制了海岸）不能把阵地伸展到海边，因而有同样的缺陷。联军的计划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制定的。他们打算以正面佯攻转移俄军的注意力，同时法军应在 5 个区舰队的掩护下迂回俄军的左翼，英军则应在骑兵的掩护下迂回其右翼。

攻击是在 20 日发起的。原定在拂晓开始攻击，但是由于英军

行动迟缓，法军不敢先行渡河。在法军的极右翼，博斯凯师渡过了河（这一条河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而过）并且登上了南岸陡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把 12 门火炮运上了台地。在博斯凯左边，康罗贝尔率领他的师渡过了河，并在台地上展开了。而拿破仑亲王的师肃清了阿尔马村的果园、葡萄园和房屋里的俄国兵。所有这些攻击是用 29 个营的兵力进行的，缅施科夫派去抗击的兵力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上只有 9 个营，不久又派出 7 个营去增援。这 16 个营在 40 门火炮和 4 个骠骑兵连的配合下必须抵抗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法军（不久又得到福雷师的其余 9 个营的增援）的攻击。这样，除了留作预备队的土军以外，圣阿尔诺元帅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结果很快就揭晓了。俄军渐渐支持不住，他们尽可能有秩序地退却了。同时英军开始攻击。大约在 4 时，在俄军阵地的左翼博斯凯的火炮从台地顶上进行齐射，这表明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大约一小时后，英军的散兵线向俄军的散兵线攻击。英军放弃了迂回俄军右翼的计划，因为俄军骑兵（不把哥萨克算在内也比英国骑兵多一倍）掩护着右翼，甚至威胁着英军的左翼。因此，腊格伦勋爵决定向俄军直接进行正面攻击。他以布朗的轻步兵师和伊文思师为第一线向俄军中央猛攻。剑桥公爵和英格兰将军的两个师组成第二线，而预备队（卡瑟克特师）在骑兵的配合下跟在左翼的后面。第一线展开后，攻击前面的两个村庄，结果赶走了俄军并渡过阿尔马河。这里双方的说法不同。英国人坚决认为他们的轻步兵师曾到达俄军掩护重炮的胸墙，但在这里被击退。而俄国人却断言，轻步兵师甚至没有能够全部渡过河，更不用说到达筑有胸墙的陡坡了。但不管怎样，英军第二线是直接在第一线后面运动的；它展开后必须再成



阿尔马河会战

纵队，以便渡过阿尔马河和登上高地；然后再展开，经过几次齐射后进行冲击。首先去援救轻步兵师的正是剑桥公爵的师（近卫军和苏格兰军）。伊文思虽然运动缓慢，但仍然没有被击退，所以在他后方运动的英格兰师就未必需要给予任何援助。胸墙被近卫军和苏格兰军占领，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之后，俄军放弃了阵地。俄军的 18 个步兵营在这里与同样营数的英军作战，如果说英军的步兵营每营人数比俄军的步兵营大约多 50 人，那末俄军以炮兵的优势和阵地的坚固绰绰有余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然而素以杀伤力强著称的英国步兵的火力，在这次战斗中特别猛烈。参加会战的大部分军队都装备了米涅式步枪，这种步枪的射弹侵略力可以一下子杀伤整行人，对于俄军的长纵队是特别致命的。除 6 个步兵营外，俄军全部步兵都投入了战斗，但他们不能期望击退再一次的冲击，于是退出了战斗；在骑兵、轻炮兵和一小部分步兵预备队的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退却。无可争辩，英军在这次会战中打得比其他军队出色，但是他们应用了他们惯用的那种笨拙的机动方法：展开，排成纵队，然后又在敌人的火力下没有任何必要地展开；因此他们既丧失了时机，又损失了人员。这次会战的结果，联军在俄军还没有得到增援以前完全控制了克里木的不设防地区，并且打开了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联军从前一种优势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们立即利用了后一种优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明 火 枪

明火枪 (Arquebuse)——源出于法文 arquebuse, 但有时误写为 harquebuse, 而在英国人那里, 特别是在苏格兰境内误称为 hagbut 或 hackbut——是最早的一种真正适于在战场上为军事目的使用的火枪。早在 1485 年博斯威尔特会战⁴⁸中就已使用这种枪, 当时叫做轻火器。它不过是一个铁制的短圆筒, 一端被类似枪尾部的东西封住, 有一个导火管; 它固定在类似矛杆或戟杆的坚硬的木托顶端。这种轻火器或者说小型火炮使用的是形状不规则的弹丸, 即不大的实心弹, 它紧贴大粒火药制成的装药, 借紧挨导火孔的火绳发射。这种武器放在前排兵士 (长矛手或持戟手) 的肩上, 靠把手调整方向, 由后排兵士发射, 发射时当然是不进行瞄准的。根据霍尔编年史⁴⁹的记载, 甚至在更早的时期, 即在阿津库尔战役时期, 不列颠军队就装备有“轻火器”。然而这种古老的火器十分笨重, 移动非常不便, 尽管响声很大, 外形别致, 但效果不大, 或者毫无效果。在亨利八世时代, 虽然在其前期曾依靠西班牙明火枪手的火力取得了帕维亚会战的胜利, 但是大弓由于射击精度高, 射程远, 侵彻力强, 仍然不失为优良的武器。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 大弓仍被称为“武器之王”, 尽管她的军队中已有火枪手, 而且她曾派詹

姆斯上校(著名小说家^①的祖先)率领一队骑马的明火枪手去援助法王亨利四世。在伊丽莎白时代,这种武器已经大有改进,不过依然又长又笨,只有放到射击前插入土里的叉架上才能进行射击;这种必要的设备有时安上矛头或戟头,以便可以牢牢地斜插在土里,当做木栅使用。

这种古老的明火枪的枪身特别长,是用很坚固的金属制成的,一般口径不大,有些已有膛线,例如,在苏格兰汉密尔顿宫中至今保存的明火枪便是这种枪。1570年博特威尔霍的汉密尔顿曾用它击毙了墨莱摄政王。这种枪依靠大麻制成的火绳,即导火索发射,导火索通到与现代燧发枪机用的机头相类似的机头下面;扣动扳机时,导火索燃着的一端即伸向药池,点燃明火枪。后来,明火枪机让位于轮发枪机。轮发枪机是把燧石固定在药池上,外周有刻线的小轮借助于弹簧迅速转动,向放置在它下面的火药喷出火花。继轮发枪机之后,出现了所谓弹簧枪机。这是钢制燧发枪机的粗糙的前身。这种枪机由约瑟夫·曼顿作过很大改进,它完全被子弹火门(这是人们能够想像的最快和最可靠的发火具)排斥也只有几年功夫。在英国内战⁵⁰时期,小手枪、猎枪和精制的小火枪上曾采用弹簧枪机,但是这种枪稀少而昂贵,所以没有广泛应用;它们只有贵族和军官才使用,而明火枪依然是兵士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完善的明火枪问世直到不久以前,在枪身的制造和子弹飞行方向的精度方面,远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的进步。精确瞄准的困难看来完全是射击方法不完善、武器笨重和发火极为缓慢所造成的,因为许多年代久远的、特别是西班牙制造的明火枪枪身,根据

^① 乔治·潘·雷·詹姆斯。——编者注

击发原理加以改造，安上新的枪托，并适当地改短后，射击十分精确，甚至在较远的距离上具有不寻常的侵彻力。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艾雷⁵¹

艾雷，理查爵士，二级巴斯勋章获得者——少将，现任英军军需总监。1821年入伍时当准尉，1825年升为上尉，1851年为中校；1854年任派往东方的一支军队的中校旅长。1854年9月，在克里木远征军从瓦尔那出发的前夕，他被任命为远征军军需长；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他是受指责的六名或八名军官之一，他们被指责在腊格伦勋爵率领下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地执行职务、缺少健全的理智、消极懈怠，以致把英军弄到毁灭的地步。当时艾雷负责规定各种行军装具（帐篷、大衣、被褥、靴鞋）在各团间分配的标准。据他本人说（向切尔西的调查委员会）：

“从185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起，在巴拉克拉瓦没有一天不储存大量寒衣，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前线战壕里有些团却正由于缺乏这些东西在大吃苦头，而这些东西就给他们存放在不过七八英里以外的地方。”

但是，他说这不是他的过错，因为要他批准分发这些东西，是从来没有一点困难的。相反，他认为自己有功：无论批准、部分满足或者拒绝师和团向他提出的申请，他都尽可能简化规定的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8月10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斯佩恩

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是多瑙河北岸的一个城镇和一个村庄，在维也纳的下方；前者距维也纳约半里格^①，后者距维也纳约两里格。这两个地方都位于多瑙河与多林的比赞贝尔格山之间的大片盛长牧草的马尔希斐特平原上。1809年5月21日和22日，法军与奥军在这里进行了历时两天的激烈的会战，拿破仑皇帝初次受挫，被卡尔大公击败而被迫退却，这两个地方从此便出名了。

战争开始时，拿破仑率领大军⁵²经提罗耳溯音河和伊扎尔河而上，在埃克缪尔附近击败了卡尔大公，然后以强攻夺取了累根斯堡，迫使卡尔大公在这里越过多瑙河退往波希米亚山脉，这样就占领了奥军与奥地利首都之间的阵地。⁵³然后，拿破仑派达武率兵4万以吸引这位奥国将军的注意力，自己则顺多瑙河而下，攻占了维也纳。同时，他的助手欧仁·博阿尔奈和麦克唐纳正从意大利经由达尔马威亚、克莱纳，沿木尔河谷而上（在此处击溃了耶拉契奇），胜利挺进，准备同自己的总司令会师。卡尔大公在埃克缪尔战败后，这时正缓缓沿多瑙河北岸而下，他希望能有机会进行一次成功的会战，以便在首都城下拯救帝国，因而率领军队在洛鲍岛和另一

^① 1里格等于4.83公里。——编者注

小岛(这两个岛把这一段多瑙河分成了4条河道)的上方,在比赞贝尔格占领了阵地。

率领10万军队的卡尔大公时刻盼望他的弟弟约翰大公率领4万军队前来会合。如果约翰大公能按照所得到的准确命令同科洛夫拉特在林茨会合,他的军队便可增加到6万,并且应当在拿破仑后方的最高地点,在他的主要交通线上占领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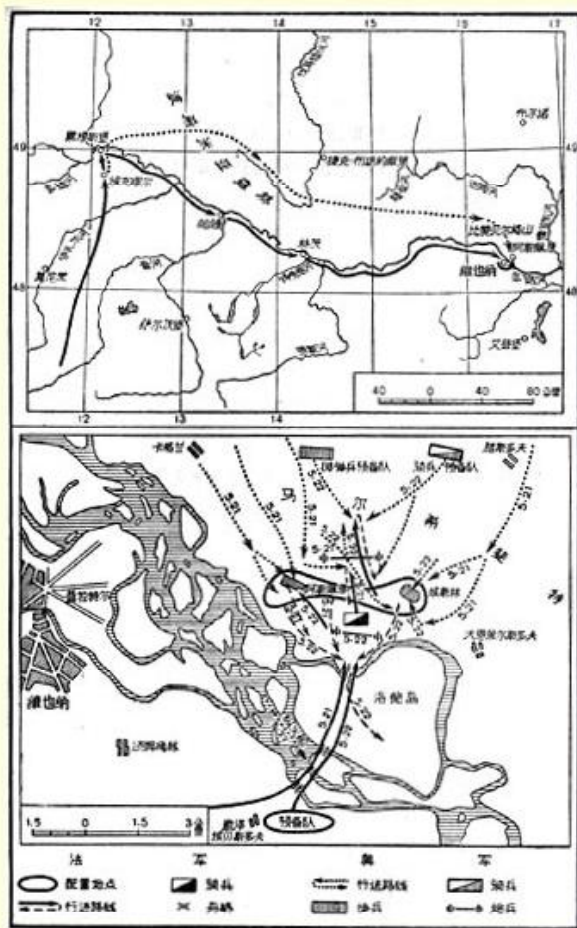
拿破仑亲自率领8万做好战斗准备的精兵,其中包括皇家近卫军和贝西埃尔的骑兵预备队,打算渡过多瑙河同卡尔大公会战,并企图在他援兵到达前将他歼灭。为此,他下令在多瑙河的右岸和洛鲍岛之间用68条大船和9个大木筏,铺上最坚固的材料架桥,而从洛鲍岛到马尔希斐特(即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两居民点之间的地方)则架设较为轻便的浮桥;21日晨,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周密地组织部队渡河。奥军司令官从高处的阵地上看见法军行动轻率:皇帝使自己庞大的军队从唯一的一座桥上通过湍急的大河,因此各兵种只能依次缓慢地通过狭长的桥,骑兵过河已感困难,炮兵则更加困难了;一旦军队被迫退却,这座桥就未必能够拯救他们。他看到这一点后,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趁法军的一半兵力还在忙于渡河或者仍在南岸时,就消灭已渡到北岸的另一半法军。这位大公命令在上游的部队的指挥官科洛夫拉特、诺德曼等准备好船只,装上重物 and 纵火物,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破坏桥梁,同时他把自己的主力隐蔽起来,命令骑兵和前哨佯作抵抗,然后在马森纳率领的法军进攻时实行退却。到12时,敌人已相当深入——4万多法军已渡到北岸,——卡尔大公可以夺取主动权了。这时,他率领8万人,其中包括14000名精锐骑兵和288门火炮,从多林的比赞贝尔格山下来,以拿破仑两翼的两个居民点——阿斯佩恩和埃斯

林为主要攻击目标，冲向敌人；这两个据点之间的中央地区、石质建筑物、筑有围墙的花园和许多栅栏，被强大的奥军炮队占领，它们主要由骑兵掩护，而霍亨索伦的步兵则作为预备队留在后方。在奥军进行翼侧攻击时，两翼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攻击的猛烈和防御的顽强在战史上几乎都是没有前例的。两个居民点几度易手，而奥军炮兵则大量地杀伤了法军，以致拿破仑命令骑兵发起总攻，企图夺取奥军的火炮。法军优秀的近卫胸甲骑兵以自己素有的勇猛和大胆精神进攻并击退了奥军骑兵。如果奥军不是迅速把火炮撤走，不是把步兵编成方队（这种方队像以后在滑铁卢会战⁵⁴中一样，粉碎了一切要突破它们这种无法攻破的队形的企图），那末火炮就可能被法军缴获了。最后，方队击败了骑兵，使他们遭到惨重的损失，狼狈不堪地退回自己的阵线。这时，阿斯佩恩已为奥军攻克；尽管法军胸甲骑兵是那样英勇，不怕牺牲，在人数愈来愈少的情况下仍反复攻击，孤军阻止敌人突破阵线，但是奥军的中央仍然逐渐地、但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

黑夜使战斗暂时停止了。可是法军在这次决战中已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左翼已被迂回，中央几乎被击退到了桥头；右翼的埃斯林，由于朗恩的英勇顽强，虽然还没有失守，但已被奥军包围，而这些奥军就在法军的尸体之间倚枪打盹，准备一到拂晓就再次进攻。

可是，这一整夜，生力军不断地过桥到达马尔希斐特，因此到拂晓时，除去第一日战斗的全部损失外，拿破仑还整整拥有 7 万人，而已经开始渡河的由达武指挥的 3 万人还不计在内。会战一开始，又恢复了对两个争夺中的居民点的攻击；埃斯林为奥军攻克，而阿斯佩恩则重新被法军占领。这一整天，两个居民点成了决斗的场所，双方都用刺刀冲杀，两地反复易手，但最后还是被奥军占领

阿斯佩恩会战 (1809年5月21—22日)



阿期佩恩会战

了，他们在傍晚时把炮兵调到这两个居民点，对法军的后方进行交叉射击。但是在这场血战中，拿破仑依靠强大的援兵摆脱了守势，采取了自己惯用的战法——对敌军中央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他派朗恩和乌迪诺率领一支拥有 2 万多步兵、前有 200 门火炮、后有大量骑兵的庞大纵队，直扑奥军的中央，即霍亨索伦的左翼和罗森堡的右翼之间的、看来是他们战线的最弱的部分。起初，这次来势凶猛的攻击似乎已完全成功；奥军的防线已被突破，在霍亨索伦和罗森堡的部队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法军的骑兵凶猛地冲入了这个缺口，打开了一条深入后方直到罗伊斯公爵预备队阵地的道路；到处传说奥军败局已定，但卡尔大公却能够沉着应变：预备队的掷弹兵兼程赶往突破口，排成棋盘形配置的许多方队；随掷弹兵之后疾驰而来的是利希顿施坦公爵的大量龙骑兵，这位勇敢的公爵手持察赫团旗，恢复了态势。

朗恩的强大纵队不能继续前进，于是停下来开始同方队进行互射，但是由于无法展开，所以被炮队从相当于火枪射程一半的距离上进行的集中射击击溃了。他的骑兵攻击方队，向刺刀硬冲，没有成功；任何一个方队都没有动摇，没有被击破。最后，奥军预备队的龙骑兵呐喊着向法军的胸甲骑兵攻击，击溃了他们，迫使他们慌乱地奔向自己的步兵，终于使全军都陷于混乱之中。霍亨索伦在击退攻击之后，立即率领 6 个匈牙利掷弹兵团在中央的右方突破了法军的阵线，攻占了直到埃斯林后方的整个地区，这时埃斯林和阿斯佩恩已被奥军最后攻占。当奥军中央不顾向洛鲍岛全面退却的法军的奋勇抵抗而胜利前进的时候，奥军炮队也从这两个居民点对桥进行了歼灭性的交叉射击，每一发炮弹都杀伤了大群密集的人马。

法军除遭到了以上这一切灾难外,连接洛鲍岛和南岸的桥这时也被奥军的纵火船和木筏破坏了,因而暂时失去了从该岛后撤退的一切可能。尽管如此,法军的后卫仍然非常坚定地战斗到半夜,抵挡奥军,直到法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战场退到岛上,直到奥军炮队停止了轰击,而被这史无前例的、光荣的一天的紧张战斗弄得疲惫不堪的炮兵在火炮旁入睡时为止。

法军有 7 000 人被胜利者埋葬在战场上,有 29 793 名伤兵和俘虏被送往维也纳。朗恩和圣伊雷尔受了致命的重伤,几天后便死去了。奥军战死的高级军官 87 人,兵士 4 200 人;负伤的 16 300 人。可是这次在首都城下、而且几乎就在首都的视界以内所取得的胜利却是一次全面的胜利;敌人惨遭挫败,士气沮丧,被围在洛鲍岛那一小块地方。假如约翰大公能按照命令的要求,在法军于阿斯佩恩溃败后的第二日早晨率领 6 万生力军赶到法军的后方,那末结果怎样就不难断言了。

可是拿破仑的末日还没有到来,各国人民还要忍受四年苦难,直到这个军事巨人在莱比锡⁵⁵和滑铁卢的战场上最后倒下来的时候,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攻 击

“攻击”这一术语，就其总的战略意义来说，是指在任何一次大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而且，在任何场合，开始时总是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的任务是：改变态势和战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他不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

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年战局和1815年战局，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完全为了保卫遭到敌人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这两个战局的不利结局丝毫不贬低它们在总的意图方面的优点或其中局部行动的意义。这两个战局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

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时，谁先夺得主动权，或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强国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统帅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还有拿破仑第一，都是特别喜爱攻击的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遭到的。法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几乎是锐不可当的勇猛攻势，归功于迅速判断情况、扩大战果和彻底粉碎敌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时法国人就远非如此强大。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和在野战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过进攻战，但是从来没有在防御战中显过身手。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会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整日的防御战以后再最后转为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至于法国军队及其统帅，在总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如此。相反地，希腊人进行的许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马拉松会战、温泉关会战、普拉迪会战等，特别是普拉迪会战，则是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的：他们先抗击

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样的战法,英国人曾采用了许多世纪,瑞士人和德国人也曾广泛地采用过;它通常都给这些民族的军队带来了胜利,而在较后的时期它也被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克雷西会战、普瓦提埃会战、阿津库尔会战、滑铁卢会战、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会战^①,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会战,都是准确地按照这种战法进行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在1812—1814年的战争⁵⁶中,美国人成功地使用了英国人的战法来对付英国人,这种战法曾为英国人极其有效地用来对付过法国人,而且不久以前还在对俄战争中得到了检验,而英国人几乎始终不变地攻击美国人,并且还违背他们自己的惯例成纵队攻击。

在战争中当两军对峙并准备会战时,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攻击方法:第一、全正面攻击,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即攻击者在从这一侧到另一侧的整个正面上同时进行攻击,并只以硬攻来解决会战。第二、翼侧攻击,即以两翼同时攻击,或先以一翼,后以另一翼攻击,而将中央的兵力控制在稍后的地方。这是拿破仑喜用的战术。他往往迫使敌人减弱中央的兵力去加强两翼,而自己却把中央的兵力挪后,以庞大的骑兵预备队来加强它,最后,迅速冲入在敌人中央形成的缺口,以歼灭性的突击解决会战。第三、中央攻击,这时两翼挪后作为预备队。在这三种攻击方法中,最后一种缺点最多;它很少被采用,而且正如大家所认为的,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假如军队被迫使成这种阵势,通常会被包围以至消灭,在坎纳进行攻击的罗马军队就是这样^②。相反,这种阵势用于防御却极为适宜。第四

① 关于这次会战,见本卷第64—7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03—305页。——编者注

种方法——斜形攻击，这是埃帕米农达斯的创造，他在列夫克特累和曼提涅亚会战中采用这种战法而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种战法就是攻击敌人的一翼，并秘密地逐渐加强自己的一翼兵力，而中央和另一翼这时稍向后移，但随时机动，使对方经常受到攻击的威胁并且无法及时加强其薄弱地点，以致防御终被突破。这就是奥地利人克累尔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喜用的战法。克累尔费运用这种战法经常击溃土耳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谈到自己最辉煌的胜利时常说，“他只不过是重演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法而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希腊人、法国人，同样还有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他们所有出色的会战中，通常都是采用纵队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这种纵队只要不遇到真正的障碍并不为敌人所阻，就可以突破敌人中央而长驱直入。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过去不论在进攻或防御中都几乎始终不变地成横队作战，而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也仍然如此；他们常常成这种队形以中央兵力去抗击敌人纵队的猛攻，阻止住敌人，直到自己的两翼前出，包围敌人的两翼，粉碎敌人为止。必须指出，每当英国人放弃这种可以说是民族的两列横队攻击方法，而像在丰特努瓦会战和契珀瓦会战⁵⁷那样用纵队攻击时，他们就遭到了失败。对于坚定沉着的敌军，用纵队攻击中央的战法是根本错误的，这几乎已成了定论，虽然对于体质和纪律都较差的敌军，特别是士气沮丧的敌军，用这种方法仍有把握取得胜利。

对于只有步兵防守的多面堡——野战工事，可以立即攻击；如果多面堡还有炮兵防守，攻击者就必须首先用火炮压制住防御者的火炮。炮兵火力应破坏防栅，击毁敌人的火炮，摧毁胸墙，从而使防御者把火炮撤到工事内部去。在炮兵完成任务后，轻步兵，主要是猎兵，绕过工事的一部分，向胸墙顶进行射击，使防御者完全

不敢露头或不得不仓促射击。猎兵逐渐接近多面堡，在预定的地点集中，这时组成强攻纵队，由携带板斧和云梯的兵士走在纵队的前面。纵队的第一列可能还携带束柴，把束柴当作盾牌使用，同时也把它用来填护堡壕。这时，多面堡的加农炮会退而对付强攻纵队；而参加攻击的猎兵应加强火力，以射击防御地点的炮手为主，因为他们可能企图给自己的火炮重新装填炮弹。如果攻击者能进到护堡壕，那末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进攻时协调一致地行动和从四面八方同时冲向多面堡。因此，攻击者应在护堡壕边停留一下，等待规定的信号。当他们攀登胸墙时，防御者会用榴弹炮的爆炸弹和滚木礮石迎击他们，而在胸墙顶上，将用刺刀和枪托来对付他们。虽然阵地的有利条件仍在防御者方面，但是进攻的锐气使攻击者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多面堡两侧没有其他工事掩护，那末，通常正是在这个时候击退敌人坚决的进攻是困难的，虽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某些战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非永久性的工事，可以进行突然攻击或者进行硬攻，在这两种场合，指挥官首要的职责，就是通过间谍或侦察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工事的性质、它的守军、防御兵器和各种物资的情报。在攻击时步兵时常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器材，这时兵士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用干柴烧毁鹿砦，用草捆填平不大的壕沟，在猎兵掩护下使用云梯攀越防栅，以及用火药包爆破堵塞的门窗等。步兵只要坚决大胆地使用这些器材，通常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普通障碍物。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阿富汗

阿富汗——亚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位于印度的西北，介于波斯和印度之间，而在另一方向上则介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之间。过去，波斯的行省霍拉桑和科希斯坦连同赫拉特，以及俾路支、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入阿富汗的版图。目前全国有将近 400 万居民。阿富汗的地势极不平坦：有高原和大山，有盆地和深谷。像所有多山的热带国家一样，气候差异很大。兴都库什山的山峰终年积雪，而盆地的温度高达 130 度^①。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炎热，但是一般说来，气候比印度凉爽。尽管冬夏之间和昼夜之间温度相差很大，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国家的气候是有益于健康的。主要的疾病有热病、胃炎和眼炎。有时天花造成极为荒凉的景象。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沙漠的绿洲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海枣，炎热的盆地出产甘蔗和棉花；而在 6 000 或 7 000 英尺高度以下的山坡的梯田上则盛产欧洲的水果和蔬菜。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熊、狼和狐狸经常出没其中，而狮、豹和虎等栖息在适于它们生活的地方。同时也不乏有益的动物。这里有良种波斯羊即肥尾羊。有高大的良种马。骆驼和驴当做驮畜使用；山羊、狗和

^① 华氏。——编者注

猫都很多。除喜马拉雅山的延伸部分兴都库什山脉之外，在西南部还有索利曼山脉，而在阿富汗和巴耳赫之间横贯着帕勒帕迈塞斯山脉，但欧洲人对这个山脉知道得很少。河流不多，其中最大的是赫尔曼德河和喀布尔河。它们都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喀布尔河向东流，在阿托克附近入印度河，而赫尔曼德河向西流，经过锡斯坦省入济腊盐沼。赫尔曼德河的特点是，它像尼罗河一样，每年泛滥，使两岸的土壤肥沃，而在泛滥地区以外则是沙漠。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是它的首都喀布尔、加兹尼、白沙瓦和坎大哈。喀布尔是喀布尔河上的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位于北纬 34 度 10 分，东经 60 度 43 分。城内的房屋是用木材建造的，整洁而舒适，城市四周有绮丽的园圃，景色引人入胜。喀布尔被村庄所包围，处于丘陵环抱的广阔的平原的中央。城中的主要古迹是巴卑尔皇帝的陵墓。白沙瓦是拥有 10 万居民的大城市。加兹尼是自古闻名的城市，一度为马茂德大苏丹的都城。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现在显得破旧不堪了。在离加兹尼城不远的地方有马茂德的陵墓。坎大哈建立较晚（1754 年），座落在一个古城的旧址上。它在好几年内曾是首都，但在 1774 年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喀布尔。据估计，坎大哈有 10 万居民。离城不远有该城的奠基人阿罕默德-沙赫的陵墓。这里是非常神圣的避难地，就连国王也不能捉拿躲藏在陵墙里面的犯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细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政体是君主制，但是国王对他的勇敢而不安分的臣民的统治具有个人独裁的性质，而且极不巩固。王国划分为若干省，每省都由国王的代表管辖，他们征收捐税并把捐税送往京都。

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说来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⁵⁸，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只是他们对国家政权深恶痛绝，爱好各自独立，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这种自发性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受一时的情绪支配并且容易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们激情的政治阴谋家迷惑。主要的部落是都兰尼人和吉尔采人，他们一贯相互敌视。都兰尼部落较为强大，由于它占优势，它的艾米尔即可汗就成了阿富汗的国王。国王的收入大致相当于 1000 万美元。他只是在自己的部落中行使全部权力。兵员主要由都兰尼部落提供；军队的其余部分由其他的克兰补充，或者是由那些为了薪饷或抢劫而来服役的军事冒险者补充。法官在城市里行使司法权，但是阿富汗人很少求助于法律。可汗有权制定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报杀亲之仇是氏族的义务。然而，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只有在受人挑拨的状况下才例外；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哪怕是一个使用奸计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任何其他危险。阿富汗人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但是他们不爱搞表面的虔诚。逊尼派和什叶派⁵⁹之间通婚是常见的现象。

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⁶⁰和波斯人的统治。在不列颠人来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塔梅尔兰和纳迪尔-沙赫，都是走这条道路。1747 年，纳迪尔死后，在这个军事冒险家的手下学会了兵法

的阿罕默德-沙赫，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最辉煌和繁荣的地步。他属于萨多扎伊氏族，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占有他的已故统治者在印度掠夺的东西。1748年他把莫卧儿总督逐出喀布尔和白沙瓦，然后渡过印度河，神速地攻入旁遮普。他的王国从霍拉桑扩展到德里，他甚至同马拉提人⁶¹的国家较量。但是这些伟大的军事业绩并没有妨碍他关心各种和平艺术的发展，他享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声誉。他于1773年逝世，把王位传给儿子帖木儿，但是帖木儿不胜任他所担负的重任。他离开了他父亲所建造的、并且在几年内就已变成富裕而人口稠密的中心坎大哈城，把政府所在地迁回喀布尔。曾被阿罕默德-沙赫的铁腕遏止了的部落间的内部纠纷在他统治期间又发生了。1793年帖木儿逝世，由泽曼继位。这位国王打算巩固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权，这个会严重威胁不列颠领地的计划引起极大的注视，因此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被派往边境，以便在阿富汗人采取任何行动时制止他们，同时开始同波斯谈判，企图借助于波斯使阿富汗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是这些预防措施用不着了；由于国内的密谋和混乱，泽曼-沙赫遇到很多的麻烦事，他的庞大计划就胎死腹中了。国王的兄弟马茂德举兵攻入赫拉特，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遭到了失败，并逃往波斯。泽曼-沙赫当初是在以萨腊弗腊兹汗为首的巴拉克查依氏族的支持下获得王位的。泽曼任命一个不孚众望的人当大臣，引起了他过去的拥护者的仇恨，他们策划了一个密谋，密谋被揭露了，萨腊弗腊兹被处死。在这以后，密谋者将马茂德从波斯请回，泽曼被俘并被挖去双目。为了反对都兰尼人所支持的马茂德，吉尔采部落从自己这方面推举舒扎沙赫，舒扎沙赫当了一个时期的国王；但是主要由

于他自己的拥护者的背叛，他最后遭到了失败，于是不得不到锡克教徒⁶²那里避难。

1809年拿破仑派加丹将军去波斯，打算怂恿沙赫^①入侵印度，而印度的英国当局也派代表^②去觐见舒扎沙赫，策划对波斯的抵抗。这时，朗吉特·辛格已经确立了政权，而且声名远扬。他是锡克教派的首领，凭着自己的才干使旁遮普脱离阿富汗人而独立，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称摩诃拉扎（大拉扎），使得英印政府不得不看重他。而篡位者马茂德注定不能久享胜利之福。他的大臣法特赫汗（动摇于马茂德和舒扎沙赫之间，受虚荣心和一时的利益驱使，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被国王的儿子卡姆朗捉住，双目被弄瞎，后来被残酷处死。被害大臣所属的强大氏族誓为死者复仇。傀儡舒扎沙赫又被推上台，马茂德被赶走。但是舒扎沙赫由于举止傲慢，不久就被推翻，由他的另一个兄弟即位。马茂德逃到赫拉特，继续统治这个地区，1829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卡姆朗继承了这个地区的统治权。这时巴拉克查依氏族获得了最高权力；它的代表人物彼此划分了地盘，但是由于民族风气开始了内讧，并且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联合起来。有一个兄弟穆罕默德汗统治白沙瓦城，并为此向朗吉特·辛格纳贡；另一个兄弟统治加兹尼城，还有一个兄弟统治坎大哈，而统治喀布尔的是氏族中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多斯特-穆罕默德。

1835年，亚历山大·白恩士上尉被派到这位国君那里当大使，这时正是俄国和英国在波斯和中亚细亚彼此勾心斗角的时期。他向多斯特建议缔结同盟，这原是多斯特非常乐意的；但是英印

① 费特赫-阿利-沙赫。——编者注

② 蒙·埃耳芬斯顿。——编者注

政府尽可能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自己却不提供任何东西作为交换。同时,波斯人于1838年在俄国人的帮助和劝说下包围了通向阿富汗和印度的要地赫拉特⁶³,波斯和俄国的代表来到喀布尔,而多斯特由于英国人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终于被迫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建议。白恩士离开了喀布尔,于是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他的秘书威·麦克诺顿的影响下,决定惩罚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他自己迫使多斯特采取的。奥克兰决定推翻多斯特,让当时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代替他。英国人同舒扎沙赫和锡克教派订立了条约;沙赫开始招募军队,由英国人出钱并由英国军官指挥,而英印军队在萨特里日河地区集中。麦克诺顿以白恩士为助手,作为驻阿富汗公使随军远征。这时,波斯军队已经在赫拉特撤围,这样,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唯一有力的借口就不存在了。尽管如此,1838年12月英军仍然开进信德,强使该地区屈服并向它征收军税以供锡克教徒和舒扎沙赫。⁶⁴1839年2月20日英军渡过印度河。他们约有12000名兵士和40000多名服务人员,此外还有沙赫的新兵。3月英军越过博朗出口;粮秣已感不足;骆驼成百地死亡,辎重的大部分都损失了。4月7日英军逼近霍贾克山口,并且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山口,4月25日进入阿富汗的统治者即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们所放弃的坎大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英军司令约翰·吉恩爵士将诺特指挥的一个旅留驻坎大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向北进发。由于一个投敌分子泄露了所有城门中只有喀布尔门没有筑防栅的消息,阿富汗的不可攻克的要塞加兹尼于7月22日被攻占;城门被炸开,要塞在强攻下被占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招募的军队在这次惨败后就都逃散了,8月6日喀布尔也打开了城门。舒扎沙赫以应有的

仪式登上了王位，但是真正的权柄掌握在麦克诺顿手中，而麦克诺顿也从印度国库中支付舒扎沙赫的一切费用。

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调回。但是阿富汗人决不甘心受 Feringhee Kaffirs (欧洲异教徒) 的统治，1840 年至 1841 年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英印军队不得不经常调动。然而麦克诺顿宣称，阿富汗社会的情况通常就是如此，并且向英国报告，情况良好，舒扎沙赫的政权是巩固的。英国军官和其他派驻官吏的警告都是徒劳。1840 年 10 月，多斯特-穆罕默德向英国人投降，并被解往印度；在 1841 年夏季，所有起义都被顺利地镇压下去了；而到 10 月，麦克诺顿被任命为孟买总督，他打算率领另一批部队开赴印度。可是这里突然起了风暴。对阿富汗的占领每年要印度国库花费 125 万英镑：支付驻阿富汗的 16 000 名英印军队和舒扎沙赫军队的薪饷开支；还有在信德和博朗出口的 3 000 名军队；舒扎沙赫的帝王的豪华生活费用、他的官员们的薪俸以及他的宫廷和政府的全部费用由印度国库开支；最后，津贴或者确切些说收买阿富汗的首领们，使他们不采取敌对行动，这一笔费用也从同一来源中支付。有人对麦克诺顿说，花费这么多的钱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他试图厉行节约，但是唯一可行的节约办法就是停止对首领们的津贴。就在他试行这项措施的那一天，首领们策划了一个旨在消灭英国人的密谋，这样，麦克诺顿本人就成了联合这些反叛力量的工具，而在此以前这些力量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是单独进行的、不统一的；不过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当时阿富汗人对不列颠人统治的仇恨已达到了顶点。

驻喀布尔的英军是由埃耳芬斯顿将军指挥的，他是一个患病风病、毫无才能而又优柔寡断的老头子，他的命令常常互相矛盾。

部队占据的地方类似一个营垒，非常宽广，以致守备部队几乎不够防守垒墙，至于要派部队到开阔地作战，那就更不够了。防御工事极不完善，堑壕和胸墙可以骑马越过。好像是为了补足这一切不幸似的，瞰制营垒的高地几乎处于枪弹的射程之内；而整个部署中最荒唐的是：所有粮食和药品的储备都放在离营垒有一段距离的两个独立堡垒内，在它们同营垒之间隔着一些围有篱笆的园圃和另外一个未被英军占领的小堡垒。喀布尔的城砦，即巴拉吉萨尔本来可以作为整个军队的一个安全的、极好的冬季驻扎地，但是为了迎合舒扎沙赫的心意而没有加以占领。1841年11月2日，起义爆发了。亚历山大·白恩士在城内的住宅遭到袭击，他本人被杀。这个不列颠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义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声势更大了。埃耳芬斯顿恐慌万分，盲目地听从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意见，不久就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拿破仑曾用三个词概括了这种混乱状况：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命令，反命令，混乱）。甚至这时巴拉吉萨尔还没有被占领。只派了几个连去对付几千名起义者，当然被击溃了。这就使得阿富汗人更加勇敢了。11月3日他们占领了靠近营垒的堡垒。11月9日存放军需品的堡垒被阿富汗人占领（堡垒守军只有80人），这样，英军就势必要挨饿。11月5日埃耳芬斯顿就已经谈论要出钱换取不受阻碍地撤出该国的权利。实际上到11月中旬，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军心已经非常涣散，不论欧洲兵或是西帕依⁶⁵都已经无法同阿富汗人进行野战。于是就开始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麦克诺顿在一次与阿富汗首领们的会晤中被杀。这时已经遍地冰雪，粮食缺乏。1月1日终于签订了投降协定。全部现金19万英镑必须交给阿富汗人，此外，还签署了14万英镑的期票。除6门六磅炮和3门山炮外，全部火炮和弹

药都留给了阿富汗人。英军必须全部撤出阿富汗。首领们答应保证安全，提供粮食和驮畜。

1月5日英军开始撤退，它的队伍计有4500名兵士和12000名服务人员。仅仅走了一天的路程队伍就毫无秩序了；兵士与服务人员混杂在一起，出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使得任何抵抗都成为不可能。寒冷、冰雪以及粮食不足的情况，就像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但是使英国人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们相当远的哥萨克，而是装备有远射程火枪和占据着每一个高地的顽强的阿富汗狙击手。签订投降协定的那些首领是不能而且也不愿制止山地部落的。小喀布尔山口就成了几乎是全军的坟墓，而它的一小股残余部队（不到200名欧洲人）被歼灭在扎格达拉克山口的入口处。只有布赖登医生一个人逃到贾拉拉巴德，讲述了经过情况。许多军官被阿富汗人所擒，作了俘虏。赛尔指挥的旅一直坚守贾拉拉巴德。人们要求他投降，但他拒绝退出城市；诺特在坎大哈也是这样。加兹尼被攻陷；在这个城市里连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火炮的人都没有，而作为守军的西帕依又经受不了这里的气候。

这时，不列颠边境当局一得到喀布尔惨败的消息，就在白沙瓦集结部队，以便援救在阿富汗的几个团。但是运输工具不足，在西帕依中病号又很多。1842年2月，波洛克将军接任指挥官，3月底他得到了新的增援部队。于是他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前往贾拉拉巴德解救赛尔，但是赛尔在几天以前已在该地把包围他的阿富汗军队完全击败。新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命令英军撤退；但诺特和波洛克都借口他们缺乏运输工具而婉言拒绝服从。到了7月初，印度舆论终于迫使埃伦伯勒勋爵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英国军队的民族荣誉和威信；因此他批准从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同时

向喀布尔进军。到了8月中旬，波洛克和诺特彼此商定了作战计划，8月20日波洛克向喀布尔进发，到达了甘达马克，并于23日击溃了阿富汗人的一支部队；9月8日他夺取了扎格达拉克山口，13日在帖津附近击溃了敌人的联合部队，15日在喀布尔城下扎营。与此同时，诺特于8月7日离开坎大哈，率领他的所有部队向加兹尼进发。经过几次小冲突，他于8月30日击溃阿富汗人的一支大部队，9月6日占领敌人放弃的加兹尼，破坏了工事和城市，在阿利丹附近阿富汗人的一个坚固阵地上，又一次击败阿富汗人，9月17日兵临喀布尔城郊，在这里波洛克立即同他建立了联系。早在这以前，舒扎沙赫已被一个首领杀害，从那时起阿富汗已经没有真正的政府；名义上的国王是他的儿子法特赫·琼格。波洛克派了一个骑兵部队去营救喀布尔的被俘人员，但是后者已经买通了看守人，所以他们在中途与部队相遇。为了报复，英军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场，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许多居民。10月12日英军放弃喀布尔，经过贾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开往印度。法特赫·琼格处于绝境，就跟随英军而去。这时，多斯特-穆罕默德被释放，返回了自己的王国。英国人在阿富汗扶植傀儡国王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8月10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鹿 砦

鹿砦, abattis (军事用语)——用砍倒的树构筑的障碍物,在山地战中常常被当做最简单的手段使用。在紧急的情况下,把树纵向放倒,树枝朝外,以阻碍敌人前进,而树干则用做防御者的胸墙。如果事先构筑鹿砦(例如当做防守山隘的手段),那就要把树枝去叶削尖,把树干埋进土里,再把树枝编成一种类似 chevaux de frise (拒马)的东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8 月 10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 座

如果要打炮台上的火炮架高到足以超越胸墙顶进行射击，而不是像通常那样，通过射孔进行射击，一般认为火炮就要 en barbette（用炮座）配置。要使火炮炮位达到这样的高度，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野战工事里，胸墙后面的土平台可以作为安置火炮的地方。在永备工事里，利用一般的高滑动炮架或旋转台把炮放到必要的高度。en barbette 配置的火炮不像通过射孔射击的火炮那样，有防御敌人火力的掩护；所以，只有在怕严重损坏胸墙而不能开射孔或希望不受射孔限制而向左右两侧扩大火力作用范围的情况下，火炮才配置炮座。因此，en barbette 配置火炮的方法适用于野战筑城、凸角工事和射击军舰的岸防炮台，尤其适用于有石砌胸墙的工程。为了掩护火炮不受到纵射火力，必要时可构筑横墙和堞墙。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4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棱堡

在古代筑城中，城墙是用圆形塔楼或方形塔楼从侧面防守的，当强攻的敌人遇到护城壕被迫停止前进时，被围者可以从塔楼向敌人射箭，并利用军用器械发射投掷物。欧洲出现炮兵以后，这种塔楼开始建造得相当大，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工程师们终于将圆形或方形塔楼改为多角形塔楼，这样就建成了棱堡。棱堡是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因此对面的凸角向开阔地突出。形成凸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而把两条长边同城墙或垒墙连接起来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而侧面以自己的火力掩护护城壕。最初的意大利棱堡还带有它的前身古代塔楼的痕迹。它构筑在离主墙很近的地方，凸角很钝，正面短，胸墙的表面用石块一直砌到顶端。这种小型棱堡的侧面主要是用来掩护连接两个棱堡的中堤前面的护城壕的。因此侧面和中堤垂直。这些棱堡位于多角形要塞围墙的每个角上，或者，如果多角形要塞的一边过长，这条边的一部分处在两个突出侧面的步枪有效火力范围以外，那末就在中间构筑中间棱堡，这种棱堡叫做 Piatta forma（台堡）。

随着十七世纪攻城炮的改进，需要有更大的棱堡，中堤很快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棱堡。侧面的作用也有

改变：这时侧面必须主要沿着邻近棱堡的正面前的护城壕进行纵射，并且侧面已不再和中堤垂直，而是和邻近棱堡正面的延长线（称为防守线）垂直。垒墙的石砌部分的高度减低了，这是为了使斜堤或者较低的外围工事的胸墙能够掩护它以防避敌人的平射火力。因此，老的法国派和德国派的代表们，以后的沃邦和库霍尔恩都曾对棱堡的形式和规模做了多次的改变，直到大约 1740 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他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著作⁶⁶为止；科尔蒙太涅的筑城法通常被认为是棱堡筑城体系中最完善的。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它的侧面和防守线接近垂直，而不完全垂直；外围工事也相当完善。

棱堡有实心的或空心的两种。实心棱堡的整个内部填实到土堤的高度，而空心棱堡是沿着棱堡的内边筑土堤，土堤很宽，足以放置火炮，而工事的中心是空的。在实心棱堡里有时构筑封垛，这是一种各边与棱堡的各边相平行的工事，它们构筑得很高，以便火炮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由于这种封垛的制高位置，通常在封垛里放置射程最远的火炮，以便从远距离用炮火骚扰敌人。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城方法。其中最受赞许的是构筑远离海岸的要塞的多边形体系或侧防暗堡体系，以及配置几层火炮的穹窿岸防炮台体系。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4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刺 刀

通常认为,目前所有基于步兵使用的这种武器是 1640 年前后在法国发明的(大概是在贝云 [Bayonne], 其名称即由此而来^①)。根据另外的资料,马来人把他们的《kris》,即短剑固定在火枪上,荷兰人从马来人那里学会使用这种武器,而法国则在 1679 年前后使用这种武器。在此以前,火枪手没有有效的白刃战武器,所以,为了在白刃战中保护火枪手,只好把他们同长矛手结成一体。刺刀使火枪手有可能抵御骑兵或长矛手,因而就逐渐排斥了后一种兵。最初,刺刀固定在木棍上,并和木棍一起插入火枪枪管,但是因为这使得兵士上刺刀后无法射击,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套在枪管上的套箍。虽然如此,长矛仍然作为步兵武器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奥地利人首先在所有基于步兵中采用带刺刀的步枪以代替长矛;普鲁士人在 1689 年仿效了他们;法国人在 1703 年,而俄国人在 1721 年,才完全废除长矛。在 1703 年斯拜尔巴赫会战中,步兵第一次上刺刀冲锋。⁶⁷目前在轻步兵中,刺刀通常被又直又尖的短剑代替,它利用活动刺刀座固定在步枪枪口的一侧。这当然不太牢固,但是轻

^① “刺刀”英语为《bayonet》(源出于法语《baionnette》)。——编者注

步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成密集队形冲锋,所以人们认为,这个缺点可以由这种武器的多样的使用方法来弥补。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4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莱-德-托利⁶⁸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俄国公爵和元帅；1759年生于利沃尼亚，1818年5月25日死于东普鲁士印斯特堡。1769年未满11岁时他就加入俄国军队，在入伍的29年中，他参加了对土耳其人、瑞典人、波兰人的各次战争，但在1798年以前他的军衔一直是不高的。在1806年的战局中他立了功。1807年他率领俄国先头部队以非凡的英勇保卫了普略西什-埃劳⁶⁹，在这座城市的街道、教堂和墓地进行了长期抵抗，从此他便有了军事上的声望。1808年他迫使瑞典人退到卡列里亚，1809年他当步兵上将，指挥12 000名俄军携带火炮、弹药、粮食和辎重渡过了冰封的波的尼亚湾，从而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查理-古斯塔夫横渡封冻的小贝耳特海峡的著名进军。他占领了乌默欧，他的到来促进了酝酿中的反古斯塔夫四世的政变，迫使瑞典人求和。⁷⁰1810年以后，他受命主管俄国陆军部。

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由他直接指挥的该军团的主力，根据夸大的官方报道似乎有55万人，可是实际上只有104 000人，而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军队总数不超过20万人。因此，俄军的撤退在当时不是自由选择而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拿破仑在圣海伦岛写的回忆录⁷¹中错误地认为最初的撤

退计划出自巴克莱-德-托利之手,其实这个计划是普鲁士将军富尔远在俄法决裂以前就制定的⁷²,而在宣战以后,贝尔纳多特在亚历山大面前重新坚决主张实行这个计划)。巴克莱-德-托利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不向荒谬的出战要求让步,不管这种要求来自俄军普通兵士还是大本营;他撤退得十分巧妙,不断地把他的一部分部队投入战斗,使巴格拉齐昂公爵有可能同他会合,并使契查哥夫海军上将易于进攻敌人的后方。当他像在斯摩棱斯克所发生的情况⁷³那样被迫进行会战的时候,他就占领一个不使会战成为决战的阵地。当撤退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已经不能避免决战的时候,他就在格查茨克附近选择了一个坚固阵地⁷⁴,这个阵地从正面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包抄。当库图佐夫到来时,巴克莱-德-托利已把军队部署好,由于俄军将领们的倾轧和俄军对于由外国人指挥神圣战争的不满,最高指挥权转到库图佐夫的手里。库图佐夫故意使巴克莱-德-托利难堪,放弃了格查茨克阵地。这样,俄军不得不在博罗迪诺附近的不利阵地应战。在8月26日这次会战^①中,指挥右翼的巴克莱是唯一坚守阵地的将军,他坚守到27日,从而掩护了俄军的撤退,要不是他,俄军就会全军复没。在从博罗迪诺向莫斯科方向撤退以后,正是巴克莱-德-托利再次警告不要进行任何保卫神圣首都的无益尝试。

1813年战局期间,巴克莱于4月4日攻占托恩要塞,在科尼斯瓦尔特附近击溃洛里斯顿;5月8日包岑会战失败后,他掩护同盟国军退却,取得格利茨会战的胜利,促使万当投降,并且在莱比锡会战中立下战功。⁷⁵在1814年战局期间,他已不指挥独立的

① 按旧历;关于会战,见本卷第258—263页。——编者注

兵团，他的活动主要在行政和外交方面，而不在军事方面。他所直接控制的军队纪律严明，这使他在法国居民中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他从波兰来得太晚没有能够参加滑铁卢会战，但参加了第二次入侵法国。他在去卡尔斯巴德的航途中逝世。晚年受人诽谤，郁郁不乐。他无疑是亚历山大的优秀将领，他朴实、顽强、果断而又明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0—15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法国元帅, 纽沙特尔公爵, 瓦兰壬公爵, 瓦格拉姆公爵; 1753年11月20日生于凡尔赛, 1815年6月1日在班堡被害。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六时代的地形测量工程兵团司令, 他在父亲的关怀下受到军事教养。他是从皇家地形测量局转入军队的, 最初为总参谋部中尉, 后为龙骑兵上尉。他曾在拉斐德的率领下参加美国独立战争⁷⁶。1789年路易十六任命他为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司令, 他在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以及1791年2月19日⁷⁷为王室出了不少力。但是他明白, 革命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而且我们看到他先后在拉斐德、吕克纳尔和居斯丁的手下当总参谋长。他在万第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所以在恐怖时期避免了嫌疑。1793年6月12日索缪尔保卫战⁷⁸中他所表现的那种英勇精神, 在国民公会委员的报告中得到好评。热月九日⁷⁹后, 他被委任为凯勒曼的总参谋长, 在他坚持下法军占领博尔格托一线, 使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可见, 还在波拿巴提升他为总参谋长以前, 他已经有了作为一个总参谋长的声誉。在1796—1797年的战局里, 在蒙多维会战(1796年4月22日)、洛迪会战(1796年5月10日)、科多尼约会战(1796年5月9日)和里沃利会战(1797年1月14日)中⁸⁰, 他也表现出自己

是一个优秀的师长。

贝尔蒂埃意志薄弱，但是顽强而有活力，具有海格立斯般的体魄，可以连续工作八夜；对作战的一切细节，例如各个军的运动，部队人数、宿营和指挥人员，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执行任务迅速，对他永远可以信赖；他仔细认真，非常善于使用地图，能十分锐利地判断地形的特点，擅长以简明的语言报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他经验丰富，十分机智，在战斗时知道应该向哪里下达命令，并且能够亲自监督执行这些命令；在战场上，他是司令官的活电报，在司令部的办公桌旁，他是司令官的不知疲倦的自动打字机；他是总揽司令部一切高级职权的将领的一个模范参谋。1798年波拿巴不顾他的反对，派他率领军队攻取罗马、在那里宣布成立共和国和俘掳教皇。⁸¹他既没有力量防止法国的将军、军需官和供应人员在罗马进行抢劫，又没有力量制止法国兵士的华变，所以把指挥权交给马森纳将军后就到米兰去了，在那里他爱上了美丽的维斯康蒂女士；他长期痴情地热恋她，因而在远征埃及⁸²的时期得到了 *faction des amoureux*（多情派）首领的绰号，并把最高统治者在各个时期赏赐给他的4000万法郎大部分花掉了。

从埃及回来以后，他支持波拿巴雾月18日和19日的阴谋⁸³，后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00年4月2日。他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时期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波拿巴相信了关于奥军的行进路线和配置情况的不确实情报而在马连峨陷入显然尴尬的境地⁸⁴。胜利后他同梅拉斯将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使命，然后重回陆军部，直到帝国宣布成立。此后他一直在皇帝身边，他以大军⁸⁵少将衔总参谋长的身分跟随皇帝参加了历次的战争。拿破仑慷慨地赐予他许

多封号、头衔、奖章、津贴和礼品。1804年5月19日他晋升为帝国元帅，获得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带，并取得法国大狩猎官的称号。1805年10月17日，他荣幸地参加了同马克制定乌尔姆地区投降条款。⁸⁶他从1806年普鲁士战局中获得纽沙特尔和瓦兰壬主权公爵的封号回国。1808年，他受命与巴伐利亚国王^①的侄女玛丽-伊丽莎白·巴伐利亚-比肯斐特公主结婚，并获得法国次帅的称号。1809年拿破仑任命他为从巴伐利亚进攻奥地利的大军总司令。他于4月6日宣战，而15日就已使整个战争陷于危险的境地。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领一半法军驻界根斯堡，派马森纳率领另一半法军驻奥格斯堡，而把巴伐利亚军队配置在他们之间的阿本斯堡，这样，卡尔大公只要推进得快，就能把这三部分军队各个击破。奥军的行动缓慢和拿破仑的到达拯救了法军。但是由于在自己的长官的直接监督下并且担任了与自己才能比较相称的职务，他在这次战争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在他长长的封号单上又增添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⁸⁷。

在俄国战争时期，他连总参谋长也不能胜任。在莫斯科大火以后，他甚至不能正确解释自己的长官的命令；虽然他一再请求准许他随同拿破仑回法国，但后者命令他同军队一起留在俄国。在法军不得不同强大的优势兵力作战的条件下，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才智有限和墨守陈规。他按照他的习惯对后卫部队的营，有时对后卫部队的连发布老一套的命令，就好像后卫部队仍然有3万人似的；他把阵地划给早已不存在的团和师，而为了弥补自己的无所作为，他就增加信使和命令。1813—1814年期间，我们又看到

①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编者注

他担任了他的老职位^①。参议院宣布拿破仑下台后，贝尔蒂埃以虚伪的借口悄然离开了他的庇护人，并且还在他退位以前，就宣称自己忠于参议院和临时政府⁸⁸，而后来率领帝国的元帅们到贡比泉去奴颜婢膝地欢迎路易十八。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封他为法国的贵族，并任命他为新建的国王近卫军的连长。他把他的纽沙特尔公国让给普鲁士国王，以换取34 000弗罗伦的津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他随同路易十八到根特。但是，由于隐瞒了拿破仑的来信，他失宠于国王，便到班堡去了，1815年6月1日在那里遇害，有六个带面具的人把他从他岳父的宫殿的窗口扔了出去。贝尔蒂埃的回忆录⁸⁹于1826年在巴黎出版。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15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① 即总参谋长的职位。——编者注

弗·恩格斯 阿尔及利亚⁹⁰

阿尔及利亚——北非的一部分，过去是土耳其的阿尔及尔帕沙辖区，从 1830 年起为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它北临地中海，东与突尼斯接壤，西与摩洛哥毗邻，南与撒哈拉大沙漠相连。它的领土从东到西，最长距离为 500 英里，从北到南，为 200 英里。阿特拉斯山脉构成这个国家自然地理的重要特点，它把沿海的可耕地同沙漠隔开。同时它也是南北河流的分水岭。主要的山脉从东向西延伸，而中央山脉的支脉在全国纵横交叉。西部的瓦纳日里斯出（托勒密叫 Mons Zalacus）以及东部的朱尔朱腊山和奥雷斯山最高。这些山几乎高达 7 000 英尺。最重要的河流是舍利夫河。还有一些很大的河流，它们从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流入沙漠。这些河流没有一条可以通航。夏季这些河流几乎是干涸的，但是春季河水淹没很大一部分地区，使得土壤肥沃。

某些旅行家不认为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害。眼炎和皮肤病非常流行。有人说，没有地方性热病，但法军大批病死看来为另外的结论提供了根据。空气极其清新，夏季炎热；冬季有时很冷，山区尤其如此。在与沙漠相连的地方是多沙的不毛之地，但是在两山之间，特别是在河流附近的地方，土壤肥沃。阿尔及利亚生长各种谷物，欧洲和热带的水果，异常美丽的花卉（特别是玫瑰花）以及甘蔗

(这种甘蔗被认为是所有出名的品种中最粗大、含糖量最多的一种)。各种家畜很多。马无疑是好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骑。阿尔及利亚的骆驼和单峰骆驼是头等的。这里是美利奴羊的故乡，美利奴羊最先是从小阿尔及利亚移入西班牙的。努米迪亚狮、豹、鸵鸟、蝎子、蛇以及其他有毒的爬虫都很多。

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据说是柏伯尔人，也叫卡拜尔人或马威德人（他们的这三个名称都通用）。关于这个种族的历史，资料很少，人们只知道他们曾经占据非洲的整个西北部，现在在东部的沿海地区也能看到他们。卡拜尔人居住在山区。其余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即穆斯林征服者的后裔。在阿尔及利亚还有摩尔人、土耳其人、库鲁格鲁人⁹¹、犹太人、黑人以及法国人。1852年全国人口有 2 078 035 人（10 万名军队除外），其中 134 115 人是欧洲各族人。卡拜尔人热爱劳动，居住在一般的村庄里；他们是出色的庄稼人，但也在矿场、金属加工企业以及粗毛和棉花加工工场做工。他们制造火药和肥皂，采集蜂蜜和蜂蜡，供应城市家禽、水果和其他产品。阿拉伯人沿袭他们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根据对牧场的需要或其他情况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居民中最不受尊敬的大概是摩尔人。他们住在城市里，生活过得比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舒适，由于一直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非常胆怯，可是仍然很残酷并且好报复；他们的道德水平也很低。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城市是：首都阿尔及尔、约有 2 万居民的君士坦丁和沿海的设防城市崩港（1847 年约有 1 万居民）。崩港附近有珊瑚场，常有做珊瑚生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光顾。布日伊位于布日伊湾。卡拜尔人曾在布日伊附近把法国的一艘两桅横帆

船的锚索砍断，使船搁浅，然后杀死船员，把船洗劫一空。由于这种暴力行为，法军提前占领了这个地点。

在这个国家里，尤其在君士坦丁省有一些古迹，例如拉姆别萨古城的遗址，那里还有城门的残迹、圆剧场的残骸和用科林斯柱支撑的陵墓。科勒阿和舍尔舍耳（古代的尤利亚·凯撒里亚城）位于海滨，后者对法国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地点。这里曾是尤巴的驻在地，附近有古代的遗迹。奥兰是一个设防的城市，1792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人统治。特累姆森曾是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驻在地，位于肥沃地带，旧城于1670年被焚毁，而新城几乎完全被法军破坏。这里生产地毯和毛毯。扎布，即古代的格土利亚，位于阿特拉斯的南面。最重要的地点是比斯卡拉，该地居民很和善，他们在北方各港口当差役和搬运工很受人欢迎。

阿尔及利亚先后被罗马人、汪达尔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当1492年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时，斐迪南派远征军去征讨阿尔及利亚，他占领了奥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已威胁到阿尔及利亚的存亡。阿尔及尔城附近的肥沃的麦提扎平原的艾米尔塞里姆·库泰米无力抗击强大的征服者，就求助于土耳其人。著名的海盗巴巴罗萨·奥鲁治被派去支援。奥鲁治于1516年到达，他首先亲手杀死塞里姆·库泰米，把这个地区据为己有，然后向西班牙人进攻。在一场时胜时败的战争之后，他不得不躲藏在特累姆森，在该地他被西班牙军队包围，后来被俘并于1518年处死。他的哥哥海尔-艾德-丁成了他的继承人。海尔-艾德-丁向苏丹塞里姆一世求援，并且承认这个君主为自己的最高掌权者。这样，塞里姆就任命海尔-艾德-丁为阿尔及尔的帕沙，并派军队给他，使他能够击退西班牙人而最后成为阿尔及尔的主宰。由于他在地中海抗击基

督教徒有功，苏里曼一世封他为卡普坦-帕沙^①。查理五世试图重新建立西班牙人的统治，于1541年派遣一支由370艘战船和3万人组成的强大远征军横渡地中海。但是凶猛的风暴和地震将舰队打散，使得舰队和陆军之间失去了一切联系。部队没有掩蔽所，又受到勇猛的敌人的疲劳攻击，因而只得回到船上逃走，损失了8000人、15艘军舰和140只运输船。从此，贝尔贝莱国家^②与马尔他骑士之间就不断发生战事，这就产生了海盗行为，因此阿尔及利亚海盗在地中海造成很大的恐怖，而基督教国家则在很长时期内不得不屈服于这种海盗行为。布莱克统率的英军、杜肯统率的法军、荷兰军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不同时期都进犯过阿尔及尔；杜肯两度炮击阿尔及尔，事后，德依^②派人去请法国领事（路易十四的代表），从他那里得知炮击花了多少钱后，便嘲笑说，如果给他这些钱的一半，他自己就把这个城市烧毁。

尽管欧洲国家不断进行抵抗，但是海上掠夺行为还是继续存在；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海岸有时也遭到专门从事这种恐怖活动——战争和掠夺——的暴徒的袭击。成千上万沦为奴隶的基督徒在阿尔及利亚一直受着折磨。虔诚的教徒曾建立一些团体，专门为了每年往返阿尔及尔，用俘虏亲属拿出的钱把俘虏赎回来。这时，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已有名无实了。由近卫军推举的德依纷纷宣布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1705年伊布拉吉姆德依把最后一个土耳其帕沙赶走了；近卫军在热烈的选举中选出了新的首领，而他们往往又在自己的暴动中把这些首领杀死。近卫军是从土耳其的移民中招募来的，当地的居民，甚至近卫军兵士与当地妇女所

① 卡普坦-帕沙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的称号。——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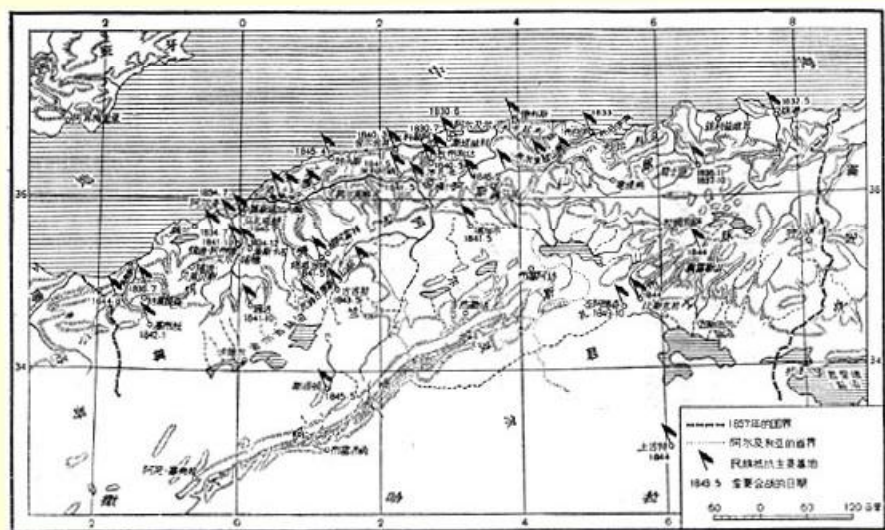
② 1671—1830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生的儿子都不准加入他们的队伍。德依有时向君士坦丁堡送礼，以表示其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但经常性的贡赋已完全停止了，同时，土耳其人被自己同俄国的无休止的斗争所牵制，没有力量去镇压远方省份的暴乱者。指明消灭骇人听闻的暴行的道路的这一使命落到了年轻合众国的身上。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有地中海的强大舰队保护贸易，因而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他们非法的勒索行为。恢复和平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又从事掠夺；美国人在 1795 年为了维持和平曾经不得不仿效欧洲各国向德依缴纳补助金，而现在已不再支付这笔贡款了。1815 年海军准将迪凯特在与阿尔及利亚的分舰队的战斗中卤获了一艘巡航舰和一艘两桅横帆船，并且进入阿尔及尔港口，迫使德依交出所有的美国俘虏并放弃以后对贡款的任何要求。英国人仿效这种勇敢的做法，于 1816 年在埃克斯毛思勋爵的统率下炮击阿尔及尔城，把它化为灰烬，迫使德依交出英国俘虏。但是这毕竟只是惩罚的措施，因为海盗行为并没有绝迹；1826 年阿尔及利亚人又公开在地中海掠夺意大利船只，甚至侵入北海。1818 年侯赛因-别依执政；1823 年，由于法国领事的住宅被抢劫和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受到多次袭击，法国向侯赛因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最后，阿尔及尔的德依亲自侮辱了法国领事，并对法国国王使用了不尊敬的语言，因为国王没有答复德依就法国政府欠犹太商人的债（而犹太商人又是侯赛因的债务人）的问题所写的信⁹³。为了迫使德依道歉，法国派出分舰队封锁了阿尔及尔。法国、穆罕默德-阿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穆罕默德-阿利在法国的支持下准备征服阿尔及尔，并作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向苏丹缴纳经常性贡款。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反对，另

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在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上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查理十世的政府独自去远征阿尔及尔，1830年6月13日布尔蒙将军统率的38 000名步兵和4 000名骑兵在阿尔及尔城附近登陆。侯赛因-别依虽然招募了6万人与这支军队作战，但是既然让法军登了陆，就无法对法军进行有效的反抗了；7月4日，阿尔及尔在如下的条件下投降：居民的私人财产和他们的宗教受到尊重，德依和他的土耳其侍从们必须离开。法军占领了城市。在他们的卤获物中有12艘军舰、1 500门铜炮和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硬币。他们在阿尔及尔立即配置了驻防军，并且实行军事管制。查理十世的政府打算把阿尔及尔移交给苏丹，当查理十世的王位被1830年七月事变推翻的时候，这个指令已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⁹⁴。他的继位者^①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决定保留已征服的地方，并且任命克洛塞尔为总司令去阿尔及尔接替布尔蒙。

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法国人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一切准则，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为了替自己辩护，法国人硬说卡拜尔人残暴，他们嗜杀成性，他们拷打俘虏，并说什么对野蛮人

① 路易-菲利浦。——编者注



阿富汗

宽容是一种错误。但是文明政府采取 *lex talionis* (复仇法) 的政策未必能够证明正确。如果按果实来评判树木的话,那末可以说,虽然花费了大约一亿美元和牺牲了几十万人,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成了法国将军和兵士们的军事学校,因为所有在克里木战争中获得荣誉的法国军官都是在这里受到军事训练和取得作战经验的。至于殖民化的尝试,那只要把欧洲人的人数和当地居民的人数作一比较,就可以证明这种尝试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失败了,而且这发生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之一,即离法国有 20 小时路程的意大利古代谷仓,那里只缺少一种东西,即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论朋友-军人或敌人-野蛮人都威胁着这种安全。能否说这种失败是由于法国人性格上的一种先天的缺陷而使他们不适于移民,或者是由于地方行政当局的不明智,这不是我们应该判断的事情。所有重要的城市——君士坦丁、崩港、布日伊、阿尔泽、莫斯塔加内姆、特累姆森——都是被强攻占领的,它们遭受了强攻所带来的一切灾祸。当地居民曾怀着很深的敌意屈从于土耳其统治者,而土耳其统治者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他们是同教者;但是,他们在新的统治的所谓文明化中却看不到任何好处,并且由于宗教狂热还对这种统治深恶痛绝。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文告中表示的是最善良的意愿,但是占领军、部队的调动以及双方的骇人的残酷行为,都推翻了关于和平和善良愿望的声明。

1831 年比松男爵被任命为民政长官;他试图建立与军事管理机构并列的民政管理系统,但是,因为他的措施会导致对总司令的监督,所以激怒了前拿破仑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于是按照他的建议,把比松召回。阿尔及利亚在萨瓦里的统治下变成了所有在政治或社会方面有嫌疑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的流放地;外籍军

团开入了阿尔及利亚，它的兵士被禁止进入城市。1833年有人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写道：

“三年来我们忍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向当局提出申诉，所得到的答复就是新的暴行，而暴行首先是针对那些提出申诉的人。结果，没有人敢做什么了；正因为如此，这份请愿书没有署名。先生们，我们恳求你们为了人道而把我们在这种毁灭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吧，把我们身上的奴隶的锁链解下来吧！如果这个国家仍然保持军事状态，如果这个国家不实行文治，那末我们就活不成了；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和平。”

这份请愿书促使调查委员会成立，结果民政管理机构建立了起来。萨瓦里死后，在瓦罗尔将军 *ad interim* (临时) 执政时期，为了平息民愤，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排干沼泽地，修筑道路，建立地方警察。但是一当曾经统率军队向君士坦丁进行过第一次也是十分不成功的一次远征⁹⁵的克洛塞尔元帅回到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措施都停止了。他的治理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结果在1836年有一份由54个知名的领导人物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要求调查他的滥用职权行为。这终于使克洛塞尔辞职了。在路易-菲力浦执政的整个时期，一直进行殖民化，但是殖民化的唯一结果是土地投机；建立军事移民区的尝试也毫无成效，因为种地的移民只有在距离他们的碉堡的火炮不远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同时，还试图向阿尔及利亚东部移民并把阿布德-艾尔-喀德从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西部赶出去⁹⁶。由于这位孜孜不倦和大胆无畏的领袖的失败，这个国家被制服了，以致加米安-加腊勃大部落立即表示了归顺。

1848年革命时期，卡芬雅克将军接替奥马尔公爵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不久，他和也在阿尔及利亚的茹安维尔亲王一起离职。但是对这个省的统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顺利。在共和国存在的短

短时期中，总督一再更换。移民被送到阿尔及利亚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不是死亡就是厌恶地抛弃了已经开始的工作。1849年佩利西埃将军袭击一些部落和贝尼·锡勒姆的村庄；他们的庄稼和一切抢走的财物照例都被焚毁或毁坏，因为他们拒绝纳税。在札布——与沙漠接壤的一个富庶地区，在一名马拉布特⁹⁷的鼓动下发生了大规模的骚动；1 200名远征军开赴该地，但是被起义者击溃。看来起义的规模很大，起义的鼓舞者是叫做“西迪·阿勃迭腊赫曼”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宗旨是歼灭法国人。起义者只是在康罗贝尔和埃尔比昂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派去镇压他们以后才被击败；而对阿拉伯城市左阿德奇的围攻也表明，土著居民丝毫没有丧失勇气，对征服者绝无好感。这个城市在51天中击退了围攻者的多次进攻，最后才被强攻占领。小卡比利亚直到1851年才投降，圣阿尔诺将军在这一年征服了它，因而建立了菲利普维耳和君士坦丁之间的交通线。

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和繁荣的言论。但这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内地同过去一样没有被殖民化。法国人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各部落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法国的制度，而对他们的野蛮袭击方法仍然在运用。例如，1857年朗东元帅对尚未屈服的卡拜尔人的村镇进行了一次胜利的袭击，企图把他们的土地并入法国领地。当地居民一直被铁腕统治着，但是不断的起义说明，法国的占领是不稳固的，以这种手段维持的和平是虚假的。如1857年8月在奥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Bureau Arabe⁹⁸长官杜瓦诺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名富豪的罪犯；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员，甚至下级官员平时

依仗自己的权势，专横暴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目前总督管辖区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央的阿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这个国家由兼总司令的总督管辖；他的助手是秘书和民政长官；在总督下面还设有由内务部门的领导人、海军司令、陆军司令以及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是批准总督的命令。Conseil des contentieux（讼事审理委员会）审理民事和刑事方面的违法行为。在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的省，有市长、法官和警官。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仍然有他们自己的法官；但他们那里有他们似乎比较喜欢的仲裁法庭制度，并且有专门负责在法国法庭上为阿拉伯人利益辩护的官员（l'avocat des Arabes（阿拉伯人的律师））。

据调查，阿尔及利亚的贸易从法国占领时起大大发展了。进口价值约为 2 200 万美元，出口价值约为 300 万美元。进口的是棉织品、毛织品、丝织品、谷物、面粉、石灰和精制糖；出口的是未加工的珊瑚、皮革、小麦、植物油、原毛以及其他某些小商品。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一次用俄文部分地发表于

1958 年“苏联东方学”杂志

第 5 期

弗·恩格斯

弹 药

弹药——使用火器所必需的弹头、装药和点火具，并且这个术语通常是指这三者已可使用的成品。例如，枪械的弹药是子弹和火帽（当然，燧发枪或针发枪是不用火帽的）；野炮的弹药是实心弹、爆炸弹、霰弹、榴霰弹、装药、信管、导火索和点火具等以及火箭连所使用的火箭。在要塞里和在围攻时，火药一般存放于桶中，需要时将它制成装药；围攻时所需的各种混合火药也同样处理；空心弹也是就地装填的。作战军队的弹药数量根据情况而定。步兵一般随身携带 60 发子弹，有时多一些；随军车辆也为每个兵士载运同样数量的子弹；其余的储备子弹存放在后面的车队（相距一两天的路程）。在野战炮兵里，炮兵连的每门火炮总是有 150—200 发炮弹，一部分装在火炮前车的弹药箱里，另一部分装在弹药车里；另外，在军团的弹药储备中每门火炮通常还有 200 发炮弹，其他的炮弹则存放在车队。在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军队中一般都这样，当然，这只是在战局开始的时候；经过数月作战，弹药的储备一般就消耗殆尽了，有时在几次会战失利后就完全没有了，而弹药的补充往往是困难而缓慢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卞尼格先⁹⁹

卞尼格先，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公爵——俄国将军；1745年2月10日生于不伦瑞克（他父亲在这里任近卫军上校），死于1826年10月2日。他在乔治二世的汉诺威宫当了五年侍从；后来参加汉诺威军队；在晋升为步兵近卫军上尉以后，他参加了七年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局。当时，他追求女性的狂热比他的战功引起更多的议论。为了娶汉诺威驻维也纳宫廷的大使施泰因贝尔格男爵的女儿，他辞去军职，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班特恩；由于挥霍无度，他困于债务而不能自拔，妻子死后，他决计到俄国军队里供职以重振家业。叶卡特林娜二世提升他为中校，他先在鲁勉采夫部下同土耳其人作战，后在苏沃洛夫部下镇压起义者普加乔夫。他曾告假去汉诺威向美貌出名的冯·施维格耳特小姐求婚。回俄国后，由于鲁勉采夫和波特金的提拔，他当了团长。1788年他在奥查科夫的围攻战¹⁰⁰中立了功，被委任为旅长，1793—1794年波兰战争期间，他指挥一支轻装部队，在奥什米亚纳战役和索雷战役以后被提升为将军；他曾率领骑兵突破了波兰军队的中央，保证了维尔诺会战的胜利¹⁰¹，而由于他在尼门河下游两岸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大胆的偷袭，叶卡特林娜二世奖给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荣誉武器和200名农奴。波兰战争时期，他表现出了优秀骑兵军官的素质——

热情、勇敢、敏捷，但是没有显露出军队指挥官所必需具备的更高的天赋。波兰战争以后，他被派到在波斯作战的军队中，他以 10 天的炮击迫使里海的杰尔宾特投降¹⁰²。圣乔治三级勋章是他从叶卡特林娜二世那里得到的最后的奖赏。叶卡特林娜二世死后，他被召回，遭到她的继位者的贬黜。

那时，圣彼得堡的军事总督帕连公爵正策划刺杀保罗的密谋。帕连知道卞尼格先很果敢，所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且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把密谋者引进皇帝的卧室。正是卞尼格先把躲藏在壁炉里的保罗拖了出来，当保罗拒绝退位，其他阴谋分子开始犹豫时，卞尼格先喊道：“还说什么！”解下肩带，向保罗扑去，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搏斗，终于将受害者掐死。为了快些结束此事，卞尼格先又用沉重的银烟盒砸保罗的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以后，卞尼格先立即获得了驻立陶宛的司令官的职位。

1806—1807 年的战局初期，他指挥卡缅斯基所率的第一军团的一个军，第二军则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在掩护华沙以抗击法军的尝试失败后，他被迫撤退到那累夫河畔的普乌土斯克，1806 年 12 月 26 日他在这里击退了朗恩和贝尔纳多特的进攻，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进攻俄国第二军团而使他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卞尼格先向亚历山大虚报战功，并且由于他暗中打击卡缅斯基和布克斯格夫登，不久便被任命为同拿破仑作战的军团总司令。1807 年 1 月底，他对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采取了进攻性机动，并完全偶然地避开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在这以后他和敌人在埃劳进行了会战。埃劳于 2 月 7 日陷落，而 2 月 8 日，卞尼格先曾为了遏制拿破仑的猛烈追击而进行了一次决战。俄军的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所指挥的普军的到达，以及法国某些军的迟滞开抵战场，使

胜利成了问题。双方都自命为胜利者，但不管怎样，据拿破仑本人说，埃劳战役是他历次战役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卞尼格先唱了 Te Deum (谢恩赞美诗)，从沙皇那里得到了一枚俄国勋章、12 000 卢布补助金和一封赞扬他为“常胜将军”的贺信。

春天，当一路法军对但泽围攻¹⁰³时，他在海尔斯贝尔格修筑防御工事，放过了攻击拿破仑的机会，但是在但泽失陷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认为攻击的时机到了。一开始，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人数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就把他堵住了，不久拿破仑的机动又迫使他退回到他的营垒。在这里，拿破仑于 6 月 10 日共以两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向他进攻，没有结果，但是次日迫使他放弃营垒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已经到达提尔西特的 28 000 人的一个军开到，就出敌不意地重新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德，在那里配置了他的军队，背靠阿累河并以弗里德兰德桥为唯一的退路。他不在拿破仑集结军队以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朗恩和莫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直到拿破仑 5 点钟把部队部署好并命令他们转入进攻。俄军被击退到阿累河，弗里德兰德被攻占，而弗里德兰德桥被俄军自己破坏，虽然俄军整个右翼还在河的对岸。6 月 14 日弗里德兰德会战就这样失败了，俄军损失了 2 万多人。据说，卞尼格先当时是受了他波兰籍妻子的影响。在整个这次战局期间，卞尼格先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全部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奇妙结合。

1812 年战局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皇帝的大本营工作，他在大本营里阴谋排挤巴克莱-德-托利，企图占据他的位置。1813 年战局期间，他指挥俄国后备军团，在莱比锡战场作战时被亚历山大封为伯爵。在这以后，他奉命把达武逐出汉堡，他包围

了达武,直到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军事行动结束为止。当时,他没有作战就占领了汉堡。为此,他要求给他新的荣誉和奖赏,结果都得到了。1814年到1818年卞尼格先在贝萨拉比亚指挥南方军团,最后,他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在那里去世,去世前他把大部分家产都挥霍掉了,并把他的贫穷的孩子留在俄国服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9月10—22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勃鲁姆

勃鲁姆，罗伯特——德国革命的蒙难者之一；1807年11月10日生于科伦，1848年11月9日在维也纳被处死。他是贫苦的箍桶匠帮工的儿子，箍桶匠于1815年去世，遗下孤苦无依的三个孩子和寡妇。1816年寡妇改嫁给一个驳船上的普通装卸工。这次改嫁并不幸福，在1816—1817年的饥荒年头，这一家穷困到了极点。1819年，年幼的天主教徒罗伯特，得到了一个在教堂里打杂的位置；后来，跟镀金匠当学徒，稍后，又跟腰带匠当学徒，并且当了德国常见的流动帮工，但是他干不了这一行，在短时间的外出奔走以后不得不回到科伦。在科伦他在一个制灯厂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博得了老板的好感，老板提拔他在办公室工作；他得到了陪伴厂主到南德意志各邦旅行的机会，1829—1830年他同厂主住在柏林。在此期间，他以顽强的努力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但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具体科学领域具有显著的天赋或出众的才能。1830年他应征服兵役（这是每个普鲁士臣民的义务），他与他的庇护人的关系也就中断了。六个星期后，他被开除出军队，失去了安身之地，他几乎是在他两次离开科伦时所处的那种情况下回到了这个城市。双亲的贫困和他本人的绝望处境，迫使他从科伦剧院的经理林格尔加特那里接受剧院跑腿的差使。勃鲁姆虽然是个小职员，但是他同舞台

的关系使他对戏剧创作特别注意,而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莱茵普鲁士所造成的活跃的政治局面,给他提供了参加某些政治团体的机会,并使他有可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他的诗作。

1831年,当时已移居莱比锡的林格尔加特让勃鲁姆当莱比锡剧院的出纳员和秘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47年。1831年到1837年间,他在“彗星”、“晚报”¹⁰⁴等这样一些供家庭阅读的莱比锡报纸上撰稿,并且出版了“戏剧百科”、“宪法之友”、“前进”文集以及其他书刊。他的著作带有某种小市民的庸俗色彩。其中后期的著作甚至还充满低级趣味。他的政治活动是在1837年开始的,当时他以莱比锡市民代表团代表的身分把荣誉礼品赠给萨克森议会的两个反对派议员。1840年他成了席勒协会和德国文学家联合会¹⁰⁵的创始人之一,而1841年成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政治性报纸“萨克森祖国报”¹⁰⁶上撰稿,这使他成了萨克森最有声望的新闻记者和政府专门迫害的对象。所谓的德国天主教¹⁰⁷把他看做是热烈的拥护者。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天主教协会,1845年成了该协会的精神上的首领。1845年8月12日,武装的市民和大学生在莱比锡的猎兵营房前面举行大会,声言要捣毁营房,以报复前一天猎兵连所制造的流血事件¹⁰⁸,这时勃鲁姆凭借他所固有的人人喜爱的口才说服激动的群众不要放弃法律所许可的反抗方法,并提议上告法院要求合理的赔偿。萨克森政府为了奖赏他的努力,又对他进行了迫害,结果,在1848年封闭了“祖国报”。

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勃鲁姆已成为萨克森自由派的中心人物;他创立了祖国联合会¹⁰⁹(该会很快就拥有4万多名会员),并且总是表现出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他由莱比锡市派到预

备议会，在预备议会中担任副议长的职务，他防止了反对派 en masse（大批）退出，从而使这个机构保存了下来。在预备议会解散以后，他是保留下来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是法兰克福会议员，是这个议会里温和的反对派首领。¹¹⁰他的政治见解是要把德国建成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有各种传统的王国和公国等作为它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王国和公国才把他认为是德国社会最美好的特点的那种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就是使得德国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能够独立发展。作为演说家，他说话明白易懂，绘声绘色，享有很大声誉。

当维也纳起义¹¹¹的消息传到法兰克福时，他受委托同德国议会的其他几位议员一起把议会反对派所写的贺信带到维也纳去。1848年10月17日，他以代表团代表的身分向维也纳市议会递交贺信。他参加学生军的队伍并在战斗中指挥街垒。文迪施格雷茨占领维也纳后，他镇静地坐在旅馆里谈话，突然旅馆被兵士包围，于是他本人被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他不愿背弃自己的言行而损害自己的尊严。他被判处绞刑，后来绞刑改为枪决，黎明时在布里吉特瑙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22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布 里 昂

布里昂,路易·安都昂·福韦勒——拿破仑的私人秘书;1769年7月9日生于桑城,1834年2月7日死于卡昂附近。1778年他进布里恩的军事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六年,他是拿破仑的同学。1789年到1792年,他在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当随员,在莱比锡研究国际法和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在华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宫殿呆了一个时候。他回到巴黎后,恢复了同拿破仑的亲密关系,当时拿破仑是个穷军官,而且没有朋友;但是在1792年6月20日以后革命事态有了决定性转变¹¹²,布里昂被迫回到德国。1795年他重返巴黎,和拿破仑再次会面,但是拿破仑对他很冷淡;而到1796年底,布里昂再次拜会拿破仑以后,他被召到大本营,立即被任命为拿破仑的私人秘书。第二次意大利战争¹¹³以后,布里昂获得了国务会议委员的头衔,住在土伊勒里宫,并且成为第一执政家里的常客。布里昂是供应军用物资的库仑商行的秘密股东,他曾为这家商行作成了一笔供应全部骑兵装具的有利交易,1802年这家商行亏空300万而宣告破产。商行负责人躲藏起来了,而布里昂被调往汉堡。1806年他奉命监督汉堡严格遵守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¹¹⁴。布里昂征收了汉堡参议会200万法郎,并向亚历山大皇帝的亲戚梅克伦堡公爵罚了款,汉堡参议会和亚历山大皇帝便控告

他盗窃公款；拿破仑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他的行为，并且命令他归还皇帝金库 100 万法郎。

布里昂因此失宠并破了产，在巴黎一直住到 1814 年拿破仑垮台；拿破仑垮台后他又露面了，从法国临时政府¹¹⁵索回了他的 100 万法郎，并且被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路易十八曾免除他的这个职务，但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风声，就又任命他为巴黎警察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呆了八天。因为拿破仑于 3 月 13 日在里昂签署的命令中，没有把他列为应该大赦的人，所以他跟随路易十八到比利时，从那里被派往汉堡，而在回到巴黎以后被委任为国务会议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大臣。1828 年，经济上的困难迫使他躲藏在比利时离沙勒罗瓦不远的封丹-勒韦克的布朗卡公爵夫人的庄园里。在这里，他在德·维耳马雷先生等人的协助下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八开本，十册）¹¹⁶，这部书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曾轰动一时。他死在疯人院里。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2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会 战

双方军队的主力,或至少是在单独的战区独立行动的两军集团之间的冲突,叫做会战。在使用火药以前,会战的结局是通过真正的白刃格斗来决定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排成戈矛林立的密集方阵进行攻击,随后用剑进行短促的格斗,来决定胜负。罗马人则将军团列成三线,这样在进攻时就可以用第二线的兵力再次攻击和用第三线的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机动。第一线进到距敌人10—15码处,即向敌人投掷一种很重的矛即投枪,接着就用剑进行格斗。如果第一线被击退,第二线就通过第一线的间隔向敌人进攻;如果这时还不能击破敌人的抵抗,那末第三线,即预备队,就猛攻敌人中央或某一翼。在中世纪,主要战斗的结局是由铁甲骑士队的攻击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使用了炮兵和轻火器使步兵重占优势时才起变化。此后,军队在火器的数量和构造上的优势就成为会战中的主要因素,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都给步兵装备了火枪,并且火器质量大致相等时为止。正是在这时候,在一定的平均射击精度的条件下,火器在一定时间内发射的弹数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步兵开始排成三列宽横队,并受最严格的副练,以保证能不断地射击和达到每分钟5发的射速。双方的宽横队不停地互射,在发射霰弹的炮兵支援下,彼此相向地缓慢地前进。最后其中

的一方因遭受损失而动摇,另一方就乘机猛扑,进行白刃格斗,通常就是这样来解决战斗的。如果一方还在会战开始前就占领了阵地,那末另一方通常力图与敌军阵线成锐角攻击,以便从翼侧迂回,然后包围其一翼;这样,被围的一翼以及中央的与其相连的部分就被优势兵力所打乱而挤成一团;这时,进攻的一方便用重炮予以轰击。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喜用的战法,他在莱滕会战¹¹⁷中运用得特别成功。此外,进攻的一方有时还用骑兵向已经动摇的敌人步兵攻击,并且在许多场合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总的说来,会战的结局仍是以步兵横队的速射来决定的,而这种火力竟如此有效,以致当时的会战成了近代流血最多的会战。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会战中全军 18 000 人,损失 12 000 人,在库奈斯多夫会战中全军 3 万人,损失 17 000 人。¹¹⁸然而,在拿破仑各次战局中最大的一次血战,即博罗迪诺会战^①,俄军的伤亡却稍少于全部兵力的一半。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完全改变了会战的情况。军队分编成若干师,每师约一万人,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它不仅成横队作战,而且还成纵队和散开队形作战。在采用这些战斗队形时,已没有必要只选择开阔的平地作为战场,而开始侧重选择森林、村镇、庄园以及各种起伏地作战。自从这种新的战斗队形为各国军队采用以后,会战与十八世纪的会战比较起来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军队虽然通常排成三线,可是,只要一次攻击,或至多连续两三次攻击,就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然而,现在会战却可能持续一整天,甚至两三天,而且在整个期间,攻击、反击和机动反复交替,双方互有胜负。目前,会战通常是由进攻一方的前卫开始的。前卫向前方派出散兵和

① 见本卷第 258—263 页。——编者注

他们的支援队，散兵一遇到严重的抵抗（这通常发生在有利于防御的地形上），轻炮兵便在散兵和小队骑兵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而前卫主力则占领阵地。然后，就照例开始炮击，其中一定数量的炮弹用来协助侦察并迫使敌人暴露其兵力。就在这时，各师相继开到，根据业已查明的敌情占领阵地。在便于攻击的地点向前派出散兵，必要时还派出基干步兵和炮兵予以支援；两翼进行攻击准备，部队被集中来攻击敌人主要阵地前的要点，而敌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还进行一系列的机动，以威胁敌人的防御阵地或者针对敌人可能的攻击而使他有遭到反击的危险。军队逐渐地接近敌人，攻击地点终于确定，而突击队便从一直占领着的隐蔽阵地出动。在战斗的这一阶段主要是基干步兵和炮兵向预定的攻击地点射击；然后，担任攻击的部队开始出动，同时小队骑兵也间或进行攻击。于是开始了要点的争夺战，双方反复争夺，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各要点之间的空隙地这时就成了已展开的步兵横队的战场，有时也成了刺刀冲锋的场所。不过，这很少会形成真正的白刃格斗，而在村镇、庄园、壕沟内和其他地方真正使用刺刀却是相当经常的。在这种开阔地上，骑兵一有机会也向前猛冲，而炮兵则继续进行射击，并前进到新的阵地。当会战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时，交战双方军队的意图、部署，特别是兵力就愈来愈清楚了；投入会战的兵力也愈来愈多了，因此不久就显示出，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未动用的预备队，以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或者是进攻的一方在这时获得了进展，因而敢于用自己的预备队猛攻防御一方的中央或翼侧；或者是攻击都被击退，并且不可能得到生力军的增援，在这种场合防御的一方就可出动自己的预备队，以猛烈的攻击击退以至粉碎敌人。在多数场合，决定性的攻击是针对敌人正面的某一地段进行的，以

达到突破的目的。面对选定的地段集中尽可能多的炮兵；步兵成密集的战斗队形前进，攻击一经成功，骑兵就迅速冲入这样形成的突破口，转向左右两侧，从翼侧和后方攻击敌人的阵线，迫使他们向两翼收缩。但是，要使这种攻击真正能够成为决定性的，就必须使用大量兵力，并在敌人把他们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再进行，否则将得不偿失，而且甚至可能成为会战失败的原因。在大多数场合，当会战出现显然不利的局面时，一个统帅宁可中断会战，也不愿动用自己最后的预备队和坐待敌人决定性的突击。在现代军队的编制和战术条件下，这往往用较小的代价就能办到，因为在激烈的会战以后敌人通常也大大丧失了元气。预备队和炮兵在后方占领新的阵地；在他们的掩护下部队依次撤出战斗，进行退却。能不能有秩序地退却，在这种场合就要看追击的速度而定。对企图退出战斗的部队，敌人会派出骑兵拦击，因此，为支援这些部队，也应准备骑兵。但是，如果退却一方的骑兵被击溃，而步兵在尚未摆脱敌人以前就被敌人赶上，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全面溃败，这时后卫在天黑以前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的处境通常是十分困难的。

这就是在双方兵力和指挥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现代会战的一般情况。如果其中的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整个问题就简单多了，而作战情况则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各文明国家军队之间的会战整个说来都具有上述的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BATTERY¹¹⁹

这个术语在野战炮兵中是指通常用于协同作战的一定数量的火炮（4—12门）以及必要数量的马匹、人员和装具。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battery 有 6 门炮，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 battery 有 8 门炮，俄国人的 battery 有 8 门或 12 门炮。field battery（野炮连）分为 light battery（轻炮连）、heavy battery（重炮连）和 howitzer battery（榴弹炮连）；有些国家还有 mountain battery（山炮连）。在记述战斗阵地时，battery 一词还用来表示任何一个放列火炮的地点。在要塞炮兵中，battery 是指配置火炮的一个要塞正面，而在攻城炮兵中，则专指配置在一条线上向要塞射击并有胸墙掩护的一定数量的火炮。构筑 battery 正是指修筑这种胸墙和炮位。battery 就其外形而言，有凸起的、半凹进的和凹进的；就其装备而言，有 guns battery（加农炮的炮台）、howitzer battery（榴弹炮的炮台）和 mortar battery（臼炮的炮台）；就其掩蔽方式而言，有 battery with embrasures（射孔式炮台）、barbette battery（炮座式炮台）（没有射孔）和 casemated battery（穹窿式炮台）（有防弹掩体）。就其用途而言，有 dismounting battery（破坏炮队）、ticocheting battery（跳弹炮队）、mortar battery（臼炮队）、breaching battery（破城炮队）和 counter battery（反炮台炮队）。破坏炮队用

来击毁与它平行的要塞正面上的火炮；跳弹炮队配置在一个正面的延长线上，用来对这个正面进行纵射，它的实心弹和爆炸弹恰好越过胸墙，沿正面飞行，而且跳离地面不高；臼炮队用来轰击棱堡内部和要塞内的建筑物；破城炮队用来破坏要塞围墙内岸的石砌墙壁；反炮台炮队配置在对着侧面的斜堤顶上，用来压制从掩护缺口前面的壕沟的侧面来的火力。strand battery（岸防炮台）是构筑在海岸的一定地点以对付敌人军舰的工事；它或者是永备工事或者是临时土质工事。永备工事通常用石块构筑，一般设有穹窿，穹窿内配置几层火炮；临时土质工事通常在炮座上放列火炮，以保证较大的射界；这两者后面通常都有掩护，以防止登陆的步兵突然袭击。

构筑土质的 battery 时，应进行主要尺寸的定线，而所用的泥土取自未来的胸墙前面或后面的壕沟。胸墙的外斜面不用复盖，但内斜面和侧面即射孔的内侧须用束柴、堡篮、编条、土桶、沙袋或草土块加以复盖，这样，泥土即使在陡峭的斜面上也不致塌落。在胸墙的外斜面和在前面的壕沟之间通常要留崖径即水平凸起部以巩固胸墙。在 battery 内射孔之间应筑踏垛，其高度要使人站在上面可以观察胸墙外面。为了掩护 battery 不受侧射火力的危害，常常在其一侧或两侧修筑肩墙，即与 battery 的胸墙成钝角的胸墙。在 battery 可能受到纵射火力的地方，必须在火炮之间修筑横墙或肩墙，在炮座式炮台上，这种掩蔽工事的加固办法就是使横墙高出胸墙几英尺，这一凸起部分横过胸墙，一直延伸到胸墙的外棱线上，这就是所谓的垛墙。火炮放列在用木板、枕木或其他木质材料做成的平台上，以保证火炮平稳。弹药一部分放在胸墙脚的崖孔内，另一部分放在地下的、用土复盖的木质防弹工事里。

为了掩护炮兵不受步骑枪火力的杀伤，常用坚固的木板制成的掩障遮住射孔，火炮移动时，则将掩障向两边敞开，或者在掩障上穿个孔，使炮口伸出去。圆木做成的掩障用来防避敌人的火力，它的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则斜支在地上。榴弹炮的炮台的射孔底边从下向上倾斜，而不是从上向下倾斜；白炮的炮台根本没有射孔，因为大射角可以保证实心弹飞越胸墙顶。为了有效地防避重炮火力，胸墙至少应该有 17 或 18 英尺厚；如果敌炮的口径很大，而胸墙的土质又不好，则可能需要 24 英尺厚。胸墙有七八英尺高就足以防避火力危害。各炮之间应有 10—14 英尺的间隔；如果需要横墙，胸墙就应相应地延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露 营

露营 (Bivouac) (法语, 可能来源于德语 bei 和 Wache^①两词)——军队不用帐篷露天宿营, 兵士把武器放在身旁和衣而睡。古代战争时武士在帐篷中宿营, 这些帐篷就好似一座游动的城市。在中世纪, 封建主和国王的军队以行军途中遇到的城堡和寺院作为宿营地。受宗教热情驱使而参加十字军远征亚洲¹²⁰的人民群众, 与其说是军队, 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除了首领们——骑士和国王——及其随身侍从外, 这一大群人就像亚洲平原上的野蛮的游牧部落一样, 完全在野地上露营。当重新采取正规战争时, 又用帐篷扎营了, 而且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但在大规模的拿破仑战争时期, 有人得出结论说, 移动的速度比兵士的健康更为重要, 于是, 除了英国军队偶尔使用外, 帐篷作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从欧洲战场上消失了。所有的军队都在篝火旁露营, 如果位于敌人附近, 即不用篝火; 他们睡在干禾秸上, 有时也可能睡在光地上, 同时由一部分兵士守卫。历史上没有一次露营像奥斯特利茨会战¹²¹前夕的露营那样为诗画所颂扬。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bei》——“在”; 《Wache》——“警卫”, “守卫”, “警戒”。——编者注

弗·恩格斯

掩 障

掩障（筑城用语）——不让敌人看到某处情况的一种设备，例如，放在炮台内棱线上的、在射孔上方突出的束柴便是这种设备；束柴使人难于在一定距离内通过射孔进行观察。有时射孔处装上较复杂的掩障，它由两块厚木板做成，从两边沿着槽沟闭合，可以完全遮住射孔。如果射向始终不变，则在推动火炮时不必将它敞开，因为在掩障上可为炮口穿孔。必要时，这个孔可用活动挡板遮住。另一种掩障用于掩护炮台的炮手，以防避曲射火力的杀伤。它用光滑坚固的圆木做成，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支在地上。如果炮弹不十分大，而且不是近于垂直地落下，就不会打穿这种掩障，而只能撞上掩障并以一定角度跳开。在修筑堑壕时，用一种特殊的掩障来掩护工兵不受火力杀伤；它借助于滚轮移动并随着挖壕的进展而向前挪动。如要抵御步骑枪的火力，只需一块用硬木板做成的护板，向外的一面包上铁皮，再用粗圆木做支柱。如要抵御火炮的火力，则需要有装满泥土的大方箱或方框、沙袋或束柴。最普通的一种工兵掩障是个很大的堡篮，或放满了束柴的圆篓，作业班在工兵前面滚动它们。当需要从上面掩护对壕时，掩障按下面的方法构筑：将方木梁放在上面，铺上束

柴，再撒上泥土，这样，方木梁就能十分可靠地抵御实心弹和爆炸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堞 墙

堞墙 (Bonnet) (筑城用语)——胸墙的横向凸起部分,也就是为了不使敌人有可能从高处看见工事内部,或者为了掩护炮座式炮台的炮手和火炮不受侧射火力的伤害而构筑的横墙和胸墙。在炮座式炮台上,火炮的火力要越过胸墙顶,火炮必须架设在高旋转台上,装置在旋转台上的炮架可前后移动。所以,炮兵操纵火炮时不能完全避免敌人的射击,而侧面射击或跳弹射击对他们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射击的目标比在有射孔和低炮架的炮台上的目标几乎高出一倍。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在火炮之间构筑横墙或横向胸墙,并且胸墙必须筑有高出于胸墙的堞墙,以便平台上的炮手完全得到掩护。这一上部构筑从横墙横过胸墙。如果火炮的两侧都有堞墙,火炮的水平迴转角度就会被限制在 90 度到 120 度之间。

《Bonnet-à-prêtre》或《Queue d' Hirondelle》(燕尾堡,野战筑城用语)——具有两个凸角并在凸角之间有一个凹角的工事。凹角经常为 90 度,两个凸角通常为 60 度,这样,两个外正面长于两个内正面,并且向后延伸。这种工事有时用来做小的桥头堡,或在其他情况下,用来防守隘口。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 姆¹²²

贝姆,约瑟夫——波兰将军;1795年生于加里西亚的泰尔诺夫,1850年12月10日逝世。他一生极端仇恨俄国。在拿破仑的胜利和宣言唤起复兴波兰的信心的时代,贝姆进入华沙的陆军幼年学校,并在佩勒蒂埃将军领导的炮兵学校受军事教育。他在炮兵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骑炮兵中尉,在1812年战局中,他在达武和麦克唐纳部下当骑炮兵中尉;他因参加但泽保卫战¹²³而获得荣誉军团十字勋章,这个要塞失陷后,他回到了波兰。因为沙皇亚历山大假充波兰民族的热烈的同情者,改编了波兰军队,贝姆于1815年加入波兰军队当炮兵军官;但是不久因同一个上级军官决斗而被免职。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华沙炮兵学校军事学教员,并被提升为上尉。他使康格里弗火箭在波兰军队中得到使用,并把这方面的经验写成一本书¹²⁴,这本书最初用法文出版,后来译成德文。他容易激怒,不愿服从,从1820年到1825年曾几次被交付军事法庭,被判处徒刑,释放后,重又入狱,最后被押送到波兰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科茨克,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下虚度岁月。在亚历山大死后,彼得堡的起义¹²⁵使康斯坦丁对他无暇顾及,他才脱离了波兰军队。贝姆离开俄属波兰后到了列姆堡,在一家大酿酒厂当经理,并且写了一本关于酒精蒸馏法的书。

当1830年华沙爆发起义时,他参加了起义,几个月后他被提

升为炮兵少校；1831年5月他参加沃斯特罗仑卡会战，他在同占优势的俄国炮队作战中表现出非凡的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¹²⁶当波兰军队对俄军的攻击最后被击退，俄军渡过那累夫河时，他勇敢地率领他的全部炮兵向前推进，以掩护波军撤退。在这以后，贝姆升为上校，不久又升为将军，并且被任命为波兰炮兵司令。当俄军强攻华沙时，他作战是很勇敢的，但作为一个指挥官，却犯了错误，没有发挥他的40门炮的作用，使俄军占领了主要防御地点沃利亚。华沙沦陷后，他带领残余部队退到普鲁士，他说服兵士不向普军缴械，结果引起了当时称为菲绍会战的一次无谓的流血冲突。后来，他离开军队，在德国组织了波兰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以后他就到了巴黎。

他那异乎寻常的性格——爱好劳动和喜爱精密科学同强烈的事业心结合在一起——促使他心甘情愿地去干冒险的事，而一旦遭受挫折就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例如，1833年他独自负责为唐·彼得鲁招募波兰军团¹²⁷，但是没有成功，当时有人指责他背叛；当他去布尔日招募波兰人加入他的军团时，有一个对他失望的同胞向他开枪。1834年到1848年期间，他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各地游历。

1848年，奥属波兰一出现革命迹象，他就赶到列姆堡，10月14日又从那里去维也纳。在维也纳为加强防御工事和组织革命力量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努力的结果。他所领导的维也纳流动自卫军¹²⁸的出击于10月25日以溃逃而告终，这使他不得不提出一系列严厉的指责；而回答他的是公开指控他叛变。这种指控尽管是完全荒谬的，但是性质十分严重，若不是惧怕波兰军团暴动，他就有可能被送交军事法庭。在他10月28日出色地保卫猎人街的

大街垒以及维也纳市议会和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之间开始谈判以后，他就躲藏起来。他的悄然失踪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从维也纳一直跟踪他到佩斯，在佩斯，由于他向匈牙利政府提出不准组织特别的波兰军团的合理建议，一个名叫科洛迭茨基的波兰人把他当做叛徒向他开枪，他负了重伤。

匈牙利政府委派贝姆指挥特兰西瓦尼亚战争，但由他自己想办法招兵买马来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是他军事活动的一个最重要时期，而且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的独到之处。1848年12月底，贝姆开始进行第一个战役，他统率一支约有8000人组成、装备很差并由各种各样的人（未经训练的**马扎尔新兵**、**洪韦德**¹²⁹、**维也纳的流亡者**和一小部分**波兰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这支混杂的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行进中又不断从**塞克列人**¹³⁰、**萨克森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那里得到补充。大约经过两个月时间，贝姆结束了这次战役，战胜了普赫纳所率的2万名奥军、恩格尔加尔特所率的6000名俄国辅助部队以及**乌尔班**所率的强盗队伍。他迫使**乌尔班**逃到**布柯维纳**，普赫纳和恩格尔加尔特退到**瓦拉几亚**，于是占领了除一座小要塞**卡尔斯堡**以外的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勇敢的突然袭击，大胆的机动，强行军，以及由于他以身作则、巧妙地选择隐蔽地段和在紧要关头一贯能够保证炮兵的支援而赢得他的部队对他的由衷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在第一个战役所进行的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统帅，同时他还表现出他是一个善于迅速组织和训练军队的能手；可是，他满足于初步的一般的组织，忽视建立由精锐部队构成的核心（这是绝对必需的），所以，他的临时组成的军队一旦遭到严重的挫败，就必定像**幽灵**那样消失。

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特派员

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残酷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敌对民族的和解政策使他的军队人数在几个月内就增加到4—5万人，而且使他有了足够的骑兵和炮兵。如果说贝姆率领这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远征巴纳特¹³¹虽有几次出色的机动但没有取得巩固的战果，那末就应当注意到：他由于必须同无能的匈牙利将军协同作战而被束缚住了手脚。

俄国大军侵入特兰西瓦尼亚和随之而来的马扎尔人的失败，迫使贝姆回到他进行第一个战役的战场。他用攻入莫尔达维亚以骚扰敌人后方的尝试失败以后，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7月29日在舍斯堡附近被利迭尔斯指挥的人数比他多两倍的俄军击溃，而他自己由于陷入了沼泽地，偶然被几个溃散的马扎尔骠骑兵救了出来，才没有被俘。他重整残部，于8月5日再次以强攻占领了海尔曼施塔特，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增援，不久只好放弃这个地方；在8月7日的战斗失败以后，他又去匈牙利，在那里恰好亲眼看到决定性的泰梅希瓦拉会战¹³²的失败。他率领马扎尔残部在卢果日进行最后抵抗失败后，他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继续同占很大优势的兵力作战，直到8月19日他才被迫到土耳其避难。

为了给自己开拓新的反俄活动领域，贝姆入了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阿穆腊特帕沙，担任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反对，他被派到阿勒颇。1850年11月他在那里有效地制止了穆斯林居民的流血事件¹³³，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基督教徒；大约一个月后，他因拒绝就医而死于严重的热病。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9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

卡·马克思 贝西埃尔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法兰西帝国元帅；1768年8月6日生于洛特省的普勒塞克，1813年5月1日在吕特岑附近阵亡。1791年他加入路易十六的“立宪自卫军”¹³⁴，在驻比利牛斯山的猎骑兵团当军士，不久获得猎兵上尉军衔。1796年9月4日，罗韦雷托会战胜利后，波拿巴在战地就提升他为上校。在1796—1797年意大利战局期间，他是总司令的吉德¹³⁵队长；贝西埃尔在埃及当吉德团团长，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种部队有关系。1802年他升为师长，1804年获得帝国元帅的称号。他参加过罗韦雷托会战、里沃利会战、圣让得阿克会战、艾布基尔会战、马连峨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他曾指挥骑兵的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击）、奥斯特利茨会战、耶拿会战、埃劳会战和弗里德兰德会战¹³⁶。1808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萨拉芒卡省的一个师（有18 000人）的师长；当他到任时，库埃斯塔将军已经占领伐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果斯之间的阵地，威胁了马德里和法国之间的交通线。贝西埃尔向库埃斯塔将军攻击，在梅迪纳-德-里欧-塞科附近取得了胜利。在英军的伐耳赫伦远征¹³⁷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贝西埃尔为驻比利时的法军司令，以接替贝尔纳多特。同年（1809年），贝西埃尔获得伊斯的

利亚公爵的封号。在埃斯林会战^①中，他指挥骑兵师，打败了奥地利的霍亨索伦将军。俄国战局时期，他是近卫骑兵司令，当1813年德国战局开始时，他担任法军骑兵司令。在吕特岑会战¹³⁸前夕，他在进攻萨克森的里帕赫峡谷时阵亡。他阵亡的消息被认为在一段时期内不宜向全军宣布，由此可见他在兵士中享有多么大的威望。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29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64—7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博 斯 凯¹³⁹

博斯凯，玛丽·约瑟夫——法国元帅，1810年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1829年入巴黎综合技术学校，1831年入麦茨军事学校，1833年升为炮兵少尉，1834年仍任少尉，随同第十炮兵团前往阿尔及利亚。有一次，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那里处境非常危急，而指挥官惊惶失措，不知如何脱出战斗，这时年轻的博斯凯出面献策，结果敌人遭到了彻底失败。1836年博斯凯被提升为中尉，1839年为上尉，1842年为少校，1845年为中校，1848年为上校，后来在共和国政府时期为准将。在1851年卡比利亚战役^①中，他率领他的旅攻击莫纳加尔峡谷时负伤。由于他对路易-拿破仑的态度矜持，他一直未被提升为师长，但是，当战争爆发，开始派军队到土耳其去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

在阿尔马河会战^②中，他指挥法军右翼向俄军左翼进行侧面攻击，其行动之迅速和有力，连俄国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博斯凯甚至使炮队通过没有道路的而且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的峡谷到达了台地。但是应该指出，在这次战斗中他的部队的人数大大超过敌军。在巴拉克拉瓦会战时，他及时赶去解救英军右翼，使英国

① 见本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59页。——编者注

轻骑兵的残存部队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俄军不得不
停止追击。¹⁴⁰在因克尔芒会战中，他在清晨就表示愿意派 5 个步兵
营和 2 个炮兵连去支援英军。当这个建议遭到拒绝时，他把法军
3 个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英军右翼后面。上午 11 时，他将其中的
两个旅调往火线，从而迫使俄军退却。如果没有他的支援，英军
将彻底失败，因为英军全部投入了战斗，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而
俄军却还有 16 个未动用的营。波斯凯作为必须对部署在陡峭的黑
河河岸的联军进行掩护的一个军的指挥官，始终非常敏捷，机警
和主动。他参加了强攻马拉霍夫冈¹⁴¹的战斗，在这次战事以后，他
被提升为元帅，1856 年当了参议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2—29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布律恩

布律恩，吉约姆·玛丽·安——法兰西帝国元帅；1763年3月13日生于布里夫-拉-盖阿尔德，1815年8月2日死于阿维尼翁。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去学习法学，但他离开大学后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当了印刷工人。革命初期，他同哥提埃、茹尔尼亚克·德·圣梅阿尔一起出版“农村和城市总汇报”¹⁴²。不久他加入革命政党，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并且成为科尔德利俱乐部¹⁴³的热心的会员。他那魁梧的身材、威武的仪表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成了1791年马尔斯广场示威时人民的军事领袖之一，这次示威被拉斐德的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¹⁴⁴。当他被囚在狱中，人们开始传说保皇派企图以卑鄙手段除掉他的时候，丹东把他营救了出来。他成了丹东的著名的拥护者之一；由于丹东的保荐，布律恩在1792年著名的九月的日子¹⁴⁵里就任军事职务，10月12日出人意外地被擢升为上校和副官长。他在比利时杜木里埃手下服务；他曾被派去对付在普伊泽将军指挥下进攻巴黎的卡耳瓦多斯省的联邦派，而且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后来，他晋升为准将并参加了冈德斯霍特会战¹⁴⁶。社会拯救委员会委派布律恩去平定吉伦特叛乱¹⁴⁷，他极其严厉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当丹东被监禁时，人们以为布律恩会赶紧去营救他的朋友和

庇护人，但是一露出危险的苗头，他便审慎地站在一旁观望，并在恐怖时期巧妙地保全了自己。热月九日后，他又归附当时已取得胜利的丹东派¹⁴⁸，并且随同弗莱隆去马赛和阿维尼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他作为波拿巴的一名将领去镇压巴黎市区的叛乱¹⁴⁹。他帮助督政府粉碎格列涅尔兵营的密谋（1796年9月9日）¹⁵⁰以后，加入了意大利军团的马森纳师，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英勇。波拿巴为了笼络科尔德利派首领们，把他在里沃利会战中的一部分功绩归之于布律恩的努力，在战地就提升他为师长，而当意大利军团第二师师长的职位因奥热罗去巴黎而空缺的时候，波拿巴便促使督政府委派布律恩担任这个职务。

康波福米奥和约¹⁵¹签订以后，督政府交给他的使命是首先麻痹瑞士人，使他们感到可以高枕无忧，然后分裂他们的委员会，最后，集结军队进攻伯尔尼州和夺取它的公共金库；当时布律恩忘记了把掠夺来的财物登记造册。此外，他采取了与其说是军事手段，不如说是外交手段，迫使法国的假同盟者撒丁国王卡尔·艾曼努尔把都灵的城砦交给他（1798年7月3日）。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巴达维亚战役¹⁵²在布律恩的军事生涯中是重大的事件。在这次战役中，他击败了约克公爵所指挥的英俄联军，约克公爵向他投降并保证遣返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被英军俘虏的全部法军战俘。雾月十八日 coup d' état（政变）以后，波拿巴委任布律恩为新成立的国务会议委员，随后又派他去镇压布列塔尼的保皇党人。

1800年被派到意大利军团的布律恩占领了三个敌人营垒，在沃尔塔河地区构筑工事，把敌人赶过了河，并且采取了立即强渡该河的措施。根据他的命令，军团必须在两个地点渡河：杜邦将军指挥的右翼在沃尔塔河畔的磨坊和波察洛村之间渡河；布律恩

本人指挥的左翼在蒙博戎附近渡河。当后面这部分部队渡河遇到困难时，布律恩下令推迟 24 小时进行，虽然在另一地点开始渡河的右翼已经同兵力强大得多的奥军接火。全靠杜邦将军的努力，右翼才没有被歼灭或做俘虏，否则对整个战争的成败就有很大的影响。布律恩因这次错误被召回巴黎。

从 1802 年到 1804 年，布律恩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他的外交才能不像在瑞士和皮蒙特有刺刀作后盾。1804 年 12 月他返回巴黎以后，拿破仑提升他为元帅，对他比对勒库尔布那样的将军们更为重用。他当了一段时期的布伦兵营¹⁵³司令官之后，于 1807 年被派到汉堡担任汉撒各城市的总督兼大军的后备军司令。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曾大力帮助布里昂窃取国家资财。为了解决在施拉赫坦与瑞典签订的停战协定中的某些争执点，布律恩曾与古斯达夫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谈，古斯达夫实际上建议他出卖自己的皇上。他拒绝这个建议所采取的方式引起了拿破仑的怀疑；布律恩在草拟关于吕根岛移交法军的协定时只把法军和瑞典军称做缔约双方，而根本不提“皇帝陛下和国王陛下”，于是拿破仑大发雷霆。布律恩立即被贝尔蒂埃去信召回。贝尔蒂埃根据拿破仑的特别指示在信中指出：“自法拉蒙德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

布律恩回到法国以后，就钻到个人生活里去了。1814 年布律恩向参议院的法令¹⁵⁴宣誓，并且从路易十八那里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百日¹⁵⁵时期，他又成了波拿巴分子，并被任命为驻瓦拉河地区的监视军司令官。他在那里像他当年当雅各宾派那样无情地、坚决地打击保皇党人。滑铁卢会战以后，他宣布自己是国王的拥护者。他从土伦去巴黎的途中，于 8 月 2 日到达阿维尼翁，当时

这个城市已被保皇派恶棍们控制，他们进行了 15 天烧杀。布律恩被人认出后遭到枪杀。一群人拖着他的尸体沿街走，并把它抛入了罗尼河。拿破仑在圣海伦岛时曾说：“布律恩、马森纳、奥热罗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大无畏的破坏者。”而关于布律恩的军事才能，他指出：“他有一定的功绩，但是总的说来，与其说他是令人生畏的军人，不如说他是 général de tribune（看台上的将军）。”1841 年，在他的故乡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3—
29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爆 炸 弹

爆炸弹，或爆炸的炮弹——重炮和白炮使用的一种内装火药的空心铁弹；它以大射角发射，具有降落的力量和爆炸的力量。爆炸弹是所使用的炮弹中最大的一种，因为白炮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短，可以有相当大的直径即口径。目前爆炸弹的直径通常为 10、11 和 13 英寸；1832 年，法军围攻安特卫普¹⁵⁶时使用了比利时铸造的白炮和口径为 24 英寸的爆炸弹。爆炸弹内的火药由炮弹信管引起爆炸，炮弹信管是装满缓燃药的空心圆管，在白炮发射时着火。这种信管的作用是使爆炸弹在到达目标时尽快爆炸，有时使爆炸弹着地直前爆炸。除了火药外，爆炸弹中有时放入几份瓦朗西恩剂¹⁵⁷，以点燃可燃物，但是有人认为，瓦朗西恩剂没有用处，因为它在爆炸弹爆炸时成了很多微粒，而且没有它也丝毫不影响爆炸的炮弹的燃烧作用。发射爆炸弹的射角为 15 度到 45 度，而一般为 30 度到 45 度，用减装药的较大的爆炸弹在射角为 45 度时有较远的射程，而用增装药的较小的爆炸弹在射角为 30 度或 30 度左右时也有较远的射程。在一切情况下装药量都是比较少的：白炮在发射 200 磅重的 13 英寸的爆炸弹时，如果射角为 45 度，火药装药为 $3\frac{1}{2}$ 磅，其射程可达 1 000 码，而如果装药为 20 磅（即相当于爆炸弹重量的十分之一），其射程可达 4 200 码。这种从高处

落下的爆炸弹，如果遇到易于破坏的目标，则其破坏力是很大的。它能穿透任何层的楼房和坚固的拱楼板；13英寸的爆炸炮弹虽然只装大约7磅火药，但是它的爆炸效果犹如地雷，如不遇障碍，其碎片可飞出800和1000码。但是，爆炸弹如果落到松软的土地上，则可陷入8到12英尺深，或者熄灭，或者爆炸，但已不能为害。同时，爆炸弹常常被用做小地雷或应用地雷——在敌人必经之地把它埋入大约一英尺深的土里；用缓燃火绳或导火索使之爆炸。这就是最初使用爆炸弹的方法。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一种装满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金属球，这种金属球借助于缓燃火绳爆炸。中国人在防守隘路时使用它，当敌人逼近时把它埋在那里。1232年在开封府保卫战中，中国人在遭到猛攻时常常从胸墙上把爆炸性火器向强攻要塞的蒙古人滚下去。古札拉特沙赫马茂德在1484年围攻查姆帕尼尔时曾向城内扔爆炸弹。在欧洲，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步其后尘的西班牙人没有仿效先前不甚可信的例子，从十四世纪初起就用火炮发射爆炸弹和燃烧弹，但是空心弹由于价格昂贵和不易制造而长期没有得到广泛采用。只是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它才成为攻城炮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5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手

炮手—最初是白炮连里操纵白炮的兵士；但是目前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这个用语是指稍低于中士的炮兵军士。炮手的主要职责通常是瞄准。奥地利曾经建立炮手团作为训练炮兵军士的学校，这个机构对制定火炮的有效而科学的操纵方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奥军的这一兵种以这种方法而闻名。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 击

炮击——为了引起火灾而向城市或要塞发射爆炸弹。炮击有非正规的和正规的两种。非正规的炮击是军舰、野炮连和少量量的攻城炮队向某地点发射爆炸弹，以便恫吓居民和守军，使之早日投降，或者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规炮击是攻击要塞的方法之一。1815年，在滑铁卢会战以后，普军围攻法国北部的要塞时首次采用正规炮击来攻击要塞。由于法军和波拿巴的拥护者当时士气非常低落，而其余的所有居民又都渴望和平，普军便决定抛弃按部就班的旧的围攻形式，而以短时间的猛烈炮击代替它，这样就可以引起火灾和火药库爆炸，使要塞的全体居民夜不成眠，从而造成居民对司令部的道义上的压力，或者造成大规模的实际破坏和守军极度疲劳，促使要塞早日投降。虽然用平射对防御工事进行正规攻击的方法还继续被采用，但是它与重榴弹炮用爆炸弹进行曲射相比，已成为次要的方法了。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非正规的炮击就够了，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必须采取正规炮击，而这两者都肯定能达到目的，所以目前人们认为围攻理论中的一个原则是：用曲射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员和物资，借此使留在要塞里成为危险的事，正像用平射和跳弹射击毁坏外围工事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对人口众多的中等要塞进行炮击效果最大，因为炮

击造成的道义上的影响是迫使司令部投降的手段之一。对大要塞进行炮击需要大量的弹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¹⁵⁸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消耗了空前的炮弹。就是这次战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正规炮击的最鲜明的例子：英法臼炮艇攻击斯维阿波尔格要塞¹⁵⁹时，曾发射了 5 000 多枚爆炸弹和同样多的实心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两桅小炮艇

两桅小炮艇——这个术语现在通常是指较老式的白炮艇 (galioles à bombes)。这种白炮艇建造得十分牢固，能够经受住白炮后坐所产生的震动，艇身長 60—70 英尺，载重 100—150 吨，吃水 8—9 英尺，通常有两个桅杆。艇上装有两门白炮和若干门火炮。当然，这种舰艇的航海性能是很差的。它们由一般辅助舰（通常是两桅横帆船）随伴；在战斗开始前，炮手和大部分弹药都在辅助舰上。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艇

炮艇，即白炮艇——这个术语是指一种较现代化的、用白炮装备的军舰。俄国战争^①以前，不列颠舰队的这种军舰吃水 8—9 英尺，舰上除 2 门 10 英寸白炮外，还装置 4 门六十八磅炮和 6 门十八磅卡伦炮。对俄战争使得舰队必须在浅水处和弯曲的水道行驶，而军舰的任何正面进攻所无法攻克的强大的俄军岸防要塞又要求使用白炮艇，于是就不能不发明一种新式炮艇。这种新式军舰长约 60 英尺，很宽，舰首呈圆形，舰底像荷兰平底船一样，是平的，吃水 6—7 英尺，以蒸汽发动。它装备 2 门 10 英寸或 13 英寸白炮和几门野炮或卡伦炮，以便用霰弹击退前来进行接舷战的队伍；舰上没有重炮。它从 4 000 码的距离上射击斯维阿波尔格要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弗·恩格斯 防弹工事

防弹工事——十分坚固足以抵御命中的爆炸弹的冲击的某种结构的顶盖。在现有直径极大的爆炸弹的情况下,要使大多数防弹建筑完全不受曲射火力的危害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也是不适宜的。拱心石所在处厚度为 $3\frac{1}{2}$ 英尺的圆拱顶能经得住大多数的爆炸弹,甚至一枚 13 英寸炮弹也穿不透它,但是第二枚多半可以穿透。因此,只有火药库、实验室等才有绝对防弹的工事,在这些地方一枚爆炸弹即可造成大爆炸。上面复有 3—4 英尺厚的泥土的坚固拱顶最为安全。一般穹窿的拱顶不必这样坚固,因为爆炸弹两次命中同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临时性防弹工事是用一根根并放在一起的坚固木梁做顶盖,放上束柴,铺满垃圾,最后再铺上一层泥土。由于采用穹窿式炮台和穹窿式堡垒,以及穹窿式防御营房(通常沿着垒墙的内斜面和离垒墙不远的地方构筑),要塞里的防弹工事就大大增多;在目前对要塞采用正规围攻与昼夜不停的猛烈炮击相结合的方法的条件下,守军如果没有可靠的掩体供换下来的部队休息和恢复体力,要经受住这种围攻的确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在修建现代化要塞时,这种工事必定会愈来愈多。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断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军 用 桥¹⁶⁰

军队渡过大河和狭窄海峡用的临时桥的架设技术，古代的人们早已掌握了，他们这种建筑的规模之大有时是令人惊讶的。大流士曾经渡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薛西斯曾经用舟桥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希罗多德的著作¹⁶¹里有这种桥的记载。薛西斯的军队曾架设两座横跨达达尼尔海峡的桥。第一座桥是用 360 只船筑成的，这些船被船首锚和船尾锚固定，舷接舷地并列在一起，龙骨顺着水流；它们靠牢固的缆连接起来，上面铺上木板，两侧用横木连接，并盖上一层土。第二座桥是用 314 只船筑成的，建造的方法同上。据阿利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军队有轻便船只组成的常备舟桥纵列。¹⁶²罗马人有一种用兽皮包裹的荆条船，用来支撑桥的木板面；帝国崩溃以前，这种船一直是军队辎重的一部分。不过，如果需要渡过湍急的河流的话，罗马人也会建造更为牢固的军用桥；凯撒渡莱茵河¹⁶³时用的著名的木桩桥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中世纪军队有专用的渡水桥梁器材的资料，但是，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作战军队曾携带在德国的大河上架桥的器材。当时所用的船很重，多半用柞木制成。桥板面由竖在这种船的船底的叉形架支撑住。荷兰人首先使用比较轻型的平底船，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和船尾是尖的，两端以一定的角度高

出水面。这种船用包着白铁皮的木骨架制成，称为浮桥船。根据福拉尔的说法¹⁶⁴，法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浮桥船的发明者，不过壳板是铜的，同时他指出，法国人在 1672 年前后就有了完备的舟桥纵列。到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军队都有了浮桥船，它们通常是由白铁皮或铜皮，皮革或浸油帆布包裹的木骨架。俄国人使用的是浸油帆布。船不大，为了使桥在一定程度上内保持在水面上，必须使船互相靠近，使它们的间隔不超过 4—5 英尺；这就严重地阻碍水的流通，使桥的安全受到威胁，并且使敌人有可能放可浮物来破坏桥。

目前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军队所使用的浮桥船较大，但基本上和一百年前使用的相似。从 1829 年起，法国人使用平底船，这种船的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很尖，而船尾尖度稍差；船的两端高于船缘，像舢板船那样翘起。船的大小如下：长 31 英尺，上宽 5 英尺 7 英寸，底宽 4 英尺 4 英寸。骨架是柞木的，上面包有一层云杉板。每只浮桥船重 1658 磅，浮力（船吃水到船缘上端时的负荷力）为 18675 磅。架桥时，船缘与船缘的间隔为 14 英尺。桥面宽 11 英尺。军队的先头部队在渡不大的河流时使用较小的浮桥船。奥地利浮桥船与较大的法国浮桥船相似，但是为了便于搬运，这种船被从中间横断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在水上连成一体。两只船舷接舷地并列，用短方木连接，并且用纵梁支撑桥板面的横梁，构成浮托桥墩。这种浮桥船是比拉戈发明的，1825 年首次被采用。俄国人的浮桥船是木骨架的，这种骨架的中间横梁或支柱可以拆卸；骨架上绷着浸油帆布或上胶的帆布。每只浮桥船长 21 英尺 9 英寸，宽 4 英尺 11 英寸，高 2 英尺 4 英寸，重 718 磅。桥面宽 10 英尺。两船的间隔为 8 英尺。俄国人还有一种浮桥船，它也是木骨

架，但是用皮革包裹。有人肯定地说，普鲁士人最先用横隔板把浮桥船隔成若干部分，使船不致因一处漏水而沉没。普鲁士人的浮桥船是木制的平底船。架桥时，他们根据情况在浮桥船之间留下 8—16 英尺宽的跨度或间隔。荷兰人（从 1832 年起）和皮蒙特人的舟桥纵列与奥地利军队的相似。比利时的浮桥船船头是尖的，但船尾并不尖。大陆各国军队的舟桥纵列都配备有载锚的小船。

英美军队的舟桥纵列完全不用船，而是用轻质材料制成的密封的空心圆筒支撑桥梁。1836 年英国采用两端为圆锥形的、半球形的或抛物线形的浮筒代替其他各种类型的浮桥船，这种浮筒是布朗沙德上校于 1828 年设计的。英国的大浮筒长 $24\frac{1}{2}$ 英尺，直径为 2 英尺 8 英寸。它是这样制成的：在一连串以空心的白铁管作轮幅的白铁轮子上包白铁皮；一个较大的直径为 $1\frac{3}{4}$ 英寸的白铁管作为它们共同的轴，通过整个浮筒。

美国曾试验用橡皮浮筒。1836 年累恩上尉（后为上校）用这种浮筒在亚拉巴马的一条深而湍急的河流上架起了桥，1839 年阿姆斯特朗先生设计了一种与此相似的浮筒，每个充气的浮筒长 18 英尺，直径为 18 英寸，重 39 磅；三个浮筒构成一个桥节。1846 年美国军队在与墨西哥作战¹⁶⁵中使用了充气的橡皮浮筒。这种浮筒由于轻，折叠后所占的地方不大，所以极便于搬运，但是经过砂砾等等的磨擦便会损坏和不能使用。它还具有各种浮筒都有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浮筒沉到水中一半时，在增加等量载重的情况下，它们吃水深度愈来愈大，而人们需要的却相反；其次，浮筒两端容易阻留各种可浮物；最后，为了使它们在水中移动，必须预先用桥板把它们一对对地连结起来，构成筏，而浮桥船却能像普通船一样单独在水上移动，而且可以用桨迅速地载运部队过

河。下面的材料就足以比较出浮筒和浮桥船的浮力：法国浮桥船可支撑大约 20 英尺长的桥，浮力（桥梁上部结构除外）为 150 多英担^①；英国的两浮筒筏大致也可支撑同样长度的桥，但浮力（上部结构除外）只不过 77 英担，而可载量则只有其浮力的一半。

除了浮桥船外，舟桥纵列还包括桨、篙、锚、缆以及浮桥船在水上移动和在一处固定所必需的其他用具，也包括铺桥面用的木梁和壳板（木板）。浮桥船通常是首先在现场一个个地摆好，然后用木梁和木板连接起来；而浮筒则是一对地连接在一起，构成筏，然后在离桥的一端的适当距离上下碇，并且用木梁和木板与桥的一端连接起来。如果情况允许，可在预定的筑桥地点的上方的隐蔽地带，将三、四个或五个浮筒用桥板连成一整个桥节，然后将桥节一个个地浮运到预定的筑桥地点。在某些场合，加上有经验丰富的架桥兵，整个桥就可以在河的一岸筑好，渡河时借水流的力量推送过去。在瓦格拉姆会战前夕，拿破仑军队渡多瑙河时用的桥就是这样架设的。整个这次战局从在敌人的视野内用军用桥横渡大河这一点来看，是极有教益的。

但是舟桥纵列并不总是现成的，所以军事工程师必须在必要时没有舟桥纵列也能够河上架桥。为此有各种筑桥材料和筑桥方法。一般在通航的河道上航行的大船，都可用来做舟桥。如果找不到船，而河的深度或河底的形状要求建造浮托桥墩，则可利用木筏、浮桶以及其他可浮物架桥。如果河小，河底坚固而又相当平坦，则可建造固定的木桩桥墩或支架桥墩。木桩桥墩可以保证建造最牢固可靠的桥，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劳力；而建筑支架

^① 1 英担等于 112 磅或 50.8 公斤。——编者注

桥墩迅速而又容易。有时，可把装满束柴等物的大车沉入河的较深处作为铺桥的桥墩。跨越水淹地和沼泽地等的桥可用堡篮建造。如果只是步兵要通过狭窄的河流或山谷，则可以采用各种吊桥；吊桥一般用牢固的粗绳索悬吊。

目前，在敌人的有效火力控制下是很少建造军用桥的，虽然必须时刻预见到击退敌人的可能性。所以，桥通常在河流的凹进地段修筑，这样左右两边的火炮就可以射击到对岸的桥头附近，借以掩护架桥。此外，凹进地段的河岸一般高于对岸，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兼有交叉火力的优点和制高位置的优点。步兵可乘船或浮桥船划到对岸，并在桥头占领阵地。有时建造门桥以渡运少量的骑兵和一些轻火炮。把河分成几条支流的岛屿或任何小河汇流点以下的地方，也有许多优点。在后一种情况下或有时在前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在河流的隐蔽地带把各个桥节造好，顺流浮运。进攻的一方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河流上选择许多合适的地点，他们容易以佯攻迷惑敌人，然后在某个遥远的地点真正渡河；而对防御者来说，在很长一段河流上分散自己的兵力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目前多半是在离河较远的地方集中兵力，一当查明真正的渡河地点并且早在敌军全部渡河之前，将全部兵力投向真正的渡河地点。法国革命以来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大河上筑桥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其原因就在这里。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14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40年
“军事历史杂志”第11期

卡·马克思 贝尔纳多特¹⁶⁶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法兰西帝国元帅，蓬特科尔沃的公爵，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为查理十四·约翰；1764年1月26日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1844年3月8日死于斯德哥尔摩的王宫。他是律师的儿子，受过这个职业的必要训练，但是由于他喜爱军事，他于1780年秘密参加皇家海军陆战队，到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在那里获得士官的军衔。从这时起，他提升很快。1792年他在居斯丁的军团里已当了上校，1793年指挥半旅，同年由于克累贝的保举，升为准将，并担任松布尔—麦士军团的师长，他在克累贝和茹尔丹的指挥下，促进了1794年6月26日弗略留斯会战的胜利、在幽里希的胜利和马斯特里赫特的投降¹⁶⁷。他还在1795—1796年反对奥地利的克累尔费将军、克赖将军和卡尔大公的战争中立了大功。1797年初，他奉督政府的命令，率领2万人增援意大利军团；在意大利他第一次同波拿巴会面，而这次会面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关系。波拿巴虽然心胸开阔，但他对莱茵军团及其将领却抱有狭隘的嫉妒和猜疑态度。他马上了解到，贝尔纳多特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而贝尔纳多特又是个地道的加斯科尼人，他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了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和。

在入侵伊斯兰利亚¹⁶⁸期间，贝尔纳多特在指挥先头部队渡过塔腊门托河以及在1797年3月19日攻克格腊迪斯卡要塞时立下了战功。

在所谓果月十八日革命¹⁶⁹以后，波拿巴命令他的将领们向所属各师收集支持这次 coup d'état (政变) 的贺信；但是贝尔纳多特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接着又示威式地表示自己绝对不愿执行这一命令，最后给督政府送了贺信，但其内容同所要求的完全相反，而且没有通过波拿巴就送发了。波拿巴在去巴黎向督政府递交康波福米奥条约的途中，曾到乌迪讷大本营中去拜访贝尔纳多特，对他大加吹捧，但第二天却从米兰下令，把莱茵军团中他的一师兵力缩减一半，而命令另一半人调回法国。在分歧和新的纠纷经过长期的劝解和调停之后，贝尔纳多特终于被说服接受了驻维也纳大使的职务。在这里，他按照达来朗的指示行事，采取了和解的立场，但巴黎报纸在波拿巴及其一伙人的教唆下宣称这种立场充满保皇主义倾向，为了证明这一指责，还广泛地散布了流言，说贝尔纳多特取下了挂在他邸宅门口的三色旗和下属帽子上的共和国帽徽。贝尔纳多特因此遭到督政府的谴责以后，于1798年4月13日，即在维也纳反雅各宾示威游行周年纪念那一天，升起了写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结果他的邸宅遭到维也纳人群的袭击，旗子被烧毁了，而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由于奥地利政府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贝尔纳多特偕同使馆全体人员离开维也纳去拉施塔特；然而督政府却遵照亲自插手搞这一丑事的波拿巴的意见，压下这件事，从而使自己的代表得不到支持。

1798年8月，贝尔纳多特同马赛商人的女儿，即约瑟夫·波拿巴的姨子德吉烈·克拉里小姐结婚，从此他同波拿巴家族有了

亲戚关系；但这看来只加深了他对拿破仑的敌意。1799年，他担任上莱茵监视军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这样一来就预先证明了拿破仑的意见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说过，贝尔纳多特只能当部下，而不适合担任总司令。在督政府牧月三十日 *emeute*（政变）¹⁷⁰以后，他主管陆军部，他的本事主要不表现在作战计划上，而表现在勾结雅各宾派的阴谋活动上，他依靠雅各宾派重新抬头的势力，企图在军队中给自己收罗追随者。结果在1799年9月13日那天早晨，他在“通报”读到自己辞职的消息，而他根本没有呈请辞职这回事。这是督政府中与波拿巴有关系的成员西哀士和罗日·杜科同他开的玩笑。

贝尔纳多特在担任西方军团司令时，镇压了万第暴动的最后几个策源地。在宣布帝国以后，帝国授与他元帅称号，并委任他指挥汉诺威军团。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以及后来担任北德意志军团司令时期，竭力在北部的人民中树立个人声望，标榜自己是独立的、温和的和擅长行政管理的人。他率领驻汉诺威的一个军，即大军的第一军，参加了1805年对奥地利人和对俄国人的战争。他被拿破仑派到伊赫劳去监视斐迪南大公在波希米亚的移动；后来被调回布隆，在奥斯特利茨会战期间，他的军部署在苏尔特和朗恩之间的中央，协助粉碎了同盟国军右翼从翼侧迂回法军的企图。1806年6月5日，他获得蓬特科尔沃公爵的封号。在1806—1807年对普鲁士战争期间，他指挥第一 *corps d'armée*（军）。他得到拿破仑的命令，要他从瑙堡开往多恩堡，而当时也在瑙堡附近的达武，则应向阿波耳达前进；在达武接到的命令中附有这样的话：如果贝尔纳多特已经同他会合，那末他们可以一同开往阿波耳达。达武侦察到普军移动的方向，确信在去多恩堡

的途中决不可能遇到敌军，因而建议贝尔纳多特共同向阿波耳达进军，甚至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但是贝尔纳多特固执地坚持从字面上解释拿破仑的命令，仍向多恩堡前进，整天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然而达武却不得不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¹⁷¹中单独承受敌人的主攻，这次会战由于贝尔纳多特没有参加，最后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亏从奥埃尔施太特附近和从耶拿附近来的两股溃军的冲突，以及拿破仑在战略上的计谋，才防止了贝尔纳多特明知故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拿破仑本来已经签署了把贝尔纳多特提交军事法庭的命令，但是作了进一步考虑以后又撤销了这项命令。耶拿会战以后，贝尔纳多特会同苏尔特和缪拉特于10月17日在哈雷击溃了普军，把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将军追逐到卢卑克，促使他于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投降。1807年1月25日在离托恩不远的莫龙根平原他还击溃了俄军。

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根据拿破仑同丹麦签订的同盟条约的条款规定，法国军队应当占据丹麦的岛屿，以便从那里进攻瑞典。¹⁷²因此，1808年3月23日，也就是俄国入侵芬兰的同一天，贝尔纳多特奉命向西兰岛推进，以便会同丹麦军队攻入瑞典，推翻国王^①，并把这个国家瓜分给丹麦和俄国——这对于被指定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斯德哥尔摩的人来说是个奇怪的使命。他率领32000人的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军队渡过贝耳特，抵达西兰岛；但是1万名西班牙军队在罗曼纳将军指挥下依靠英国舰队的帮助脱离了贝尔纳多特的军队。贝尔纳多特在他留驻西兰岛期间毫无作为，也毫无收获。此后他被调到德国，参加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新的

①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编者注

战争，他奉命指挥主要由萨克森人组成的第九军。

1809年7月5日和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又引起他同拿破仑之间的不和。会战的第一天，欧仁·博阿尔奈退出紧靠瓦格拉姆的隘口，插入敌军后备军的中央，但没有得到贝尔纳多特应有的支援，因为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参加战斗太晚而且太不主动。遭到正面和翼侧攻击的欧仁被有力地击退到拿破仑的近卫军那里；因此法军进攻的第一次猛攻由于贝尔纳多特行动缓慢而遭到挫折，当时贝尔纳多特占据了阿德勒克拉村，该村在法军阵地的中央，但在法军的正面稍前一些。第二天早晨6点钟，奥军集中兵力发动进攻，贝尔纳多特没有设防固守这个村庄，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面上，他却在阿德勒克拉前面展开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奥军的迫近使他所选定的阵地非常危险，所以放弃阿德勒克拉，退到它后面的台地，于是阿德勒克拉立即被贝尔加尔德的奥军占领。这样一来，法军中央处于危急状态，它的司令官马森纳派出一个师到前面去，以便重新占领阿德勒克拉，但是这个师又被达斯普雷的掷弹兵从该地打出来。正在这个时候，拿破仑亲自来了，他负责总指挥，制定了新的会战计划，破坏了奥军的机动。可见，贝尔纳多特又像在奥埃尔施太特那样，使会战的胜利又一次受到威胁。而他则不满意拿破仑违反一切作战规则，命令杜帕将军（杜帕将军的法国师是属贝尔纳多特军指挥的）采取行动，而不考虑他的命令。当拿破仑发现贝尔纳多特对萨克森人发布的命令在内容上同皇帝的通告不一致之后，就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呈。

贝尔纳多特回到巴黎后，开始同富歇搞阴谋活动，不久，伐耳赫伦岛的远征¹⁷³（1809年7月30日）迫使法国内阁在皇帝不在的时候委派他去防守安特卫普。英军的大错误使他所采取的任何

行动都成为多余的了；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告自己的官兵书里，字里行间指责拿破仑忽视采取应有措施来防守比利时沿岸地区。他被免职了；回到巴黎以后接到命令，要他离开首都，回到自己的蓬特科尔沃领地去，他拒绝服从这个命令，因而被召到维也纳。他同拿破仑在雪恩布龙¹⁷⁴经过几次激烈和尖锐的谈话以后，接受了罗马区总督的职务——这是一种光荣的流放。

他当选为瑞典王储的原因，甚至在他死后很长时期都没有完全弄清楚。查理十三在收查理-奥古斯特（奥古斯滕堡公爵）为义子并承认他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以后，派了弗雷德伯爵去巴黎，为公爵向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儿夏绿蒂郡主求婚。1810年5月18日，奥古斯滕堡公爵突然死亡，俄国坚决主张查理十三收奥登堡公爵为义子；而拿破仑则支持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的要求。年老的国王本人主张宣布死者奥古斯滕堡的兄弟为继承人，他派了默尔纳男爵带了指令去见弗雷德将军，要求弗雷德去事先取得拿破仑对国王提出的人选的同意。但默尔纳这个年轻人属于瑞典极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当时以为只有紧密联合法国才能复兴自己的国家。默尔纳到了巴黎，同年轻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拉比、瑞典总领事辛纽尔和弗雷德伯爵本人磋商以后，提议贝尔纳多特为瑞典的王位候选人，他们竭力不让在土伊勒里宫的瑞典大使拉格尔比埃尔克伯爵知道自己的步骤；而且他们抱有一系列被贝尔纳多特所巧妙支持的错误看法，他们坚信贝尔纳多特事实上是拿破仑心目中的候选人。因此，弗雷德和辛纽尔于6月29日在给瑞典外交大臣的急电中报告说，如果王位继承人的高位能给拿破仑的亲戚和助手，拿破仑将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查理十三表示反对，但是厄勒布鲁的全国议会于1810年8月21日选举了贝尔纳多特为瑞

典的王储。国王也就被迫把他收为义子，起名查理-约翰。拿破仑很不乐意和很不高兴地命令贝尔纳多特去接受给予他的高位。贝尔纳多特于1810年9月28日离开巴黎，10月21日抵赫尔辛堡，在这里宣布脱离天主教，11月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1月5日出席等级会议，并从这时起他掌握了政权。自从签订倒霉的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¹⁷⁵以来，瑞典普遍主张重新占有芬兰，一般都认为，没有芬兰，就像拿破仑在1811年2月28日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说的，“瑞典就不能生存”，至少是不能作为一个摆脱俄国控制的国家。瑞典只有紧密联合拿破仑才能指望收回这个地区。正因为人们坚信这一点，贝尔纳多特才得以当选。在国王患病期间（1811年3月17日至1812年1月7日），查理-约翰被任命为摄政王；但这个任命只是仪式问题，因为他从到达瑞典那天起就已经领导一切事务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他是不会去照顾自己老部下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强迫贝尔纳多特——违背以前的协定——于1810年11月17日参加大陆体系和对英宣战。他还取消了贝尔纳多特作为法国公爵所应得的收入，并借口贝尔纳多特是“和他不相等的国王”，而不接受贝尔纳多特直接给他的信件，并退回查理-约翰赠送给新生的罗马国王^①的六翅天使勋章。这些无谓的刺伤不过使贝尔纳多特有理由根据早就作出的决定来行动。他刚迁入斯德哥尔摩，就公开接见俄国苏赫帖连将军（这位将军因收买斯维阿波尔格的要塞司令而被瑞典人所痛恨），甚至同意派这个人为驻瑞典王宫的大使。1810年12月18日他同车尔尼晓夫会谈，

① 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第一之子。——编者注

在会谈中他表示“热烈希望得到沙皇的高见”，并同意永远放弃芬兰，条件是挪威要脱离丹麦而并入瑞典。他通过车尔尼晓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一封极为谄媚的信。当他因此同俄国的关系密切起来的时候，那些推翻古斯塔夫四世和促成贝尔纳多特当选的瑞典将领们不再支持他了。1812年1月27日法国师侵入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这是拿破仑根据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秘密建议而采取的措施），终于使查理-约翰有了正式宣布瑞典中立的名正言顺的借口，这时候，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得到响应的瑞典将领们的反对立场，已经对他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了。然而他背着议会同亚历山大于1812年3月27日在圣彼得堡秘密签订了反对法国的进攻同盟条约，条约还规定挪威并入瑞典。

拿破仑的对俄宣战，使贝尔纳多特一时成为主宰欧洲命运的人物。拿破仑向他提议，只要他派4万名瑞典军队进攻俄国，就答应给他芬兰、梅克伦堡、施特廷以及在施特廷和沃耳加斯特之间全部地区。贝尔纳多特本来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并在拿破仑进入莫斯科以前占领圣彼得堡。他却宁愿在英国、俄国同他一起组成的三执政中扮演雷必达的角色。他怂恿苏丹批准布加勒斯特和约¹⁷⁶，从而使俄国契查哥夫海军上将得以从多瑙河沿岸撤走自己的军队，并在法军的翼侧采取行动。他还是1812年7月18日在厄勒布鲁签订的以英国为一方和以俄国、瑞典为另一方的和约¹⁷⁷的中间人。亚历山大被拿破仑最初的胜利吓破了胆，他邀请查理-约翰会晤，同时建议他担任俄军总司令的职务。查理-约翰很机智地拒绝了后一建议而接受了会晤的邀请。他于8月27日到达亚波，在该地会见了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灰心丧气，竭力想求和。而查理-约翰本人却完全不同，毫无退让之意，他激发了动摇

的沙皇的勇气，向沙皇指出，拿破仑表面的胜利必将导致他的灭亡。会晤的结果签订了所谓亚波条约¹⁷⁸，条约中附有秘密条款，从而使同盟具有家庭协议的性质。实际上，查理-约翰除了得到诺言以外一无所得，而俄国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获得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同瑞典的同盟。不久以后，根据正本的文件证明，芬兰归还给瑞典的问题当时完全取决于贝尔纳多特；但是这个统治者——加斯科尼人——却被亚历山大的谄媚的诺言迷惑，亚历山大说：“总有一天，从拿破仑头上掉下的法国皇冠会落在他的头上”，因此，他把瑞典也仅仅看成是 *pis aller*（不得已而占有的地方）。

法军撤出莫斯科以后，他同法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而当英国在 1813 年 3 月 3 日的条约¹⁷⁹中保证他得到挪威的时候，他加入了反法同盟。他在英国的资助下，于 1813 年 5 月率领约 25000 名瑞典军队在施特腊耳宗德登陆，并开始向易北河推进。在 1813 年 6 月 4 日实现的休战¹⁸⁰期间，他在特拉亨贝尔格的会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里，亚历山大把他介绍给了普鲁士国王^①，并通过了总的作战计划。他在担任北方军团（由瑞典、俄国、普鲁士、英国、汉撒和北德意志等部队组成）总司令的时候，通过一个以朋友身分经常到他的大本营拜访的人，同法军保持了非常暧昧的联系；他保持这种联系是根据这样的设想：只要他向法国人证明自己的宽容和仁慈，那末他们就会心甘情愿舍弃拿破仑而换贝尔纳多特来统治。因此他阻挠部下将领转入进攻，而当毕洛夫不顾他的命令，在大贝伦和登内维茨两次战胜法军的时候，他还制止追击溃军。当布吕歇尔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而向易北河进军，并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他会合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的军团中的英国全权代表查理·斯图亚特爵士以停止供应相威胁，他才不得不向前推进。然而瑞典军队在莱比锡战场出现，不过是装装样子，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伤亡还不到 200 人。当同盟国军进入法国的时候，贝尔纳多特让瑞典军队在法国边境按兵不动。拿破仑退位以后，他亲自前往巴黎，以便向亚历山大提醒他在亚波所许下的诺言。达来朗向同盟国国君会议声明说，“只能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其他一切都是阴谋”，这就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幼稚的希望。

在莱比锡会战以后，查理-约翰率领了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军队侵入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面临敌军的优势兵力，被迫于 1814 年 1 月 14 日签订基尔和约，和约规定，挪威割给瑞典。但是挪威人不愿任人如此无礼地摆布，于是在丹麦王储克里斯提安-弗雷德里克领导下宣布挪威独立。国民代表于 1814 年 5 月 17 日在埃德斯沃尔集会，通过了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现代欧洲最民主的宪法。查理-约翰调动瑞典陆海军，占领了控制通向克利斯提阿纳的要冲的弗雷德里克施塔德要塞，然后同挪威人进行谈判，同意把挪威当作独立国家看待，并承认埃德斯沃尔宪法；他在 10 月 7 日得到这个议会的同意以后，于 1814 年 11 月 10 日前往克利斯提阿纳，以他自己的名义和国王的名义向宪法宣誓。

1818 年 2 月 5 日，查理十三逝世，称为查理十四·约翰的贝尔纳多特就被欧洲承认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这时他企图修改挪威宪法，恢复已被废除的贵族阶层，掌握绝对的否决权以及撤换一切文武官员的权力。这种企图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了 1828 年 5 月 18 日骑兵袭击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的克利斯提阿纳

居民的事件。大暴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 1830 年的法国革命迫使国王暂时采取和解的步骤。为了得到挪威，他曾经不惜一切牺牲，而挪威在他整个统治期间始终是造成困难的经常根源。从 1830 年法国革命的最初日子起，欧洲只有一个人认为瑞典国王是法国王位的合适追求者，这个人就是贝尔纳多特自己。他不止一次地向斯德哥尔摩的法国外交代表说：“怎么拉菲特没有想到我呢？”欧洲形势的改变，首先是波兰的起义，一度促使他产生建立反俄同盟的想法。他根据这种想法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建议，但遭到坚决的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于 1834 年 6 月 23 日同尼古拉皇帝签订同盟公约（这个公约使他成为俄国的陪臣），以此为自己有过短时间的闹独立的思想赎罪。从这时起，他在瑞典的政策具有如下特点：蓄意侵犯出版自由，迫害犯 *lèse majesté*（侮辱国王）罪的人，反对进步措施，甚至连那些要使工业摆脱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陈规束缚的措施也在反对之列。他利用参加瑞典议会的各阶层的角逐，长期有效地破坏了各种运动；但是议会于 1844 年通过的自由主义决议（根据宪法，议会在 1845 年应使这些决议成为法律），使他的政策有彻底破产的危险；但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死了。

如果说，在查理十四统治期间，瑞典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挫折中有些恢复的话，那末这决不能归功于贝尔纳多特，而要完全归功于人民本身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
10 月 15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班牙舰队¹⁸¹

西班牙舰队——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为征服英国而派出的一支庞大的海军，其目的是

“为天主效劳，使许多受异教徒——我们神圣天主教的敌人压迫的饱受痛苦的人们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里来，异教徒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教派，使他们受尽折磨”（“西班牙远征英国的真实记述”¹⁸²公元1588年版）。

几乎在与舰队出发的同时，根据菲利浦的命令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1588年我国元首唐·菲利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集结的最幸运的舰队。彼得罗·帕斯·萨拉斯著”¹⁸³；在这本书里，对这支海军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柏里勋爵弄到了这一本书，因此英国政府预先知道了远征的一切详情细节。（这本书包括了一直到1588年3月的资料，目前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里。）该书指出，舰队拥有65艘大帆船和大军舰、25艘大运输船（每艘排水量为300至700吨）、19艘辅助船（排水量为70—100吨）、13艘小型巡航舰、4艘小帆船和4艘桡船——总共130艘舰船，总吨位为75868吨。舰船装置了2431门火炮，其中有1497门青铜炮——大部分是最大型的加农炮（四十八磅的）、长炮（三十磅的和二十磅的长管炮）等；弹药有123790发球形实心弹和5175英担^①火药，每门火炮配备约50发炮弹，装药平均为4 $\frac{1}{2}$ 磅。全部舰员共有8052名水兵；此

^① 1英担等于112磅或50.8公斤。——编者注

外，舰上还载有 19 295 名兵士、180 名神甫和修道士。舰上还有上岸后牵引野炮用的骡子和炮车。根据上述资料，这次远征备有 6 个月的粮食。这支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舰队应开往佛来米海岸，以便掩护帕尔马公爵指挥的 3 万步兵和 4 000 骑兵组成的另外一支军队登上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平底船（这些平底船的船员由波罗的海的水手补充）。在这以后，全部舰船就向英国前进。

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舰队，最初有 30 艘军舰，将近 180 艘船；舰船的大小不一，一般地说，规模不及西班牙军舰。但是在英国舰船上有 17 500 名水兵，因此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西班牙舰队。英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支军队：一支为 18 500 人，由莱斯特伯爵指挥，任务是直接抵抗敌人，另一支为 45 000 人，担任女王的私人警卫。此外，根据英国博物馆保存的题为“为对付西班牙舰队而召集的英国兵力的详细记述”的手稿¹⁸⁴（手稿部，书目 18，第 21 章）来看，还可从尼德兰得到 2 000 名步兵的增援。

西班牙舰队原定 5 月初从里斯本出发，但因舰队司令桑塔·克鲁斯和副司令去世便延期了。继任舰队司令的是麦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对海军业务完全外行；但是副司令马丁涅斯·德·雷卡尔德是有经验的海军宿将。1588 年 5 月 29 日，舰队在从里斯本到科鲁尼亚装运弹药的航途中被大风暴打散了，虽然所有的军舰（除了 4 艘以外）都在科鲁尼亚集合了，但它们被烈风严重损坏，需要修理。由于西班牙舰队已经完全不能使用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舰也不出动；但是舰队司令霍华德勋爵违抗这一命令，乘船前往科鲁尼亚，弄明白了真实情况回来以后继续作战争准备。此后不久，他便得到了在海面上出现西班牙舰队的消息，他即下令起锚，在拉芒什海峡尾随西班牙舰队前进，沿途一有

好机会就对西班牙舰船进行骚扰。当时西班牙人向弗兰德海岸前进，舰船相互之间尽可能靠紧。在这时发生的各种小战斗中，英国人因为自己的军舰比较灵活，人数比较多，舰员对业务比较熟悉，所以经常战胜不灵活的舰员配备不足的（尽管船上挤满了陆军兵士）西班牙大帆船。此外，西班牙炮兵没有好炮手，往往瞄准得太高。西班牙舰队在加来附近抛锚，等待帕尔马公爵的舰船离开佛来米港湾；但是不久得到消息说，帕尔马的不适于战斗的舰船，在西班牙舰队渡过海峡并赶走进行封锁的英荷分舰队以前不能离开该处。因此西班牙舰队就重新起锚，但是在敦克尔克附近碰上了无风天气，被迫停在英国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霍华德勋爵准备了纵火船，于8月7日夜间起风的时候，向敌舰放出了8艘纵火船。纵火船在西班牙舰队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有些军舰起了锚，另一些军舰砍断了绳缆，听任风势摆布；整个舰队乱成一团，有些军舰自相碰撞而损毁了。到第二天早晨，秩序还没有恢复，而西班牙舰队的各个区舰队分散任辽阔的海洋上。当时霍华德勋爵得到了那些由有爵位的贵族和无爵位的贵族担任舰员的军舰和由拜伦勋爵指挥的进行封锁的分舰队的支援，并在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巧妙协助下，于拂晓4时开始同敌人作战。这次战斗，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猎捕（因为英国人在一切攻击地点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一直进行到天黑。西班牙人作战勇敢，但是他们的笨重的军舰不适宜在狭窄的海峡里航行和进行机动的战斗。西班牙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损失惨重。

这样一来，同帕尔马公爵的运输船的会合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单靠舰队的兵力在英国海岸登陆，就更谈不上了。当时舰上储存的粮食已大部分用完，而通向西班牙弗兰德的道路这时已被截断，除

了回西班牙去补充食物以外,就别无出路。(见“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舰队在爱尔兰海岸附近遭到的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1588年伦敦版。¹⁸⁵艾曼努埃尔·弗雷莫萨的供词。此人曾在雷卡尔德海军上将的排水量为1100吨的旗舰——“圣璜号”上服务过。)因为拉芒什海峡的通道也遭到英国舰队封锁,所以只剩下一条出路即绕道苏格兰回国。被派去追逐的西摩尔勋爵的舰队对西班牙舰队仅仅骚扰了一下,因为他们弹药不足,不敢进攻。然而在西班牙人绕过奥克尼群岛以后,海上起了大风暴,打散了整个舰队。有些军舰被风暴刮回到挪威海岸触了礁。另一些在北海沉没,或者在苏格兰海岸附近和赫布里底群岛一带触礁而毁坏。在这以后不久,西班牙人在爱尔兰西部海岸又一次遭到风暴的袭击,在那里沉没了30多艘军舰。那些好容易才游到岸边的舰员也大部分被打死;约有200人根据爱尔兰总督^①的命令被处死。整个舰队剩下不过60艘破烂不堪的舰船,而且船员受尽了饥饿折磨;它们大约在9月中旬到达桑坦德,这时西班牙才最后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7月底和10月23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① 菲茨威廉。——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艾阿库裘¹⁸⁶

艾阿库裘——秘鲁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131 921人。在它的主要城市（也叫艾阿库裘）附近曾发生过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胡宁会战（1824年8月6日）¹⁸⁷以后，西班牙总督拉·塞尔纳将军企图采取各种机动来切断苏克莱将军指挥的起义军队的交通线。总督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他诱使敌军进入艾阿库裘平原，在这里面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一个高地上的防御阵地。他们的兵力有13个步兵营（配有炮兵和骑兵），共9 310人。1824年12月8日双方的先头部队进入战斗。次日，苏克莱率领5 780人发动进攻。科尔多巴将军指挥的哥伦比亚第二师进攻西班牙军队的左翼，一下子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在左翼的拉·马尔将军指挥的秘鲁师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拉腊将军的预备队开到以前无法向前推进。在这以后，敌军全线退却，骑兵就立即进行追击，打散了西班牙骑兵并击溃了步兵。西班牙军队有6名将军被打死；打死打伤和被俘人数达2 600人；总督也被俘掳了。南美洲军队的损失如下：打死1名将军和308名军官和兵士，打伤520人（其中有6名将军）。次日，康太腊克将军（西班牙军队这时已由他指挥）签字投降；根据投降条件，不仅他和他所有的部队都成了战俘，而且在秘鲁的全部西班牙军队和全部岗哨、火炮、仓库以及还在西班牙人

手中的全部秘鲁领土(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基尔卡等地)都交给了起义军。由此成为战俘的军队人数总共几乎达到12 000人。西班牙的统治就这样最终地结束了;1825年8月25日丘基萨卡代表会议宣告了玻利维亚共和国的独立。

在西班牙,人们给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军队中的党羽起了“艾阿库裘派”的绰号。聚集在埃斯帕特罗周围的一部分军人权奸同他一起参加了镇压南美洲起义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仅是战友之谊,而且是他们冒险事业的共同爱好;在这次战争期间,他们彼此保证回到西班牙以后在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他们认真地履行了这个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的保证。人们给他们起“艾阿库裘派”的绰号,暗示这次会战的不利结局实质上是由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党羽促成的。但这种说法不对,尽管它流传很广,甚至现在在西班牙通常也都相信这种说法。埃斯帕特罗不仅没有在艾阿库裘战场出现过,而且当会战进行时他甚至不在美洲,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结束他的西班牙之行——拉·塞尔纳总督派他到西班牙去给斐迪南七世送紧急报告。1824年6月5日,他在基尔卡搭乘英国两桅横帆船“台伯号”,于9月28日到达加迪斯,10月12日抵马德里,并于1824年12月9日,也就是在艾阿库裘近郊发生会战的那一天,从波尔多乘船返美洲。(见唐·霍赛·塞贡多·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四卷集,1844年马德里版;以及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1848年马德里版)¹⁸⁸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9月21日和10月23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吕歇尔¹⁸⁹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普鲁士元帅，1742年12月16日生于梅克伦堡-施韦林的罗斯托克，1819年9月12日于西里西亚的克里布洛维茨逝世。1754年，布吕歇尔还是少年的时候，便被送到吕根岛，在这里他秘密加入了瑞典骠骑兵团，任下级军官，参加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在1758年战争中，布吕歇尔被俘，在被俘整整一年和开除瑞典军籍后，经人说服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71年3月3日，他被任命为骑兵上尉。1778年，当冯·施韦特封疆伯爵的非婚生子冯·耶格匀费耳德上尉而不是他补上了少校的空缺时，布吕歇尔即上书弗里德里希二世：

“陛下：耶格尔费耳德除了是冯·施韦特封疆伯爵之子外，别无任何功勋，竟先我而被提升。请陛下准我退伍。”

为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下令将他关入监狱，但是当他不顾相当长期的监禁，拒绝撤回自己的呈文时，国王便同意满足他的请求，批示如下：“冯·布吕歇尔上尉可以滚蛋。”于是，布吕歇尔远走波兰的西里西亚，不久便结了婚，开始从事农业，并在波美拉尼亚弄到了一个不大的庄园。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后，他重返自己原来的团队，任少校，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他的任期应从

1779年算起。数月后他的妻子去世。布吕歇尔曾参加对荷兰的不流血的入侵¹⁹⁰，并在1788年6月3日晋升为中校，1790年8月20日升为上校和骠骑兵团第一营营长（早在1760年他就加入了该团）。

1794年布吕歇尔在普法尔茨对共和制法国作战时，出色地表现了一个轻骑兵指挥官的才干。1794年5月28日，在基尔魏勒战斗获胜后，他晋升为少将，而在卢森堡、凯则斯劳顿、莫尔施海姆、魏登塔耳、埃德斯海姆、艾登科本等地的战斗，使他的名望越来越高。当他以勇猛的 *coups de main*（坚决的攻击）和成功的奇袭不断地惊扰法军的时候，他从未忘记向大本营报告关于敌人调动的最确切的情报。他在这次战局中所写的日志¹⁹¹，于1796年由他的副官哥尔茨伯爵公布。这本日志虽然在修辞上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部有关前卫勤务问题的名著。巴塞尔和约¹⁹²签订后，他再次结婚。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后把他提升为中将，他在任中将期间占领了爱尔福特、缪尔豪森和闵斯德，并作为总督来管理这些地区。1805年，他被调到一个人数较少的军担任军长，该军集中在拜罗伊特，监视奥斯特利茨会战以后所造成的直接关系到普鲁士的局势，即监视贝尔纳多特军进占安斯巴赫公国。

1806年布吕歇尔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指挥普鲁士军队的前卫。但是他的攻击被达武的猛烈的炮火击退了，而他的关于投入全部骑兵、以生力军再次攻击的建议也被普鲁士国王拒绝了。普军在奥埃尔施太特和耶拿两地战败以后，布吕歇尔顺易北河向下游退却，而拿破仑却势不可当地追击普军的主力，从耶拿不停地追到施特廷。布吕歇尔在退却中收容各军残部，因而使他的军队增加到将近25000人。他在苏尔特、贝尔纳多特和缪拉特的联合

部队的猛攻下向卢卑克的退却，是德国这一屈辱时代中有数的光辉事迹之一。因为卢卑克是中立地区，所以布吕歇尔把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的街巷变成殊死奋战的场所，使该城遭到法国兵三天的洗劫，这件事便成了对他进行激烈的攻击的口实。但是，在当时情况下重要的是给德国人民做出哪怕是一个顽强抵抗的榜样。布吕歇尔被逐出卢卑克后，于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平原被迫投降，但以书面证明他投降的原因是“弹尽粮绝”为条件。他在宣誓后获释，前往汉堡，同儿子们在一起打牌、抽烟、饮酒，消磨时光。在和维克多将军相交换以后，他被任命为波美拉尼亚总督。但是，普鲁士和拿破仑在1812年2月24日缔结的同盟条约秘密条款之一规定，应当像对待夏恩霍斯特和其他杰出的普鲁士爱国人士一样，解除布吕歇尔的职务。国王为缓和这一公开的不愉快的事件，秘密地将西里西亚富饶的孔岑多夫领地赐给了布吕歇尔。

从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到德国解放战争这一过渡时期的年代里，“道德协会”¹⁹³的领导者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力图推举一位人民英雄登上舞台，他们选中了布吕歇尔来充当这个角色。他们成功地在群众中扩大了他的声望，因而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1813年3月17日发表宣言号召普鲁士人拿起武器时，他们已经充分准备了条件来迫使国王任命布吕歇尔为普军总司令。在同盟国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仍然失利的吕特岑和包岑会战中，布吕歇尔曾在维特根施坦指挥下作战。同盟国军队从包岑向施魏德尼茨退却时，他曾和海瑙附近设伏，率领自己的骑兵痛击了梅桑指挥的法军前卫，使梅桑在这次战斗中损失1500人和11门火炮。¹⁹⁴布吕歇尔的这一意外的胜利振奋了普军士气，并使拿破仑在追击

时不得不极为小心。

1813年8月10日特拉亨贝尔格休战协定¹⁹⁵期满后，布吕歇尔开始指挥一个独立的军团。这时，同盟国的君主们将同盟国军队分编为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配置在易北河下游；主力军团，经波希米亚进军；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尔统率，协助他的有他的参谋长格奈泽瑙和副参谋长缪弗林。这两个人一直在布吕歇尔手下担任该职直到1815年缔结和约时为止，他们帮他制订了所有的战略计划。而布吕歇尔本人，据缪弗林说：

“对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得极少，以致将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是极小的作战计划送呈他批准时，他都不能从中得出多少一点明确的概念和判断计划的好坏”¹⁹⁶。

他同拿破仑的许多元帅一样不识地图。西里西亚军团包括三个 corps d' armée (军)：兰热朗伯爵指挥的俄军4万人；冯·萨肯男爵指挥的16 000人，约克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军4万人。布吕歇尔率领这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军团是异常困难的。兰热朗曾经担任过独立的司令官，不愿听从外国将军的指挥；加之他知道布吕歇尔曾接到仅采取守势的密令，但是完全不了解布吕歇尔8月11日在赖辛巴赫同巴克莱-德-托利会晤时得到见机行事的许可。因此，当他觉得总司令违背早先商妥的计划时，他认为自己有权不执行命令，而约克将军也竭力支持他的这种反抗行为。

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但是在这时发生了卡茨巴赫河会战，结果使布吕歇尔在他的军团中获得很高威望，从而保证了他的军队一直打到巴黎的大门口。麦克唐纳元帅遵照拿破仑的旨意应将西里西亚军团逐向西里西亚腹地，他于8月26日开

始了会战，攻击布吕歇尔配置在奈塞河与卡茨巴赫河汇合处普劳兹尼茨与克罗奇之间的前哨。所谓卡茨巴赫河会战实际上是四次不同的战斗，其中第一次战斗是以刺刀冲锋赶跑了奈塞河右岸山岭后面台地上约 8 个营的法军（这几乎还不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而所造成的结果却完全超出了它原来的意义。这是因为丢弃台地逃跑的法军没有在下克赖恩集合，也没有配置在卡茨巴赫河对岸的克罗奇附近而造成的；当时假如这样作的话，他们逃跑就不会对法军的其余部分发生任何影响了。其次，是因为配置在奈塞河左岸的萨肯和兰热朗两军在天黑时曾数度挫败敌人，还因为在奈塞河左岸亲自指挥的麦克唐纳元帅到下午 7 时已难于抵挡兰热朗的攻击，在日落后就立即将自己的军队带到哥耳德贝克，当时他们已经筋疲力竭，不能继续作战，因而必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最后，是因为暴雨季节使得逃跑的法军所必经的一些平时不大的河流——奈塞河、卡茨巴赫河、得伊赫谢耳河及博伯尔河——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巨流，同时使得道路几乎无法通行。结果在西里西亚军团左侧山区活动的地方民军协助下，本身意义不大的卡茨巴赫河会战以生俘法军 18 000—20 000 人、缴获大炮 200 余门和弹药 300 余箱以及救护车和辎重车等而结束。

在会战后，布吕歇尔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他的军队尽全力追击敌人，并正确地向他们指出：“如果多辛苦一些，他们就可能避免一次新的会战。”9月3日，他率领自己的军团强渡奈塞河，4日，通过比硕夫斯韦尔达，以便到包岑集中。他的这一行动挽救了主力军团，后者于8月27日在德勒斯顿城下失败而不得不退到厄尔士山脉以后，现在完全脱离了敌人¹⁹⁷；而拿破仑则不得不率领援兵向包岑前进，以便收集在卡茨巴赫河被击溃的军队，并同西里西

亚军团会战。布吕歇尔在停留易北河右岸萨克森东南部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后退和前进的机动，始终避免同拿破仑会战，但是在同法军个别部队遭遇时则经常进入战斗。9月22、23和24日，他在敌人右侧实行侧敌行军，挺进到易北河下游，靠近北方军团。10月2日，他在易北河上埃耳斯特附近架设浮桥，而在10月3日晨他的军团渡过易北河。这一行动不仅是大胆的，甚至是冒险的，因为布吕歇尔完全不顾交通线的安危。这一行动是由最高的政治意图决定的，并最终导致了莱比锡会战。如果不是布吕歇尔的话，行动迟缓而又过分谨慎的主力军团是永远不敢冒险进行这一会战的。

由贝尔纳多特任总司令的北方军团，共约9万人，因此，使该军团向萨克森进军至关重要。布吕歇尔因为同北方军团内普军军长毕洛夫和俄军军长文秦格罗迭保持密切联系，所以获得了最确凿的证据，证明贝尔纳多特向法国人献媚，并且当他仍然单独在一个独立的战区时，是无法促使他采取稍许积极的行动的。毕洛夫和文秦格罗迭曾表示愿意不按贝尔纳多特的意图行事，但他们为此要求有10万人的军队来支援他们。正因为如此，布吕歇尔才决定侧敌行军，而不顾君主们让他向左，即向波希米亚方向前进，同他们靠拢的指示。贝尔纳多特甚至在西里西亚军团渡过易北河之后还不断地刁难布吕歇尔，但是这些刁难也没有使他放弃这个意图。他在离开包岑之前，曾派遣一名信使去通知贝尔纳多特：既然北方军团兵力过弱，不能在易北河左岸单独作战，他将率领西里西亚军团前来，并将于10月3日在埃耳斯特附近渡河；因此，请贝尔纳多特与他同时渡过易北河，共同向莱比锡进军。由于贝尔纳多特对这一信件置之不理，而敌人又占领了埃耳

斯特尔对岸的瓦滕堡，因此布吕歇尔便首先驱逐了敌人，尔后，为了能在拿破仑倾全力向他猛攻时进行防御，便开始在瓦滕堡到布累丁一线构筑营垒。他从这里前进到了木耳德河。

10月7日在同贝尔纳多特会面时曾经约定，两个军团共同向莱比锡进军。10月9日，当西里西亚军团准备进军时，贝尔纳多特得到关于拿破仑从麦生沿大道开来的情报，就坚持退到易北河对岸，只有当布吕歇尔决定协同他渡过萨利河以便在该河对岸占领阵地时，才同意留在易北河左岸。尽管由于这一行动西里西亚军团会重新丧失自己的交通线，布吕歇尔还是同意了，因为否则同盟国就会实际上失掉北方军团。10月10日，整个西里西亚军团同北方军团会师，抵木耳德河左岸，河上桥梁已被破坏。当时，贝尔纳多特又提出必须退到贝恩布克，而布吕歇尔仅仅为了不让他撤回易北河右岸，又作了让步，条件是贝尔纳多特在韦廷附近渡过萨利河并在那里占领阵地。10月11日，正当西里西亚军团的纵队越过马格德堡至哈雷的大道时，布吕歇尔获悉贝尔纳多特违背了自己再三保证的诺言，没有在韦廷架桥，于是决定沿这条大道实施强行军。

拿破仑看出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避开他在杜宾附近集中兵力这一行动所发出的挑战，又知道他们除非退到易北河对岸就不可能避免会战，同时，也了解他只剩下四天的时间就将同主力军团遭遇，而这将使他处于两面夹攻的境地，于是，决定向易北河右岸维登堡方向开进，以使用这个佯动诱使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渡到易北河对岸，然后再向主力军团进行迅猛的突击。果然，贝尔纳多特由于担心他与瑞典之间的交通线而命令自己的军团立即通过在阿肯架设的桥梁，撤到易北河右岸，并在当日，即

10月13日，通知布吕歇尔说，亚历山大皇帝出于某些重要考虑已将他（布吕歇尔）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为此，他要布吕歇尔尽可能不失时机地率西里西亚军团随他之后开到易北河右岸。假如布吕歇尔这时优柔寡断，追随于北方军团之后，那末战局就会失败，因为总数约20万人的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就不会出现在莱比锡战场上了。布吕歇尔复函贝尔纳多特，说明根据他所掌握的一切情报看来，拿破仑丝毫没有把战场转移到易北河右岸的意图，只不过是企图迷惑他们而已。同时，他恳求贝尔纳多特放弃渡过易北河的打算。另一方面，由于他一再劝导主力军团向莱比锡进军，并提出在该地迎接它，他终于在10月15日得到了期待已久的邀请。他当即开往莱比锡，而贝尔纳多特却撤到彼得斯堡。10月16日，布吕歇尔在从哈雷至莱比锡途中，在默克恩激战中击溃了法军马尔蒙指挥的第六军，缴获54门火炮。他立刻把这次战斗结果，通知了在莱比锡会战第一日没有在战场的贝尔纳多特。会战第二日，即10月17日，布吕歇尔驱逐了帕尔特河右岸的敌人；敌人手中只剩下哈雷关卡附近的一些房屋和野战工事了。18日拂晓布吕歇尔同贝尔纳多特在布拉亨斐特举行会议，贝尔纳多特提出，倘若布吕歇尔当天不从西里西亚军抽调3万人给他，他就不能攻击帕尔特河左岸的敌人。布吕歇尔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以他仍然亲自率领这3万人，以保证他们有力地协同攻击为条件。

在10月19日获得最后胜利后以及在拿破仑从莱比锡向莱茵河退却的整个过程中，唯有布吕歇尔一人认真地进行了追击。当10月19日指挥各部队的将军们在莱比锡集市广场上迎接君主们，而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互相道贺上的时候，布吕歇尔的西里

西亚军团已向吕特岑方向追击敌人了。布吕歇尔从吕特岑向魏森费耳斯挺进时，普鲁士威廉亲王赶上了他，并把授予他普鲁士元帅称号的证书交给了他。同盟国君主们让拿破仑赢得了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同盟国军队始终没有能弥补上。但是布吕歇尔从爱森纳赫起以后每次都是下午到达拿破仑当天早晨才撤离的地方。正当布吕歇尔打算向科伦进发以便从那里渡过莱茵河时，他被召回并奉命去封锁莱茵河左岸的美因兹城。他迅速追击敌军直到莱茵河的结果，使莱茵联邦¹⁹⁸瓦解；联邦的军队脱离了在这以前他们所属的法军各师。西里西亚军团的大本营驻在赫希斯特时，主力军团进到了上莱茵。1813年战局就此结束。这次战局所以获胜，全赖布吕歇尔具有大胆的进取心和铁一般的刚毅精神。

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盟国之间意见分歧；一派主张停留在莱茵河上并采取守势，另一派则主张渡过莱茵河向巴黎进军。君主们久久犹豫不决，最后，布吕歇尔和他一派人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向巴黎分进合击：主力军团从瑞士出发，毕洛夫从荷兰出发，而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从中莱茵地区出发。为进行新的战局，曾增拨三个军归布吕歇尔指挥，即克莱斯特军、黑森选帝侯军和萨克森—科堡公爵军。布吕歇尔留下兰热朗军的一部围困美因兹城并命令新调来的各军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于1814年1月1日在曼海姆、考布和科布伦茨三地渡过莱茵河；在摩塞尔河谷将马尔蒙逐过了佛日和萨尔河，然后将约克军配置在摩塞尔河各要塞之间，并率领一支由萨肯军和兰热朗军一个师组成的28000人的部队，经沃库略尔和茹安维尔向布里恩挺进，以便自己的左翼同主力军团会师。1月29日，在布里恩附近他遭到拿破仑约4万人的攻击。这时，约克军仍远离西里西亚军团，而为数11

万人的主力军团还刚刚到达肖蒙。这样，布吕歇尔便不得不与拿破仑的很大优势的兵力周旋。然而，拿破仑在这次攻击中缺乏他素有的刚毅精神，并且甚至让布吕歇尔毫无阻碍地（如果不算骑兵的几次小战斗的话）退到特拉纳。假如拿破仑占领布里恩，以部分军队配置在与它毗邻的地方，并以三个军分别占领迪昂维耳、拉罗提埃尔和肖美尼耳，那末他就能在1月30日以优势兵力猛攻还在等待援军的布吕歇尔。可是，拿破仑却采取消极战术，而同盟国的主力军团已在奥布河岸巴尔集中，并以部分兵力前来增援布吕歇尔右翼。这位皇帝所以如此消极，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夏提荣会议的和谈¹⁹⁹上；他成功地使和谈开始了，他指望利用和谈赢得时间。果然，主张同拿破仑进行外交谈判的人们在西里西亚军团同主力军团会师以后，坚持在会议进行和谈期间只要装装打仗的样子就行了。施瓦尔岑堡公爵为此曾派遣一名军官谒见布吕歇尔，以便取得他的同意，而布吕歇尔让军官带回的答复如下：

“我们必须向巴黎进军。拿破仑曾拜访了欧洲各国的首都，我们岂能失礼？简单地讲，他必须退位。不推翻他，我们就不能安心。”

布吕歇尔坚决地指出，假如在拿破仑还没有能够把他的其余部队调来的时候就在布里恩附近向他进行攻击，同盟国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优势，并且他亲自承担这一任务，只要在约克军未来之前能够得到援军。贫瘠的奥布河谷无法供养军队，若前进，必得后退，——这个理由使他的建议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发起会战，但是，施瓦尔岑堡公爵没有率领他手下的联合部队向敌人进攻，只将维尔腾堡王储军（4万人）、居莱军（12 000人）和弗雷德军（12 000人）配属给布吕歇尔。另一方面拿破仑却什么也不知道，并且也没有怀疑过主力军团的来到。2月1日下午1时左右向他

报告布吕歇尔已经进攻时，他竟不愿相信。在查明情况属实后，他骑上马打算避开会战，并给贝尔蒂埃作了相应的指示。但是，当他在布里恩-拉-维伊和罗提埃尔之间追上新近卫军²⁰⁰时（新近卫军在听到越来越近的炮声后已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受到了近卫军的狂热欢迎，于是他决定利用这种情绪，就高呼《L'artillerie en avant!》（“炮兵，前进!”）。这样，4时左右在拉罗提埃尔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在初次失利后拿破仑就没有再亲自参加战斗。他的步兵冲入了拉罗提埃尔村，开始了持久而顽强的战斗，以致布吕歇尔不得不调来自己的预备队。只是到夜间11时，拿破仑在伤亡了4000—5000人，被俘2500人，损失火炮53门之后，命令军队退却时，法军才被逐出该村。这时同盟国军队距离巴黎仅仅六日行程，如果全力挺进，则拿破仑必然抵挡不住同盟国军队巨大的优势兵力。然而君主们却仍然怕妨碍拿破仑在夏提荣会议上媾和，竟让主力军团总司令施瓦尔岑堡公爵利用种种借口避免采取坚决的行动。

当拿破仑命令马尔蒙朝朗律特方向前进，返回奥布河右岸，而他自己则侧敌行军退向特鲁瓦的时候，同盟国军队分成了两个军团：主力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主力军团开始缓慢地向特鲁瓦前进，而西里西亚军团向马尔纳河进发。布吕歇尔预计在马尔纳河同约克军以及兰热朗和克莱斯特两个军的一部分会合，这样，他的兵力总共可以增到5万人左右。布吕歇尔的计划是追击这时到达马尔纳河下游的麦克唐纳元帅，直捣巴黎，而施瓦尔岑堡则应在塞纳河箝制法军的主力。但是，拿破仑看出同盟国军队不懂得如何利用既得胜利，同时深信自己在同盟国的主力军团能向巴黎方向深入之前来得及返回塞纳河，便决定猛攻较薄弱的西里西亚

军团。因此，拿破仑把维克多和乌迪诺率领的一支 2 万人的部队留下对付 10 万人的主力军团，自己则率莫尔蒂埃和奈元帅两个军共 4 万人向马尔纳河方向进发，在诺让附近又带上马尔蒙军，于 2 月 9 日率领这支联合部队进抵塞臧。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沿通往巴黎的小道经圣乌昂和索姆皮伊前进，2 月 9 日将他的大本营设在韦尔杜小镇上。他的兵力部署如下：约 1 万人在大本营附近；约克率 18 000 人在多尔芒至梯叶里堡之间，追击沿埃佩尔讷至巴黎的驿道退却的麦克唐纳；萨肯率 3 万人在蒙米赖至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之间，防止塞巴斯提昂尼的骑兵同麦克唐纳会合，切断麦克唐纳通往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渡口的道路；俄国奥尔苏费也夫将军率 5 000 人把守尚波贝尔。这种错误的兵力部署，使得西里西亚军团 en échelon（层层）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这是布吕歇尔出自两个彼此矛盾的动机的结果。一方面，他力图切断麦克唐纳的道路，不让他同塞巴斯提昂尼的骑兵会合；另一方面，他想把克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编入自己的序列，因为这两个军已从夏龙出发，预计在 9 日或 10 日同他会合。一个动机促使他放慢步伐，另一个动机却促使他急速前进。

2 月 9 日，拿破仑在尚波贝尔攻击奥尔苏费也夫，并击溃了他。当时克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已到达，但大部骑兵未到，布吕歇尔即率领这两个军向奉拿破仑的命令开来的马尔蒙进攻，并在后者向拉费尔-尚佩努瓦兹退却时跟踪追击，但在获悉奥尔苏费也夫溃败的消息后，于当夜率领他的两个军返回伯热尔，以便在这里掩护通往夏龙的道路。2 月 10 日，萨肯在战斗获得胜利以后，在特里耳波尔附近把麦克唐纳逐过马尔纳河，但当日夜闻听说拿破仑进攻尚波贝尔后，即于 11 日仓卒向蒙米赖后退。当他还

没有到达蒙米赖时，就不得不在维厄-梅宗展开战斗队形，来对抗这位从蒙米赖方向迎面而来的皇帝。萨肯在同约克会合前即被击败，损失惨重。两位将军在维福尔会合，2月12日退到梯叶里堡，在该地约克被迫进行了后卫战，遭到重大损失，这以后就退到于乌希-拉-维耳。拿破仑命令莫尔蒂埃沿菲姆大道追击约克和萨肯后，13日进抵梯叶里堡。2月11日和12日，布吕歇尔因不知约克和萨肯的确实位置和战斗结果，便在伯热尔静观在埃托日占领阵地与他对抗的马尔蒙的动态。13日他获悉两位将军失败的消息后，推测拿破仑已去寻找主力军团作战，并误认马尔蒙为拿破仑的后卫，因而一心想吞食马尔蒙。布吕歇尔进到尚波贝尔，他迫使马尔蒙退往蒙米赖；2月14日拿破仑在该地同马尔蒙会合；这时，拿破仑便转而对付布吕歇尔，中午在沃尚附近同他遭遇；当时布吕歇尔有2万人，但几乎没有骑兵。拿破仑向他进行了攻击，以骑兵包围了他的纵队，以巨大的代价将他击回尚波贝尔。西里西亚军团在从尚波贝尔退却时，本来可以在天黑前不受到特别的损失就到达埃托日，可是布吕歇尔却有意缓慢地退却而自找苦吃。因此他在整个退却过程中不断地遭到攻击，而且他的一支部队——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师——在经过埃托日时再次被沿着该城两侧街道运动的敌人所包围。近午夜时分，布吕歇尔才到达伯热尔的营地，休息数小时后即向夏龙进发，2月15日将近正午时到达夏龙。16日和17日，约克和萨肯的部队先后同他会师。在尚波贝尔、蒙米赖、梯叶里堡、沃尚、埃托日等地的各次零星的战斗中，布吕歇尔共损失15 000人和27门火炮。对于造成这种失败的战略上的失策，完全应由格奈泽瑙和缪弗林负责。

拿破仑留下马尔蒙和莫尔蒂埃对付布吕歇尔，带领奈元帅

以强行军返回塞纳河（施瓦尔岑堡在这里迫使维克多和乌迪诺退过了耶尔河），并在该地将麦克唐纳率领的 12 000 人及从西班牙调来的一些增援部队编入自己的军队。2 月 16 日，同盟国军因拿破仑突然出现而感到措手不及。17 日拿破仑的军队随后开到。拿破仑同他的元帅们会师后，急促地发起了对施瓦尔岑堡的攻击，当时施瓦尔岑堡正占领以诺让、蒙特罗和桑城为依托的一个大三角形的阵地。施瓦尔岑堡公爵在他所属的将领维特根施坦、弗雷德和维尔腾堡王储一一为拿破仑击败后，转身逃跑，退到特鲁瓦，并通知布吕歇尔，请他会合，以便共同在塞纳河同拿破仑会战。布吕歇尔这时已获得新增援的部队，当即表示同意；2 月 21 日他进抵梅里，22 日整天在那里等待关于约定的会战的命令。晚上他得知通过利希顿施坦公爵已向拿破仑提出休战建议，但遭拿破仑坚决拒绝。布吕歇尔立即派遣一名信使到特鲁瓦，恳请施瓦尔岑堡出战，甚至表示愿意亲自出动，只要主力军团同意作为后备队即可。但是施瓦尔岑堡得知奥热罗把布伯纳将军逐到瑞士，就更加惊慌而下令向兰格尔退却了。布吕歇尔当时立刻认识到向兰格尔的退却必将导致向莱茵河对岸的退却，而为了把拿破仑引开，不让他去追击士气沮丧的主力军团，便决定再次直接向巴黎方向进军，向马尔纳河挺进；在那里他这时可以指望聚集 10 万人的军队，因为文秦格罗达已率领 25 000 人进抵兰斯郊区，毕洛夫率领 16 000 人开向郎城，克莱斯特军的残部可从爱尔福特开来，兰热朗军的残部由圣普里指挥，可从美因兹城附近开来。

正是布吕歇尔再度离开主力军团的这一行动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假如拿破仑开始去追击退却的主力军团，而不去攻击前进的西里西亚军团，那末同盟国军就会遭到失败。2 月 24 日，布吕

歇尔在拿破仑尚未前来攻击他的时候，在昂格吕尔架设浮桥渡过奥布河，完成了他进军途中唯一的艰巨任务。拿破仑派遣乌迪诺和麦克唐纳率领约 25 000 人尾追主力军团后，在 2 月 26 日同奈元帅和维克多一起离开了埃尔比斯去追击西里西亚军团。这时，主力军团面前只有两个元帅，施瓦尔岑堡按照布吕歇尔的建议停止了退却，鼓起了勇气，转身攻击乌迪诺和麦克唐纳，并在 2 月 27 日和 28 日击败了他们。布吕歇尔企图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尽可能靠近巴黎的某个地方。马尔蒙率领他的部队仍然驻在塞臧，而莫尔蒂埃则在梯叶里堡。当布吕歇尔逼近时，马尔蒙就退却了，于 26 日在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附近与莫尔蒂埃会合，一同退到莫市。布吕歇尔接连两日企图渡过乌尔克河，将战线大大地向前推进，迫使两个元帅同他会战，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沿着乌尔克河右岸前进。3 月 2 日，到达乌希-勒-夏托，3 月 3 日晨获悉毕洛夫和文秦格罗迭已迫使苏瓦松城的法军投降，布吕歇尔即于当日渡过安纳河，而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苏瓦松附近。拿破仑在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渡过马尔纳河后，距离布吕歇尔有两昼夜强行军的路程，即向梯叶里堡和菲姆方向前进，在他的一支部队再度攻占兰斯后渡过了韦耳河，并于 3 月 6 日在贝里-奥-巴克渡过安纳河。布吕歇尔本来打算在拿破仑渡安纳河后，在河的对岸同他会战，并为此调集了军队。可是当他得知拿破仑向菲姆和贝里-奥-巴克进发，企图从左侧迂回西里西亚军团时，即决定布成斜角阵势，一俟拿破仑走出贝里-奥-巴克峡谷，立刻从克朗向他的翼侧攻击，迫使他在背后仅有一条隘路的情况下出来作战。布吕歇尔在从苏瓦松到克朗的中途以右翼依托安纳河、左翼依托慕特河部署好兵力后，获悉文秦格罗迭竟让拿破仑于 6 日顺利通过

了贝里-奥-巴克，后者甚至还派遣了一支部队沿大道向郎城挺进，于是便放弃了这一卓越的计划。这时，布吕歇尔认为除郎城外在任何地点都不宜进行决战。

拿破仑如果从兰斯出发沿着公路经科尔贝尼，就能像从克隆出发的西里西亚军团那样迅速地到达郎城，因此，布吕歇尔为了阻碍拿破仑，便将沃龙佐夫军配置在安纳河与累特河之间设有坚固阵地的克隆台地上，同时，派文秦格罗迭率骑兵1万人经费特厄向科尔贝尼方向进发，当拿破仑一开始向沃龙佐夫进攻，就立刻攻击拿破仑的右翼和后方。然而，文秦格罗迭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因此拿破仑在3月7日将沃龙佐夫逐出了台地，不过他自己损失了8000人，而沃龙佐夫损失4700人，却未溃败，秩序井然地退却了。3月8日，布吕歇尔在郎城附近集中了自己的军队，而郎城会战应当决定两军的命运。除西里西亚军团在数量上占优势外，郎城前面广阔的谷地也特别便于该军2万骑兵展开；同时，郎城本身位于一座山岗的平顶上，四周坡度为12、16、20、30度不等，山麓有四个村庄，无论对于进攻或是防御，地形都十分有利。这一天，拿破仑亲自指挥的左翼法军的进攻被击退了，而马尔蒙指挥的右翼法军在入夜后露营时遭到了奇袭和严重的失败，以致一直退到菲姆，这位元帅才制止了自己军队的逃窜。拿破仑及其总数仅为35000人的左翼军完全陷于孤立，被困在不利的阵地上，看来应当在为胜利所鼓舞的、拥有相当优势兵力的敌人面前投降了。但是，次日晨布吕歇尔突患寒热病，双目发炎，不能指挥作战，而拿破仑仍然在原先的阵地上摆出挑战的姿态。这吓坏了当时指挥作战的将领，他们不但停止了已开始的进攻，而且还让拿破仑在夜间安然撤向苏瓦松。

虽然如此，郎城会战却损伤了拿破仑的兵力和士气。3月13日，他企图偷袭落入圣普里手中的兰斯城，以恢复原态势，但没有成功。这时，他的处境已显而易见，因此当他在3月17日和18日向奥布河岸阿尔西的主力军团进攻时，甚至施瓦尔岑堡本人也不顾自己只有不足8万人的兵力可用以对抗拿破仑指挥的25000人，而敢于停下来进行会战，这个会战到3月20日和21日仍在继续。当拿破仑停止会战时，主力军团尾追至维特里，并在他的后面同西里西亚军团会师。拿破仑在绝望中采取了最后的手段——退到圣迪济埃，企图用这种方法以他的一小撮兵力切断同盟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及兰格尔与肖蒙之间的退路，来威胁庞大的同盟国军队。同盟国军队以直取巴黎回答了这一行动。3月30日，战斗在巴黎近郊发生了，西里西亚军团猛攻蒙马特尔。布吕歇尔自郎城会战患病以来虽然尚未复原，但他还是骑在马上，遮住眼睛以免阳光刺激，短时地亲临战场督战，而在巴黎城投降以后，就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他辞职的借口是患病，但真正的原因是：不隐讳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的布吕歇尔，不同意同盟国君主们认为需要采取的装样子的外交手腕。因此，3月31日布吕歇尔是以私人身分来到巴黎的。在整个1814年战局中，他是同盟国军队中唯一力主进攻的人物。他以拉罗提埃尔会战打破了夏提荣妥协派的计划，继而在梅里表现了果断精神，把同盟国军队从毁灭性的退却中救了出来，最后又以郎城会战预定了巴黎的第一次投降。

在缔结第一次巴黎和约²⁰¹后，布吕歇尔伴随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访问了英国，在那里人们把他当做一位当代英雄来欢迎它。他受到了许多奖赏，获得了欧洲的一切战

功勋章。普鲁士国王特为他制作了铁十字勋章；英国摄政王^①将自己的肖像赠送给他，牛津大学授予他教会法和民法博士学位。

1815年布吕歇尔再次决定了对拿破仑最后一次战争的结局。布吕歇尔虽然已经73岁，但在6月16日利尼会战中遭受惨败后，仍能收拾残军，重整旗鼓，尾随拿破仑之后前进，因而能于6月18日傍晚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上。这是战史上空前的功绩。滑铁卢会战后，布吕歇尔将逃窜的法军从滑铁卢一直追击到巴黎，这在以往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即拿破仑曾同样出色地将普军从耶拿一直追击到施特廷。这次，布吕歇尔是亲率他的军队进入巴黎的，他甚至还任命了他的副参谋长缪弗林为巴黎的军事总督。布吕歇尔曾竭力主张枪决拿破仑，炸毁塞纳河上的耶拿桥，以及将法军从欧洲各国首都劫夺来的珍宝归还原主。他的第一个愿望遭到威灵顿的阻挠，第二个愿望遭到同盟国君主们的阻挠，仅仅最后一个愿望才得到了实现。他在巴黎居住了三个月，常常出现在赌桌旁玩《rouge et noir》^②。在卡茨巴赫河会战周年纪念的时候，他访问了故乡罗斯托克城，该城居民集资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布吕歇尔逝世时，全普鲁士军队哀悼8天。

拿破仑把布吕歇尔称为Le vieux diable（老鬼），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国兵给他起了一个“前进元帅”的绰号。其实，布吕歇尔是一位骑兵将军。他在骑兵专业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这门专业只要求有战术技巧，并不需要有战略知识。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和法国人，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有健全的理智，作

① 乔治。——编者注

② “红与黑”（一种纸牌赌博）。——编者注

风朴实，谈吐粗鲁，而在必要场合也善于慷慨陈词，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他是一名模范军人。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在需要紧张的时候，他不知疲倦；他在普通士兵中有强烈的影响；他既有非凡的勇敢，又善于细致地判断地形，危急中能当机立断，在防御中沉着顽强，在进攻时勇猛坚决；遇到较简单的情况，他具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确定正确的行动方式，遇到较复杂的情况，则依靠格奈泽瑙，——因此，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9月22日—10月30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炮 兵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抛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硝石，因此很自然地，当地居民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的典礼中。我们没有资料说明，究竟在什么时候人们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成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因其爆炸性而具有重大的意义。据帕拉韦先生 1850 年在法国科学院的一个报告²⁰²中所引证的中国某些编年史资料看来，在公元前 618 年就有了火炮；在中国古代的其他史料中，记载着用竹筒发射的燃烧性火器以及类似爆炸弹的火器。但不管怎样，火药和火炮在军事上的应用，看来在中国早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只是到公元 1232 年才确实第一次大量使用它们，当时被蒙古人围困在开封府的中国人，曾使用了抛射石弹的火炮来抵御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性火器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火器。

根据希腊著作家埃利安努斯、克提西阿斯、菲洛斯特拉特和泰米斯提乌斯提出的证据，印度人似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在军事上使用某种烟火剂。这种烟火剂虽然含有大量硝石，但绝不是火药。在印度法典中大概有关于某种火器的说明；其中无疑

地曾提到火药，而按照霍·海·威尔逊教授的说法，在印度古代的医书中载有火药的配方。但是，关于火炮的最初记载，在时间上几乎和已确凿证实的中国最早出现火炮的时期完全一致。大约写于1200年的哈泽德诗篇中，曾提到实心弹发射器，它的响声在10考司（1500码）内可以听到。我们曾读到，德里统治者大约在1258年使用过车子炮。一百年以后，印度已广泛使用火炮，在1498年葡萄牙人到印度的时候，发现印度人在使用火器方面竟和他们一样先进。

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剂。在阿拉伯人对硝石的叫法中，有两种叫法的意思就是**中国盐**和**中国雪**。古代阿拉伯的著作家曾提到“中国红火和白火”。阿拉伯开始使用纵火器的时期几乎也就是他们大举侵入亚洲和非洲的时期²⁰³，拜占庭的希腊人最初从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制造烟火剂（以后发展成为“希腊火”），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至于 *maujanitz*——据传说是穆罕默德所知道和使用的一种几乎神话般的火器——则更不用说了。九世纪的著作家马可·格雷克提到一个配方——六分硝石、二分硫磺、一分木炭，这和真正的火药成分是非常近似的。²⁰⁴在欧洲的著作家中，罗吉尔·培根大约在1216年在他的“论魔法的荒淫”²⁰⁵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相当精确的火药配方，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一百年，西方各国还不知道使用火药。阿拉伯人看来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根据孔代所写的“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在1118年萨拉哥沙围攻战时期就使用火炮了，而在1132年，西班牙除制造其他火炮外还铸造了四磅长炮。²⁰⁶大家知道，1156年阿布德-艾尔-穆敏利用火器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崩港附近的穆罕默迪亚，而在次年利用发射箭

矢和石块的火器击退了卡斯提尔人，守住了西班牙的涅布拉城。如果说阿拉伯人在十二世纪使用的发射器的特点至今还不清楚的话，那末下列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即在 1280 年已使用火炮攻打哥多瓦，而到十四世纪初火炮的知识就由阿拉伯人传给了西班牙人。1308 年，斐迪南四世利用火炮夺取了直布罗陀。1312 年和 1323 年在巴萨、1326 年在马尔托斯、1331 年在阿利康特的强攻中都使用了火炮；在上述围攻战中几次火炮还发射了燃烧弹。使用火炮的知识又从西班牙人那里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在 1338 年围攻吉约姆山时使用了火炮，同年，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²⁰⁷也使用了火炮。到 1350 年，火器已流传到西欧、南欧和中欧各国。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那时，火炮是用锻铁条焊成圆筒、外面用大铁箍箍紧而制成的。火炮由几部分组成，可拆卸的炮尾部是在射击时待火炮装填完后备才装在炮筒上的。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们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属于同样早的年代，甚至更早。大约到十四世纪，不论是欧洲的或是亚洲的火炮，构造都非常简陋，这说明炮兵当时还处在幼年时代。这样，火药的发明及其用于火器上的时间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最初成为军事上的重要因素的时间；在十四世纪，不论什么地方火炮都很笨重，这说明那时的火炮还刚刚开始作为常备武器。欧洲十四世纪的火炮是很笨重的。大口径火炮只有拆卸成几部分才能搬运，而且每一部分要占用一辆马车。甚至小口径火炮也异常笨重，因为那时还不知道火炮和炮弹之间以及炮弹和装药之间的正确比重。火炮放置在阵地上时，还要为每门火炮设置一个木架或垫板之类的东西，以便将火炮架在上面射击。根特城内

有一门炮，连同它的垫板，共长 50 英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炮架。在大多数场合下，火炮和我们现在的臼炮一样，是以很大的射角进行射击的，因此在使用爆炸弹以前，射击效果一直是很小的。火炮通常发射球形石弹，而小口径火炮有时则发射铁箭。虽然火炮有上述缺点，但是它不仅在攻城和守城时使用，而且在野战中和军舰上也使用。早在 1386 年，英国人就缴获了两艘装备有火炮的法国军舰。如果以“玛丽-玫瑰号”（于 1545 年沉没）上取下的火炮为例，那就可以看出，这些最初的舰炮架设在特制的木座上，并且固定在上面，因此不可能有不同的射角。

在十五世纪，火炮的构造和使用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火炮开始用生铁、铜或青铜铸造。可拆卸的炮尾部逐渐被淘汰，这时火炮已铸成一个整体。最好的铸造厂是在法国和德国。法国人还首先尝试在攻城时把火炮调到前面，在掩护下架炮。约在 1450 年出现了类似堑壕的工事，不久毕罗兄弟便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依靠这些炮队在一年内就把英国人以前夺去的全部要塞夺了回来。但是作了最大改进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 35 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 2 匹到 24 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当时意大利的火炮

仍然用犍牛驮运，由几个部分组成，在选定了阵地以后还得架设在垫板上；它们发射石弹，一般都很笨重，因此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胜利的福尔诺沃会战（1495年）²⁰⁸，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兵法”²⁰⁹，就是专门论述如何巧妙地配置步兵和骑兵以防止这个新兵种的杀伤的。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和弗朗斯瓦一世继续改进自己的野炮，并使它们更加轻便。弗朗斯瓦把炮兵组成一个特殊部门，属炮兵总监指挥。他的野炮在马利尼亚诺会战（1515年）中粉碎了一向无敌的、人数众多的瑞士长矛队；它们从一个翼侧阵地迅速转移到另一个翼侧阵地，就这样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知道爆炸弹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到欧洲各国的。但是在欧洲开始使用这种炮弹和白炮（现在白炮就发射这种炮弹）仍然不早于十五世纪下半叶；一般认为这种炮弹和炮的采用应归功于里米尼的长官庞多尔福·马拉特斯塔。最初的爆炸弹是两个空心的金属半球体旋在一起制成的；铸造整个的空心爆炸弹的方法只是以后才发明的。

查理五世皇帝在野炮的改进方面并不落后于他的对手法国人。他采用了前车，这样两轮炮架在转移时就成为四轮炮车，有利于更快地运动和通过起伏地。例如，在1554年的朗蒂会战²¹⁰中，牵引这些轻炮的马匹就是跑步前进的。

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人们认为意大利人塔尔塔利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in vacuo*（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就奠定了炮兵

学的理论基础。几乎在同一时候，万诺乔·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1540年），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并为制定可靠的理论原则和以经验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开辟了道路。

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是筑城法的彻底变革。从亚述和巴比伦王朝时代以东，筑城法只有很小的发展。但是，当时新式火炮已能在旧式石墙的任何地方打开缺口，因此就需要发明一种新式工事。防御工事的构造应当使暴露于围攻者火炮平射火力之下的石质部分尽量减少，并使强大的火炮能够配置在土堤上。旧式石墙被仅用石块做复盖的土堤代替，而不大的侧防塔楼则改为大的五角棱堡。工事上的一切石砌部分，开始逐渐得到外围土质工事的掩护，以免受到敌人的平射火力；到十七世纪中叶，要塞防御手段又胜过了进攻手段，直到沃邦再度使后者占居优势为止。

在这以前，装填的方法是直接把散装的火药填进火炮。大约在1600年，开始使用药包，即装有定量火药的粗麻口袋。这样，装填所需的时间就大大缩短，并且由于装药量更加一致而保证了更大的射击精度。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明，即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而能用来发射空心弹的野炮，也是在这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在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²¹¹时期进行的多次围攻，大大促进了防守和攻击要塞用的火炮的改进，特别是促进了白炮和榴弹炮、爆炸弹、燃烧弹和炽热的实心弹的使用方法的改进，以及点火具和其他的军用烟火器材的制造方法的改进。十七世纪初，人们还使用着各种口径的火炮——从四十八磅炮到口径最小的、只能发射半磅实心弹的鹰炮。野炮虽然有了许多改

进，但毕竟还很不完善，因此必须有所有上述各种口径的火炮，才能大致上取得我们今天用少量六磅到十二磅中口径火炮所达到的效果。那时，小口径火炮灵便，但是威力小；大口径火炮威力很大，但是不灵便；而中口径火炮无论就威力或灵活性而言都不足以完成所有的任务。因此，当时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炮。火炮的射角用高低楔来确定。炮架仍和以前一样笨重，当然，每种口径的火炮仍需要有专门的炮架，所以在战场上几乎不可能携带备用的车轮和炮架。车轴是木制的，其尺寸根据火炮的口径而定。而且同一口径的火炮及其炮架的大小也都不一样，因为各地还保留着许多旧式火炮，此外，一个国家中不同工厂制造的火炮在构造上也不相同。药包仍然只用于要塞炮；而在战场上是用小铲将散装火药装进火炮，然后再装上火塞和炮弹的。点火孔内也要装填散装火药。整个装填过程非常缓慢。炮匠不算作正规军的兵士，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行会，招收学徒，并且宣誓不泄露本行的秘密。当战争爆发时，作战双方都尽可能招募更多的、比平时要多得多的炮匠。招募来的每个炮匠或炮手指挥一门火炮，配有一匹乘马和一个学徒，并按他要求的数量配备专业助手，而搬运重炮所需的人员还不包括在内。炮手的报酬比兵士多三倍。当战争爆发时，炮兵用的马匹由承包人供给，承包人还按照合同提供挽具和驭手。在会战中，火炮成一线配置在阵线前面，这时火炮从前车上卸下，马匹则卸套；接到前进的命令时，火炮架上前车，套上马前进；口径较小的火炮在短距离内有时就用人力转移。火药和炮弹用另外的车辆运送；前车上还没有弹药箱。移动、装填、装导火药、瞄准和射击，所有这些操作过程从我们现代的观

点看来都是极端缓慢的，而且在技术这样不完善、对于炮兵学几乎完全缺乏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命中率必然是很小的。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古斯塔夫-阿道夫攻入德国，标志着炮兵学的巨大进步。这位伟大的统帅取消了口径过小的火炮，最初代之以他的所谓蒙皮炮，即用绳子和皮革包扎着的轻锻铁管。这种炮只用来发射链式霰弹，这样，链式霰弹就第一次用于野战；而在这以前，链式霰弹只用来保卫要塞的壕沟。古斯塔夫-阿道夫除了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外，还在自己的野战炮兵中使用了药包。由于蒙皮炮不够坚固，后来就代之以生铁制的四磅轻炮，它的长度是口径的 16 倍，加上炮架共重 6 英担，用双马牵引。每个步兵团配有这种炮两门。这样，由于用新式火炮代替了口径虽小但比较笨重的旧式火炮，就出现了团炮，它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团炮最初只用来发射霰弹，但是很快也能用来发射球形实心弹了。重炮则单独编为强大的炮兵连，在军队翼侧上或中央前占据有利的阵地。这样，轻炮和重炮的这种区分和炮兵连的编成，奠定了野战炮兵战术的基础。瑞典炮兵总监托尔斯顿森将军大大推动了这些革新，由于这些革新，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遵循着它自己特殊的用于战斗的原则。大约也在那时，还有两项重要的发明。约在 1650 年发明了水平调整螺杆，它使用到格里博瓦尔时代；约在 1697 年，开始采用装满火药的管子作为起爆管，以代替点火孔内的散装火药，这样，瞄准和装填过程都简便多了。另一个重大的改进是发明了短距离内转移火炮用的牵引索。在十七世纪，战场上使用的火炮数量很多。在格累芬哈根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 2 万名兵士，共有火炮 80 门，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会战中，18000 名兵士共有火炮 200

门。²¹²在路易十四战争时期，拥有 100—200 门火炮是通常的现象；在马尔普拉克会战²¹³中，作战双方都有近 300 门火炮；这在当时说来是在一个战场上集中的火炮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数量。这一时期在野战中使用臼炮是相当经常的。法国人仍然保持了在炮兵方面的优势。他们在 1671 年建立了炮兵团，规定了不同的军官职务和等级，从而首先废除了旧的行会制度，把炮匠编入军队作为基干兵。这样一来，这部分武装力量就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兵种，而它的军官和兵士的训练也就由国家掌管了。1690 年，法国创办了一所炮兵学校，它至少在成立后的五十年内是世界上唯一的炮兵学校。1697 年，圣雷米出版了一本炮兵学手册²¹⁴，这在当时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是，由于炮兵方面的“秘密”仍然保守得非常严，因此其他各国进行的许多改革，法国还不知道；而且欧洲各国的火炮构造和炮兵编成也有很大区别。例如，荷兰发明的榴弹炮，到 1700 年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但是法军还没有装备这种火炮。拿骚的摩里茨伯爵首先采用的装置在前车上的弹药箱，法国并不知道，而其他各国也很少采用。因为火炮、炮架和前车都过于笨重，已经无法再加上弹药的重量了。口径最小的火炮，包括三磅炮在内，实际上已不用了，但是法国还没有轻型的团炮。在上述各时期，火炮装药一般都很重，最初装药和实心弹的重量是一样的。虽然当时火药的质量不好，但是这些装药产生的力量仍然比现在用的装药所产生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是火炮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经受住这种装药的爆炸作用，青铜加农炮的重量往往是炮弹重量的 250—400 倍。但是，加农炮的重量必须减轻，这就要求把装药逐渐减少；大约到十八世纪初，装药的重量通常就只有炮弹重量的一半了。臼炮和榴弹炮的装药量视目标距离而

定，通常都不大。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结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火炮的口径和种类既杂乱又繁多，一切已有的、凭经验得来的规则并不可靠，而确定不移的原则又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这时已引起人们注意，并且再也不能容忍了。因此，到处都大规模地进行试验，试图确定：各种口径的火炮的作用；口径同装药量、同火炮重量及火炮长度的关系；火炮各部分金属重量的比例；射程以及后座力对炮架的作用等等。在1730—1740年这一时期，贝利多尔在法国拉费尔，罗宾斯在英国以及帕帕契诺·丹东尼在都灵都领导了这种试验。结果，火炮的口径大为统一，火炮各部分的金属重量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装药的重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发展炮兵学原理方面，也取得了像上述改进那样大的进步。伽利略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别尔努利、沃尔弗和欧勒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验家对炮兵学中数学方面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普鲁士的野炮又一次大大减轻了。团属短管轻炮的长度不超过口径的14倍、16倍或18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80—150倍；在当时主要由步兵火力决定战斗结局的情况下，这样的轻炮被看做是具有足够射程的火炮。因此，这个国王便按照上述长度和重量方面的比例改造了他所有的十二磅炮。奥地利人在1753年仿效了这种做法，其他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

了；但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却在他统治的后半期又用强大的长管炮装备了预备队炮兵，因为莱滕会战的经验使他相信了这种炮的火力的优越性。弗里德里希大帝让自己的一部分炮兵连的炮手乘马，从而建立了骑炮兵这样一个新的兵种，骑炮兵用来支援骑兵，就像步炮兵用来支援步兵一样。这一新兵种具有很大的威力，因而很快就被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在某些国家的军队，如奥地利军队中，炮兵不是乘马，而是乘在一种特制的车辆上。在十八世纪，各国军队的火炮数量还是很多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拥有的火炮数量是：1756年在7万名兵士中有206门，1762年在67000名兵士中有275门，1778年在18万名兵士中有811门。这些火炮除团炮随各营行动外，都编成大小不同的炮兵连，每个炮兵连有6至20门火炮。团炮随同步兵一起前进，而炮兵连则在选定的阵地上进行射击，有时还前进到下一个阵地，但是通常就停在这里，直到会战结束。在运动性方面，这些火炮都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库奈斯多夫会战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能在决定性时刻把火炮调来。普鲁士将军泰佩尔霍夫还建立了野战臼炮连，轻臼炮是用骡子驮载转移的；但是1792年和1793年的战争证明这种臼炮没有用处，此后不久它就被淘汰了。这一时期，炮兵学在德国有了特别重大的发展。斯特伦泽和泰佩尔霍夫在这一方面写了一些有益的著作²¹⁵，但是当时最卓越的炮兵专家是夏恩雷斯特。他所写的炮兵手册是炮兵学方面第一部全面的、真正的科学著作，而早在1787年就已出版的他的一本军官手册中，就已开始科学地论述了野战炮兵的战术²¹⁶。夏恩霍斯特的著作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是至今仍然是权威的著作。奥地利的维加将军、西班牙的摩尔拉将军、普鲁士的霍伊尔和鲁弗鲁瓦也都写了有价值的炮兵学著

作²¹⁷。1732年，法国人采用瓦耳埃尔的办法改编了炮兵；他们保留了二十四磅、十六磅、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并采用了8英寸榴弹炮。但是他们的火炮在结构上仍大不相同；加农炮的长度为口径的22倍到26倍，重量大约为炮弹重量的250倍。格里博瓦尔将军在七年战争时期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知道普鲁士和奥地利新编炮兵的优越性，因此终于在1774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他提出的新编制。攻城炮兵与野战炮兵彻底区分开了。攻城炮兵由十二磅以上的全部火炮和全部旧式的十二磅重加农炮编成。野战炮兵则由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长度均为口径的18倍，重量均为炮弹的150倍）以及6英寸榴弹炮编成。加农炮的装药量最后确定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并采用了高低调整螺杆，炮和炮架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规定的型式制造的，以便用库存的预备品来替换。法国炮兵所使用的各种运输工具只需7种车轮和3种车轴就够了。虽然大多数国家的炮兵都知道使用前车上的弹药箱来运送弹药，但是格里博瓦尔在法国没有采用这种弹药箱。四磅加农炮配属给步兵，每个步兵营有这样的炮两门，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则编成单独的炮兵连，作为预备队炮兵，每个炮兵连有一个野战铁工场。组成了辎重队和工役连。总的说来，格里博瓦尔的炮兵是第一个根据当代的要求建立的。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分的比例上、在兵器和编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炮兵优越，而且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

由于格里博瓦尔的各种改革措施，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比其他各国的炮兵都强大，并且很快地成为拿破仑手中的威力空前强大的一支兵力。1799年法国最后取消了团炮，同时，由于欧洲各地使用了大量六磅和三磅加农炮，法军也装备了这两种火炮；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法国炮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的野战炮兵都编成炮兵连，每连有 6 门火炮，其中 1 门通常是榴弹炮，其余 5 门则是加农炮。但是，如果说在炮兵的兵器方面没有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末在炮兵的战术方面则有很大的改变。虽然火炮的数量由于团炮的取消而稍有减少，但是火炮在战斗中的作用由于火炮得到了巧妙的使用而增强了。当时，拿破仑使用配属给步兵师的一些轻炮来达到发起战斗和迫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目的，而把大部分炮兵留作预备队，直到决定了主要攻击目标时为止；等到主要攻击目标一确定，这些炮兵就出敌不意地编成庞大的炮队，共同袭击这一目标，从而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预备队最后的攻击作准备。在弗里德兰德会战^①中有 70 门火炮，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有 100 门火炮，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排成一线的；在博罗迪诺会战^②中，由 80 门火炮编成的炮队为奈元帅向谢明诺夫村攻击作了准备。另一方面，拿破仑编成的大量骑兵预备队需要相应的骑炮兵部队来支援，于是骑炮兵又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法军有大量的骑炮兵，而且在实践中首创了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法。如果没有格里博瓦尔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产生炮兵的这种新的使用方法；而改变战术的必要性，即促使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军队逐渐地、稍加改变地采用了这些改革措施。

截至法国革命战争初期，英国炮兵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国的炮兵。英军每个营有两门团炮，但是根本没有预备队炮兵。炮车用单马纵列挽曳，而驭手持长鞭随车步行。马和驭手都是雇来的。火炮的构造非常落后，火炮在转移时，除了很近的距离外，马只能慢步前进。他们还没有骑炮兵。但是，自

① 见本卷第 114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58—263 页。——编者注

从 1800 年经验表明原有的炮兵不能令人满意以后，斯皮尔曼少校对炮兵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前车改用双马纵列挽曳，火炮编成 6 门制炮兵连，总之采用了大陆各国已经采用了一个时期的改革措施。由于不惜金钱，英国炮兵很快就成为衣着最讲究、装备最优良最齐全的一支炮兵了。新建立的骑炮兵很受重视，它很快就表现出勇敢、迅速和动作准确的特点。至于炮兵兵器方面的革新，则仅限于炮车构造的改进。单尾炮架和带有弹药箱的前车，后来为大陆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在这一时期，炮兵和军队其他各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些。火炮数量最多的是皮尔马森斯会战²¹⁸中的普鲁士军队——1 000 名兵士中就有 7 门火炮。拿破仑认为每 1000 名兵士有 3 门火炮就足够了，而这一比例就成了一种常规。这时还规定了每门火炮应有的炮弹数量，即一门炮的炮弹不少于 200 发，其中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霰弹。在拿破仑垮台后的和平时期内，欧洲列强的炮兵都逐步进行了改革。各地都取消了三磅和四磅轻炮，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英国炮兵的经过改进的炮架和弹药箱。几乎到处都规定装药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50 倍或接近 150 倍；火炮的长度则为口径的 16—18 倍。法国人在 1827 年改编了自己的炮兵。他们给野炮规定了以下标准：八磅和十二磅炮，长度为口径的 18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50 倍。他们采用了英国式的炮架和弹药箱；这种前车上的弹药箱，法军还是初次采用。八磅和十二磅炮连的编成中分别包括有口径为 15 厘米和 16 厘米的两种榴弹炮。野战炮兵这种新编制的特点是非常简单。在法军野炮连所使用的一切运输工具中，只有两种炮架、一种前车、一种车轮和

两种车轴。此外，他们还建立了特种山炮兵，它由口径为 12 厘米的榴弹炮组成。

现在，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九磅炮组成，这种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7 倍，重量按炮弹重 1 磅、炮重 $1\frac{1}{2}$ 英担计算，装药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每个炮兵连有两门 $5\frac{1}{2}$ 英寸的二十四磅榴弹炮。在不久以前的对俄战争^①中，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根本没有调到战场上去。他们使用两种车轮。不论英国或法国的步炮兵，枪手都是乘在带有弹药箱的前车上转移的。

普鲁士军队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8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45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弹炮的口径是 $5\frac{1}{2}$ 英寸和 $6\frac{1}{2}$ 英寸。每个炮兵连有 6 门加农炮和 2 门榴弹炮。他们使用两种车轮和车轴以及一种前车。炮架是格里博瓦尔式的。在步炮兵中，为了迅速转移，5 名炮手（足够操炮的人数）坐在前车上和骑在辕外马上转移，其余 3 名炮手则各自随火炮前进。因此，弹药箱不像法国军队或不列颠军队那样，和火炮连在一起，而是单独组成一个纵队，作战时配置在敌人射击范围以外的地方。在 1842 年，采用了英国式的经过改进的弹药箱。

奥地利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6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35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奥地利的榴弹炮和普鲁士军队使用的榴弹炮相似。一个炮兵连由 6 门加农炮和 2 门榴弹炮组成。

俄国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8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50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

^①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弹炮的口径是 5 英寸或 6 英寸。根据口径和任务的不同，炮兵连由 8 门或 12 门炮组成，其中加农炮和榴弹炮各占一半。

撒丁军队装备有八磅和十六磅加农炮以及口径与此相同的两种榴弹炮。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都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西班牙军队装备有八磅炮和十二磅炮；葡萄牙、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那不勒斯的军队则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

英国炮兵在斯皮尔曼少校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得到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炮兵界对于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的兴趣，还有大不列颠庞大的海军炮兵的存在为炮兵的进步所提供的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切促成了许多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烟火剂和火药比其他各国都好，而英国的空炸信管的准确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英国炮兵不久以前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榴霰弹（一种装满弹子、在飞行过程中爆炸的空心弹），因此，霰弹的有效射程就和球形实心弹的射程一样远了。不管法国的设计家和组织者的本领多么大，法军恐怕是唯一未能采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炮弹的军队。他们不会配制空炸信管所需的药剂，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路易-拿破仑提出了一种新式野炮，看来法国现在正在逐渐采用这种野炮。目前装备的四种加农炮和榴弹炮，全部要用这种轻型的十二磅加农炮来代替，它的长度是口径的 15.5 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 110 倍，装药量是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在用减装药时，这种加农炮应当发射 12 厘米来的爆炸弹（目前山炮用这种炮弹），这样就可以代替专门发射空心弹的榴弹炮。法国四个炮兵学校进行的各次试验都很成功，而且法国人还肯定地认为，在克里木战争中这种加农炮显然优越于大部分是六磅炮的俄国加农炮。但是，英国人确信他们的九磅长管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

都优于这种新式加农炮。这里必须指出，他们首先使用过这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但不久就放弃了。路易-拿破仑的炮显然就是这种炮的仿造。用普通加农炮发射爆炸弹的方法，则是向普鲁士军队学来的，普鲁士军队在围攻时用二十四磅加农炮发射爆炸弹来完成一定的任务。但是路易-拿破仑的这种加农炮的质量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而由于没有专门公布过关于这种火炮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作用的任何资料，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可能对这种火炮的优劣作出定论。

炮兵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火炮用实心弹、空心弹和其他炮弹进行射击的规律以及通过试验而确定的射击规则；炮弹飞行距离、射角和装药量之间的已知的关系；炮弹与膛壁之间的空隙所起的影响和造成射弹偏差的其他原因所起的影响；命中率以及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in vacuo（在真空中）朝非垂直方向抛掷任何重物，都会形成一条抛物线，这一事实虽然是炮兵学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运动物体速度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空气阻力，却使抛物线理论在炮兵方面的实际运用中发生极大的变化。例如，炮弹初速为每秒 1 400—1 700 英尺的火炮，其弹道和理论上的抛物线相差很大，以致只要成 20 度左右的射角射击，就能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而按照抛物线理论，这一射角却应当是 45 度。人们根据实验的结果相当准确地断定了这种偏差量，并依此确定了每种火炮在采用一定的装药向一定的距离射击时应有的射角。但是，影响炮弹飞行的还有许多别的因素。首先是存在着空隙，即炮弹直径和炮膛直径有差别，因为为了便于装填，炮弹直径应小于炮膛直径。这种空隙，第一使装药爆炸时膨胀的气体漏掉，换句话说，使爆炸力量减弱；第二使炮弹不能在赋予的方向上正确飞行，结果

发生方向偏差或高低偏差。其次，装药的重量和它在发射时的状况必然是不一样的；炮弹由于其重心与圆心不一致而产生的偏心现象，也引起各种偏差，偏差的大小则决定于发射时重心与圆心的相对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使炮弹虽然看来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飞行，但是产生的结果却不相同。我们已经看到，各国野炮的装药量几乎都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而野炮的长度都是口径的 16—18 倍。在采用这种装药量时，野炮如果进行直射（那时炮身处于水平状态），那末炮弹约在 300 码的距离上落地；如果增大射角，射程可增至 3 000 或 4 000 码。但是距离这样远时，炮弹即失去命中目标的任何可能性，因此野炮的有效射程不超过 1400 码或 1500 码，而且即使在这样的距离上，6 发或 8 发炮弹中也只可能有 1 发命中目标。在用实心弹和爆炸弹射击时，加农炮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距离（即对战斗的结局能起影响的距离）是 600 码到 1100 码；在这样的距离内，命中率的确要大得多。例如，据计算，六磅加农炮对标示步兵营强攻纵队正面的靶子（长 34 码，高 2 码）射击时，在 7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50%，在 9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35%，在 1 1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25%。九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射击效果比较好一些。1850 年在法国进行的试验中，用当时装备的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对长 30 米、高 3 米的靶子（标示骑兵队）射击时，取得了以下成绩：

距离(米)	500	600	700	800	900
命中率 十二磅加农炮·····	64%	54%	43%	37%	32%
八磅加农炮·····	67%	44%	40%	28%	28%

虽然这个靶子比上述靶子高出二分之一，但是射击成绩平均来说低于上述成绩。野战榴弹炮的装药量与炮弹重量的比例，比加

农炮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炮身短(炮身长度是口径的7倍到10倍),而且射击时必须采用大射角。榴弹炮在以大射角进行射击时,如果采用重装药,冲向后方下方的后座力会使炮架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致在几次发射后炮架就会损坏。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多数大陆国家的炮兵中,一门野战榴弹炮有重量不同的几种装药,这样,炮兵就能用不同的装药配合不同的射角来保证向所要求的距离射击。在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地方,例如在英国炮兵中,榴弹炮的射角必然很小,只稍稍大于加农炮的射角;英国二十四磅榴弹炮在采用 $2\frac{1}{2}$ 磅装药和4度射角时,其射表中所标示的射程不超过1050码;九磅加农炮如以这种射角射击,则其射程达1400码。在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中,大多数都采用一种特殊的短管榴弹炮,这种炮可以采用16度到20度的射角,因此与臼炮相似;它的装药量必须小些。这种榴弹炮和普通的长管榴弹炮比较起来,它的优越性在于可以用爆炸弹轰击地窖后面的隐蔽阵地等目标。但是当射击移动的目标,如军队时,这种优越性就值得怀疑了;尽管当平射火力达不到的目标固定不动时,它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至于进行平射,这种短管榴弹炮则因为炮身短(相当于口径的7—16倍)、装药少而完全不适用了。在根据面临的任务(平射或曲射)而以一定的射角射击时,为了达到不同的射程,装药量应当是各不相同的;普鲁士野战炮兵也使用这种短管榴弹炮,它们采用的装药不少于十二种。一般说来,榴弹炮是一种极不完美的火炮,因此愈能早日用效果良好的、发射爆炸弹的野战加农炮来代替就愈好。

在要塞中、在围攻时以及在军舰上使用的重炮,有不同的类型。在最近一次对俄战争以前,围攻时一般不使用比二十四磅加农炮更重的火炮;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少数三十二磅加农炮。但

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起，就不再区分攻城炮和舰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忽然发现重型舰炮在轰击堑壕和土质工事时的作用比一般轻型攻城炮大得多，所以从此以后这种重型舰炮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围攻战中的决定性武器。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往往同一种口径的加农炮有不同的类型，有短管轻炮和长管重炮。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性的意义较小，所以往往为了专门的目的而制造一些长度相当于口径 22—25 倍的火炮，其中有些火炮由于炮身长，射击时竟和步枪一样准确。在这类较好的加农炮中，有一种就是普鲁士的二十四磅青铜炮，它的长度是 10 英尺 4 英寸，即口径的 22 倍，重 60 英担；围攻时没有任何一种加农炮在击毁敌人火炮方面能和它相比。但是，人们认为，火炮长度为口径的 16—20 倍，就完全足以完成大多数的任务了；通常，人们宁愿把火炮口径造大些，而不愿过分提高射击精度，因而，用 60 英担的生铁或铸炮青铜来铸造长度为口径 16—17 倍的三十二磅重炮照例是最合适的。用生铁铸造的长 9 英尺、重 60 英担的新式三十二磅长管炮，是不列颠海军最好的火炮之一，它的长度为口径的 16.5 倍。有一种可旋转的、重 112 英担的六十八磅长管炮 [pivot-gun]，装备在全部的有 131 门火炮的螺旋推进器大型军舰上，它的长度是 10 英尺 10 英寸，即略大于口径的 16 倍；另一种可旋转的、重 98 英担的五十六磅长管炮，长 11 英尺，即为口径的 17.5 倍。直到现在，军舰仍然装备有大量威力较小的火炮，如长度仅为口径 11 倍或 12 倍的、炮筒是旋凿而成的火炮以及长度为口径 7—8 倍的卡伦炮。但是还有另一种海军火炮，它是佩克桑将军在三十五年以前发明的，而且从那时起就具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这种火炮经过了很多改进；目前，法国的

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是与佩克桑设计的火炮最近似的一种，它仍保留着圆柱形药室。而英国海军中，这种炮或者根本没有药室，或者有一个稍小于口径的短截锥形药室；这种火炮的长度是口径的10—13倍，只用来发射空心弹；但是上面提到的六十八磅和五十六磅长管炮，则既可发射实心弹，也可发射爆炸弹。在合众国海军中，达尔格伦上校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这是一种口径很大的短管炮（口径为11英寸或9英寸）；这种炮一部分已用来装备若干艘新式巡航舰。它的优越性尚待在战斗实践中检验，实践会证明，它能否保证大型爆炸弹发挥巨大的威力，而射击精度又不致受到影响；但是为了达到远射程，必然要采用大射角，而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射击精度。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有各种不同的装药，就如同火炮本身有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目标一样。为了在石质工事上打开缺口，要采用最重的装药，有些很重的大口径火炮的重装药量达到炮弹重量的二分之一。但是相当于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装药，一般说来，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围攻目标使用的中等装药，它的重量有时增到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有时则减到炮弹重量的六分之一。在军舰上每种火炮通常有三种装药：大号装药用于对远距离目标和逃敌等射击，中等装药用于海战中对中距离目标进行有效射击，减装药用于接舷战斗和发射链弹。三十二磅长管炮的装药有相当于炮弹重量十六分之五、四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三的三种。对于短管轻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来说，装药和炮弹重量的比例当然还要小些；而且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所使用的空心弹比实心弹轻。除普通加农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外，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还有重榴弹炮和白炮。榴弹炮是一种短管炮，以12度到3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射击，

它固定在炮架上；臼炮则是一种更短的火炮，固定在托架上，通常以 20 度以上的射角，有时甚至以 60 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射击。这两种火炮都是带药室的火炮，就是到在这两种炮上都有一个药室，即用来填放装药的那部分炮膛，其直径小于炮管，即炮膛的主要部分。榴弹炮的口径很少超过 8 英寸，但是臼炮的口径达 13 英寸、15 英寸或更大一些。臼炮发射爆炸弹时，由于装药量少（相当于爆炸弹重量的二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射角大，炮弹在飞行时受到的空气阻力较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抛物线理论就可以用于炮兵射击的计算，而不致同实际结果相差很远。臼炮的爆炸弹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当做燃烧弹使用，即从炮弹的孔眼中喷出火焰使易燃物着火，它还可以靠自身的重量冲破拱形的和其他形式的工事掩盖；在最后这种场合，最好采用大射角，因为这能使炮弹飞得更高，因而在落下时能产生最大的惯力。榴弹炮的爆炸弹首先是用来起侵彻作用，其次是用来起爆炸作用。臼炮由于射角大，炮弹初速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空气阻力不大，它的射程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都要远。由于射击目标通常是整个城市，不要求火炮有很高的射击精度，因此，重臼炮的有效射程有时达到 4 000 码以上；英法的臼炮艇就在这种距离上轰击了斯维阿波尔格。

围攻时各种火炮、炮弹和装药的使用问题，将在有关的条目^①中论述；海军炮兵的使用问题几乎是海军基本战术中有关战斗行动部分的全部内容，因此不属于本条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就野战炮兵的使用和战术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① 见本卷第 349—351 页。——编者注

炮兵没有进行白刃战的武器；它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离进行射击。此外，只有当它占据阵地的时候，才保持着战斗准备；而当火炮架在前车上或连上牵引索转移时，就暂时失去了战斗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三个兵种中，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更大得多的防御特性；它的进攻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进攻本身是一种前进运动，而进攻的最高潮是白刃格斗。因此，在敌人火力下前进、占据阵地以及进行射击准备，对于炮兵来说是危险的时刻。炮兵的展开和射击前的运动应当利用地褶或步兵横队来掩护。所以，炮兵应先配置在与规定占据的阵地相平行的一线上，然后朝着正对敌人的方向进入阵地，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避免遭到敌人的侧射。炮兵阵地的选择，不论从保证炮兵连的射击效果来看，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连的射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自己火炮的配置应当保证使敌人最容易感受到火炮的威力，这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另一项任务则是保证自己不受敌人火力的伤害。良好的阵地应当设置在土质坚硬而又平坦、便于放置车轮和架尾的地方；如果车轮停放不平，火炮就不可能准确地进行射击，同时如果架尾陷入土中，后座力很快就会使炮架损坏。此外，阵地应当有开阔的视界，便于观察敌人占领的地形，并能保证最大的机动自由。最后，阵地前的地形，即炮兵连和敌人之间的地形，应当便于我方火炮射击，而尽可能不利于敌人。坚硬而平坦的地面是最有利的地形，它有利于跳弹作用的发挥，此时射弹即使是近弹，一接触地面也能跳起飞向敌人。不同性质的土壤对于炮兵射击的效果影响之巨大是令人惊讶的。在松软的土壤上，炮弹一触及地面，即使一般地说不会立刻陷入土中，也必定会离开自己的飞行方向，或者开始不规则地跳动。耕地垅沟的方向对于射击，

特别是对于用霰弹或榴霰弹进行的射击，有很大影响；如果垅沟是横的，那末大部分炮弹将陷入土中。如果我方阵地直前是土质松软的波状起伏地形，而再往前靠近敌方阵地是土质坚硬的平坦地形，那末这种地形将有利于我炮兵射击，并保护我方不受敌方火力的杀伤。在5度以上的斜坡向下或向上进行射击，或者从一个山冈的顶部向另一山冈进行射击，是非常不利的射击条件。至于掩蔽自己，不受敌人射击的问题，那末甚至很小的物体也有利于这一点。勉强能掩蔽我方阵地的稀疏的栅栏、树丛或高秆作物，都能妨碍敌人进行正确的瞄准。利用陡峭的小土堤配置火炮，就能够免遭敌方最危险的炮弹的袭击。壕沟能成为很好的胸墙，而起伏不大的地形上的棱线则具有最好的防护作用，我们可以把火炮配置在棱线后面，使敌人只能看到火炮的炮口；如果选择这样的阵地，那末落在阵地前面的每一发炮弹，都将从我方阵地上面高高地跳过。如果在棱线上面为火炮挖掘一个深约2英尺的炮床，并朝反斜面方向开一平坦的进出口，从而保证火炮能控制山冈的整个正斜面，那末这样的阵地就更好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善于特别巧妙地配置自己的火炮，其他各国人就是从法国人那里学会这种技能的。炮兵阵地应当这样选择：对敌人说来，它是敌人侧射和纵射火力达不到的地方，而对己方的军队说来，它不应当造成他们运动的困难。火炮配置成横队时，各门火炮一般相距20码，但是没有必要死守这种练兵场上的规则。当火炮进入阵地时，前车配置在火炮的直后，但是某些国家的军队的弹药车仍留在掩蔽地内。如果弹药车用来载运炮手，那末它也不得不冒险停放在敌人的有效射击范围内。炮兵连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阵地威胁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末炮兵连应当

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们尚未被压制的话），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如果他们已暴露的话）；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炮兵连就应当不顾对我射击的敌人的炮兵，而对向我攻击的敌人射击。对敌人炮兵射击最有效的时机，是在敌人炮兵不能进行还击的时候，也就是在敌人火炮架上前车、正在转移或者正从前车上卸下的时刻。这时进行几次准确的齐射，就能在敌人中间造成极大的混乱。过去曾有一项规则，即炮兵非万不得已不应当接近到距敌人步兵 300 码以内，也就是说不应当接近到步枪的射程以内；现在这一规则很快就要过时了。在现代步枪的射程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野战炮兵在步枪的射击范围以外已经不能顺利地行动，而火炮及其前车、马匹和炮手形成相当大的一个目标，步兵用米涅式步枪或者恩菲耳德式步枪从 600 码的距离上就可以对这个目标进行射击。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谁想活得久一些，谁就去当炮兵，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步兵从远距离进行射击，这在将来显然是对炮兵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而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步兵在距离炮兵阵地 600 码的地方难道还会找不到可靠的掩蔽地吗？

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横队或纵队一向是具有优势的；用霰弹进行几次成功的齐射或者向长纵队发射两三个实心弹，就能大大挫伤敌人的士气。攻击者离炮兵愈近，炮兵的射击就愈有效；即使在最后的时刻，炮兵也能够容易地转移，摆脱如此缓慢前进的敌人，尽管成散兵线 *pas gymnastique*（跑步）进攻的 *chasseurs de Vincennes*（文森猎兵）是否能在火炮架上前车以前追上炮兵，仍然是个问题。

在与骑兵作战时，炮兵沉着应战就能保持优势。如果炮兵在

敌人前进到 100 码以前不射击，然后用霰弹进行准确的齐射，那末当烟尘消散的时候，骑兵离开炮兵还远。在任何情况下，将火炮架上前车并企图退走，是最坏的做法，因为这时骑兵就肯定能截获火炮。

在炮兵对炮兵的战斗中，决定胜败的是：地形特点、火炮的口径、火炮的数量以及双方使用火炮的技能。然而必须指出，虽然大口径火炮在远距离上射击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但是小口径火炮随着距离的缩短，其作用就与大口径火炮逐渐接近，而在近距离上则几乎与大口径火炮的作用相等。在博罗迪诺会战中，拿破仑的炮兵主要是由三磅炮和四磅炮组成的，而俄国人的火炮大部分是十二磅炮，但是法国人的小型火炮却对俄国十二磅炮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炮兵支援步兵或骑兵时，应当始终在他们的翼侧占据阵地。步兵进攻时，炮兵应当以半连或排为单位与散兵线一起前进，有时甚至稍稍在散兵线之前前进；当大群步兵准备刺刀冲锋时，炮兵应立即快步前进到离敌人 400 码的地方，用霰弹进行急促射，为冲锋作准备。如果冲锋被击退，炮兵应对追击的敌人射击，直到不得不退却时为止；如果冲锋成功，那末炮兵的火力就能有力地促成战斗的胜利结束，这时一半火炮继续射击，另一半火炮前进。骑炮兵作为支援骑兵的一个兵种，能够使骑兵具有它原来当然完全没有的那种防御能力；现在，骑炮兵已成为各国最喜用的兵种之一，而且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虽然骑炮兵的任务是在骑兵便于行动的地区和骑兵一起作战，但是，世界上还没有骑炮兵不能跑步通过骑兵所能通过的地形，只不过不能保持队形的整齐一致罢了。各国骑炮兵都是由军队中最勇敢、

最熟练的骑手组成的；在各次大规模演习中，这些骑炮兵神气十足地不顾障碍、炮火以及可能使骑兵受阻的种种情况，勇猛地向前冲去。骑炮兵的战术在于勇敢和沉着。迅速行动、突然出现、急速射击、随时准备转移并在骑兵难以通行的道路上运动，这些都是优秀的骑炮兵的基本素质。骑炮兵由于经常变换位置，所以不必专门去选择阵地；凡是离敌人近而敌人骑兵又不能到达的阵地，都是好阵地；炮兵要在骑兵搏斗的高潮和低潮中随着马群冲上去和退下来，正是在这种时候需要时刻表现出高超的骑术和奋发的精神，在并不是所有骑兵都敢于冒险到达或者愿意跟踪前往的任何地形上，出入于汹涌澎湃的战海之中。

在攻击和防守据点时，炮兵也采用同样的战术。炮兵的主要作用始终是：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成功地击退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炮兵的任务还包括破坏坚固的障碍物，这时，应根据火炮的特点及其作用而使用不同口径和不同种类的火炮：榴弹炮用来烧毁建筑物，重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门、城墙和街垒。

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就各国军队中的师属炮兵来谈的。但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预备队炮兵取得的。预备队炮兵在战斗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配置在后面，在敌人视界和射击范围以外，只是在进行最后突击的关头才调到前面，集中轰击有决定意义的地点。预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里多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较小的地段进行破坏性射击。如果敌人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炮兵进行回击，那末半小时的急速射就解决问题了。在呼啸的弹雨下，敌人的兵力开始削弱，这时新锐的步兵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最后一场激烈而短促的搏斗，并

取得胜利。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就是这样为麦克唐纳的冲锋作好准备的，因而成纵队进攻的3个师还没来得及放一枪或进行白刃格斗，敌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因此，可以认为，只是从这些伟大的日子起才有了野战炮兵的战术。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中旬—
11月26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毕 若²¹⁹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伊斯利公爵——法国元帅;1784年10月生于里摩日,1849年6月10日死于巴黎。1804年他参加法国军队当列兵,1805年战争时期是下士,在普鲁士和在波兰战争时期(1806—1807年)成为少尉,1811年参加列里达、托尔托萨和塔腊果纳围攻战时是少校军衔,在卡塔卢尼亚的奥尔达耳会战²²⁰以后升为中校;在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以后,毕若上校用蹩脚的诗歌颂白百合花²²¹,但是因为他的诗作受到人们很大的鄙视,所以他在百日²²²时期又投奔拿破仑了。拿破仑派他去阿尔卑斯军团领导第十四基干团。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去埃克西迪他父亲的庄园。在昂古列姆公爵干涉西班牙²²³时期,他表示愿为波旁王朝效劳,但因为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所以他就成了自由派,并且参加了最后促成1830年革命的运动。

1831年毕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路易-菲力浦提升为少将。1833年他被任为布累城堡司令,受命监视贝里公爵夫人;但是他执行这项使命所采用的方法使他很不光彩,因此以后他就被人称为“布累城堡的前任狱吏”。1834年1月16日,在众议院进行辩论的时候,拉腊比先生指责苏尔特实行军事独裁,毕若打断他的话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另一个议员杜隆先生嘲弄地问道:“要是

命令他去当狱吏，那怎么办呢？”。这场冲突引起了毕若和杜隆之间的决斗，杜隆在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使巴黎人民极其愤慨，并且由于毕若参加镇压 1834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的巴黎起义²²⁴，这种愤慨情绪就更加强烈了。镇压起义的部队分为三个旅，其中一个旅由毕若指挥。14 日早晨，当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几个还在坚守街垒的热情的起义者却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残杀。虽然这条街不是毕若旅的活动地区，因而他并没有参与这次暴行，但由于人民的痛恨，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个可耻的事件连在一起，并且不管怎样反驳，还是坚决地痛斥他，给他取了“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的绰号。

1836 年 6 月 6 日，毕若将军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令，这个职位几乎不受总督管辖。他在接到同阿布德-艾尔-喀德作战并派出强有力的军队迫使阿布德-艾尔-喀德屈服的命令之后，签订了塔弗纳条约²²⁵，这样一来，他就放过了展开军事行动的机会，使自己的军队在开始行动以前就处于危急状态。在签订这个条约以前，毕若曾进行过几次会战。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秘密条款规定偿付毕若将军 3 万布若（约 12 000 美元）。他被调回法国以后升为中将，并成为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高级将领。塔弗纳条约的秘密条款被人知道以后，路易-菲力浦准许毕若出资建筑几条公用道路，以提高毕若在选民中的声誉和保持他在众议院的席位。

1841 年初，毕若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督：统率了足以执行自己面临的任务的军队，拥有对所属下级将领的绝对的权力，并且长久地担任这个职务，以致可以按照一个需要多年才能实现的计划来进行活动。在伊斯利会战（1844 年 8 月 14 日）中，他

以劣势兵力击溃了摩洛哥皇帝^①的军队，他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地对穆斯林进行了突然的袭击。²²⁶毕若在1843年7月17日，就已获得法国元帅的称号，在这次会战以后，他获得了伊斯利公爵的封号。因为在他回法国以后阿布德-艾尔-喀德重新集结军队，所以他又被派回阿尔及利亚，迅速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因而同基佐发生了分歧²²⁷，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并且按照基佐的说法，他“获得了回到法国和享受荣誉的机会”。

由于基佐的秘密的建议，路易-菲力浦于1848年2月23日夜间接见了毕若，并任命他为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军和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24日早晨，毕若在吕利埃尔、贝多、拉摩里西尔、德·萨尔、圣阿尔诺以及其他将军的陪同下，到土伊勒里宫的总参谋部隆重地接任奈穆尔公爵的最高统帅职位。他对在场的军官们说，他这个将要带领他们去镇压巴黎革命者的人，“无论在战场上或在镇压起义的时候，是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的”，他保证这一次也要迅速除掉“暴民”。然而任命他的消息一传出，情况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国民自卫军对任命他担任最高统帅尤为不满，他们高呼：“打倒毕若！”，“打倒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国民自卫军坚决表示，他们将不服从他的命令。路易-菲力浦被这次示威吓破了胆，只得收回成命，并花了一整天时间进行了没有结果的谈判。2月24日毕若成了路易-菲力浦的顾问中唯一坚持不惜牺牲继续进行斗争的人了；但是国王已经认为，只有牺牲元帅才能同国民自卫军取得和解。因此统帅权转入他人手中，而毕若被免职了。两天以

^① 阿布德-艾尔-拉赫曼。——编者注

后，毕若表示愿为临时政府²²⁸效劳，但是没有被接受。

路易-拿破仑当总统的时候，他任命毕若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毕若同时在下夏朗德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毕若发表过一些主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²²⁹。1852年8月，在阿尔及尔城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另一个纪念碑建立在他出生的城市。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玻利瓦尔-伊-庞特²³⁰

玻利瓦尔-伊-庞特，西蒙——哥伦比亚的“解放者”；1783年7月24日生于加拉加斯，1830年12月17日死于圣马尔塔附近的圣彼德罗。他出身于 familias Mantuanos (曼都亚家族)，这个家族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是委内瑞拉的克里奥洛贵族。按当时美洲有钱人的习惯，他还在14岁的少年时期就被送到了欧洲。他从西班牙移居法国，在巴黎住了几年。1802年他在马德里结婚，随即回到了委内瑞拉，在那里他的妻子患急性疟疾突然死去。在这以后，他再度去欧洲；于1804年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典礼²³¹，又于1805年参加了拿破仑给自己戴上伦巴第的铁制王冠的仪式。1809年玻利瓦尔回到祖国，虽然他的亲戚霍赛·费里克斯·里巴斯再三请他参加1810年4月19日在加拉加斯爆发的革命²³²，但他还是拒绝了。然而在这个事件以后，他接受了去伦敦购买武器和请求不列颠政府保护的委托。他受到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威尔斯里侯爵表面上的殷勤接待，他除了得到许可在现款交易和缴纳高额关税的条件下自由输出武器之外，一无收获。他自伦敦回国以后再度脱离政治，直到1811年9月，他由于当时担任起义部队陆海军总司令的米兰达将军的劝说而接受了司令部中校军衔和委内瑞拉最强固的要塞卡柏略港的要塞司令的职务。

当西班牙战俘（米兰达通常把他们解到卡柏略港，扣押在城砦里）突然袭击武装看守取得胜利，占领了城砦的时候，玻利瓦尔虽然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守备部队和大批的军需仓库，而他的敌人手无寸铁，但是他却不预先通知自己的部队就连夜带了8名军官匆忙搭上军舰，于黎明到达拉瓜拉，随后又到圣马特欧自己的庄园去了。守备部队得悉自己的司令官逃跑以后，就秩序井然地撤离了要塞，而这个要塞立即被蒙特威尔德指挥的西班牙军队占领。这一事件造成有利于西班牙人的形势，迫使米兰达按照议会的委托于1812年7月26日在维多利亚签订条约，委内瑞拉因此重新受西班牙统治。米兰达于7月30日到达拉瓜拉，打算在那里搭乘英国军舰。他在访问该城要塞司令曼努埃尔·马利阿·卡萨斯上校的时候，碰到一伙人，其中有唐·米格尔·佩尼亚和西蒙·玻利瓦尔；他们劝他至少在卡萨斯上校家里过一夜。翌晨2时，正当米兰达酣睡的时候，卡萨斯、佩尼亚和玻利瓦尔领了四名武装士兵走进他的房间，先夺取了他的佩剑和手枪，然后叫醒他，粗暴地命令他起床穿衣，给他带上镣铐，最后把他交给了蒙特威尔德，蒙特威尔德把他押到加迪斯，他在那里被囚禁了几年以后死于监狱。以米兰达在维多利亚投降敌人、背叛国家为借口而采取的这一行动使玻利瓦尔获得了蒙特威尔德的特别欢心，因此当玻利瓦尔请他签发护照的时候，蒙特威尔德说过：“玻利瓦尔上校的请求应予满足，以答谢他交出米兰达，为西班牙国王效劳”²³³。

因此，玻利瓦尔获准去库拉索，他在那里住了6星期，然后同自己的亲戚里巴斯一起从那里前往卡特黑纳小共和国。在他们到达以前，过去受米兰达将军指挥的大量士兵就已逃到了这里。里巴斯建议他们远征委内瑞拉去讨伐西班牙人并承认玻利瓦尔为他

们的总司令。他们非常兴奋地接受了前一建议，而反对后一建议，最后还是同意了，但必须由里巴斯担任副司令。因此应募加入玻利瓦尔队伍的士兵有 300 人，卡塔黑纳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托里塞斯也将他的亲戚曼努埃尔·卡斯提耳奥指挥的 500 人并了进去。远征军于 1813 年 1 月初出发。由于玻利瓦尔和卡斯提耳奥因争夺最高指挥权而闹意见，卡斯提耳奥突然带领自己的格拉纳达人离开了。玻利瓦尔也提出要仿效卡斯提耳奥，回到卡塔黑纳去，但是里巴斯终于说服他至少继续进军到波哥大，因为新格拉纳达议会当时正在那里开会。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得到了种种支援；他们两人被议会擢升为将军；他们把自己的这支小军队分为两路，按不同的路线向加拉加斯进发。他们愈向前推进，他们的力量也愈增强；西班牙人残暴的破坏行为到处起了替争取独立的军队招募新兵的作用。西班牙人的抵抗力量已经被摧毁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四分之三的士兵由当地居民组成，这些士兵在每次小战斗中都投到敌人那边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像提斯卡尔、卡希加尔和菲埃罗这样一些将领胆小怕死，他们每次战斗都离开自己的部队。因此，一个不识字的少年圣地亚哥·马里尼约，才能够在玻利瓦尔向西部各省推进的时候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库马纳省和巴塞洛纳省。里巴斯的那一路部队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唯一的一次顽强抵抗，但里巴斯在洛斯-塔古阿涅斯击溃了蒙特威尔德将军，迫使他率领残部困守在卡柏略港。

加拉加斯总督菲埃罗将军听到玻利瓦尔逼近的消息以后，派了代表去向他提出签订投降协定，协定在维多利亚签订；但是张皇失措的菲埃罗没有等到自己的代表回来，就在夜间偷偷逃跑了，留下 1 500 多名西班牙士兵听凭敌人处置。这时公众为玻利瓦尔

举行了凯旋式。玻利瓦尔站在凯旋车上，凯旋车由加拉加斯名门望族的12名年轻妇女牵拉，她们穿着配上国旗颜色的白衣服，玻利瓦尔没戴帽子，身穿礼服，手拿小杖，从城门到他府邸化了半个小时左右。他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者”，——而马里尼约接受了“东部各省执政者”的封号，——他制定了“解放者勋章”，建立了一支称之为警卫军的精锐部队，他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但是他像大多数自己的同胞一样，不能长期努力奋斗，他的独裁不久就变成了军事无政府状态；他把最重要的事务托付给亲信，可是他们滥用国家的钱，后来为了抵抵这笔钱，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因此，人民原先的热情很快就变成了不满，而敌人的分散的兵力又有了重新集结的可能。1813年8月初，蒙特威尔德困守卡柏略港要塞，西班牙军队手中只剩下委内瑞拉西北部的小块领土，从那时起仅仅过了三个月，在12月解放者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威信，连加拉加斯本身也因邻近突然出现由博韦斯指挥的进展顺利的西班牙军队而受到威胁。玻利瓦尔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于1814年1月1日召集了由加拉加斯最有势力的居民组成的洪达，并宣称他再也不愿担负执政者的重担了。但是胡尔塔多·孟多萨在长篇演说中却坚决主张，

“在新格拉纳达议会召开和委内瑞拉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领导以前，必须仍旧由玻利瓦尔将军掌握最高权力”²³⁴。

这个建议被通过了，独裁从而取得了一种似乎合法的批准。

在一个时期里，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带有小战斗的性质，双方都不占绝对优势。1814年6月，博韦斯率领自己全部兵力从卡拉博索开往拉普厄尔塔，而玻利瓦尔和马里尼约这两个执政者的部队已经在那里会合了；博韦斯同他们遭遇，就命令自己的部队立

刻向他们进攻。玻利瓦尔略作抵抗以后，就逃到加拉加斯去了，而马里尼约朝着库马纳方向逃之夭夭。卡柏略港和瓦伦西亚落入博韦斯手中，他随即把军队分成两路（其中一路由冈萨勒斯上校指挥），向加拉加斯推进。里巴斯企图阻止冈萨勒斯的进攻，但没有成功。1814年7月17日，加拉加斯向冈萨勒斯投降，这时玻利瓦尔撤出拉瓜拉，他命令停泊在该城港湾的军舰驶往库马纳，并率领自己的残部向巴塞洛纳退却。1814年8月8日，博韦斯击败了阿尔圭塔的起义者，玻利瓦尔就在当天夜间偷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绕道赶往库马纳，在那里他不顾里巴斯的愤怒的抗议，立即偕同马里尼约以及其他几个军官一起搭乘“比安基号”军舰离去。如果里巴斯、帕埃斯和其他将领也追随执政者逃跑的话，那末一切都完了。他们到达马加里塔岛的胡安格里耶哥，阿里斯门迪将军把他们当做逃兵对待，命令他们离境，他们就前往卡鲁帕诺，但在那里也受到贝尔穆德斯上校同样的对待，因而又转程去カタ黑纳。在这里，他们为了冲淡逃跑所造成的印象，发表了措词冠冕堂皇的表白性的文告。

玻利瓦尔由于参与为推翻カタ黑纳政府而策划的密谋活动，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共和国，转到通哈，新格拉纳达联邦共和国²³⁵的议会正在那里举行会议。这时孔迪纳马卡省领导了一些不承认格拉纳达联邦条约的独立省份，而基多、帕斯托、圣马尔塔和其他一些省还处于西班牙人统治之下。玻利瓦尔于1814年11月22日到达通哈，被议会任命为联邦军队的总司令，并接受了两重任务——先迫使孔迪纳马卡省的主席承认议会的权力，然后向还控制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新格拉纳达唯一设防海港圣马尔塔进发。前一任务毫不费力地完成了，因为这个表示不满的省份的首府波哥大

是没有防御的城市。尽管波哥大已经投降，玻利瓦尔仍然允许自己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 48 小时。在圣马尔塔，西班牙的蒙塔尔沃将军只有一支不到 200 人的弱小守军和一个防御工事极为薄弱的要塞，他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逃跑，已经租定了一艘法国船；而该城居民通知玻利瓦尔说，在他来到的时候，他们将打开城门，并赶走守军。但是玻利瓦尔没有按照议会对他的指示去进攻盘据在圣马尔塔的西班牙军队，却在敌视卡特黑纳城防司令卡斯提耳奥这种感情支配下，擅自率领部队去进攻这个业已加入联邦共和国的城市。他被击退后就在拉波帕——大约位于卡特黑纳火炮射程以内的一个大山冈——扎了营，并安下仅有的一门小火炮作为对付拥有大约 80 门火炮的要塞的炮台。然后他由围攻转为封锁，封锁一直持续到 5 月初，除了他自己的军队因逃跑和患病而由 2400 人大概减少到 700 人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莫里耳奥将军指挥的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远征军于 1815 年 3 月 25 日从加迪斯到达马加里塔岛；远征军向圣马尔塔增派了大批援军，然后立即占领卡特黑纳。但在这以前，玻利瓦尔于 1815 年 5 月 10 日已在大约 12 名军官的伴随下乘了英国军用两桅横帆船前往牙买加。到达这个安全地点以后，他又发表了文告，说自己被某一秘密敌人或集团所陷害，并为自己在西班牙军队迫近时逃跑辩护，把自己说成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宁才放弃指挥的。

在玻利瓦尔逗留在京斯敦的 8 个月中，被他抛弃在委内瑞拉的将领以及马加里塔岛的阿里斯门迪将军都对西班牙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里巴斯（玻利瓦尔依仗他才博得声誉）在马士临失陷后被西班牙人枪决了，接替他上台的是另一位具有更大才能的人，这个人因为是外国人，在南美革命中不能起独立自主

的作用，所以他最后决定在玻利瓦尔领导下进行活动。这个人就是路易·布里昂。他为了援助革命者，乘了二十四炮式的轻巡航舰从伦敦驶往卡塔黑纳，这艘军舰大部分是由他自己出资装备的，舰上载运了 14000 套武器和大量军用物资。因为他来得太迟了，对这个地区的起义者已经用不上了，所以他就从这里驶往海地²³⁶的凯斯，因为在卡塔黑纳投降以后许多流亡的爱国者已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同时玻利瓦尔也从京斯敦前往太子港，在太子港，海地总统佩蒂昂为了响应他提出的解放奴隶的诺言，表示愿意给予他一切物质的支援，以便他重新组织远征军去讨伐在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人。他在凯斯遇见了布里昂和其他流亡者，在全体大会上，他提议让他担任新的远征军司令官，条件是在共同的议会召开以前，民政权和军权统一归他掌握。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条件，1816 年 4 月 16 日远征军出发了，以玻利瓦尔为司令官，布里昂为海军司令。在马加里塔岛，玻利瓦尔把当地部队指挥官阿里斯门迪收到了自己这方面来，阿里斯门迪已经使西班牙人在岛上只占有一个据点，即潘帕塔尔。阿里斯门迪取得了玻利瓦尔的正式诺言：他一控制国家，就在委内瑞拉召开国民议会，因此阿里斯门迪在拉-维利亚-德尔-诺尔特城的教堂里召开了洪达，公开宣布玻利瓦尔为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共和国总司令。1816 年 5 月 31 日，玻利瓦尔在卡鲁帕诺登陆，但是他没有坚决阻止马里尼约和皮阿尔离开他，让他们自担风险地去攻打库马纳。他因这次分离而削弱，便按照布里昂的劝告，开往奥库马雷，他率领 13 艘舰船（其中只有 7 艘是武装的）于 1816 年 7 月 3 日抵达该地。他的军队共 650 人，由于招募了他已宣布解放的黑人，大约增加到 800 人。在奥库马雷，他又发表文告，提出“消灭暴君”和“把人民召集起来，

由人民委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的诺言。当他向巴伦西亚推进的时候，他在离奥库马雷不远的地方，遭遇了率领一支约 200 名士兵和 100 名民团的队伍的西班牙莫拉勒斯将军。当莫拉勒斯的猎兵驱散了他的先头部队的时候，据一个目击者说，他失去了

“任何一点镇静；一句话不讲，就迅速掉转马头，向奥库马雷飞奔而去，经过村庄，到了邻近的港湾，跳下马，坐上小船，再登上‘迪安努号’军舰，并命令整个分舰队跟随他去博内尔小岛，而把自己的战友全都丢下不管了”²³⁷。

他在布里昂的指责和规劝的影响下，又去联合库马纳沿海地区的其他指挥官了，但是遭到他们的严厉对待，而且皮阿尔威肋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逃兵和胆小鬼论罪，因此他又立即前往凯斯。布里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大部分感到必须有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中心的委内瑞拉军事长官重新承认玻利瓦尔为总司令，但他必须召开议会和不干预民政管理。1816 年 12 月 31 日，他带了佩蒂昂提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到达巴塞洛纳。1817 年 1 月 2 日，阿里斯门迪投奔了他，1 月 4 日，他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并把全部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过了五天，阿里斯门迪中了西班牙人的埋伏，这位执政者就逃回了巴塞洛纳。部队重新在巴塞洛纳集合，布里昂还给玻利瓦尔调来了火炮和增援部队，因此他又立即建立了一支 1 100 人的新队伍。4 月 5 日，西班牙人占领巴塞洛纳城，爱国者的部队退到巴塞洛纳城外的养老院大楼，该建筑物按照玻利瓦尔的命令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是它不能在猛攻情况下用来掩护 1 000 人的守军。4 月 5 日夜間，他离开部队，把指挥权交给了弗莱特斯上校并告诉他说，他出去寻找新的部队，很快就回来。弗莱特斯相信了他的话，拒绝了劝降，因此在敌人强攻以后，他和全体守军都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屠杀。

皮阿尔是有色人，生于库拉索，他企图征服并征服了圭亚那，而布里昂海军司令用他的炮艇来支持了他的这一行动。7月20日，在西班牙人退出圭亚那全省以后，皮阿尔、布里昂、塞亚、马里尼约、阿里斯门迪等人在安哥斯土拉召开了省议会，推举三执政来领导政府；布里昂憎恨皮阿尔，他特别关心玻利瓦尔的成就，并为此花了大笔私产，力求使玻利瓦尔（虽然他不在）被任命为三执政的成员。玻利瓦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离开了躲避的地方，来到安哥斯土拉，在那里他受到布里昂的鼓励，解散了省议会和三执政，用他本人领导的“国家最高委员会”来代替它们，而布里昂和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分别成为军事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人。然而，曾经威胁要把玻利瓦尔送交军事法庭以逃兵论罪的圭亚那的征服者皮阿尔百般讽刺“退却的拿破仑”。因此，玻利瓦尔想除掉他。根据捏造的所谓皮阿尔阴谋反对白人、企图杀害玻利瓦尔、夺取最高权力的罪名，皮阿尔便受到布里昂主持的军事法庭的审讯，定了罪，判处死刑，并于1817年10月16日枪决。他的死使马里尼约胆战心寒。马里尼约完全知道，没有皮阿尔，自己就微不足道，他在一封用奴颜婢膝的口吻写的信里公开诽谤自己被害的朋友，否定了自己同解放者竞争的做法，祈求玻利瓦尔宽宏大量，对他开恩。

皮阿尔征服圭亚那，使情况起了有利于爱国者的根本变化；仅仅这一个省给他们提供的资源就比委内瑞拉所有其他七省的总和还要多。因此人们普遍地期望，玻利瓦尔以新文告宣布进行的新战争能把西班牙人彻底赶走。第一份公报把几支退出卡拉博索的西班牙马林采购兵的小队伍，渲染为“一见我们常胜军就逃跑的军队”，不言而喻，这是为了不使人们的希望落空。玻利瓦尔有9

000多人，他们的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并得到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大量供应，而他们的对手西班牙军队大约只有4000人，而且莫里耳奥还没有来得及把他们集中起来。可是在1818年5月底以前，玻利瓦尔却打了大约十二次败仗，俄利诺科以北的所有省全被丢失。因为他分散了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所以他的部队往往被各个击破。他让帕埃斯和其他的部下去作战，而自己溜到安哥斯土拉去了。接连不断的丧师失地，看来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各种有利情况的凑合，使形势再次起了变化。玻利瓦尔在安哥斯土拉遇到新格拉纳达人桑坦德，他请求玻利瓦尔帮助他攻入该地，因当地居民已经准备好了反西班牙人的总起义，玻利瓦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请求。当时英国提供了人力、船舶和军用物资等大量的援助，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军官也从四面八方涌向安哥斯土拉。最后，曾因南美革命遭到挫折而失望的赫尔曼·罗西奥博士也出现了；他对玻利瓦尔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于1819年2月15日召开国民议会，仅国民议会的名义就成了建立一支14000人左右的新军队的极有力工具，这样，玻利瓦尔才得以恢复进攻行动。

外国军官们向玻利瓦尔提出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必须假装打算进攻加拉加斯并要把委内瑞拉从西班牙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迫使莫里耳奥削减他在新格拉纳达的兵力，把兵力集中去防守委内瑞拉，而他（玻利瓦尔）应趁这个时机突然转向西面同桑坦德的游击队会合，进军波哥大。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玻利瓦尔于1819年2月24日离开安哥斯土拉，任命塞亚在他不在期间为议会的议长和共和国的副总统。由于帕埃斯的机动，莫里耳奥和拉·托雷在阿查古阿斯被击溃，如果当时玻利瓦尔能使自己

的部队同帕埃斯和马里尼约的队伍会师的话，那末他们就会被完全消灭。不管怎样，由于帕埃斯的胜利才占领了巴里马省，这就为玻利瓦尔打开通向新格拉纳达的道路。当桑坦德在这里把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主要由英国人组成的外籍军队以7月1日、23日和8月7日在通哈省取得的一系列胜利²³⁸决定了新格拉纳达的命运。8月12日，玻利瓦尔胜利进入波哥大，而西班牙人由于格拉纳达的所有省都举行起义，而不得不困守在设防城市莫姆波斯。

玻利瓦尔在波哥大组织格拉纳达议会，并任命桑坦德将军为总司令之后，前往潘普洛纳，在那里，他在宴会和舞会中消度了约两个月。11月3日他到达委内瑞拉的蒙特卡耳，命令当地具有爱国心的军事长官和他们的部队集结起来。这时他掌握约200万美元的款项（这是通过强制性的军税从新格拉纳达居民征收来的），拥有一支人数约9000名的整装待发的军队（这支军队三分之一由纪律非常严明的英国、爱尔兰、汉诺威和其他外籍军队组成），而他面前的敌人则已丧失了一切手段，名义上的兵力也只有约45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西班牙人所不能信赖当地居民。由于莫里耳奥从阿普雷河岸的圣费南多撤到圣卡洛斯，玻利瓦尔一直追击到卡拉博索，这样敌对双方的大本营相距只有两天的行程。如果玻利瓦尔勇敢地向前推进，那末单靠他的欧洲部队也可以粉碎西班牙军队，但是他宁愿把战争再拖延五年。

1819年10月，安哥斯土拉的议会迫使他的代理人塞亚辞职，选出阿里斯门迪接替他。玻利瓦尔得到消息以后，突然把自己的外籍军团派到安哥斯土拉，使阿里斯门迪措手不及（他只有600名当地居民组成的士兵），把阿里斯门迪赶到马加里塔岛，使塞亚恢复了原职。经过罗西奥博士（以中央集权的前景吸引了玻利瓦

尔)的说服,他宣告成立了包括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共和国”,颁布了由罗西奥本人起草的新国家的根本法,并同意成立两个地区的共同的议会。1820年1月20日玻利瓦尔重新回到阿普雷河岸圣费南多。西班牙人害怕外籍军团更甚于害怕十倍数量的哥伦比亚人,玻利瓦尔突然撤走外籍军团,就使莫里耳奥重新有可能集结增援部队,而且在这个时候有消息说,西班牙准备派出一支由奥当奈尔指挥的大规模的远征军,这一消息提高了西班牙部队已经低落的士气。玻利瓦尔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是在1820年的战争期间竟毫无进展。就在那个时候,从欧洲传来消息说,累翁岛的革命²³⁹以暴力制止了原定的奥当奈尔指挥的远征。在新格拉纳达,22个省中有15个加入了哥伦比亚政府,控制在西班牙人手里的只有卡特黑纳要塞和巴拿马地峡。在委内瑞拉,8个省中有6个服从哥伦比亚的法律。在这样的形势下,玻利瓦尔却接受了莫里耳奥所诱使的谈判,结果于1820年11月25日在特鲁希约签订了为期6个月的休战协定。在休战协定中甚至不提哥伦比亚共和国,虽然议会已经明确规定,西班牙司令官不先承认共和国的独立,就不准同他们签订任何条约。

莫里耳奥因急于参预西班牙的事务,于12月17日乘军舰去卡柏略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米格尔·德·拉·托雷,而玻利瓦尔于1821年3月10日写信通知拉·托雷说,30天过后,就要恢复军事行动。西班牙人在卡拉博博(这个村镇大概位于从圣卡洛斯到巴伦西西的中途)占据了坚强的阵地;但是拉·托雷没有在这里集合他的全部兵力,而只集中了第一师,即2500名步兵和1500名左右的骑兵,然而玻利瓦尔拥有6000名步兵(包括不列颠军团1100人在内)和帕埃斯指挥的3000名草原牧民²⁴⁰所组成的

骑兵。玻利瓦尔非常害怕敌人的阵地，因此他向军事会议建议签订新的休战协定，但是被他的部下拒绝。帕埃斯指挥主要由不列颠军团组成的纵队，沿着小路迂回敌军右翼；在他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机动之后，拉·托雷在西班牙人中第一个逃跑了，一直逃到卡柏略港，他和残余部队一起在那里困守。如果胜利的军队当时迅速逼近，那末卡柏略港的要塞本身也势必投降，但是玻利瓦尔由于在巴伦西亚和加拉加斯举行人民晋谒盛典而丧失了时机。1821年9月21日，坚固的卡塔黑纳要塞向桑坦德投降了。委内瑞拉的最后战绩——1823年8月的马拉开波海战和1824年7月的卡柏略港的被迫投降，都是帕迪利亚的功劳。阻止了奥当奈尔出发远征的累翁岛革命和不列颠军团的援助显然保障了哥伦比亚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哥伦比亚议会于1821年1月在库库塔召开会议；议会于8月30日颁布了新宪法，而在玻利瓦尔再次假装辞职之后，又恢复了他的全权。玻利瓦尔签署了新宪法，并获准向基多省进军（1822年），而西班牙人由于普遍的人民起义²⁴¹而被赶出巴拿马地峡以后就撤退到该省。这次战争以基多、帕斯托和瓜阿基尔归并哥伦比亚而告终，在这次战争中名义上由玻利瓦尔和苏克莱将军领导，但是，远征部队所以能取得不多的胜利，还全应归功于包括桑兹上校在内的英国军官。在1823—1824年同上秘鲁和下秘鲁的西班牙人作战^①期间，玻利瓦尔就已认为不需要再充当统帅了，就把整个军事领导权授与苏克莱将军，而自己仅限于参加凯旋的入城式、发表宣言和宣布宪法。他依靠他的哥伦比亚禁卫军，对利马议会的

①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表决施加影响，利马议会于 1823 年 2 月 10 日委任他为执政者，而他又提出辞职声明以便使自己重新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同时，由于英国正式承认新国家和苏克莱将军占领上秘鲁各省（苏克莱把这些省合并成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玻利瓦尔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玻利瓦尔在苏克莱武力控制的这个地区充分发展了他对专制统治的喜爱，例如他模仿 Code Napoléon²⁴²而制定了“玻利维亚法典”。他打算推广这个法典，使它从玻利维亚传到秘鲁，再从秘鲁传到哥伦比亚，同时他利用哥伦比亚军队控制前两个国家，而利用外籍军团和秘鲁士兵控制哥伦比亚。他凭借武力和阴谋确实把自己的法典强加给了秘鲁，至少有几个星期。他，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玻利维亚的教父，这时已经到达了荣誉的最高峰。但是在哥伦比亚，中央集权派，即玻利瓦尔派同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反对者和玻利瓦尔的军事对手联合组成的联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玻利瓦尔的教唆下，哥伦比亚议会提出了对委内瑞拉副总统帕埃斯的控诉书。在这以后，帕埃斯就公开叛乱，而这个叛乱是得到玻利瓦尔本人秘密的支持和鼓励的，因为他需要利用暴动来作为撕毁宪法和重新获得独裁权力的借口。玻利瓦尔从秘鲁回来，除了自己的禁卫军以外，还带来了 1 800 名秘鲁兵，似乎是要镇压联邦派的叛乱。但是，他在卡帕略港同帕埃斯会了面，他不仅批准帕埃斯继续留在委内瑞拉的指挥岗位上，对所有的叛乱分子宣布特赦，而且还公开站在他们这一边，谴责宪法拥护者；根据 1826 年 11 月 23 日在波哥大颁布的法令，他掌握了独裁全权。

从 1826 年起他的统治开始衰落，这一年他争取到召开巴拿马会聚²⁴³，会议在名义上是为了制定国际法的新的民主准则而召开

的。哥伦比亚、巴西、拉普拉塔、玻利维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等的代表都到会了。实际上，玻利瓦尔竭力想使整个南美洲变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并打算由自己担任共和国的执政者。正当他还充满幻想，要使整个半球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实际统治权却很快就从他的手中滑脱了。在秘鲁的哥伦比亚军队得知他准备实施玻利维亚法典之后就开始起义。秘鲁人选出拉·马尔将军为共和国总统，并援助玻利维亚人把哥伦比亚军队赶走，甚至对哥伦比亚进行了胜利的战争，结果签订了条约，规定哥伦比亚回到原先的疆界，建立两国平等关系和分开两国的国债。玻利瓦尔为了修改宪法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而在奥康尼亚召开了议会，议会于1828年3月2日开幕，会上宣读了一个长篇报告，报告中证明政府迫切需要新的特权。但是，当大家清楚地看出，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后必将同它原来的面目完全不一样的时候，玻利瓦尔的朋友们就不再出席会议，使议会得不到法定人数，从而迫使议会停止了活动。玻利瓦尔去到离奥康尼亚有几英里远的他的庄园，发布了另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对他的朋友们的做法佯装不满，同时攻击议会，号召各省采取非常措施，并宣称他愿意接受将加在他身上的任何一种权力重担。在他的武力胁迫下，加拉加斯、卡塔黑纳以及他当时去到那里的波哥大等地的国民大会再一次授与他独裁统治权。在波哥大，他在卧室里遇刺，幸亏他在黑暗中从阳台跳下，躺在桥下隐藏才脱了险，这一事件促使他在短期内实行类似军事恐怖的措施。虽然桑坦德参加了这次阴谋，但是玻利瓦尔没有触犯他，却把帕迪利亚将军判处死刑，帕迪利亚的罪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但他是一个有色人，不能为自己申辩。

由于1829年激烈的派系斗争震撼了共和国，玻利瓦尔再次在

告公民书中，要求他们坦率表明对宪法应当如何修改的意见。加拉加斯的名流会议对此的回答是，谴责他贪图功名，揭露他行政管理上的弊病，并宣布委内瑞拉脱离哥伦比亚，推举帕埃斯领导共和国。哥伦比亚的参议院支持玻利瓦尔，但是各地再次爆发了起义。他于1830年1月第五次引退，随后又担任总统，并离开波哥大，用哥伦比亚议会的名义去讨伐帕埃斯。1830年3月底，他率领8000人开始进攻，占领了爆发起义的卡拉库塔，然后向马拉开波省进攻，帕埃斯带了12000人在该地严阵以待。他一知道帕埃斯打算同他认真较量，他就失去了勇气。他一度甚至想向帕埃斯屈服并宣布自己反对议会；然而这时他的拥护者在议会中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影响，他也就不得不辞职，而且人们向他示意，这一次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辞职，如果同意出国，可以得到年金。因此他于1830年4月27日向议会递交了卸去全权的声明书。但是玻利瓦尔指望依靠他的拥护者的影响重新恢复权力，并利用哥伦比亚新总统华金·莫斯克腊所遭到的反对，尽量拖延自己离开波哥大的日子，并且在种种借口下把自己停留在圣彼德罗的时期延长到1830年年底，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死了。

杜库德雷-霍尔施坦对玻利瓦尔作了如下的刻划：

“西蒙·玻利瓦尔身高5英尺4英寸；长圆脸，两腮凹陷，皮肤黝黑而发青。有一双不大不小的深陷的眼睛，头发稀少。鬍子使他显得阴沉和粗野，特别在他激动的时候。他的体格瘦弱。从他外貌上看有65岁。他在走路的时候老是摆动双手。不能走很多路，极易疲倦。他喜欢在吊床上坐着或躺着。他常常勃然大怒，这时他就马上失去理智，跳上自己的吊床，咒骂周围一切人。他以刻薄地嘲笑不在场的人为乐事；他只阅读轻松的法国小说；他是个勇敢的骑手，酷爱华尔兹舞。他非常欣赏自己的演说，喜欢举杯致词。他在倒霉的时候，或者在他急需别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一点也不激动，也不冒火。他变得温和、有耐性、随和、甚至是驯服的人了。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缺点，装

作是受过所谓 *beau monde* (上流社会) 教养的彬彬有礼的人, 他几乎具有亚洲人的装模作样的才能, 他比他的大多数的同胞都更了解人的本性。”²⁴⁴

根据新格拉纳达议会的法令, 玻利瓦尔的遗体于 1842 年运送到加拉加斯, 在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见“玻利瓦尔的生平。杜库德雷-霍尔斯坦将军著, 并由阿尔丰斯·维奥累续写到玻利瓦尔逝世”(1831 年巴黎版); “约翰·密勒将军 (曾在秘鲁共和国的军队中供职) 回忆录”; 希皮斯利上校的“俄利诺科游记”(1819 年伦敦版)²⁴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战 局

战局——这一术语往往是指战争时期在一年内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这些军事行动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战区内的进行的，那末把它们看做一个战局就未必合乎逻辑了。例如，人们不按照这个词的严格含义而称为 1800 年战局的，却是两个毫不相关的独立的战局：意大利（马连峨）战局和德国（霍根林登）战局²⁴⁶。另一方面，自从各国军队几乎都不再调回冬季营地以来，年终就不一定是一系列明显相关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和另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开始的界限了。现在，在战争中有许多其他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比季节的变换所起的作用更重要得多。譬如，1800 年的两个战局都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这是因为 7 月到 9 月的全面停战的缘故，而且德国战局虽然在 1800 年 12 月结束了，但是，意大利战局到 1801 年 1 月整个上半月还在继续着。克劳塞维茨正确地指出，1812 年战局显然不是在该年的 12 月 31 日结束的，因为当时法军还在尼门河地区，他们正处于退却高潮。这个战局只是在 1813 年 2 月法军渡过易北河，在那里重新积聚兵力时才结束的，因为把他们赶回本土的军队这时已停止行动²⁴⁷。然而，在我们居住的纬度地带，冬季终究仍是作战军队因疲惫和艰困而力量特别薄弱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往往正是双方休战和养精蓄锐的时期。战

局这个词，虽然就严格的含义来说是指根据一个战略计划、为达到一个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在多数场合也不妨以其中主要的战斗行动发生的年代来命名。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CAPTAIN

Captain——步兵连、骑兵连或骑兵半连的指挥官以及军舰指挥官的军衔。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captain 属于尉官一级；在英国军队中，captain 是介乎校官和尉官之间一级的军官，因为在英国，列入尉官这一级的仅仅是那些具有军官毕业证书、但按其军衔并不履行直接的和固定的指挥职权的人。在美国军队中，captain 负责本连的武器、弹药、军服等。在海军中 captain 的职责非常广泛，并且他的职位是最负责的职位之一。在英国海军中，captain 按军衔来说相当于陆军中的中校，他获得这个军衔以后经过三年就相当于陆军中的上校。在旧时法国海军中，captain 是不准离开自己军舰的，违者处以死刑，因此他宁愿把军舰炸毁也不使它落入敌手。称 captain 的还有商船船长、客船船长和战列舰的各种海军军士长，例如：captain of the forecastle（前甲板军士长）、captain of the hold（舱段军士长）、captain of the main and fore tops（中下桅楼楼长）等。《Captain》一词源出于意大利文^①，

^① 意大利文是《capitano》。——编者注

意即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因此这个词经常被用作“总司令”的同义词，特别是指他作为统帅的才能而言。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马枪²⁴⁸

马枪(carabine 或 carbine)——骑兵使用的一种短管枪。为了便于在马鞍上装弹,它的枪管的长度不应超过 2 英尺 6 英寸(只要它不是后装的);为了便于单手使用它,它必须比步兵用的枪轻。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马枪的口径也比步兵用的火器的口径略小。马枪可以分为滑膛的和线膛的两种;在前一种情况下,它的射击效果比普通枪低得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按平均距离上的射击精度来说,马枪超过普通枪。在英国军队中,骑兵装备滑膛马枪;在俄国骑兵中,全部轻骑兵装备线膛马枪,而胸甲骑兵只有四分之一使用线膛马枪,其余四分之三使用滑膛马枪。在某些国家的军队(特别是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中,炮兵也使用马枪;在英国,马枪是按恩菲耳德新式步枪²⁴⁹的原理制造的。有一个时期,马枪射击曾是骑兵战斗的主要形式,但现在,马枪主要在执行警戒勤务和骑兵对射时使用。在法国的军事著作中,《carabine》一词总是指步兵用的线膛枪,而以《mousqueton》(“短火枪”)这个词表示骑兵用的马枪。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卡伦炮

卡伦炮——短管铁炮，最初于 1779 年在卡伦（苏格兰）是为了供应英国舰队而铸造的，在对美战争²⁵⁰中第一次使用。卡伦炮没有耳轴，依靠炮身中部下面的卡箍安装在炮架上。炮膛有药室，炮口像碗口那样大。这种炮很短、很轻便：每 60—70 磅重的炮使用 1 磅重的实心弹，它的长度相当于口径的 7—8 倍。因而装药不是少量的，只占实心弹的重量十六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卡伦炮在最初采用的时候，极受水兵欢迎。它的重量轻，后座小，在当时的小型军舰上能大量装置。卡伦炮射程比较远的原因是：（1）炮弹在炮膛中的间隙小，（2）由于炮尾的金属厚和炮身短，炮膛的轴线和瞄准线之间的角度大；卡伦炮发射的炮弹重量大，所以它在近距离上是一种威胁性极大的武器。美国舰队于 1800 年左右使用卡伦炮。但很快就查明，这种型式的炮比不上使用全装药和按小射角进行射击的、炮管更长的重炮。例如，已经查明，英国军队的普通长管炮在按 2 度射角（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则按 3 度射角）进行射击时，同相应口径的卡伦炮在按 5 度射角进行射击时，它们的射程是一样的（即 1 200 码左右）。因为射角大，命中率就小，所以卡伦炮按 5 度射角进行射击，射程决不可能超出 1 200 码，而长管炮最有效的火力则可达到 1 英里，甚至

2 000 码。例如 1812—1814 年英美战争²⁵¹时期，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两支敌对的分舰队的行动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美国舰船装备长管炮，而英国舰船主要装备卡伦炮。美国人在英国卡伦炮的火力范围以外进行机动，他们又用长管炮射击，使敌舰舰体和索具遭到严重的损毁。由于卡伦炮有这些缺点，现在不再使用它了。在陆地上英国人有时把卡伦炮安置在棱堡的侧面和穹窿里，因为只要利用一小段壕沟就可以从那里进行侧射，而且大部分采用霰弹。法国军舰采用带有耳轴的卡伦炮（carronade á tourillons）；但这在实质上已是大威力火炮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霰弹²⁵²

霰弹(case shot或canister shot)——装入圆柱形白铁弹壳中的一系列由锻铁制成的球形弹丸。供野炮使用的弹丸通常是一层一层地装的,但大多数攻城炮和海军炮使用的弹丸只是倒入圆筒,装满以后把盖板焊接上。在圆筒底部和装药之间插放木弹座。弹丸的重量根据炮的类型和各国军队规定的标准而有所不同。英国人在重型海军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8盎斯至3磅的弹丸;在9磅野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1.5盎斯和5盎斯的弹丸;而且用这种炮发射一次,圆筒内需相应地装126颗弹丸和41颗弹丸,普鲁士人装41颗弹丸,而且每一颗弹丸的重量为相应球形实心弹的重的三十二分之一。法国人在1854年以前几乎也是采用这种装法;至于因装备发射爆炸弹的新式加农炮而在这方面可能引起变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可谈的。攻城炮和要塞炮使用的球形弹丸有时装在突出于木弹座上的心轴周围,它们或者像一串葡萄似的装在袋子里(因而有《grape shot》^①之称),或者一层一层排均匀,中间用圆的木片或金属片隔开,再整个套进帆布袋。

最新型的霰弹是球形霰弹,以它的发明人英国将军施拉普奈尔的名字命名,称为施拉普奈尔爆炸弹。这种炮弹具有薄的生铁的

① 《grape》——“一串葡萄”;《grape shot》——大霰弹,通常由9个球形弹丸组成的链式霰弹。——编者注

弹壳(厚度为 $1/3$ — $3/4$ 英寸),中间带有膜片或隔椽。底部用来装置爆炸装药,上部装置铅制球形枪弹。在炮弹中放有装满精制起爆药的炮弹信管,这种起爆药能保证准时燃烧。为了不使球形弹丸移动,在弹丸之间的空隙处填满了特制药剂。在野战中使用时,把炮弹信管截断成射程所需要的那样大小,再装入炮弹中。信管的起爆药在离敌人 50—70 码的地方烧完,炮弹随即爆炸,而向敌人那边散射弹丸恰好是在发射普通霰弹时炮弹爆炸的地方。现在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炮弹信管作用的精确度非常高,因此这种新炮弹使炮手可以在过去只有使用球形实心弹才能达到的距离上进行霰弹射击而取得预期的效果。普通霰弹在 200 码以内的距离上具有最大的威力,但在 500 码以内的距离上也可以使用;在近距离上用它对付以横队进攻的步兵或骑兵,它的杀伤作用极大;但用它对付散兵线,效果很小;对付纵队用得更多的是球形实心弹。至于球形霰弹,它在 600 至 1 400 码的距离上效果最大,如果有适当的射角和长的炮弹信管,那末即使在更远的距离上也能奏效。因为球形霰弹在敌人附近爆炸,它向敌人猛烈散射的弹丸的密集度很大,所以可以用它来有效地对付几乎除了散兵线以外的所有战斗队形。球形霰弹出现以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都采用了它,因为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发明了自己特有的炮弹信管的起爆药,而没有起爆药就不可能使用球形霰弹。在欧洲强国中只有法国还没有掌握这一细部。但是今后的试验(或者侥幸成功,或者通过收买),毫无疑问会使这个强国掌握这一秘密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燃 烧 弹

燃烧弹——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它在燃烧的时候，火焰通过三四个喷火孔射出来，火力极猛，很难把它扑灭。用臼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发射这种炮弹就像发射普通爆炸弹一样，它们的燃烧时间为8分钟至10分钟。这种药剂或者用火熔化，在炽热的时候注入炮弹，或者用液体润滑脂把它做成浓密的物体，然后装入炮弹。燃烧弹的弹孔用软木塞或木塞堵住，装满了易燃剂的中心管通过这些塞子进入炮弹内部。以前这种炮弹内部装有隔橡即膜片，就像现代榴霰弹那样；而且底部用来安置火药这种爆炸装药；但现在不采用这种复杂的装置了。从前还使用另一种类型的燃烧弹，形状像轻的实心弹，由两个圆形的互相交错成直角的铁环做成，在铁环上紧裹粗麻布；因此形成不十分匀称的球形体，内部装满像现在所使用的那种药剂（主要的成分是火药和树脂）。但是这种燃烧弹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它的重量极轻，几乎不能用它们在稍远的距离上进行比较准确的射击。现在的燃烧弹所装的药剂很不相同，但所有这些药剂的主要成分都是掺上含胶物质或含油物质的硝石和硫磺。例如普鲁士军队，他们采用75分硝石、25分硫磺、7分碾碎的火药和33分松香。英国人采用100分硝石、40分硫磺、30分树脂、10分铈、10分油脂和10分松节油。燃烧弹

主要是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也大得多。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药筒

药筒——纸的、羊皮纸的或绒布的套子或袋子，里面装有严格定量的、用作火器装药的火药；有时弹丸或炮弹同药筒连在一起。枪械的空包弹与军用子弹不同，它不包含弹丸。在枪械的各种药筒中，把塞入内部的纸当药筒盖使用。法国米涅式步枪和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药筒一端浸透滑油以便于填塞。普鲁士针发枪的药筒还装有起爆药，它受击针的作用而爆燃。火炮的药筒通常是用绒布或轻而薄的毛织物做的。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至少是野炮，药筒利用木弹座同炮弹连在一起（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法国人甚至在他们的海军中也部分地采用这种方法。在英国军队中，无论野炮、海军炮和攻城炮，药筒始终是同炮弹分开的。

在英国乌里治的皇家军火库中，不久以前采用了巧妙的方法制造无缝纸药筒。他们在金属制成的空心圆柱型（它的大小正好能装进药铜）上，钻许多小孔，把这些圆柱型浸在做药筒纸用的稀纸浆里，然后把它们同抽出了空气的空气泵的套子连在一起，这时它们就糊上了薄薄的一层纸浆。这层纸浆干了以后就制成了一个纸筒。在制造药筒时是同时使用大量圆柱型的；把每一个圆柱型放在毛套里（就像套手指头那样），再使毛套粘上纸浆；这个毛套连纸层一起从圆柱型上取下来，就成为装配最好的药筒的衬垫。

猎枪使用的那种药筒是用金属网制成的，药筒里面只装霰弹。它们装置在纸的外壳里。霰弹的装药为了更稠密就拌上骨粉。用这种枪进行射击，霰弹不流散，而且比用其他任何装药射得更远。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崖路

崖路（筑城用语）——其一工事的壕沟内岸和胸墙外斜面之间的一条横面土堤。它通常约有 3 英尺宽。它的主要用途是：加固胸墙和防止胸墙的泥土因暴雨、解冻或其他原因而坍塌到壕沟里去。崖路有时也能当作工事周围的外部通路使用。然而不可忽视，崖路也是强攻部队和攀城部队休息和集中的最合适的地方，因此在很多永备工事体系里完全不采用它，而在另一些工事体系里，则用形成步兵射击时的掩护线的齿形墙来保护这种崖路。在野战筑城中或在构筑前面带有壕沟的攻城炮台时，通常是非有崖路不可的，因为壕沟的内岸几乎从来不砌面，而如果没有这种空间，那末无论内岸或胸墙一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就会很快地崩坏。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布伦海姆

布伦海姆（或称布林德海姆）——巴伐利亚的一个村庄，距奥格斯堡约 23 英里。1704 年 8 月 13 日，马尔波罗和奥伊根亲王指挥的英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同塔拉尔元帅、马尔散和巴伐利亚选帝侯^①指挥的法国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当时由于奥地利各省受到敌人经德国直接入侵的威胁，马尔波罗便从弗兰德出发前往援助它们。英奥两国商定在意大利、尼德兰和莱茵河下游采取防御行动，而把全部主力集中在多瑙河。马尔波罗对谢伦山上的巴伐利亚军的工事进行了强攻以后，渡过多瑙河与奥伊根亲王会师，随后这两支军队立即开始向敌人进攻。他们发现敌人在涅贝尔河对岸，而在敌人的两翼前有布伦海姆和基青根这两个被敌军固守的村庄。法军为右翼，巴伐利亚军为左翼。两军防守几乎 5 英里的正面，各把骑兵配置在自己的两翼，因此一部分中央阵地就处于法国骑兵和巴伐利亚骑兵的共同防守之下。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按照当时通用的战术规则来占领阵地。全部法国步兵共 27 个营，拥挤在布伦海姆；这对于按照当时编制组成的、只受过成线式队形在平地作战的训练的军队来说，意味着

^① 马克西米利安第二·艾曼努尔。——编者注

陷入了绝境。就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们遭到了英奥军队的突然攻击，马尔波罗很快就利用了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一切有利条件。对布伦海姆的攻击被击退后，他便突然将自己的主力调到中央，用他们突破了敌军的中央。奥伊根亲王完成了粉碎孤立的巴伐利亚军队这个不太困难的任务，转入了全面追击，而马尔波罗则完全截断了被困在布伦海姆的 18 000 名法军的退路，迫使他们（包括塔拉尔元帅在内）缴械投降。法军和巴伐利亚军伤亡和被俘的共计 3 万人；胜利者损失约 11 000 人。这次会战是整个战局的决定性会战。巴伐利亚落到了奥地利人的手中，而路易十四则威信扫地了。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在当时，步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在法国，一般在整个大陆，都根据邻近一个小镇的名称而把这次会战称为霍赫施泰特会战，这个小镇由于上一年 9 月 20 日在那里进行过一次会战²⁵³而早已闻名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罗迪诺²⁵⁴

博罗迪诺——俄国的一个村庄，位于科洛查河的左岸，在该河与莫斯科河汇合点的上方 2 英里处。俄国人用这个村庄的名字来称呼 1812 年解决夺取莫斯科问题的那次大规模会战，而法国人则称之为莫斯科会战或莫日艾斯克会战。战场在科洛查河的右岸。俄军的右翼在从该河与莫斯科河的汇合点起到博罗迪诺止的地方，受到了该河的掩护；左翼成 en potence（拐子形）向后折到小溪和雏谷的后面，这道雏谷是从极左翼的一点，即乌提察附近通向博罗迪诺的。雏谷后面的两座小山上构筑有不完整的多面堡，即眼镜堡；其中距中央最近的一个称为拉也夫斯基多面堡，而左面小山上的三个多面堡叫巴格拉齐昂眼镜堡。两座小山之间另有一道雏谷，与谷后的谢明诺夫村同名；这道雏谷从俄军左翼起向下通往第一道雏谷，并在距科洛查河约 1 000 码的地方与其相接。通往莫斯科的大道经过博罗迪诺，而旧道则经乌提察通向俄军阵地后方的莫日艾斯克。这条长约 9 000 码的防线，由将近 13 万俄军防守，而且俄军占领的博罗迪诺位于阵地中央的前方。俄军总司令是库图佐夫将军。他的军队分为两个军团，较大的军团由巴克莱-德-托利指挥，占领了右翼和中央阵地；较小的军团由巴格拉齐昂指挥，占领了左翼阵地。阵地选择得极不成功，法军对左翼的

攻击如果得手，就可以完全迂回右翼和中央，如再能于俄军右翼退却以前到达莫日艾斯克（而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俄军就会陷入绝境。然而，库图佐夫在拒绝采用巴克莱所选择的察列沃-宰米舍村附近的有利阵地之后，已无另作选择的余地了。²⁵⁵

拿破仑亲自指挥的法军计 125 000 人左右。新历 1812 年 9 月 5 日（旧历 8 月 26 日）法军将俄军左翼某些不坚固的战壕内的部队逐走后，准备于 9 月 7 日开始会战。拿破仑的计划是针对库图佐夫的错误拟定的：他对俄军的中央仅进行监视，而将兵力集中来攻击俄军左翼，企图在此处突破，然后打通直达莫日艾斯克的道路。为此，欧仁亲王奉命对博罗迪诺进行佯攻，然后奈元帅和达武元帅即对巴格拉齐昂的部队和巴格拉齐昂眼镜堡进行攻击，而波尼亚托夫斯基则应迂回乌提察附近俄军的极左翼。而当会战真正开始时，欧仁亲王应渡过科洛查河，攻击拉也夫斯基眼镜堡。因此，真正的攻击正面不超过 5 000 码，平均每码 26 人，战斗队形纵深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俄军所以受到炮火巨大杀伤的原因。拂晓时，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向乌提察前进并将它攻占，但是他的对手图奇科夫又把他逐出该地；不过，当后来图奇科夫不得不派一个师去支援巴格拉齐昂时，波兰人又重新占领了这个村庄。6 时，达武直接攻击巴格拉齐昂眼镜堡的左翼，在前进时遭到十二磅炮的猛烈射击，他仅能用三磅炮和四磅炮还击。半小时以后，奈元帅直接攻击这些眼镜堡的右翼，眼镜堡得而复失，随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没有决定性的结果。

但是，巴格拉齐昂机警地注视着指向他而来的巨大兵力，以及后面的强大预备队和法国近卫军。真正的攻击方向已无可怀疑了。因此，他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从拉也夫斯基和图奇

科夫的军里各抽调一个师，从军团的预备队中调来近卫军和掷弹兵，并请求巴克莱把巴哥武特的一个军全部派给他。这些为数3万多人的增援部队立即被派出。巴格拉齐昂仅从军团的预备队中得到17个近卫营和掷弹兵营，两个十二磅炮连。但是所有这些部队最早也要到10时才能赶到并投入战斗；而在这以前达武元帅和奈元帅已经对俄军的工事进行了第二次攻击，占领了这些工事，将俄军逼到谢明诺夫雏谷的后面。于是巴格拉齐昂派出他的胸甲骑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这时俄军随着援军的陆续开到，曾向前推进，但当达武把预备队的一个师投入战斗后，俄军又被迫退至雏谷后面。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大，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巴格拉齐昂本人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到这时，库图佐夫终于多少参与了一下会战，他派遣多赫图罗夫指挥左翼，并且派自己的参谋长托尔到现地去检查防御措施的执行情况。刚过10时，17个近卫营和掷弹兵营及瓦西里契柯夫师到达了谢明诺夫村。巴哥武特军分成几部分：一个师增援拉也夫斯基，一个师增援图奇科夫，骑兵派往右翼。这时法军继续在攻击，威斯特伐里亚师在树林内向雏谷的突出部推进，弗里昂将军已越过雏谷，但是仍未能守住这个阵地。这时（10时30分）俄军得到从军团预备队中抽调的博罗兹丁胸甲骑兵和科尔弗的一部分骑兵增援，但他们的队伍过于混乱，不能转入进攻，而与此同时，法军却在准备大规模的骑兵攻击。在俄军阵地中央，欧仁·博阿尔奈于晨6时夺下博罗迪诺，渡过科洛查河，紧逼面前的敌人；但是他不久就折回，在上游重新渡河，以便会同意大利近卫军、布鲁西埃师（意大利军队）、热拉尔、莫朗以及格鲁希的骑兵一起攻击拉也夫斯基的部队和拉也夫斯基多面堡。博罗迪诺仍在法军手中。博阿尔奈的军队

因渡河拖延了时间，没有能在 10 时以前开始攻击。拉也夫斯基多面堡由帕斯凯维奇师防守，左翼有瓦西里契柯夫支援；多赫图罗夫军作为预备队。11 时，多面堡被法军攻克，帕斯凯维奇师完全被打散，并被逐出战场，但瓦西里契柯夫和多赫图罗夫又将多面堡夺回。这时维尔腾堡公爵欧根的师赶到，于是巴克莱命令奥斯特尔曼军在后方占领阵地，作为新的预备队。同这个军一起使用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尚未动用的俄军步兵；在预备队中只剩下了 6 个近卫营。12 时，欧仁·博阿尔奈已准备好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进行第二次攻击，然而就在这时，科洛查河左岸出现了俄军骑兵。²⁵⁶博阿尔奈被迫暂时停止攻击，派出部队迎击骑兵。但是俄军既未能夺回博罗迪诺，又未能通过沃伊纳河谷的沼泽地区，只好经 Zodock（佐多克）退走，唯一的战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拿破仑的计划。

与此同时，配置在巴格拉齐昂小山上的奈元帅和达武元帅仍继续隔着谢明诺夫雏谷向大群的俄军猛烈射击。法军的骑兵突然出动了。在谢明诺夫村的右方，南苏蒂极成功地攻击了俄军步兵，一直到西韦尔斯的骑兵向他的翼侧攻击迫使他退回时为止。左面，拉图尔-莫布尔的 3000 名骑兵分成两个纵队进攻，一个纵队由 2 个萨克森胸甲骑兵团为前导，两次击退了刚刚编成方队的 3 个俄国掷弹兵营，但它的翼侧也受到了俄军骑兵的攻击。波兰的胸甲骑兵团歼灭了俄军的掷弹兵，但本身也遭到攻击，被迫退向雏谷。在这里由两个威斯特伐里亚胸甲骑兵团和一个波兰枪骑兵团组成的另一纵队又击退了俄军。这样，有利的条件形成了，奈元帅和达武元帅的步兵便越过雏谷。弗里昂占领了谢明诺夫村，在这里作战的俄军残部——掷弹兵，近卫军和基干部队——最后被击退，

并被法军骑兵彻底击溃。他们混乱地成小股逃向莫日艾斯克，直到深夜才聚集起来；只有 3 个近卫团还稍有秩序。这样，法军的右翼击溃俄军左翼后，于 12 时就已直接在俄军中央的后方占领了阵地。于是达武元帅和奈元帅请求拿破仑根据他本人的战术原则行事，将近卫军经由谢明诺夫村投到俄军后方以达到最后胜利。但是拿破仑拒绝这样做，而奈元帅和达武元帅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混乱，没有增援也不敢进攻。

俄军方面，在欧仁·博阿尔奈停止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的攻击以后，维尔腾堡公爵欧根的军队被调往谢明诺夫，奥斯特尔曼也应把正面转向这一方向，以便从谢明诺夫村方面掩护拉也夫斯基小山的后方。法军炮兵司令官索尔比埃发现这些生力军后，即命令从近卫军炮兵中调来 36 门十二磅炮，并在谢明诺夫村前用 85 门火炮编成一个炮队。当这些火炮向大群俄军轰击时，缪拉特派出了尚未动用的蒙勃伦的骑兵和波兰的枪骑兵。这些骑兵乘奥斯特尔曼的军队展开时突然向他们攻击，使他们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就在这个时候克累茨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俄军步兵仍然受到炮火的杀伤，不过双方都不敢前进。约 2 时左右，当欧仁·博阿尔奈确信其左翼已不再受敌军骑兵威胁后，便再次攻击拉也夫斯基多面堡。与步兵从正面攻击的同时，骑兵也从谢明诺夫村扑向多面堡的后方。经过顽强的战斗，多面堡落入法军手中，将近 3 时俄军便退却了。双方虽然在继续炮击，但积极的战斗行动已停止了。拿破仑仍拒绝把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因而俄军得以从容地退却。俄军除两个近卫团外，所有的部队都已参加战斗，甚至这两个近卫团，也受到炮火轰击而损失了 17 名军官和 600 名兵士。俄军共损失 52 000 人，还不包括经伤人员和暂时与

部队失掉联系而后又很快归队的兵士在内。而在会战后的第二天，俄军只剩下 52000 人。法军除近卫军（步兵 14 000 名、骑兵和炮兵 5 000 名）外，也已全部参加战斗，所以他们击溃了兵力显然比他们要大的敌军。此外，法军的炮兵也较弱，主要是三磅炮和四磅炮，而俄军的火炮有四分之一是十二磅炮，其余都是六磅炮。法军损失 3 万人；他们缴获了 40 门火炮，总共俘掳了 1 000 人。如果当时拿破仑把近卫军投入战斗，那末，根据托尔将军的说法，俄国军队无疑是会被歼灭的。但是拿破仑不敢以其最后的预备队——他的军队的核心和支柱——来冒险，可能因此而错过了在莫斯科签订和约的机会。

上述的会战情况（在一些细节上与流行的说法有分歧）主要是根据“托尔将军回忆录”²⁵⁷编写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托尔将军是库图佐夫的参谋长。这本书是俄军方面关于这次会战的最好的报告，而且评断正确，因此是一份难得的原始资料。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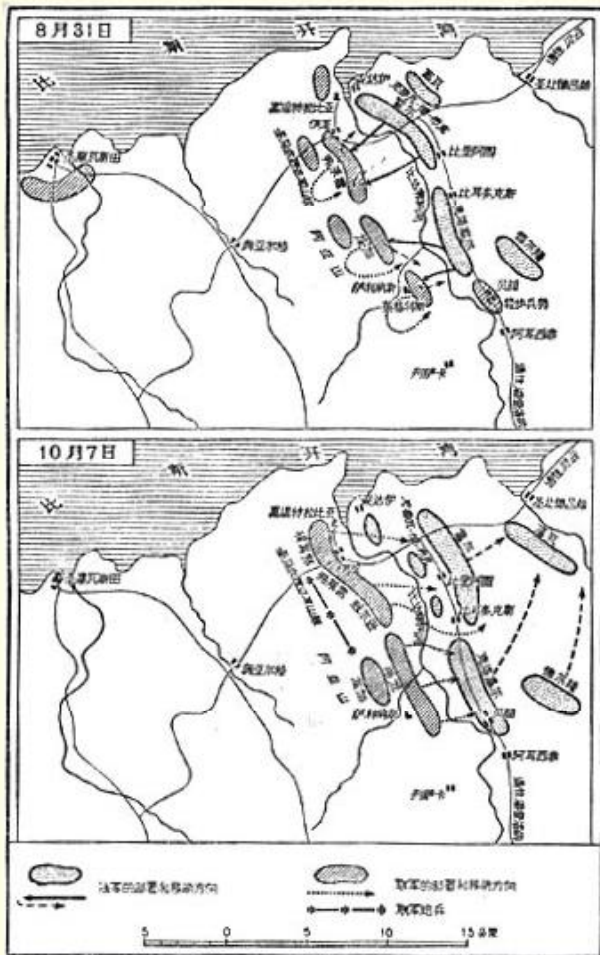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比达索阿

比达索阿——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条小河；它因苏尔特指挥的法军同威灵顿指挥的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军队曾在河的两岸进行了会战而闻名。苏尔特在 1813 年维多利亚会战²⁵⁸失败以后，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阵地上，阵地的右翼紧靠富温特拉比亚对面的海岸，面临比达索阿河，而中央和左翼沿着一些山脊向圣让德吕兹方向延伸。有一次苏尔特从这个阵地出发企图去给潘普洛纳守军解围，但被击退了。圣塞瓦斯田被威灵顿包围，处境极为困难，因此苏尔特决定迫使敌军撤除包围。他在比达索阿河下游地区的阵地离通向圣塞瓦斯田的道路上的一个村子奥亚尔松只有 9 英里；如果苏尔特能够到达该村，那末敌人就不得不撤除包围。所以到 1813 年 8 月底，苏尔特在比达索阿河地区集中了两个纵队。在左翼的一个纵队由克洛塞尔将军指挥，有 2 万人和 29 门火炮，它占领了贝腊（在这个地点后面的河上游都控制在同盟国军手里）对面山脊上的阵地。同时雷尔将军率领的 18 000 人和富瓦指挥的 7 000 名预备队部署在下游，即在贝云至伊龙这条道路附近。法军的后方营垒由德尔隆的二个师防守，他们的任务是抗击同盟国军右翼的任何迂回运动。

威灵顿获得关于苏尔特计划的情报以后，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

比达索阿河会战 (1813年8月31日和10月7日)



比达索阿河会战

施。他的阵地的最左翼依靠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得到正面掩护，它有良好的防御工事，尽管防守部队的人数不多；中央是难以通行的圣马尔西亚耳的陡峭山岭，筑有野战工事，由西班牙弗莱雷部队坚守，第一不列颠师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他们的左翼的后方，在伊龙道路附近。右翼由西班牙龙加部队和第四英一葡师组成，部署在阿亚山的陡峭山坡上；第七师的英格利斯旅把右翼同在贝腊附近的轻装师以及在更右面（在高地中间）单独作战的队伍连接起来。根据苏尔特的计划，雷尔应当攻占圣马尔西亚耳（他打算把它变为今后作战的桥头堡），把同盟国军击退到他们的右翼阵地——阿亚峡谷，从而为富瓦扫清大道，使富瓦得以沿着这条道路直接进攻奥亚尔松，与此同时，克洛塞尔留下一个师监视贝腊，他应当在这个地点的稍下游的地方渡过比达索阿河，把与他对抗的一切部队击退到阿亚山，从而从侧翼支援雷尔的攻击。

8月31日早晨，雷尔部队的几个纵队徒涉过河，以快速猛攻占领了圣马尔西亚耳的第一个山峰，并向更高的控制周围地区的山峰推进。但是在这难以通行的地区，他的部队由于指挥不力而陷于溃乱；散兵线和支援他们的队伍混在一起，在某些地方则乱成一团，而这时西班牙纵队从山上冲下来，把他们赶回到河边。第二次进攻起初比较顺利，法军曾冲到西班牙军的阵地；但在这里法军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西班牙军队重新进攻，又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赶回到比达索阿河。同时，苏尔特在得知克洛塞尔进行了顺利的攻击以及他正迫使当面的葡萄牙、英国和西班牙军队后退并向阿亚山缓慢地推进的消息以后，马上就把雷尔的预备队和富瓦的部队编为纵队以发动第三次即最终一次攻击；这时传来消息说，防守营垒的德尔隆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由于法军集中在比达

索阿河下游，暴露了他们攻击的真实方向，威灵顿就命令集中在高地的自己的最右翼的一切部队，去攻击与他们对抗的所有部队。虽然这次进攻被击退了，但它终究是一次很激烈的进攻，而且有可能卷土重来。当时不列颠轻装师的一部分部署在比达索阿河左岸，以便威胁克洛塞尔的进攻部队的翼侧。在这种情况下，苏尔特放弃了预定的进攻计划，把雷尔的部队调回比达索阿河对岸。克洛塞尔部队为通过只腊附近的桥梁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深夜才摆脱了敌人。这一天由于暴雨，河上浅滩不能通行。同盟国军用强攻占领了圣塞瓦斯田，而城砦于9月9日投降。

第二次比达索阿河会战是在10月7日威灵顿强渡该河的那天发生的。苏尔特部队的部署几乎没有改变；富瓦占领了圣让德吕兹的营垒，德尔隆占领了乌尔达克斯和埃诺亚兵营，克洛塞尔占据连接乌尔达克斯和比达索阿河下游的山岭，而雷尔则沿着河流驻扎在克洛塞尔右翼到海岸这一带地方。正面全线都构筑了工事，而且法军还加固自己的工事。不列颠军的右翼同富瓦和德尔隆对阵；中央由西班牙希龙部队和轻装师组成，并以西班牙龙加部队和第四师为预备队，人数总共有2万人，与克洛塞尔对阵；在比达索阿河下游的是西班牙弗莱雷部队、第一和第五英—葡师、埃耳默和威尔逊的独立旅，总共24 000人，他们准备向雷尔进攻。威灵顿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保障进攻的突然性。他的部队于10月6日夜内部署在敌人无法监视的一些地点，连兵营的帐篷也使人看不清楚。此外，走私者给他指明了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的三个在退潮时可通行的浅滩地点，这三个浅滩是法军所不知道的，法军以为在这个地段是十分安全的。

10月7日早晨，法军预备队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扎下了营，第

一线的一个师的许多兵士被派去构筑多面堡，这时第五英国师和埃耳默旅涉水过了河口，向营垒即著名的“长裤汉兵营”前进。当他们刚渡到对岸，圣马尔西亚耳的火炮就开始射击，另有5个纵队又向前推进，准备涉水过河。他们在法军能作出任何抵抗以前就在右岸整好了队伍；果然，进攻的突然性是完全达到了；法国步兵营由于零散地不按时到达就遭到了失败，整个战线和阵地锁钥克鲁瓦-德-布克高地在任何预备队到达以前就被占领了。弗莱雷占领了曼达累高地以后，迂回了联接雷尔和克洛塞尔的比利阿图和比耳多克斯兵营，因此法军只得放弃该兵营。雷尔的部队溃退了，直到苏尔特从埃斯佩累特率领预备队匆促开到以后，才在乌罗尼埃附近制止了他们的溃退。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就得知乌尔达克斯遭到进攻；但是他毫不怀疑进攻的真实方向，因而向比达索阿河下游推进，然而他来得太晚，已不能挽回局势了。同时英军的中央向克洛塞尔发动进攻，经过正面的和侧翼的攻击逐步占领了他的阵地。到傍晚，克洛塞尔手里只剩下山岭的制高点大吕恩高地，而第二天他就撤离了。法军损失约1400人，同盟国军的伤亡人数约1600人。突然的袭击十分出色地实现了，法军实际上只有1万人的兵力防守阵地，他们遭到33000名同盟国军的强力进攻，在任何预备队赶来支援他们以前被逐出了这些阵地。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2月11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布 达

布达（欧芬）——多瑙河西岸的城市，匈牙利过去的首都，目前是佩斯州首府。这个城市和它的7个郊区的人口（包括1850年划入该市的老欧芬的人口）共45 653人，卫戍部队和大学生不计在内。按直线计算，布达离维也纳135英里，在它的东南；离贝尔格莱德200英里，在它的西北。从前布达同河对岸的佩斯用浮桥相接，自1849年起，改用长1250英尺的吊桥相接；从1852年起构筑隧道，使桥同城堡连接起来。布达方圆约有9英里；该城围绕着城堡山建立，城堡山是单独矗立的有慢坡的山岩。中央最高部分称为城堡，它是布达城最合规划的部分，这里有许多美丽的建筑物和广场。城堡的四周有城墙；从城墙到多瑙河经过几个郊区。城市的主要建筑物有：王宫——长达564英尺的长方形建筑物，宫里面有203个房间；两座哥德式的建筑物——圣母升天教堂和圣护军教堂；兵工厂、典礼宫、市政厅。布达有12座天主教教堂、1座希腊正教教堂、1座犹太教教堂、几个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剧院、许多大的军事机关、学校和慈善机关。还有几家印书局；出版3种报纸。在城南超出地中海水面516英尺的高地上有1座天文台，佩斯大学的印刷厂也在那里；人们不惜巨资为天文台装置了最好的仪器。在城外各地有硫磺温泉，有罗马人和

土耳其人从前占领这个地方时修筑的浴池遗址。酒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贸易货品（主要是类似勃艮第酒的红葡萄酒）；酒就在邻近的小山上的葡萄园里酿造，据统计年产量达 450 万加仑。此外还有铸炮厂和几家缫丝厂、丝绒织造厂、棉织厂、毛织厂和制革厂。多瑙河轮船航运公司的船只在这里建造，近 600 人从事这项工作。布达是匈牙利总督和国家政权代表们固定的驻在地。

有人推测说，这个城市是“安敦尼旅行指南”²⁶⁰中提到的古代阿克文库姆的原址。在匈牙利王国时期，布达是国王的王宫所在地，国王们把布达扩大并美化了；马特维大帝首先就是这样做的。布达于 1526 年曾被苏里曼大帝统治时期的土耳其人占领，但在第二年即被收复。1529 年，布达重新落入土耳其人手里，被土耳其人一直占领到 1686 年，才最终由洛林公爵卡尔收复；1784 年，布达又成为政府所在地。布达在其整个历史上遭到的围攻不下二十次。最后一次围攻发生在 1849 年 5 月，当时匈牙利军队在戈尔盖的指挥下把奥地利军队赶到王国的西部边境。至于进一步的行动，曾有两种计划：一种是扩大战果，坚决追击敌人到他们的本土，在当时向匈牙利推进的俄军来到以前就打散敌人的兵力，并力图使维也纳发生革命；另一种是留在科莫恩前面的防御阵地上，分出巨大兵力去围攻布达，消灭奥军在退却时留在那里的守军。戈尔盖断言，科苏特和克拉普卡坚持后一种计划；但是克拉普卡说，他不知道科苏特是否下过这样的命令，并否认他自己曾建议采取这种步骤。如果拿戈尔盖的回忆录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²⁶¹对比一下，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进军布达究竟是谁的过错，而且克拉普卡所引用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无可争辩的。戈尔盖还断言，其次，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完全缺乏

野炮弹药和其他的储备物资，还由于他本人确信军队会拒绝越过边境。总之，一切进攻行动都被制止了，而戈尔盖率领了3万人向布达推进。采取这种步骤的结果失去了挽救匈牙利的最后机会。而奥军却获得了在失败以后整顿兵力的机会，6个星期后，当俄军出现在匈牙利边境的时候，他们就以127 000人军队（此外还有两个已经编成的预备军）重新发动进攻了。因此，围攻布达是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的转折点，如果戈尔盖和奥军之间果真有过叛变性关系的话，那末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布达城堡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一个古老城砦的可怜残迹，过去土耳其人依靠它的城墙经常打退匈牙利军队和皇帝的军队的一切进攻。护城壕和斜堤已经和地面一样平了；保存下来的只是城堡的主墙——很高的石砌建筑。城堡的基本轮廓是一个长方的四角形工事，它的各个边都有些弯曲，这样便于进行充分有效的侧射。不久以前构筑的堑壕由东面往下伸到多瑙河，掩护了给城堡供水的水导工事。守军由4个步兵营、大约1个工兵连和必要数量的炮兵组成；他们的指挥官是英勇而果断的亨齐少将。在城墙上安置了75门火炮。5月4日，在城堡被包围和遭受野战重炮短时间轰击以后，戈尔盖建议守军投降。当建议被拒绝的时候，他命令克美蒂攻击水导工事；在所有的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克美蒂的纵队向前推进，但部署在堑壕里的炮兵用纵射火力向前进的纵队射击，很快就把他们击退了。这就证明：没有事先的围攻作业，光靠强攻是决不能攻破城堡的，而且必需有火炮攻击以便一开始就打开可通行的缺口。但当时戈尔盖没有比十二磅炮更大的火炮，甚至连这种炮的弹药也不够。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从科莫恩运来了4门二十四磅炮和1门十八磅炮，稍后又运来了6门白炮。在离城

墙西北角 500 码的高地上架设了破城炮,于 5 月 1 日开始射击。在前一天,亨齐毫无理由地而且没有任何获胜希望地对佩斯城进行了轰击。16 日,缺口被打开了,勉强可以通行;但是戈尔盖在第二天夜间决定强攻:一个纵队进攻缺口,其他二个纵队强攻城墙,而克美蒂指挥的第四纵队则夺取水导工事。强攻毫无进展。又恢复了火炮攻击。破城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环绕水导工事的防栅遭到十二磅炮的破坏,城堡的内部也遭到轰击。每天夜间进行佯攻,以骚扰守军。20 日夜晚准备发动新的强攻。派出原先的四个纵队,攻击目标依旧不变,在 21 日黎明前,纵队向城堡推进。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时亨齐亲自指挥防守缺口,受了致命伤),洪韦德²⁶²第四十七步兵营占领了缺口,随后第三十四步兵营向前推进,同时由克美蒂强攻水导工事,克涅威希指挥的第三军的队伍强攻维也纳门附近的城墙。在城堡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不久守军就投降了。守军 3500 人中约 1000 人被打死,其余的都被生俘。在围攻战中,匈牙利军队损失了 60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桥头堡

桥头堡即 tête-de-pont (筑城用语)——一种永备工事或野战工事, 构筑在桥的尽头, 目的是保卫桥梁和保证守桥的军队能够在河的两岸进行机动。桥头堡对于设在大河边或两河汇合处的大型现代化要塞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这种场合, 对岸的良好筑垒郊区往往成为桥头堡。例如卡斯特尔是美因兹的桥头堡, 埃伦布莱施坦是科布伦茨的桥头堡, 多伊茨是科伦的桥头堡。在革命战争时期, 法军占领克尔以后, 立刻把它变为斯特拉斯堡的桥头堡。在英国, 哥斯港可以看做是朴次茅斯的桥头堡, 虽然那里并没有桥, 而且它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这后一种情况, 设在河对岸或狭窄海峡对岸的工事, 即使没有桥也常常称为桥头堡, 因为这种工事能够掩护登陆兵登陆和准备进攻战役, 起到桥头堡的作用, 并且从战略观点来看, 可以同桥头堡相提并论。至于谈到设在某条大河边军队的阵地, 那末军队在对岸所占据的一切据点都称为它的桥头堡, 不管它们是要塞、筑垒村庄还是一般的野战工事, 因为它们全都保证军队渡到对岸的安全。例如在 1813 年, 拿破仑从俄国退到易北河停下来以后, 汉堡、马格德堡、维登堡和托尔高就成为他在易北河右岸的桥头堡。在野战筑城中, 桥

头堡通常是极为简单的工事，它由 bonnet-à-prêtre^①构成，有时由角堡或冠堡（在向河的一面敞开）以及桥前面的多面堡构成。有的时候，小村庄、农用建筑群或其他在桥附近的建筑物，只要经过适当的改造用于防御，都能变为很好的桥头堡，因为在现代轻步兵战术下，这些设施如果一般来说适合防御的话，都可以利用来进行抵抗，这种抵抗力量决不会比按照一切军事学术原则构筑的任何野战工事小，甚至还要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131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弹 射 器

弹射器（源出于希腊文 $\gamma\acute{\alpha}\rho\alpha$ ——“朝向”和 $\pi\acute{\alpha}\lambda\lambda\omega$ ——“投掷”）——古代的一种军用器械，用来投掷石头、标枪和其他的发射物；发明于老迪奥尼修斯统治时期的叙拉古。弹射器根据弓的原理发射，它用木头骨架构成，骨架的一部分有伸缩性和弹性，并套有鬃毛或心线绞成的粗绳。弹射器的大小不一，要看它们是用于野战还是用来射击要塞而定。最大的弹射器能发射长 6 英尺、重 60 磅的梁木，射程为 400 步，而约瑟夫·弗拉维引举的例子是：弹射器投射大石头，射程达 $1/4$ 英里。罗马人在围攻耶路撒冷时期使用了 300 架这样的弹射器²⁶³。自尤利乌斯·凯撒时期以来，古罗马作者对弹射器和弩炮不加区别，其实弩炮最初仅仅是用来投掷石块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野 营

野营 (Camp) —— 军队用帐篷、露营或者用能够迅速筑成的任何掩蔽物来度过一夜或更长时间的宿营地。当军队分驻在村庄里或者在战局结束后驻在临时兵营里的时候，称为舍营。兵营是永久性的军营。拿破仑认为帐篷没有用处，宁可让兵士露营，脚靠篝火而睡，用轻便的敞棚和树枝做的东西来挡风。美军少校西布利发明了一种能容纳 20 名骑兵及其装具的帐篷；兵士在帐篷里脚靠篝火而睡，篝火放在帐篷的中央。法国军队从 1837 年起使用露营帐篷。这种帐篷是用浸上橡胶因而是不透水的棉布做的。每个兵士随身携带一块帐篷布；帐篷的各个部分可用钏环很快连接起来。在选择野营地点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适当的距离上有很好的饮水，靠近树林，保证获得燃料和构筑掩蔽物的木料。如果军队野营的时间长，那末良好的道路、运河或通航河流对供应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避免在沼泽或死水旁边设置野营。应当选择使军队有可能进行机动的地方以利防守。骑兵和步兵应尽可能配置在一条线上——骑兵在翼侧，步兵在中央。掩蔽物或临时兵营（这要看地形条件而定）应当排成几道，与正面垂直，从营地的一端伸到另一端。但是对设置野营来说，不可能规定任何普遍适用的规则：司令官应当根据情况决定他的军队配

置在一条线上还是两条线上，以及确定步兵、骑兵和炮兵相互的位置。野营的警卫部队有：（1）野营卫兵队，任务是维持良好的秩序和纪律，防止逃跑，向营地发警报；（2）巡逻队，由步兵和骑兵担任，分布在营地的前方和翼侧；这种巡逻队堵住敌军侦察队的道路，及时通知敌军逼近的消息；（3）小哨，或称战斗警戒部队，由大的分遣队担任，分布在周围的村庄、农场或小型野战工事内，他们从那里可以监视敌人的调动情况。他们不应离营地过远，以免在遭到攻击时得不到支援。到达野营地点后，立刻要派出必要数量的兵士去组成卫兵队和巡逻队，确定他们应站的哨位，指定分配粮食的地点，并且一般地要发布有关野营外部警卫和内部警卫以及保持营地秩序和清洁等方面的一切命令。

以色列人在他们大批离开埃及时期所设置的野营是历史上提到的最古老的野营之一。它是一个大四角形，按各个不同的部落划分地段；中间是设有会幕的利未人²⁶⁴的野营，还设有正门，即入口处；它和毗连的一块空地同时作为集会场和集市广场。但是要弄清楚古代犹太人或他们的敌人通常所有的军营的形式、规模和工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郊的野营设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它是用来保卫被拉到陆地上来的希腊军舰的；营地按不同的部落划分成各个地段，在向城和向海的两面筑有围墙，而在营地外面筑有很高的土堤，土堤上设有木塔楼，以便击退被围者的出击。希腊人的最勇敢的领袖，如阿基里斯和哀杰克斯住在营地的最边端。斯巴达人的营地是圆形的，而且非采取通常的防备措施不可，如布置有哨兵和马巡队。

罗马的野营根据季节、军队驻留的时间、军团的数目以及地

形条件和其他等情况而变动。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①曾提到各式各样的营地，有圆形的、长方形的等等，但是罗马的营地通常是正方形的。野营地点由占卜官决定，他们根据四个方向、以正面朝日出而确定营地位置；它利用日晷进行测量；²⁶⁵边为 700 英尺的正方形被认为足以容纳 2 万名战士。营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相隔一大块空地，还有从东到西和从北到南两条干线（*decumana* 和 *cardo*）以及话多街道贯穿营地。营地设有四座门，其中主要的是主门和禁卫军门，任何兵士未经许可不能通过这些门，违者处以死刑；营地四周有围墙（围墙同营地内侧界线间隔 200 英尺）、壕沟和土堤。所有这些工事都由兵士自己构筑，他们使用丁字镐和铲子像使用剑和矛一样灵巧；他们填平土地，用随身带来的地桩在工事四周筑起不整齐的齿状栅栏。营地上部中央安置统帅的帐篷（主帅营），它是边长 200 英尺的正方形；在它四周安置占卜官帐篷、财务官帐篷或军队司库官帐篷、作集市广场和会场用的集会场、次帅的帐篷、护民官帐篷（位于相应军团的对面）和外来的辅助部队司令官帐篷。在下部安置下级司令官帐篷和军团兵士（罗马的骑兵、后备兵、主力兵和长矛兵等）的帐篷，在翼侧是外来的骑兵和步兵队伍的帐篷（他们竭力使这些部队单独驻扎）。帐篷用兽皮复盖，每顶帐篷可容纳 10 个武士和他们的十人长；百人长和旗手在本部队的前面。在营地两部分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为 *principia*），耸立着一座木板台，它是供统帅主持审判和讲话用的；在那里还有圣坛、神像和不少神圣的战旗。在特殊的情况下，营地用石墙围起来，有时甚至连兵士住的地方也是用石

^① 约瑟夫·弗拉维。——编者注

头建造的。整个营地外形犹如一座城市；这是唯一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堡型式。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 *casta* (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①等。

古代野蛮人的野营经常是用各种车辆作为工事围起来的，例如，基姆布利人在他们同罗马人的最后一次会战²⁶⁶时期（公元前101年）所设的野营——这也就是那在基姆布利人失败以后，他们的妻子如此愤怒地出来保卫的营地。

营垒 (Intenched Camp) 是周围筑有防御工事的野营，它也是筑城工事的一种，因此是为了长期使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2月18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英文是 Doncaster, Leicester, Worcester, Chester, Winchester。——编者注

弗·恩格斯 库霍尔恩

库霍尔恩（科霍尔恩），门诺，范，男爵——荷兰将军和工程师；1641年生于弗里斯兰，1704年5月17日死于海牙。16岁升为上尉，在围攻马斯特里赫特时以及后来在塞涅弗、加塞尔、圣丹尼和弗略留斯等会战²⁶⁷中都立了战功。在战斗行动的间歇时期，他钻研筑城学，目的是要使围攻者和被围者双方保持均势，因为他的同时代人沃邦所创立的新筑城法使被围者占了很大的优势。他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工程师了，到了中年，他被公认为荷军的工程部队的优秀军官了。奥伦治亲王曾经答应授予他上校军衔，但是由于亲王没有注意履行自己的诺言，库霍尔恩愤而辞职，打算去为法国效劳。然而根据亲王的命令，扣留了他的妻子和8个子女，作为他回国的人质。这就迫使他迅速回国，回国以后，他获得了原先答应给他的军衔，以后又接连被提升为炮兵将军，并担任要塞工事总监，后来又担任弗兰德省省长。

库霍尔恩的一生致力于加强尼德兰的防御手段。在1674年围攻格腊韦时期，他发明并首先采用了用榴弹射击的小口径臼炮，即所称的库霍尔恩炮，次年，他成功地渡过了麦士河，攻占了被认为有江河作可靠掩护的棱堡，从而受到了沃邦的赞扬。在缔结尼姆韦根和约²⁶⁸（1678年）以后，他着手进一步加固一系列已经设

防的城市；尼姆韦根、布雷达、曼海姆（它的防御工事后来被夷平）和贝亨-沃普-索姆等地的工事都证明他的筑城法是有价值的。在这些要塞中，他认为贝亨-沃普-索姆是他的精心杰作，然而这个要塞经德·洛旺达元帅长期围攻以后于 1747 年攻破。在 1688—1691 年战争期间，他服现役。²⁶⁹ 1692 年围攻那慕尔，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筑城法同沃邦的筑城法作一番较量，因为那时这两个著名工程师正处在直接敌对地位：库霍尔恩保卫为防御城砦而构筑的工事，而沃邦竭力要攻破它。库霍尔恩顽强地进行了防御，但是在他受了重伤之后，不得不向对手投降，他的对手心胸宽大地承认了他的勇敢和技能。库霍尔恩后来参加了特拉尔巴赫、灵堡和列日的围攻，1695 年促使收复了那慕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²⁷⁰时期，他接连地围攻了文洛、斯提文斯威特、鲁尔蒙特和列日，1703 年，经过三天的重炮射击（被 500 门库霍尔恩炮的榴弹火力所加强）攻占了莱茵河畔的波恩。随后他被调到荷兰的弗兰德，在那里他曾数度战胜法军，并指挥了对居伊的围攻。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军事活动；在这以后不久患脑溢血去世，当时他正等待同马尔波罗公爵商谈新的作战计划。

库霍尔恩最重要的著作“构筑要塞的新方法”²⁷¹一书于 1685 年以对开本在吕伐登出版，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他的设计最适合于构筑荷兰式的要塞或那些类似荷兰式的建立在仅仅高出水面几英尺的要塞。只要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工事周围挖两道壕沟，外面的一道灌满水，里面一道是干的而且宽度通常是 125 英尺左右；这条内壕是被围者的屯兵场，而在某种情况下又是骑兵队伍的屯兵场。他的筑城法的理论原则（无论进攻或防御）就是用协同的密集火力去压倒分散的火力。库霍尔恩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人

们指责他过于浪费人的生命；在这方面他不如爱惜人的沃邦。在为人方面，他直爽、正直和勇敢，憎恨阿谀奉承。他拒绝了某些外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诱人的建议。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赐给他骑士的称号。库霍尔恩死后葬于弗里斯兰省斯内克附近的魏克耳，在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下半月—
2 月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5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布里西亚

布里西亚——伦巴第的一个省，北面与贝尔加莫和提罗耳接壤，西面是维罗纳和曼都亚，南面是克雷莫纳，东面是洛迪和贝尔加莫，面积 1300 平方英里；人口 35 万人。土壤肥沃，适宜于发展最精细的生产部门。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是养蚕业，它每年提供 100 万磅生丝；有 27 家丝织厂，1046 家纺丝工场。每年能剪优质羊毛约 7 万磅，毛纺厂不下 45 家，生产毛织品和棉织品的工厂 40 家，呢绒工厂 13 家，制造金器、银器和青铜器的企业 27 家，制造小五金和瓷器的企业 12 家，印刷所 7 家，炼钢厂和其他金属冶炼厂 137 家（布里西亚的钢世界闻名），生产火器和其他武器的工厂 77 家，由于这些武器质量优良，布里西亚在早先被称为 L' Armata（兵工厂）。油类、干酪、小麦、玉蜀黍、干草、亚麻、栗子、植物油和酒是补充的收入来源。该省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与它同名的省会。

布里西亚城（古代的布里克西亚）人口有 4 万，位于美拉河畔和加尔查河畔的一座不高的山的山麓。山顶上的设防城堡旧时称为“伦巴第之鹰”。这是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可爱的和热闹的城市，它因许多喷泉而著名：在街道和广场上的喷泉不下 72 处，此外在私人住宅内的喷泉有几百处。在古老的大教堂和其他教堂内有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大师绘制的丰富多采的壁画。新的大教堂

(Duo-mo Nuovo) 奠基于 1604 年，但是圆顶建筑到 1825 年才竣工。圣阿夫腊教堂的主要装饰物是提香的“不守妇道的女人”^①。共有 20 多个教堂，而且所有这些教堂都以自己的艺术宝藏闻名。著名的公共建筑物有韦基亚广场上的供市政机关用的回廊宫；这个建筑物的美丽的正面遭到 1849 年 4 月炮火的严重损坏。托西宫是由托西伯爵捐献给该城市的，宫中收藏了许多名画，其中有拉斐尔的著名作品“救世主”。阿韦罗耳迪宫、费纳罗利宫、勒基宫、马丁南果宫和其他宫殿的绘画陈列馆也都以自己的艺术珍品而驰名。在剧院大街上，所有房子第二层的正面都装饰着圣经、神话和历史题材的色彩画。十八世纪中叶由魁里尼红衣主教创办的魁里尼图书馆藏有 8 万多册图书，此外还有大量收藏的珍贵手稿和古物。布里西亚的独一无二的古迹是墓地 (Campo Santo) —— 这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墓地；它在 1810 年建成，它的正面是半圆形的空地，四周是坟墓和柏树。布里西亚城是省的行政中心和教区的中心，同时是商务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的所在地。在那里还有各种慈善机关、正教中学、两所文科中学、一所普通中学、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农业协会、几所高等学校、音乐馆（意大利最古老的音乐馆之一）、赌场，富丽堂皇的剧院，在城外有每年集市（最热闹和快乐的时期）临时作为演艺场使用的宽广场地。布里西亚的周报叫“布里西亚省报”。布里西亚的近郊于 1822 年发掘出大理石砌造的古罗马的寺院。布里西亚有铁路通向维罗那和意大利其他城市。

有人认为布里西亚城是由伊特刺斯坎人建造的。在罗马帝国

^① 这幅画的比较流行的名称是“基督和有罪的女人”。——编者注

崩溃以后，遭到了哥达人的洗劫，最后落入法兰克人的手中。奥托大帝授与该城以帝国自由城市的特权，但是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²⁷²之间的斗争使这个城市遭到许多灾难。某一时候它受维罗纳的统治者的控制，但是在1339年为米兰人所统治。1426年它被卡尔马尼约拉攻占，1438年被皮钦尼诺包围，1509年投降了法国人，1512年被威尼斯将军格里蒂占领，但是最后被加斯頓·德·富瓦解放。布里西亚在十六世纪还遭到了三次围攻，它一直受威尼斯统治，直到这个共和国崩溃²⁷³为止。在拿破仑时期，布里西亚是美拉省省会。在1849年革命时期，布里西亚的居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从1814年起统治他们的奥地利政权。1849年3月30日，海瑙将军炮轰这个城市；该城支持到4月2日中午，为了免遭毁灭而被迫投降并付出120万美元的赎金。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2月24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缅甸

缅甸(阿瓦王国)——东南亚的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在恒河以东;过去它的领土要比现在大得多。缅甸以前的疆界在北纬9度和27度之间,长达1000英里以上,宽超过600英里。现在缅甸的领土伸展在北纬19度25分和28度15分之间,东经93度2分和100度40分之间,它的面积从北到南长达540英里,宽为420英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英里。在西面,缅甸同阿拉干省(在1826年根据英缅签订的条约割让给英国)接壤,还同提彼腊、曼尼普尔和阿萨姆等小国交界;缅甸同这些小国之间隔有崇山峻岭。南面是不久前被英国并吞的勃固省²⁷⁴,北面是上阿萨姆和西藏,东面是中国。根据亨利·尤耳上尉的材料,缅甸人口不超过300万。

自从勃固省落到英国人手中以后,缅甸就没有冲积平原,也没有出海口,因为缅甸的南部疆界离伊洛瓦底江江口至少有200英里,从这个疆界向北,地势逐渐升高。缓升地带绵延约300英里,以后便是陡峭的山地。境内有三条大河流:伊洛瓦底江、它的支流亲敦江、萨尔温江。这些河流发源于北部山脉,流经南部入印度洋。

尽管缅甸遭到掠夺,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但保留下来的那些土地也决不能说是贫瘠的。森林中有许多珍贵品种的树木,其

中以造船用的柚木最为著名。几乎所有在印度生长的树木的品种在缅甸也都有。缅甸出产质量优良的胶漆和做漆器用的漆。把上等的柚木从森林运往缅甸首都阿瓦，有 15 天的路程。农业和果园艺业到处都非常落后，要不是土壤肥沃和气候良好的话，这个国家就会是非常贫穷的了。对果树不加任何照料，庄稼的栽种技术水平很低。在蔬菜作物中，种得最多的是葱和辣椒，此外有薯类、马铃薯以及为数不多的甜瓜、黄瓜和茄子。居民用嫩竹笋和野芦笋和各种水生植物的多汁根代替非野生的果实。在缅甸出产的水果有芒果、菠萝、橙、荔枝、面包果（面包树的一种）、木瓜、无花果、芭蕉（这个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所有这些水果几乎是或者说完全是不加照料而生长的。主要的大田作物是稻米（稻米在某些地区还被用作流通手段）、玉蜀黍、黍、小麦、各种豆类作物、棕榈作物、甘蔗、烟叶、短纤维棉花和靛蓝。甘蔗没有普遍种植，虽然居民早就知道这种植物，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把甘蔗榨糖的技术。从巴尔米拉棕榈的液汁中可以提取没有净化过的廉价糖。这种棕榈树的小树林很多，特别在首都的南面。对靛蓝的照料很差，完全不能出口。南方的主要作物是稻米，北方则是玉蜀黍和黍。芝麻当牲畜饲料用，到处都种植。在北方山坡上大量种植地道的中国茶树，但奇怪的是，当地居民不泡茶喝（中国茶一般都是泡着喝的），而是吃茶叶，还在茶叶里拌上植物油和蒜。棉花主要栽植在上缅甸各省的旱地上。

在缅甸茂密的森林中有很多野兽，其中主要是象、独角犀牛、虎、豹、野公猪和各种鹿。禽类中常见的是野公鸡，还有各种野鸡、沙鸡和鹌鹑。家畜有犍牛、马和水牛。象也作为役畜使用。骆驼不详。山羊和绵羊的数量不多，但人们不关心它们的繁殖。驴

子也很少役使。在缅甸，根本不用狗来看家，而猫却非常多。马只供乘骑；马的体高很少超过 132 厘米。在北方驮畜是公牛，在南方用水牛当驮畜。

矿产有金，在不同的河流的河底可以发现金子，它是随同山上的沙子一起被冲到河底的。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博敦开采银矿。每年开采的金银总数将近 100 万美元。在老挝的东部蕴藏着丰富的铁矿，但是由于矿石加工的方法太原始，30—40% 的金属都损失了。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石油井，每年提供 800 万磅的石油。大家知道，老挝有铜、锡、铅和铋，但是这些金属中任何一种金属都未必能大量采掘，因为居民不懂得采矿方法。阿瓦城四周的山地，出产质量优良的石灰石；离首都 40 英里的伊洛瓦底江两岸，有适合于雕塑用的美丽的大理石；国内琥珀极多，所以在阿瓦它的售价很低，每磅 1 美元；全国到处都蕴藏着硝石、碱、盐和煤，不过煤很少使用。石油在缅甸的开采量很大，各阶层的居民都把它用作点灯的燃料，还用作驱虫的药剂。人们用桶在深 210 至 300 英尺的狭窄的油井里舀取石油，同时井底石油好像喷泉那样涌出来。国内各地都产松节油，松节油大量向中国输出。在国内两个地区的一些小河河底，有东方的蓝宝石、红宝石、黄晶、紫晶以及各种金绿宝石和尖晶石。所有价值在 50 美元以上的宝石都被宣布为王国的财产，并收入国库。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得开采宝石。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缅甸人民在采矿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进步。棉织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是由妇女来完成的。她们使用简陋的织布机，手艺或技能比较差。瓷器从中国输入；英国的棉织品也是输入品，可是它们在缅甸国内市场上的售价甚至比本地的产品还低廉。缅甸人虽然会炼铁，但是钢仍得由孟加拉

运入缅甸；国内某些地区生产丝织品，然而用的是中国生丝。缅甸输入大量各类商品，而输出量却比较小。缅甸同中国的贸易极为广泛，向中国输出原棉、装饰用的羽毛（主要是蓝松鸦的羽毛）、食用燕窝、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较稀贵的宝石。缅甸以此交换的输入品有：加工过的铜、黄砷、水银、硃砂、金属器皿、铜丝、锡、铅、矾、银、金（包括金叶）、陶器、颜料、地毯、大黄、茶叶、蜂蜜、生丝，丝绒、中国烧酒、麝香、铜绿、干果、纸张、扇子、伞、鞋和衣服。全国各地能制造很简单的金银饰物。在阿瓦能制造兵器、剪刀和细木工工具；在距阿瓦 40 英里的地方有纯白大理石的丘岗，大理石大量被制成偶像雕塑品。货币流通不发达。作为流通手段的是未经压模的铅、银和金。由于小额支付的困难，极大部分的交易采取直接的商品交换。贵金属的转让每次必须过秤和检验，银钱业商人为此抽取约 3.5%。年利率在二分五厘和六分之间波动。石油是最普遍的日用品；可以用石油交换硝石、石灰、纸张、漆器、棉织品、丝织品、铁器、铜器、糖、罗望子等。尤委特-尼（国内银币本位）通常是由银和 10—15% 的铜制成的合金。含银量不到 85% 的合金不准流通，因为这正是付税的货币所必须达到的金属纯度。

帝国收入的来源是向乡村征收的房屋税，乡村当局根据每个人的支付能力确定分摊数额。税额各地不一：向每个房主征收的税额自 6 铢（在卑谬）至 27 铢（在冬瓜）不等。服兵役的人、王室领地的农民和从事社会劳动的手工业者免缴这种税。土地税的税额取决于收成。烟草税用货币缴付，其他作物则抽 5% 的实物税。在王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以一半以上的收成缴税。在湖泊和江河捕鱼，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或按照捕鱼量缴纳相应数量的干鱼。所有这些收入都由王室的官吏集中起来，他们依靠这些收入生活；每个官吏

根据各人所处的地位得到或大或小的地区由自己管辖,并且依靠从该地区得到的收入生活。王室的收入靠出卖专利品获得,其中最主要的是棉花。在这种专利制度下,居民必须把一些商品按照规定的低价供售王室官吏,而王室官吏转手出售即可获取厚利。例如生产者供售的铅的价格每维斯(3.6磅)5铢,而国王陛下出售的铅的价格是20铢。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王室的收入每年约1 820 000铢,即227 500英镑,此外还应加上在各个地区收来的各种税款总额44250英镑。这些钱都供宫廷开销。缅甸的税收制度虽然有它的专制性质,但细节非常简单;国家管理简单的另一个例子是,采用军队靠自己供养或者至少是靠居民供养的方法。军队的招募办法各种各样:在某些地方实行招募志愿兵的制度,而在另一些地方,每16户必须摊派2名配有武器和装备齐全的兵士。此外,他们还必须每月供应这些新兵56磅大米,并付给他们5卢比。在帕东省,两家供养一个兵士,这两家可以领到5英亩不缴税的土地,但是必须把一半收成交给这个军人,并且每年付给他25卢比,此外还须供给他木柴和其他次要消费品。每个指挥50人的指挥官可向6户征收10铢(1铢等于1.25美元或2.5卢比),并向7户征收一半的收获量。博(百人长)的生活由52户负担,博任(上校)的薪俸取之于自己的官兵。缅甸兵在良好的条件下是能够很好地作战的;而缅甸军队主要的优越性在于他们没有辎重;兵士在枪的一端挂上自己的铺盖(吊床),另一端挂行军用的饭盒和其他用品,而把自己的粮食(大米)放在袋子里,缠在腰上。

按体形外貌来讲,缅甸人看来是住在印度斯坦和中国之间一带的种族,他们更像属于蒙古人的类型,而不像属于印度人的类型。他们个子矮,身体结实、匀称、丰满而灵活。他们有大颧骨和斜

视眼，脸色黝黑但不乌黑，头发粗硬、光滑和乌黑，胡须非常浓密，比他们邻人（暹罗人）的胡子还长。艾伦少校在给东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对他们作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他们忠实，富有幽默感，相当机智灵敏，有温和的爱国精神，但眷恋乡土和家庭，对外国人比较不抱成见，愿意学习新的手艺，如果不需要花很多脑力的话。他们是有经验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具有一种进取心；他们有自制力，但并不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们的机警胜过勇猛。虽然他们的天性是不凶残的，但他们冷漠地容忍了许多国王的暴虐行为；他们不是撒谎者，也不是骗子手，但终究很爱夸口而反复无常。

缅甸人信仰佛教，他们保持的宗教仪式不像在印度和中国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缅甸的佛教徒在某些方面不像中国的佛教徒那样膜拜神像，而缅甸和尚比通常更严格地信守贫苦和独身的誓愿。在上世纪末，从缅甸国教分出了两个教派，即古老宗教的两个支派。其中一派遵循的教义在某些方面同泛神论相似，相信神的本原散布于全世界，并存在于自己的创造物中，但是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体现在佛教徒身上。第二种教派的代表则完全否认轮回说，不膜拜佛像，反对佛教徒所采取的寺院制度；他们认为死是进入极乐世界或永久苦难之门，而这取决于死者生前的行为，他们景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万能之精灵（Nat）。当今的国王^①热心捍卫自己的宗教，他已经用篝火当众烧死了属于这两个被宣布为非法的教派的14个异教徒。根据尤耳上尉的说法，这两个教派的人数始终很多，但他们举行祈祷仪式是秘密的。

缅甸早期的历史不详。十一世纪，帝国处于最强盛时期，当时

^① 门登。——编者注

它的首都在勃固。到十六世纪初，国家分裂成为互相混战的许多独立小公国。1554年，国王莽应龙占领了阿瓦，征服了整个伊洛瓦底江盆地，甚至征服了暹罗。经过一系列变动以后，现今王朝的奠基人雍籍牙（死于1760年）使帝国几乎重新达到了它以前的版图和旧日的强盛。后来英国人夺走了缅甸最肥沃和富饶的地区。

缅甸按政体来说是一个纯粹的专制国家，国王除了有其他封号以外，还有生死主宰者的称号，下狱、罚款、拷问或处死都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最高意志。具体的行政事务由赫鲁奥特-达乌，即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由预定的王位法定继承人领导，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则由王族中的某个亲王领导。通常四个大臣参加枢密院，但是他们不固定主管某些部门，他们的活动取决于偶然因素。他们组成上诉审法院，受理要求最后判决的上诉书。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全权对那些没有提交枢密院集体审理的案件作出司法判决。他们从争讼的财产中扣下10%作为诉讼费用，因此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从缅甸的国家机关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不难使人相信，司法是很少维护人民利益的。每一个官吏同时又是掠夺者；法官贪污，警察无能，国内盗贼很多，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没有任何促使进步的动因。在首都附近，国王的权力使人恐惧和顺从，但是离中央越远，国王的权力也就越弱，而在距离更远的省份，臣民不重视白象统治者的诏令；在那里，人们选举自己的执政者（这种选举经国王批准），而只给政府缴纳少量赋税。在同中国接壤的省份，有一种很有趣的情况：那里的人民毫不在乎地在两国政府（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管辖下生活，两国政府以平等的权利参与批准这些地方的执政者，但是通常都是明智地选定同一个人。虽然英国各种使团访问缅甸，传教士在緬

甸的活动也比在亚洲其他地方更有成绩，但是缅甸的内地至今还是真正的 *terra incognita*（未经考察的地方），现代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对这些地方提出了一些荒谬的假设，然而他们对缅甸的具体知识却是非常少的。

见 1858 年伦敦出版的亨利·尤耳上尉的“1855 年受印度总督的委派出使阿瓦王国宫廷的记述”²⁷⁵。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初和
3 月 8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

博马尔松德——波的尼亚湾入口处阿兰群岛和瓦尔迪奥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博马尔松德港湾的俄国工事在 1854 年战争期间遭到英法海军的破坏。7 月底通往博马尔松德的海峡被 4 艘英国军舰和几艘小型蒸汽舰封锁。在这以后不久，开来了由纳皮尔和帕塞瓦耳-德申海军上将指挥的庞大的联军混合舰队，随后于 8 月 7 日又开来了一些战列舰，舰上有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和 12 000 名兵士（主要是法国人）。8 月 16 日，俄军司令官鲍迪斯科将军被迫投降。联军占领该岛一直到月底全部工事被炸毁为止。胜利者的战利品计：112 门带炮架的火炮、79 门不带炮架的火炮、3 门臼炮、7 门野炮和 2235 名俘虏。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次围攻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彻底解决了关于在具有陆地正面的工事中利用暴露的石砌部分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3 月 1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雷斯福德²⁷⁶

贝雷斯福德，威廉·卡尔，子爵——英国将军；1768年10月2日生于爱尔兰，1854年1月8日死于肯特。他是瓦特福德的第一个侯爵乔治·贝雷斯福德的非婚生子，16岁参军，1790年以前一直在新苏格兰服务。在这时期，他由于一个共事的军官的枪枝走火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曾经在土伦、科西嘉、西印度（在阿伯克朗比的领导下）服务，在印度和埃及在贝尔德领导下服务。1800年回国以后他被提升为名誉上校^①。随即在爱尔兰服务，参与侵占好望角，并作为准将在1806年参加攻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该地被迫放下武器，但后来他逃跑了。1807年他指挥侵占马德拉的军队，并被任命为该岛总督²⁷⁷。1808年他获少将军衔，在他率领英军到达葡萄牙之后，担任了葡萄牙军队（包括国民军在内）的全部组织工作。他是起草著名的辛特拉协定条款的全权代表之一；参加过向科鲁尼亚的撤退和该城附近的会战，掩护约翰·穆尔爵士的军队登舰²⁷⁸。1809年3月，贝雷斯福德获元帅称号，并被任命为葡萄牙军队总司令，葡萄牙军队在他领导下很快变为一支能攻能守的出色的战斗力量。他参加了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从战

① 指具有上校称号但仍按原先军衔领饷的军官。——编者注

争开始一直到 1814 年战争结束), 给予威灵顿以重大支援。但是在他当总司令时期的唯一重大战役中, 即阿耳布埃拉会战中, 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统帅, 要不是他部下的一个军官不顾他的命令擅自行动的话^①, 会战就失败了。他参加了萨拉芒卡、维多利亚、贝云、奥尔特兹, 土鲁斯等胜利的会战²⁷⁹。由于这些功绩他获得葡萄牙元帅的称号和埃耳瓦希公爵和圣坎波侯爵的封号。1810 年他被选为瓦特福德郡的议会议员 (他从未出席过下院会议), 1814 年获得阿耳布埃拉和丹甘囊的贝雷斯福德男爵的封号, 1823 年他获得了爵的封号。

1814 年, 贝雷斯福德负外交使命到巴西去, 1817 年在那里组织了对密谋活动的镇压²⁸⁰。回国以后他担任副炮兵总监的职务, 随即获得陆军将军称号, 最后当炮兵总监 (从 1828 年至 1830 年)。由于他在 1823 年援助过唐·米格尔²⁸¹, 他失去了葡萄牙元帅杖。在政治方面, 他是托利党的积极而坚决的捍卫者, 虽然对这一点他没有公开声明过。他的军事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对葡萄牙军队卓有成效的改组上, 葡萄牙军队由于他那非常巧妙的和不倦的活动终于成为一支坚强而有纪律的甚至能同法国军队媲美的军队。1832 年他同他的表妹路易莎结婚, 路易莎是土阿姆大主教的女儿, 银行家、百万富翁和“阿纳斯塔西乌斯”²⁸²的作者托马斯·霍普的寡妇。贝雷斯福德没有子女, 因此在他死后, 没有人继承他的封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3 月初和 4 月 9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53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骑 兵

骑兵（法文为 *cavalerie*，来源于 *cavalier*——骑手和 *cheval*——马）——骑马的兵士的总称。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这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当欧洲和亚洲热带区的马很快就退化为笨拙的牲畜或矮种马的时候，阿拉伯、波斯、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各国的马匹却长得很骠骏、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是，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在埃及的古迹上刻画有许多战车，却根本没有骑手，只有一个例外，而且就连这个例外显然也是属于罗马时期的。但是无疑地，埃及人至少在被波斯人征服前两世纪左右就拥有大量的骑兵了，而且在宫廷显贵中往往有人就是这一兵种的司令官。埃及人很可能是在同亚述人作战时期初次遇到骑兵的，因为在亚述的古迹上常常刻画着骑手；而且亚述军队最早在战争中使用骑兵这一点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马鞍大概也是在亚述最早出现的。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波斯人和米太人有史以来就是善骑的民族。他们虽然还保留着战车，甚至仍旧对战车比对骑

兵这一较年轻的兵种更加重视，但是，由于骑马的武士数量众多，骑兵毕竟起了在以往的任何军队中没有起过的作用。亚述、埃及和波斯的骑兵就是至今仍盛行于东方，并且不久前还是北非、亚洲和东欧仅有的那种骑兵，即非正规的骑兵。但是，一当希腊人把本国马和东方马杂交改良了马种而使马适用于骑兵，他们就立即按照新的原则组成了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希腊人既是正规步兵的创建人，也是正规骑兵的创建人。他们把大量兵士编为独立的作战单位，根据他们的使命加以装备，训练他们协调一致地作战，成横队和纵队行动，并且保持一定的战术队形，以便能够以大量集中的兵力向前推进，把全部兵力投在敌人正面上的某一点。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处处表明比亚洲人用来同他们作战的那些未经训练的、笨拙不灵的乌合之众优越。我们没有发现希腊骑兵在波斯人自己建立比较正规的骑兵部队以前同波斯骑手进行会战的例子。但是，没有疑问，如果说发生过这种会战，其结果也必定像这两国的步兵在战场上交锋时的结果一样。骑兵最初仅在希腊产马区，如特萨利亚和贝奥提亚建立起来；但不久雅典人除了用来担任警戒勤务和成散开队形作战的马弓手以外，又建立了重骑兵部队。斯巴达人也把青年中的 élite（精华）组成骑兵卫队；但他们并不信赖骑兵，规定骑兵在战斗中必须下马，像步兵一样地作战。波斯人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和曾在波斯军队中服务的希腊雇佣兵那里学会了组织正规骑兵，而且无须怀疑，在曾和亚历山大大帝作过战的波斯骑兵中，有一大部分或多或少地受过成密集队形正规作战的训练。但是，他们不能同马其顿骑兵相比。马其顿人把骑术训练作为教育贵族青年的必修科目，并且骑兵在军队中享有荣誉。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的骑兵是由马其顿和特萨利亚的

贵族组成的；只有几个骑兵连是在希腊本土征召的。这支骑兵由披戴头盔、胸甲、护胫和手持长矛的重装骑手（cat-phractae）组成。他们在攻击时通常排成密集队形、长方形纵队或楔形纵队，有时也排成横队。由辅助部队组成的轻骑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正规骑兵，它像现代的哥萨克一样，担任驻军警戒和成散开队形作战。

格拉奈卡斯河会战（公元前 334 年）是骑兵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战例。当时波斯骑兵配置在距徒涉场有一个冲锋距离的地方。当马其顿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刚渡过河，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时，波斯骑兵便向他们猛冲，以勇猛的攻击把他们赶下河去。这种数次运用均获全胜的战法，直接证明了波斯人已有了一支能与马其顿人相抗衡的正规骑兵。骑兵只有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情况下，才能趁步兵力量最弱的时机，即由一种战术队形变换为另一种战术队形的时机，突然地攻击步兵而使其措手不及。非正规骑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时，率领亚历山大军队前卫的托勒密，一直等到马其顿重装骑手渡河从翼侧攻击波斯军队以后，才得以前进。随后，展开了长时间的战斗；但因波斯骑兵排成一线，没有预备队，而在波斯军队服役的亚洲籍希腊兵最后又背叛了他们，因而波斯骑兵终于被击溃，阿尔贝雷会战（公元前 331 年）是马其顿骑兵最出色的一次会战。当时，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马其顿骑兵部队作战，这些部队配置在战斗队形的极右翼，而特萨利亚骑兵为左翼。波斯军队试图从翼侧迂回对方，但在决定性时刻亚历山大从后方调来了生力军，也想迂回波斯军队。这时，波斯军队在左翼和中央之间形成空隙，亚历山大立即迅速插入，切断了波斯军队左翼同其余部分的联系，彻底击溃了左翼敌军，并追击到很远的距离。但他又不得不去援救自己的受到威胁的左翼，于是就非

常迅速地集合了自己的骑兵，由敌军中央的后面穿过，从背后攻击其右翼，结果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从此，亚历山大便被认为是历代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之一。在结束会战时，他的骑兵一鼓作气地追击逃敌，次日，先头骑兵已远离战场 75 英里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世纪，人们对骑兵战术的基本原则的理解竟和我们现在一样深刻。趁步兵成行军队形成正在变换队形时加以攻击；攻击骑兵时主要攻其翼侧；利用敌人横队的每个缺口迅速插入，随后向左右扩展，从翼侧和后方迂回突破口附近的敌军；迅速而无情地追击溃敌以巩固胜利，—— 这些就是现今每个骑兵军官所必须懂得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亚历山大死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这支希腊和马其顿的出色的骑兵了。在希腊，步兵重新占了优势，而在亚洲和埃及，骑兵很快就衰落了。

罗马人从来不善于骑马。在罗马军团中有少数骑兵，然而他们宁愿徒步作战。他们的马是劣种的，兵士也不善于乘骑。但是，在地中海南岸却建立了一支骑兵，它不仅可以和亚历山大的骑兵媲美，甚至还超过它。迦太基统帅哈密尔卡尔和汉尼拔除自己的努米迪亚非正规骑兵外，还建立了一支头等的正规骑兵，这样就创立了一个使他们几乎战无不胜的兵种。北非的柏伯尔人，至少是住在平原地区的居民，至今仍是一个善骑的民族，而汉尼拔的兵士乘骑的、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冲力冲入罗马步兵阵列的柏伯尔人的骏马，现在仍用来补充法国最优秀的骑兵团—— 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团，并被他们视为最好的战马。迦太基的步兵，甚至经过两位伟大的首领长期训练之后，仍然比罗马步兵差得多；如果没有骑兵的协助，步兵在同罗马军团作战时便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汉尼拔单靠这支骑兵就在意大利支持了 16 年之久²⁸³，这支骑兵由

于辗转征战、历尽艰苦(但决不是被敌人战败)而遭到削弱后,汉尼拔才被迫撤出意大利。汉尼拔所指挥的会战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所指挥的会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大多数会战中骑兵都战胜了头等的步兵;的确,骑兵从来没有树立过像在这两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下所树立的那样的丰功伟绩。哈米尔卡尔和汉尼拔的正规骑兵是由什么民族组成并根据哪些战术原则建立的,我们不确切知道。但是,由于努米迪亚轻骑兵始终同重装的或正规的骑兵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后者不是由柏伯尔部落组成的。重骑兵中很可能有许多外籍雇佣兵和一些迦太基人,但其主要成员极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这支骑兵是在西班牙国土上编成的,而且甚至在凯撒时代大多数罗马军队中都还有西班牙骑手。由于汉尼拔很熟悉希腊文化,而且还在汉尼拔以前,希腊雇佣兵和冒险家们就在迦太基军队中服务,所以未必能怀疑,希腊和马其顿重骑兵的组织是迦太基重骑兵组织的基础。迦太基骑兵在意大利的第一次作战就解答了它是否优越的问题。在提契诺河会战(公元前218年)中,罗马执政官普卜利乌斯·齐比奥率领骑兵和轻步兵进行侦察时,与汉尼拔指挥的、执行同样任务的迦太基骑兵遭遇。汉尼拔立即向罗马军队攻击。罗马的轻步兵配置在第一线,骑兵构成第二线。迦太基重骑兵攻击了罗马步兵,将它击溃,随后立即从正面攻击罗马骑兵,努米迪亚非正规骑兵同时袭击罗马骑兵的翼侧和后方。会战是短促的。罗马军队虽然英勇作战,但是毫无取胜希望。他们不善于乘骑;他们自己的马成了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逃跑的罗马轻步兵径直向骑兵败退,企图寻求骑兵的保护,结果许多马匹受惊,摔下骑手,搅乱了队形。另一些兵士对自己的骑术没有信心,为了慎重起见,便下马企图像步兵那样作战。但迦太基的重骑兵已经冲进了他

们的纵深,同时,到处出现的努米迪亚骑兵则在乱成一团的罗马军队的周围奔驰,杀伤逃出的每个兵士。罗马军队伤亡惨重,普卜利乌斯·齐比奥本人也负了伤。特雷比亚河会战时,汉尼拔用计将罗马军队引诱过河,使他们背水作战。一当他达到这个目的,便以全部兵力发起进攻,迫使罗马军队迎战。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一样,也是把步兵配置在中央;他们的两翼是骑兵,但汉尼拔用战象与之对峙,而把骑兵用来迂回和包围敌人的两翼。会战一开始,罗马骑兵就因遭到优势敌人的迂回而彻底失败,但罗马步兵打退了中央的迦太基步兵,并向前推进。这时,得胜的迦太基骑兵从正面和翼侧攻击了罗马步兵,迫使他们停止进攻,但没有能够击溃他们。不过,汉尼拔了解罗马军团的坚定性,于是派出1 000名骑兵和1 000名精锐步兵由他的兄弟马贡率领,迂回到罗马军队的后方。这支生力军随即攻击罗马军队,并突破了第二线;但第一线计有1万人,靠拢起来成密集队形冲出了敌阵,然后顺着河向下游的普拉岑提亚前进,从那里顺利地渡过了河。坎纳会战(公元前216年)时,罗马军队有8万步兵和6 000骑兵,迦太基军队有4万步兵和1万骑兵。拉丁姆的骑兵为罗马军队右翼,以奥菲德河为依托;意大利同盟者的骑兵配置在左翼,步兵居中。汉尼拔也将步兵配置在中央,仍以凯尔特和西班牙的部队分列两侧,在他们之间稍后的地方配置有当时已按照罗马式样装备和编成的非洲步兵。至于骑兵,汉尼拔则将努米迪亚骑兵配置在右翼,这里地形开阔,因而使动作比较机灵和迅速的努米迪亚骑兵能够避开当面的意大利重装骑兵的攻击;全部重骑兵则由哈斯德鲁拔率领,配置在左翼河岸上。努米迪亚骑兵虽然使罗马军队左翼的意大利骑兵吃够了苦头,但由于它本身是一支非正规骑兵,因而不能用正

规的攻击摧毁敌军的密集队形。在中央，罗马步兵迅速击败了克尔特和西班牙部队，以后便排成楔形纵队用来攻击非洲步兵，但后者却将它的两翼收回，成横队攻击动转不灵的罗马军队，粉碎了它的进攻，以后会战便长久相持不下。这时，哈斯德鲁拔的重骑兵已做好击败罗马军队的准备。他们向罗马军队的右翼猛冲，经激战后，将其冲散，然后，他们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贝雷会战时那样，由罗马军队中央的后面穿过，从背后攻击了意大利骑兵，把他们击溃，并且把他们当作轻而易举的战利品留给努米迪亚骑兵，自己则列队向罗马步兵的两翼和后方总攻。这就决定了会战的结局。笨拙不灵的罗马军队受到围攻，支持不住而陷于混乱，结果被击溃并被粉碎了。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彻底的全军复没。罗马军队损失了 7 万人；骑兵生还的仅有 70 人。迦太基军队损失不到 6 000 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罗马军团第一次攻击时首当其冲的凯尔特步兵。而赢得整个会战胜利的哈斯德鲁拔的 6 000 名正规骑兵，死伤不到 200 人。

在较晚的时期，罗马骑兵比在布匿战争²⁸⁴时期好不了多少。他们分成小队编入各个军团，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兵种。除这种属于军团的骑兵外，在凯撒时代还有西班牙人、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雇佣骑兵；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非正规骑兵。罗马骑兵从来没有建树；这个兵种在罗马如此被轻视，战斗力如此薄弱，以致安息的霍拉桑非正规骑兵都成了罗马军队的莫大威胁。然而在帝国东部，人们仍然保持了对马匹和乘骑的传统喜爱，而且拜占庭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前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大的马匹市场和骑术学校。所以我们看到，当查士丁尼在位时，在拜占庭帝国短暂的复兴时期，它的骑兵曾达到较高的水平；据史料证明，在卡普亚会战（公

元 554 年)中,宦官纳尔塞斯主要靠这一兵种打败了意大利的条顿族征服者。²⁸⁵

条顿族征服者在西欧各国建立贵族政体,开创了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各地贵族都组成骑兵,他们担任铁甲骑士(*gens d'armes*)的勤务,成为一种装备最重的骑兵,不仅骑士,而且连马匹都披戴金属的护甲。出现这种骑兵的第一次会战是普瓦提埃会战,公元 732 年,查理·马尔泰尔在这里击退了阿拉伯人的屡次入侵。法兰克的骑士曾在阿奎丹大公埃德的率领下突破了摩尔人的阵列,并夺取了他们的营地。但这种部队不适于追击,因此,阿拉伯人便在不怕疲劳的非正规骑兵的掩护下,无阻碍地退入西班牙。这次会战便成了以后一连串战争的开端,从此雄壮有力但笨拙不灵的西方正规骑兵便常常同东方的灵活的非正规骑兵作战,互有胜负。德国骑士在几乎整个十世纪中与野蛮的匈牙利骑兵不断较量过,并以其密集队形于公元 933 年在梅泽堡和公元 955 年在雷赫河彻底击败了后者。²⁸⁶西班牙骑士与侵入他们国土的摩尔人作战达数百年,最后战胜了他们。但在十字军远征期间,当西方的“重装”骑士将战场移到东方敌人的国土上时,便开始打败仗,在大多数场合都遭到复灭;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马匹都经受不了东方的气候、长途行军和合适粮秣的不足。十字军远征以后,又发生了东方善骑的民族对欧洲的入侵,即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侵占了俄国和波兰各地,于 1241 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同波兰德国的联军会战。²⁸⁷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亚洲人击溃了疲惫的欧洲铁甲骑士。但是,征服者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致实力大受亏损。蒙古人没有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由于内讧而不再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被击退

了。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东方各国，经常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规的轻骑兵；在西欧各国，决定这一时期内每次会战胜负的兵种则是由骑士组成的正规重骑兵。骑兵的这种优势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长处，——因为东方的非正规骑兵不会正规作战，而西方的正规骑兵行动又极不灵活，——而是由于步兵的素质低劣。当时亚洲人同欧洲人一样轻视步兵；步兵的成员都是些没钱买马的人，主要是奴隶或农奴；步兵没有适当的组织，没有护身甲冑，仅有的武器是矛和剑；它依靠纵深较大的队形有时也能抵御住东方骑兵猛烈但是混乱的冲锋；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那些不怕攻击的西方重装骑手的践踏。只有英国步兵例外，它得力于一种厉害的武器——大弓。这一时期欧洲骑兵在军队中所占的比重无疑不像几世纪后那样大，甚至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骑士的数量不是很多的，我们发现，在多次大会战中，参战的骑士不到800—1000名。但是，他们只要将敌人的重装骑手逐出战场，通常足以对付任何数量的步兵。这些重装骑手通常排成一列，成横队作战；后一列为侍从兵，他们的装备一般较轻，而且不齐全。这种横队一同敌人接触，便立即散开单骑作战，所以会战是以单纯的白刃格斗结束的。后来，由于使用了火器，才开始建立纵深的队形，通常为方形；但这时骑士阶层已快没落了。

在十五世纪，战场上出现了炮兵，而一部分步兵——当时的射击手——则装备了火枪；与此同时，步兵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兵种开始由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编成。德国雇佣兵和瑞士兵就是这种职业兵；他们很快规定了较正规的队形和战术动作。古代的多立斯和马其顿方阵在一定程度上又复兴了；头盔和胸甲使步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骑兵的矛和剑；在诺瓦拉会战

(1513年)²⁸⁸中,瑞士步兵把法国骑士完全逐出战场,从此,这种勇敢但是笨拙的骑兵就不再使用了。因此,在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式骑兵——德语为 *Reiters* (雇佣骑兵) (法语为 *reitres*),这种骑兵同步兵一样,是用自愿报名的办法召募来的,装备有头盔、胸甲、双刃刀和手枪。他们的装备和现代胸甲骑兵的一样重,但比骑士的轻得多。他们很快就表明比全身披戴铠甲的骑兵优越,从此后者逐渐绝迹,矛也随着绝迹了;双刃刀和短銃火器成了骑兵通用的武器。约在同一时期(十六世纪末),起先在法国,随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种步骑两用兵——龙骑兵。龙骑兵配备火枪,它根据情况有时作为步兵、有时作为骑兵作战。类似这样的兵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曾建立过,称为第马赫(*dí-machae*),但这种做法长期没有被仿效。十六世纪的龙骑兵存在了较长时期,但到十八世纪中叶,他们到处都只保留了名称,而失去了原有的两用性质,一般仅作为骑兵使用了。龙骑兵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完全不披戴护身器具的正规骑兵。俄皇尼古拉曾试图再次大规模地建立作为真正的两用兵的龙骑兵,但不久就看出,到临阵之际总是不得不把它作为骑兵使用,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又把龙骑兵改编为像骠骑兵和胸甲骑兵那样很少担任步兵勤务的一般骑兵了。荷兰的伟大统帅奥伦治亲王摩里茨首先在其雇佣骑兵中建立了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战术编制相似的编制。他训练他们以独立的部队成几列横队进行冲锋和运动,训练他们以独立的连和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种转法和摆脱敌人的动作,排成纵队和横队,变换正面。这样一来,骑兵战斗的结局就已经不取决于全部骑兵的一次冲锋,而取决于相互支援的各独立骑兵连和各列横队的连续冲锋了。奥伦治亲王摩里茨的骑兵通常排成

纵深为 5 列的队形。其他各国军队的骑兵则成长纵队作战，而在采用横队的地方，其纵深仍为 5—8 列。

在十七世纪，由于耗资过多的重装骑手完全废除，骑兵的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兵种在任何时期任何军队中从来还没有占过这样大的比重。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各国军队中一般都有五分之一以至几乎二分之一的人员是骑兵；在个别场合，骑兵比步兵多一倍。这个时期最卓越的骑兵统帅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他的骑兵由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组成，而龙骑兵差不多总是作为骑兵作战。他的胸甲骑兵比皇帝的胸甲骑兵装备轻得多，而且不久就证明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瑞典骑兵排成 3 列，它一般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以手枪为主要武器的胸甲骑兵相反，惯于持双刃刀向敌人冲锋，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射击上。在中世纪，骑兵通常配置在中央，而在这个时期，骑兵又像古代那样，配置在军队的两翼，排成两线。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的对手。他只靠骑兵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²⁸⁹的胜利。

除瑞典军队和英国军队外，在大多数军队中，使用火器仍是骑兵在战斗中的基本行动方法。在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骑兵被训练使用马枪，正像步兵使用火枪一样；射击是整行、整列、整排地在

马上进行,射击时停止前进;接敌冲锋时,横队快步前进;距敌人不远时停止前进,进行齐射,抽出双刃刀,然后冲锋。步兵宽横队的有效射击,动摇了人们对已无盔甲护体的骑兵冲锋的一切信心,因而骑术被忽视,快步行进不会了,甚至在缓步行进时人马失事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训练大都徒步进行,因而骑兵军官对如何指挥骑兵作战毫无所知。固然,法国骑兵有时是挥着双刃刀冲锋的,而忠于本民族传统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则一贯以骑兵全速冲锋,不进行射击,冲散敌人的骑兵和步兵,有时甚至攻占轻型野战工事,但是,只有弗里德里希大帝及其伟大的骑兵指挥官泽德利茨才承担了根本改革骑兵的使命,并使骑兵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弗里德里希从他父亲^①那里继承下来的普鲁士骑兵是由骑着笨拙的马匹、只受过射击训练的重装骑手组成的,它在莫耳维茨会战(1741年)中转眼间就被粉碎了。但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²⁹⁰一结束,弗里德里希便立即彻底改组了骑兵。射击和徒步训练退居次要地位;骑术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各种动作均应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各种转法应以轻跑步进行。骑兵军官应首先把自己的兵士培养成优秀的骑手;胸甲骑兵应像骠骑兵那样精于骑术,还应熟练地使用双刃刀。”

骑兵应每日练习骑术。乘马通过起伏地、超越障碍和劈刺是主要的训练项目。冲锋时在敌军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未被彻底突破前不得射击。

“每一骑兵连冲锋前进时,应持双刃刀砍杀敌人,任何指挥官都不得允许部下射击,否则应受降级处分;旅长应对此负责。进攻时,首先应以快步前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进,最后转为快跑,但要保持密集队形;国王深信,如以此种方法冲锋,敌人必将被粉碎。”“每一骑兵军官应永远记住,为粉碎敌人必须做到两点:(1)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2)从翼侧迂回敌人。”²⁹¹

从弗里德里希制定的守则中摘录的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骑兵战术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弗里德里希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泽德利茨,他一直指挥弗里德里希的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由于泽德利茨的训练,在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骑兵在神速地和有组织地冲锋、迅速地变换队形、巧妙地向翼侧冲锋、冲锋后迅速集合和变更部署等方面,是任何骑兵都不能相比的。成果很快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时,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共10个骑兵连)彻底打败了奥地利步兵的左翼,击溃21个营,缴获军旗66面、炮5门并俘掳4000名敌军。在措尔恩多夫会战中,当普鲁士步兵被迫退却时,泽德利茨率领36个骑兵连将得胜的俄国骑兵逐出战场,然后猛攻俄国步兵,俄国步兵彻底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罗斯巴赫、施特里高、凯塞多尔夫、莱滕以及其他十次会战的胜利,弗里德里希都是靠他的出色的骑兵取得的。²⁹²

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采用了普鲁士军队的一套制度,但是法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法国骑兵由于革命而濒于瓦解,而新编部队在战争初期几乎不能使用。法国新征集的步兵在1792年和1793年与训练有素的英、普、奥骑兵作战时,几乎屡战屡败。法国骑兵由于完全无力同这些对手较量,因而总是作为预备队使用,以后数年的征战才使它得到改进。从1796年起,每个步兵师都有骑兵支援;然而,维尔茨堡会战时,法国全部骑兵仍被59个奥地利骑兵连击溃(1796年)²⁹³。拿破仑执掌法国政权时,曾全力提高法国骑兵的质量。当时,他不得不训练质量低劣到了极点的人

员和马匹。法国人在欧洲无疑是最不善骑的民族，他们的马用于驾车还不错，但不适于乘骑。拿破仑本人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骑手，他对别人的骑术也采取漠视的态度。然而他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建立布伦兵营以后，他的骑兵（骑的大都是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匹）已成了一个不容轻视的对手。在1805年和1806—1807年的战局中，他的骑兵夺取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几乎全部马匹，此外，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莱茵联邦和华沙大公爵²⁹⁴的精锐骑兵的加强。这样就建成了拿破仑于1809年、1812年和1813年下半年用以作战的那支庞大的骑兵；这支骑兵虽然通常称为法国骑兵，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德国人和波兰人。革命前不久在法军中已完全废除了胸甲，又部分地被拿破仑在重骑兵中恢复起来。此外，骑兵的编制和装备几乎没有改变，不过，拿破仑在得到波兰辅助部队的同时，还得到了几团装备着长矛的轻骑兵，这些轻骑兵的服装和装具的式样不久就为其他军队仿效。拿破仑彻底改进了骑兵的战术使用原则。他根据师和军由三个兵种编成的原则，给每个师或军编入一定数量的轻骑兵，但骑兵的基本兵力，特别是全部重骑兵，则集中留作预备队，用以在有利时机进行强有力的决定性的突击，或在必要时掩护军队撤退。这些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的某一点，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他们还是一直没有取得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骑兵所取得的那样光辉的战绩。其原因部分是步兵战术改变了：步兵多半选择起伏地作战，而且总是列成方队对抗骑兵，这就使骑兵难以取得像普鲁士骑兵对敌人正面宽而纵深小的步兵横队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同时，没有疑问，拿破仑的骑兵是不能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骑兵媲美的，拿破仑的骑兵战术也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比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先进。法军由于骑术不精，只得较慢的步

度——快步或正规的轻跑步冲锋；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快跑冲锋。法军的骁勇和密集队形的采用，虽然常常弥补了不够迅速的缺点，但他们的冲锋在现今看来也不能算是高明的。在很多场合，法国骑兵保留了旧的战术——手持马枪、勒马不动地迎击敌军骑兵，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都遭到了失败。运用这种战术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丹宁科夫会战（1813年4月5日）²⁹⁵。当时约1200名法国骑兵就是这样等待400名普鲁士骑兵的攻击，前者虽然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至于拿破仑的战术，则使用大量骑兵是他坚定不移的原则，结果，不仅师属骑兵被削弱得不堪使用，而且在大量使用骑兵时，他又往往忽视兵力应逐次投入战斗的原则，而这却是现代战术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它对骑兵比对步兵更适用。拿破仑把骑兵排成纵队进行冲锋，甚至还把整个骑兵军编成一个庞大的纵队；从这种队形中哪怕是调出一个连或一个团来单独作战，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更谈不到什么展开了。拿破仑的几个骑兵将军也不称职，连其中最优秀的缪拉特，同泽德利茨比较起来也显得十分可怜。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的战争期间，拿破仑的敌人的骑兵战术有了重大的改进。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仿效拿破仑的做法——将大量骑兵留作预备队，因而大部分骑兵常常不参加任何军事行动，但在许多场合他们还是试图恢复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在普鲁士军队中恢复了原来的精神。布吕歇尔首先较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骑兵，并且一般都获得了成功。在海瑙伏击战（1813年）中，普鲁士20个骑兵连击溃了法军8个步兵营，并缴获了18门炮。这次伏击战是现代骑兵史上的转折点，它比吕特岑会战时同盟国军的战术高明得多。在吕特岑会战中，同盟国军把18000名骑兵留作预备队一直到会战失败时止，虽然当时难以找

到较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

英国向来没有采取编组大量骑兵部队的做法，因而常常取胜，虽然纳皮尔本人承认当时英国骑兵不如法国骑兵那样好²⁹⁶。在滑铁卢会战（顺便插一句，法国的胸甲骑兵这一次是快跑冲锋的）中，英国骑兵的指挥很出色，它除了有几次因民族习性发作而失去了控制以外，总的说来行动是成功的。1815年的和约以后，拿破仑的战术又被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取代，虽然仍旧被规定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的操典中。骑术得到了较多的注意，虽然仍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手持马枪迎击敌人的作战思想已被摒弃；到处恢复了弗里德里希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一个骑兵指挥官如不主动攻击敌人，而让敌人攻击自己，便应受到降级处分。跑步又成为冲锋的步度；纵队冲锋让位于以一系列横队的逐次冲锋，并采用能保障翼侧攻击的队形，以及冲锋时能以独立的小部队机动的队形。然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对骑术、特别是对野战条件下的骑术予以更多的注意，使马鞍的构造更接近于猎人用的样式，并相应地改变骑马的姿势，而最主要的是减轻马匹的负荷，——这些就是各国军队无一例外地需要做的改进。

现在我们放下骑兵史，来谈谈骑兵的现代编制和战术。每个国家骑兵兵员的补充方法总的说来同该国其他兵种的补充方法一样。不过，某些国家是规定一定地区的人来充当骑兵的，例如：在俄国是小俄罗斯人（在小俄罗斯出生的人），在普鲁士是波兰人。在奥地利，重骑兵在德意志各省和波希米亚补充，骠骑兵仅限于在匈牙利补充，枪骑兵主要在波兰各地方补充。马匹的补充方法值得专门提一下。在英国，战争时期全部骑兵所需的马不到1万匹。政府采购并不困难，但为了保证军队优先使用约在五龄以下、未曾参加过

劳役的马匹，政府采购三龄的牡马，其中大部分为约克郡种马，在马匹适于服役以前，由政府出资在马场饲养。英国盛产好马，并以每匹 20—25 英镑的价格征购牡马，这就保证不列颠骑兵配备了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马匹。俄国同样盛产马匹，不过质量低于英国。军马采购官在帝国的南部和西部各省大都向犹太人成批采购；然后把不适用的马转卖，剩下的马按毛色分发给各团（在俄国军队中，一个团要选用毛色相同的马）。团长被当做本团全部马匹的所有者，他应当用拨给他的大批经费妥善饲养本团的马匹。马的服役期限规定为 8 年。起初马匹由沃伦和乌克兰的各个大养马场供给，但这些马野性未改，调教非常困难，因此只得放弃了这种做法。在奥地利，一部分以匹是买来的，但近来大部分马匹是由国家养马场供应的，养马场每年可提供五龄的军马 5 000 匹以上。像奥地利这样盛产马匹的国家，在极需马匹的时候，可以依靠国内市场。在 60 年前，普鲁士所需的马匹几乎全部从国外购买，然而目前国内出产的马匹已能供应全部骑兵，包括常备军和后备军的骑兵。常备军骑兵的马匹在三龄时就由采购官买来，送到马场豢养到服役年岁；每年需要 3 500 匹。在动员后备军骑兵时，国内的所有马匹像有服役义务的人一样，都必须应征；但每征一匹马，都偿付相当于 40 到 70 美元的代金。在普鲁士适于服役的马比所需的多两倍。法国的产马量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少。法国的马用来驾车往往不错，甚至很出色，但一般不适于乘骑。国家养马场 (haras) 虽早已建立，但没有取得其他国家那样的成就。在 1838 年，这些养马场以及同它有关的军马供应处甚至不能为军队提供 1 000 匹由政府采购来的或饲养大的马。拉罗什-艾蒙将军认为，全法国甚至找不到 2 万匹四龄到七龄的适于骑兵勤务的马。²⁹⁷ 虽然军马供应处和养马场近

来已有很大改进,但仍然不能充分满足军队的需要。阿尔及利亚提供一种出色的军马,法军的精锐骑兵团——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团——全都配备这种马,但其余的团几乎一匹也得不到。因此,在动员时,法国人只好从国外——有时从英国,但大都从北德意志——购买马匹。从北德意志购买的马,虽然每匹要花费约100美元,但是还都不是最好的马。许多被德国骑兵团淘汰的马都出现在法军的队伍里,所以,除了 chasseurs d'Afrique 外,法国骑兵一般都配备着欧洲最坏的马。

骑兵分为两大类:重骑兵和轻骑兵。它们的实际区别在于马匹不同。体壮力大的马和矮小灵活的快马不可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前者在冲锋时动作较慢,但冲击力较大;轻巧的马跑得较快,冲得猛,尤其适于单骑作战和成散开队形作战,而笨重的或高大的马在这方面就既不够灵活,也不够机敏。正因为如此,骑兵的这种分类的确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学时髦、凭想像以及模仿一定的民族服装,骑兵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了。大多数国家的重骑兵,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披戴胸甲的,不过这种胸甲远不是枪弹穿不透的;在撒丁,第一列重骑兵装备着长矛。轻骑兵一部分装备马刀和马枪,一部分装备长矛。马枪有滑膛的和线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骑兵还佩带手枪;唯独合众国骑兵配备着转轮枪。马刀有直的,有不同程度弯曲的;前一种宜于刺,后一种宜于劈。矛是否比马刀优越,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马刀无疑更适于白刃格斗;矛太长、太重,用来冲锋未必适宜,但在追击溃逃的骑兵时,它成了极有效的武器。几乎所有善骑的民族都指靠马刀;甚至哥萨克同善于使用马刀的切尔克斯人作战时,也不用长矛。手枪除了用来发信号外,别无用处;马枪即使是线膛的,效用也不很大,

如果不是后装的,那永远不会带来很大的实际好处;转轮枪在好射手的手里,是厉害的近战武器;然而锋利适用的精制马刀仍然是骑兵武器之王。

骑兵的马除负载鞍具和武装的骑手外,还要驮载备用服装、野营用具和饲马用具,战时还要驮载粮秣。在各国军队和各类骑兵中,马匹在行军时的总载重量在250—300磅之间;这个重量比民用马匹的载重量大得多。马匹这种过重的负荷是一切骑兵的最大弱点。在这方面到处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骑手和行军装具的重量都可能而且应当减轻,但只要目前的这套规定存在,在判断骑兵的战斗力和耐力时,总是必须注意马匹的负重量。由身体强健、但体重尽量轻的骑手和健壮的马匹组成的重骑兵,主要应作为以密集队形进行集中攻击的力量。为此,就需要有体力、耐力和一定重量的负荷,虽然也不能太重而使骑兵行动不便。骑兵的行动应当迅速,但必须以保持最严整的队形为限度。列阵冲锋时,骑兵应勇往直前,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重骑兵的骑手虽然单个可能不会都像轻骑兵那样善骑,但应当有把握地控制自己的坐骑,并学会紧密靠拢,严格地照直前进。因此,他们的马对骑手小腿动作的反应不能过敏,也不能举蹄过急,但要善于快步行进,并学会在长时间轻跑步时严格保持队形。轻骑兵则相反,它的骑手较灵活,马匹也较快,因此行动迅速,并能到处奔驰。它重量轻的缺点,应以迅速和积极行动来弥补。它极勇猛地冲锋;但当时机有利时,可故作逃跑姿态,以便随后突然变换正面,攻击敌军的翼侧。轻骑兵速度极快,又便于单骑作战,因而特别适于追击。轻骑兵指挥官必须具有比重骑兵指挥官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头脑。轻骑兵的每个骑手都应当精于骑术,熟练地掌握自己的坐骑,善于从停止间转为快跑,

在急驰中停住，迅速转弯和灵活地超越障碍。轻骑兵的马匹要勇猛迅速，对缰绳和骑者小腿动作的反应敏捷，转弯灵巧，受过专门的轻跑调教，而且步伐矫健。轻骑兵除用于向翼侧和后方勇猛攻击、伏击和追击外，还应担任整个军队的大部分警戒和巡逻勤务；因此，擅长单骑战斗（纯熟的骑术是单骑战斗的基础）是对轻骑兵的主要要求之一。骑兵成横队行进时，队形不应密集，这样就能够随时变换正面和进行其他的机动。

英国在名义上有 13 个轻骑兵团和 13 个重骑兵团（龙骑兵，骠骑兵，枪骑兵；胸甲骑兵只组成两团禁卫军），但在实际上，从编成和训练来看，英国的全部骑兵都是重骑兵；骑兵的身材和马匹的大小差别都很少。真正的轻骑兵勤务英国一向是利用外籍部队担任的：在欧洲利用德国人，在印度利用土著非正规部队。法国有三类骑兵：轻骑兵（骠骑兵和猎骑兵）共 174 个连；基干骑兵（枪骑兵和龙骑兵）120 个连；预备队骑兵（胸甲骑兵和马枪兵）78 个连。奥地利有重骑兵（龙骑兵和胸甲骑兵）96 个连和轻骑兵（骠骑兵和枪骑兵）192 个连。普鲁士的常备军内有重骑兵（胸甲骑兵和枪骑兵）80 个连，轻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72 个连；战时可能增加第一类后备军的枪骑兵 136 个连；第二类后备军的骑兵未必在任何时候都编成独立的单位。俄国骑兵由重骑兵（胸甲骑兵和龙骑兵）160 个连和轻骑兵（骠骑兵和枪骑兵）304 个连组成。作为步骑两用兵的龙骑兵部队现在不再编组了，龙骑兵已编入重骑兵。然而俄国真正的轻骑兵是哥萨克，其数量足够在俄国各个部队中担任各种警戒、侦察和非正规骑兵的勤务。合众国军队中编有 2 个龙骑兵团，1 个猎骑兵团和 2 个名义上叫做骑兵的团；一般把所有这些团都叫做骑兵团。实际上，合众国骑兵只是一种骑马的步兵。

骑兵的战术单位是连,其人数以连长在变换队形时能用口令和动作直接指挥全连为限。一个连的人数在 100 名(英国)到 200 名(法国)之间;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人数也不超过这一范围。4 个、6 个、8 个或 10 个骑兵连组成一个团。人数最少的是英国骑兵团(400 到 480 人),人数最多的是奥地利轻骑兵团(1600 人)。全团的人数过多,则行动不便;人数过少,则兵力在战争期间会很快耗尽。例如,英国 1 个轻骑兵旅在战局开始后还不到两个月就进行的巴拉克拉瓦会战时只有 5 个两连制的骑兵团,勉强达 700 人,即相当于俄国 1 个骠骑兵团战时编制人数的一半。特殊编制的有英国的连即半连,奥地利的营即双连,这些都只是为了使团长能够在骑兵团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进行指挥而设立的中间组织。

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前,所有的骑兵都排成纵深不少于三列的队形。弗里德里希于 1743 年首次把自己的骠骑兵排成两列,而在罗斯巴赫会战时,他的重骑兵也排成同样的队形。七年战争以后,这种队形为所有其他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现在还是唯一被采用的队形。为了便于变换队形,连分为 4 个排;由横队变纵队(各排向纵深疏开)以及反过来由纵队变横队,是一切骑兵机动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动作。其他大多数动作仅用于行军(三路侧敌行军等)或用于特殊场合(成排或连横队的密集纵队)。骑兵在战斗中的行动主要是白刃格斗,射击仅占次要位置,冷兵器(马刀或长矛)是骑兵的主要武器;骑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冲锋上。所以冲锋是衡量骑兵是否善于进行各种机动、变换队形和占领阵势的准绳。一切给冲锋造成困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冲锋的威力取决于战士和马匹在冲锋将要结束的时机,即同敌人实际接触的时机,是否共同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以逐渐加快的速度接近敌

人,只有当马匹距敌人近时才全速冲进。但是,实现这种冲锋是骑兵必须解决的任务中差不多最难的一项。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前进时,要保持严整的队形和协调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在极不平坦的地形上行动时尤其如此。这里就可以看出,严格照直前进是多么困难,又多么重要,因为假如不是每个骑兵都照直前进,在横列中就要出现挤撞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会由中央波及到两翼,又由两翼波及到中央;战马因而紧张不安,马匹的速度和冲力便开始参差不齐,整个队形很快就会乱得不成样子,无法保持整齐的横列,而完全失去唯一能够保障胜利的那种紧密协调。其次,显然,当逼近敌人时,马匹不愿冲入停立不动或正在移动的敌群,这时骑手就应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冲锋必将失利。因此,骑手不仅要有冲入敌阵的坚强决心,而且要能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战马。各国军队的操典对冲锋时的骑兵的行动方法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横队尽可能以慢步开始前进,然后转为快步,距敌人 300—150 码时转为轻跑步,并逐渐加快前进速度,转为快跑,距敌人 20—30 码时则全速前进。不过,所有这些规定允许有很多例外,实际上,在各种情况下都必须注意地形的特点、天气、马匹的状况等等。骑兵对骑兵冲锋时,如双方直接相撞(这种情况在骑兵战斗中极为罕见),则在相撞的一瞬间,马刀的作用就不大了。这时依靠惯力,一方就可冲倒和驱散对方。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最勇敢的骑兵连就将极其沉着、坚决、勇猛、ensemble(协调一致)和齐心合力地前进。因此,任何骑兵如不“勇猛”[《dash》],就不可能有所建树。但只要一方的队伍被冲散,马刀和个人骑术便开始发挥作用。这时,得胜的骑兵至少有一部分要离开战术队形,以使用马刀杀敌取胜。由此可见,成功的冲锋能立即决定战斗的胜负;但是,如

果冲锋不继之以追击和单骑白刃格斗，那末战果就不会很大。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切的另一方，正因为如此，非正规骑兵无论怎样善战，数量怎样众多，也不能击溃正规骑兵。没有疑问，就个人的骑术和刀法来说，从来还没有一支正规骑兵能比得上素来善骑的东方各民族的非正规骑兵，但是，就连欧洲最坏的正规骑兵在平地战斗中也总是战胜这种非正规骑兵。从匈奴人在夏龙战败（451年）以后一直到1857年印度西帕依起义298这个期间，就没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出色的、但非正规的东方骑兵曾以冲锋打垮过哪怕只是一个团的正规骑兵。非正规骑兵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没有严整的陈列，因此丝毫也不能动摇密集的、勇猛行进的队形。只有当正规骑兵的战术队形陷入混乱和开始单骑战斗时，非正规骑兵的优越性才能显示出来；但是非正规骑兵直接向敌人乱冲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只有当正规骑兵为追击逃敌而放弃横队和展开单骑战斗时，非正规骑兵突然向后转并利用有利时机，才能将前者击败。实际上，从安息人与罗马人战争的时期起，非正规骑兵对正规骑兵作战的全部战术几乎就是使用这种计谋。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拿破仑的龙骑兵在埃及的作战。无疑地，它是当时最坏的正规骑兵，但总是打败最出色的非正规的骑手——马木留克兵。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²⁹⁹

能较好地保持自己的战斗队形的骑兵部队，不管在冲锋时占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但还是很明显，甚至这样的部队在成功的冲锋后队形也要相对地受到破坏。冲锋不可能在一切地点都取得同样

的决定性胜利；许多兵士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单骑格斗或追击；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二列还能大致保持队形。这是骑兵最危险的时刻，只要有很小的一队生力军向它冲击，便能使它前功尽弃。因此，冲锋后迅速集合是真正优良的骑兵的标志，而恰恰在这方面，不仅新编部队，而且有时甚至英勇而有经验的老部队也有严重的缺点。骑烈马的英国骑兵尤其容易失去控制；他们几乎到处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滑铁卢和巴拉克拉瓦）。发出集合信号以后，追击通常由特别指派的或预先规定的几个排或连进行；这时，骑兵的基本兵力重整队形，准备应付任何意外。鉴于冲锋后甚至胜利者都会处于紊乱状态，就迫切需要经常拥有预备队，以便首先在战斗失利时可以使用；因此，骑兵战术的基本规则，总是只把当时拥有的兵力的一部分投入战斗。这种普遍采用的使用预备队的方法，说明大规模骑兵会战中情况变化多端，时而一方居优势，时而另一方占上风，双方互有胜负，直到最后留下的预备队以完整的战斗队形全力向溃乱而惊散的敌群猛冲，并决定战斗的结局时为止。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地形。没有一个兵种像骑兵这样受地形的影响。泥泞松软的土壤会使袭步变为慢跑步；单个骑手毫不犹豫便可超越的障碍，却能破坏队形和队列的协调一致；尚未劳累的马匹轻易便可越过的障碍，却能把从清早就奔驰而未吃草料的马匹绊倒。同时，意外的障碍又会阻滞骑兵的前进和迫使它变换正面和队形，从而使整个横队处于敌人翼侧攻击之下。缪拉特在莱比锡会战中所进行的总攻就是骑兵攻击不当的一个例子。他把14000名骑兵排成一个长纵队，去攻击向瓦豪村冲锋而刚被击退的俄军步兵。法军骑兵以快步接近敌人；在距同盟国军步兵约600—800码处转为轻跑；马匹在松土上很快就疲惫了，到他们到

达方队的时候,进攻的锐气已经消失了。结果同盟国军只有少数伤亡严重的步兵营被击溃。大队骑兵绕过其余的方队,穿过步兵的第二线,但并没有给步兵以任何杀伤,最后到达了池塘和沼泽地一线,他们就只得停止前进。这时马匹已筋疲力尽,队形也混乱了,各团都混杂起来并失掉了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两个团和哥萨克近卫骑兵(总数不到 2000 人)突然攻击法军骑兵的两翼,迫使法军狼狈逃窜。当时缪拉特既没有预备队以应付意外情况,也没有适当注意前进的步度和距离,结果遭到了失败。

冲锋可采用各种队形。战术家把冲锋分为: en muraille (密集队形的) 冲锋,即冲锋的横队中各连之间根本没有间隙或仅有很小的间隙;间隙队形的冲锋,即连与连之间相隔 10—20 码; en ∞ chelon (梯次队形的) 冲锋,即从一翼开始,各连相继冲锋,因此,各连不是同时、而是先后接触敌人,假如将一个连列为疏开纵队,跟在构成第一 ∞ chelon (梯队) 的连的外翼侧的后面前进,那就可使这种冲锋大为加强;最后一种是纵队冲锋,它与前几种冲锋根本不同,因为前几种冲锋只不过是横队冲锋的不同形式。在拿破仑以前,横队是一切骑兵冲锋通用的和基本的形式。在整个十八世纪,仅在一种场合,即在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时,骑兵才排成纵队冲锋。但是,拿破仑的骑兵都是勇敢而不善乘骑的兵士,所以他不得不采用某种新战法来弥补骑兵战术上的缺陷。他开始使骑兵成长纵队冲锋,这样就迫使前列骑兵照直狂奔,同时又向选定的冲锋地点投入比横队冲锋时多得多的骑兵。尽量以大纵队作战竟成了拿破仑在 1807 年战局以后各次战局中的一种癖好。他首创了异常庞大的纵队队形,由于在 1809 年侥幸成功,在以后的各次战局中他就固执地坚持这种队形,尽管这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

到失败。他把整师的步兵或骑兵编成纵队,使各营和各团展开,重叠配置。骑兵于1809年在埃克缪尔初次作了这种尝试,当时10个胸甲骑兵团成纵队冲锋,其中第一线展开2个团,其后四线各展开2个团,各线间的距离约60码。步兵在瓦格拉姆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以整师编成纵队,同时各营展开,先后跟进。这种战法用来对付当时慢条斯理的奥地利军队还不致造成危险,但在以后的各次战局中,以及同行动较积极的敌人作战时,便招来失败。我们已经看到缪拉特在瓦豪采用这种队形总攻时所招致的悲惨后果;德尔隆在滑铁卢发起的步兵总攻所遭到的致命的失败,也是由于采用这种队形造成的³⁰⁰。骑兵采用大纵队作战尤其错误,因为这样就把最宝贵的兵力变成笨拙不灵的一群人马,一旦投入战斗,再也无法指挥,因此,无论在正面取得怎样的胜利,当翼侧受到指挥灵活的小股敌军攻击时,它总是束手无策。用编成一个这种纵队的兵力,可以建立第二线和一两支预备队;用他们来冲锋,即使不能立即收到突出的效果,但反复几次冲锋,无疑终会以较小的伤亡而获得较大的战果。事实上,大多数军队都已摈弃了这种纵队冲锋的方法,或者只把它当做一种奇特的理论,而在实际的做法上,则使大队骑兵列成数线,各线之间留有一个冲锋距离,在长时间格斗时,每一线均可支援和替换另一线。拿破仑还第一次把数个骑兵师编成一个大单位,称为骑兵军。预备队骑兵的这种组织,作为在一支庞大的军队中简化命令传达的一种手段是极端必要的;但在战场上,当这些军作为统一的整体作战时,保留这一级组织则从未带来良好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大纵队队形所以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现代的欧洲军队中,骑兵军一般都保留了下来;在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中甚至还规定了这种骑兵军在战场

上的标准队形和作战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的基础就是把兵力编为第一线和第二线以及预备队；这些原则也包括配属给骑兵军的骑炮兵应如何配置的规定。

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骑兵的行动，仅限于骑兵对骑兵作战而言。但在会战中使用这一兵种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在当前实际上是主要的目的，是对步兵作战。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步兵同骑兵作战时几乎从来没有排成方队。步兵在迎击冲锋时，仍保持横队；如冲锋指向翼侧，几个连就向后折回，排成 *en potence* (拐子形) 来迎击敌人的冲锋。弗里德里希大帝曾告诫他的步兵，绝不可排成方队，除非孤立的步兵营突然受到骑兵的袭击；如在这一场合排成方队，

“方队应直接朝敌人的骑兵前进，击退他们，并不再理睬他们的冲锋，而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

当时，步兵的纵深较小的横队全靠自己有效的火力迎击骑兵的冲锋，并且也确实常常击退了骑兵的冲锋；但这种横队一旦被突破，则必然被粉碎，霍恩弗里德贝尔格和措尔恩多夫会战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在很多场合纵队代替了横队，步兵只要有可能，总是以方队来迎击骑兵的冲锋，这已经成了惯例。诚然，在现代各次战争中，有一系列的例子说明，精良的骑兵突然袭击列成横队的步兵而被步兵的火力所击溃，但这种情况总是例外。现在问题在于骑兵是否有充分把握粉碎步兵的方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看来公认的论点是：在一般情况下，未被炮火打散的精良的新锐步兵有很大可能抵挡住骑兵，而对于没有经验的、长时间处在敌人炮火下经过一天激战伤亡较大因而筋疲力尽和丧失斗志的步兵，则行动坚决的骑兵占上风。不过也有例外，如德国龙骑兵在加

尔西亚-埃爾南迪斯会战(1812年)³⁰¹冲锋时,3个骑兵连中就有1个连击溃了法国新锐步兵的1个方队;然而通常骑兵指挥官并不认为用自己的骑兵去攻击这种步兵是明智的。在滑铁卢会战中,奈元帅以大批法军预备队骑兵向威灵顿军队的中央发动总攻,但未能粉碎英军和德军的方队,因为被攻击的部队隐蔽在丘陵后面很远的距离上,炮火轰击对他们的伤害极小,所以他们几乎完全是新锐的。因此,这种冲锋只能在会战的最后阶段采用,这时步兵因积极作战或是在密集的炮火下消极行动而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冲锋便可取得决定性的效果,特别是当它得到步兵预备队的支援时,就像博罗迪诺和利尼^①两次会战时的情况那样。

这里,我们不能一一阐述骑兵在执行警戒、巡逻、护送等勤务时所能担任的各项职责。但是,在这里简单叙述一下骑兵战术的一般原则是适宜的。由于步兵日益成为会战的主力,骑兵的战法无疑应当或多或少地服从于步兵的战法。因为现代战术是以三个兵种的配合和相互支援为基础的,所以至少对部分骑兵说来就谈不上独立行动。根据这种情况,各国军队的骑兵总是分为两类:师属骑兵和预备队骑兵。第一类是编入各步兵师和军并与步兵隶属同一指挥官的骑兵。它在战斗时的使命,是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有利时机来取得胜利,或当步兵遭到优势兵力攻击时,协助步兵退出战斗。它的行动自然有局限性,兵力也不足以独立作战。预备队骑兵是军队骑兵的主力,它对于整个步兵来说同样起着从属性的作用,就像师属骑兵与它所在的步兵师的关系一样。因此,预备队骑兵应随时做好准备,以待有利时机进行毁灭性的突击,击退敌人步兵或

^① 见本卷第258—263页和第191页。——编者注

骑兵的总攻,或伺机进行决定性的骑兵冲锋。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预备队骑兵最适用于大会战的最后阶段,这时它能起而且确实常常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泽德利茨率领骑兵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设想了,但是,骑兵的作用对现代多数大会战的结局仍有很大影响。骑兵在追击时的作用特别大。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只要保持队形,沉着坚定,就没有理由惧怕与骑兵作战;但步兵无论由于什么原因而队形混乱时,就会成为向它冲来的骑兵的猎物。遇到骑兵时不能逃跑,因为优秀的骑兵甚至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也能前进;以骑兵猛追溃敌,在任何时候都是彻底巩固战果的唯一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无论步兵在会战中起多大作用,骑兵仍然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兵种。现在,像过去一样,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3 月初—
6 月 21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筑城³⁰²

人们有时把这个题目分为防御筑城和进攻筑城两部分，防御筑城规定改造某一地形使之长期或短期适于防御的方法，进攻筑城则包含围攻的各种规则。但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题目分为三部分来谈：**永备筑城**，即在平时使某地的防御能迫使敌人在进攻时对它采取正规围攻的一种方法；**围攻法**；**野战筑城**，即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某地可能暂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构筑非永久性工事予以加强的一种方法。

一、永备筑城

工事的最古老的形式看来是防栅，直到十八世纪末，防栅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民族形式的工事（palanka），甚至现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缅甸人还在广泛使用。防栅是由两列或三列排得很紧密的坚固木桩垂直插入地下构成的，它形成环绕整个被防卫的城市或兵营的围墙。大流士在向斯基台人进军时，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的塔巴斯科附近和库克船长在新西兰都曾遇到过这种防栅。有时，各列木桩之间填满泥土；在另一些场合，木桩用藤条牢牢系在一起。下一步是石墙代替了防栅。这种工事使用的时间较长，同时

对它攻击也困难得多。从尼尼微和巴比伦时期起直到中世纪末，在所有比较文明的民族中，石墙是唯一的筑城手段。石墙筑得很高，甚至使用云梯也难于攀登，而且相当厚，足以长时间抵御攻城槌的撞击，并使防御者可以在较薄的、带垛的石质胸墙的掩护下在石墙上自由行走，通过胸墙上的射孔，则可向围攻者射箭或抛丢其他投掷物。为了加强防御，胸墙不久便筑在石墙顶端向外突出的悬石上，悬石之间留有孔隙，使防守者可以看到墙根，如果敌人进到这里，防守者就可以直接从上面投物杀伤他们。至于围绕整个石墙挖掘护城壕作为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毫无疑问，这也是在很早时期就有了。最后，紧靠石墙每隔一定距离又增建了一座塔楼，形成石墙的突出部，从这里可以对在两座塔楼之间攻城的军队投物射箭，从侧面防守石墙，石墙的防御能力就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塔楼比石墙高，用横胸墙与石墙顶隔开，瞰制着石墙，而且每一塔楼本身又是一个小堡垒，在防守者已被迫撤离主墙以后，敌人仍必须分别夺取。如果再补充一点，即在有些城市中，特别是在希腊，在要塞内的制高点上构筑某种城砦（内城），形成内堡和第二道防线，那末我们就把石墙时代筑城工事最主要的特点说得详尽无遗了。

但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末这一时期中，炮兵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攻打筑垒地点的方法。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大量有关筑城的著作，它们提供了无数的筑城体系和方法，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地被采用和推广了，而另外一些——并不经常是最差的——却往往被人们当做纯理论性的笑谈而忽视了，直到较晚的时期，其中一些有益的主张才被比较幸运的后继者重新发掘出来。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在旧的石墙体系和新的土质工事体系（仅在敌人从

远处看不到的部分才砌上石头)之间起了桥梁作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位作者³⁰³的命运就是这样。使用炮兵的直接结果,是石墙的厚度和塔楼的直径加大,而它们的高度减低。这时这些塔楼改称圆台堡(rondelli),它们构筑得相当大,能容纳数门火炮。为使防守者也能从石墙上用火炮射击,又在石墙后面加筑了土堤,使石墙有必要的宽度。不久我们看到,这种土质工事开始逐渐排挤石墙,而在某些场合完全代替了它。德国著名画家阿尔勃莱希特·丢勒发展了这种圆台堡体系,并使它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他在整个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个圆台堡,把圆台堡筑成完全独立的堡垒,各堡均有对护城壕进行纵射的穹窿炮台;他的石质胸墙没有掩蔽的部分(即围攻者可以看到的、成为他们平射的目标的那部分)高度不超过3英尺。此外,为了加强护城壕的防御,他建议构筑侧防暗堡——一种构筑在护城壕底部、围攻者看不到的穹窿式工事,它两面都有射孔,可以对直到多角形要塞邻近各角的一段护城壕进行纵射。几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新发明;如果说在他那个时代这些主张除了穹窿以外没有一个得到人们的赞同,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一些最重要的筑城体系中它们都得到了承认,并得到了与新时代已改变了的条件相适应的发展。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塔楼的外形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说是产生最新筑城体系的开端。圆形的塔楼有一个缺点,即无论是从中堤(两个塔楼之间的城墙)或是从相邻的塔楼进行射击,都不能把塔楼前面的所有各点全部置于火力之下:在靠近城墙的地方有些小的角度,敌人一到达那里就位于要塞火力范围之外。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塔楼被改建成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其中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其他四边则面向要塞外面。这种五角形的

工事叫做棱堡。为了避免重复和说不清楚，下面我们先叙述能说明棱堡防御主要特点的一种体系，并指出它的各部分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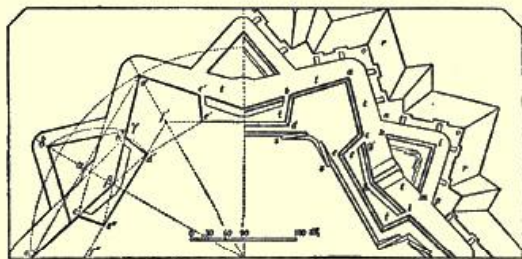


图 1

图 1 所示的是根据沃邦的第一种方法建成的六角形要塞的前三面。左半图是工事外形的几何草图，右半图是详细画出的土堤、斜堤和其他部分。多角形要塞的 $f'f'$ 线并不全部是连续的土堤，其两端 $d'f'$ 和 $e'f'$ 部分没有土堤，这段空间由向前突出的五角形棱堡 $d'b'a'c'e'$ 掩护。 $a'b'$ 线和 $a'c'$ 线构成棱堡的正面； $b'd'$ 线和 $c'e'$ 线构成棱堡的侧面；棱堡正面和侧面交会之点叫交点。从圆心到棱堡顶角的 $a'f'$ 线叫中线。六角形始边的一段—— $e'd'$ 线是中堤。这样，每一座多角形要塞有多少个边，就有多少个棱堡。棱堡有实心的和空心的两种：五角形棱堡内全部填土，填到架炮垒道（土堤上放置火炮的地点）的高度时，叫实心棱堡；土堤从垒道后面起就向棱堡内部成缓坡倾斜时，叫空心棱堡。图 1 中 $dbace$ 为实心棱堡，其右面只画出一半的是空心棱堡。棱堡和中堤合在一起组

成要塞的围墙，即要塞的核心部分。在棱堡和中堤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架炮垒道上的胸墙，胸墙构筑在前面，以便掩护防守者，其次可看到内斜面上的坡道（ss），这是用以和要塞内部保持交通的。要塞围墙的高度足以掩护城内房屋不受敌人平射火力的射击，而胸墙的厚度则足以长时间经受住重炮的轰击。整个要塞围墙的周围有护城壕 tttt，护城壕内配置有几种外围工事。首先，中堤前有三角堡或半月堡 klm——一种有两个正面 kl 和 lm 的三角形工事，每个正面都有配置火炮的土堤和胸墙。上述一切工事敞开的后面部分叫背面，所以三角堡的 km 线和棱堡的 de 线都是背面。三角堡的胸墙比要塞核心部分的胸墙约低 3—4 英尺，这样，后者便可瞰制三角堡的胸墙，必要时，要塞核心部分的花炮可超越三角堡进行射击。中堤和三角堡之间的护城壕内，有一种狭长的独立工事 ghi 叫做凹角堡，主要用来掩护中堤，使它不受敌人破城炮的射击。这种工事很低而且过于狭窄，不能配置火炮，其胸墙仅能在敌人强攻得利的时候，使步兵能从护城壕中进行射击，从翼侧掩护半月堡。护城壕外面是隐蔽路 nop，它的内侧是护城壕，外侧是斜堤 rrr 的内斜面，斜堤从自己的内缘即斜堤顶（ \square crete）起成极缓的斜坡向堤外地面倾斜。斜堤顶又比三角堡低 3 英尺或 3 英尺以上，以便要塞的全部火炮都能超越它而进行射击。在这些土质工事的斜面中，要塞核心部分的外斜面和护城墙内的外围工事的外斜面（即内岸），以及护城壕本身的外斜面（从隐蔽路向下的部分），即外岸通常都用石砌。隐蔽路的凸角和凹角构成的宽大的掩护地点叫屯兵场，在凸角处的叫凸角屯兵场（如 o），在凹角处的叫凹角屯兵场（如 np）。为了防止对隐蔽路的纵射，隐蔽路上每隔一定距离拦起一道横墙，即横方向的胸墙，只在靠近斜堤的一端留一

个不大的通路。有时还构筑小型工事，用来掩护从凹角堡通过护城壕到三角堡的交通。这种工事叫侧防暗堡，是一条两面用胸墙掩护的狭窄的通路，胸墙的外部表面成缓坡向下倾斜，和斜堤相似。图 1 中这种侧防暗堡位于凹角堡 ghi 和三角堡 klm 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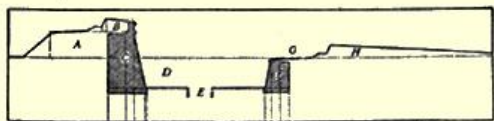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所示的断面图可以使上面的介绍更为清楚。A——要塞核心部分的架炮垒道；B——胸墙；C——内岸的石砌部分；D——护城壕；E——水壕，即沿护城壕中央挖掘的较小和较深的壕沟；F——外岸的石砌部分；G——隐蔽路；H——斜堤。胸墙和斜堤后面的梯阶叫踏垛，是步兵超越掩护自己的胸墙进行射击时立脚的地方。从图 1 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配置在棱堡侧面上的火炮可以射击到相邻棱堡前面的整段护城壕。这样，棱堡的正面 a'b' 由侧面 c'e' 的火力掩护，而正面 a'e' 则由侧面 bd 的火力掩护。另一方面，两个相邻棱堡的相对正面可以用火力控制位于它们之间的三角堡前的护城壕，掩护三角堡的正面。因此，护城壕没有一段不在侧射火力掩护之下，这也就使棱堡体系向前迈进了真正伟大的一步，从而开辟了筑城史上的新纪元。

棱堡的发明者以及棱堡出现的准确年月已无从查考，确实可信的只有：棱堡是意大利发明的，1527 年桑米凯利曾在维罗纳的城墙上修建了两座棱堡。关于在更早以前就有棱堡的一切说法都

是有疑问的。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的学派来分类。首先应当谈的当然是发明棱堡的那一学派，也就是意大利派。最早的意大利棱堡保留着它的前身的痕迹：它们只是一些多角形的塔楼或圆台堡；如果不算侧射火力，它们几乎没有改变工事原来的性质。要塞的围墙仍是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下的石墙；石墙后面堆积的土堤主要用作配置火炮和进行射击的地点，它的内斜面像古老的城墙一样，仍用石头被复。只是在很久以后，胸墙才开始筑成土质工事，但即使在那时，整个外斜面，仍用石头一直砌到顶端，而且暴露在敌人的平射火力之下。中堤极长，约 300—550 码。棱堡非常小，相当于大的圆台堡，棱堡的侧面总是和中堤相垂直。因为筑城学中有一条原则：有效的侧射火力总是从与火力所要掩护的那条线相垂直的一线发射的，所以老式意大利棱堡构筑侧面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掩护相邻棱堡的短而远的正面，而是为了掩护长而直的中堤线。中堤过长时，就在它中间修筑平顶的钝角棱堡，叫做台堡 (piatta forma)。侧面不是从交点修起，而是从正面土堤稍后处修起，这样，交点就向前突出，并用来掩护侧面。每一侧面都有两个炮台：下层炮台和稍微向后配置的上层炮台。有时还在侧面的内岸上与护城壕底相平之处构筑穹窿。这里再加上一条护城壕，那就是最初的意大利棱堡体系的全貌，它既没有三角堡和凹角堡，也没有隐蔽路和斜堤。但这种体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中堤缩短了，棱堡加大了。多角形要塞内边（即图 1 中的 $f'f''$ 线）的长度规定为 250—300 码。棱堡的侧面加长到相当于多角形要塞一个边的六分之一和中堤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尽管棱堡侧面仍与中堤相垂直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侧面已能较多地掩护相邻棱堡的正面了。棱堡也开始构筑成实

心的，而且在它的中央常构筑封堞，即一种正面和侧面各与棱堡的正面和侧面平行的工事，但其土堤和胸墙比棱堡的土堤和胸墙高，以便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护城壕既宽且深，其外岸通常与棱堡正面平行。但是因为这种方向的外岸妨碍棱堡侧面上紧靠交点的那一部分对整个护城壕进行观察和侧射，所以以后这一缺点被克服了，在构筑外岸时使其延长线通过相邻棱堡的交点。后来，又构筑了隐蔽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在米兰的城寨中初次出现；1554年塔尔塔利亚曾第一个提到过³⁰⁴）。它用作完成出击的部队集合的地点和撤退的道路，可以说，隐蔽路的出现是防御要塞时巧妙而坚决地采取进攻行动的开端。为了增大隐蔽路的使用效果，又构筑了提供更大场地的屯兵场，从屯兵场的凹角处还可以对隐蔽路进行可靠的侧射。为使敌人接近隐蔽路更为困难，在斜堤上距堤顶约1—2码处又构筑了围栅；不过这样配置的围栅很快就会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因此，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根据法国人莫丹的建议，围栅移至有斜堤掩护的隐蔽路上。要塞的大门位于中堤的中央，为了掩护大门，又在大门前护城壕的中央构筑了一种半月形的工事；但是和塔楼改为棱堡的原因相同，这种半月堡（demi-lune）不久也改建为三角形工事，即现在的三角堡。这种工事仍然是很小的，但后来发现它不仅可做护城壕的桥头堡，而且还可以掩护棱堡的侧面和中堤不受敌人炮火的破坏，可以在棱堡中线前面构成交叉火力，并可以从侧方有效地掩护隐蔽路，于是便开始把它构筑得大一些了。尽管如此，这种工事仍然很小，因而它的正面的延长线只能在中堤点（即中堤两端之点）与要塞的围墙相交。意大利筑城体系的主要缺点如下：

1. 棱堡侧面的方向不好。因为有了三角堡和隐蔽路之后，中堤成

为攻击对象的场合愈来愈少，现在遭受攻击的主要是棱堡的正面。为了很好地掩护正面，应使正面的延长线在相邻棱堡侧面的起点与中堤相交，而这个侧面则应与这一延长线（叫做防守线）垂直或接近垂直。这样，才能沿整个护城壕和对棱堡前面进行有效的侧射。但实际上防守线既不与棱堡的侧面垂直，又不在中堤点与中堤相交，而是在中堤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处与中堤相交。因此，从侧面上发射的平射火力与其说可以杀伤攻击相邻棱堡的敌军，不如说可以杀伤相对侧面的守军。

2. 要塞围墙只要有一处被敌人打开缺口和攻占，就显然不能保证进行长期防御。

3. 三角堡太小，不足以掩护中堤和侧面，而中堤和侧面从侧方掩护三角堡的火力也很弱。

4. 土墙非常高，而且整个表面都是用石砌的，通常约有 15—20 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下，当然，这个石砌部分很快就会被击毁。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尼德兰人已证明石砌部分毫无用处以后，仍需要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彻底消除了对不加土掩盖的石砌部分的信赖。意大利派优秀的工程师和著作家有：桑米凯利（死于 1559 年，他曾构筑希腊纳波利-德-罗曼尼亚和干地亚二地的要塞，并在威尼斯附近修建了利多堡垒）；塔尔塔利亚（约 1550 年）；阿尔吉西·达·卡皮、吉罗拉莫·马吉和扎科莫·卡斯特里奥托——这三人约在十六世纪末都写过有关筑城的著作³⁰⁵。乌尔比诺的帕乔托则曾修筑过都灵和安特卫普的城砦（1560—1570 年）。稍晚的意大利筑城学著作家有马尔基、布斯卡、弗洛里安尼和罗塞蒂，他们对意大利筑城体系作了许多改进，但其中毫无独创之处。他们不过是巧妙程度不同的抄袭者；他们大部分的发明都是抄袭德国人丹尼尔·斯佩克尔的，其余的则是抄袭尼德兰人的。上述这些著作家的活

动都在十七世纪,当时在德国、尼德兰和法国筑城学已迅速发展,相形之下,他们的这些活动就黯淡无光了。

在德国,意大利筑城体系的缺点很快就被发现了。第一个指出旧意大利派的棱堡小和中堤长这个主要缺点的,是为查理五世在安特卫普城构筑要塞的德国工程师弗兰茨。在审查要塞构筑计划的会议上,他曾坚持构筑较大的棱堡和较短的中堤,但是阿尔巴公爵和其他西班牙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些人除了旧意大利体系及其特有的陈规旧套以外,根本就不想知道其他的东西。其他体系的一些德国要塞的特点,是按丢勒的原则构筑了穹窿暗廊,例如在1537—1558年构筑的尤斯特林要塞中,以及几年后在由工程师——有名的约翰大师(Meister Johann)构筑的幽里希要塞中都是如此。但是第一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是修建斯特拉斯堡城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死于1589年),他所创立的原则,成为后来所有棱堡工事体系的依据。他的主要原则如下:1.构成要塞围墙的多角形的边愈多,要塞就愈坚固,因为边多了,要塞的各个正面就可以更多地互相支援;所以,需要相互掩护的各个工事配置得愈近似直线愈好。由此可知,科尔蒙太涅当作新奇的发现提出来,并用以炫耀其数学知识渊博的这个原则,早在150年前就为斯佩克尔所熟知。2.锐角棱堡不好,钝角棱堡也不好,棱堡的凸角应为直角。在反对锐角形凸角方面他是正确的(目前人们通常认为最小的凸角为60度),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对直角形凸角的偏爱,他也反对钝角形凸角,实际上钝角形凸角非常有利,而且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看来,实质上这是他对当时偏见的让步,因为在他自认为最能显出他的筑城法最大优点的一些设计图中都画有钝角棱堡。3.意大利的棱堡太小;

棱堡必须是大型的。因此斯佩克尔的棱堡比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大。

4. 每个棱堡内和中堤上都必须构筑封堞；这是从当时使用的围攻法中得出的结论，用这种围攻法时，堑壕内的高大封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按照斯佩克尔的意见，封堞不仅起简单的抵抗作用，而且起更大的作用；他的封堞是预先构筑在棱堡内的真正的二重堡，在要塞围墙被敌人打开缺口并被攻占后，它们就成为第二道防线。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把封堞变为永久性二重堡，是沃邦和科尔蒙太涅的功绩，其实应当归功于斯佩克尔。

5. 棱堡的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并应从防守线和中堤相交之点构筑起。由此可见，原来人们认为是法国工程师帕冈所首创的、并且是使他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在比他早 70 年以前就被提出来了。

6. 穹窿暗廊是防守护城壕所必需的；因此斯佩克尔在棱堡的正面和侧面上都构筑这种工事，不过仅供步兵使用。如果他把它们构筑得大到足可容纳炮兵，那末他在这方面就达到最新的完善的水平了。

7. 要使三角堡发挥作用，便应把它尽可能构筑得大些。因此，斯佩克尔的三角堡是所有曾被提出过的三角堡中最大的。以沃邦与帕冈相比，沃邦的改进大部分在于加大三角堡；而以科尔蒙太涅与沃邦相比，科尔蒙太涅的改进几乎全部在于加大三角堡；但斯佩克尔的三角堡甚至比科尔蒙太涅的三角堡还要大得多。

8. 隐蔽路的防御应尽可能地加强。斯佩克尔是第一个了解隐蔽路的重大意义并相应地加强其防御的人。斜堤顶和外岸顶端构筑成 *en crmaillère*（锯齿形），使敌人的纵射不起作用。科尔蒙太涅又借用了斯佩克尔的这一主张，不过他保留了为斯佩克尔所否定的横墙（横在隐蔽路上防纵射的短土墙）。现代的工程师通常都肯定斯佩

克尔的方案比科尔蒙太涅的方案优越。此外，佩斯克尔还是第一个在隐蔽路的屯兵场上配置炮兵的人。9. 任何石砌部分都不应在敌人视界以内，不应暴露在平射火力之下，这样，敌人的破城炮在到达斜堤顶以前，便不能做好射击准备。这一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在十六世纪就为斯佩克尔所确立，但直到科尔蒙太涅为止，从来没有被采用过；甚至是沃邦，也将石砌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暴露在外（见图 2C）。从这个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斯佩克尔的主张中不仅包含了，而且已明确地提出了整个最新棱堡式筑城的基本原则，甚至是现在，根据他的筑城法仍可构筑出很好的防御工事，如果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的筑城法确实是非常杰出的。在整个近代筑城史中，人们在每一个著名工程师的杰出主张中都能证明其中某些是从这位伟大的棱堡防御体系奠基人处抄袭来的。斯佩克尔的实际的工程艺术表现在英果尔施塔特、施勒特斯塔特、加根瑙、乌尔姆、科马尔、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等要塞的建筑中，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筑成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尼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³⁰⁶促成了另一筑城学派的产生。当时，不能指望荷兰城市的古老石墙能抵挡住正规的围攻 [regular attack]，因而必须加强这些城市的防御以抵抗西班牙人，但是要按意大利式构筑高大的石质棱堡和封堞，则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而这里的地形特点（拔海不高）却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于是在建筑堤坝方面素有经验的荷兰人就依靠水来防御。他们的筑城体系与意大利体系完全相反：宽 14—40 码的浅水壕；矮矮的土堤没有任何石砌部分，但有更低的、突出在前面的土堤（前堤）作掩护，用以更好地防守护城壕；护城壕中有大量外围工事，如三角堡、半月堡（棱堡突出部之前的三角堡）、角

堡和冠堡等^①；此外，在利用地褶方面，也比意大利人好。第一个完全用土质工事和水壕设防的城市是布雷达（1533年）。后来荷兰筑城法又有了某些改善：内岸的一个狭长部分砌了石块，因为有水的护城壕在冬季结冰后，敌人很容易通过；护城壕中构筑了堤坝和水闸，以便趁敌人在干壕底开始对壕作业时放水；最后，还构筑了水闸和拦河坝，以便预先有计划地用水淹没斜堤脚周围的地区。写过这种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著作家有马罗鲁瓦（1627年）、弗莱塔格（1630年）、费尔克尔（1666年）和美耳德尔（1670年）。曾试图把斯佩克尔的原则用于荷兰体系的有沙伊特尔、诺伊鲍威尔、海德曼和赫尔（都在1670年和1690年之间，都是德国人）。

在所有的筑城学派中，法国派享有最大的声望。在保存到现在的各要塞中，这一派的原则被实际采用的比其他各派的原则加在一起还要多。不过，再也没有一个派别比它更缺乏自己独创的主张了。在整个法国派中，找不出一一种新的工事、一条新的原则不是从意大利人、荷兰人或德国人那里抄袭来的。但是，法国人巨大的功绩是使筑城法和精确的数学原理相结合，规定了各线之间适当的比例，并根据筑垒地点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科学理论。人们通常把巴尔勒杜克的埃拉尔（1594年）称为法国筑城之

① 角堡是一种由左右两个半棱堡、中堤和三角堡组成的工事，它突出在主壕之前，每一边都有成直线的土堤和壕沟掩护，土堤和壕沟与要塞围墙上的棱堡正面的相对位置，使得前者能完全处于后者侧射火力的掩护下。冠堡由两个这样的角堡组成（中央是一个棱堡，两侧带半棱堡各一），双冠堡则由三个角堡组成。为使要塞围墙能瞰制所有这些工事，它们的土堤必须比要塞围墙的土堤低，至少要低到三角堡的土堤低于要塞围墙的土堤的那种程度。当然，这些外围工事都是在特殊情况下，视地形特点而构筑的。

父,实际上这是没有根据的;他的棱堡的侧面与中堤形成锐角,因而比意大利式棱堡的侧面还要不适用。比较著名的是帕冈(1645年),他是法国第一个采用和推广斯佩克尔的侧面应与防守线相垂直的这一原则的人。帕冈的棱堡很大,其正面、侧面和中堤之间长度的比例极为恰当,防守线的长度从不超过240码,因此除隐蔽路外整个护城壕都处于棱堡侧面的步枪火力范围内。他的三角堡比意大利式的大,而且在背面有内堡,即中间工事,以便垒墙被占领后仍可继续抵抗。帕冈还在护城壕中构筑一种独立的狭窄的工事掩护棱堡的正面,这种工事叫堡障,荷兰人已经采用过(第一个采用它的可能是德国人狄利希)。帕冈的棱堡的正面有两道土堤,其中第二道作为二重堡,但两道土堤之间的壕沟毫无侧射火力掩护。使法国派成为欧洲第一的是法国的沃邦元帅(1633—1707年)。虽然他在军事方面真正的荣誉是他在攻打要塞方面的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但是他作为一个要塞建筑家更为出名。我们关于法国派所谈过的那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沃邦筑城法的特征。在他所构筑的工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只要是棱堡体系中可能有的他都采用了,但是其中没有一种是独创的;而且除棱堡外,他更少考虑采用其他的形式。不过在各组成部分的布局、各种线条的比例、断面以及根据极其不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理论等方面都非常巧妙,与前人的创作相比,确已登峰造极,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成体系的筑城是从他开始的。虽然沃邦对自己的筑城法没有写过什么,但法国的工程师们在研究他所修建的大量要塞的基础上,力求总结出他所遵循的理论原则,结果确定了三种方法,叫做沃邦的第一法、第二法和第三法。

图1就是沃邦第一法的最简单的图解,主要部分的规格如下:

多角形要塞的外边，即由一座棱堡的顶端到相邻棱堡的顶端之线，平均为 300 码；该边中间的垂直线 $\alpha\beta$ 为该边的六分之一，从 a'' 和 a' 点起通过 β 点之线为防守线 $a''d'$ 和 $a'e''$ ；从 a'' 和 a' 点起在防守线上量出相当于 $a'a'$ 线全长七分之二的一段即为棱堡的正面 $a'c'$ 和 $a'b'$ ；从交点 c' 和 b' 以 $c'd'$ 或 $b'e''$ 为半径在防守线之间画出的弧线即棱堡侧面 $b'd'$ 和 $c'e''$ ； $e'd'$ 线是中堤。护城壕的画法是：从棱堡顶端以 30 码为径画弧线，再从相邻棱堡的交点引一直线成这一弧线的切线即为外岸。三角堡的画法是：从中堤点 e'' 以 $e''\gamma$ 为半径（ γ 点在对面的棱堡正面上距交点 11 码处）画弧线 $\gamma\delta$ ，使它与垂直线 $\alpha\beta$ 的延长线相交，相交之点即为三角堡的顶端，这一弧线的弦即为三角堡的正面。三角堡正面这条线从三角堡顶端起画到与形成主壕外岸的切线相交为止；三角堡背面的位置也以这条外岸线来确定，这样，从棱堡侧面就能毫无障碍地对整个护城壕进行射击。在中堤之前——而且仅在前面——沃邦还保留了荷兰式的前堤（在他以前，意大利人弗洛里安尼就已这样做过），这种新的工事叫做凹角堡（tanaglia）。沃邦的正面是沿着防守线划的。三角堡前的护城壕宽 24 码，外岸与三角堡的正面平行，顶端成弧形。沃邦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他的棱堡构筑得很宽阔，而侧面的突角则经常在步枪火力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棱堡构造简单，只要有一个棱堡的正面被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不能进行防御。沃邦的那种与防守线形成锐角的棱堡侧面，不如斯佩克尔和帕冈的棱堡侧面那样完善，但是他取消了棱堡侧面上第二层和第三层没有掩蔽的火炮，在大部分意大利棱堡和较早的法国棱堡的侧面上都有这样配置的火炮，然而从来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沃邦构筑凹角堡的目的是为了以步兵火力加强对护城壕的防御，并掩护中堤

不受斜堤顶上敌人破城炮的平射。但是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彻底，因为靠近侧面 e 的那部分中堤还是完全暴露在敌人配置在凹角屯兵场（见图 1n）的破城炮前。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只要在这里打开缺口，就可以迂回构筑在棱堡内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全部二重堡。原因是三角堡还是构筑得太小。沃邦的隐蔽路上没有。crémaillères（雉堞），但构筑横墙，这比斯佩克尔的方法要差得多，因为横墙虽能妨碍敌人对隐蔽路的纵射，但也妨碍防守者自己对隐蔽路的纵射。各种工事之间的交通总的来说是好的，但要进行坚决的出击则仍嫌不足。断面的大小与至今仍到处采用的相同。但沃邦仍然坚持将土堤向外的一面全部用石砌起来，所以至少有 15 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外。在沃邦的许多要塞中都重复了这个错误，而错误既已犯了，要纠正它，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用加宽棱堡正面前的护城壕，并构筑屏障式的土质工事的方法来掩护石砌部分。沃邦在一生中多半都遵循第一种方法，但在 1680 年以后，他采用了另外两种方法，目的是要在棱堡被打开缺口以后，仍能继续进行长期防御。为此，他采用了卡斯特里奥托的主张，后者曾提出在护城壕中面对塔楼处构筑独立的棱堡，使塔楼与城墙组成的古老筑城体系合乎时代要求。沃邦的第二法和第三法都与此相符合。三角堡也构筑得比较大；石砌部分的掩蔽有所改进；塔楼内构筑穹窿，但不是整个塔楼完全筑满穹窿。使棱堡和凹角堡之间的一段中堤可能被破坏的那个缺点仍然存在，因而独立棱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然而，沃邦认为他的第二法和第三法是非常有效的。当他把兰道的筑城计划（根据第二法）呈交路易十四时，曾说道：“陛下，这就是用尽我的本领也无法夺取的要塞”。但是这并没有保证兰道不失守，该城在沃邦生前即被攻陷三

次（1702、1703、1704年），在他死后不久（1713年）又被攻陷一次。³⁰⁷

科尔蒙太涅纠正了沃邦的错误，他的方法可以说是达到了棱堡体系的顶峰。科尔蒙太涅（1696—1752年）是工程长官。他的较宽阔的棱堡内可以构筑永久性二重堡和第二道防线；他的三角堡几乎和斯佩克尔的三角堡一样大，完全掩护了沃邦所暴露在外的那一部分中堤。八面以上的多角形要塞的三角堡向前突出得相当远，以致在围攻者到达斜堤顶后，三角堡可以从后方射击他们为围攻邻近棱堡所构筑的工事。围攻者要避免这种射击，就必须在棱堡上打开缺口以前先压制两个三角堡。需要掩护之线愈近似直线，这种大三角堡的相互支援就愈有效。凹角屯兵场用内堡来加强；斜堤顶筑成 en crémaillère（锯齿状），与斯佩克尔的相同，只是仍然保留横墙；断面结构极好，石砌部分之前都有土质工事掩护。科尔蒙太涅使法国派发展到了顶点，因为所谓法国派就是指护城墙内有外围工事的棱堡防御体系。如把1600—1750年间棱堡筑城的逐步发展及其表现在科尔蒙太涅筑城体系中的那种最后结果同上述斯佩克尔的原则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德国工程师的惊人天才，因为护城壕里的外围工事数量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在这150年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重要原则是斯佩克尔所没有清楚而明确地提出过的。

在科尔蒙太涅之后，梅济埃尔工程学校（约在1760年）对他的体系做了某些不大的改动，其中主要的改动又回到斯佩克尔的旧原则，即侧面应与防守线垂直。但梅济埃尔派最杰出的一点是该派的代表最先在隐蔽路前构筑了外围工事。在防御能力特别薄弱的地段上，他们在斜堤脚附近在棱堡中线上构筑了叫做眼镜堡

的独立的三角堡，这样一来，就首次向最新的永久性营垒体系接近了一步。十九世纪初一个在普鲁士供职、于1807年在但泽附近被打死的法国流亡分子布斯马尔，曾再一次试图改善科尔蒙太涅的体系，他的主张相当复杂，其中最杰出的一点是他的三角堡很大，一直突出到斜堤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上面谈到的眼镜堡并起到这种眼镜堡的作用。

和沃邦同时代的、并且不只一次地在围攻战中成为沃邦劲敌的荷兰工程师库霍尔恩男爵促成了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干壕和水壕配合得很巧妙，出击极为便利，各独立工事之间的交通很方便，三角堡和棱堡中的内堡和二重堡安排得很巧妙，因而他的筑城体系甚至比科尔蒙太涅体系的防御能力更大。库霍尔恩是斯佩克尔的热烈崇拜者，他是唯一能老实地承认他的成就有多少应归功于斯佩克尔的杰出的工程师。

我们看到，在有棱堡以前，阿尔勃莱希特·丢勒就已采用侧防暗堡来保证加强的侧射火力。在他的四角城堡里，护城壕的防御完全依赖这些侧防暗堡，城堡的各角没有塔楼，这是一种只有几个凸角、顶部平整的四角城堡。构筑要塞时使要塞围墙完全与多边形的边线相吻合，因而只有凸角而无凹角，护城壕则以侧防暗堡掩护，这就是所谓多边形筑城的原则，丢勒应该算是这种筑城法的创始人。另一种，要塞围墙构成星状，凸角与凹角相互交替，每一条线既是侧面又是正面，可以用靠近凹角的一段从侧面掩护下一条线前面的护城壕，用靠近凸角的一段控制地面，这样的经始就是凹角形筑城的基础。旧意大利派的代表和旧德国派的部分代表曾提出过这种形式，但在许多年以后它才得到了发展。格奥尔格·林普勒尔（在德国皇帝那里服务的工程师，1683年在抵

御土耳其人的维也纳防御战³⁰⁸中牺牲)的体系是介于棱堡体系和凹角形体系之间的一种中间体系。他所称为中间棱堡的工事,实际上构成一条完整的凹角线。他坚决反对前面只有简单的土质胸墙作掩护的暴露炮台,坚持只要有可能,无论在何处都应构筑穹窿炮台,特别是在侧面上,在这里如有2—3层掩蔽得很好的火炮,则其射击效果远比暴露的侧面炮台上从来也不能同时射击的2—3层火炮的效果大得多。他还坚持在隐蔽路的屯兵场上构筑炮台(或称内堡),这是库霍尔恩和科尔蒙太涅曾采用过的;他还特别坚持在要塞围墙的突角后面构筑双重的和三重的防线。在这一方面,林普勒尔的筑城体系超过了它自己的时代因而显得非常出色。他的要塞的整个围墙是由独立的堡垒组成的,每一个堡垒都必须单独地夺取;他利用大型防御穹窿的方法和德国最近的工事中所采用的方法几乎连细节也都一样。毫无疑问,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棱堡体系有多少应归功于斯佩克尔,蒙塔郎贝尔的成就也就有多少应当归功于林普勒尔。第一个充分证明凹角形筑城体系比棱堡体系优越的是兰德斯堡(1712年),不过假如我们去分析他的论据或描述他的筑城工事,那就谈得太远了。在林普勒尔和兰德斯堡之后的许多熟练的德国工程师中,我们可以提一提地堡式横墙(即可供步枪作隐蔽射击的中空横墙)的发明人梅克伦堡的布根哈根上校(1720年)和设垒营房(即构筑在向前突出的工事的背面能避开曲射火力的一种大型营房)的发明人维尔腾堡的赫伯特少校(1734年);设垒营房内面向要塞围墙的那部分筑有带射孔的穹窿,面向城市的部分筑有兵士住的营舍和仓库。这两种工事现在都使用得很广泛。

因此,我们看到,德国派(几乎只有斯佩克尔是唯一的例

外)从产生的时刻起就反对棱堡。他们想主要用凹角堡代替棱堡,同时还试图构成良好的内部防御体系,主要的途径是采用穹窿暗廊,这正是法国工程界权威人士视为荒谬绝伦的东西。但是法国在某一时期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骑兵少将蒙塔郎贝尔侯爵(1713—1799年)竟公开地打着旗帜投到德国派方面,他使整个法国工程界大为震惊,直到现在,他们仍在指责他所写的每一句话³⁰⁹。蒙塔郎贝尔激烈地批评了棱堡体系的缺点:侧射火力没有效果;使敌人深信他的炮弹即使没有击中原定的一线,也几乎肯定会使另外一线遭到损失;对曲射火力防护不够;中堤在射击方面完全没有用处;在棱堡的背面不可能构筑又好又大的二重堡,这一点已有事实证明,即当时没有一个要塞筑有这一派理论家所提出的各式永久性二重堡;最后,外围工事很弱,它们之间的联系很差,缺少应有的互相支援。因此,蒙塔郎贝尔宁愿采取凹角形体系或多边形体系。在这两种体系中,要塞的核心部分都是由许多配置一层或两层火炮的穹窿组成的。穹窿的石砌部分周围都有防平射火力的土质堡障或外堡面作掩护,再前面是第二道护城壕。这条护城壕由构筑在外堡面凹角处的穹窿从侧面掩护,这些穹窿则由凹角屯兵场内的内堡或眼镜堡的胸墙掩护。整个这种体系依据下列这一原则:在敌人到达斜堤顶或外堡面时,利用配置在穹窿内的火炮的歼灭性火力给敌人造成障碍,使他无法架设破城炮。不顾法国工程师的一致反对,蒙塔郎贝尔肯定穹窿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以后,他甚至设计了若干废除一切土质工事的环形筑城体系和凹角形筑城体系,使整个防御依靠配置4—5层火炮的高穹窿炮台,穹窿的石砌部分只靠自己炮台的火力防护。他在自己的环形筑城体系中曾力图用这种方法使距要塞500码以内的任

何一点上都能集中 348 门火炮的火力，并认为这样巨大的火力优势会使敌人完全不能架设攻城炮。但是，在这方面，只有在构筑岸防炮台向海的正面部分时，才有他的追随者。在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时期，充分地证明了舰炮是不可能击毁设有穹窿的坚固围墙的。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瑟堡等良好的炮台，朴次茅斯港（英国）入口处的新炮台，以及现代几乎一切保卫港湾抵御舰队的炮台，都是根据蒙塔郎贝尔的原则修建的。林茨（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³¹⁰和科伦独立堡垒的内堡有一部分暴露的石砌部分是模仿蒙塔郎贝尔不太成功的方案构筑的。在陡峻的高地筑城（如普鲁士的埃伦布莱施坦）有时也采用暴露的石质堡垒，但其抵抗能力如何还须由实际经验来确定。

凹角形筑城体系从来没有被实际采用过，至少据我们所知是如此；但是多边形筑城体系在德国很受重视，并被采用于最新的工事中，而法国人却顽固地抓住科尔蒙太涅的城堡不放。多边形筑城体系的要塞围墙通常是顶部平整的土墙，有石砌的内岸和外岸，有构筑在水壕中央的大型侧防暗堡，有构筑在土墙后面并以土墙作掩护以便起二重堡作用的大型设垒营房。类似的设垒营房也作为二重堡构筑在很多棱堡工事中，用以封闭棱堡的背面，同时土墙可作为屏障来掩护石砌部分，使它避免遭到远射。

在蒙塔郎贝尔所有的主张中，最成功的是独立堡垒体系，这种体系不但在筑城学方面开辟了新纪元，而且在攻击和防守要塞方面、甚至在总的战略方面也开辟了新纪元。蒙塔郎贝尔主张在重要地点的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外形上是孤立的，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无法轰击要塞本身；在必要时，这些堡

垒也可构成军队用的营垒。沃邦就已采用过在要塞火炮掩护下的永久性营垒，但营垒的工事由很长的连续不断的防线组成，只要一点被突破，就全部陷入敌手。而蒙塔郎贝尔的营垒的抵抗能力则大得多，因为每座堡垒都必须单独夺取，敌人在没有夺得其中至少三四座堡垒以前，就不可能开始对要塞本身进行围攻作业。而且，对其中每一座堡垒的围攻，随时都可能被守军或者甚至被配置在堡垒后面兵营内的军队所打断，这样，就保证了积极的野战与正规要塞战相结合，从而必然大大地加强了防御。自从拿破仑对那些按旧法构筑的要塞置之不顾而率军深入敌国腹地千百英里，以及1814—1815年同盟国军也把沃邦为法国留下的三层要塞带毫不在意地留在自己背后而直捣巴黎以后，仅在主壕内或者最多也只在斜堤脚构筑外围工事的筑城体系已经过时，这一点已十分明显了。这样的要塞对于现代的大军已失去了牵制的力量。它们使敌人遭受损失的能力达不到它们火炮的作用半径以外。因此，必须找出阻止突入国境的现代军队迅速前进的某种新方法，于是蒙塔郎贝尔的独立堡垒体系被广泛采用。特别是科伦、科布伦茨、麦茨、拉施塔特、乌尔姆、科尼斯堡、波兹南、林茨、培斯克拉和维罗那被改筑成可容6—10万人的巨大营垒，但在必要时也可用少得多的守军进行防御。同时，筑垒的地点在战术上是否优越的问题也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是从战略上着眼来决定修建要塞的地点了。构筑工事的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阻止胜利的军队继续前进的地点，以及本身是个大城市，又是整个省的物质资源集中点因而能为军队提供巨大优越条件的地点。要塞的位置通常选在大河旁边，特别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处，因为这样可迫使进攻军队分散兵力。要塞围墙尽可能地简化了，而护城壕的外围工事

几乎全部取消；人们认为有能够抵御短时间攻击的围墙就足够了。主要战场在独立堡垒的周围，而独立堡垒的防御，主要已不是靠本身垒墙上的火力，而是靠要塞守军的出击。巴黎就是按这种方案修建的最大的要塞；它有简单的棱堡式围墙和几乎都是四角形的棱堡式堡垒；在它的全部筑城工事中没有一个外围工事，甚至没有一个三角堡。毫无疑问，由于有了这种足可供三个被击败的军团作掩蔽所的新的大营垒，法国的防御力量增强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改进的结果，使各种筑城法中所包含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花钱最少的方法现在成为最好的方法，因为目前的防御已不再依靠在要塞城墙内等待敌人，直到他开始围攻作业，然后对他炮击的消极方法，而是依靠以守军的集中的兵力对不得不把兵力分开的围攻者采取攻势的积极方法了。

二、围 攻

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围攻法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他们曾使用攻城槌击破城墙，在有良好遮盖的接近车的保护下接近城墙，必要时还使用高出城墙和塔楼的设备，使强攻的纵队可以安全地接近城墙。使用火药以后，这些设备就不再使用了，因为从这时起，要塞的土墙修得较低，但可以对很远的距离进行有效射击，于是围攻者便向斜堤构筑锯齿形或曲线形的接近壕，同时在不同地点配置炮队，以便尽可能迫使被围者的火炮停止射击并破坏他们的石质工事。围攻者一到达斜堤顶，立即构筑高大的堑壕式封堞，以便控制棱堡及其封堞，然后以猛烈的火力打开缺口并准备强攻。攻击点通常是中堤。但是，在围攻的这种方法上并没有形成过什么体系，直到沃邦才采用了跳弹射击的平行壕，将围攻过程按一

种方法系统化，这一方法甚至现在还采用，而且仍被称为沃邦围攻法。围攻者用足够的兵力四面包围要塞并选好攻击正面以后，夜间即在距离要塞 600 码处掘第一道平行壕（一切围攻作业多半在夜间进行）。这道与被围攻的多角形要塞的边平行的塹壕，至少应围绕要塞的三个边或面。抛向敌人一方并在塹壕两边用堡篮（装满土的柳条筐）支住的泥土形成抵御要塞火力的胸墙。在这第一道平行壕内配置跳弹炮队，以便沿攻击的正面进行纵射。如果围攻的对象是棱堡式六角形要塞，跳弹炮队的数目就要足够对两个棱堡和三个三角堡的正面进行纵射，一般来说，每个正面要用一个炮队。这些炮队射击时，要使炮弹直接跳越工事的胸墙，从侧方射入棱堡（三角堡）的正面，使炮弹顺着正面飞行杀伤人员和击毁火炮。这样的炮队还用来对隐蔽路的个别地段进行纵射，而臼炮队和榴弹炮队则用来射击棱堡和三角堡的内部。所有这些炮队都有土质胸墙掩护。与此同时，在前面，在两个以上的地点，朝要塞方向挖掘锯齿形接近壕；挖掘接近壕时，尽可能完全避开要塞的纵射火力。一当发现要塞火力有减弱的迹象，就立即开始在距要塞约 350 码处掘第二道平行壕。在这里配置破坏炮队，以便完全消灭要塞正面上的炮兵和击毁炮眼。有八个正面需要轰击（两个棱堡及其三角堡的正面以及相邻两个三角堡面向这一边的正面），每个正面由一个与该正面平行配置的炮队进行射击，而每一炮眼则正对要塞上相应的炮眼。从第二道平行壕朝要塞方向构筑新的锯齿形壕，到距要塞 200 码处构筑半平行壕，形成锯齿形壕的新支壕，壕内配置臼炮队。最后，在斜堤脚构筑第三道平行壕，壕内配置重臼炮队。这时，要塞的大炮差不多已完全被压制而停止射击，于是开始向斜堤顶构筑各种曲线或折线形的接近壕，

以防跳弹火力；这些接近壕应对着两个棱堡和一个三角堡的顶端。然后在凸角屯兵场构筑浅壕或带胸墙的掩体，供步兵用火器纵射护城壕。如果敌人行动积极，敢于大胆出击，那就必须构筑第四道平行壕，将沿斜堤的全部凸角屯兵场连接起来。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从第三道平行壕向凹角屯兵场构筑对壕，并在斜堤上挖掘王冠形壕，即在斜堤顶上沿整个隐蔽路挖掘战壕。然后，在这条 *couronnement*（王冠形壕）内配置反炮台炮队，以便迫使从棱堡侧面对护城壕纵射的火炮停止射击，在这以后，再以破城炮轰击棱堡和三角堡的顶端和正面。在预定的破城地点的对面，则挖掘从战壕起经斜堤和外岸直通到护城墙的爆破用的地道；炸毁外岸后，再构筑新的对壕，经护城墙通到缺口下面，对壕受棱堡侧面纵射火力威胁的一面则构筑胸墙作掩护。一旦造成缺口并修好在护城壕内的通路，就立即发起强攻。以上是通过干壕强攻的情况，如果通过水壕，那就要用束柴构成堤坝，在面对相邻棱堡侧面的一方也要构筑胸墙作掩护。如果夺取棱堡后发现后面还有工事——二重堡，那再构筑浅壕，在缺口处配置新的炮队，打开新的缺口，设法下到壕沟，通过壕沟，重新发起强攻。按照沃邦第一法修建的棱堡式六角形要塞，如果没有二重堡，对这样的围攻平均可抵御 19—22 天，如果有二重堡，则可抵御 27—28 天。按照科尔蒙太涅的方法所构筑的要塞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则分别可以支持 25 天或 35—37 天。

三、野战筑城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在野战筑城法方面，古代军队甚至比现代军队掌握得还要好得多。罗马军团在敌

人附近扎营时，每夜都要在营地构筑工事。我们也看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野战工事被使用得非常广泛，而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各次战争中，驻军警戒的哨兵通常都构筑轻型的凸角堡。不过，甚至在那时——现在更是如此——构筑野战工事也是为了加强那些由于考虑到战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预先选好的阵地。崩采耳维茨附近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营垒，托列斯-维德拉斯附近的威灵顿防线，魏森堡附近的法国防线，以及1848年维罗那前面的奥军工事³¹¹，都是这样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工事可以使兵力较弱的军队成功地抵抗优势的敌人，因而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最初，防线是连绵不断的，例如，在沃邦的永备营垒中就是如此。但是，这种防线有缺点，只要一处被突破和占领，全线就无法防守，因此，现代的营垒都由成一线或多线配置的独立多面堡组成，多面堡之间可用火力相互从侧面掩护，一当多面堡的火力削弱敌人的攻击，守军立即可通过多面堡之间的间隙地向敌人出击。这就是野战工事的主要使用方法。但是，它们也可以独立使用，例如用作桥头堡来防守桥梁接近地，以及用作重要通路上的障碍来阻止敌人小部队通过等。除去一切形式比较奇特、而且现在已经过时的工事外，野战工事可分为背面敞开的和背面闭合的两种。属于前一种的有凸角堡（构成顶端向敌的角形的两段垒墙，前面有护堡壕）或眼镜堡（有短侧面的凸角堡）。眼镜堡的背面也可能用防栅封闭。现在使用的闭合式野战工事主要是四角形多面堡，这是一种等边的或不等边的四角形工事，周围是护堡壕和胸墙。胸墙的高度与永备工事的胸墙相同（7—8英尺），但没有它厚，因为这种工事只用来抵御野战炮兵的射击。由于这些工事本身都没有侧射火力，它们的位置应保障能用步枪火力互相从侧面掩护。为

了使侧射火力有效和加强整个防线，目前最通用的方案是：构筑配置成一线的、可以互相从侧面掩护的四角形多面堡，并在多面堡之间的间隙地前面构筑简单的凸角堡，从而构成营垒。1849年在多瑙河南岸的科莫恩附近构筑过这样的营垒，匈牙利人曾借以抵挡住兵力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达两天之久。³¹²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6 月
9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 年版
第 7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步 兵

步兵——军队中徒步的兵士。除了游牧部落以外，一切民族的军队，如果不是全部，那末大部分总是由徒步兵士组成的。例如，甚至在最早的亚洲军队——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军队中，步兵至少在数量上是军队的主要部分。希腊军队最初全由步兵组成。关于古代亚洲军队步兵的编成、编制和战术，我们所掌握的一些贫乏的材料已记述在“军队”^①一条中。在那里，读者可以了解到许多细节，这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在本条中，我们只叙述这一兵种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战术特点；因此，我们直接从希腊谈起。

一、希腊步兵

希腊战术的创始者是多立斯人³¹³；多立斯人的后裔斯巴达人使古代多立斯人的战斗队形达到完善的地步。最初，组成多立斯社会的各个阶级——不仅构成贵族阶级的全权公民，而且无全权的珀里俄科³¹⁴，甚至奴隶——都必须服兵役。他们全编在同一个方

^① 见本卷第5—9页。——编者注

阵内，但每一阶级在其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全权公民都是重装的，有护身器具：头盔、甲冑、铜护胫、大木盾（外包皮革，高度足以掩护整个身躯），同时还有长矛和短剑。他们依据人数编成方阵的第一列或前两列。后面是无全权者和奴隶，所以每一个斯巴达贵族都有仆役跟随。这些仆役没有贵重的护身器具，只靠前列对他们的掩护和自己的盾牌；他们的攻击武器是投石器、梭镖、刀子、匕首和狼牙棍。因此，多立斯方阵是有纵深的横队：前列是 hoplitae 即重步兵，后列是 gymnetae 即轻步兵。重步兵用长矛向敌人攻击来打败敌人；如果陷入敌阵，他们就拔出短剑，进行白刃格斗，打开一条前进的道路，而原先在前列的后面投石、掷梭镖以进行攻击准备的轻步兵，这时则协助重步兵攻击，肃清受伤的和还在抵抗的敌兵。由此看来，这一兵种的战术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战术机动可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兵士特别是重步兵的英勇、坚定、体力、个人的灵活和技巧。

这种把一个民族的各个阶级编在同一个方阵内的宗法式组合，在波斯战争³¹⁵后不久就消失了，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结果，方阵从此就只由重步兵编成，而轻步兵，不论是继续存在的或者改建为新式轻步兵的，都是成散开队形单独作战。在斯巴达，斯巴达公民和珀里俄科在一起编成重装方阵，赫罗泰³¹⁶则运送辎重或者作为盾牌手 (hypaspistae) 跟在后面。这种方阵有一个时期曾符合战斗的一切要求；但不久，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³¹⁷时期，由于雅典人有了先驱兵，斯巴达人也建立了这种兵。但是他们没有编成单独的轻步兵部队，而是选拔较年轻的兵士去执行先驱兵的任务。当这次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全权公民、甚至珀里俄科的人数都大大减少了，斯巴达人就不得不用重装 of 的奴隶编成方阵，由

公民指挥。雅典人取消了方阵内由贫穷公民、仆役和奴隶中征集来的轻步兵之后，另建立了由轻步兵或普色尔（psiles）组成的专门的轻步兵部队；这种部队担当先驱兵的任务；他们都是用远战武器装备起来的，分为投石手（sphendonetae）、弓箭手（toxotae）和梭镖手（akon—tistae）。后者又叫做培尔塔斯特（peltastae），因为只有他们持有小盾（pelta）。这种起初由雅典贫穷公民中征集来的新式轻步兵，很快就几乎全部改由雇佣兵和雅典同盟者的部队编成。自从使用了这种先驱兵以后，笨拙的多里斯方阵就显得更不适于单独作战了。同时，用来编成这种方阵的人员的质量也愈来愈坏，这在斯巴达是由于尚武的贵族逐渐没落，在其他城邦是由于在商业和财富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不怕死的精神。因此，由不太勇敢的人组成的方阵就基本上丧失了它的作用。它成了殿后军，成了战斗队形中的预备队，而在它的前面则有先驱兵作战；先驱兵在受到敌人进逼时退到它的后面，但不论何时都很难指望方阵本身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只要方阵是由雇佣兵组成的，那末它也就好不了多少。它由于本身笨拙不灵而不适于机动，甚至在稍有起伏的地形上也是如此，因而只能用来进行消极抵抗。这就使雇佣兵的首领伊菲克拉特进行了两种改革的尝试。这位希腊的雇佣兵队长废除了重步兵原有的较短的矛（长8—10英尺），而改用长得多的矛，使得在密集队形中，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用矛刺到前面，杀伤敌人。这样，方阵的防御力量就大大地加强了。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一种能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决定会战结局的力量，他又以轻便的护身器具和利剑装备了培尔塔斯特，并对他们进行方阵队形变换的训练。他们在接到攻击命令后，即以重步兵的方阵所不能达到的速度前进，在距

敌人 10 或 20 码的地方齐向敌人投掷梭镖，持剑冲入敌阵。这样，简单的古代多立斯方阵就让位给复杂得多的战斗队形了，统帅的活动成了胜利的重要条件，战术机动也就成为可能了。埃帕米农达斯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在他以前，希腊人作战时排成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第一线的兵力平均分配在整个正面上；如果一方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敌方军队，那它或者构成纵深较大的战斗队形，或者包围敌军的两翼。与此相反，埃帕米农达斯则指定一翼攻击，另一翼防御。攻击的一翼由他的精锐部队组成，其中有排成长纵队的重步兵的主力，其后是轻步兵和骑兵。另外一翼当然就薄弱得多，并且配置在后面，而攻击的一翼则应突破敌人的队形，然后纵队即展开或向左（右）转弯变成横队，在轻步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击溃敌人。

在马其顿统治古希腊人并率领他们远征波斯的时期，伊菲克拉特和埃帕米农达斯所实行的改革，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步兵的长矛换成了更长的马其顿长矛。伊菲克拉特的培尔塔斯特重新以完善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盾牌手。最后，埃帕米农达斯在战斗队形中采用的军队组织形式，又由亚历山大发展为各兵种联合的形式；这种联合会，只有少量骑兵的希腊是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亚历山大的步兵由重步兵的方阵、轻步兵和盾牌手组成。重步兵是战斗队形中的防御力量；轻步兵成散开队形在整个正面上与敌人接战，还用来扩大战果；亚历山大的卫士也是盾牌手，盾牌手虽然是轻装，但仍然能在方阵队形中作有规则的运动，因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成密集队形，又能成散开队形行动的步兵。但不论是希腊还是马其顿，都没有建立

足以同坚固的方阵对抗的灵便的步兵。为此亚历山大使用了骑兵。攻击的一翼是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的主力；盾牌手协同重骑兵作战，他们在攻击的骑兵之后跟进，冲入骑兵打开的缺口，巩固既得的胜利，并在敌人的阵地上巩固下来。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帝国的中部以后，把他的重步兵主要用来担任所征服的城市的警备勤务。他们很快就从军队中完全消失了。这支军队经过英勇神速的远征后，征服了一直到印度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亚洲部落。这支军队主要由骑兵、盾牌手和轻步兵组成；方阵无法参加这种远征，同时由于所要征服的敌人的特点不同，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他的步兵也同他的骑兵以及他的战术一样，很快就完全衰落了。战斗队形的两翼已完全由骑兵构成，中央是步兵，但步兵的力量很不可靠，以致用战象来掩护。在亚洲，占优势的亚洲因素很快就完全获得统治地位，这使得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几乎毫无作用。在欧洲，马其顿和希腊的步兵又获得了一定的稳定性，方阵战术也随之恢复了原先的绝对优势的地位。轻步兵和骑兵过去所起的作用一直到最后罗马军团废除整个这一套战法时为止就没有恢复过，虽然有人也曾花了许多心血，想了许多办法试图使方阵具有灵活性，但是没有成功，方阵就其本质来说，是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方阵的战术编成和机动是很简单的。正面为 16 人和纵深通常也为 16 人的队形（在亚历山大时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正方形，叫做辛塔格马 (Syntagma)，它是队形变换的单位；16 个辛塔格马，即 256 行组成一个有 4096 人的小方阵；4 个小方阵又组成一个完整的方阵。小方阵在战斗队形中的纵深为 16 列；它以辛塔格马为单位向右转、或向左转、或左（右）转弯变成行军队形，不论用

哪一种转法，都可排成正面为 16 人的密集纵队。当方阵排成横队时，可以将报双数的行插到报单数的行的后面，使每行人数增加一倍来加大纵深，缩小正面；成相反的队形变换时，则每列人数加倍，队形的纵深由 16 人减为 8 人。当敌人突然出现在方阵的后方时，即采用各行反转行进；这种队形变换后的正面（即每一行不是在原方阵或原辛塔格马的原位置上），有时可用每个辛塔格马的各列反转行进来恢复。如果再加上长矛的使用方法，那我们就把古代重步兵军事训练的全部课题都讲完了。当然，轻装部队虽不用来成密集队形作战，但仍然进行方阵队形变换的训练。

二、罗马步兵

拉丁语 legio 一词，最初是被挑选出来服兵役的人的总称，所以是军队的同义词。后来，当罗马的版图扩大和共和国的敌人的力量增强需要有更多军队的时候，军队就分成若干个军团，每个军团的人数都相当于原来的罗马军队。直到马利乌斯时代，每个军团都由步兵和骑兵组成，而骑兵的人数约等于步兵的十分之一。最初，罗马军团内步兵的组织看来同古代多立斯方阵是相似的；它编成有纵深的横队作战，被戴重盔甲的贵族和富裕公民编成前数列，贫穷的轻装平民则在他们的后面。但大约到萨姆尼特战争³¹⁸时期，军团的组织开始有了变化，并且很快变得与希腊方阵完全相反。这种组织在布匿战争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波利比乌斯曾作过详尽的叙述³¹⁹。每次战争通常都征集 4 个军团。从这时起，每个军团都包括四种步兵：轻装兵、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轻装兵是由新兵组成的轻步兵；后备兵是由老兵组成的

预备队；其他两种步兵组成军队的其余部分，他们是主要的战斗力量，即基干步兵；主力兵是从在作战经验上仅次于后备兵的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这一点正是他们与长矛兵不同之处。轻装兵戴皮帽，执轻便的圆盾作为护身器具，佩短剑，并备有数支轻梭镖；其他三种步兵都戴铜盔，着外包薄铜片的皮甲和铜护胫。长矛兵和主力兵除短剑外，每人还有两支 pilum 即投枪：一支轻的，一支很重。重投枪是罗马步兵所特有的攻击武器。它用硬木制成，装有长铁尖，其重量至少有 10 磅，连同铁尖长约 7 英尺。它只能抛掷很近的距离，大约 8—12 码，但是它由于分量重，对于当时的轻护身器具来说是很可怕的武器。后备兵除短剑外，还装备有长矛，以代替投枪。每个军团的组成如下：长矛兵 1 200 人，分编为 10 个中队或连，每个中队为 120 人；主力兵的人数和分编方法同上；后备兵 600 人，分编为 10 个中队，每个中队 60 人；轻装兵 1 200 人，只要不作别用，就分编在上述 30 个中队中，每个中队 40 人，编成后几列。长矛兵构成第一线，并且每个中队都展开成横队，其纵深大概为 6 列，各中队之间的间隙与中队正面的宽度相等。因为每列中各人的间隔为 6 英尺，所以一个中队正面的宽度约为 120 英尺，整个军团的正面宽度则达 2 400 英尺。在长矛兵的后面，第二线配置有主力兵的 10 个中队，掩护第一线各中队之间的间隙；主力兵的后面为后备兵；各线之间都保持适当的距离。轻装兵在正面前和两翼成散开队形作战。如把每行人数增加一倍，战斗队形的正面宽度就可比原来的减少一半，即减少到 1 200 英尺。整个这一战斗队形是用来进行攻击的。

罗马军团因其战术单位小，运动性大，几乎在任何地形上都能作战，所以是希腊方阵所望尘莫及的；而希腊方阵则需要平坦

的地形，由于它本身动转不灵，很快就变成了仅适于防御的队形。当军团进攻时，长矛兵在距敌人 8 或 12 码的地方趁希腊方阵的长矛还不能刺到他们以前（他们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把两列变成一列）向方阵抛掷重投枪，以此打乱方阵的密集队形，然后持剑猛扑方阵。如果个别中队的队形乱了，其结果也不会影响友邻中队；如果会战继续下去，不能很快结束，主力兵就进到间隙地上，投掷投枪，持剑冲向敌人，使长矛兵有可能摆脱困境，退到后备兵后面进行整顿。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后备兵才进攻，以便最后获得胜利，或保证有秩序地退却。轻装兵与骑兵共同担负警戒勤务，在会战之初与敌人接战，像先驱兵那样行动，并进行追击。长矛兵和主力兵的轻投枪大概主要用在防御中，当敌人还没有逼近到可以使用重投枪的距离时，用它来打乱进攻的敌人的队伍。军团的向敌行军可以从任何一翼开始；长矛兵的第一个中队走在前面，其后为主力兵和后备兵的第一个中队；随后，前三者的第二个中队也按同样顺序前进，其余依此类推；侧敌行军由 3 个纵队来完成，每种步兵各组成 1 个纵队；辎重位于距敌人最远的地方。如果敌人从后备兵行进的一边出现，军队就停止前进并将正面转向敌人；主力兵和长矛兵则通过后备兵各中队之间的间隙占据自己的位置。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由于罗马人连年战争和版图的不不断扩大，再加上罗马和整个意大利的一些重要社会变动，普遍兵役制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这时罗马军队开始逐渐由来自贫苦阶级的志愿兵组成，从而形成职业兵的军队，代替了从前由全体公民组成的民军。这样一来，军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而且因为军队的补充人员愈来愈坏，建立新的组织就成为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这种新

组织的创立人是马利乌斯。罗马骑兵不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少量骑兵由蛮族雇佣兵或同盟者的部队组成。步兵分为四种的制度废除了。轻装兵被同盟者或蛮族的部队所代替，军团的其余部分则由同一类型的基于步兵组成，其装备与长矛兵或主力兵相同，但是没有轻投枪。作为战术单位的中队为大队所代替，平均每个大队为 360 人，最初由 3 个中队合编成；这样，当时每个军团分为 10 个大队，通常配置成三线（第一线 4 个大队、第二、三线各 3 个大队）。大队排成纵深为 10 列的队形，每行所占宽度为 3—4 英尺，这样，军团正面的总宽度便大大地缩小了（约为 1 000 英尺）。因此，不仅战术队形的变换简化了，而且军团指挥官的影响也更加直接而有力。每个兵士的武器和装具都减轻了，但另一方面，每个兵士必须用马利乌斯发明的叉形木架（*muli Mariani*^①）携带自己的大部分行李；这样，军队的 *impedimenta*（辎重）就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把 3 个中队合编为 1 个大队不能不缩小军队在起伏地上机动的自由；轻投枪的取消降低了军团的防御能力，由于轻装兵的作用不是经常能完全由外籍的辅助部队即雇佣兵或安帖锡格纳尼（这是凯撒从军团中派出担任轻步兵勤务的兵士，但是他们没有远战武器）所能代替的，所以废除轻装兵后，军队就更难连续作战，同时也更难避开决定性的格斗了。适用于这种军团的唯一作战形式就是迅速坚决的攻击。但罗马步兵仍然由罗马人组成，至少是由意大利人组成，虽然在凯撒后继者时代帝国已趋衰落，但在罗马步兵的民族性质没有失去以前，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悠久的荣誉。可是一当罗马籍不再是加入军团的必备条件，军队很快

① 直译是：“马利乌斯之骡。”——编者注

就丧失了稳定性。到图拉真时代，来自罗马各行省和没有被征服国家的蛮族，已成了各军团的主力，从此以后罗马步兵的特点便消失了。沉重的盔甲已被废弃，长矛代替了投枪；分编为大队的军团又变成了笨拙的方阵。这一时期步兵的特点是普遍力求避免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所以弓和梭镖当时不仅在成散开队形作战时使用，而且在基于步兵成密集队形时也使用了。

三、中世纪的步兵

罗马步兵衰落了，拜占庭步兵也随着衰落了。强迫征兵这种制度仍然保留着，不过它除了能在军队中建立最不适用的部队以外，别无他用。由蛮族和雇佣兵组成的辅助部队，是军队中最好的部队，但是就连他们的质量也不高。军队中的等级管理制度日益完备，达到了几乎是十足的官僚制度的地步，结果和我们目前在俄国所看到的一样：在花费大量金钱而且部分仅是名义上存在的军队中，有了营私舞弊和盗窃国家资财的完善的组织。与东方非正规骑兵作战，使得步兵的作用愈来愈小，同时也使步兵的质量愈来愈坏。马弓手成了惯用的一种兵；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步兵除了矛和剑以外都还装备了弓箭。这样，远战就成了平常的事，而白刃格斗则被认为是某种过了时的东西。当时人们都把步兵看做废物，故意让它远离战场，主要用于警备勤务。维利萨里所进行的大多数会战中，只有骑兵单一作战，而当步兵也参加会战时，它总是一触即溃。维利萨里的战术完全依据下述原则：避免白刃格斗，用围困法战胜敌人。如果说他在同根本没有投掷武器的哥特人作战时，由于选择了哥特人的方阵不能行动的起伏

地做战场而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则，那末他在同步兵的战法与古罗马步兵的战法有某些共同点的法兰克人作战时，以及在同骑兵无疑胜过他的骑兵的波斯人作战时，却遭到了失败。

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军队，最初主要由步兵组成，而且成独特的多立斯方阵作战；首领和较富有的人在前列，其余的人在后面。他们的武器是剑和矛。但是，法兰克人有短柄的双刃斧，在持剑冲锋以前像罗马人掷投枪一样把双刃斧掷入敌阵。他们和萨克森人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有值得钦佩的优良的步兵，但征服各地的条顿人自己逐渐地转服骑兵勤务，而步兵则由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的居民担任。这样一来，在步兵中服役就被鄙视为奴隶和农奴的事，因此，步兵的质量也必然相应地降低了。到十世纪末，骑兵成了在欧洲各地真正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步兵，虽然人数在各国军队中都比骑兵多得多，但只不过是装备低劣、几乎谁也不想好好地加以组织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步兵甚至不算作兵了。miles（兵）这个词成了骑兵的同义词。唯一能够保持大批步兵的地方就是城市，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佛兰德。城市有自己的民军，他们自然都是步兵；但由于近郊的贵族无止境的纷争，民军保卫城市成为经常性的任务，所以不久又认为用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来代替由市民组成的民军是比较合适的；然而，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民军仍然保存了下来。但就是这样，我们也看不出城市步兵比贵族招募来的、在作战时总是留下看守辎重的乌合之众的步兵有什么显著的优越性。至少，在骑士的极盛时期是如此。在这个时期的骑兵中，每个骑士 *cap-à-pied*（从头到脚）全身披戴着甲冑，骑着同样裹以甲冑的战马。他们的后面都跟随着装备轻得多的侍从兵和其他许多没有甲冑但装备了弓箭的骑手。

在战斗队形中，这些兵是按照类似古代多立斯方阵的编队原则部署的：重装骑士在第一列，侍从兵在第二列，马弓手殿后。马弓手由于武器的关系，不久即成徒步队形作战，而且这逐渐成为一种常规了，因此，他们的战马就主要用于行军，而不是用于攻击。装备大弓的英国弓箭手（而在南欧则使用弩），运用这种成徒步队形作战的方法成绩特别显著，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成徒步队形作战的方法很快在马弓手中广泛流行。毫无疑问，在法国的长期作战中，重装骑士的马匹很快就疲倦不堪，而只适于作为运输工具使用。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配备劣马的 *gendarmes*（铁甲骑士）不得不下马，组成以最好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威尔士人）来补充的长矛手方阵，这是十分自然的；同时，备有仍适于攻击的马匹的骑士，现在就组成有真正战斗力的骑兵。这种队形对于防御战极为适合；黑亲王^①的各次会战都采用了这种队形，并且像大家所知道的，都获得了全胜。新的作战方法很快就被法国人和其他民族采用了，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可以认为是几乎通用的战法。这样，经过了一千七百年，我们差不多又回到了亚历山大的战术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亚历山大的骑兵是当时新兴的兵种，是用以加强日趋衰退的重步兵的战斗力的，而这时，由下马的骑兵组成的重步兵则生动地证明，骑兵正在衰退，步兵又在兴起。

四、步兵的复兴

在佛来米人的城市（当时世界主要的工业区），以及在瑞士的

^①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编者注

山区，初次出现了在步兵衰退数百年后重新堪称为步兵的军队。法国骑士已抵抗不了比利时各城市的织布匠、织呢匠、首饰匠和皮匠，而勃艮第和奥地利的贵族也抵不住瑞士的农民和牧民。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良好的防御阵地和轻武器，此外，佛来米人还有许多火器，而瑞士人则利用当时重装骑士几乎不能到达的地形作战。瑞士人主要装备有既便于刺击又便于砍杀、而且用来白刃格斗也不会觉得太长的短戟；后来他们也有了长矛、弩和火器。而在这以前的一次最有名的会战，即劳平会战（1339年）³²⁰中，他们除了石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远战武器。他们很快就由险峻山地的小防御战转入平原进攻战，同时采用了比较正规的战术。他们成纵深的方阵作战；护身器具是轻便的，通常只是前列和两侧的兵士才有，没有甲胄的兵士则配置在中央。然而，瑞士方阵始终由三个彼此不同的部分组成：前卫、主力和后卫，这就保证方阵具有更大的运动性和编成各种战术队形的可能性。瑞士人很快就成了利用地褶的能手，再加上火器的改进，因而他们能够抵挡骑兵的袭击；在对付装备有长矛的步兵方面，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攻入长矛林立的敌阵的方法，在攻入敌阵后，沉重的短戟就给他们造成巨大的优势，甚至在同披戴铁甲的兵士格斗时也是如此。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用方队或十字队形，特别是在火炮和轻火器的支援下，击退骑兵的攻击。因此，当步兵刚刚又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骑士的末日就快到了。

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各城市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处都得到了当时较大的、统一的君主国国王的响应。结果，各君主国建立了雇佣军队，一方面是为了镇压这些贵族，同时也是为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除了瑞士人以外，德国人，紧接着欧洲大

多数国家都开始豢养大批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用自愿报名的方法招募来的，他们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谁给的报酬最多，就给谁效劳。这些部队，在队形编成方面采用了与瑞士人相同的战术原则；他们主要装备长矛，并以营为单位编成纵深同正面人数相等的大方队作战。但是他们的作战条件与防守山地的瑞士人不同；他们不仅要扼守防御阵地，而且要进攻，不仅要在丘陵地上，而且要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平原上作战。不久，他们又面临着当时轻火器迅速改进的事实。这些情况引起了旧的瑞士战术的某些改变，改变的情况在各个民族中各不相同，但这一战术的基本特点在各民族中仍是相同的，即队形编为三个长纵队，其名称已经固定为前卫、主力、后卫或预备队，虽然实际上并不经常如此。瑞士人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帕维亚会战。就在这以前的一个时期，德国雇佣兵如果不是完全同瑞士军队相等，那也是差不多同它相等了，而在会战以后，德国雇佣兵就被认为是欧洲的头等步兵。法国人因为他们的步兵一直不中用，在这时期曾极顽强地试图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本民族的步兵，然而他们只是以皮卡尔第和加斯科尼两省的本地人组成了一支步兵。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步兵根本不值一提。而西班牙人，由于岡萨洛·德·科尔多巴在对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战争³²¹中最先采用了瑞士的战术和瑞士的武器，他们很快就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就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步兵。当时，意大利人以及步其后尘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把矛的长度由 10 英尺增加到 18 英尺，而西班牙人却仍保存着比较方便的短矛，他们由于灵巧，在同持短剑和匕首的对手进行白刃战时，就成了可怕的敌人。西班牙人在西欧，至少在法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直到十七世纪末都保持了这种声誉。

瑞士人根据以往的传统而轻视护身器具，但十六世纪的长矛手却不赞同这种态度。一当各国军队步兵的战斗素质日渐接近而形成了一种欧洲式的步兵，那种只将少数披戴胸甲和头盔的兵士配置在方阵四周的做法就不够合适了。如果说以前瑞士人认为这种方阵是牢不可破的，那末自从遇到了另一种足以与它相抗衡的方阵后，它就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套护身器具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它不太妨碍军队的运动性，它就能使军队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此外，西班牙人从来不对胸甲抱这种轻视态度，而且重视它们。这样，胸甲、头盔、护臂、护胫和护手又成为每个长矛手的一部分常备装具了。此外，还增加了一种剑，德国人的较短，瑞士人的较长；而有时还有匕首。

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步兵

在这以前不久，欧洲大陆，除土耳其以外，已经看不到大弓；在十六世纪的前 25 年，法国的加斯科尼人最后一次使用弩。弩到处都被明火枪代替了。这种本身完善程度不等、或确切些说粗糙程度不等的火枪，从此便成了步兵的第二类武器。十七世纪的明火枪是一种构造简陋的粗笨的武器，口径太大，因而除了射程小以外，不能保证射击最起码的精度相对长矛手胸甲的穿透力。约在 1530 年左右盛行的一种火器是重火枪，这种枪射击时要搁在叉形脚架上，因为没有这种支架，射手就不能瞄准。火枪手佩戴有短剑，但没有护身器具，他们或成散开队形与敌人互射，或成特殊的疏开的队形扼守防御阵地，或在这种阵地上为长矛手作攻击准备。不久，火枪手的人数按比例来说比长矛手增加了很多；在弗朗斯瓦一世在意大利进行的各次会战中，火枪手的人数还比长

矛手少得多，但 30 年以后，就至少是相等了。由于火枪手人数的增加，就必须发明某种战术，以便将火枪手正规地配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这一点在被称为匈牙利战斗队形 [Hungarian ordinance] 的一套战术中已经做到了，这种队形是帝国的军队在匈牙利与土耳其人作战期间创立的。火枪手在白刃战中不能自卫，所以经常配置在能够退到长矛手后面隐蔽的地方。于是，他们有时配置在两翼，有时配置在四角上；最常见的是在长矛手的方队或纵队的四周，围以一系列火枪手，同时，火枪手受到后列的长矛手的保护。最后，把火枪手配置在长矛手两翼的原则被广泛采用，荷兰人在独立战争时所实行的一套新战术就采用了这一原则。这套战术的特点，就是每一支军队按照瑞士战术或匈牙利战术所分成的三个大方阵再作进一步的划分。每个大方阵列成三线，中间的一线又分为左翼和右翼，两翼之间的间隙至少等于第一线的正面宽度。全军分编为若干个半团，我们把这种半团称为营；每个营的长矛手配置在中央，火枪手配置在两翼。前卫的兵力为 3 个团，通常队形如下：2 个半团为第一线，构成绵亘的正面；每翼之后又各有 1 个半团；再后面就是其余 2 个半团，同样构成绵亘的正面，与第一线平行。主力和后卫或配置在前卫的翼侧，或配置在前卫之后，但队形通常同上。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原先的罗马队形，即分成三线和几个不大的独立单位。

帝国的人以及西班牙人认为，必须把他们庞大的军队分成更多的部分，而不是分成上述三个部分。但是，他们的营，即战术单位，比荷兰人的大得多，作战时不是成横队，而是成纵队或方队，并且战斗队形也没有固定的形式，一直到荷兰独立战争时西班牙人才把他们的军队编成一种大家叫做西班牙旅的战斗队形。⁴

个这样的大营（每一个常常由若干个团组成）编成1个方队，四周各有一列或两列火枪手，并且每个角上都有侧防火枪手队；这4个营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配置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而且其中的一角朝向敌方。如果军队合编为1个旅过于庞大，则可分编为2个旅，这样就构成三线。第一线2个营，第二线4个营（有时只有3个营），第三线2个营。我们可以看出，如同荷兰的战法一样，这里也在企图恢复过去罗马的三线制。

在十六世纪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重装骑士队被解散了，雇佣骑兵起而代之。雇佣骑兵像我们现代的胸甲骑兵一样，装备有胸甲、头盔、双刃刀和手枪。这种骑兵比从前的骑兵行动迅速得多，因此对步兵的威胁也就更大；但是当时的长矛手却始终不怕它。由于这一变化，骑兵便统一成为一个兵种，并且在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三十年战争时期。在这时期，雇佣兵制度盛行于欧洲；依靠战争和为了战争而生活的人形成了一个阶层；虽然战术可能因此发展了，但是，人员——组成军队并决定军队的 morale（精神状态）的材料——的质量却当然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在中欧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雇佣兵队长，他们以宗教和政治纠纷为借口，掠夺利蹂躏整批国家。兵士的品质愈来愈坏，一直到法国革命最后废除雇佣兵制度时为止。帝国的人作战时采用西班牙旅的战法，一线配置4个或4个以上的旅，并用同样的方法构成三线。瑞典人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编成瑞典旅，每个旅由3个营组成，1个营在前，2个营稍后。每个营展开成一线，中央是长矛手，两翼是火枪手。这两种步兵（他们的人数相等）配置时构成绵亘的阵线，彼此都能进行掩护。假定命令火枪手构成绵亘的阵线，这时中央营即前列营的两翼火枪手便站

到长矛手的前面进行掩护，而其他两营的火枪手则各前进到相应的翼侧，与前一个营的火枪手取齐构成一线。如果预料到有骑兵攻击，那末所有的火枪手都应退避到长矛手的后面，而两翼的长矛手则向前移动，与中央的长矛手取齐成一线，这样，长矛手就构成绵亘的阵线。战斗队形是以配置在军队中央的各旅编成的两线构成的，而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两翼，中间夹杂有小队火枪手。这套瑞典战法的特点是：长矛手，在十六世纪曾是一种具有巨大进攻力量的兵，现在已失去了任何攻击的能力。他们成了单纯的防御工具，其任务是掩护火枪手免遭骑兵的攻击；而骑兵不得不重新肩负起攻击的全部重担。这样一来，步兵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而骑兵则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实战中取消了当时骑兵所惯用的一种战斗方法——射击；他命令骑兵始终要手持双刃刀全速冲锋；从这时起，直到恢复在起伏地上作战时止，凡采用这种战术的骑兵，都可以因为在与步兵较量中取得巨大的胜利而自夸。这种情况，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雇佣步兵来说，是最严酷不过的判决了，然而从执行各种战斗任务这方面来看，它仍然是历代最有训练的步兵。

对欧洲军队的战术来说，三十年战争总的结果是，无论是瑞典旅或西班牙旅都不存在了，军队这时开始配置为两线，骑兵构成两翼，步兵在中央，炮兵配置在这两个兵种的正面前，或两者之间的间隙上。有时还留有由骑兵编成的或由骑兵和步兵混合编成的预备队。步兵展开成纵深为6列的横队，火枪已轻便得多，不用叉形脚架便可进行射击；各国都采用带弹壳的子弹和子弹盒。火枪手和长矛手合编在同一个步兵营内，这就产生了最复杂的战术队形变换；而合编的理由是必须建立所谓防骑兵的步兵营或者就

像我们所说的方队。即使在编成简单的方队时，要将中央的 6 列长矛手拉开，以便从四面保护那些不能抵抗骑兵的火枪手，这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营编成十字队形、八角队形或其他一些奇特的队形，那又是多么困难！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方法比任何时候都复杂，除终身服役的兵士外，无论谁都毫无希望做到哪怕是大体上掌握它。同时，很明显，在敌人的视界内编成能够击退骑兵攻击的战斗队形的一切尝试，都完全是枉费心机的。任何有战斗力的骑兵，不等这些营的队形变换完成四分之一的时候，就早已冲到这种营的中央了。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长矛手的人数比火枪手大大减少了，因为从长矛手丧失全部进攻力量时起，火枪手就成了步兵的真正的攻击力量。此外，人们发现当时最厉害的骑兵——土耳其骑兵——经常突破长矛手的方队，但是他们的攻击也经常被排成一线的火枪手以准确的射击所击退。因此，帝国的人便在自己的匈牙利部队中完全废除了长矛，而有时用 *chevaux de frise*（拒马）来代替它，这种拒马是到战场上才装配起来的，并且拒马上的尖刃由火枪手携带，作为他们常备装具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军队作战时根本没有长矛手，火枪手在受到骑兵攻击的威胁时，凭借自己的火力和骑兵的支援来抵抗。但是彻底废除长矛，还是有赖于如下两种发明：大约在 1640 年法国发明的、并于 1699 年改进为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一种方便的武器——刺刀，以及大约在 1650 年发明的燧发机。刺刀当然不能完全代替长矛，但它还是使火枪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而在这以前，人们认为火枪手通常是靠长矛手来保护的；燧发机简化了装弹过程，这样就不仅能用快射弥补刺刀的不足，而且能以此取得大得多的战

果。

六、十八世纪的步兵

随着步兵装备中长矛的废除，各种护身器具也就取消了。从此以后，这一兵种就只由装备有带刺刀的燧发枪的兵士组成。这种变革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头几年，也就是十八世纪的头几年完成的。这时，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常备军，这种常备军是尽可能用自愿报名的方法——这经常与欺骗和强制的手段相结合——招募来的，而在必要时则采用强迫征兵的办法。这些军队到这时才固定地分为 500—700 人的营作为战术单位；营为了特定的目的又分为连；几个营组成一个团。这样，步兵组织就有了较固定的形式。用燧发枪射击时所需要的空间比用过去的明火枪射击时要小得多，因此取消了原来的疏开的队形，而采用密集的队伍，以便在一个地段上容纳尽量多的射手。基于同一原因，战斗部署中各营之间的间隙也最大限度地缩小了；这样，整个正面就构成了一条拉长的绵亘的阵线：步兵成两线在中央，骑兵在两翼。射击原先是按横列进行的，而且每列在射击后都退到后面重新装填，这时却按排或连进行了：每排的前三列都按照口令同时射击。这样，每个营都可对面前的敌人不间断地进行射击。每个营在这种宽横队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每人都有规定位置的队形就取名为战斗队形。把军队编成行军队形，使它随时都易于从行军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并且每个单位都能迅速地在横队中占据规定的位置，这是极其困难的。在敌人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安营也要考虑到这种要求。因此，军队转移和安营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大大地改进了，然而，战斗队形的笨拙不灵仍然限制了军队的

一切运动。同时，这种队形过于呆板，除了最平坦的地形以外，什么地方都不能采用，这就更加限制了战场的选择范围；但在交战双方受到同样限制时，这种情况就不致使任何一方陷入不利态势。从马尔普拉克会战时起，到法国革命开始时止，一切道路、村镇和庄园对步兵来说都是禁地，甚至沟渠或栅栏也几乎被防守它们的军队视为障碍。

普鲁士步兵是十八世纪最出色的步兵。它主要是由德骚亲王列奥波特建立起来的。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步兵横队的纵深由 6 列减为 4 列。列奥波特取消了第四列，将普鲁士军队排成 3 列。他还采用了装弹铁探条，使他的军队在一分钟之内能装填和发射 5 次，而其他军队在一分钟之内却只能勉强发射 3 次。同时，他的军队受过在攻击过程中进行射击的训练。但是因为射击时必须停下来，而整个宽横队又应保持整齐，所以步伐很慢；这就是所谓鹅步。射击从距敌人 200 码的地方开始；横队以鹅步前进；距敌人愈近，步幅愈小，火力愈强，直到敌人开始退却，或陷入混乱状态，使得骑兵的侧面攻击和步兵的刺刀冲锋把敌人逐出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时为止。军队总是编成两线；但是因为第一线中几乎没有间隙，所以第二线很难在必要时支援第一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即位时所承袭的军队和战术就是这样。看来，一个有天才的人，如果不破坏这种战法，就很少有可能改进它，而弗里德里希以他所处的地位和他所拥有的兵源要破坏它是办不到的。但他终于还是制定了一种攻击法和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使得他能够依靠比目前撕丁还要小的王国的资源和英国的微薄的金钱援助，进行了几乎对整个欧洲战争。其中的秘诀是很容易道破的。到当时为止，十八世纪的一切会战都是两军对阵的

会战：双方军队展开成互相平行的阵线，在正规的平地战斗中厮杀，不讲什么军事计谋和诈术；较强的一方可能获得的唯一优势，就是以其两翼包围敌军的两翼。而弗里德里希则将埃帕米农达斯所发明的斜形攻击法运用于线式战斗队形。他选择敌人的一翼进行第一次攻击，并且以进行包围的那一翼以及中央的一部分部队去攻击所选定的一翼，而将其余部队控制在后面。这样，他不仅由于包围敌军的一翼而获得了优势，而且能以优势兵力击溃受到这种攻击的敌军。其余敌军不可能前来援救，因为他们被固定在线式战斗队形中的自己的位置上；攻击部队在一翼上取得胜利后，其余部队立即前进看齐并对中央的敌军展开正面攻击；这时，原来已开始攻击的一翼在粉碎敌人的一翼以后，则转而猛攻中央敌军的翼侧。这确实是唯一可取的方法，采取这个方法既可以保持线式队形，又可以用优势兵力攻击敌军战斗队形的任何一部分。可见，一切都取决于如何组织攻击的一翼的兵力，所以，弗里德里希总是在笨拙不灵的战斗队形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加强这一翼。他经常在攻击的一翼的第一线步兵之前，配置一线掷弹兵或精兵作为前卫，以保证在第一次攻击中就取得最大的胜利。

弗里德里希用来提高其军队水平的另一办法就是改编骑兵。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理论被遗忘了。骑兵不再依靠双刃刀和勇猛的攻击取胜，除了极少数例外，已恢复了使用手枪和马枪作战的方法。因此，在十八世纪初的战争中骑兵攻击成功的战例不多；在普鲁士，骑兵特别被忽视。但是弗里德里希恢复了骑兵持双刃刀全速冲锋的老办法，并且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他的很大一部分胜利都是依靠这支骑兵取得的。当他的军队成了欧洲模范的军队的时候，为了迷惑别国的军事家，他竟把战术队形变换

的方法弄得异常复杂，其实这些复杂的战术队形的变换一点也不适于真正作战，只不过是用以掩饰他取胜方法的简单罢了。他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以致他自己的部属比其他任何人都受骗更深，他们确信这些复杂的编队方法是他的战术的真正实质。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希就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利奥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

除了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一贯成密集队形作战的基于步兵以外，还有一种不参加大会战的特种轻步兵。这种步兵的任务是进行游击战；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但是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仿效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区³²²的这些半野蛮人组成了自己的轻步兵。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直到十七世纪，轻步兵在大会战中曾采用过的散兵战，已完全不采用了。只有普鲁士人以及步其后尘的奥地利人，组织了一两个猎兵营。这是由防止偷猎的守卫人和守林人组成的，他们都是打得很准的射手，在作战时分布在整个正面上，射击敌人的军官；但是他们人数很少，所以不见得有什么作用。散开队形的恢复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当时，欧洲军队的兵士被用强制手段和严厉办法控制在队列里，不可能受命去进行散兵战，而在美国，他们却不得不同那些虽未受过常备军的正规训练、但射击准确而又善于使用步枪的居民作战。地形对居民是有利的；他们并没有企图进行他们最初所不会的机动，而是本能地采用了散兵战。这样，累克辛顿在康克德战斗³²³就开辟了步兵史上的新纪元。

七、法国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的步兵

当欧洲同盟的军队侵入革命的法国时，法国人所处的地位与在这不久前美国人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法国人没有那样有利的地形。为了按照旧的线式战术与业已侵入或即将侵入本国的人数众多的敌军作战，法国人必须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兵士，但是这样的兵士并不多，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志愿兵却很多。虽然志愿兵曾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受过一些线式战术基本动作的训练，但一进入火线，展开成横队的志愿兵的各营便自动地散开，成为散兵群，利用每一地褶，防避敌人的火力；同时，当做一种预备队的第二线，常常一开始就卷入战斗。此外，法国军队的编制也与敌军大不相同。它不是把各营编成单一的、不灵活的横队，而是编成若干个师，每个师由炮兵、骑兵和步兵组成。意外地新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即问题不在于使营在战斗队形中“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而在于使营在接到命令后进入战线和很好地作战。因为法国政府很穷，所以十八世纪的帐篷和庞大的辎重都被取消了；实行了露营；军官个人的行囊，在别国军队中要占运送物资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国已减少到军官可以随身携带的程度。军队不是从兵站仓库领取粮食，而是指靠在经过的地区就地征集。这样一来，法国军队就具有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运动性和易于编组战斗队形的能力。战败时，他们几个小时就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进攻时，他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点，出现在敌人的两翼。法国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以及同盟国军领导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使法军得到了一些喘息机会

来训练志愿兵和制定在他们当中开始萌芽的新的一套战术。

我们发现，从 1795 年起，这套新战术已开始具有某种将散开队形和密集纵队结合起来的形式。后来，又增加了横队，但不像以前那样全军都排成横队，而只是在认为情况需要时个别的营展开成横队。当然，这种必须经过较系统的训练才能采用的战法，是法国革命的非正规部队到最后才采用的。3 个营组成半旅，6 个营组成旅，2 个或 3 个步兵旅组成师；此外，每个师还有 2 个炮兵连和一定数量的骑兵；若干个这样的师组成军团。当师与敌人遭遇时，前卫的散兵即占据防御阵地，而前卫则在全师到达之前作为散兵的预备队。然后，各旅都组成两个横队和一个预备队，但各营则成纵队，其间隙的大小不固定；战斗队形中的间隙，则由骑兵和预备队掩护。战斗队形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定要成为绵亘的直线；它可根据地形向任何方向弯曲，因为这时已不再选择光秃的平地做战场；相反，法国人宁愿选择起伏地，他们的散兵在整个战线前构成散兵线，冲入他们所能攻占的每个村镇、庄园或小树林。如果第一线各营展开，那末，这些营通常都很快地变成散开队形；而第二线各营则总是保持纵队，并且用这种队形向敌人纵深很小的横队攻击，通常都取得很大的战果。由此可见，法军的战术队形逐渐演变为两线制，每一线均由成密集纵队的营组成，这些营配置成 *enéchiquier*（棋盘形），散兵在正前方，预备队集结在后方。

拿破仑就正是在这一发展阶段遇到了法国革命创立的战术。当他一掌握政权，对此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便开始进一步发展这一套战术。他把军队集中在布伦兵营，施以正规训练。他着重训练兵士在担任预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内，并

迅速展开成横队。他把 2 个或 3 个师编成一个军，以便于指挥。他建立了新的行军队形，并使它达到了极完善的地步。这种队形的特点在于把军队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使他们能够依靠当地的物资储备供养自己，同时在于使军队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以便在遭受攻击的一部分军队可能被敌人击溃以前能够在任何一点集合。从 1809 年战局起，拿破仑就开始制造新的战术队形，例如，由整旅整师组成的长纵队。但是，这种纵队很不成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1813 年以后，法国的一套战术成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财富。旧的线式战术和募兵制被彻底废除了。各国都规定每个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实行了新的战术。在普鲁士和瑞士每个公民都应服现役，而在其他国家则采用征兵制：青年都要抽签，以确定应服兵役的人。到处都实行预备役制度，将一部分已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复员回家；这样，平时的开支不大，而战争一旦爆发又能拥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士。

从这时起，步兵的装备和编制起了某些变化，其原因一方面是轻火器生产领域内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法国步兵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冲突。一向爱使用步枪的德国人，增加了他们的猎兵营；而感到必须在阿尔及利亚装备射程较远的武器的法国人，终于在 1840 年建立了一个猎兵营，装备了经过改良、命中率大而射程远的步枪。这个营的兵士学会了各种队形变换，甚至用一种跑步 (pas gymnastique) 进行远距离行军，不久就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力，因而又组成了一些新的营。这样，新式的轻步兵就建立起来了，但已经不是由猎人和守林人组成，而是由最健壮灵活的兵士组成。步枪的射击精度和远的射程同兵士的灵活和刻苦耐劳结合起来，因此，这些新建立的部队无可争辩地胜过当时所有

的步兵。同时，在基于步兵中也采用了 pas gymnastique，现在各国军队已都把跑步当做步兵的重要训练项目之一——这在过去，甚至拿破仑也会认为是极不合理的。

法国军械师（德尔文和庞沙腊）所设计的新式步枪的成功，很快就引起了新的改进。线膛枪采用了圆锥形的弹丸。米涅、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使弹丸很容易沿枪膛下滑，同时使铅弹在滑至枪膛的下端后扩张而嵌入膛线，这样，就产生了保证射击效果所必需的旋转运动和力量。另一方面，德雷泽发明了针发枪，这种枪从后面装填，并且不需要专门的导火具。所有这些步枪都能杀伤 1 000 码距离上的目标，并且像普通的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于是产生了用这些步枪装备所有步兵的想法。英国首先实现了这个想法。早已准备采取这一步骤的普鲁士随后也实现了这个想法，接着是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最后是法国。俄国以及意大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到目前为止仍处于落后状态。这种新武器完全改变了作战的特点，但不是朝着战术理论家所期望的那个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很简单的数学原因。只要画出这种弹丸的弹道，就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在测定目标距离时如果有 20 或 30 码的误差，就根本不可能命中 300 或 350 码以外的目标。此外，在教练场上，各种距离都是已知的，而在战场上则是未知的，并且每分钟都在变动。如果步兵配置在防御阵地上，并且有时间测量达到正面前显著地物的距离，那末在 300—1 000 码距离内对攻击的敌人就将具有巨大优势。对方要消除这种优势，只有迅速跑步前进，在相隔守敌 300 码的距离外不进行射击，因为在 300 码以内双方的火力是同样有效果的。在这种距离上，双方成两条严整的散兵线进行的互射将非常猛烈，大量子弹将命中前

哨和预备队，以致勇敢的步兵除了在 40 或 50 码的距离上进行齐射，一有机会即向敌人猛扑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原则首先是由普鲁士少校特罗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的，随后由法国人在不久前的对奥战争³²⁴中成功地运用了。所以这些原则将成为现代步兵战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对付像普鲁士的针发枪那样装填迅速的武器时，如果能取得同样良好的效果，那就更是如此。用同一型式的线膛枪装备所有步兵，就将消除轻步兵和基干步兵之间至今还存在着差别，就将建立一支能够执行任何任务的步兵。显然，这就是这一兵种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9 月—10 月
10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 年版
第 9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海 军³²⁵

海军——一个国君或国家所拥有的军舰的总称。古代各国海军虽然往往有很多船只，但是在船只的大小、动力和进攻力方面则根本不能同现代海军相比。腓尼基、迦太基、希腊和罗马的海船是一种不能在风暴天气里航行的平底船；海上风暴对于它们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它们只能沿海岸缓慢行驶，夜间则停泊在小港湾或海湾内。对于这种船说来，横渡希腊与意大利之间的或非洲与西西里之间的海面是一桩危险的事情。这种船承受不住我们现代军舰常用的那种帆的重压，因此仅备有小帆，它们依靠浆的力量只能缓慢地航行。当时还没有发明罗盘，还不知道经纬度，在航行中唯一的向导是岸标和北极星。进攻手段的效能也很差。弓箭、梭镖、笨重的弩炮和弹射器是仅有的能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在海上，在两只交战的军舰直接接触以前，是不可能给敌方以任何严重的损伤的。因此海战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或者是冲向敌舰，用舰头坚硬的铁尖猛撞敌舰的舷，将它击沉；或者是舷并舷靠拢敌舰，将它钩住并立刻和它进行接舷战。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了迦太基的海上霸权³²⁶以后，古代史上就再也找不到具有丝毫研究价值的海战了，而罗马统治权的建立，很快就消除了以后在地中海发生任何海战的可能。

我们现代海军真正的诞生地是北海。大约在大批的中欧条顿族人起来为打倒腐败的罗马帝国、复兴西欧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在北海沿岸的同伙——弗里西安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丹发人和斯塔的那维亚人——开始了航海。他们的船是一种稳定的、坚固的海船，龙骨凸起，两端尖削，他们在这种船上大都只使用帆，并且不怕在波涛汹涌的北海上受到风暴的突然袭击。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就是乘这种船从易北河和埃德尔河的河口航行到不列颠的海岸，而诺曼人则乘这种船进行了海盗式的探险，东面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西面到达了美洲。这种敢于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的建成，在航海业中引起了全面的革命，因此还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在欧洲所有沿海地区就都采用新式尖底海船了。诺曼人航海时所使用的船大概不太大；排水量无论如何不超过 100 吨，有一根或者最多两根张着纵帆的桅杆。

在一个长时期内，无论是造船业还是航海业看来都没有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内，使用的船只都不大，诺曼人和弗里西安人所固有的那种胆气也消失了。所有的改进都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做出的，他们成了当时最勇敢的航海者。葡萄牙人开辟了去印度的航线，两个在外国服务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和卡博特则继诺曼人莱夫之后最先横渡了大西洋。远涉重洋的旅行成为当时必需的事情，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船只。同时，由于需要给军舰甚至商船装备重炮，也要求增大船只的尺寸和吨位。常备陆军产生的原因，也同样成为常备海军产生的原因，而且只有从这时起，我们才能谈到真正的海军。这时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

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

亨利七世奠定了不列颠海军的基础，他建造了第一艘军舰，名为“伟大的哈利号”。亨利七世的继承者^①创立了归国家所有的正规的常备海军，其中最大的军舰命名为“上帝的亨利号”。这是到那时为止所建造的一切军舰中最大的军舰，它有 80 门火炮：一部分配置在两层普通的连续的火炮甲板上，一部分配置在舰首和舰尾的补助平台甲板上。这艘军舰有 4 根桅杆，它的吨位约为 1 000 到 1 500 吨。到亨利八世逝世的时候，整个不列颠海军大约有 50 艘帆船，排水量共计为 12 000 吨，乘员为 8 000 名（包括水兵和海军陆战队）。这个时期的大型军舰都很笨重，前甲板和后甲板很高，也就是说舰首和舰尾的上层建筑很高，因此军舰很不稳定。我们有资料考证的第二艘大军舰是“海上霸王号”，后来称为“英王号”，它建成于 1637 年，这是我们掌握有近乎完全确凿的武器装备资料的第一艘军舰。它有 3 层连续甲板、前甲板、后半部甲板、中后部甲板、后甲板和舰尾指挥室；下甲板上 30 门四十二磅和三十二磅炮；中甲板上 30 门十八磅和九磅炮；上甲板上 26 门大概是六磅和三磅的轻炮。此外，它还有 20 门追击炮，在前甲板和后半部甲板上还有 26 门火炮，但在内河执行一般任务时舰上的炮减为 100 门，因为携带全部火炮可能使军舰负担过重。关于小型战船，我们的资料是极端缺乏的。

1651 年，军舰分为 6 级。但是，此外还有许多种不列等级的舰船，如三桅横帆船、围船，稍后还有炮船、纵火船和座艇。据一份关于 1677 年整个英国海军舰船的统计材料所载，最大的一艘

^① 亨利八世。——编者注

一级三层甲板舰装备有 26 门四十二磅炮、28 门二十四磅炮、28 门九磅炮、14 门六磅炮以及 4 门三磅炮；最小的两层甲板舰（五级）装备有 18 门十八磅炮、8 门六磅炮、4 门四磅炮，即共计 30 门火炮。整个海军由 129 艘舰船组成。1714 年海军共有舰船 198 艘，1727 年共有 178 艘，1744 年共有 128 艘。此后，随着船数的增多，舰船的尺寸也在增大，而随着吨位的增加，武器装备的重量也在增加。

第一艘相当于我们现代巡航舰的英国军舰，是罗伯特·达德利爵士早在十六世纪末建造的。但是过了整整 80 年以后，这种首先在南欧各国出现的军舰才被英国海军广泛采用。有一个时期，英国人对于巡航舰高速性的意义认识不足。不列颠军舰装备的火炮总是太多，因此舰上的底层炮门仅高出水面 3 英尺，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是无法打开的。此外，武器装备过重，使军舰的航海性能也大为降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在保持同样数量火炮的条件下，却增大了军舰的排水量，因此他们的军舰能够装备口径更大的火炮，能携带更多的储备品，而且还具有更大的浮力和高速性。十八世纪上半叶排水量约为 710 吨的英国巡航舰，有 44 门九磅到十二磅的炮和几门十八磅炮。到 1780 年建成了排水量为 946 吨的巡航舰，装备有火炮 38 门（大部分是十八磅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改进。在这一时期武器装备与英国军舰相同的法国巡航舰，排水量平均多 100 吨。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十八世纪中叶），较小的军舰开始比较明确地像现在这样区分为：轻巡航舰、两桅横帆船、小型两桅船和纵帆船。

1779 年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炮（大概是英国将军梅耳维耳发明的），这就使大多数国家的海军的武器装备起了很大变化。这是一

种炮身很短的大口径炮，类似榴弹炮，但它是用来以小量装药在近距离上发射实心弹的。这种炮最初由苏格兰卡伦铁业公司制成，所以叫卡伦炮。这种炮的齐射在远距离射击时无效的，但在抵近射击时对于敌舰的木质部分可造成极严重的破坏。这种炮的炮弹由于飞行速度较小（装药量少），能造成较大的弹孔，更加严重得多地破坏船只的木质部分，造成许多特别危险的裂缝。同时由于这种炮比较轻便，就能比较容易地将几门这样的炮配置在军舰的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上。到1781年，英国海军中已有429艘军舰除普通火炮外还装备了6—10门卡伦炮。我们在阅读法国战争和美国战争时期的海战报告时，应当注意到英国人从来没有把卡伦炮计算在军舰火炮数目之内，例如不列颠巡航舰通常有36门炮，但如果把舰上的卡伦炮包括进去，它实际上就有42门以至更多的火炮。在与革命的法国作战时，英国军舰由于使用卡伦炮，在全舷齐射时所发射的炮弹的重量占优势，这就使得英国人在近距离进行的战斗中获得多次胜利。但卡伦炮毕竟只是临时用来加强80年前就已存在的那种较小型军舰的战斗力的武器而已。各级军舰的尺寸一经增大，便开始不用卡伦炮了，目前这种炮大都被其他型式的火炮所代替。

在军舰结构方面，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大大超过了英国人。他们的军舰比不列颠军舰大，外形也比较美观，他们的巡航舰在尺寸和航海性能方面特别优于英国巡航舰。许多年来，英国巡航舰都是仿照1782年缴获的法国“赫柏号”巡航舰建造的。随着军舰长度的增加，舰首和舰尾的高大的上层建筑——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缩小了，因而提高了军舰的航海性能。这样，军舰就逐步具备了现代军舰那种比较美观的外形和高速性。在这种

比较大的军舰上，人们不是去增加火炮的数目，而是去加大每一门火炮的口径、重量和长度，以便能使用全装药和达到最大的直射距离，这样就能在远距离上开火。二十四磅以下的小口径炮在大军舰上已经绝迹。而其余火炮的口径也被简化，每艘舰上不超过两种口径，最多三种口径。因为战列舰的下甲板最为坚固，所以配置有口径与上甲板上的相同、但更长更重的火炮，以保证至少有一层火炮能够向尽可能远的距离射击。

约在 1820 年，法国将军佩克桑有一项对于海军的武器装备具有很大意义的发明。他设计了一种炮尾部有狭小药室的大口径火炮，并开始用这种“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canons obusiers）以小射角发射空心弹。虽然在德国早已有人以二十四磅甚至十二磅短管炮使用爆炸弹对筑城工事进行过平射，但到当时为止还只有岸防炮台的榴弹炮用空心弹射击过军舰。拿破仑非常了解爆炸弹命中军舰木舷时的破坏作用，因此他在布伦给准备用来征讨英国的大部分炮舰装备了榴弹炮，并且确定了一条规则，即应当用命中后才爆炸的炮弹来射击军舰。这时，佩克桑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的出现，就使军舰能装备这样一种火炮，这种火炮以最低伸的弹道发射爆炸弹，因而能在舰对舰的海战中使用，并能保证与发射实心弹的旧式火炮相同的命中率。新式火炮不久就被各国海军用作武器，经过各种改进之后，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大型军舰武器装备中的重要部分。

这以后不久，有人开始尝试把蒸汽发动机运用到军舰上，就像富尔顿把它装在商船上一样。从内河轮船发展到近海轮船并逐渐发展到远洋轮船的过程是缓慢的，蒸汽军舰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这是因为当时只有明轮蒸汽舰的缘故。明轮和一部分机器暴露在

敌人的火力之下，只要命中一弹，就不能再用；它们占去了舰上的大部分位置；此外，机器、明轮和煤的重量使舰船的容量大大减小，以致根本谈不到给它们装备大量长管重炮的问题。因此明轮蒸汽舰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战列舰，但是它的航速快的优点，使它能够同通常在敌人翼侧活动以获得战果或掩护退却的巡航舰媲美。目前巡航舰的尺寸和武器装备，正好使海军能大胆地使用它独立巡航，同时它的优良的航海性能又使它能够及时退出众寡不敌的战斗。任何巡航舰的航海性能都远远不如蒸汽舰，不过蒸汽舰没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蒸汽舰根本无力同巡航舰进行正规的舷炮战；蒸汽舰上的地方不够，它的火炮必然常常比帆力巡航舰的火炮少。这里比任何地方都适于使用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蒸汽巡航舰上所减少的火炮数目，可以从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的口径和所发射的炮弹的重量方面得到弥补。起初这种炮只用来发射爆炸弹，但不久前已开始把它们（特别是舰首和舰尾的追击炮）造得这样重，以致在使用全装药时可以把实心弹发射到很远的距离。此外，由于火炮数量减少，就可以在甲板上设置旋转平台和敷设滑轨，使全部或大部分火炮能够移动，以便向任何方向射击。依靠这一点，蒸汽巡航舰的进攻力几乎增加一倍；20门火炮的蒸汽巡航舰可以使用上的火炮数量，至少与装备有40门火炮但每舷只有18门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可以使用上的火炮数量相等。因此现代大型明轮蒸汽巡航舰是威力最大的军舰之一。它在火炮口径和射程方面的优势，以及它的速度，使它能在帆力舰很难给予任何有效还击的距离上杀伤对方；同时当加速发展会战对它有利时，它还可以利用它发射的炮弹的重量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力来做到这一点。明轮蒸汽舰的缺点仍然是：全

部发动机暴露在敌人直接瞄准火力之下，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

对于那些较小的舰船，如轻巡航舰、侦察船以及其他一些在海战中虽然不起什么作用但在整个战局过程中则有很大用处的轻便船只，蒸汽的巨大优越性立即就被承认了，因此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都根据需要建造了大量的这一类的明轮船。运输船只的情形也是如此。在运送陆战队登陆时，轮船不但能够把航海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并且使人们能够几乎绝对准确地计算出到达指定地点的时间。运送军队的工作大为简便了，而如果考虑到每个海洋国家都有大量蒸汽商船在必要时可作为运输船只使用，情况就更是如此。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茹安维尔亲王在他的一本著名的抨击性小册子³²⁷中说：蒸汽在海战条件方面引起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法国攻入英国，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只要担负决定性行动的军舰即战列舰还仅仅是些帆力舰，那末蒸汽的利用就不可能使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螺旋推进器的发明，就有了一种必然使海战发生根本变革并且使所有的军舰变为蒸汽舰的手段。但是，在发明螺旋推进器以后过了整整13年，才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新式军舰设计和建造方面一贯走在英国人前面的法国人，首先迈出了这一步。1849年，法国工程师杜毕伊·德·洛姆终于建造了第一艘螺旋推进器战列舰——装备有功率为600匹马力的发动机和100门火炮的“拿破仑号”。这艘军舰不完全依靠蒸汽的力量；螺旋推进器和明轮不同，它使军舰能够保持帆力舰的整个形状和索具，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只利用蒸汽或只利用帆力或者同时利用二者来航行。因此，这种军舰随时能够利用帆来节省用煤，以备急需；所以它对加煤站的依赖性比旧的明轮蒸汽舰要小得多。由于它同时

还使用帆，并且由于它的蒸汽发动机的功率还太小，不能使它达到相当于明轮蒸汽舰的速度，所以“拿破仑号”和其他同类的军舰都被称为辅助蒸汽舰。但是，此后即建成了拥有功率相当强大的蒸汽发动机的战列舰，这种发动机使军舰能够以螺旋推进器所能造成的最大速度航行。鉴于“拿破仑号”的成功，法国和英国不久就开始建造螺旋推进器战列舰。俄国战争^①又进一步推动了军舰建造业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当人们已经知道给大部分造得很好的战列舰装上螺旋推进器和机器并不特别困难时，把一切军舰变为蒸汽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任何一个海上强国都不想建造大型帆力舰了。几乎所有新建造的军舰都是螺旋推进器蒸汽舰，只有少数还需用于某种目的的明轮蒸汽舰例外。而到1870年，帆力舰就差不多像今天手摇纺车和滑膛枪那样过时了。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需要，出现了两种新式军舰。第一种是蒸汽炮艇或臼炮艇，它最初是英国人为了准备攻击喀琅施塔得而建造的。这是一种小船，吃水4—7英尺，装备1—2门射程重炮或1门重臼炮；炮艇主要在航行困难的浅水中使用，臼炮艇则在远距离轰击筑有工事的海军兵工厂时使用。这种舰艇能极好地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未来海战中无疑将起重要的作用。斯维阿波尔格战斗表明，臼炮艇使舰队获得过去从未有过的那种对要塞轰击而不致遭到还击的能力，因而完全改变了舰队和要塞之间攻防力量的对比。在3000码的距离上，臼炮艇可以破坏像一个城市这样大的目标，而它们本身则由于面积小而十分安全。在相反的场所，炮艇在岸防炮台的配合下也能加强防御，并为进行海战提供至今还

^① 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十分缺乏的、可作为先驱舰的轻便舰艇。

第二种是炮弹穿不透的装甲浮动炮台，它最初是法国人为了攻击岸防工事而建造的。这种浮动炮台只在金布恩附近试用过³²⁸，即便是用来对付这个小要塞的不坚固的胸墙和生锈的火炮，也没有获得特别大的战果。可是，看来法国人对它很满意，所以此后还是继续试制装甲舰。他们建造了一种炮艇，在其前甲板上设置了一道炮弹穿不透的特别的钢质护板，用以掩护火炮和炮手。但是，如果说浮动炮台尚且笨重不灵，需要拖曳，那末这种炮艇就经常由于船头下沉而根本不适于航行。然而法国人还是建造了一般包着钢板的蒸汽巡航舰“光荣号”。据说，这艘军舰是炮弹穿不透的，行驶很快，并且完全经得起风浪的袭击。关于这种炮弹穿不透的巡航舰在海战中可能引起的变革有一种最夸大的说法。有人声称，战列舰已经过时，大规模海战的结局已转由这种装备有一个炮台的、周围裹着炮弹穿不透的装甲的巡航舰来决定；这种巡航舰好像是任何一艘木质三层甲板舰都敌不过的。这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指出，设计一种足以穿透铁甲或钢甲的威力强大的线膛炮并把它装置在军舰上，比起建造包着很厚的金属板以抵御这种火炮的实心弹或爆炸弹的舰船来，要容易得多。至于“光荣号”，我们毕竟还没有确实知道它是否经得起风浪；据说，由于它不能装载足够的煤，所以在海上依靠蒸汽航行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它的不列颠对手“勇士号”的能力如何，我们还不了解。毫无疑问，在缩减武器和储煤量并且改变舰船构造之后，是可以造成一种完全不怕远距离和中距离射来的炮弹、同时又能很好发挥轮船优点的军舰的。但是，在炮兵学进步如此迅速的时代，今后是否应当建造这一类军舰，是很值得怀疑的。

目前由于线膛炮的使用而在炮兵中发生的变革对于海战的影响，看来比装甲舰可能发生的影响要重大得多。每一门名副其实的线膛炮，都能赋予远距离射击以这样大的精确性，以致原来海军炮在这种距离上射击效果不大的情况，看来很快就将成为过去。此外，线膛炮可以使用长炮弹和减装药，因此就能大大减小舷炮的口径和重量，而如果保持原来的口径，则可取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效果。重 56 英担的三十二磅线膛炮所使用的长炮弹，不但在重量方面，而且在侵彻力、射程和命中精度方面，都超过重 113 英担的 10 英寸滑膛炮的球形炮弹。如果装备战线膛炮，每艘军舰的进攻力至少可增加两倍。同时，发明一种触及船舷即行爆炸的着发炮弹也有非常迫切的需要。球形炮弹旋转不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它命中目标时，它的着发引信不是经常处在应处的位置，所以不一定会爆炸。但是线膛炮发射的长炮弹则围绕纵轴旋转，总是能够以弹头撞击目标，因此弹头信管上一个简单的着发火帽就能使炮弹触及船舷即行爆炸。迄今所发明的任何一艘装甲军舰，遭到两层甲板舰的舷炮用这种炮弹进行的两次齐射，恐怕是没有不被击坏的，更不用说那些穿进炮门而在甲板之间爆炸的爆炸弹了。线膛炮必然使那种适于使用卡伦炮的近距离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机动重新获得巨大的意义，而由于蒸汽使交战中的舰船不依赖于风向和水的流向，所以未来海战的战法就将更加接近于陆上会战的战法，并且将服从陆上会战的战术原则。

现代海军的军舰分为不同的等级，从第一级起到第六级止。但因为这些等级可以任意更改，所以最好还是用普通的方法来给军舰分类，即把它们分为：战列舰、巡航舰、轻巡航舰、两桅横帆船、纵帆船等等。战列舰是最大的军舰，其任务是在决战中组成

战斗队形，并依靠向敌舰发射的炮弹的总重量决定会战的结局。战列舰有三层甲板舰或两层甲板舰，换句话说，它们有三层或两层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这些甲板称为下甲板、中甲板和主甲板（或上甲板）。上甲板的顶上起初只铺有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而现在则铺有从舰首到舰尾的连续露天甲板。这层露天甲板的各部分仍旧称为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舰中部的上层建筑部分，称为中前部甲板），并且也配置有火炮，主要是卡伦炮。因此实际上两层甲板舰有三层火炮，而三层甲板舰则有四层火炮。最重的火炮当然配置在下甲板上。火炮配置的位置高水面越高，火炮的重量就越轻。各层甲板上火炮的口径通常是一样的，因此要达到以上要求，就要把火炮本身的重量减轻，这样一来，上甲板上的火炮就只能使用减装药，当然也就只能进行近距离射击了。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追击炮，这种炮配置在舰首和舰尾，即便是配置在前甲板或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也仍然具有最大限度的长度和重量，因为它们是用来进行最远距离的射击的。例如，英国战列舰的舰首炮和舰尾炮不是发射爆炸弹的 8 英寸和 10 英寸加农炮便是发射实心弹的五十六磅（口径为 7.7 英寸）和六十八磅（口径为 8.13 英寸）加农炮，其中一门装置在前甲板的旋转平台上。英国海军的一级军舰上通常有舰尾炮 6 门，舰首炮 5 门。这种军舰上其他的武器装备列于下表：

火炮位置	火炮形式	重量 (英担)	长度	火炮数目 (门)
下甲板	发射爆炸弹的 8 英寸加农炮	65	9 英尺	4
下甲板	三十二磅炮	56	9 英尺 6 英寸	28
中甲板	发射爆炸弹的 8 英寸加农炮	65	9 英尺	2
中甲板	三十二磅炮	50	9 英尺	32
上甲板	三十二磅炮	42	8 英尺	34
前甲板、后甲板	三十二磅炮	45	8 英尺 6 英寸	6
和中后部甲板	三十二磅卡伦炮	17	4 英尺	14
共 计				120

较小型的战列舰的武器装备依据相同的原则配备。为了比较起见,我们将法国一级军舰上的武器装备也列举出来,即:下甲板上三十磅长管炮 32 门;中甲板上发射爆炸弹的八十磅加农炮 4 门,三十磅短管炮 30 门;上甲板上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加农炮 34 门;前甲板、后甲板和中部甲板上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加农炮 4 门,三十磅卡伦炮 16 门;共计火炮 120 门。法国的发射爆炸弹的八十磅加农炮的口径比英国 8 英寸炮的口径大 0.8 英寸;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加农炮和发射实心弹的三十磅炮的口径比英国三十二磅炮的口径稍大一些,因此法国人在发射的炮弹的重量方面占优势。现在,最小的战列舰有 72 门炮;最大的巡航舰有 61 门炮。

巡航舰是只有一层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的军舰,在这层甲板的顶上另有一层露天甲板(前甲板、后甲板和中部甲板),在它上面也配置有火炮。英国海军的巡航舰通常有下列的武器装备:火

炮甲板上有火炮 30 门(或者全部是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或者一部分是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一部分是三十二磅长管炮);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有三十二磅短管炮 30 门;在舰首的旋转平台上有重炮一门。因为巡航舰大都是单独行动,并且常常和执行同样战斗任务的敌方巡航舰进行一个对一个的海战,所以大多数海洋国家都费了不小的力量使巡航舰造得尽可能又大又有威力。不论哪一级军舰都没有做巡航舰那样大量地增加吨位。由于美国要求建立一支花钱不多、但十分强大足以使人敬畏的海军,它是第一个重视由大型巡航舰组成的舰队的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它的这种舰队的每一艘巡航舰都将胜过其他国家用来对付它的任何一艘巡航舰。美国造船家在建造快速船只方面的长处也被利用起来了,在同英国的最近一次战争(1812—1814 年)中许多进行得很好的会战表明,这些美国巡航舰是多么可怕的敌人。虽然现在美国巡航舰同其他国家的巡航舰比较起来,大小上的差别已经不像 30 或 40 年以前那样悬殊了,但直到目前为止,它们仍然堪称同类军舰中的典范。

次一级的军舰叫做轻巡航舰。轻巡航舰只有一层配置在露天甲板上的火炮。但是这一级中较大的军舰有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但在舰的中间部分没有连续甲板连接在一起),上面还配置有几门火炮。因此这种轻巡航舰与 80 年前的那种高耸的两端还没有用连续甲板连接起来的巡航舰几乎一样。这种轻巡航舰还是相当坚固的,在它的舰舷上可以装置与更大的军舰上的火炮口径相同的火炮。它也有三根桅杆,一律使用横帆。较小的舰艇——两桅横帆船、纵帆船——有多到 20 门少到 6 门火炮。这类舰艇上只有两根桅杆,两桅横帆船使用横帆,而纵帆船则使用纵帆。它们的

火炮口径必然比大军舰上火炮的口径小,通常不超过十八磅或二十四磅,有时则小到十二磅和九磅。进攻力这样小的军舰是不可能派往会遇到严重抵抗的地方去的。在欧洲海面上,目前到处都开始用蒸汽舰来代替它们;只有在南美和中国等地的沿岸的海面上它们才真正有用,因为在这些地方它们只会遇到弱小的敌人,它们的使命也只是用来升起海上强国的国旗而已。

以上谈到的只是目前海军中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海军线膛炮的普遍使用,最近十年内军舰的武器装备无疑在一切方面都将发生变化。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1月22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1年版

第1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马克思
——
福格特先生³²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11 月
1860 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按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London,

H. Petzsch & Co. deutsche Buchhandlung,

78, FENCHURCH STREET, &c.

—
1869

“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³³⁰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伦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³³¹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³³²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采取法律手续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的预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了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写，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谈论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sunt certi denique fines*（一切总归有个限度）^①。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卷，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该书的内容，——硬说我干了许多丑事，现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续来当众驳斥这类货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进行这项工作，那末，除了上述的别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详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了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论定。

对福格特言论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的 *partie honteuse*（阴私）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责难的，只不过是他们曾经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况使然的；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们所碰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谈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约从 1849 年至 1859 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比较一下，那就会是给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辩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But never mind！（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须加以任何特别的说明。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1848年以前,那些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³³³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计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给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许多我过去并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现在还不相识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伦敦

硫 磺 帮³³⁴

Clarín; Malas pastillas gasta;
 ...hase untado
 Con unguento de azufre.
 (Calderon)^①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儿似的委任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³³⁵称之为“圆满的人物”^②；这位“圆满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这些同行们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136页）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³³⁶，出版于1859年12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圆满的人物”在

① 克拉林：他胡说八道；
 ……他给自己擦上
 硫磺膏。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第二幕）。——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abgerundete Natur》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智力成熟的人物”；海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编者注

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³³⁷，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来的文字：

俾尔“推销员”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伦‘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职业是组织同盟和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中。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①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也未减当年的风韵。从俾尔“推销员”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情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加以夸大，而且由于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是麻布衣服。）——编者注

到了下列扼要材料，现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伦敦

万兹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们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您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绝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现在我就来谈谈**硫磺帮**。

1849年，我们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顾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结识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许多人都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结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勃鲁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贝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而苦恼和沮丧，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绪。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我们认为 die Jugend jottvoll（这个地方是天

堂)①。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们全都一无所有,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也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贷款’给我们,而且还‘贷款’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只不过是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问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债务问题。可惜我能够告诉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传,我现在还是回头来谈1849年。

当时我们常常畅怀痛饮和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 *dulci júbilo* (亲密无间的欢乐气氛)中度过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有时也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间,他们往往同我们一起唱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靠萨瓦或瑞士湖畔的别墅窗前‘讨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现已去世的阿伯特·加累尔——日内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语气告诫我们。他说:‘你们真是一些发了疯的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你们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说明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们的精神并没

① 柏林方言。——编者注

有颓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韧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的最严厉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 R···n 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语的炮兵，而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科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议议员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鲁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F···g 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冯·F···g 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军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进行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顺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我们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别愉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手腕，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 [ausbubokratie]^① 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报纸是因缺乏经费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好像

^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绰号是送给德国的某一个小议院中或者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们想永远保存这个绰号。”（波克罕）

我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评论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康海姆**和**罗森勃鲁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们于1851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鲁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说，**康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克尔也在当时，即在1850年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经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中，把我转移了25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带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说的：very well, sir, thank you! (好极了，先生，谢谢您!)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有教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您自己了。

顺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兹蒙特·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许**硫磺帮**预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就用木刻把自己的户籍登记表放进这本历史书里去，也就是说，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创办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曾经参加1848年9月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起义，后来被关进布鲁赫萨尔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战斗，结果被赶到瑞士境内。³³⁸1850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康海姆和罗森勃鲁姆到了伦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围。我不曾有同他们结识的荣幸。从政治上说，他们同我是有接触的，因为当时他们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老委员会³³⁹相抗衡。顺便提一下，该委员会发表的敌视我们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勃鲁姆、康海姆、博布秦、格隆尼希和奥斯渥特签署的，并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全盛时期，**烧炭帮**（烧炭党人）³⁴⁰曾经是警察活动和贵族幻想的渊藪。我们帝国的高亮都亚，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更大利益，是否想按照烧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特也许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非常讨厌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特效药的吧？大家知道，庸医拉德马赫尔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病的。³⁴¹如此说来，海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委任人的称呼——“**圆满的人物**”，拉德马赫尔所说的“绷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著名的大夫菲沙尔特叫做“**法国式大肚子**”^①的东西，都该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的天性就不只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许福格特的动物良知提醒他：对疥虫来说，硫磺就意味着死亡，因而多

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6章。——编者注

次改变自己皮肤的疥虫是特别厌恶硫磺的吧?最新的研究证明,只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不幸都是由日内瓦的硫磺帮造成的,而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³⁴²造成的。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首脑和成员们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1852年纽约版第31、32和61、62页)。

“这个帮³⁴³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 la bohème (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像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

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 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的同谋者进行清洗，把他们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凯恩去的那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³⁴⁴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①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³⁴⁵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更确切些说，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

① 《vol》这个字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① 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籍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伊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② 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 est le roi des dro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③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妍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③ ……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 1848 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

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②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③ 德·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亵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³⁴⁷来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³⁴⁸

二 制刷匠帮

《But, sirrah, there's no room for faith,
truth nor honesty, in this bosom of thine;
it is all filled up with guts and midriff》.
(shakespeare)^①

我们在俾尔的原始福音书中读到：“制刷匠帮或硫磺帮”（“主要著作”，文件，第 31 页）。我们在“主要著作”中看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第 136 页）。

从这两种说法来看，硫磺帮和制刷匠帮是一个帮。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硫磺帮在 1850 年年中已死亡了，消逝了。那末，制刷匠帮也该消逝了吧？“圆满的人物”是十二月帮的文明传播者，而文明同野蛮的区别，用傅立叶的话来说，就在于用复杂的谎言代替简单的谎言。

这位“复杂的”帝国的福斯泰夫同我们谈到了（“主要著作”第 198 页）一位阿布特，他把他叫做“卑鄙中的最卑鄙的”。福格特对自己用的是原级形容词，对他的阿布特用的却是最高级形容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把阿布特升为自己的奈元帅了，这真是了不起的

^①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的地位，它只是充满了脏腻和横隔膜。”（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谦逊！当福格特的原始福音书在俾尔“**推销展**”上出现的时候，我曾请“人民报”³⁴⁹编辑部不加任何评论地转载这一原始诽谤书。但编辑部仍然给它加了下列附注：

“上载诽谤书，出自一个名叫**阿布特**的堕落家伙之手。八年前日内瓦德国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认为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

“人民报”编辑部认为**阿布特**是福格特的原始诽谤书的作者；它忘记了瑞士有两个里士满在战场上³⁵⁰，——除了**阿布特**以外，还有一位**福格特**。

可见，这位“卑鄙中的最卑鄙的”在1851年春发明了他的**制刷匠帮**，福格特在1859年秋从他的元帅那儿把它偷了过来。他本能地把他那可爱的剽窃习气，从编纂博物学转移到警探式的著书立说。有一个时期，领导日内瓦工人协会的是一个制刷匠 [Bürstenmacher] **藻伦海美尔** (Sauernheimer)。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 (Bürstenheimer)。起初他除了用这个绰号称呼**藻伦海美尔**以外，还用它来称呼藻伦海美尔的密友：**波恩的康姆**，职业是制刷匠；**宾根的拉尼克尔**，职业是装订帮工。他把**藻伦海美尔**封为制刷匠帮的将军，把**拉尼克尔**封为副官，把**康姆 sans phrase**（直截了当地）封为一名制刷匠帮成员。后来，当身为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的两个流亡者**伊曼特**（现在丹第一个中学里任教）和**席利**（先在特利尔当律师，现在巴黎当律师）促使公意法庭把**阿布特**开除出协会的时候，**阿布特**发表了一篇满纸谩骂的攻击文，把整个日内瓦工人协会都提升为**制刷匠帮**的高官显贵。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般的制刷匠帮

和特殊的制刷匠帮。属于一般的制刷匠帮的有日内瓦工人协会，走投无路的福格特曾经从它那里骗取了一份 *testimonium pauper-tatis* (贫困证明书) 在“总汇报”上发表，并且曾经在席勒纪念会上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对之磕头作揖。属于特殊的制刷匠帮的有我提到过的那位我素不相识、从未去过伦敦的藻伦海美尔；被逐出日内瓦、后来经伦敦赴美国的康姆(然而他在伦敦探望过的并不是我，而是金克尔)；最后是那位非驴非马的拉尼克尔，他作为制刷匠帮的副官留在日内瓦，“聚集”在“圆满的人物”的周围。的确，他亲自充当福格特的无产阶级。因为以后我还得回头来谈这位拉尼克尔，所以暂时只初步提供一些有关这个怪物的情况。拉尼克尔是伯桑松流亡者兵营中的一员，黑克尔的进军失败之后，这个兵营由维利希指挥。³⁵¹他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后来同维利希一起逃往瑞士。维利希是他的共产主义的穆罕默德，后者原要用火和剑来建立一个千年王国。拉尼克尔是一个爱慕虚荣、夸夸其谈、忸怩作态的花花公子，比暴君还要残暴。在日内瓦，他在盛怒时曾疯狂地反对过“议员们”，他还作为新的退尔，特别威胁要“杀死州官”。但是，当瓦洛，这个三十年代的流亡者和福格特的总角之交，把他领进福格特家里的时候，拉尼克尔的凶残的情感却一变而为《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人情的乳臭”)^①。像席勒所说的：“这小子是州官手下的”^②。

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将军的副官；福格特将军之所以

①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一幕第五场。引自麦克佩斯夫人在谈到麦克佩斯时说过的话：“你充满了人情的乳臭”。——编者注

②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在军事上未享盛名，只是因为普隆-普隆认为那不勒斯的乌洛阿大尉 (by courtesy (由于礼貌) 甚至被称为将军) 在执行普隆-普隆的《corps de touristes》(“旅行团”) 在意大利远征中所担任的任务方面，也是够糟糕的，而把他的巴洛留在预备队内，以便进行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即将要在莱茵河畔进行的大冒险³⁵²。1859年，福格特把他的拉尼克尔从无产者等级提升为资产者等级，帮他搞了一家商店(专营艺术品、装订、文具)，此外还保证他得到日内瓦政府的订货。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的《maid of all work》(“打杂的女仆”)、义务听差、密友、列保莱罗、心腹、采访员、造谣家、告密者，而尤其在脑满肠肥的杰克^①堕落之后，又是他的暗探和波拿巴在工人中间的招募人。据瑞士一家报纸不久前报道，有人发现了第三种刺蝟，即兰刺蝟或莱茵刺蝟，它具有狗刺蝟和猪刺蝟的双重特性，是在阿尔夫河畔的巢穴中、洪堡-福格特的田庄上发现的。这种兰刺蝟同我们的拉尼克尔有没有关系呢^②？

Nota bene (请注意)：唯一同我有过联系的日内瓦的流亡者，是“新莱茵报”³⁵³前编辑部同仁、目前在利物浦经商的恩斯特·德朗克博士，他对制刷匠帮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我对伊曼特和席利的下列信件，只想谈这么几句：伊曼特在革命爆发时离开大学，当志愿兵参加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1849年，在席利和伊曼特领导下袭击了卜留姆军械库³⁵⁴；他们带着从那里夺得的武器和自己的队伍到了普法尔茨，参加了维护帝

① 在莎士比亚笔下，酒友们把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叫做杰克。——编者注

② 这是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一方面，德文里《Ran-Igel》(“兰刺蝟”) 这一个词同Ranickel (拉尼克尔) 这一名字的语音近似；另一方面，德文里的《Schwein-gel》这一个字有两重意义：“猪刺蝟”和“卑鄙的东西”。——编者注

国宪法的军队。1852年夏初，他们被逐出瑞士，来到了伦敦。

“1860年2月5日于丹第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福格特怎能把你同日内瓦的事件扯在一起。那里的流亡者都知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德朗克同你有联系。硫磺帮在我去以前就有了，我唯一记得与之有关的一个人是波克罕。

人们把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们叫做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阿伯特取的。协会当时是维利希秘密同盟的苗圃，我是这个同盟的主席。在有许多流亡者参加的工人协会根据我的建议认为阿伯特无耻，并宣布他不配同流亡者和工人们交往以后，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诽谤书，攻击我和席利犯了极其荒唐可笑的罪行。在这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完全另一些人的参加下重新审查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求阿伯特证实他对我们进行的攻击，他拒绝了。邓策尔没有要我或席利进行任何辩护，就提议宣布阿伯特是个无耻的诽谤者。这个提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参加这次流亡者会议的，几乎全是议员。很抱歉，我写的材料很不完全，但八年来我回忆这件肮脏事还是第一次。我不愿受罪去写这类事情，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类肮脏东西，那我将不胜惊奇。

再见！

你的 伊曼特”

有一位俄国名作家^①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他用上信结尾的精神给我写了一封信。

“1860年5月10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爱德华·西蒙的文章³⁵⁵中看到了诽谤您的谰言，深感愤怒。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认为既不愚蠢也不凶恶的福格特，道德上竟堕落到了像他在他的的小册子里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深的地步。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就深信您是不会玩弄卑鄙齷齪的阴谋的；而且，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发表这些谰言，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您正赐给学术界一部杰出

^① 尼·伊·萨宗诺夫。——编者注

的著作³⁵⁶（它的使命是改造经济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的第一部分……亲爱的马克思，请别理会这类下贱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一切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们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论战，而完全是别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编。您的成就在有思想的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如果有关您的学说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消息能使您感到愉快，那我现在愿意告诉您：今年年初，某教授^①在莫斯科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开讲演，第一次讲演就是介绍您最近发表的著作。给您寄上一份‘北方日报’，您可以看出您的名字在我的祖国受到多大重视。再见了，亲爱的马克思，珍惜您的健康，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琐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请相信一个忠实于您的人的友谊……”^②

匈牙利前部长瑟美列也写信对我说：

《Vaut-il la peine que vous vous occupiez de toutes ces ba-vardises?》
（“您是否值得去理睬这类流言蜚语呢？”）。

尽管有这类劝告，我为什么还要去插手——用伊曼特的有力的话来说，——福格特的这类肮脏东西呢？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的前言中已经简单地谈到了。

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制刷匠帮。现在我把席利的信照抄在下面，包括同“肮脏事情”无关的东西。但是我删去了有关硫磺帮的部分，因为我们从波克罕的信中已经知道了。此外，我还要给往后的叙述留下几处地方，因为我必须把“我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相当巧妙，所以我不想一下子就把全部秘密都道破。

“1860年2月8日于巴黎拉斐德路46号

亲爱的马克思：

从你上月31日的来信中，我得到了有关你的直接消息，感到很愉快；我

① 伊·康·巴布斯特。——编者注

② 萨宗诺夫的信是用法文写的，在手稿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法文原文。——编者注

本来就打算 *proprio motu* (主动地) 把你所关心的有关日内瓦事件的必要情况写信告诉你的, 现在我就更加乐于这样做了。当我们偶然谈到这一点时, 我和所有在日内瓦的熟人的第一个想法都像你信中所写的那样, 认为福格特把你同你毫不相识的人搅在一起了。因此, 为了维护真理, 我应当把有关制刷匠帮, 硫磺帮等等的情况告诉你。这样一来, 你就会明白你提出的两个问题: ‘(1) 制刷匠帮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干什么的? (2) 硫磺帮是什么, 由什么样的人组成, 他们是干什么的?’ 提得正好。但是首先, 我要责备你颠倒了前后次序, 因为按照次序, **硫磺帮**应在前面。如果福格特想用魔鬼去吓唬德国的庸人, 或者用燃烧的硫磺去烧灼他们的脑袋, 同时借此‘寻开心’, 那他确实可以找到比这些毫无恶意的、心情愉快的酒馆常客更好的魔鬼来充当这类角色。我们老一代的日内瓦流亡者毫无恶意地把这帮酒馆常客戏称为硫磺帮, 而他们也非常善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这是缪斯的一帮快活的学生, 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各次起义和后来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应过 *examina* (考试) 并进行了 *exercitia practica* (实习), 而在失败之后, 便同他们的红色科学的主考人和教师一道在日内瓦聚集力量, 准备新的战斗……不言而喻, 根本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或在硫磺帮垮台以后才到日内瓦的人, 是决不能把他们归入这个帮的。这个帮纯粹是当地的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朵花 (其实可以把这一升华物称做硫华), 但是, 大概由于它的‘喧声’报所散发的革命气息, 对瑞士联邦的神经来说是过于强烈的一种气味吧, 因此德律埃吹了一口气, 这朵花就四处飞散了。很久以后, 阿布特才到了日内瓦, 又经过好几年, 舍尔瓦尔也到了那里, 他们‘各行其是’地散发着芳香, 但决不是如福格特所说的那样, 是在那早已雕零、早已枯萎和早被遗忘的花束中散发着芳香的。

硫磺帮的活动可归纳为这样一句话: **在主的葡萄园里劳动**。此外, 他们还编辑自己的‘喧声’报, 报上的题词是: ‘留在土地上靠**微红的东西**过活’^①。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巧妙而幽默地嘲笑上帝和世人, 揭露虚伪的预言家, 鞭笞议员们 (*inde irae* (由此招怒)^②), 同时, 无论对自己或是对我们这些客人

① 这里套用了圣经上的说法: 把《*redlich*》(诚实的)改成《*rötlich*》(微红的、微红的东西)。——编者注

② 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都不留情，并且以无可争辩的善意和公正，把一切的一切，朋友或敌人都加以漫画化。

他们同你毫无关系，也不曾穿过你的“鞋（会）”³⁵⁷，这是用不着对你说的。但是我也不能对你隐瞒，这种鞋也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这帮革命的雇佣兵，暂时踩着战事沉寂的拖鞋，等待革命把他们重新激发起来，并把革命的厚底靴（坚决前进的千里靴）再发给他们。而谁要是敢于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工人专政等等去打扰他们的 *siesta*（午休），那他准会大倒其霉。天啊！他们所干的那件工作，至多需要一个主持狂饮的人，而他们的经济课就是围着酒瓶和它的微红的东西团团转。有一次，一个常同他们一起的奥登林山的可敬的铁匠巴克菲施曾经说过：‘劳动权利当然是好事情，但让劳动义务见鬼去吧！’……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那块被如此不恭地掀开了的硫磺帮的墓碑放回原处吧。说实在的，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人玷辱硫磺帮的陵墓，应当有一位哈菲兹出来朗诵《*Requiescat in pace*》（“愿它得到安息”）。但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唱这样一支歌，于是‘他们全都闻过火药味’这句话将成为他们的 *proviatico et epitaphio*（挽歌和墓志铭），而他们的那位亵渎神圣的历史编纂者却只不过嗅过硫磺味而已。

当制刷匠帮出现的时候，硫磺帮的成员已仅仅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日内瓦市俗们的注册簿上和日内瓦美人儿的心上了。制刷匠和装订工藻伦海美尔、康姆、拉尼克尔等人同阿布特吵了架；因为伊曼特、我和其他人热烈支持他们，于是我们就引起了阿布特的仇视。为此，阿布特被邀参加一次全体会议，流亡者和工人协会作为 *cour des pairs*（贵族法院）甚至作为 *haute cour de justice*（最高法院）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出席了这一会议，在会上他不仅不坚持他对许多人的攻击，而且直截了当地声称攻击是他捏造的，对他的敌手们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他还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阿布特勇敢地对这一套报复手法进行了辩护，并一再企图使高等法官们相信这套手法的实际作用之后，有人提出了控告他的证据；在这以后，会议断定他进行了恶意诽谤。并且揭露他犯了其他过错，因此判决把他开除。En revanche（为了报复），他就把高等贵族——最初只是上述的手工业者，——取名为制刷匠帮。你知道，这是上述那个藻伦海美尔的职业和姓氏的一种成功的结合，因而你应当把藻伦海美尔尊崇为制刷匠帮的老祖宗，但是，你却无

权把你自己算做这一族的成员或者归附这一族，不管它是行会或是贵族等级。因为你知道，他们当中从事‘组织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是你的敌人。他们把维利希尊崇为天父，或者至少尊崇为罗马教皇，而把你看做是反基督者或罗马教皇的敌人，因此，曾经是你日内瓦教区的唯一拥护者和 *legatus a latere* (特使) 的那个德朗克，除酒会 (他在这种会上 *primus inter pares* (在同辈中数第一)) 而外，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但是，制刷匠帮和硫磺帮一样，纯粹是一种昙花似的东西，也被德律埃一口大气吹散了。

阿加西斯的这位学生竟陷入这类日内瓦流亡者的化石中，并且从中取得了出现于他的小册子已提供的那类博物学方面的臆造，这事对 *species Bürstenheimerana* (制刷匠帮种) 来说是格外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动物研究室里就有一个原始制刷匠帮成员拉尼克尔，正好是从那里搞来的反当类中的乳齿象的极妙标本。显然，反当得是不正常的，或者是上述那位学生对反当的研究是错误的……

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et au delà* (甚至还超过了)。现在我也想向你提出一点要求，就是我知道你对扣除部分遗产 *pro patria* (以利于祖国)，*vulgo* (换言之)，以利于国家，把它当做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看的；不言而喻，这只是对大宗遗产而言的，并要废除由穷苦阶级负担的一切赋税……除了遗产税这个问题以外，我还在思考德国的两个法规：‘土地合并’和‘抵押保险’。我想把这两个法规介绍给法国人，他们对于这些法规简直一无所知，除少数人以外，他们只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浓雾和酸白菜。不久前，‘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化界’报倒是一个例外；它在抱怨地产过分分散时正确地指出：《Il serait désirable qu’ on appliquât immédiatement les remèdes énerglques, dont une partie de l’ A llemagne s’ est servie avec avantage : le remaniement oblig-atoire des proprlétés partout où les 7/10 des propriétaires d’ une commune réclament cette mesure. La nouvelle répartition facilitera le drainage, l’ irrigation, la culture rationnelle et la voirie des propriétés (‘最好是立刻采取在一部分德国土地上已行之有效的坚决措施，即在十分之七的土地占有者都要求重分土地的所有村社中，强制重分土地。重分土地将有助于排涝、灌溉、合理耕作以及田间道路的铺设’)。‘世纪

报’也谈到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本来就有些目光短浅，在观察德国问题时更是如此，但是，由于它像第欧根尼炫耀自己的破烂外套那样炫耀它的沙文主义，因而格外饶舌；它竟把这道菜冒充爱国主义，每天加一加热以饕读者。这一家沙文主义的报纸在向它的 *bête noire*（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①——‘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报客气地说了一声早安之后，就叫了起来：《Propriétaires ruraux, suivez ce conseil! Empressez-vous de réclamer le remaniement obligatoire des propriétés; dépouillez les petits au profit des grands. O fortunatos nimium agricolos—trop heureux habitants des campagnes—sua si bona—s’ils connaissaient l’avantage à remanier obligatoire ment la propriété!》（“土地占有者，听从这个劝告吧！赶快要求强制重分土地；为了大所有者的利益抢光小所有者。啊，最幸运的乡下人，——要是他们知道强制重分土地的好处该多好！”）^②好像在按所有者的人头投票时，大所有者会战胜小所有者似的。

其他方面，我让事情照常进行，帝王的我给帝王，上帝的我给上帝，‘魔鬼的一份’也是如此。谨向你致老友的问候。

你的 席利”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既然日内瓦在1849—1850年有过硫磺帮，而在1851—1852年有过制刷匠帮，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末，我们的议会小丑所发现存在过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不过是他的非非之想，**瀟天大谎**，“大得同臆造它的人一个样”。试想有一个历史家竟会这样恬不知耻地断言：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有过一帮人，他们以《Cercle social》³⁵⁸知名，**或者也以“雅各宾党人”**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

至于他所制造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生活和活动，那我

①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② 这句话里的拉丁文，是套用咪吉尔的长诗“稼穡诗”第2册中的诗句的。——编者注

们的这位小丑老兄并未为此花任何生产费用。我只举出唯一的一个例子：

这个圆满的人对他的惊讶的庸俗读者说：“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这句话说得不坏：“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这些人（即福格特式的 homunculis（矮小而可怜的人））向德国寄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公开威胁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主要著作”第139页）

为什么福格特连“一封”信都不公布呢？因为硫磺帮写了“几百封”。即令恐吓信贱得像乌莓子^①，福格特仍然会赌咒发誓地说：我们连一封信也不应当看见。如果明天叫他出席格留特利联盟³⁵⁹的公意法庭，要他对“几百封”“恐吓信”给以说明，那他会从腰里掏出酒瓶，但不是信件，会用手指打一个榧子，把舌头弹得一响，并且会因锡仑式的哈哈大笑而抖动肚子，同他的阿布特一起喊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① 这里套用了福斯泰夫的话（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三

警察作风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①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加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手中；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他们在适当时机将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166、167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②吗？那末，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③。

1. 自 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1853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77

①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② 在德文原文中，《verlogen》（“满嘴撒谎”）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页上说过：‘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把自己委婉地称为〈福格特说的〉‘形势’。”（“主要著作”第167页）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1849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当巴登格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³⁶⁰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同比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

“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的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

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 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 status quo (现存秩序) 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³⁶¹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揭露等等”波士顿版第 62、63 页）³⁶²

但是，连这一点“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莱蒂首肯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线要集中在罗亚尔宫³⁶³，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普隆的手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多么卑鄙齷齪啊！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侦查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嚷嚷的饶舌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

中是以entrepreneur（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第63、64页）³⁶⁴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话呢？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们就得像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从事组织秘密团体和败坏大陆上的团体和一些人的名誉。”（第171页）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没有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Egli è bugiardo, e padre di menzogna》（“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①。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顿的失败。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巧妙地说服了，因此终于决定在穆尔顿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打算在那儿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对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从四面八方方向穆尔顿集中，但他们很快就被宪兵逮捕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别照顾。”（“主要著作”第168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起义，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三首歌。——编者注

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 1849 年 5 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鲁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锅匠街本兹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³⁶⁵说过的话，按号码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传说，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Swaz ich trinken' s hân gesê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êhen :
ich hân einen swêlch gesê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êfte jêhen .
Den dûhten becher gal entwîht,
ër wolde nâpf noch kophe niht,
ë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
ër ist vor allen mannen
ein vorlauf allen swêlhen
von ûren und V on êlhen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iht getan.^①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

①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说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简直令人吃惊。

他不满意大高脚杯，

既不愿用孟形缸，

也不愿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①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³⁶⁶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

^① 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羊）。——编者注

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 moucharderie（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 mouchard（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 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骗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A 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Non,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 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于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 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³⁶⁷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

罪孽（见附录 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³⁶⁸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获。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 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 年 1 月 25 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狼^①”）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惯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 11000 人减少到 500 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

① 文字游戏：德文里的 W olf 是姓，《W olf》是“狼”。——编者注

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告诉他：

“请设法在其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的大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得尔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马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羁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做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没有pia frau（虔诚的欺骗）也是不行的，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滨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说，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说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

3. 舍尔瓦尔

《The virtue If this jest will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lies that this
same fat rogue will tell us》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
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①

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³⁶⁹。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②，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³⁷¹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³⁷²）就否认了这项证词。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② 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³⁷⁰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

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³⁷³）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冯·雷·^①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wald nommé Frank, 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 (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 (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宗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

^① 雷缪扎。——编者注

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 1845 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 10 月 23 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³⁷⁴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 1853 年 3 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 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 172 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 1852 年 5 月到 1853 年 3 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 1850 年 6 月到 1851 年 9 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 1850 年 6 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

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浹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 Bellevogt。^①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 173 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 173—174 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³⁷⁵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担任同伦敦通信的工作。（同上，第 175 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们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娄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娄罗们”（第 176 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娄罗们“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到”在巴黎

① 文字游戏：Greif, Wermuth 和 Goldheim（小称是 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鹰”的意思，《Wermuth》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

的“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借以动摇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们的财政制度”（同是，第 175 页）。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钞票的工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是，——“这些假钞票（自然，钞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见第 175 页），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脱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输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间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³⁷⁶）！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剑^①！

“这个密谋计划（同上，第 176 页）订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并没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

① 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颇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遗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者的预告，因而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empire（帝国）的巴黎公民们（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poor（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³⁷⁷到他以第五基干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功勋），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①的；我本人同约翰·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

① 莱茵兰德尔。——编者注

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 contra (反对) 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非常错误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我本人不认识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轻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责难福格特为拿破仑效劳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毁灭锦绣前程、破坏和辱没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议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

那末,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作为一个长辈,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绝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三十年的经验,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

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独立不羁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人的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慈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过 1849—1850 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十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点燃起来，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敌人；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下流报棍子竟像电磁变感导体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道，甚至 *par excellence*（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问题时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说明谦逊的普鲁士议院。而布勒斯劳的资产阶级，——它似乎总是享有好名声的，——为了庆祝硫磺帮，竟 *sancta simplicitas*（天真地）组织了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nolens volens*（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一样，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磺一番，使发热的头脑燃烧得最旺；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烧伤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列尔，*vulgo*（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和通常的骗子于 1853 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得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做真正的英国人。纽金特自己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安排自己并有利地表现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定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简出，后来几乎光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 *office de renseignements*（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勒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歇尔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学学校校长，在我那儿担任编辑。这人在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歇尔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

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员，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地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说：‘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劝告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绩。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业绩，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顺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回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不费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经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真正的 *maitre de plaisir*（主持人）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维尔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他的同仁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贩那儿收到一本马克思写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美尔，并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读读这本小册子。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播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样子做。

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纽金特也在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说了。纽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德国人克列美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加斥责。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径同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成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结论，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列美尔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轻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

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

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测的诡计。他并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些事将给他带来许多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传播。

忠实于您的 约·菲利浦·贝”（见附录 3）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们且撇开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不谈，来谈谈科伦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伦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伦审讯了他的同盟的同志们。”一点不错。

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大使馆，辛凯尔迪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 *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侦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家的辅助手段，甚至从我的 1853 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现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①，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含糊地说：

“科伦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页）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的自我辩护书^②，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³⁷⁹上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讯，——在起诉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① “带恶臭的或窒息性的炮弹主要用于地雷战。为此要用一般可燃物，但其中包括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废物，把它们放入弹壳内并附上导火线。”（伊·克·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第一部分（J. C. Plümcke.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 Erster Theil. Berlin, 1820））

② 我在1853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³⁷⁸里作了答复。

“我仔细研究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施梯伯的控告，控告他违背誓约，而且必须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违背誓约的。”（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³⁸⁰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起诉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伦），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败类中间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藏垢纳污的丑恶渊藪。”（“主要著作”第169、170页）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改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传的极端卑鄙齷齪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伦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³⁸¹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检察官）用

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在审理末）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71、72页）³⁸²“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暗中偷运的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页）³⁸³

辛凯尔迪在科伦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业已出现的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因此，他要求用1000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凯尔迪的另一封

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见附录 4）

的确，正是这种**科伦陪审员的良好组成**，普鲁士的辛凯尔迪一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调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警察败类在 1852 年 10 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 1853 年 3 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 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嚣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³⁸⁴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1859 年 6 月 26 日和 27 日)

我们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满意心情逃回到……阿尔卡迪亚。我们又在“瑞士遥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 6 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纳坐在伦敦，而西塞罗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Jam jam intelligis me acrius vigilare ad salutem, quam te ad perniciem

reipublicae》. (“现在你会懂得，我关心共和国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要热心。”)^①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圆满的人物”在节日期间所干的英雄业绩的原本报告，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编写的报告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瓦奈书店出版”³⁸⁵。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五个月之后出现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说，他在这个演说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的原因是：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如果这些责难是可靠的，那就必然会根本动摇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他接着说，——“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上述的）阴谋诡计。”（报告第6—7页）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徒劳无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

“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其一部分喷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烧坏；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简直奇臭刺鼻，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

^① 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集”，引自第一篇演说的第4章。——编者注

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铅弹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 a posteriori (屁股)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³⁸⁶国籍的演说家自言自语地说，并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专喷去：

“但是，我坚决要向你们提出下列警告，——提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诡计，他们的全套计谋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使工人卷入形形色色的密谋和共产主义的诡计中去；他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最后就冷酷地（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致工人于死地。现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把工人同盟引入他们布下的阴险的罗网里去。无论他们说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诡计），但是要知道，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剥削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报告第 18 页。见附录）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议论我和我的那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说我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没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的 mouchards (间谍们) 曾经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诽谤，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附录 5）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们的“圆满的人物”就无法再保持自己的 sérieux (严肃的声调) 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态的“迫害者”比作“在措尔恩多夫村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他本人比作——请猜猜比作谁？——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福格特记得，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逃回

的。他却没有任何战役就逃跑了，因此就更加伟大！^①

这就是根据原本报告所载，在洛桑中央节上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后，请欣赏一下（用菲沙尔特的话来说）这个讨厌的食客、笨拙而肮脏的厨子吧”，^②——看一看他在五个月之后竟给德国庸人熬出了多么可笑的警察烂粥来。

“有人想不惜任何代价在瑞士制造纠葛，准备给中立政策以决定性打击……我得到通知说：他们打算利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来把工人们驱回工人早就坚决拒绝了的道路上去。他们想用美妙的中央节来组织秘密委员会，委员会应当同德国的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接触，应当采取上帝知道（福格特尽管得到了通知，但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一些措施。他们散布关于工人积极干预德国政治的各种混乱流言和秘密消息。我立即决定出面反对这类诡计，再一次警告工人们，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听信这一类建议。我在上述演说结尾公开提出了警告，等等。”（“主要著作”第180页）

西塞罗-福格特忘记他在演说开头曾当众泄露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参加中央节的秘密，——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张皮。他的演说对准备就绪的谋害瑞士的行为、对利用中央节的密谋计划、对秘密委员会、对工人们积极干预德国政治以及“这一类”或任何别“类”建议，都只字未提。对这些施梯

① 在雅科布·费奈迭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中，科贝斯第一³⁸⁷叙述说：他“亲眼看到，当我们大家，连同其他四个帝国摄政强迫维尔腾堡政府动用武力、从而使议会能光荣死去的时候，身为帝国摄政的卡尔·福格特竟没有出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其他四个摄政坐上车子，按约定向会议地点出发，要在那儿同“残阙”议会一道对着刺刀挺起胸膛（大家知道，“残阙”议会是没有脑袋的）时，——卡尔·福格特竟推上车门，向车夫喊道：‘喂，开车吧，车里已经坐满了，我随后就去！’但当各种危险都已过去的时候，卡尔·福格特来了。”

（同上，第23、24页）

②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编者注

伯之歌只字未提。他的最后的警告不过是诚实的赛克斯的警告，这个赛克斯在老贝利^①法庭上警告陪审员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盗窃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们的话。

福斯泰夫-福格特说（“主要著作”第181页）：“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证实了我的预感。”

怎么，预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记了，他在前面讲的根本不是什么“预感”，而是得到了“通知”，——得到了关于密谋者的计划的通知，而且通知得颇为详细！而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又究竟是——“你真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②——什么样的事件呢？

“‘总汇报’的一篇文章强加给中央节和工人生活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它们（即中央节和生活）根本不曾想到过的。（这完全同福格特把这种倾向强加给穆尔顿代表大会和所有工人组织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和它在‘法兰克福报’³⁸⁸上被转载以后，一位南德意志邦的公使就据以提出了秘密质问，使中央节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总汇报”的文章和它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转载强加给中央节的吗？根本不是，——“这种意义，按照**碌碌帮**的未能实现的计划来看，是中央节**本来应该具有的**”。

原来如此！**本来应该具有的！**

虽然，为了戳穿西塞罗-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把“主要著作”同记载中央节的原本报告粗略地比较一下就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有没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能成为福格特式的着力的物质³⁸⁹。因此，我就写信给原本报告的编写人，日内瓦的**格·洛美尔**。洛美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有过友好的交往，因为他不仅在编写关于洛桑中央节的报告时得到过福格

① 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守护楼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译者注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编者注

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³⁹⁰的小册子中，竭力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败。洛美尔先生同我并无一面之交，他在1860年4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

“福格特说什么他曾在洛桑挫败了一次危险的密谋，这种说法纯粹是臆造或谎言。他在洛桑只不过要寻找一个场所，借以发表以后可能出版的演说。他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驳斥了说他是被收买的波拿巴主义者这样一种非难。这一讲稿现在还由我完整地保存着。”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问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谋时，简短地回答说：

《Il faut connaître cet individu》（“必须认清这个家伙”）（即福格特），《surtout le faiseur, l' homme important, toujours hors de la nature et de la verité》（“这首先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撒谎者，自然和诚实同他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谓“研究”³⁹¹第99页上说，他“从来没有自诩为预言家”。但是人们从旧约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预言家所没有看到的。而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在1859年11月才对之有预感的密谋，而在1859年6月就已把它“挫败了”。

6. 其 他

“要是我没有记错”，——议会小丑说，——“那末，通告（即虚构的1850年告无产者的伦敦通告）无论如何是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所谓议会的狼草拟的，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现在，在‘祖国友人告哥达党人’的通告这一事件中，这条渠道又露出来了。”（“主要著作”第144页）

渠道露出来了！自然科学的打诨者的 Prolapsus ani（直肠脱

出来) 了吗?

至于谈到“议会的狼”，——为什么议会的狼就像恶梦一样缠着议会小丑，这事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那末，他曾在柏林“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

我从一位友人的信中得知，‘国民报’（今年第41号）在根据福格特的小册子写成的一篇社论中，发表了下列意见：

‘1850年曾从伦敦发出告德国无产者的另一个通告，福格特认为，它是由议会的狼，alias（或者叫）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我既不曾看到这一号‘国民报’，也不曾看到福格特的小册子，因此，我只能对上面引证作如下答复：

(1) 1850年我住在苏黎世，而不住在伦敦，1851年夏天我才移居伦敦。

(2) 我平生既没有草拟过告‘无产者’的通告，也没有草拟过告其他人的通告。

(3) 至于用汉诺威警察当局诋毁我一事，那末，我要以鄙视的态度把这种无耻的攻击回敬给它的制造者。如果福格特小册子的其他部分也涉及我的那部分一样丑恶和虚伪，那它真堪与谢努和德拉奥德这样一些先生们的创作媲美。

威·沃尔弗”

由此可见，正像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结构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想像出福格特的全部文字杂拌。的确，把卡尔·福格特同谢努和德拉奥德并列，他就显得是 *primus inter pares*（在同辈中数第一）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妹妹。这成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证明我特别同‘十字报’³⁹²派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第194页）。怎样打退肥胖的

福斯泰夫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苏格兰祖先^①，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做叛乱者在爱丁堡市场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许会原谅她有普鲁士大臣这样一个亲属的吧？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日内瓦举办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11月13日）上，他报告说：

“法兰克福议会左派曾好久不能决定派谁去维也纳，派勃鲁姆去还是派他去。于是最后就抽签，而命运作出了有利于勃鲁姆的决定，或者更正确些说，命运作出了反对他的决定。”（“日内瓦席勒纪念会等等”1859年日内瓦版第28、29页）

10月13日，罗伯特·勃鲁姆从法兰克福去维也纳。10月23日或24日，法兰克福议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伦。我会见了代表团的团员们，其中有几个人同“新莱茵报”关系甚密。这些代表们——其中有一个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了，有一个还活着，——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的致命玩弄的诡计，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安和奇怪的情况。但是：

叫我别说话，叫我不作声，
因为保密是我的责任。^②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11月），“圆满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巴结逢迎地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斯·法济，像锡仑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进纪念会会场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

^① 阿盖尔伯爵。——编者注

^② 歌德“迷娘”。——编者注

的彬彬有礼的笑谈中把自己说成是罗伯特·勃鲁姆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的时候,人们好容易才把几个急躁的工人劝住,没有让他们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记他在6月还在预防革命,——现在亲自“再一次号召工人们走向街垒”(“席勒纪念会”第29页)的时候,场内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回声:“街垒!——一堆!”^①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谈究竟值多少钱,因此,这次甚至没有随之出现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的秘密质问”,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所说的那类诗歌能手:

Ed egli avea fatto del cul trombetta.^②

^① 在德文中《Barrikaden—Fladen》(“街垒—扁饼”)这两个字的尾音相同。——编者注

^② 他把他的臀部也变成了喇叭。[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一首歌。马克思把康内吉塞尔翻译的但丁的这句诗的德译文放在脚注里,并把译者的姓放在括弧内。]——编者注

四 泰霍夫的信

“圆满的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 che si tr angugia).

(D ante)^①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1850年8月26日寄自伦敦。

“我能用来评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识他的（！），都说他是一个正派人；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派人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谁呢？）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谁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著作”第141页）

泰霍夫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伦敦。他的信是寄给前普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他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们”的，即通知“集中”的成员们的；“集中”是一个十年前就宣告结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员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议会议员。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那末，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谁

^① “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但丁）

[“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八首歌。——编者注]

授权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们”中间，只有两位还在日内瓦。现在就让他们两位自己来说吧：

“埃^①致席利。1860年4月29日于格劳宾登州的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时，因其中载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给他的瑞士朋友们的一封信，我们这些还在瑞士的泰霍夫的朋友，便决定以书面形式向福格特表示我们不满意他这种未经允许擅自发表此信的做法。泰霍夫的信是寄给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并应转抄给朋友们……我感到高兴的是，事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泰霍夫的朋友中间，即有权持有8月26日这封信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这封信的人那样利用过它。1月22日，我们给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这种未经允许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的做法表示不满，抗议他以后继续滥用这封信的任何行为，并要求将该信寄回。大约是1月27日，福格特回信说：‘泰霍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们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他只能把信交给他信的那个人。’

“博^②致席利。1860年5月1日于苏黎世。

给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③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们’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内容知道信也是给我的，但他不愿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话备用。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尔，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

① 埃梅尔曼。——编者注

② 博伊斯特。——编者注

③ 拉尼克尔。——编者注

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问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信是泰霍夫写给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们——席梅尔普芬尼希、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本人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驱逐出瑞士（事先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内瓦街上被捕了，并且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连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许。因此，我从伯尔尼监狱写信给在日内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屠姆，请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谁在当时也同我一起被粗暴地撵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贵重的给我寄到伯尔尼来，其余的则暂时代管一下，并请他仔细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给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没有给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议员们当时反对日内瓦流亡者救济金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个在日内瓦的公民组成，即屠姆和两个流亡者：贝克尔和我）一事有关；拉尼克尔由于拥护这个委员会而反对议员们，对这些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力请委员会的会计和档案保管员屠姆通过拉尼克尔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尔既然被邀协助检查我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说不定是从一位检查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这儿转到他手里的这种占有的转移（应把它同所有权的转移加以区别）丝毫不加反对；但是我非常坚持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有权。于是我马上从伦敦写了一封信给拉尼克尔，要他把信寄给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 *culpa manifesta*（明显的罪过）也就开始了，最初还是 *levis*（轻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谋未经许可擅自发表此信而 *magna*（变本加厉）了，以至发展成 *maxima*

culpa（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 *dolus*（欺骗）的地步。我从来不怀疑发表此信是未经允许的，任何收信人没有授权什么人去干这件事情；不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给埃问一下。至于拉尼克尔插手公布此信这一点，由于人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丝毫不想去批评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同。要知道，拉尼克尔不仅是最大的议会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别对帝国摄政流露出嗜血的情绪。‘我一定要掐死这个坏蛋’，——他喊道，——‘即使我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对一个显要人物采取恐怖手段，差一点要给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现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

者，将怎样脱身。在他究竟是选择欧洲还是美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说，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已经幸运地结束了，我仍然活着——而且我将复仇！！让拜占庭发抖吧！”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①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没有把信寄回。于是“朋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道德上的委婉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也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朋友们”，因而也就是写信给福格特和拉尼克尔这样的“朋友们”——arcades ambo（两个阿尔卡迪亚人）、（两个来自阿尔卡迪亚的人）^②。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埋没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是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或多或少的区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暂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

① 在德文中用的动词是《aufstiebern》，意思是“探出”、“仔细搜寻”，它同警探施梯伯（Stieber）的名字发音相似。——编者注

② 这是拜伦在其小说“唐璜”（第四首歌第九十三节）中曾经用过的味吉尔的话，意思是“两个坏蛋”；这一用语已成了普通用语。——编者注

于一个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团体的任务是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辗转奔波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³⁹³中可以看出，从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找到了极其热烈的追随者。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³⁹⁴。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 1846 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加入了同盟。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员，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的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于 1848 年初问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译本。二月革命爆发时，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了，因为已有了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它的目的。1849 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维利希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绍，我还要指出：1850 年 9 月 15 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

会的多数派，连同恩格斯和我，都决定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伦，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的所在地，除了伦敦以外，科伦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³⁹⁵，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伦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大肆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中断了；加之这种宣传团体也根本不合时宜了。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了。

引起上述分裂的原则性原因，我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截然相反的估计，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譬如，维利希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问题上的争执³⁹⁶会引起严重的冲突，并会给革命派造成进行实际干涉的机会。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成的宣言：“告各国民主义者书”，这是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的。相反，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页）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嚣是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³⁹⁷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³⁹⁸

维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记忆犹新的伯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每天都在重复的冲突，是否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这可以根据下列文件得出结论。

“南锡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主席——

俾尔的约·菲利浦·贝克尔公民

公民：

我们谨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们已在南锡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锡德国纵队’。

组成这里的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维祖耳纵队的成员，一部分是曾参加伯桑松纵队的成员。他们离开伯桑松，纯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问题是维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伯桑松纵队的基本规章根本不是经全队讨论而建立的，而是由维利希武断地提出的：未经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后来维利希发出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们确凿地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维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舍恩的队员的脚上脱下用纵队的储蓄给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储蓄也有舍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贴里积累起来的…… 他想把鞋穿走。维利希却下令把它脱下来。

维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情——譬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间）迟到啦、口角啦，——竟不同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员从伯桑松赶走了，赶走时

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许他们呆在法国；要是他们不去非洲，他就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去，即驱逐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给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伯桑松省政府问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并非属实。维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说：谁要是不乐意，愿意走就可以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笼统地威胁说：谁不服从他的命令，那末，要是不到非洲去，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向省政府提出了质问。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许多人对伯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们滚蛋。他们说：要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我们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们说，够了，要是在伯桑松再呆下去，就得同维利希大闹一塌，因此他们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没有一个能够收容他们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靠 10 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别无他途，他们也就这样办了。维利希就这样使 30 个正直的公民陷于绝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错，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维利希竟非常不明智，因而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下，而贬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纠葛。维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说，普鲁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说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却是善良，其实他想要说的是愚蠢，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维利希就把当时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惹得恼怒不堪。最后，他还有下面这样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连让一个被维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队员再住一夜，这个连不顾维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连的驻地里，并且不让维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缝们走近这个驻地。于是维利希就下令拿绳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绑起来。绳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维利希却是心有余而力下足的……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控告维利希。维利希的品格和意图是好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维利希的意图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 *ultima ratio*（最高理智）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做蠢才或者叛徒。总之，维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见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意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

他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够了！我们现在已认清维利希了。我们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我们就离开了伯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伯桑松的时候都说，他们离开维利希，但他们并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维祖耳人也是如此……

最后，顺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南锡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并受纵队委托

秘书 B.

1848年11月14日于南锡”

现在回头来谈**泰霍夫**的信。就像别的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笔中。那里谈到我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先生的决斗。1850年9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场决斗中，**泰霍夫**和法国人**巴特尔米**充当**维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中说：

“他们（即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抬出他们的骑士**施拉姆**来反对维利希，后者用一大堆极其粗野的话痛骂了他（泰霍夫想要说的是：他痛骂后者）一顿，最后引起了一场决斗。”（“主要著作”第156、157页）

对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捏造，我已经在七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证过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纽约版）中驳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维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维利希**的助手**巴特尔米**还没有被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没有被烧死，而**泰霍夫**先生也还不会忘记他那封“通知朋友们”的通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载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53年11月23日从**曼彻斯特**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³⁹⁹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维利希的说法）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间’，因而这就是通盘策划了这件事。以前，似乎是马克思（按照维利希的说法）‘唆使’施拉姆，而现在为了多样化，我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经验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顶好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我们想枪杀他……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的行动……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会议室）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

弗·恩格斯”（“骑士等等”第7页）⁴⁰⁰

从我这方面来说，泰霍夫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谣言的传播者是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到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维利希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发高尚人物回阴曹地府，并且他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三思之后，他确定了，惯于运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他。”（同上，第9页）⁴⁰¹

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们”的信里所编造的东西，是转述了别人说过的话。后来在同盟分裂时站在维利希一边的卡尔·沙佩尔，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事他这样写信告诉我说：

“1860年9月27日于培德
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F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的丑事，奉告如下：

这件丑事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这是他们俩在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引起的。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们平静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偏袒维利希。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人们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时，他这个年轻人的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弄垮了，同时这种病就像光轮似地笼罩着他那别致而漂亮的头部。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首先把他自己的讣告给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饶舌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稷岛的圣埃尔耶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埃尔耶的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了。致悼词的是乔·朱利安·哈尼；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

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泼息·霍士泼。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伦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们在我们接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间的 rendez-vous (会晤)。他在 1850 年 8 月 26 日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叙述了这次 rendez-vous。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许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暂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我的朋友，看透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五脏六腑，并背着我们连忙把对我们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苦口婆心地嘱咐“朋友们”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我是宽宏大量的，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谈到政治时，她就说：《Ne parlons pas morale》（“咱们别谈道德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 8 月 26 日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以根据两封信来说明他。我只做了摘要的 1853 年 11 月 23 日的第一封信⁴⁰²，是我的朋友、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威·施特芬从切斯特寄给我的。信里说：

“有一次维利希派来这里（即科伦）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计，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估计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 citissime（匆忙地）宣布成立维

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就很瞧不起我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伦’（他对我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贞般的秘密。”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1853年才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察探的赫尔弗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划得更清楚了；赫尔弗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海弗纳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们于1850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赫尔弗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尔弗（1851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 我们已就准备贷款（金克尔贷款）的基础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势力的人写了信，建议他们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谈谈密谋组织的威力，并且指出，无论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有任何日期吗？）^①…… 我们的工作现在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你把那些过分顽固的人置之不顾，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 我的社会地位同你一样，都很困难。我们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贷款一事）急需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① 马克思为了嘲笑席梅尔普芬尼希上面一句话的文法错误，在括弧里套用了他稍加改动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动议员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所说的一句话，这位公爵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Rein Datum nicht》），就是说，他用了在德语上不允许的双重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6页）席梅尔普芬尼希犯了同样的错误。——编者注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驱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维耳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以前就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该文件是用辛凯尔迪在页边上的一些笔记和其他一些证件编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尔弗那里攫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aufgestiebert]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宣传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间进行“老鼠与青蛙之战”⁴⁰³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们自己泄漏给美国的德文报刊的。辛凯尔迪曾谈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传金克尔革命贷款的主张所作的普鲁士之行；他在谈话时所用的讽刺口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员会（即赫尔弗、海弗纳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等）驻伦敦的代表”卡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说：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维也纳的瑞兹和即将来此地的泰霍夫参加谈判。N. B.（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不得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给巴黎“亲爱的人们”的信，1851年4月16日于伦敦）

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通知朋友们”的信，是寄给这些“亲爱的人们”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见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见解原是我细心隐瞒，而他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谓《in vinoveritas》（“酒醉吐真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们”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说，——

“我……快结束时说，我一直设想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员式的共产主义的幸福马厩这种荒唐思想高明一筹”云云。（“主要著作”第150页）

设想啊！可见，泰雷夫虽然丝毫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他还是把它们设想为不十分“荒唐”，可真是够宽宏大量、谦逊温和的了。

姑且不谈学术著作，他只要读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问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题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详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虽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

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 [Home-colonies],创立小伊加利亚,^①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页)⁴⁰⁴

最后一句话把卡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说的“幸福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们同泰霍夫会晤前许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谬误。我们且举几个例子,让他自己来说明自己: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也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但这是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因此,他就为这种力量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152页)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讥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讥笑”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⁴⁰⁵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

① 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Home-colonies)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具有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⁴⁰⁶。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第一章,即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第11页)⁴⁰⁷的一章里,详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产阶级的的发展(见1850年1月“新莱茵报评论”第15页)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基,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⁴⁰⁸因此,我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杯水之浪”⁴⁰⁹。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⁴¹⁰里发挥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还只不过是应该“剥夺”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看法,泰

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页）⁴¹¹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伦资产阶级陪审法庭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页）⁴¹²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不外是“体系和词句的剪裁”，以便通过它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Tant de bruit pour une omelette!*（煎鸡蛋引起了多么大的喧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泰霍夫毕竟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唯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看法：

“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不久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要著作”第148页）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

月号“新莱茵报评论”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打捞出这个秘密前八个月，我曾向德国读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现在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到那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1850年2月“评论”第2期第77页）。⁴¹³

旧欧洲“不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号“评论”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页）⁴¹⁴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

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上，第153页）⁴¹⁵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尖锐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大幅度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们谈话中认真的东西理解成玩笑，于是对玩笑就更加认真了。他带着一个参加葬仪的人所有的那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开导他的“通知朋友们”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说：

“马克思又说，在革命中，军官是最危险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仑，这是一大批叛徒和一连串叛变。应当随时给他们准备好**匕首和毒药**。”（“主要著作”第153页）

关于“兵老爷们”判变的一套老生常谈，甚至泰霍夫本人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政府，例如Co-mité de salut public⁴¹⁶曾给“兵老爷们”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异效但喜剧性较小的手段吗？匕首和毒药至多能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细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讽刺来。福格特的同谋者、著名的波拿巴派mouchard（密探）**爱德华·西蒙**，在“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8期第528页，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诉讼等等”一文

中) 上转载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 并加了如下按语:

«Marx n' aime pas beaucoup voir des officiers dans sa bande. Les officiers sont trop dangereux dans les révolutions.

Il faut toujours tenir prêts pour eux le poignard et le poison!

Techow, qui est officier, se le tient pour dit; il se rembarque et retourne en Suisse».

(“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军官。在革命中军官是危险的因素。应当随时给他们准备好匕首和毒药!

泰霍夫夫人是一个军官, 他听到了这种话, 于是就乘船回瑞士去了。”)

照爱德华·西蒙的叙述, 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 以致他立刻躲开, 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转载“匕首和毒药”这一处, 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 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谓的“研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异彩——因为问题涉及一个民族的独立。”(同上, 第 79 页)

附带提一下: 西班牙和英国的有关 1807 年至 1814 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 早已驳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话。但对空谈政治的人来说, 这类神说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着的。

最后, 我来谈谈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语”, 并且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公正态度:

“首先谈的是他们同我们之间, 即瑞士同伦敦之间的竞争。用他们的话说, 他们应当维护旧同盟的权利, 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场, 当然不能友好地对待在同一范围 (无产阶级) 内与之并存的另一个同盟。”(“主要著作”第 143 页)

泰霍夫这里谈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革命

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们的。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领导该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1848年曾任某个小议会的副议长，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员^①。1850年7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议交给他这个伦敦同盟的成员，叫他“通知”我。协议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能无条件地同意伦敦提出的纲领（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间已达成了如下协议：

(1) 双方同意今后共同进行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伦敦协会通过组织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来为无产阶级统治作准备；

(2) ‘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们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他们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成员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组织；

(3) 和 (4) 至于瑞士，其领导权则只应交给‘革命中央委员会’中真正拥护伦敦宣言的人。双方相互交换报告。”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并不是“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范围内的和具有不同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题意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议是与同盟的“原则”性不相容的。

^① 契尔奈尔。——编者注

“接着轮到了金克尔……他们回答说……他们从来没有追求过廉价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他们是会竭诚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的。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拉斯塔特的辩护词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们早已知各方面都会发出一阵号叫，而且他们已想像到，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现有的机关报（‘莱茵报评论’）的存在孤注一掷。他们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们因这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莱茵省的所有订户，而不得不使报纸停刊。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同上，第146—148页）

首先，让我们来核对一下事实：当时“评论”还没有停刊，三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没有失去一个莱茵省的订户，这一点，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前普鲁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⁴¹⁷的编辑能给以证明，因为他当时费心地替我们收报费。此外，只听说过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少也该读过他本人批评过的我们对金克尔的辩护词所作的批评。他给瑞士“亲爱的人们”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向他们“揭露”我们早在五个月以前就已向读者揭露了的东西呢？上述的批评这样指出：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愤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我们的斥责丝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我们的揭露会使他进入赦免之列，因为我们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说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的供词是可靠的，并且我们还宣告说，他不仅应该赦免，甚至应该录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于世了。”（1850年4月“新莱茵报评论”第70、71页）⁴¹⁸

泰霍夫说我们在“败坏”革命的 *petits grands hommes* (小伟人) 的“名誉”。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败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们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种刺眼外皮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样就预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凡斯的著名抒情诗人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诗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别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1850年3月“评论”第70—78页）⁴¹⁹中偶尔对济格尔将军所作的评论做例子，来说明我们进行一种不光彩的攻击。

那末，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评跟那些议论同一位济格尔将军的心怀叵测的废说比较一下，这类废话是我们同泰霍夫见面大约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赞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赞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

1851年12月3日，“巴尔的摩通讯员”，这在当时仿佛是金克尔的“通报”⁴²⁰，在一篇题为“伦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尔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平庸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被问到低能的拿破仑的情况时更加狼狽。拿破仑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儿’，而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锐的反政府的言论而成为有声望的军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论是由于经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开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

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较成熟的和真正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无名的、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年轻人时，他们感到相当的气愤。但是这里有布伦坦诺，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能做出任何会毁灭革命的事情。不错，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伦坦诺事后承认了他……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斯塔特城下和黑林山脉中的绝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们交给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还以引人注目的失败的统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雄的业绩，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说的。陶森瑙 1851 年 11 月 14 日在伦敦写的“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领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问题：

“……他们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一件迫切事情。德国鼓动者协会赞同这种想法，而且它的会员们在多次试图团结金克尔及其拥护者的过程中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刚刚形成，它就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协议，在谅解的假面具下坚持单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而进行有系统的欺骗，一些不知名的大人物以有组织才能的党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强迫接受一个秘密财政委员会的企图，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们老是想在放逐中通过这类东西来左右祖国的命运，可是，一碰到革命的火焰，这类沽名钓誉的盘算就化为灰烬了……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们；在我们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对我们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讯盈篇累牍；而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使用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谓德国贷款来迫使我们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说，接受从属和依赖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财政上使党合并的发起人所期待的。金

克尔的离开是严守秘密的，因而我们只是从美国报纸上读到 he 到达纽约的消息时才知每这件事…… 对于那些不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意识到自己以往功绩的严肃革命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至少人民中有一些阶层是支持他们的；这些事实和其他许多东西，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同盟的决走性理由。”

其次，有人指责金克尔，说他所募集的款项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伦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可是结尾却说：

“我们既没有答应我们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没有答应他们要偿还捐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用善意的行动（实际的服务？）和认真的会计制度来证明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也知道，将来当我们公布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可以期待博得祖国的感谢。”（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们三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创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同盟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见附录6）

可是，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闹无谓纠纷，是由埃尔斯的两个议员齐茨和律斯勒之间的一场纸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说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们”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们”一信的收信人，他在1850年底同赫尔弗、海弗纳尔、戈克以及其他（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该委员会当时的一个委员写给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

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被当做陪审员那样吸收进来作为列席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為了装装样子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希望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攫为已有的金克尔去主持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妙趣横生地给我们把马克思描绘一番，并且使我们对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一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马克思的建议。造谣和阴谋、无耻透顶的诽谤都被抬出来当做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并且作出了一项相应的决议，如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话。1851年初，在‘汉堡指南’的小品文栏里发表的、由路·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绘而编造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评论，算是执行这项决议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论如何，海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当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兹之歌”混为一谈。相反地，最初的“劳兹之歌”是彼得·品得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⁴²¹。

五

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Vidi un col capo si di merda lordo,
 Che non pareva s' era laico o cherco.
 Quei mi sgridò: Perchè se' tu si' ngordo
 Di riguardar più me, che gli altri altri brutti?
 (Dante)^①

福格特遭到谴责后，急不可待地要想证明：为什么恰好是他这个 bête noire (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②引起了硫磺帮的注意。因此，关于舍尔瓦尔和洛桑中央节上“遭到挫折的密谋”这一类轶事，又由“流亡的帝国摄政”这种同样逼真的奇闻来补充。不应该忘记，福格特曾是议会岛巴拉塔利亚的总督。⁴²²他说：

“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是从1850年年初起出版的。第一期出版之后，硫磺帮就立即通过它的一个成员（他在这以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了），发表

① 我看到一个脏鬼满头都是污粪，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爱瞧着我，
难道我比别人更污秽！”

(但丁)

[“神曲”地狱篇第十八首歌。马克思在引证康内吉塞尔的德译文时，在脚注里注明了译者的姓。]——编者注

② 直译是：“凶猛的野兽”。——编者注

了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及其党羽和阿道夫·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这本小册子，‘总汇报’也曾提到过……硫磺帮的整整一套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表现出来了。”（同上，第163页）

接下去便是又长又臭的叙述：在上述小册子里有一篇由哈根教授写的论**加格恩**的匿名文章，把它“硬说成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写的，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硫磺帮知道”，哈根

“当时住在德国，正受到巴登警察当局的迫害，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给他增加极大的麻烦”（第163页）。

席利在2月6日从巴黎寄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格莱纳**，——据我所知，他从未到过日内瓦，——被列入硫磺帮，是由于他写了一篇哀悼文献给‘流亡的帝国摄政’：议员们认为它是**德斯特尔**写的，因而咒骂地，一直骂到我 *correspondendo*（写信）给福格特的一个朋友和同事，使他们弄清真相为止。”

格莱纳曾经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委员。**格莱纳**的统治是“一片恐怖”（见**福格特**“研究”第28页），特别对我的朋友**恩格斯**来说是如此，因为**格莱纳**曾制造借口下令在基尔希海姆博兰登逮捕他。这一整个悲喜交集的事件，**恩格斯**本人已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2月号第53—55页）⁴²³上详细地叙述过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格莱纳**先生的一切。在流亡的帝国摄政无中生有地把我牵连进他同“普法尔茨伯爵”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上，“整整一套”“又一次”表现出来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就是按照这一套来编排硫磺帮的生活和活动的。

使我终于同他和好的是真正的福斯泰夫式的幽默，他以这种幽默使普法尔茨伯爵“马上”动身到美国去。在普法尔茨伯爵像射出一支巴尔芬人的暗箭一样出版了反对“流亡的帝国摄政”的

抨击性小册子之后，恐怖包围了格莱纳。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他从瑞士赶到法国，后来又从法国赶到英国。他在拉芒什海峡对面也并不感到安全，因而驱使他登上一艘丘纳德公司的轮船，继续前往利物浦；他一到船上，就气喘吁吁地央求船长道：“快点越过大西洋！”而《stern mariner》（“严峻的水手”）却回答他说：

“我一定救您脱离州官的暴力！
且让别人把您救出大风浪的怀抱。”^①

^① 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六 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S in kumber was manecvalt》

（“他的忧愁是多种多样的。”）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 162 页）“阐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同少许真实情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那就会发现，在 1848 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悦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忘记认真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冯·芬克那样的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夸奖——

《that important fellow,

the children’ s wonder—Signor Punchinello》，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们的活宝——潘奇内洛先生，”）

因此，我们就让这位法兰克福的通讯员去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以后，报道的语气开始有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摩停战协定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会提出的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⁴²⁴。在街垒战失败，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兵营，并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立即讨论**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表示感谢的建议。在**福格特**登上讲台之前，甚至连**费奈迭**也反对“**立即讨论**”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胜过了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通讯员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同年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数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威美尔曼**10月10日代表大约40名议员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⁴²⁵的抗议书上签名。威美尔曼说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言论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种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但**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⁴²⁶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瓜分

德国当做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们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尚情操使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新莱茵报’第243号，科伦1849年3月10日。‘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关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齜齜的意见，我们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⁴²⁷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①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新莱茵报”第248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⁴²⁸。诚然，在皇帝问题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也还是不清楚的，——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略费尔**去摆布。施略费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巴塞爾曼**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把他斥之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弗·恩格斯**，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而不得不逃亡⁴²⁹。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⁴³⁰一再

^① 这是发音近似的文字游戏：《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编者注

揭发“‘新莱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①”，——“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见“新莱茵报”第299号）⁴³¹，——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态度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用红色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表示抗议，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尖锐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见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议）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敢于认为久已等待的机会已经到了，在议会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他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⁴³²的时刻已经到了。“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议员，进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勒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简单地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一篇是乌朗特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

① 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

们之手。⁴³³会议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雷^①，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记圣保罗教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记记录（第 229、228 号）。⁴³⁴

布勒斯劳的沃尔弗：

“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读过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软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做一篇文章在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刚才还宣读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顺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说明。（中间派发出叫喊声：为什么用不着？）我谈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际上，它是写得非常温和的，甚至连布斯先生都说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见，而这当然是对告人民书的一种最坏的介绍。不，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们就不应该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说话；你们不应该谈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该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谈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场内骚动和笑声）我把他们全都归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之下。（全场活跃）是的，诸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必须对他们说：‘正如同你们站在合法的立场上一样，我们也站在合法的立场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场，你们也要顺便说明，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组织精良的作战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需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们就发表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②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的告人民书。（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骚动又起）喂，别打断我的话：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违背和破坏了许可的一切界限。他不能当着这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旁听席上的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们的辩论。”

① 文字游戏：Reh（雷）是姓，《Reh》是“小鹿”。——编者注

② 约翰大公。——编者注

沃尔弗：“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大臣们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鲁莽无礼！）

主席：“我必须剥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议；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的话。我抗议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场情绪非常激昂）

主席：“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诸位先生，刚才发生的意外事件，我可以这样说，是议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这个辩论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说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议会的根基。”（施略费尔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说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我乐意这样做，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另一个样子要求本议会守秩序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诸位先生，我很遗憾，刚当上议员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是把一切事情都当做喜剧看待的）。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粗暴地破坏我们对帝国摄政王大人表示必需的尊敬和关怀的责任。”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吉森的）福格特：“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是不会使你们听得疲倦的。议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感谢上苍（“盲目信仰”的福格特在感谢上苍！），因为议会已变成这个样子” [geworden wird]（是的，geworden wird!^①），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我请求发言（这就是说，刚才这套表示谢意的祈祷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为了保护从诗人心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清彻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为了堵塞它（然而激流不是早已为告人民书所吸收了吗？）而向它投去或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肮脏的东西，——我这样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话（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话），反对

① 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错了动词形态。——编者注

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的、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圾。是的，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的愤怒。”（极大的愤怒的福格特，quel tableau！（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①。

沃尔弗对乌朗特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堡”（福格特“研究”第28页）和“他的所有大臣们”，对于福格特来说，都是“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des fürsten milte üz österr lche
fröit dem stüezen regen gel lche
beidiu liute und ouch daz lant.^②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25页。）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估了约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议会和它的首领们也低估过路易-拿破仑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之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围内使他的低

① 这里套用了乌朗特所写的诗“歌手的诅咒”中的一行（原诗是：“他所说的——都是鞭策”）。——编者注

② 奥地利的君主，慷慨又好施，
就像柔和的如丝细雨，
抚摩着人们和大地。——编者注

估者] 因所犯的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们决没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观。令人惊异的恬不知耻等等（路易·波拿巴的）。——这一切都证明他比老朽的哈布斯堡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议上，**沃尔弗**曾通过济克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告**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进行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了国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①，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陪伴着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并让他听天由命去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唯一、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4月号第73页）上的一篇题为“来自帝国的补充资料”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们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呼吁建立国民军的‘告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或者时钟上的刻度XII就像夫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满足庆

① 科贝斯第一在我们已经提过的雅科布·费奈迭写的抨击性小册子里叙述说：“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即在加布里埃尔·里谢尔发表了关于皇帝的演说以后受到加格恩的拥抱的那次会议上，当**卡尔·福格特**用一种讥笑人的慷慨激昂的神情大喊大叫地去拥抱议员威美尔曼时，我向他喊道：‘别耍这一套顽童的鬼把戏了。’于是，福格特认为必须用挑衅性的骂人话来侮辱我一顿；可是当我要求他决斗时，他却通过一位朋友的长期斡旋，厚着脸皮收回了对我的侮辱。”（同上，第21、22页）

贺他的那个抱怨派的需要在纽伦堡^①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⁴³⁵敲响，那该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摄政政府在夫赖堡政府大厦内设立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许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和幸福。在经过长时间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一项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这些护照并不复杂，是石印的，但很漂亮，而且可以免费领取，份数随便。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们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也许，其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没有学格莱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

① 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纽伦堡的功绩辩解说，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七 奥格斯堡战役

在土尔高州公民⁴³⁶结束他的意大利战争之后不久，伯尔尼州公民就开始了他的奥格斯堡战役。

“那里（在伦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绝大部分通讯是他们供给的，而且从1849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主要著作”第194页）

尽管马克思本人从1849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居住在伦敦，但“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伦敦就有了。尽管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给‘总汇报’**绝大部分通讯**”，可是“从1849年起”才同它“经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时期，即“很早以前”到1849年为一时期，从1849年到“这一”年为另一时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位男子汉在1848年以前“还没有想到政治活动”。（同上，第225页）

我在1842—1843年编辑过旧“莱茵报”⁴³⁷，这家报纸同“总汇报”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848—1849年，“新莱茵报”重新展开了这一论战。由此可见，除了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争，而福格特从1844—1847年是该报的“经常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在“很早以前到1849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见“主要著作”第225页）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时期。

我在伦敦的时候，“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即“从1849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因为“从1852年起”有一位奥利是“总汇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实际上，无论在1852年以前还是以后，奥利同我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他既然老是同伦敦流亡者交往，准就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的会员。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事情本身，因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乡，淡黄头发的奥利曾是学会英文的老巴伐利亚人阿尔坦赫费尔过去的先知，他企图从共产主义的基础出发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获得更高的诗的观点。最初他是‘总汇报’驻苏黎世的主要通讯员，从1852年起到他最后完结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该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主要著作”第195页）。

Mouchard（密探）爱德华·西蒙把这首福格特之歌变成了如下的法语：

《En voici d'abord un qui de son point départ communiste, avait cherché à s'élever aux plus hautes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人，他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企图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政治观点。”）（“政治方面更高的诗的观点”甚至是爱德华·西蒙也无能为力的。）《A en croire M. Vogt, cet adepte fut l'oracle de la Gazette d'Augsbourg jusqu'en 1852, époque où il mourut dans une maison de fous》。（“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说的，那末这个魔术师直到1852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13卷第529页）

关于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奥利，福格特可以说，《Opem et oleum peridi》（“枉费了油和功夫”）^①。他本人说他的“小同

① 普劳图斯“迦太基人”第一幕第二场；这是一个女侍说的一句话，她抱怨她枉然给自己抹了芬芳的油。这里是文字游戏：Only（奥利）这个名字和拉丁字 oleum（油）的发音相似。——编者注

乡”从 1852 年起一直到“最后完结于疯人病院”，都从伦敦为“总汇报”写通讯，而爱德华·西蒙却说，“如果相信福格特说的，那末奥利直到 1852 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附带说一句：他现在也还健在），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

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既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末，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说的，还是相信他所说的反面，都完全是一样的。

卡尔·福格特说，“李卜克内西先生代替他（即奥利）去做‘总汇报’的通讯员”。“直到李卜克内西被公开宣布为马克思派以后，他才被‘总汇报’接受为通讯员。”（同上，第 169 页）

这次宣布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进行期间，即 1852 年底发生的。

事实上，李卜克内西在 1851 年春是“晨报”⁴³⁸的撰稿人，他给该报写了伦敦工业博览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 1855 年 9 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讯员。

“他的（马克思的）同志们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他的。”（同上，第 194 页）

证据很简单：“他（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 195 页），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们在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的神话创作的特点：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内瓦的偏狭、小市镇眼光和瑞士的酒馆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真地从日内瓦搬到了世界名城伦敦，他让李卜克内西在西头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住在四英里外的汉普斯泰特的我。而且我每天为散居在全伦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讯的其他许多

“同志”作拉·格隆尼埃尔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终身使命，而又多么有利可图啊！

福格特的师傅爱德华·西蒙，即使不熟悉伦敦的情况，但至少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家的敏感，在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涂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Marx, comme chef de la société, ne tient pas lui-même la plume, mais ses fidèles, n'écrivent pas une ligne sans l'avoir consulté: La Gazette d'Augsbourg sera d'autant mieux servie》(同上, 第529页)。即：“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领，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写的，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奥格斯堡报’被操纵得更不用说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吗？

我同李卜克内西从伦敦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一般说来，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是完全值得称赞的，他在“总汇报”上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论述，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的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讯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福格特本人小心翼翼地翻阅了“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寻找李卜克内西通讯中的弱点，但他对这些通讯的内容的批评，却仍然不得限于指出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标志是“两条细的斜杠”（“主要著作”第196页）。

杠划得斜自然证明通讯也写得坏^①，何况还是“细”的！李卜克内西如果不用两条“细杠”而是划上两个肥油油的圆点作他的通讯标志就好了！既然通讯中除了“两条细的斜杠”外没有任何其他缺

^① 文字游戏：《schie》是“叙”的意思，但同某些动词连用也有“坏”的意思。——编者注

点,那就值得想一想,这些通讯为什么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是唯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远东来信”⁴³⁹的同一家报纸上,李卜克内西可以安然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福格特宣称,在“总汇报”撰稿人当中也有卑劣的人。大家知道,他本人从1844年到1847年就是该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那末,在1859年我们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即我于1859年1、2、3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好些社论,其中有的文章详细地批评了“总汇报”所宣扬的“中欧大国论”及其认为奥地利继续统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那种论点⁴⁴⁰。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经我的同意,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门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第4页),是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⁴⁴¹但是,我们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奥地利有必要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的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例如,我在“论坛报”上(参看1859年2月)详细地证明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经达到了危急点,只有对外战争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统治以及

欧洲反革命的统治⁴⁴²。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张，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这一切早在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内瓦大发议论以前就发生了。

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以后，我已经把“圆满的人物”完全忘掉了。1859年春天，一个四月的夜晚，当弗莱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纲领”⁴⁴³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有趣的小伙子。这并不是泄露机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们而写的，但不是福格特的朋友，而是受信人的朋友。

如果问我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什么，那我就这样回答：“政客的空谈”。他要求弗莱里格拉特吸收布赫尔先生为计划在日内瓦出版的宣传性报纸的政治通讯员，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这个老诙谐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1859年4月1日。大家知道，从1859年1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表示了同福格特“纲领”绝对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物是青红皂白一概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可怜的作者，这本著作使我确信，他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有联系。

1859年5月9日晚，戴维·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一位面色阴郁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脸上的那种哈姆雷特式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

事”^①。这就是 homme d'état (政治活动家) 卡尔·布林德。在几句开场白以后,他就说到福格特的“阴谋”,而且富于表情地摇晃着脑袋,向我保证说: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领取进行宣传工作的费用;福格特想用 30000 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他不能告诉我(很难想像,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值 30000 盾);而且在伦敦已经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 1858 年当普隆-普隆、法济之流在日内瓦会晤的时候,就讨论了意大利战争的问题,他们并指定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建议他(布林德)参加自己的宣传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弗品贝尔;大会开始了,戴·乌尔卡尔特力图详细说明,意大利战争是俄法阴谋的产物^②。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② 福格特当然要把“马克思集团”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攻击归之为我仇视他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和他的“朋友”(“主要著作”第 212 页)。因此,应当简略地谈一下我同戴·乌尔卡尔特及其政党的关系。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和反对帕麦斯顿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看法,我仔细地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和 1807—1850 年的外交蓝皮书⁴⁴⁴。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1853 年底)。在这些文章中我根据帕麦斯顿同波兰、土耳其、切尔克西亚等等的会谈,证明他同彼得堡内阁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转载于由厄内斯特·琼斯编辑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并且又增加了关于帕麦斯顿活动的几段⁴⁴⁵。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中的一篇(“帕麦斯顿与波兰”⁴⁴⁶),这篇文章引起了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注意。在我同他的一次会面之后,他说服了塔克尔先生在伦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文章的一部分。这些反对帕麦斯顿的小册子,后来以不同的版本共出了 15000—20000 册。鉴于我对论述卡尔斯的陷落的蓝皮书进行了分析(载于 1856 年 4 月伦敦的宪章派报纸),设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曾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见附录 7)⁴⁴⁷。在翻阅英国博物馆保藏的外交手稿时,我发现了一些从彼得大帝时代到十八世

当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⁴⁴⁹国际栏的编辑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一家新的伦敦德文周刊“人民报”刚刚发行；由安·谢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工人报纸“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⁴⁵⁰的出版者金克尔的阴谋而关闭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讯员的比斯康普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放弃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教员职位，以便在伦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一些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纸当然也像所有这一类的工人报纸一样，编辑和写稿都是没有报酬的。虽然孚赫本人是自由贸易派，跟“人民报”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愿意有人垄断伦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伦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援该报的财政委员会。比斯康普已经写信给至今他还不认识的李卜克内西，要求他参加编撰工作等等。最后是孚赫要求我参加“人民报”的工作。

虽然比斯康普从1852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们那时还不认识。在乌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内西把他带到我家来。由于缺少时间，最初我没有满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答应请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帮助报纸征求订户，给以资助并参加编撰工作。谈话中我们说到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②

② 纪末这一时期的英国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不断进行秘密合作的事实，而彼得大帝时代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我只发表过详细论述这一题目的著作中的一篇导言，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这篇导言曾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以及伦敦的“自由新闻”这两种乌尔卡尔特创办的刊物上发表⁴⁴⁸。自伦敦“自由新闻”创办时起，我就偶尔为它写点稿子。由此可见，我是一般地研究了帕麦斯顿和英俄外交活动，丝毫也没有想到，帕麦斯顿勋爵的背后还有卡尔·福格特先生。

着又说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经读过福格特的“研究”，并且给了正确的评价。我向他和李卜克内西介绍了福格特的“纲领”和布林德所揭露的内容，但是我就后者指出说，南德意志人总是喜欢把事情加以渲染。使我惊异的是，我发现“人民报”第2号（5月14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的文章（见“主要著作”，文件，第17、18页），比斯康普在该文内提到了布林德说过的两件事实，即30000盾（但他说成是4000盾）和福格特的活动资金来自波拿巴的事。此外，文章充满了俏皮话，风格同他于1848—1849年同海泽一起在加塞尔出版的“大胡蜂”报⁴⁵¹一样。同时，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它的领导人之一谢尔策尔先生号召在瑞士、比利时和美国的工人教育协会支持“人民报”，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作斗争，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见附录8）。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1859年5月14日刊登在“人民报”上的文章寄给福格特，福格特同时也经自己的信徒拉尼克尔之手接到了安·谢尔策尔先生的通告。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评的率直”凭空捏造，把我说成是反对他的阴谋的策划者。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把后来发挥成他的“历史故事”的一篇纲要发表在前面好几次引证过的“瑞士商业信使报”150号特别附刊上。这篇原始福音书第一次揭露硫磺帮、制刷匠帮和舍尔瓦尔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所以比摩门教⁴⁵²福音书所注的日期更晚），标题是“警告”，就其内容来说，很像译自臭名远扬的艾·阿布小册子中的一段文字^①。

① 这里稍微谈谈俾尔“推销员”，即“流亡的帝国摄政”的地方小报“通报”。俾尔“商业信使报”的出版者和编辑是一个叫恩斯特·许列尔的，他从1838年起

我已经提到过，“人民报”根据我的要求转载了福格特的匿名的原始福音书“警告”。

6月初我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报”收集了25英镑左右的预订费。这笔钱是由弗·恩格斯、威·沃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去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的三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视线越过拉芒什海峡”投射到奥格斯堡和维也纳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作”第212页）。关于原财政委员会在伦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225页上教导我们说：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诡计，而他们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企图得到索取工资和报酬的特权。”

“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编辑和撰稿，而且还要编辑和撰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诡计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报”与反动派有关，那末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即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现了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的校样，他匆匆地看了一遍，立刻认出是布林德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奥·费格勒说，布林德曾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给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校样转寄给了“总汇报”。传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②“人

^② 是政治流亡者，曾作过驿站站长、酒商，破过产，但现在又发了财，因为他的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领取不列颠—法国—瑞士新兵招募处津贴的报纸，现在拥有1200订户。

民报”第7号(1859年6月18日)转载这份传单时又利用了这个活字版。

“总汇报”发表了“警告”之后,前帝国的福格特的奥格斯堡战役就开始了。他控诉“总汇报”转载了传单。

在“主要著作”(第227—228页)中福格特模仿了缪尔纳:“我是,我是,我是强盗雅罗米尔”[《bin's, bin's, bin der Räuber Jaromir》]⁴⁵³。只是他把动词 sein (是)改成了 haben (有)。

“我提出控诉 [ich habe geklagt],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为‘南德文化代表’的那个编辑部的空虚、渺小和卑鄙必然会全部被揭露出来,我提出控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这个可敬的编辑部和被它捧上天去的奥地利政策同硫磺帮和革命的残渣之间的联系必热会大白于天下。”

接着还有四个“我提出控诉”。

提出控诉的福格特充满了伟大^①,朗金说得真好,再没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瘪的了。

这位“圆满的人物”喊道:“我控诉的动机极少含有个人考虑。”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牛犊在屠宰台上也不会像卡尔·福格特在被告席上这样叠叠挣扎。当他的“密”友拉尼克尔、莱纳赫(曾写过非常流行的关于福格特的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闻录)和埃斯林根的饶舌的“残阙”会议议员迈尔在助长他对法庭的恐惧心理的时候,而苏黎世那边却固执地要他赶快“控诉”。在洛桑工人节上,皮毛商罗斯当众向他宣称,如果不进行诉讼,就不再尊敬他了。但是,福格特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根本不想理会奥格斯堡和伦敦的硫磺帮,因此他将保持缄默。不过,他还是突然说话了。各报

① 原文这里是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geklagt habende》(提出控诉的)和《wird erhaben》(充满了伟大)的尾音相似。——编者注

刊登了关于他的诉讼消息，而拉尼克尔声明说：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尔）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是，由于这位“圆满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所以，最合适的办法无疑是控告“总汇报”。福格特就雅·费奈迭的攻击（说福格特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⁴⁵⁴）发表的自我辩护书刊登在1859年6月16日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伦敦是在匿名传单出现以后看到的。传单在结尾时威胁说：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做——，将有揭露之二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没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烦，但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们都很怯懦。他可以估计到，他的控诉使得问题愈明朗化，他们就会愈加谨慎，因为揭露“流亡的帝国摄政”的丑行，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残阙”议会。

议员雅科布·费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⁴⁵⁵第27—28页上失口说：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读了福格特写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给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场揭露得更为清楚，说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争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要，我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地方，只是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在我保证不拿去发表的前提下才把这封信给我看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虑，人们力图用某些方法来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这些方法无论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许多人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使福格特现在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厚颜无耻地以德国党的领袖的资格出现。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属的党应当替他

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①

所以，一方面，控告“总汇报”并不冒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这个方向转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将军提供最有利的作战基地。这是奥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诬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奥地利同共产党人结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敌人之间的巨大而奇怪的联盟的有趣的受害者。小德意志派报刊本来就因为福格特是帝国缩小者 [Mindrer des Reichs]⁴⁵⁶而对他特别赏识的，这一来就更应当为他欢呼并把他大大夸奖一番了！

1859年7月初，我刚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这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为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点。我逐点复述了他在5月9日对我说的话，事实上那就是传单的全部内容。这种说法他完全同意，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1859年8月，李卜克内西给我看了“总汇报”编辑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传单“警告”中列举的罪状提出证据。根据他的请求，我决定同他一起去圣约翰伍德的布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传单的作者，他总是在5月初就已经知道了6月初的传单的内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西。布林德没有在家，他到某个海滨浴场去了。李卜克内西写信告

① 并见上面引证过的小册子的第4页，那里写道：“出自对党的考虑而对福格特加以‘宽容’；由于道德上的不坚定，福格特的密友们明知福格特对祖国干了可耻的勾当，却容许这个福格特公开指控一些人为诬蔑，这些人仅仅说了他们大家都知道、都想过、并且握有证据的话；这一切都引起我的厌恶”等等。

诉他我们拜访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错了地址）。您知道，我决不想干预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的，我与此事**毫无关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私下的谈话，显然完全是出于误解；这里发生了某种误会，有机会时我将对此作口头说明。使您同马克思徒劳往返，对此我表示遗憾。

充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9月8日于圣莱昂纳兹”

说布林德与指责福格特“**毫无关系**”的这份冷淡的外交照会，使我想起了1859年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匿名文章，翻译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讯员向我们写道：

“阁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①，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的演说。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件事实。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仑亲王在日内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奥地利和即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的计划。这位亲王曾经同一位瑞士议员详细谈过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位议员的名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计划，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一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被驱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大量金钱用来收买他们（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这种提议遭到了愤怒的拒绝。”（见附录9）

^① 指上面提到过的5月9日由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出福格特的名字，但对伦敦德国流亡者来说已经够清楚了，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传单“警告”的主要内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责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奥格斯堡案件提供的大好时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谁又是“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5月间，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当我向“自由新闻”的编辑科勒特先生说明争论的问题的意义并把布林德的外交照会的内容告诉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1859年9月17日，排字工人奥·费格勒先生给我一个书面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页），其中他决未断定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证明是他本人（奥·费格勒）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传单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并且霍林格尔有一次提到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

根据费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内西又给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闻”上所宣扬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说明，现在已经掌握了他参加传单“警告”出版工作的物证。布林德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却派科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开他是“自由新闻”登载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谦恭要同布林德的勇气协调一致。

这时奥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缄默。福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要我负传单的责任并要我证明传单中所举的事实，把我当做是传单的秘密作者。为了对此进行反

击,为了替李卜克内西辩白,为了帮助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经李卜克内西告诉“总汇报”编辑部,只要编辑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传单“警告”的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开始了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94页上所说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的通信”^①。所谓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的通信”就是奥尔格斯先生同一天给我的两封信,要我把许给的材料寄给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简短的几句话^②。

奥尔格斯的两封信,更正确些说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1859年10月18日到达伦敦,而奥格斯堡案件将在10月24日开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费格勒先生,约他于次日在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庭内 rendez-vous (会晤),要他对传单“警告”的声明提出合乎法律形式的 affidavit^③。我的信他没有及时接到。因此,在10月19日^④我不得不违反原来的意图,给“总汇报”寄去了前面提到

① 科尔布先生的确在“总汇报”第319号上提到关于“他没有刊登的马克思先生的一封非常详细的信”。但是,这封详细的信刊登在1859年11月19日的汉堡“改革报”第139号附刊上。这封“详细的信”是我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个声明也寄给了柏林的“人民报”。[见本卷第756—759页。——编者注]

② 我的附函 [见本卷第755页。——编者注]和费格勒的声明均包括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页,奥尔格斯先生给我的信则见附录10。

③ Affidavit 是向法庭作的声明,是代替宣誓过的证词用的,如有虚假,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证人负责。

④ 由于我字迹潦草,奥格斯堡法庭把信上日期10月19日看成10月29日。福格特的律师海尔曼博士、福格特本人、值得尊敬的柏林“国民报”以及 et hoc genus omne [整个这一伙]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毫不怀疑,10月29日在伦敦写的信竟能在10月24日就寄到奥格斯堡。

的 9 月 17 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 affidavit^①。

大家知道，奥格斯堡的诉讼案变成了一出真正的错中错喜剧。当做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的，是威·李卜克内西寄给“总汇报”并由该报转载的传单“警告”。但是，传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内西无法把他在伦敦的证人派往奥格斯堡的法庭，“总汇报”的编辑们在法律上陷入困境之后，发挥了一通乏味的政治妙论，海尔曼博士让法庭饱享了一顿“圆满的人物”关于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谈，最后是法庭不受理福格特的诉讼，因为原告找错了法院。当奥格斯堡案件结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总汇报”到达伦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顶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缄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吓坏了，突然出现在公开的活动场所。费格勒没有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只说过：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曾对他说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费格勒坚决声明，传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传单不是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传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传单也可能是布林德的笔迹，并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 313 号载有 11 月 3 日于伦敦的一项声明(见“主要著作”，文件，第 37、38 页)，公民兼政治家的布林德在该声明中宣称，他不是传单的作者，并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a) “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 300 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属恶意捏造，特此声

① 从费格勒后来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提出的 affidavit 可以看出，这个 *quid pro quo* [代替品] 的产生纯粹是偶然的，是由于他接到我的信太晚了。

明。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约·弗·维耶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费格勒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断言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所以，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费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说它是“恶意捏造”。另一方面，既然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呢？

排字工人维耶为什么根据“十一个月以来”（从1859年11月2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所说确系实情”呢？

我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总汇报”第325号，并见“主要著作”，文件，第39、40页）的回答：“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 *mystère*（秘密）就都揭穿了。”

布林德怀着被侮辱的好心人的义愤，又转而攻击“1859年12月11日的‘总汇报’附刊”：

“我再一次（我们会记住的）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认为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种已经属于诽谤性的武断，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武断则是最粗暴的歪曲。”

“总汇报”编辑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语中指出，“广大读者

对于这种争论已经不感兴趣”，因此编辑部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对于这一点，“圆满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末尾是这样评述的：

“换句话说：‘总汇报’编辑部要求被揭露的彻头彻尾的撒谎者马克思、比斯康普^①、李卜克内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继续丢丑。”

奥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暂时宣告结束。

福格特又用了他的劳斯之歌的声调，他断言，“排字工人费格勒”向我和李卜克内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195页）他说明传单的来源时这样写道：布林德

“可能产生过某种怀疑，并把这些想法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传单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们硬说成是陷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218页）。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邀请，仍然没有在伦敦重新开始他的未结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伦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229页），同时也是由于有关方面“互相指责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双方不为真理而争论的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预是适当的。

① 比斯康普于10月20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编辑部一封关于福格特事件的信，在信的末尾他要求该报接纳他为通讯员。⁴⁵⁷ 这封信我是从“总汇报”那里才知道的。福格特制造了一种道德论，根据这种理论，我既然支持过已经停刊的报纸，就得为该报编辑后来的私人信件负责。那末，福格特应当为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负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是科拉切克的“月刊”⁴⁵⁸的有酬的撰稿人。比斯康普在出版“人民报”的这一期间，作了极大的牺牲。为了担任该报编辑，他放弃了多年的职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无偿地进行编辑工作；最后，他为了能按自己的信念行动，牺牲了在例如“科伦日报”这样的德国报纸上发表通讯的机会。其他一切事情，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与我无关。

我跳过三个月，从1860年2月初继续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选这里已经有了，文选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所以后来马克思派能轻而易举地把布林德说成是传单的作者；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结为沉默（就像福斯泰夫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一样），因而布林德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开口讲话，我在伦敦发表了1860年2月4日写的一封英文通告信（见附录11）。

这封通告信寄给了“自由新闻”的编辑，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得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并非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一种可耻的谎言”^②。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根据这一切，我再次把上面提到的卡尔·布林德称做可耻的撒谎者（deliberate liar）。如果我说的有失实的地方，那很方便，他可以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1860年2月6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⁴⁵⁹）以《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题报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谈这一点——“国民报”的文选。于是，我就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② 我用英文写的是：《deliberate lie》。“科伦日报”译成“可耻的谎言”。我接受了这种译法，虽然译成“蓄意的谎言”更切合原文些。

控告“国民报”进行诬蔑，警告“电讯”，我将对该报进行类似的控告，并开始收集需要的诉讼材料。

1860年2月11日，排字工人费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一份 affidavit。这份文件重复了他 1859年9月17日的声明的主要内容，即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部分由他本人（费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见附录 12）。

排字工人维耶的 affidavit 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且是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过他的证词。

因此，除了附原文（见附录 13）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地翻译如下：

“去年 11 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这期间，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entreated me）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非常感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 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2) 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 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 他(费格勒) 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 为上述传单排版, 并且说, 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 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 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警告’, 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上:

(5) 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索荷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 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 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 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 1860 年 2 月 8 日, 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 托·亨利”

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两个 affidavits 证明, 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并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清样。

这位 homme d'état (政治活动家) 在 1859 年 7 月 4 日由伦敦写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信中说:

“这里出现了说福格特进行叛卖活动的尖锐指责, 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其中举了一些我们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似有其事的事实。”

这同一位 homme d'état 在 1859 年 9 月 8 日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 他

“与这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 除此以外, 他还靠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钱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谢，诱骗排字工人维耶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骗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和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伪证寄给“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C3“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话是“明显的谎言”。

我把费格勒和维耶的这两份 affidavits 的副本交给各界人士传阅，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很可爱的文静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一个温顺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举行了一次会晤。

1860年2月15日的“每日电讯”发表了一则后来德文报纸转载的简讯，译文如下：

“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致‘每日电讯’的出版者！

阁下！鉴于近来谣诼纷纭，我感到有责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马克思先生正式声明，他们之中谁都不是前不久出现的反对日内瓦福格特教授的传单的作者。这个传单出自我的手，我应当对此负责。出于我对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的尊敬，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1860年2月14日于伦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这项声明寄给了我。为了报答他的殷勤，我立即给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同时给他写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既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给“总汇报”的伪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骗取维耶签名的

conspiracy (阴谋)。

布林德感到他现在不是站在“总汇报”的可靠的立足点上，而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 affidavits 和以它们为根据的我的通告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末他和霍林格尔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 affidavits，但是，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艾塞勒-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因为柏塞勒-沙伊伯勒公开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传单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给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清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伪证并寄给“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进行反驳。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被人误会的无辜的人，因为他不是传单的作者，也不是出版传单的主谋。他只是柏塞勒-沙伊伯勒的抄写员。正因为如此，所以 1859 年 7 月 4 日他不知道传单是“谁”搞出来的，而在 1859 年 9 月 8 日他“与这事毫无关系”。所以，我们为了使他安心，就这样说：柏塞勒-沙伊伯勒是传单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勒-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根据一切文明民族的法律是**责任出版者**。Haveat sibi! (随他的便!)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沙伊伯勒先生说几句。

福格特发表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攻击我的诽谤书(日期是：1859 年 5 月 23 日于伯尔尼)的标题是：“警告”。沙伊伯勒于 1859 年 6 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抄写并出版的传单的标题也是“警告”，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收买”他人的和“被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署名是 X。虽然在代数学上 X 代表未知数，但是，这也正好是我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传单“警告”采用这样的标题和签

名,或许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告”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告沙伊伯勒的“警告”是在进行诽谤。而沙伊伯勒的揭露之二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沙伊伯勒在他的传单上印有“请代为传布”等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内西满足了这种“请求”,通过“总汇报”“传布”这个传单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却在 1859 年 6 月到 1860 年 2 月这一期间束缚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 affidavits 才使他开口讲了话。

不管怎样,福格特的本来的原告沙伊伯勒现在公开声明,对传单中所提的事实负责。因此,奥格斯堡战役并没有以捍卫者福格特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终于在斗争舞台上的出现而结束。

八 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SINE STUDIO》^①

大约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谓“欧洲现状研究”问世了（1859年日内瓦版）。Cui bono?（对谁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仍将保持中立。”（“研究”第4页）

他也知道：俄国

“定将协同法国，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奥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限。”（“研究”第13页）

他还知道：普鲁士——但是让他本人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普鲁士吧。

“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而拔剑张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同上，第19页）

总之，facit（结论）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奥地利进行的十字军征

^① 《Sine studio》的意思是“不偏不倚”；马克思标上这一副标题，用以讽刺福格特的“研究”（《Studien》）的偏颇态度。——编者注

讨中,英国**仍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奥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鲁士将压制好战的联邦⁴⁶⁰成员,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争局限在一个地区内。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现在将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充当可以说是欧洲同盟的一位秘密将军对意大利作战。那末,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既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国和普鲁士将采取反对奥地利的行动,那末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波拿巴**著书立说呢?但看来除了以“年老糊涂的阿伦特老爹和微不足道的杨的幽灵为首”(同上,第121页)的要吞掉法国人的老一套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席卷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议院里和报纸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缓慢地、不无抵触地同意了这一统治思潮”(同上,第114页)。看来“对即将发生的危险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上)。法国的“**通报**”(顺便提一下,见1859年3月15日的一号)是以“伤心和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某些邦的议院里和报刊上,正在进行对法国发动一次十字军征讨之类的宣传。它们谴责法国野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它已放弃了这种计划;它们谴责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并不需要进行这种侵略”等等。

“通报”在回答这些“诽谤性谴责”时宣称:“相反地,皇帝”在意大利问题上的行为应当“使德国人的头脑深信不疑”:保障德国的统一和德国人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一种梦寐以求的理想,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见该报1859年4月10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种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册子“挑拨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说,路易·波拿巴在加紧设法给自己的人民一个“久已瞩目的机会”,让他们去《pour s'étendre ma-

jestueusement des Alpes au Rhin》(“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记了，法国是受不允许政府事先进行任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马姆兹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告一样（见 1859 年 1—5 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⁴⁶¹），引起了与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福格特也许达到了。他的“研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波拿巴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编。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政客式废话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使他的“研究”的性质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军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变为纳皮尔“勋爵”（“研究”第 4 页）。十二月政变的一帮耍笔杆的朱阿夫兵，从圣马丁门剧场⁴⁶²的演出中得知：每一个著名的英国人至少是一个勋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不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同奥地利和睦相处。如果暂时一致的利害关系使它们结合一些时候，那末，政治上的必要性总是紧接着又使它们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鲁士倒经常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等等（同上，第 2 页）。

果真如此！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争，除了几次短时期的停顿以外，从 1689 年起到 1713 年都在进行，也就是说，几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同奥地利一起，对普鲁士和法国几乎斗争了六年。只是在七年战争⁴⁶³中，英国才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奥地利和法国，但在 1762 年，布特勋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公使哥利岑提议“瓜

分普鲁士”，时而又向奥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议“瓜分普鲁士”。1790年，英国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俄国和奥地利，但这个同盟在当年就解体了。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普鲁士尽管接受了皮特的资助，但仍然签订了巴塞尔条约⁴⁶⁴而退出了欧洲同盟。相反地，奥地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争从1793年继续到1809年，其间只有几次短时期的停顿。拿破仑刚被废黜，英国还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就马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条约⁴⁶⁵（1815年1月3日）。1821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里在汉诺威缔结了一项反对俄国的新协定⁴⁶⁶。因此，当不列颠人自己——历史家和议会里发言的人——多半把奥地利当做《ancient ally》（老盟友）来谈论时，而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里发现了，奥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们的“暂时一致”不谈，却总是分道扬镳的，相反地，英国和普鲁士却一贯团结无间，所以，林德赫斯特勋爵在对俄国作战期间也在上院对普鲁士高喊：《Quem tu, Romane caveto!》（“提防它，啊，罗马人！”）^①新教的英国厌恶天主教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奥地利，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破产的奥地利。但是，在英国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撼动心灵的篇章。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统治英国的三十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现出他对奥地利的厌恶，借以掩盖自己对俄国的从属关系。例如，由于“厌恶”奥地利，他在1848年竟拒绝了奥地利提出的并得到皮蒙特和法国赞同的由英国出面按下列条件对意大利事件进行调

① 这里套用了贺雷西“讽刺诗集”中的一行诗，见第1卷，第四首讽刺诗。——编者注

停；这些条件是：奥地利退至艾契河和维罗那一线，如果伦巴第愿意的话，可以并入皮蒙特，帕尔马和摩地那可以划归伦巴第，而威尼斯则在一位奥地利大公的管辖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并独立制定自己的宪法（见 1849 年 7 月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第 2 编，№№377, 478）。无论如何，这些条件要比维拉弗兰卡和约⁴⁶⁷的条件有利。在拉德茨基击溃意大利人之后，帕麦斯顿本人提出了他早先拒绝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战争时期，当俄国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时，帕麦斯顿就不顾自己对奥地利的“厌恶”，以 1711 年条约⁴⁶⁸为借口，拒绝了匈牙利人向他提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绝对俄国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议，因为

“欧洲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是同作为欧洲的大国奥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息相关的”（在 1849 年 7 月 21 日举行的下院会议上）。

福格特往下说：

“联合王国的利益……处处都是同它（奥地利的利益）敌对的。”（同上，第 2 页）

这个“处处”立即变成了地中海。

“英国无论如何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确立自己的影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马尔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英国指向东印度的政策的据点；奥地利利用这些据点处处对英国加以强有力的阻挠。”（同上）

这位福格特在原著中，即在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在巴黎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读到的东西，是全都相信的。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样想的：他们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争夺马尔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但决不同奥地利人争夺这些岛屿。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曾经派遣远征军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峡加强自己的地位；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结

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订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1840年七月条约⁴⁶⁹,这是反对法国的,但是同奥地利一起反对法国的;英国在执行“指向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受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阻挠”;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间发生的一次唯一严重的争端中,即关于1840年的硫磺争端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岛硫磺贸易的垄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线⁴⁷⁰;最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一有机会就说要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français》(“法国的内海”),但是从来不说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autrichien》(“奥地利的内海”)。可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种重要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1858年,在伦敦出现了一种欧洲地图,名为《L'Europe en 1860》(“一八六〇年的欧洲”)。这种地图是由法国大使馆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1858年来说是带有预言性的暗示,例如,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并入皮蒙特,而摩洛哥则被并入西班牙。这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它好像仍然保留自己的原有版图。原来指定给法国的领土,用一种隐蔽的嘲弄把它们分配给一些不可思议的主人。譬如说,埃及被划归奥地利,而在地图空白处的注释中却指明:《Francois Joseph I, l'Empereur d'Autriche et d'Egypte》。(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和埃及的皇帝。)

在福格特面前摆着“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的指南针。他的所谓英国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福格特预言说: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之一而告终”,如果,——幸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如果奥地利拥有一支海军的话”(同上,第2页)。但是,“研究”的

独特的历史知识,在下列一处达到了顶峰:

“拿破仑第一曾经企图使英格兰的银行 [die englische Bank] 遭到破产,后者对货币采取点数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以往常用的过秤的办法,在一天之间就摆脱了困境;奥地利的国库一年 365 天都处在类似的、甚至坏得多的境况中。”(同上,第 43 页)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 [die Bank von England] (die englische Bank——这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从 1797 年 2 月到 1821 年曾停止钞票兑换黄金;在这二十四年中间,英国的钞票根本不能兑换金属货币,不论按重量或者按点数都是一样。当停止兑换黄金的时候,在法国还没有什么拿破仑第一(虽然波拿巴将军当时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而当针线街^①恢复钞票兑换的时候,在欧洲已经没有拿破仑了。这一类“研究”,甚至使奥地利“皇帝”对提罗耳进行的拉·格隆尼埃尔式的征服也为之逊色。

克品登纳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恶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仑第一)加以区别。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说:皮蒙特“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 71 页)。

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说什么呢?在皮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让给俄国,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鲁士购买亚德湾一事⁴⁷¹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后,更是如此:

^①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译者注

“一个在异国境内的军港，同占有该军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因为这种军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设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测瞄准线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研究”第 15 页）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经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军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谦逊”，因为这种谦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⁴⁷²（1859 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 20 页上读到：

“可是，当奥地利政府自己已经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 1815 年条约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谈这些条约不可破坏呢？”^①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译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话意出自迄今一直厚颜无耻地破坏条约的唯一的政府之口，听起来简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约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 58 页）。

当然，尼古拉废除了受到 1815 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 1815 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 1831 年派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 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像对

① 《De quel droit, d'ailleurs, le gouvernement autrichien viendrait-il invoquer l'inviolabilité de ceux》(traités)《de 1815, lui qui les a violés en confisquant Cracovie, dont ces traités garantissaient l'indépendance?》

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 1815 年条约在 1840 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1846 年 2 月 22 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又占领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入奥地利。⁴⁷³这些条约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 1846 年奥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 1831 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记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①

俄国“一贯敌视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派拿巴的）政策现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 30 页）一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心愿”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经颁发给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约的拘束力、签订了条约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仑第三”⁴⁷⁵（1859 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读到，——“俄国属于斯拉夫大家庭，属于优秀种族…… 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间突然产生的骑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则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绝妙的道路，并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诚意（在路易-菲利浦同英国之间只有过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间却存在着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最充分的诚意）已经产生了极其良好的结果：铁

① 帕麦斯顿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议愚弄了欧洲，从 1831 年起，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克拉科夫的阴谋。（见我的抨击文“帕麦斯顿与波兰”⁴⁷⁴1853 年伦敦版。）

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场等等。”^①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说：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心愿的朋友，而不是解放心愿的敌人。”（同上，第 10 页）

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 9 页）。

谁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 1838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 1843 年下诏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 1847 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 476，但是到了 1848 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废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

^① 《La Russie est de la famille des Slaves, race d'élite... On c'est étonné de l'accord chevaleresque survenu soudainement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Rien de plus naturel: accord de principes, unanimité de but... soumission à la loi de l'alliance sainte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 non pour leurrer et contraindre, mais pour guider et aider la marche divine des nations. De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sont sortis les plus heureux effets: chemins de fer, 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 stations commercial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etc.》p. 33. 《La Foi des Traités etc.》，Paris, 1859.

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⁴⁷⁷)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1860年出版的“俄国真相”⁴⁷⁸一书中,对所谓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谎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谎言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传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响亮地给以宣扬,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间订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订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⁴⁷⁹

“奥地利拚命抗议,法国和俄国则表示赞同。”(同上,第65页)

在俄国内阁于1837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1855年的“普鲁士周刊”⁴⁸⁰曾经转载过)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们在 1814 年 12 月 11 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议（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⁴⁸¹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在他把贝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 年布加勒斯特和约）⁴⁸²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组织规程”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 code（法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⁴⁸³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属统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 64 页）。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的当选（同上，第 65 页），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 9 页）。

把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货色。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贬称为 *Le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①）曾

① 转意是：口是心非的奸诈汉。——编者注

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⁴⁸⁴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⁴⁸⁵？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忏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里斯库？1830年以前，各种语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林惨败⁴⁸⁶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头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曾是1842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1842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

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经是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马尼亚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间多少是有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伦巴第、皮蒙特和罗马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计划。”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⁴⁸⁷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问题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转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计划的注意力。”

1843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⁴⁸⁸的号召毫无结果以后，便于1844年3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项计划通知教皇^①，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

^① 格雷哥里十六。——编者注

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 1844 年 4 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使罗马宫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伦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虽然奥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债款，一旦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统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搁在一边了。”

“小报”在 1844 年就是这样写的。

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挠——虽然这种阻挠是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顽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地利是东方一切纷争的策源地”（同上，第 56 页）。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结盟反对奥地利的理由——“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倾向除外，——说成是因为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给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奥地利已经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诈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该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 10、11 页）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由于在 1850 年华沙会议时损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⁴⁸⁹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满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 1825 年 10 月写于巴黎

的著名紧急报告⁴⁹⁰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划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慑的态度；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去反对我们，那末，一场它从未经受过的极可怕的风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争和内部的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议由奥地利占领“它所觊觎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结局，而把普鲁士简单地描绘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顺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维也纳内阁承认我们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内阁的计划早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 1830 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它规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许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作为补偿；奥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倡议下，同一个计划又由摩莱提交给彼得堡内阁。在这以后不久，布隆诺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伦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项证据交给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组织 1840 年的反法同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该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争。俄国“民族的”构成，特别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则”为其“指路明星”的人来说，看来该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们对民族原则评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则对我们更可贵”（同上，第

121 页)。

当俄国根据 1815 年条约占领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楔入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经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 1831 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维斯拉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宽慰德国说: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无疑问”,——他说,——“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紧张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也许,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 12 页)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场战争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给它准备好了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异族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较容易,福格特劝告普鲁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脱“斯拉夫人的附庸”

(同上,第 17 页),也就是摆脱**波兹南**(同上,第 97 页),或许也要摆脱**西普鲁士**,因为只有东普鲁士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德国土地”。从普鲁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没的中心体合并,而“纯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鲁士,将变成俄国的 enclave (插入别国领土中的领土)。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脱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的战争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 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 12 页),“在俄国为实现这类阴谋而使用特殊手法的情况下,奥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摆脱“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许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 13 页)。虽然普鲁士自己会放弃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9 年就已得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谢他对拿破仑第一所作的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鲁士和奥地利管辖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仑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在 1859 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福格特**并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并灭亡。Finis Poloniae! (结束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即传遍了全欧;1855 年 3 月,戴维·乌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揭露了这种观

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谈者叙述说：“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异常殷勤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比较起来，简直太突出了，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nota bene（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既温和又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须取其轻；而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并不是较大的害。”（同上，第12、13页）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异常殷勤、既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传播幻想的“渠道”；而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赖，并用这种信赖摧毁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①

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别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统治建立在统治的民族——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伟大的保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们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们。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波兹

^① 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作过战、后来又任在切尔克斯亚反对过俄国的一位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说：“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第216页）⁴⁹¹。“维也纳内阁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按照他们的建议，把一些领导人杀害了……俄国人一方面用种种办法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188、189页）

南和加里西亚。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了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约瑟夫二世，以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统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们全国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战胜者——马扎尔人，不如说是针对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像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⁴⁹²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见，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统治，不论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统计同俄国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马扎尔人。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统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马扎尔人的统治有联系的匈牙利的灭亡。^①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

① 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意大利战役时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在都灵的匈牙利军官们，他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解释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仅仅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属于俄国这样一种前途。附带提一下，我曾写给他一封信，要他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1860年4月19日于圣埃尔耶）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种工具：帮助匈牙利逃脱双头鹰的毒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怀抱。”

首听命于俄国的统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①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间,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剑张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间,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

福格特说:“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围绕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页)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居民属于“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们旁边

① 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发挥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残酷地对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1851年2月15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告诉宰相列施德-帕沙说:“约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唯一英明人物,他用尽了他的全部独特而罕有的智慧,利用了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的威力的传闻,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并使它溶化于一个联合的国家中。然而,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奥地利从灰烬中起来投入最后一次革命,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的主子双膝下跪。因而奥地利必须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信集》第33页)在同一封信中,另外,他还这样写道:土耳其和匈牙利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挫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诡计。1851年1月17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We must crush Russia, my dear Sir! and, headed by you, we will! I have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of will, but also that of hope! and this is no vain word, my dear Sir, no sanguine fascination; it is the word of a man, who is wont duly to calculate every chance; of a man though very weak in faculties, not to be shaken in perseverance and resolution etc.》(同上,第39页)。“我们一定要摧毁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摧毁它。我不仅充满决心,而且满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话,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思熟虑的人说的话,这个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 134 页）我们，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领地不给以任何保证。”（同上，第 133 页）“**联邦内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没有侵犯联邦的德意志领土**”时“**给该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 9 页），而且应当趁俄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内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给**”俄国以“**行动自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谋”的对象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的附属地”，有助于德国的“统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奥地利将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鲁士仍然把德意志联邦之剑装在剑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暗中支持**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 13 页）。

可是“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宽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们摆脱了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属于“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须围绕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间，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属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维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 50 德里、宽 25—35 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 65 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河到阿尔萨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线仅仅是 45 德里，因此，法国方面

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维也纳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经过俄国。德勒斯顿、纽伦堡、累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们同俄国毗连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斯拉夫人来说，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许我们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们也就得勾销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设防阵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辅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军就能够泰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军，使其中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较弱的各个击破。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 *slovanskD zemèvid*¹⁴⁹³ 来说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围的德语区犬牙交错，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语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维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语的，它们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鲁日伊策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说，无疑是

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泽里茨直通利贝罗泽和吕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线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较久地阻碍伟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们也没有权利继续留在原地方。既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现状”，那末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须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间，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奥地利、萨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的德国部分完全并入俄国。用“民族原则”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来改组斯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鞑靼人时，也是为了给“民族原则”增光），作为对他们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一种惩罚，福格特把这一点解释成对奥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则”应划给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们不妨暂且谈一谈：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这种现状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在俄国的领导下。

福格特强迫我们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 1815 年唱过的歌：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①

这样，福格特在 1859 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间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则”，按他本人的意见，首先应当表现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马扎尔民族在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了一段颇有说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约其词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现。在 1859 年 5 月 2—16 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⁴⁹⁴上，马志尼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缔结的同盟的第一条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完全拒绝支持波兰，福格特则译为：“最终填平横在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 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 mano e quelle del-l'Ungheria, daranno campo all'Alleanza di rivelarsi... 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er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ero sulle rovine dell'Impero Turco e del-l'Austria... Constantino di

① “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王中之王，
你赐给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酬。”——编者注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见 1859 年 5 月 2—16 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那末,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 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给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了。”)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是奉命的。在这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口号办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设下圈套,这些圈套是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奥地利战争万一发生某种转变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在奴颜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词句。实际上,他所干的勾当就是唱“路易之歌”⁴⁹⁵:

《Einan kùning wèiz ih, hèizit hër Hlùdow i g
ther gèrno G òde (即各民族) dionòt)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国王;
他非常热忱地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

我们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颂扬,说它“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现在有这样一对比:

他说:“在(普鲁士的)声明里,没有谈到奥地利…… 如果北美和交趾支那之间发生战争,那末,声明也可以这样写的。可是声明里却特别强调了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它的德意志职责,旧普鲁士。因此,法国(而按他在第 27 页上所说的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正在通过‘通报’和其他报刊滥加赞扬。——奥地利发狂了。”(“研究”第 18 页)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真是恬不知耻!我们不禁想起了: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彬

彬彬有礼,说**只有奥地利破坏 1815 年条约而且只有奥地利侵占克拉科夫**。他现在又同样友好地为“南方的白天使”效劳。

“这个教会国家,卡芬雅克,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代表人物和加格恩的在军事上的同类货色(也是一个对处!),对这个国家的共和国(教会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对一个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杀人罪!),然而,杀人罪并未能帮助他获得总统的职位。”(同上,第 69 页)

总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对罗马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卡芬雅克的确曾在 1848 年 11 月派遣一个分舰队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充当教皇的私人警卫。不过,只是在第二年,只是在卡芬雅克竞选总统失败后过了几个月,只是在 1849 年 2 月 9 日,教皇的世俗权力才被废除,罗马才成立共和国,可见,卡芬雅克不可能消灭在他执政时期还不存在的共和国。由于路易·波拿巴多次庄严地保证,说他的目的只是在于阻挠奥地利所计划的对罗马国家的入侵,才从国民议会骗到了他远征罗马所必需的费用,然后在 1849 年 4 月 22 日派乌迪诺将军率领 14000 人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大家知道,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决定要为“对罗马共和国的卑鄙的杀人罪”(因为这同时是对“法国宪法的卑鄙的破坏”和“对国民议会决议的卑鄙的破坏”)进行报复,决定要向所有这一切卑鄙行径的祸首——路易·波拿巴进行报复,即对他进行审讯,成了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大灾难⁴⁹⁶的开端。我们看到,这位政变的可耻的造谣者卡尔·福格特,为了使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解放者的“路易”先生的使命不致遭到任何怀疑,竟多么“卑鄙地”、多么无耻地在伪造历史。

福格特记得“新莱茵报”曾经写过:在法国,小农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构成了 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唯一基础。他

把这句话当成了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没有拥护者，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没有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军队和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这是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组织强大的工具，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债务的奴隶。”（第 25 页）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军队也包括在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城市居民，其中约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占有者，而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无地的和穷苦的人，统统变成了小农，“抵押债务的奴隶”。最后，他根本取消了法国（除了城市以外）的会读会写的本领。从前他伪造历史，现在他又伪造统计数字，来为他的英雄扩大宝座。现在，这位英雄正在自己把自己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马松（也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谈论过这位统治者：他有国家活动家和君主的优良品质，有不可动摇的意志，他严守分寸，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有一颗刚强的心，有高超而富有独创性的智慧，而且特别铁面无情。”（同上，第 27 页）

《W ie saecl̄iche stāt im an
allez daz daz êr begāt!
wie gār s̄in l̄ip ze wunsche stāt!
wie gānt̄ im so gel̄iche inein
die f̄inen keiserl̄ichen bein》

(Tristan)^①

① “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能否挑出什么毛病？
他的优美而纤细的身段
加上匀称而至尊的双眼
谁能用言语来描绘？”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编者注

福格特从他的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摇来晃去。他在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静持重”、“施展计谋的巨大才干”、“蛇一般聪明”、“坚忍”（第 28 页），随后，像前室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统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谬的。首先，他必须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伟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仑”⁴⁹⁷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 36 页）。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统治发生变化（说得多么谦虚：变化！），那末我们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贺成功，虽然现今我们面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远景。”（同上，第 29 页）

这位满心祝贺成功的颇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经，可以从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但是，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因此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为法国军队同一些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军官中间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 27 页）

这样看来，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军队，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险。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争，重新使法国“军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 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结局告终。1857—1858 年的普

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① 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 *congrès agricoles* (农户代表大会) 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粮价低落和高额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责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想要扮演拿破仑的企图的一系列失败——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的一些袭击。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手段⁴⁹⁸，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在大国面前的惨败。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总结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奥尔西尼的炸弹已像闪电似的照明了法国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⁴⁹⁹ 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五个镇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立摄政政

① 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

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⁵⁰⁰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⁵⁰¹蒙塔郎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顿，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法庭辩护词中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 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利浦主义⁵⁰²，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⁵⁰³期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⁵⁰⁴最后是，国库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须使由1816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争。当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把他抛弃。”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

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并得到英国(得比)内阁同意的建议前往维也纳。在那里(见上引的蓝皮书),这些建议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莱还没有来得及返回伦敦报告争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路易·波拿巴已放弃了他自己的建议,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议,即召开会议来商定反对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预,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计划,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贡比臬赞同普伦贝尔密谋⁵⁰⁵的帕麦斯顿的允许,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内阁当政,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可能使当时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满情绪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说,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顺便说一说,它是被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末,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蒂国会崩溃,一个崭新的未来会到来”(同上,第131页)。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军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军队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

桎，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吗？

不应该忘记，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绝接受《idées napoléoniennes》⁵⁰⁶所表现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而感到惊讶。甚至立法团的《chiens savants》（“有学问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现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责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责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责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统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等等所用的不满腔调；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抚 messages（文告）；皇帝的《étudier une puestion n'est pas la créer》（“研究问题不等于提出问题”）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这一出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讶的英国报刊，满纸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语，说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转变；交易所在议论“会不会打仗”的问题，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间的一场“决斗”；人们在打赌谁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伦敦的“经济学家”⁵⁰⁷杂志引证几处来阐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的预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财政大臣和帕麦斯顿的工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现在采取了安抚手段。”（1859年1月15日“经济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于法国舆论对计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现于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纸币贬值，对税吏的恐惧，彻底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一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 *pis aller*（下策）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曾料想到的。”^①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著小册子问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要求：“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并且不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愿引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 29、30 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现在要求“各民族独立”这样一种意愿上（同上，第 31 页）。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

^① 在考莱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The official disavowal (载于 1859 年 3 月 5 日“通报”) of all warlike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Emperor, this Imperial message of peace, has been received by all classes of Paris with feelings of what may be called exultation》。(1859 年 1—5 月出版的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88)。（“皇帝正式放弃一切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通告，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了。”）

那个“纲领”中，详尽地说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①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来使法国人民摆脱“和平的昏睡状态”，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摄取领土，他的理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是很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经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争。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库扎上校和罗马尼亚民族。在这里，调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见1859年3月15日“通报”论克里木战争。1859年4月10日“通报”是这样论述罗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论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经条约承认的民族能保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各公国，那末，他（皇帝）曾不辞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愿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① Nota bene（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独特的命运无常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前列”（第35页）；“当在民族解放范围内遵循这一政策的时候，必须协助它”，并且“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36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们的“纲领”中却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预防来自这种人方面的帮助。”（“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

并见 1859 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⁵⁰⁸。它是这样谈论克里木战争的。

“最后，法国为所流的鲜血、为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耗费的千百万金钱要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1859 年巴黎版第 13 页）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重复的题目，用德文阐述得非常成功，以致艾·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呱呱喳喳的喜鹊，竟好像是把福格特的德文译文倒译成了法文。见“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⁵⁰⁹。在这本书里，我们又碰到了克里木战争和摩扎上校治理下的罗马尼亚民族。

福格特跟着“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说：“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知道的：法国没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土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远征以后就不会满足于在军事艺术中形成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研究”第 33 页）“然而，这就表现出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同上）^①

① 其实，“小拿破仑”纵谈解放各民族的空话，也是从真拿破仑那里抄袭来的。例如，1809 年 5 月，拿破仑从雪恩布龙发布了告匈牙利人书，其中就说：“匈牙利人！你们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对你们毫无所求。我只希望看见你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民。你们同奥地利的关系是你们的一种灾难，等等。”1797 年 5 月 16 日，波拿巴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它的第一条说：“今后法国同威尼斯共和国应当和睦相处”。三天以后，他在一份秘密紧急报告中向法国督政府公开了他利用这个和约所追求的目的。该紧急报告是这样开头的：“兹送上我同威尼斯共和国所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规定，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率领五六千名兵士占领了一个城市。我曾利用这个和约追求各种目的”。他在谈到最后一个目的时说：“压制可能在欧洲出现的一切谈论，因为现在有人会觉得：我们占领威尼斯是威尼斯人自己热烈要求的一种临时行动。”又过了两天，即 5 月 26 日，波拿巴写信给威尼斯市政委员会说：“在米兰签订的条约，暂时可能由市政委员会签字，秘密条款由它的三个委员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仑”并不是真拿破仑！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 1851 年预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险、远征布伦和萨托里的腊肠阅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货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八日⁵¹¹，更不会给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⁵¹²时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是“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⁵¹³里^①

① 签字。我将始终不渝地竭尽我的全力，向你们证明我是希望巩固你们的自由的，并希望终于看到不幸的意大利，将成为自由的、摆脱一切外国人的羁绊而获得独立的意大利，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天以后，他写信给巴拉盖·狄利埃将军说：“接到此信后，即往访威尼斯临时政府，向它说明：根据现在使法兰西共和国同威尼斯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各项原则，并为了法兰西共和国对威尼斯共和国予以直接保护起见，必须把共和国的舰队提高到令人尊敬的高度。您要利用这一借口占有一切，同时不要忘记，应同威尼斯人和睦相处，并应招募共和国的所有水手为我们服务，但随时随刻都要以威尼斯的名义讲话。简言之，您必须把所有海军装备和军舰从威尼斯港调往土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款，威尼斯人应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土伦舰队提供价值 300 万的装备，但我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意欲占有威尼斯的所有船只和它的全部海军装备供土伦使用”（见“拿破仑的机密函件”七卷集 1817 年巴黎版⁵¹⁰）。这些命令丝毫不盖地被执行了；可是当威尼斯遭受掠夺而失去它的全部陆海军装备之后，拿破仑竟毫不犹豫地把他新盟国，他曾庄严宣誓要不顾一切危险予以保护的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置于奥地利的专制桎梏之下。

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32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 honneurs（荣誉）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1815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34、35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 honneurs（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得

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 1858 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声筒，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奏了各种变调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 1858 年 11 月 20 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订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转送给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 1848—1849 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才能组织起来的，只有东方的 demi-monde（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词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用的智慧，他这样说：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
(同上，第 64 页)

皮蒙特侵略意大利的土地。因此，多瑙河各公国——土耳其的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罗马尼亚土地，即从俄国手中夺取贝萨拉比亚、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希瓦拉的巴纳特和布柯维纳吗？福格特不仅忘记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记了，匈牙利在 1843—1849 年间看来丝毫无意于让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尼亚的土地，拔出剑来回答他们的“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记了，相反地，正是奥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则的宣传”去反对匈牙利的。

但是，当福格特一半是根据他从浏览过的轰动一时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的印象，十分冷静地把“各公国的可悲状况……”说成由“希腊人和法纳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 63 页）造成的时候，福格特的“研究”的渊博历史知识，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出来了。

他甚至没有想到，法纳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就是从十八世纪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的希腊人。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又在俄国人的支配下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得天花乱坠的君士坦丁堡的卖柠檬水小贩的追随者。

虽然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并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消灭各民族，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则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向发动进攻，但仍然

“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研究”第 36 页）。

在两位天使和“德国统一的两个最大外敌”采取这些联合行动时，即在“极其密切的联盟”（“研究”第2版的跋第154页）内采取这些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绝不是“帝国扩张者”【《M ehrer des Reichs》】想使德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说：“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而拔剑张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意志”省区除外）尼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研究”第1版第18、19页）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真正开始以前，就滥肆宣扬土伊勒里宫告诉他的秘密，即普鲁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密一致”的行动，并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然就为普鲁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各邦政府，无论对普鲁士在战争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军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都产生了怀疑。

福格特说：“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论选择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德国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应当毅然决然地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现在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议会，等等。”（同上，第96页）

散布普鲁士同“外敌”携手并进，散布这种办法将导致北部平原的被吞没等等观点，显然是要恢复联邦议会所缺少的统一。特别要使萨克森注意：普鲁士已经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份”（同上，第93页）。“购买亚德湾”（同上，第15页）一事正在被揭

露中。

“当霍尔施坦要成为普鲁士（在土耳其战争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籍的盗窃紧急报告事件突然使谈判发生了根本转变。”（同上，第 15 页）“梅克伦堡、汉诺威、奥登堡、霍尔施坦以及同它们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成了钓饵”，——而且“一有便利机会”——“普鲁士就贪婪地向这种钓饵猛扑过去”（同上，第 14、15 页）。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钓饵使普鲁士上了钩。一方面，普鲁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牲它的德意志弟兄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同上，第 14 页）。另一方面，普鲁士

“只有当由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将沿着白美因河延伸，并进而顺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兹时，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 93 页）。

德国中心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自然地理领域中的这类发现——露在外面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现（见“主要著作”），——使得“圆满的人物”同亚·冯·洪保齐名。福格特在这样地向德意志联邦宣扬要信任普鲁士的领导权的同时，由于不满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因德意志等等的领土而引起的旧竞争”，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由于欧洲以外的领土而经常发生”（同上，第 20 页）。这块欧洲以外的领土显然是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 1858 年刊印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 l'Empereur des Fran-

cais conserve ses (!) 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 (!) 旧疆界。“普鲁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 (参看上面已提到的 1837 年的报告书)。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 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 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部的矛盾的简化而完成, 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续不断的三十年战争⁵¹⁴。

总之, 按“研究”的第一版来看, 普鲁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 以报答它在战争时期使德意志联邦的剑保持在剑鞘内所作的一番“努力”。在福格特的“研究”和法国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 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 而是普鲁士要求通过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和自然疆界。

然而, 只是在奥法战争时期出版的“研究”第二版的跋中, 福格特才揭示出普鲁士的真正使命。普鲁士应当发动“内战” (见第 2 版第 152 页) 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 (同上, 第 153 页), 来使德国加入普鲁士君主国。当俄国将从东面迫近, 而奥地利将被路易·波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 普鲁士则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场王朝“内战”。福格特向摄政王^①保证说: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 至少要占去 1859 年这一年”, “然而德国的统一, 如果进行得迅速而坚决的话, 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 但意大利战役则需要几个月” (同上, 第 155 页)。

德国的内战只需要几个星期! 奥地利军队就不用说了, 因为不管意大利战争是否继续下去, 他们都是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鲁

① 威廉。——编者注

士的，除了奥地利军队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说，普鲁士也会遇到“完全处于奥地利影响之下的……巴伐利亚”（“研究”第1版第90页）的抵抗，会遇到首先受到威胁、已没有任何理由强迫自己“同情奥地利”（同上，第93页）的萨克森的抵抗，会遇到“维尔腾堡、黑森—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同上，第94页）的抵抗，简言之，会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16页）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且，如福格特进一步证明的，这些邦政府在这样的王朝“内战”中当然不会处于无援的境地，何况普鲁士是在德国受到“它的两个最大外敌”威胁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的。

福格特说：“宫廷（巴登的宫廷）会追随普鲁士，但是人民——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当然不赞同当权王朝的这类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样，布莱斯高仍然由于同情的和宗教的纽带，也由于对前奥地利（布莱斯高曾经属于前奥地利）的往事的回忆，而被紧紧地拴在皇帝和帝国的身上，而且在经过如此长期的分离之后，拴得比人们所料想的还要牢固得多。”（同上，第93、94页）“除了梅克伦堡”，“也许”还除了黑森选帝侯国，“北德意志笼罩着一片不信任溶合论的气氛，对普鲁士的让步也作得极为勉强。南德意志对普鲁士抱着本能的厌恶情绪，甚至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是皇党的一切大叫大嚷所无法压倒或消灭的。这种情绪活生生地蕴藏在人民当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府，都不能够长期地与之抗衡。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无论在德国人民那里，还是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那里，普鲁士都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同上，第21页）。

福格特就是这么说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说法，正是因为这样，由普鲁士同“德国的两个最大外敌”“秘密一致”地发动的王朝“内战”，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但这还不是全部。

“旧普鲁士同政府并肩行动，而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则同天主教奥地利并肩行动。如果那里的人民运动不可能迫使政府转到奥地利一边，那末，直接的后果将是君主国的两部分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同上，第20页）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即使普鲁士对奥地利仅仅保持中立也会重新加深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同旧普鲁士之间的鸿沟,那末,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鲁士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而发动“内战”,自然就会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完全脱离普鲁士。“但是,德国同这些罗马教会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同上,第119页)或者,说实在的,就像他所想的那样,这些罗马教会信徒同德国有什么关系呢?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这都是教皇至上主义的、“罗马一天主教的”土地,而不是“真正德国的”土地。因此,它们都应当像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一样被排除出联邦。**福格特**向普鲁士建议的王朝“内战”应当加速这一排除过程。的确,法国政府在其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它已成了**福格特**的“研究”的指针)上,已把埃及并入奥地利,而把莱茵河各省当做“天主教民族”的土地并入比利时,——这是法国并吞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各省的讽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国政府的地图更进了一步,并把天主教的威斯特伐里亚也献上了,这可以解释为流亡的帝国摄政对待普隆-普隆、威斯特伐里亚前任国王^①之子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总起来说: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将允许俄国经过波兹南染指波希米亚,经过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将使用武力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意大利,并且全都——pour le roi de Prusse^②,全都只是为了使普鲁士有可能通过内战使德国屈从于自己,而“保证莱茵河各省永远不受”法国“侵犯”(同上,第

①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pour le roi de Prusse》是一个成语,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通常则译成:“白白地”、“为了装装门面”。——编者注

121 页)。

“然而有人说，联邦的领土受到了来自世仇方面的威胁；世仇的真正目的是攫取莱茵。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吧，去保卫联邦领土吧。”(同上，第 105 页)

让人们去保卫联邦领土，同时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让给俄国，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同时在德国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目的却是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脱离普鲁士。

“然而有人说，路易-拿破仑……想采用某种方法来满足拿破仑式的侵略渴望！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眼前有克里木战役的实例！”(同上，第 129 页)

除了不相信拿破仑式的侵略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战役之外，福格特 in petto (心里) 还有另一个论据。在意大利的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像基尔肯尼的猫一样，将互相咬架，直到只剩下尾巴为止。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渠的顽强战争，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同上，第 127、128 页)“法国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同皮蒙特一起赢得胜利；但是要从这种精疲力竭状态中恢复过来，则需要几十年。”(同上，第 129 页)

意大利战争的这种旷日持久的前景，使他的敌人们胆寒。但是福格特用来延长奥地利抵抗在意大利的法军的方法，用来瘫痪法国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确是相当别致的。一方面，法国人在意大利得到 *carte blanche* (活动的自由)^①；另一方面，让“好心的沙皇”在加里西亚、匈牙利、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进行演习，在奥地利内部玩弄革命阴谋和在奥地利边境举行军事示威，来

“把奥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国的那些会受到俄军攻击或者便于俄

^① 直译是：“空白的格纸”。——编者注

国人玩弄阴谋的地区”（同上，第 11 页）。

而最后，由于普鲁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内战”的结果，奥地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主力，以保卫它的德意志领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⁵¹⁵，而……“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奥地利既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已提出的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赔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莱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结盟进攻普鲁士。决不会！它将顽强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物”会议愤填膺地拒绝把莱茵当做这类报酬的。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保存自己的原则。”（同上，案 31 页）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唯一的一个观念，即保留这个〈对法国的〉统治权”（同上，第 29 页）。

他知道，“意大利战争不会给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莱茵河各省既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赢得“威望”。他说：

“莱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的一种心爱的宿愿，如果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国民不抱这种愿望。”（同上，第 121 页）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见的人们”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要德国还存在 34 个不同的邦政府，就有希望实现这件事（即法国取得莱茵的自然疆界）。只要一出现利益一致和组织巩固的真正的德国，——莱茵的疆界就可能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 121 页）

正因为如此，曾在维拉弗兰卡向奥地利皇帝提出以伦巴第换取获得莱茵河各省的保证（见金累克于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声明）的那个路易·波拿巴，会愤懑地拒绝奥地利提出的建议，即把莱茵河各省让给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鲁士的一种报酬。

同时，丹屠出版的福格特原著，不仅对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表现了兴高采烈^①，——这些小册子用一种道貌岸然的人物的语调，驳斥了觊觎莱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莱茵！莱茵是什么？是疆界。但是疆界将很快就成为时代错误。”（“对条约等等的忠实”1859年巴黎版第36页）^②

谁会来谈论莱茵的疆界，来谈论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则建

① 《La Prusse est l'espoir de l'Allemagne... l'esprit allemand a son centre à Berlin... l'esprit allemand cherche l'unité de son corps, la vérité de la Confédération. C'est par cet entraînement que s'élève la Prusse... D'où vien-il que, lorsque l'Italie reclame l'intégrité, l'unité nationale, ce que l'Allemagne désire, celle-ci favorise l'Autriche, négation vivante de toute nationalité... C'est que la Prusse n'est pas encore la tête; c'est que la tête l'Autriche qui, pesant avec ces forces hétérogènes sur l'Allemagne politique, l'entraîne à des contradictions avec l'Allemagne véritable》(p. 34, 《La Foi des Traités etc.》) [“普鲁士是德国的希望……德国精神的中心在柏林……德国精神力求同它的躯体统一，力求组成一个真正的邦联。普鲁士在这一目标的鼓舞下，正积极行动起来……当意大利要求完整和民族统一时，德国也在追求这种统一，那末德国为什么竟站在反对一切民族的那个化身——奥地利一边呢？……因为普鲁士还不占居领导地位；因为占居领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奥地利利用各种力量去压制政治上的德国，使它同真正的德国处于矛盾状态”（“对条约等等的忠实”第34页）。

② 《Le Rhin!...Qu'est ce que le Rhin?Une frontière. Les frontières seront bientôt des anachronismes》(l. c., p. 36) .

立的千年王国的疆界呢？

“难道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说它为了正义、为了树立适当的威信、为了欧洲均衡的利益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报酬吗？对道它要求莱茵河左岸吗？难道它对萨瓦和尼斯伯国有一点儿觊觎之心吗？”（“问题的实质等等”1859年巴黎版第13页）^①

法国放弃萨瓦和尼斯，这是它放弃莱茵的明证！福格特并没有把这一点译成德文。

战争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引诱普鲁士同他达成协议，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诱过普鲁士，对他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研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更重要的是唆使普鲁士采取某些步骤，能向奥地利真正地或虚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协议。因此，在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研究”中，福格特在一篇专门写的跋中呼吁普鲁士征服德国并发动王朝“内战”；同时他在该书的正文中证明，这场战争将是“血流成渠的、顽强的，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而且它至少将牺牲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可是在同一书的跋中，他却庄严地宣称：战争“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并不是茜林丝的声音。因此，在干骗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顿这位 bottle-holder（拳击中的副手）支持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维拉弗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鲁士建议给弗兰茨-约瑟夫看；普鲁士要在

^① 《La France stipule-t-elle des dédommagements pour les sacrifices qu'elle se prête à faire dans un but d'équité, de juste influence, et dans l'intérêt de l'équilibre européen? Demande-t-ell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Elève-t-elle même des prétentions sur la Savoie et sur le comté de Nice?》(p. 13, 《La vraie Question etc.》)

军事上领导德国的谦逊要求必然成为奥地利缔结和约^①的借口，路易·波拿巴不得不为这个和约向法国辩解说：意大利战争有变为全面战争的危险，而这种战争会

“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挠的事业”。^②

法国借助于意大利战争取得了藏瓦和尼斯，从而也就取得了一个阵地，一旦莱茵区发生战争，这个阵地所起的作用要比整整一支军队还大，在这以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和“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的或然率理论中的倒数。1860年出版的《L'Europe pacifiée》（“平息了的欧洲”）地图，对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作了解释；在前一种地图上，埃及已经不再归奥地利管辖，而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则并入法

①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以后不几天，“布拉格报”上出现了下列官方声明。“这个抗议（想要取得在联邦监督下的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普鲁士的抗议）明显地证明：普鲁士力争德意志的领导权，从而力争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去。因为背信弃义的伦巴第同保存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比较起来，其价值简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弃，以便缔结和约，鉴于普鲁士的态度，该和约对我们已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

② 巴黎“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只是在特别时机和受到官方的特别委托才发表社论的，它在1859年7月22日的一号中写道：《To give another province to the king of Piedmont, it would not only have been necessary to support a war against two-thirds of Europe, but German unity would have been realised, and a work thus accomplished, which ever since the time of Francis I. it has been the object of French policy to prevent》。【“为了再给皮蒙特国王一个省，不仅必须经受得住一场反对欧洲三分之二的战争，而且会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挠的事业。”】

国，以补偿转让给普鲁士的“北部平原”。^①

最后，培尔西尼在亚田正式宣布：甚至“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人向莱茵推进。^②但是，不论在意大利战争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说过比这位流亡的帝国摄政更加无耻的话。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⁵¹⁷日内瓦议员”（同上，前言），是用下列开场白（同上，第 37—39 页）来开始他

① 普隆-普隆的专刊“民论报”在 1860 年 7 月 5 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凭借实力提出要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方面，皇帝有非常灵活的手腕，对舆论的感觉非常敏锐……但是，难道普鲁士发过誓永远不考虑德国的统一。它能否保证永远不贪婪地窥伺汉诺威、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奥登堡和梅克伦堡？今天，君主们正在互相拥抱，而且当然是真诚的。但谁知道过几年以后人民会向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是德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了，那末，不允许法国牺牲自己的邻邦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是否公正，是否合理呢？……如果德国人认为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旧政治制度，而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代替软弱无力的联邦，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法国有权利要求德国赔偿和作出保证。”

② 皇帝的柏克斯尼弗曾在丹屠出版的“英国政治”（1860 年巴黎版）⁵¹⁶这一小册子中大显身手。按作者的意思，必须劫取几百万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便改善法国的道德面貌，因为法国南方气质需要同北方人的稳重有较多的混合。在论述了法国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而需要自然本身所赐予它的疆界之后，接着说：“这种兼并（对莱茵各省和比利时的兼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法国喜欢而且要求合理的自由（une sage liberté），但南方气质却在法国的社会设施中占居重要的地位。这种气质有妙不可言的特性……但是它缺乏坚毅和果断精神。它需要我们北方弟兄们的顽强性、冷静而不屈不挠的决心。因此，天意给我们注定的疆界，无论对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的独立来说，同样是必要的。”

的“研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开场白中建议瑞士对由路易·波拿巴代替路易-菲力浦一事应表示欢欣喜悦。不错，路易·波拿巴曾要求联邦委员会采取“反报刊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拿破仑家族的所有代表人物看来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肤”（同上，第36页）。皮肤病，不过是皮肤病而已，但它老是纠缠这个家族，因而它不仅随着家族的血统遗传，而且还——路易·波拿巴 teste（可以作证），——仅仅随着家族的名字遗传。当然，

“日内瓦在迫害一些无辜的人，对这些可怜人的迫害，是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救命进行的，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设立领事馆，压制报刊，采取各种荒谬的警察措施，最后还有关于割让达普谷地的谈判，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真正帮过忙这一点忘记了，而且就是为现在反对他最激烈的那个政党帮过忙”（同上，第37、38页）。

宽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负义的政党啊！皇帝插手纽沙特尔冲突⁵¹⁸，决不是破坏1815年条约的先例，也就是使普鲁士受屈辱和对瑞士实行保护的先例。路易·波拿巴，作为“新瑞士人、土尔高州公民和奥贝尔施特拉炮兵上尉”，是应该为瑞士“真正帮忙”的。福格特在1859年3月指责瑞士反波拿巴政党忘恩负义，而皇帝的另一个奴仆图温奈尔先生则在1860年6月责备整个瑞士忘恩负义。在1860年6月30日“泰晤士报”上我们可以看到：

“几天以前，凯伦博士同冯·图温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在座的有考莱勋爵。图温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说，联邦政府的犹豫和抗议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仑皇帝在许多场合，尤其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给（rendered）联邦帮过忙（services），那末，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不

管怎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 1859 年 3 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简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 39 页）。例如，1858 年，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救命”驱逐了“一些可怜人，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第 37 页）；1838 年，联邦委员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绝驱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错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谋。1846 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1858 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⁵¹⁹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说：“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残喘；所有的人，甚至连正统主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 31 页）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 37 页）。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奥的逻辑作出结论说，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纯瑞士立场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悦”（第 39 页）。

在为必要的情绪预先作了布置的这个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员会于 1859 年 3 月 14 日的照会的德文译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 1815 年条约⁵²⁰，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

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 112 页）^①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 84 页），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蒙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纳德出口。同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蒙塞尼山隘、经费涅斯特雷利到达斯图腊河谷”（同上，第 84 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因此，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 85 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集中。”（同上，第 86 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一条红线，它从日内瓦一直引向巴黎。

其实，得比内阁公布的 1859 年 1—5 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附近集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 174 号，哈里斯上尉 1859 年 3 月 24 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车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

① 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会谈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对比重，因为在纽沙特尔冲突之后，普鲁士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地利已被削弱了，而法国则比过去无可比拟地强大了。”

即维阿马拉、什普留根和伯纳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第 86 页）。

实际上，维阿马拉首先是经过什普留根，其次是经过伯纳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经过了。

“圆满的人物”在说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语（它是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转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的真正任务。

福格特说：“瑞士有充分权利坚决不承担下列义务：除非为捍卫瑞士本国领土必须使用中立地区，不允许军用列车利用这条铁路线（从居洛兹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同上，第 89 页）

于是他要联邦委员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委员会在 3 月 14 日的照会中所拟定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 3 月底发表他的“研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 4 月 24 日才让军用列车利用上述铁路线，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一些。由此可见，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计划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得到了一项明确的指示，要说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先破坏，这种破坏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了中立的萨瓦地区。他讨好联邦委员会，因为他要给 3 月 14 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来看应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员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说，瑞士将“一视同仁地”履行它的根据条约而来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文，根据该条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军队均不能（在中立的萨瓦地区）驻扎或通过该地区”。委员会只字未提法国人可以使用通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卫自己的领土的措施”，委员会才给联邦保留“用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故意

歪曲委员会照会的内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作证明,而且马姆兹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1860年4月23日的上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明。

马姆兹伯里说:“当法国军队打算(在3月14日的联邦委员会照会发出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萨瓦开往撒丁的时候,忠于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说这些军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①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有关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论据来打消联邦委员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1859年3月底就已经知道法国军用列车要在1859年4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3月底就已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4月底用来掩饰自己暴行的那种词句了。他怀疑“从居洛兹到埃克斯和沙姆伯里铁路线的先头地段在中立地区范围内”(同上,第89页),并且证明“设立中立地区的目的,决不是要中断法国和沙姆伯里之间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线,从道义上说,是绕过中立地区的。^②

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马姆兹伯里勋爵说的话:

① 《When the French troops were about to march through Savoy into Sardinia the Swiss Government, true to the neutrality upon which depends its independence, at first objected that these troops had no right to pass through the neutralised territory》.

② 这条铁路在中立地区内,已由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和秘书长席斯在1859年11月18日给哈里斯上尉的照会中予以确认。照会中说:《Il pourrait être aussi question d'un autre point qui concerne la neutralité de la Savoie... nous voulons parler du chemin de fer dernièrement construit de Culoz à Chambéry, à l'égard duquel on peut se demander s'il devait continuer à faire partir du territoire neutralisé》. [“涉及萨瓦中立的另一款,可能存在问题……我们所指的是新近铺设的从居洛兹到沙姆伯里的铁路,也许有人会问,它是不是将继续构成中立地区的一部分。”]

“后来,由于上述理由,即该铁路线是绕过萨瓦的中立部分的,因而瑞士政府放弃了反对意见,允许法军通过该地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I think that they were wrong in doing so)。我们认为,遵守这个地区的中立,从欧洲利益的观点来看,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1859年4月28日向法国宫廷提出抗议,反对军队通过该地区开往撒丁。”

这一抗议成了帕麦斯顿攻击马姆兹伯里同情“奥地利的”借口,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had uselessly offended the French government),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第183页)攻击“人民报”一样,说它

“用尽千方百计(当然是为了讨好奥地利)来给瑞士制造困难……要弄清‘总汇报’所完全同意的这些倾向,只要读一读‘人民报’发表的有关中立和法国人通过萨瓦的文章就够了”^①。

“要弄清”的是:在福格特的“研究”中有一整章是谈瑞士的,这一章的唯一任务就是预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瑞士的中立地区进行辩解。这是兼并萨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并瑞士法语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反对这第一步,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维护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并把有关权利的问题变为全欧洲的问题,——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而刚发动局部战争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

^① 福格特也攻击“人民报”,说它竭力想使“联邦同一些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当萨瓦实际上已被兼并的时候,波拿巴派的小报“瑞士联邦报”攻击官方的“联邦报”,说“它对萨瓦和法国的看法是下列政策的微弱余音,这种政策从1848年起就力图把瑞士卷入欧洲的斗争中去”(见1860年3月12日伯尔尼“联邦报”第71号)。我们看到,在波拿巴主义者笔下,这类词句早就准备好了。

英国政府既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①因此，“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就异常努力地来搅乱问题，而把允许法军通过中立地区说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说成是对奥地利的一种英勇示威。须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纳-舍尔瓦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在重复并加强他的那些否认对莱茵的疆界有覬覦之心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抗议的同时，避免对同一些小册子里所说的放弃萨瓦和尼斯的做法作任何暗示。在他的“研究”中，甚至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可是，在1859年2月，萨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经抗议过意大利战争，因为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是同法国结盟的一种代价。这一抗议没有传到福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于1858年8月在普伦贝尔所签订的条约的那些条件（发表在“人民报”头几号的某一号上），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马志尼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859年5月2—16日）中，的确曾经预言过：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因而提出它在1848年某时刻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一类条件，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伦巴第，那时和约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才能实现，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

① Had those provinces (Chablais and Faucigny) been occupied by the Federal troop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ey would have remained in them up to this moment. (p. 20, L. Oliphant.) 《Universal Suffrage and Napoleon III》. London, 1860 [如果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省份(沙布累和弗西尼)……那末，毫无疑问，它们就会一直驻扎在那里。(劳·奥利芬“普选权和拿破仑第三”1860年伦敦版第20页)]

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①

马志尼发表他的预言是在 1859 年 5 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研究”的第二版是在 1859 年 6 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还在马志尼以前，也在萨瓦的代表以前，早在 1858 年 10 月，即在普伦贝尔密谋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门用急件通知英国内阁说：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已签订了关于割让萨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②

1858 年 6 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萨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并一事通知英国驻伯尔尼代办。^③ 不论是萨瓦代表的抗议，也不论是马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 1858 年 12 月到 1859 年 6 月这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没有传到福格特这位按其职业是瑞士人的救星的耳朵里去。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在 1860 年 3

① 《Ma dove l'Austria, disfatta in sulle prime, affacciasse proposte e quali, a quelle ch'essa affacciò per breve tempo nel 1848 al Governo Inglese, abbandono della Lombardia a patto di serbare il Veneto, la pace... sarebbe accettato: le sole condizioni dell'ingrandimento della Monarchia Sarda e della cessione della Savoia e di Nizza alla Francia, riceverebbero esecuzione》。

② 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他的上述的发言中这样说：《There is a despatch now in the Foreign Office, dated as long back as October 1858...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Swiss Republic, stating that he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ome conditional agreement had been come to between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and Count Cavour with respect to Savoy》[“目前，在外交部有一份注明日期为 1858 年 10 月的急件……它是由瑞士共和国主席发来的，急件中说，主席有理由认为，沙国皇帝和卡富尔伯爵已签订了关于萨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

③ 见“论拟议中的萨瓦等地的兼并”第一部蓝皮书文件第 1 号。

月,当关于普伦贝尔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喻户晓时,不知怎么福格特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沉默是奴隶的美德”^①这一题词之所以美化了“研究”,也许是由于它对咄咄逼人的兼并默不作声。但在“研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说:“可是,就假定会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论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129、130页)

意大利北部地区,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萨瓦。在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从纯瑞士的立场来看”(同上,第39页)“感到莫大的喜悦”之后,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他“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骨头”,也就是得到尼斯和萨瓦,从而也得到瑞士法语区。^②

① 这里套用了海涅“旅行札记”中的一句话(第四部,意大利,第三章,鲁卡城)。——编者注

② 福格特的希望是:“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把意大利的“骨头”塞进“法国狼”的喉咙里去,使狼苦于消化不良。这种希望的规模,无疑将越来越大。1860年10月15日的半官方杂志“现代评论”——附带提一下,这家杂志是专门庇护福格特的,——登载了一篇10月8日发自都灵的通讯,其中写道:“热那亚和撒丁会成为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一场新的(法国的)战争的合法代价。我补充说,占有热那亚会成为我们对半岛产生影响的一种必要工具,会成为阻挠一个海军强国(它是我们协助建立的)有朝一日溜出我们的同盟而加入某个新同盟的一种唯一有效手段。只有把膝盖顶在意大利的胸膛上,我们才能保证赢得它的忠心。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好裁判员,它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压力没有奥地利的那样粗暴,但是比它有力,——这是唯一的区别。”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仑第三”，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也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而是“拿破仑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仑第三。这是一本拿破仑第三对拿破仑第三滥肆吹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一个名叫达-达的阿拉伯人译成了他祖国的文字。在该小册子的跋中，这位带着醉意的达-达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因而火热的诗句洋溢纸上。但在序言中，达-达还是够清醒的，因而承认他的著作是奉阿尔及利亚地方当局之命发表，用来在阿尔及利亚国境那边的当地阿拉伯部落中间散发的，以便使“在一个共同领袖领导下的统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满他们的想像”。这位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共同领袖，——像达-达所透露的，——不是别人，正是“慈善的太阳、苍穹的荣誉——皇帝拿破仑第三”。福格特不是别人，正是德国的达-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诗^①。

达-达·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阳和苍穹的荣誉放射出来的“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改绘的欧洲地图转述成德文，就称之为“研究”，这种俏皮的称呼是很成功的，在他快乐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这甚至比帝国摄政、帝国酒宴以及他本人发明的帝国护照都更巧妙。这位“有教养的”德国市民认为“研究”是 *bona fide* (诚实的)，因为其中谈到了奥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国作斗争，奥地利同普鲁士因欧洲以外的土地而争吵，拿破仑第一强迫英格兰银行把它的黄金过秤，而不是点数，希腊人和法纳尔人是不同的种族，从蒙塞山出隘有一条陆路经过费涅斯特雷利通往斯图腊河谷等等，——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了：在反动的十年中，这位市民的自

^① 文字游戏：《ungereimt schreiben》意思是“无韵脚的写作”，即写的不是诗，同时也有“写作胡说八道的东西”、“荒诞无稽的东西”等意思。——编者注

由主义脑袋瓜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然而，奇怪的是，当艾德门·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最初叫“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中，以智者的谨慎把达-达编纂的东西又译成法文时，同一位厚脸皮的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即欢迎把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的原著小册子译成福格特的非常夸张的德文译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疯似地从自己的舒适的安乐椅上跳了起来。顺笔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鹊并未失去狡诈。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政变帝国把达-达·福格特同洪堡混为一谈，就像把拉萨里耳奥-哈克兰德尔同歌德混为一谈一样。无论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的这种搭配，表现出阿布对他的对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德国的达-达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九 代理机构

《So muosens alle str i ten.
in v i l angestl i chen z i ten
wart gescheiden doch her dan
...der V og t da von Bérne》.

(《Klage》)

(“在这紧要关头
全体都参加战斗，
那行列之中有
……伯尔尼的一个州官。”

(“哀歌”)^①)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将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

① 与此相反，哈特曼在“伊威恩”中为了暗示他同伯尔尼的头脑简单的人意见分歧，迫使州官说了如下的话：

《von Bern mao wol heizen ich,
wand ich dà n i ht ze schaffen hàn》.

[“纵使把我称为伯尔尼人，
也同伯尔尼毫无瓜葛。”]⁵²¹

但是，不要把这个哈特曼同福格特的朋友、那位同名的、柔情的、议会的软体动物混为一谈。

不准备来谈这个问题。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介绍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们文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纲领”，准备聘请

“愿意遵守这个纲领，按适当稿酬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中参加工作的那些人”（“中央节等等”第 17 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章杂志的人们取得联系？如果他们将版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付以优厚的报酬。”（“主要著作”，文件，第 36 页）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核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 36 页）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er sante nach allen den herren
die im diusken r i chen waren;
er clagete in allen s i n not;
unde bo i t in ouch s i n golt rot》.
(K aiserchronik)①

① “他向德国所有公爵
派去了使者，
他向他们哭穷，
也向他们提供黄金。”

（“帝国大事记”）⁵²²。——编者注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章杂志和小册子“施加影响”,要他们把自己的文章给福格特“寄来”并付给他们“优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为了使莱茵河沿岸免于危险,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第34页,“纲领”)。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页)。“这涉及匈牙利”(给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页)。

同上面谈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给卡尔·布林德的信,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masculini(男人)(“中央节”第17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页)。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中央节等等”第17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是“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页)。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

报刊提供价值 250 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 50、100 或 150 法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没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奥、或布耳埃、或“世纪报”523 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524 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 quid pro quo (混乱) 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①。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的老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 11 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内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 年 11 月

^① 引自席勒的诗“小溪边的男孩”。——编者注

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这次就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该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评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⁵²⁵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评论”)。该报是《an nom du radicalisme genè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格特的功劳。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谋人,而只是受了别人的蒙蔽。按照纯福格特式的做法,把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推诿给列·海弗纳尔,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页)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仑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并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扬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即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8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

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宽宏大量地拒绝“扮演斯图加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那样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鲁里亚王国般的小国，简直是可笑的。

“拿破仑亲王坚信自己的天才和禀赋，他根本瞧不起这些可怜的小王位。”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的最崇高望重的堂兄的宫廷中，“以亲王公民 (prince-citoyen) 的身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但是，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仑亲王同皇帝一样，是大经济学家……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健全原理终于在法国取得胜利，那末，毫无疑问，拿破仑亲王也是有一份大功劳的。”

他过去和现在都“拥护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对任何预防性的警察措施，“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如果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影响听不进这个埃吉丽亚的忠言，那末，亲王就尊严地引见，而“毫无怨言”。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对他进行诽谤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经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和——这是可能的吗？——普隆-普隆《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他在克里木战役的阿尔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个 5 万人的军团（著名的 corps de touristes（旅行团），我几乎说成 corps de ballet（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军，而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 la maladie Plon-Plonienne（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⁵²⁶。

“日内瓦评论”最后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介绍了他（即普隆-普隆）的真相。”

乌拉，普隆-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 Prince Rouge（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是所谓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给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然是“骇人听闻的”。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别论了！就算**福格特**在纽沙特尔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①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之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Plon-Plon est voluptueux comme Héliogabale, lâche comme Ivan III et faux comme un vrai Bonaparte》（“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普隆-普隆的最糟糕的行为就

① 卡罗利。——编者注

是把他的堂兄当做 *homme sérieux* (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并非任何人都能按其心愿成为巨人”)^①,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现了普隆-普隆以后,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⁵²⁷,比真波拿巴还真;因此,法国人总要说: *l'autre est plus sùt* (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 *Bas Empire* (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②。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的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什么呢!^③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中央节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

① 雨果“小拿破仑”结语第1部第1章。——编者注

②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③ 正如福格特所说的,早在1852年他就该同普隆-普隆一起作一次学术旅行(巴考士的游行?),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热情地把福格特介绍给普隆-普隆,因为福格特《*mais do que promettia a forza humana*》[“超乎人力所及”(卡蒙斯“卢兹之歌”第一首歌)]“对自然历史作了惊人研究”(“主要著作”,文件,第24页)。

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的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Ⅶ页），并且特别向“德国资产者”（同上，第128页）呼吁：要他们“关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反过来向德国工人解释说，“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唯一支柱**”（“中央节等等”第11页）。

他说：“我刚刚对你们说过，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并不存在，还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同上，第10页）

这些话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说的，可是早在6月6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就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①用武力和王朝内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的最简便的办法。接着，他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须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她是一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当这段讲话刊印的时候，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问题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间的斗争中表明立场，那末我们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们就省事了。”（“中央节等等”第13页）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

^① 威廉。——编者注

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恰恰是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把已经“转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给无产者以工作，使资产者破产等等”（“中央节等等”第9页）。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资产阶级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1)对于面临危险的谣言尽可能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2)在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即以比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⁵²⁸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俾尔“推销员”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伦贝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爱丽舍宫前厅里已经在分配萨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用这事开心取

乐。”^①

1851年12月6日,法济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划归十二月政变帝国。^②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统治不断扩张,萨瓦将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并。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翼侧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论拟议中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N^o I)。哈里斯把这一点告诉了**马姆兹伯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谈过合并的问题,皇帝的意见是,如果撒丁扩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末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同上, N^o IV)。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所以是在签定**拉弗兰卡**和约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⁵²⁹,其中说欧洲准备兼并萨瓦。同年8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结束后,**福格特**偷偷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

① 《On se partage déjà les places...de la Savoie dans les antichambres de l'Elysée. Ses journaux plaisaient même assez agréablement là-dessus》.

② 《Peut-être le citoyen Thurgovien que nous avonssibien défendu contre les menaces de Louis philippe, nous fera-t-il la grâce de vouloir bien se constituer comme médiateur, et reprendre de nous Genève》(1851年12月6日“日内瓦评论”) [“我们曾经很好保护他,使他不受**路易-菲力浦**威胁的这位**土尔高**公民,或许会殷勤地出来充当中间人,以便把**日内瓦**从我们手里拿走”。]

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谣言，说什么他到费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zè pâr ÿ s lëbt er mangel tac,
vil kleiner wisheit er enpfac,
s ÿ n zerung was unmâzen grôz··
ist êr ein esel und ein guoch,
daz sêlb ist êr zuo Pâr ÿ s ouch》.①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已经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同上，^{Nº}VI）；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说明这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却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Nº}IX）。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普隆的厄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宣传归于失败。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气势汹汹地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疯狂程度。⁵³⁰

1860年，准备兼并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们的利益。这时，已

① “巴黎住了许多天，
聪明没有长一点，
成了饕餮大肚汉……
饭桶一个驴一头，
至今一成也未变。”

（引自博内留斯“宝石”中的一篇寓言“一个博学的傻神甫的故事”。）——编者注

经到了用兼并诱骗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官纲领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给瑞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1860年1月初，内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如果萨瓦的占有者有所改变，根据1815年条约，瑞士同时也应该获得一条良好的防御线。”（见上述蓝皮书，N^o X III）

早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莱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告诉考莱：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累和佛西尼永远归属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N^o X X VII）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成为一个也具有兼并野心的和力图扩张自己领土的国家”（同上，N^o X V）。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萨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为自己造成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谴责，那末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因为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的夹攻弄得复杂了，所以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谅解的。”（同上，N^o X X IV）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

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的紧急报告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告）。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谋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诺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N^o X X III）。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泰晤士报”是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认为，根据他的消息，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N^o X X X III）。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N^o X X X III）。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1860年2月9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逊，要他相信，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⁵³¹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

舆论。在该报 1 月 27 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风格写的“**尼斯伯国**”一文中,已经显示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 年 2 月 2 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莱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 2 月 5 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 1860 年 4 月 23 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2 月 6 日才提交凯伦博士,这样,英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 月 3 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意说:

“他刚才听说(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谈论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萨瓦的条约。遗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 1 月 27 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明显的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们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问题,条约中并没有任何保留条件;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缔约双方的心目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条件是不言自明的(sous-entendue comme allant de soi)……我们不当只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我们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们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论。”(见法济的“可以充分信任的”演说,这一欺骗性的杰作载于 1860 年 2 月 3 日“日内瓦评论”)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 1860 年 3 月

24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内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 de bonne foi（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福格特在普隆-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萨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满满的普隆-普隆的豪华筵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俾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表现出

“它的民兵不仅是为了检阅和作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累和佛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其他步骤”。“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付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木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伦贝尔成了法国参预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违反自己意愿，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窘迫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曾在领导集团中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并且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

中，即在除了夺取某一小块（1）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管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纸上胡诌什么尼斯人绝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⁵³²，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卢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静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暗指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而福格特也满意地获悉“窝州新闻”在赞扬他的演说。“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兹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⁵³³。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⁵³⁴——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访问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访问土伊勒里宫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而且他给他自己的奥狄浦斯们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他的宫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厕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

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个人也为那个人而生，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内瓦大会议的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词，他是那个人的列保莱罗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有关瑞士的利益来说毫无结果，但就威胁法济处境的危险来说，却成绩辉煌。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九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德奥多·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由《fruitiers》（“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警卫军中挑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既没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洛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

占领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真正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才真正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诬指，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孔米恩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会议主席和“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给过佩里埃钱，那是从建立志愿军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孔米恩，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维克多-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区割让给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① 莱蒂在原来的中立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

① 大家知道，由于北萨瓦被兼并以后，使日内瓦处在法国领土的包围中，加以法国在托农湾的设防，近来大大加强了旧共和国的反波拿巴情绪。但是，在这种人民情绪真正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巴黎操纵的、部分为法国警察密探制造的假骚动。例如，在1860年9月22日的“星期六评论”⁵³⁵上可以看到：“一个笨拙的宪兵由于过分热心公务，在托农扣留了一帮所谓的瑞士人，要求他们出示护照，这些所谓的瑞士人就粗暴地侮辱帝国。这些带着完全稳妥的证件的瑞士人原来是法国人……在这些人为的冲突中，最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法济的一个最亲近的拥护者（朋友佩里埃）同一次最早的和最糟糕的冲突有极大的关系”（The gravest fact relating to these artificial collisions is, that in one the earliest and the worst of them a close adherent of Mr. Fazy was prominently implicated）。

即派三个师占领日内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内瓦警察局告密，说日内瓦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的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的旧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福格特散布谣言，说我不断地来往于瑞士西部和萨瓦之间，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有害而对敌视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谋前不久，这一阴谋，福林特肯定是知道的，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祸于我，使我毁灭。幸而他也是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我的，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说：‘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式的阴谋！’，这使他大为惊异。他让我更详细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维第’的成员，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议，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同意卡尔的行为。古斯达夫简洁地回答说，他从福林特的信中早已看出福格特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要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散布法国兼并萨瓦的想法；最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真的反抗；那末，现在根据巴黎纲领来看，后来发生的真正兼并和变得明显的危险，归根到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仆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重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谈到：

“请劝告我们的有势力的同胞们当心詹·法济的建议，他可能建议瑞士放弃自己的中立。这个劝告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詹姆斯·法济至今是它殷勤的代理人……现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同法国的计划作斗争，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说，这是阴谋诡计。只要瑞士声明它既不愿、也不能继续作中立国家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结盟。”

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

“当萨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终止，因此，法济的这种劝告也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的演说中证明，他

“一面怒骂和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们（他指责他们是 *le 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的阵营”。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锐地攻击了苏黎世—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并没有妨碍他叫嚣。

“欧洲，特别是德国抛弃了瑞士。因此，中已不可能；瑞士必须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词地提到了：

“近亲法国，只要它认识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许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老朽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始，而应当由海尔维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们该怎么办的。联邦军队在日内瓦的出现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他们的出现会使人对日内瓦现行政权机构产生丝毫的怀疑，那就让他们走开，日内瓦会帮助自己并保护自己。”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

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特别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籍的《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并且曾经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绝对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不得不投票赞成坚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交情并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此,福林特当然不可能在记名投票时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有声望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计划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需要逃跑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的通常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对“**奥地利主义**”的指责,**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责的大声重复,终于反跳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说道:

“看来,萨瓦对瑞士是一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奥地利的怂恿**下,急忙出来在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问题上阻碍**拿破仑第三**……英国和北方的一

些大国,除奥地利外,一点也不反对兼并萨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领地上制造不安和骚动的奥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伟大的民族原则的逼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不能服从一种千篇一律的常规。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该想到,在德森州人们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语言,那它就不该忘记,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属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的傲慢议员、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兹“王冠”酒馆中举行的纽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说家(“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莱茵,因为否则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谋。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本笔记本:“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要促使建立拿破仑的世袭统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统治者的没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分崩离析的法兰克帝国各省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因而德国就能够较容易地为自己争得自由,——这就是政治上的庸医:为了使活的机体神奇地重新出现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人们指责了那些人,他们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进行自卫并拥有自决权;最后,人们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他懂得什么是民族解放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

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⁵³⁶抨击了这样的

“逻辑：为要更快地捉住刺猬并把它重新放掉，应当放它回到田鼠洞里去；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勒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名教授，他的做法就像本末倒置的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一样。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农民的‘鞋’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的关系已经恶化，因而就同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537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 habitué（常客），并且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纽沙特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唯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末他们有什么理由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取得它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的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特别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 tutti quanti 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

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些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①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弩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争取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门·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de prendre la Savoie... c. à d. nous fermerions notre prote》

① 《Si la seule espérance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est fondé sur une guerre avec la France, quelle raison peuvent-ils avoir de chercher à affaiblir le gouvernement de ce pays et l'empêcher de former ses frontières naturelles? Serait-il que le peuple en A llemagne est loin de partager cette haine de la France? Q uoi qu'il en soit, il y a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très sincères, et notamment parmi les democrates les plus avancés, qui ne voient pas grand malheur dans la perte d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qui sont, au contraire, convaincus que c'est après cette perte seulement que commencera la vie politique d'une A llemagne régénérée, appuyée sur l'alliance et se confondant avec la civilisation del l'Ö ccident européen》 (《L'Espéran-ce》, 25 Mars 1860)。

（“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鲁士的同样的扩张，《alors nous aurions à veiller à notre sûreté, à prendr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c'est-à-dire 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那末，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这个轻率的守门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⁵³⁸的阿·阿·通讯员，约瑟夫·普留东和坐镇在土伊勒里宫的《Providence》（“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并且还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并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宣布，非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达、为德国报刊设立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销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门·阿布的门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现代评论”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评论”⁵³⁹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⁶⁴⁰的一些人、奥尔良派、联合派以及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和 Membres de l'Institut⁵⁴¹。既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

回办法迫使他们为波拿巴派的“评论”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的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⁵⁴²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爱德华 [Edouard]·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 [Eduard]·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时时刻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了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席勒协会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会议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处？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说：

“自然，没有 mouchard（密探）不出席的会议，没有 mouchard 不参加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烦，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简单策略，并且 probatum est（已经见效）——我们找来一个熟识的 mouchard，立刻把他选入委员会。在所有这类场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最为合适。您知道，过去替拉马丁跑腿，替艾米尔·德·日拉丹做夹肉面包的拉·格隆尼埃尔，现在成了皇帝的宠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检查官。而爱德华·西蒙是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独特地皱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说）一只臭气熏人的小狗。爱德华·西蒙——您当然不会把这一点归咎于他——不想 pour le roi de Prusse（白白地）工作。他认为，只要投身十二月政变制度，对他本人和文明那是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他并不缺乏在某些方面策划低级阴谋的能力。拉·格隆尼埃尔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

颇有谋略。‘祖国报’的老板、银行家德拉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小狗一样的 parvenu (暴发户)，除了最善于谄媚的人以外，他容不了别的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同他办公。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顺，因此正好合适。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提埃大街⁵⁴³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⁵⁴⁴和‘立宪主义者报’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事情刚露苗头，它就为开展狂热的兼并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癫疯。‘祖国报’确实获得了首先报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的版面就立即扩大了，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La Savoie et le cometé de Nice ayant été annexés à la France, la conséquence naturelle est l’agrandissement de la Patrie》（“萨瓦和尼斯伯国划归法国的必然结果是祖国^①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回答《Q u’est-ce que la patrie?》（“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Journal du soir》（“一家晚报”）。如果莱茵河各省一旦被兼并，‘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 salaire (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废除 tourniquet de la Bourses (交易所行情表) 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也就是全国范围的交易重新达到所希望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中于废除 tourniquet de la Bourse, 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论的作者和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alias (或者说) 警察局长的、尤其是帕勒斯特林纳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说) 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 odeur de mauvais lieu (臭气) 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完全无法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

① 文字游戏。《Patrie》意思是“祖国”，也是报纸的名称。——编者注

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议)。**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的^①**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alias*(或者说)**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②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林纳的密探和一切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灵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s'annida

Ipocrisia, lusinghe, e chi affatura,

Falsità, ladroneccio, e simonia,

Ruffian, baratti, e simile lordura》。^③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适于扮演 *double emploi* (双重角色) 的。首先他私下给拉·格隆尼埃尔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派他去“现代评论”工作。“现代评论”编辑部曾经恭顺地提出要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

① 文字游戏：《*ruchbar*》意思是“远近闻名的”，也有“发出气味的”意思。——编者注

② 通过温存的库尼贡达，我的故乡特利尔的一家小报上出现了某种福格特式的攻击我的东西，其中谈到我同“总汇报”的“肉体上的接近”。对纯洁的库尼贡达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啊！*Very shocking indeed!* [真是有伤大雅！]

③ “集居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惑人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淫者等等卑鄙齷齪的人”。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一首歌。)——编者注

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论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 Le procès de M. 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的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① 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in partibus（非现实的）^② 帝国在五巨头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伦有三个圣王⁵⁴⁵，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戴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的”^③。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进行淘汰”^④。

“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鲜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不是那么细致入微的”^⑤。当然罗！“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

① 《Il fut un des trois régents de l'empire éphémère》（l. c. , p. 518）.

②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③ 《Il dépasserait le but au goût des Français》（l. c. , p. 519）.

④ 《Nous nous efforcerons de choisir》（l. c. ）.

⑤ 《M. Vogt aime beaucoup les couleurs tranchantes, et il n'est pas Précisément un gourmet en matière de langage》（l. c. , p. 530）.

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给他的上司解闷,所以在巴黎读者面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残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余圣王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绘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后的志愿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引文时说:

“可见,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缔造德国统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甚至让法兰西帝国来促成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那是最合适的。也许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出卖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议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们也必热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①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馆党之间宣传必须以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

① 《On le voit, M. Vogt se souciait peu d'où vint le secours en faveur de l'unité allemande, pourvu qu'il vînt; l'empire français lui semblait même singulièrement propre à hâter le dénouement qu'il désire. Peut-être en cela M. Vogt faisait-il bon marché de ses antécédents, et il dut paraître étrange, à ses anciens collègues qui siégeaient avec lui à l'extrême gauche dans le Parlement de Francfort de voir ce fougueux antagoniste de tout pouvoir unique, ce fervent zélateur de l'anarchie manifester de si vives sympathies envers le souverain qui l'a vaincu en France》(I, c, p. 518).

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值了，他供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缔造德国统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贵了，“朋友”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 (de bon marché) 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无论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他甚至向日内瓦当局报告过革命的阴谋哩”，这同爱德毕·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纳先生和拉·格隆尼埃尔所“报告”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 penny-a-liner (不值钱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拢牙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这样，达·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西蒙、归属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绞死的人物。请问：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地的信念，就是收买。”（“主要著作”第 217 页）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给福格特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像支付方

式那样花样繁多。

谁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⁵⁴⁶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里迫使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或者，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的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因此，“同185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同时”，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领导人）的事业中也发生了转变；谨慎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勋，赠给他巨额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成现金。一些彼此不相识的知道内幕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在某种程度上担任着尼翁（在瓦得）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地产（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尼亚^①购买的原属于一位寡妇的一所府邸）的总监督，报酬相当优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转变”后很长时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在1860年初向普·勃·勃·先生（住在伦敦芬切尔奇街78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项，这笔款项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贿赂而是当做预支从巴黎中央金库领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所说的下面的话：

^① 马克思指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编者注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钱,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将努力谋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在的钱,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主要著作”第 226 页),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Nugaris, cum tibi, Calve,

Pinguis aqualiculus propenso sesquipedale extet》。^①

真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现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现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纯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 182 页)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谈到的事实那样纯洁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传的、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谋害别人和毁了自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人们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① “你写的全是胡言乱语,秃子,
而且搭拉着你那鼓得过头的肚子”。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Swerc niht geloubt, der sündet》（“谁不信仰，谁就有罪”）^①；或者像一支现代歌曲中所唱的：“谁不相信，谁就胡涂”。

①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巴齐法尔”第9册。——编者注

十 庇护人和同谋者

Principibus placuisse viris non
ultima laus est.

(博取权贵的欢心，并非无上的荣誉。)^①

作为自己《good behaviour》(“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拉普卡”，他都可以把他们“自豪地称之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 213 页)。

我称他们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1849 年 7 月 2 日)之后，戈尔盖违抗匈牙利政府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说：“如果有一位精力充沛的人物领导政府，那末，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说，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等等”⁵⁴⁷第 125、126 页)

^① 贺雷四“书信集”第 2 册第十七封信。——编者注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对他的蓄谋叛变，是盖昂将军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见戴维·乌尔卡尔特“居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者访问记”）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得发表的一篇漂亮的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那他会亲手杀死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现这次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当他同几个人布置反对戈尔盖的可怜的计划的时候，他同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尊敬谈起他，甚至于给他本人写措辞极为温和的信。当眼见只有推翻一个危险人物才能拯救祖国时，怎么能够在企图用颤抖的手把他收拾掉的同时，又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给对方招来追随者和崇拜者，甚至把全部权力都交到对方手里呢？也许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时而赞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戈尔盖却比他彻底和坚决地在实现他那阴险的计划。”（泰·拉品斯基，同上，第163—164页）

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腊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上帝作为对我国人民的惩罚而使我们在战争中失利后，我们对联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继续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得胜利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已无可挽救地毁灭，——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适当地利用”科苏特托付给他的权力，“向上帝负起拯救”匈牙利的“责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得太少。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板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到达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转束的：

“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但是，他当做祭品献到祖国祭坛上的，送到戈尔盖手里的，只是执政者的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居塔希亚，这位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执政者阁下得到了帕麦斯顿提交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⁵⁴⁸。他在给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他确信，“俄国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细，甚至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 dear Hungary (亲爱的匈牙利)。^①不过当他在南安普顿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palmerston, 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 (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拘期满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踏上英国的领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人们都认为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不相容的。匈牙利没有理由也不希望同这些学说有任何瓜葛，原因极为简单：在匈牙利没有它们存在的条件和丝毫理由。”(请把这番话同马赛通信比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就改变一次他

① 科苏特当时不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视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骗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How could a man of any intellect for a single moment believe that the Minister who allowed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would give the word of attack against her?》[“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一霎时的相信——，一位曾经听任俄国干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1850年12月17日发自居塔希亚的信。“科苏特通信集”。)

的信条。卡季米尔·鲍蒂扬尼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他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 bévues (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容忍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隐瞒的一切，一句话，使我对这个人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的一切决定了我这样做……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顿、威兹比奇或伦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他人忘记他在马赛说过的话。在‘年轻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因为，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毫无节操的 (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了下去，因此他 sans gêne (满不在乎地) 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弟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名字来掩饰自己……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 (a most undeserving heart) 滥加尊敬，你们将因而感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表示**赞成**奴隶制，他那巡回演出遗留下来的，除了异乎寻常的失望和三百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这段奇特的轶事不说，我只想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的流亡者，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包括法国在内（不仅不包括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包括法国，甚至不包括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到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形迹可疑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同路易·波拿巴接触。（见1852年9月28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该报的声明⁵⁴⁹）

1853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⁵⁵⁰，这座城市到处

张贴了致驻当地的匈牙利军队的告示，号召他们参加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维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的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的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赞同下才张贴的。马志尼认为，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马志尼起初想用**一个更忠实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部的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宽宥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宏大量地没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就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的统治权，土耳其就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土耳其对世界自由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他在1851年2月15日写给土耳其宰相**施德-帕沙**的信里，他的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热烈了。他夸夸其谈地表示愿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写信给**戴·乌尔卡尔特**说：

“您是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同意维护我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由于幸运，我甚至想说由于天意使我在得到的地位，都应当能够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克罗谢**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

建议作为土耳其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请求克罗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项。

他在这封信里说道:“我憎恨并蔑视制造革命的伎俩”(《I hate and despise the artifice of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乌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吐露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东方的瑞士”,同时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⁵⁵¹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进行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1853年底就把他于1852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进行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罗谢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的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约翰·班迪亚**上校^①带着他全力的

① 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图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式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的秘密首长,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门路通向为各国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把它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⁵⁵²。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了住在巴黎的一位匈牙利人,以及班迪亚之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解开时,我便于1853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⁵⁵³。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一封辩护信中,班迪亚说,我把他看成间谍是最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一直(这也是事实)避免同我谈论有关我党内部的问题。尽

推荐信到那里去。

1858年1月20日,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迭尔比进行了审讯。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约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犯有背叛国家和私通敌人(俄国将军菲力浦逊)之罪”,一致判决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军事法庭的供认里还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指挥……”

- ② 管科苏特和他的追随者当时没有同班迪亚断绝往来,然而,我在“刑法报”上的揭发毕竟对他后来在伦敦的行动有所不便,因而,他就更加乐于抓住东方的混乱提供给他的机会,以便在另一个天地中施展他的天才。巴黎和约(1856年)缔结后不久,我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以约翰·班迪亚知名的一个基督教徒,同一些波兰流亡者从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切尔克西亚,他在那里是塞弗尔-帕沙的总参谋长并且似乎成了切尔克斯人的“西蒙·玻利瓦尔”。我在伦敦“自由新闻”上点出了这位解放者的历史⁵⁵⁴,这家报纸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大销路。如正文所指出的,1858年1月20日,班迪亚因图谋叛变切尔克西亚,由泰·拉品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军团的军事法庭在阿迭尔比判决死刑。由于班迪亚是土耳其的上校,塞弗尔-帕沙认为执行这一判决同对土耳其政府的尊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把这个罪犯送往特拉比曾德,不久以后,罪犯从该地获释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在为班迪亚热情辩护,攻击波兰人。由于俄国大使馆的保护,班迪亚没有受到土耳其政府御前会议(而且它还得把他当做“上校”和他的妻妾一起加以供养)的追究,由于他的同胞们对波兰人所持的偏见给他的保障,他极为冷静地在“君士坦丁堡报”⁵⁵⁵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辩护书。然而很快来了一个切尔克西亚代表团,把这出戏收了场。匈牙利流亡者正式抛弃了他们的被保护者,尽管是是 *de très mauvaise grâce* (非常不乐意)。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全部公文,其中包括班迪亚的自供和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交换的文件,都由那里的波兰流亡者寄到了伦敦,并摘要登载在伦敦的“自由新闻”(1858年5月)上。我还将这些文件更为详细地发表在1858年6月16日“纽约论坛报”⁵⁵⁶上。

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必须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给他明确指定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共同行动。

他说:“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那方面去。在远征队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1857年2月中),我接到了科苏特的来信和指示,他赞同我的行动计划。”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国将军菲力浦逊的信件,他的叛卖活动被发觉了。

班迪亚说:“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一位俄国将军建立联系,我很久都不敢这样做,但是,最后我接到了非常明确的 ordres(命令),使我不敢再犹豫不决。”

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审讯,特别是班迪亚的自供,在君士坦丁堡、伦敦和纽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一再坚持(而且匈牙利人也是如此)要科苏特公开解释,但是毫无结果。直到现在,他对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的使命一事,仍然怯懦地保持沉默。

1858年秋,科苏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到处演讲,廉价兜售他

那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⁵⁵⁷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张。他要英国人提防他称为俄国的秘密盟友的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计谋，那时他是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1858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时，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肯定说，早就属于罗亚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同普隆-普隆拟定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公开辩论。普隆-普隆十分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的大门。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忙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要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3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把这位前统治者带进了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的救星。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因此普隆-普隆只得代他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赞许不已。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对此的答复，前统治者极其庄重地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念，同时肯定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和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他才不得不参加了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

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拍卖王位的公认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对他国外的言论经常稍加注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闭塞的容克地主谈论他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①

科苏特放弃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给他 30 万弗罗伦皇室费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外表；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渴望成立一个宫廷奸党；到了外国却顽固地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像一位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议付给他 300 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得到 5 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项，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一种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传奇式的敏感是绝不相互排斥的。要知道，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科苏特就已明智地想到——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不领取科苏特纸币，而要银币或奥地利钞票。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

① 这种事情为众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加这次会晤的至少有两方民的饶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伦敦逗留期间（1859 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经公布了这些事实。

争取中立的运动,使得比内阁的所谓“亲奥地利倾向”中立化。众所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地完成了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所进行的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的巡回讲演,同他在 1858 年秋天的英国——苏格兰的巡回讲演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the standing menace to England》(“对英国的经常威胁”)。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 1852 年底起就相继离开了科苏特。由于有了靠法国的帮助进攻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希望,大多数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判,并不缺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可以把大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去都灵的一笔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服(一套少校军装价值达 150 英镑),最后是预支 6 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发一年的军饷。但是,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卡)10000 法郎,将军 6000 法郎,准将 5000 法郎,中校 4000 法郎,少校 3000 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有士兵,而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此发出沉痛的怨言。

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已经提过的,立即拒绝参加,并公开作了声明。克拉普卡不顾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坚持在阜姆登陆,但是科苏特却将匈牙利流亡者军团留在剧院经理所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消息刚一传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交给奥地利,就费尽心机,背着他的军队,偷偷地跑到日内瓦。在当

时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也无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那样招来那么多憎恨。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使得对他的批评略为平静。科苏特在回到伦敦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他的驯服的大象——格拉斯哥的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动人的言词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请求给他的信都寄到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弗·普尔斯基的寓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卤,建议科苏特——如果他愿意的话——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他确信,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或者他无话为自己辩护时,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就做太阳一样,他也有亏蚀的时候。他新近给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靠山”。

像十八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个每次都从新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的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他的新奇思想的创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钢丝上跳舞,而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诗人的思想不稳定必然要表现为行动上的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只不过是迪奥修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

的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将军**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一。他同1859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①。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用“朋友”克拉普卡来作“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在选择朋友方面并不具有特殊的才干。**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的密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服务，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什么。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⁵⁶⁰，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参谋军官当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惧……这些衣领绣金的洒了香水的先生们，

① 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的这种立场，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的著作里发现了相同的情绪时，我却感到惊奇和不安，因此我坦率地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告诉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⁵⁵⁸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并且有十分重要的根据使他宣称：匈牙利人得到维也纳给的东西后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在赞助或反对奥地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匈牙利的干涉；最后，给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以及伏伊伏迪纳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1848—1849年那样，使维也纳内阁获得这些“民族”的协助来反对马扎尔人。这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in usum delphin》⁵⁵⁹残缺不全的维也纳版的匈牙利宪法，才能这样说。

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 3 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尽方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各种借口脱离主力部队，以便躲进舒适而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正是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描绘出一片内部混乱、骚动等等的恐怖景象，以便只要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地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个革命中的全部意图就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往往在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为欺诈和蒙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概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要比他们补充金库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塞内存有足够一整年用的食物，其中有极大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邻近的村庄；相反地，从周围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燕麦，尽管他们请求收购这些饲料，然而无人理睬，可是几星期之后，哥萨克人的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们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饲料。要塞中的大部分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饲料不足的借口下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许不知道，鲜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开始霉烂为借口被卖掉；这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多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的包围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弃他所想到的任何一个好念头；他周围的那些先生们所关切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 202—206 页）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⁵⁶¹都同样确凿地说明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的意志，并且按他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货和懦夫的恣意行事，那末，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灿然一闪。”（同上，第 209 页）

8 月 3 日，克拉普卡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腊

布，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腊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的一封信和后者缴械投降的消息。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结，然后满不在乎地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部队进行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地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绝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说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但是，——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不会拒绝我们提出的两星期的停战，因为这是我仁慈的皇帝陛下向您请求的。这一席话像烈性毒药似地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劝说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得到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番巧妙的恭维，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从此，科莫恩的陷落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星期内从要塞中运走足够一整年用的军粮。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从发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多瑙河的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在工事里和城内游手好闲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国军团从未发起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作战并且只有19000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警探活动上面，因为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军官们的。

拉品斯基说道：“最后，只要谈到奥地利人就有危险，因为那可能被捕。”

9月27日,终于投降了。

“如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那个国家的绝望的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软弱无力的奥地利,那末可以说,投降的条件是分外可怜的。”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是,不论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还定得非常匆忙,因而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瑙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末,克拉普卡就更不能供给他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詹姆斯·法济——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宫廷丑角福格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①)对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因此,我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教皇至上派”的那种伪善的恐惧。例如,他使德国只能进行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向路易·波拿巴伸手,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的支配,而且“老实说,宁愿再一次处在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52页)。他用清教徒的难听的鼻音愤懑地号叫,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怪”(同上,第120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老杜班在波拿巴参议院里所透露的

^① 见本卷第443—447页。——编者注

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从属于耶稣会的联合会、协会和各种各样的团体比在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下数目大为增多;十二月政变帝国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废除了政府机构在 1789 年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所加的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的波拿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的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的多年联合的基础上的。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 *crème* (精华) 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了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怪”结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内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议员。这就是要预先说明的。

“1860 年 7 月 2 日于巴黎

莱朋友: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经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 *species* (类型) 的政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 *tours de force* (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 *Salto*

mortale (翻筋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 non plus ultra (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承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 à discrétion (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

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约·菲利浦·贝克尔”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莱：

那么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断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识和他的内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法济是在诺依维特的一所兄弟会教徒的学院里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 65 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用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一切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都非常谙熟。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是煽动分子。他的主要的国务准则和格言是 *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⁵⁶²。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创办一点东西的地方插上一手，不去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筹办的 *Banque de Crédit et d'Échange*（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末，他的准则和格言倒并不是那么糟糕的。在 1846 年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是按照“离枪声远的兵活得长”这句格言行事的，因而，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伯特·加累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尽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而且告诉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逃出日内瓦。加累尔是一个事业心很重，从不计较个人名誉的人，他——至少在当时——坚信法济对人民真心热爱，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累尔怎么也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即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议，而且得到了国家公文翻译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⁵⁶³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的词藻，在报刊和讲坛上大肆宣传经过伪装的他的真正的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至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奸诈。1847 年底，反宗得崩德的战争刚一结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军事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因此只有我一人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的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说：“嘿，这个装

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政府首脑奥克辛本将军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着较好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狭隘的倾向，即保证重要的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无任何权力，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不愿顺从并尽可能给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组织西西里军团，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迫害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该地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织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法济先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可以把任何人轻易地当做牺牲品，即使法律是在牺牲者那一边。后来有一件事使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委员凯伦博士和特罗格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借口人道主义，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无情地迫害那些与加累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累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可恶的，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这就是法济天真地举出的要驱逐他的唯一理由。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做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得州。加累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承认错误。可是结果引起一场长时间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声音越大，越装得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说，这场丑戏是在贝尔格旅馆当着一位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的面演出的，而日内瓦政府主席很喜欢在赫尔岑先生那里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遇到的不体面的诽谤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经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主要是想用这话来嘲弄一下加累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累尔在政治问题上同法济是一致的。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

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坚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峙的时候，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而迫不得已地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只要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因为他早已同教皇至上派勾勾搭搭，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毫不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决裂了；我曾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能干的人物，这种习惯看法使我没有这样做。不停的内部分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使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累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坚决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很快便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意识和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1815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萨瓦的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的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同这个‘激进派’——法济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累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迫害并被革职。年轻的民主派还不能像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那样，对即将来临的选举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加累尔和他的朋友还是拒绝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胜利希望寄托于未来。如果法济真诚地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就不会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更有效地恶意诽谤和迫害加累尔，‘激进派的’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种专事诽谤的小报，使他们的英明的统治者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日内瓦评论’了；这种骂街一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报上，就更丰富了，至于这些替罪羊，他是随时都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累尔，经不住这场下流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1852年）死去了，年仅33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说：‘我们善良而高尚的加累尔是我们耶稣会的暴君残酷复仇的牺牲品！’在后一届政府选举中，加累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者表示，只要能推翻法济，在政府中他们只有寥寥数人参加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坚持原则的加累尔，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然法济

不以不体面的教皇至上派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体面的贵族派的尾巴害臊呢？既然法济先生可以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大选（大概是在 1853 年 11 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 1846 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了主席的宝座。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因此，我必须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酒地中挥霍一光，以至满身债务，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就力图尽快地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因此，1856 年有一个苦于债务负担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责人当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五十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要‘感恩的人民’急急地来援助他，在平毁城堡后的空对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帮助平毁了这块地上的城堡，当更有势力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合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合并’那么一小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进行建筑的工人的工资。1855 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对法济破口大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丧失了主席的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到了一件更为倒霉的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 Caisse d'Escompte（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他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坏榜样败坏良风尚——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Caisse d'Escompte 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险中。无论如何，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全部事业就会由于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 caissed'Escompte 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信贷机构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争银行搞到大

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 Caisse d'Escompte 的钱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务的来潮。为了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事成之后：人们担保给法济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酬金，给 Caisse d'Escompte 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是，法济先生抱着这种目的，既 pro domo（为了自己）也为了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 前往巴黎。在这里逗留很多星期之后，传说他在‘圣上’仁慈的支援下，从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大选（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 Caisse d'Escompte 的股东们的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能奏奇效的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一激进派的选民们来说，是一把富有魔力的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非常逼真地把他画成一只庞大的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 5000 万法郎，喝葡萄酒时听人说——带回来 1 亿法郎，喝 extrait d'absynthe（苦艾酒）时又听人说——带回来 2 亿法郎。法济老爹像有一股创造奇迹的力量似的，他的声誉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能够取胜，因而没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不久前组织起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les fruitiers（干酪制造者）——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大选时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就又登上了主席的宝座。

但这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他们也想得到胜利的报酬。有一天，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夫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者的马利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作‘神圣的’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响遍全城，很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从的激进派看来，最忠顺的 fruitiers 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政府主席先生不信任案。他的同僚、政府顾问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却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攻击他的主人和庇护人。但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一贯是这样行事的：他拉下屎，让他的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利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预先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申斥一顿之后，从伯尔尼写信来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宗教自由’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受到奇耻

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格言——这套格言是到处适用的，因而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乐意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就实现了愿望，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 保证他终身分取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同 cercle des étrangers（外国人士）进行着频繁的往来。自皮蒙特认为萨瓦疗养区的“赌场”同他的国家道德不能并存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逃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安置了这样一个赌场。自由万岁！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A llez chezmot et faites votre jeu！（听之任之！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①

您的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谋者。

Peace and goodwill to this fair meeting,
I come not with hostility, but greeting.^②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由弗·察贝尔先生指挥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勒斯劳报”⁵⁶⁴等发表的相应的文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准备了两个纲领，

① 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编者注

② 把和平与美意给在座诸君，
我来不是怀有敌意，而是向你们致敬。

一个是为搞意大利战役准备的,另一个是为搞奥格斯堡战役准备的。究竟是什么迫使弗·察贝尔先生,迫使这位“国民报”的平常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的社论中,第一次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话是:“通往席尔达的路标”⁵⁶⁵。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们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论说:

“柏林‘国民报’是空洞的充实表现。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谈的是关于普鲁士的通告……虽然和但是!能够和愿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鲁士政府希望!每个句子都像苦役犯似的,脚上带着上百斤的大镣,因此非常累赘,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但是’;是有血有肉的 Dr. utriusque juris (两种法律的^①法学博士)。“国民报”谨慎地用基督教德国人的又臭又长的废话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它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政客的空谈——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同 premier Berlin, en grande tenue (柏林的社论,非常出色)……‘国民报’显然是为有思考力的读者出版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通史’一样⁵⁶⁶……法国人对这一类纯粹用文字表现的思维有一种恰当的说法:《Je n’aime pas les épinards et j’en suis bien aise; car si je les aimais, j’en mangerais beaucoup, et je ne peux pas les souffrir》。‘我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得很多,可是我极厌恶菠菜’。‘国民报’希望普鲁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内阁。但是有一个内阁——这是它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的。这是‘国民报’的庇护人对之明确并且有十足信心的唯一的一件事。”

“新莱茵报”第296号这样说:

① 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编者注

“柏林 1849 年 5 月 9 日…… 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萨克森革命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禁。”

不过，害怕是一种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十年当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波普的话的正确性：

Still her old empire to restore she tries,
For born a goddess Dulness never dies^① .

波普的 Dulness 王国和“国民报”的国王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现在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二，正如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②，不过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 Dunc the first (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勒斯劳报”，它现在崇拜霍享索伦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一样。1860 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1860 年 2 月 27 日于布勒斯劳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人民报’上读了作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③‘布勒斯劳报’也登载过像‘国民报’上的同样文章，署名的是该报经常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会议里同德斯特尔一道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

① 她至今还想恢复自己那古老的统治，

Dulness——这位天生的女神永远不会去世。⁵⁶⁷

Dulness 这个字在译文中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比无聊更重，是提高为原则的 ennui [无聊]、死气沉沉、迟钝愚蠢。作为文体上的特点，Dulness 也就是“新莱茵报”称之为“空洞的充实表现”的东西。

② 亚·波普“邓斯之歌”第 1 册。——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765—766 页。——编者注

己的教员职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进行宣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以便把西里西亚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却遭到现任内阁的拒绝，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上届内阁对于他从事私人授课予以默认，现任内阁却把这当做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取得准许，他去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你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上了解到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布勒斯劳俱乐部根据施泰因博士的倡议在丑角行列里又演出了硫磺帮。尽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雷汉、舍姆劳以及他们在立宪主义者中的同伙，还是要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为这类人不让人怀疑他们的爱国心。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整整半年的时间（1855年）是“新奥得报”⁵⁶⁸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外时为之写文章的唯一的一家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头^①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位施泰因曾加以长时雕琢，想把他弄成个半人像。例如，第225号上就这样说：

“科伦 1849年2月16日……关于施泰因先生本人，我们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⁵⁶⁹上对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真正的告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一个同他志同道合的教师，这个人现在是‘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的盟员。协商派议会的所谓民主派，也像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预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将承认钦定宪法。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是：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复选人会议上所坚持的东西。

① 此处和下文均为文字游戏：德文中 Stein（施泰因）是姓，《Stein》是“石头”。——编者注

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的。”⁵⁷⁰

当曼托伊费尔又谪贬 [wegoktroiyert hatte] 钦定议院⁵⁷¹的时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那时，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在“布勒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现在必须承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们还存在，德国的统一就根本不可能。”（“新莱茵报”第290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施韦林却总不愿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掉泪的伤心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喧声”⁵⁷²。这杂志的扉页上的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 penny-a-liner [不值钱的文人] 的象征。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失了自己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一 malheur [不幸] 是在1846年同废除谷物法⁵⁷³一起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去，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不想肯定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扉页上的花饰时作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 penny-a-liner，而天生的 penny-a-liner 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持献给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

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因此，我们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经混进了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1848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⁵⁷⁴发展起来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制造者，金克尔用来制造革命的贷款，一部分就耗费在这上面了；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亲王门下，抱怨大赦，确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来折磨汉堡“自由射手”。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来说，真是来得适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企业的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Quelle horreur！（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他给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5号的“自由射手”（1860年第17—21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的令人难懂的废话。⁵⁷⁵但是，多大的差别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要有客观地理解原材料的最起码的才能，无疑才会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正确地抄录一行半句，都是我们的爱德华·梅因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17号：“现在有人揭穿有家报纸（“总汇报”）……也……得

到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 18 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了作用。”

福格特撒了许多谎，而且毫无顾虑，但是他的辩护人海尔曼已经禁止他援用这种欺骗的说法：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重复”的不是该报刊印的比斯康普的文章。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 167 页）

“自由射手”第 19 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上发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他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霍林格尔那里原来的活字版还没有拆掉。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 19 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人，不理解任何民族。”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手”第 20 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

霍夫当维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以后，泰霍夫就同马克思和他的同盟决裂了。”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奥斯坦德。他大概在伦敦听过有关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位法国人在西头常常抱怨说，英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在他写信时平生只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联合并且参加我的同盟。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老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决裂了。

“自由射手”第 21 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中央工人节），福格特遭到伦敦‘人民报’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日期是——1859年5月14日。（传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中央节是在1859年6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也就是在中央节已经引起（按梅因的说法）“猛烈攻击”很久之后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文选已经够了。毫不奇怪，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读到了其中根本没有的东西之后，还读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内。”（“自由射手”第 17 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从印就的书上正确地抄录两行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贝格读世界史，时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 dissolving views（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贝克的使徒！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

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题目叫做：《A man shot by a dog》（“被狗枪杀的人”）。这篇短评很快就传遍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的射击手”，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伦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该报散布谣言说，该书业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的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莱茵报”发行期间，当我们由于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而整天同我们科伦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伦日报”会在1859年以民族原则的骑士的面貌出现，而那位平凡的约瑟夫·杜蒙先生将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蒙特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神恩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伦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莱茵报”第144号将告诉我们它那时是如何愤怒地攻击奥地利的。

“科伦11月15日（1848年）。当人们获悉奥地利匪徒的一个嗜血成性的奴仆，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议员罗伯特·勃鲁姆的时候，一片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来谈谈两家德国报纸是合乎时宜的。其中一家报纸竭力以稀有的背信弃义来玷辱死者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另一家报纸则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到他走进坟墓。我们所指的就是‘科伦日报’和‘莱茵国民大厅’（vulgo Narrhalle（俗称傻瓜大厅）^①）……‘科伦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日，

① 文字游戏：《Volkshalle》是“国民大厅”，《Narrhalle》是“傻瓜大厅”。——编者注

民主派的兴高采烈的领袖们离开了维也纳；其中有……罗伯特·勃鲁姆。’‘科伦日报’登这则消息时，没有加任何补充，但是，对勃鲁姆的诽谤的话是用黑体字排的，以便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伦日报’干得还要出色。它甚至毫不在乎地转载宫廷奸党的黑黄小报上的文章，转载所有奥地利报纸中最下流的报纸——大公妃索菲娅的机关报上的报道……”以下继续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没有获得声誉……事情是这样：他在大礼堂里说内部敌人是软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说，如果除去这些内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们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军阀取胜而不愿自由取胜，那末，我们同聚集在城下的敌军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也应当全力地指向这些人……在勃鲁姆先生的演说里，充满了九月党人⁵⁷⁶的癫狂；如果勃鲁姆先生说了这些话，那他可就——怨我们直言不讳——大失体面了。’‘科伦日报’就是这样写的。”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弄脏了太晤士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勒维**，不仅对化学是内行，对炼金术也是内行。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di colore oscuro (用黑颜色)写着：《hic…quisquam faxit oletum!》(“此处……随意便溺!”)^①，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W anderer, stop 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②

像哈巴谷一样，**勒维**也是 est capable de tout (无所不能)的。

① 这里套用了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② 拜伦“墓志铭”。——编者注

他能够就某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饮食的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巧妙地作成的，这些细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是高得惊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 *coffre fort* (保险柜，也就是富翁) 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无业的律师很快发现勒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勒维进行诽谤的人无代价地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勒维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报纸上大声诉苦，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敲诈勒索，即控告勒维进行诽谤。自此以后，控告勒维就成为一桩冒险事业。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在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到：*Commit no Nuisance* 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Commit Levy*^①。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 *mobpaper* (黄色小报)”，然而勒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勒维的卖价一辨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而讨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维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齷齪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① 难以翻译的文字游戏，英文动词《to commit》有几种意思，《Commit no Nuisance》是“禁止小便”，《Commit Levy》是“审讯勒维”。——编者注

然而，勒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是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有关道德的攻击，勒维脱出小难而陷入大灾。啊，逻辑！——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逻辑，你的羞郝哪里去了？可不是，这个流氓（the rogue）大概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是什么呢？至少会是地震和出现耀眼的彗星。礼貌！《I thank thee, Jew, 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儿。）^①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勒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修女院。Get thee to a nunnery, Levy!（到修女院去吧^②，勒维！）勒维在一座修女院里！《nunnery》大概是 nonaria 的误植吧^③，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勒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multum gaudere paratus,

Si Cynico barbam petulans nonaria vellat》.

（“由衷地发笑，

如果荡妇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勒维的〉胡子撒娇。”）^④

“每周邮报”断言：勒维 [L_ev_y] 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X》是《U》，但他却把《I》写作《Y》。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马克思把英语中的《nunnery》（修女院），同与它发音相似的拉丁字《nonaria》（荡妇）连在一起。——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④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第一篇。——编者注

22000 个利未人 [Levis]⁵⁷⁷ 中,没有一个人会用《Y》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勒维渴望把自己当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之母已坚决地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径直地写在他的脸上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I》写成《Y》于勒维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位从 promontory of noses (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 finest nose (出色的鼻子)的神秘的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见“特利斯屈兰·善弟”),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谈笑的资料^①,而勒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足够一年谈笑的资料。一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能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束了自己的描写:

Ο τὸν ἄρ' ἔρ' ἠσ' ἔρ'
ἔρ' ②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猜到,勒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And'tis a miracle we may suppose,
No nastiness offends his skilful nose》. ③

① 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 and 见解”第4卷,“斯洛肯贝尔吉的故事”一篇。——编者注

② 卡斯托尔有一个万能的工具,他的鼻子能干各种家务事。

③ 任何臭气都无损于他那灵敏的鼻子,谁能认为这不是个奇迹。

实际上，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勒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劳斯之歌”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勒维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简单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orm an occassional correspondent·Frankfort on the Main, February 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我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勒维报纸的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斯普累河流域某城的另一位熟人。回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阿贝尔**。我认为这个名字是一种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英文，这愚弄不了我。如果阿贝尔作为察贝尔，不会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末，察贝尔作为阿贝尔，不会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作通讯员呢？那末，是察贝尔——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比伦 [Babel] 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地把柏林的智慧的报纸同勒维的报纸作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

“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无误。’”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

勒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见，勒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或高级警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⁵⁷⁸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时，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 22 000 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 [A 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 [A bel] 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来愈糊涂了，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以他那种英国式的枯燥的严肃表情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虚构，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的一名热情的奴仆，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厌烦的热情能够说明，为什么勒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伦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勒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 par nobile fratrum (一对高贵的兄弟)^①。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2 卷，第三首讽刺诗。——编者注

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维提供他的货色，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贝尔给勒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艾希特纳赫的游行⁵⁷⁹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No crad more active in the dirty dance,

Downward to climb, and backward to advance》

(Pope). ①

阿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维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才能。例如，“科伦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伦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理 *entre deux cigares* (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间) 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内阁的触角，比方涉及了冯·施莱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一刻也不耽误，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I owe to myself》(“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等。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为斯德哥尔

① “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
就是螃蟹也不能更灵敏地在泥中跳舞”。

[波普“邓斯之歌”第2册]。——编者注

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可以象征性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奇特的施泰恩·盖沙特是福格特的另一个同谋者，名叫路·班贝尔格尔。1848年他曾经是美因兹的一家小报的编辑，现在“全靠供养”过活，通过与巴黎的结缘，成了 loup garou（能千变万化的人）的亲戚和“最简单意义上的”波拿巴民主主义者。为了了解这个“简单的意义”，必须知道巴黎交易所的犹太教堂的暗语。施泰恩·盖沙特的“简单的”民主，也就是伊萨克·贝列拉称之为《la démocratisation du drédit》，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赌窟，以便对它 en masse（大量地）进行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民族财富，那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 fish（鱼）。他们同罗马皇帝一起高呼：non olet（没有臭味）^①，而同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一起补充说：“群众应当做这件事”。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伟大的“简单”的民主。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最近以“去意大利，好啊！”⁵⁸⁰一书出了名。与此相反，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倾听过这样的

^① 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谈到厕所捐时说的话。——编者注

呼声：“哎哟，离开基尔希海姆博兰登！”这个逃离基尔希海姆博兰登和欺骗过莱茵—普法尔茨志愿军的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勋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灵了，所以他不可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充满鲜血的肮脏的冲积层，对机灵^①的探宝人来说，是含有金子的。于是他到了巴黎，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alias（或者说）亨·伯·奥本海姆）说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十二月政变肮脏的土层上突然露出崇高思想的鲜明色彩的时候，认为1858年“流通”开始“停滞”（见Banque de France（法兰西银行）关于1858—1859年货币流通统计表）的施泰恩·盖沙特高兴开了。既是鲜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解，巴黎的洪水不仅会冲走十二月的土层，而且会冲走他的主要著作的pro，只留下contra^②。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扩大了希腊缪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缪斯，希伯来缪斯——“当代的缪斯”，即他所说的交易所行情表。

现在回过头来谈阿贝尔。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名城的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odor specificus（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同时从二十个不同纬度上写作的事业心使勒维特别感动的时候，勒维便把阿贝尔亲切而爱抚地称做他的《industrious bug》（“勤勉的臭虫”）^③。

-
- ① 文字游戏：Gescheidt（盖沙特）是姓，《gescheit》是“机灵”的意思。——编者注
- ② pro和contra，即赞成和反对，在这里是收入和支出的意思。——编者注
- ③ 波普“邓斯之歌”第1册。——编者注

诗人的正义感已经要求“圆满的人物”在喜剧结尾时不再同阿贝尔一起陷在伦敦的粪堆里，但是，谁会把他从粪堆里拉出来呢？谁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只能是一位肮脏的人，即冯·芬克男爵^①，红色土地^②上的容克地主，笑容骑士，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⁵⁸¹。

如前所述，“新莱茵报”早在1848年就已经透露了福格特和芬克的对立的同一性，而福格特本人在1859年就预感到了这一点，那时他在他的“研究”中写道：

“冯·芬克先生作为新国家自由的宣传者……已完全接近于可笑的领域”（同上，第21页），

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领域。但是，1860年3月1日，芬克公开说到和解，按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说法，他用“硫磺帮来点缀谦虚的普鲁士议会！”大约在这前一年，他曾经向同一个议会推荐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⁵⁸²，由于他没有勒维的鼻子，当然不可能嗅出这本小册子的硫磺味。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扮演意大利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侮辱波兰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要求瓜分德国的时候，这两个彼此敌对的兄弟就永远互相拥抱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同极不可避免地互相排斥。福格特和芬克也同样地长期互相排斥。两人都有夸夸其谈的毛病，因此谁都认为对方不让自己说话。

根据拉尼克尔的证明，福格特是一个大动物学家，芬克也一模一样，他在伊克尔恩养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搭配两名丑角。在卡德龙

① 文字游戏：vincke（芬克）是姓，《Mistfink》是“肮脏的人”。——编者注

② 威斯特伐里亚。——编者注

的剧作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诺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须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费奈迭只适合扮演潘塔隆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挥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他在1848年6月21日的议会会议上这样声明：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会议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托利党人举行庆祝会时，他以**愚人的公爵**身分为宾客们解闷，坐在酒桶上唱道⁵⁸³：

“我当选为愚人的公爵，
为的就是大吃大喝。”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愉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谁也吓唬不了谁，因而，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彼此攻击。福斯泰夫-福格特知道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的价值，vice versa（反之亦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曾经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过法律，他对于罗马的Corpus juris⁵⁸⁴研究较少，因为他认为，红色土地的祖先没有白白把瓦鲁斯打败。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顿法，特别是研究大学生章程，他从各个方面研究它的基础，然后把它取名**法律基础**，使它到处闻名。由于受了这种诡辩地深刻研究大学生章程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脱的某根头发，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骑士和流血之间的不可克服的诡辩障碍，就像新婚床上横在公主和locum tenens（代替者）之间的一把脱鞘的剑一样。这种诡辩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狂热准时出现，它从

1847年联合议会⁵⁸⁵时代的法庭陪审员宾达的惊险的历史开始，直到1860年下院中的普鲁士陆军大臣^①的同样引人注意的历史为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久前有人指责这位容克地主丧失了他的法律基础，那使他受了多大的冤屈。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骗局构成，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律辩论，所以我们的机灵的容克地主在日常的议会实践中就以**木棒章程**去代替它。

有一天，芬克在法兰克福的蛙池中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特骂作“**未来的大臣**”。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记住了这句名言：

“只要搞到一个官衔，
一年中就是老爷”^②，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而且成为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愤愤不平。要知道，在1847年联合议会上，芬克就作为弗伦特党人出来反对内阁，作为贵族代表出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爆发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负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他的对手们都成了现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未来的大臣**”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顺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到圣保罗教党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维茨将军的小丑、捧场者和打手在这里进行活动。

① 罗昂。——编者注

②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4章。——编者注

只要得到上级的赞许，芬克^①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诚的奥地利人。他疯狂地攻击各民族。

“在左面，人们依次热中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现在甚至还有马扎尔人。”（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

三骑士——芬克、利希诺夫斯基和阿尔宁——演奏了音乐三重唱：

母牛放……公牛叫，
驴子唱低音凑热闹，

他们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诣来反对替波兰说话的人（1848年6月5日的会议），使得主席的小铃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维茨由于军事上和地理上的考虑，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1848年8月12日的会议），芬克为了取悦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秘密赞赏，用头顶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的蛙池通过一些决议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记；当德意志民族由于屈辱的马尔摩停战协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这些决议的主要捧场者、红色土地的容克地主喊叫得更为兴高采烈了。为了保证在批准停战协定时有多数人赞同，外交人员和其他旁听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面的席位上。骗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说，重要的不在于谁进行表决，而在于表决什么（1848年9月16日的会议）。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而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谁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① 原文是《Fink》，而不是V incke。Fink是碌鹞、放荡者和色鬼的意思。——编者注

由于不满足于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放肆攻击，他建议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848年6月21日的会议），但是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即要德国议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执行机关既不执行，也不宣布，甚至根本不用理睬议会的这些平民决议。当他的多数派中的一些伙伴，仅仅是为了换换花样，投票赞同帝国执政者——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同外国签定条约时——应俯就事先取得议会的同意的时候，这事使他暴跳如雷（1848年6月27日的会议）。芬克在德国议会中发表了极其激烈的演说，企图迫使人们举行对帝国首相施梅林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们和帝国摄政参与卑鄙的、流血的维也纳背叛 586（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这篇演说驳斥菲沙尔特的诬蔑极为成功：

哦，威斯特伐里亚人的嘴脸，
是多么冷酷的嘴脸！^①

因此，只要在议会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还没有突然出现小德意志⁵⁸⁷的海市蜃楼，我们的容克地主还没有错认为他看到一只腋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内阁大臣的公事包的硕鹑，芬克就会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索伦王朝所大声流露的忠顺，将得到柏林的赏识。1848年6月21日，他不是挤满了人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吗：

“我的选民们派我来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

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编者注

的权利。我一直赞赏一位伟大的选帝侯^①的话，他有一次曾把马尔克^②的居民称做他的最忠诚、最恭顺的臣民。住在马尔克的我们以此为荣。”

马尔克的巴亚尔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战役中从言论转向行动，在这次战役中他赢得了骑士马刺（1848年8月7日和8日的会议）。当布伦坦诺由于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请求大赦，因而在讲台上对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亲王说了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芬克像一头真正忠顺的狗一样狂怒了。他离座冲向布伦坦诺先生，对他高喊：“滚开，流氓！”，并且要把他拉下台来。但是，布伦坦诺站在原地未动。不久，这位容克地主又向他奔去，并且当做挑战书向他投下了骑士的手套（当然，保留进一步成熟地考虑在法律基础上可能产生的困难），布伦坦诺拾起手套接受了挑战说：

“在教堂外面，您想对我说什么，那随您的便；但在这里，您别打扰我，不然，小心吃我耳光。”

这个容克地主在自己积累的词汇中翻腾了一遍，从中又找出几句骂人话来辱骂左翼，直到赖哈德向他喊道：“冯·芬克，您这个恶棍！”（1848年8月7日的会议）。芬克想用直接转入日常事务讨论的办法，来取消关于勃兰登堡内阁和柏林协商派议会之间的冲突的辩论。

他说，“自从弗兰格尔胜利地进入柏林，局势已经平静，证券的价格已经上涨……柏林议会无权发布告人民书，等等。”

协商派刚被驱散，我们的这位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就更加猛烈地攻击他们了。

在1848年12月12日的会议上他喊道：“对共和国来说，我们缺少政治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② 指威斯特伐里亚的马尔克郡。——编者注

的初步教育：前柏林议会的代表们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决议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卑鄙的虚荣心。”

这话引起了风暴，他企图用下面的话来使其平息下去，他说，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骑士般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位小心谨慎的骑士补充说，“他指的不是本议会的成员，而只是已经解散的柏林议会的成员。”

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驱散的协商派的全体战士们发出了挑战。其中的一位听到了这种挑战的声音，竭尽全力做出了一件确实闻所未闻的事情：他迫使这位红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亲自来为爱森纳赫的战场上。当我们的巴亚尔在紧要关头找到了邓斯·司各脱的法律上的诡辩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们的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者^①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执的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铲除。他曾经庄严地宣誓，宁愿像日本的大名⁵⁸⁸那样切腹自戕，也不愿触动这位名叫乔治的、对决斗来说还太年轻^②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圣保罗教堂内，这位顽强的决斗者愈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锁在闵斯德监狱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的人物（1849年1月9日的会议）。如果说他为了迎合上层而曾不嫌繁殖，那末，他在建立小德意志和大普鲁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现的忠诚却达到了顶峰。“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较起来简直太幼稚了。”

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经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 1848 年三

① 圣乔治（胜者乔治）。——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Jung（荣克）是姓，《jung》是“年轻”的意思。——编者注

月事件中的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深感羞愧。行动内阁⁵⁸⁹垮台的时候，芬克有一段时间从圣保罗教堂消失，但他随时都在整装待命。冯·普富尔内阁垮台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由于高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所以穆罕默德决定向高山走去。在某个腐朽的市镇当选后，红色土地的骑士突然以钦定议院议员的身分出现在柏林，迫切希望他在法兰克福的功勋获得奖赏。此外，在不剥夺他的任何非议会自由的戒严中，这位骑士感到非常舒服。当他同钦定议员一起在宫殿前等待白厅接待的时候，柏林居民用嘘声和嘲笑来欢迎他。由于曼托伊费尔曾经小心地向他暗示过，似乎上面——哪怕是到了要留一个大臣的空缺以资奖赏某些功勋——倾向于从法兰克福的“皇帝制造者”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听到这些嘘声和嘲笑就更加高兴。芬克陶醉于这种甜蜜的希望，他企图暂时作为内阁的 dirty boy (清洁工) 以示效劳。他按“十字报”的指示，草拟了一份上国王的奏折，大声疾呼地反对大赦，声明钦定宪法只有在在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他才同意接受，这个条件是这宪法要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重新审查和修订。他辱骂受到戒严之苦的左翼议员等等，同时等待着自己的胜利。

灾难临近了。法兰克福皇帝代表团到了柏林，4月2日(1849年)芬克提出了一项极端效忠皇帝的修正案，就是曼托伊费尔天真地投票赞成的那个修正案。会议一结束，芬克就疯了似的跑进邻近的一家旧货店，要在那里亲自购买一个公事包，红色天鹅绒装饰的、金边黑硬纸面的公事包。第二天早上，这位笑容骑士像孚恩神那样怡然自得，含着胜利的微笑坐在议会中央的他的席位上，但是，突然响起了一阵“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喊声。曼托伊费尔的嘴唇嘲弄地抽搐着，而我们的这位无畏的容克地主却嘴唇发白，

由于内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神色古怪地向他的朋友们暗示：“拦住我吧，否则我要闯祸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许多月来芬克都坚持照该报的指示行事，而该报也把他看做该报的议院奏折草案的教父）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在危险中”的文章，其中说道：

“内阁仍然存在，国王^①在回答苏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说，他们不必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骗的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骑士蹒跚地从柏林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的愚弄比勒维曾经受到的更甚，当然，这种愚弄也只有未来的大臣才会受到的！

红色土地上的辛辛纳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成了普鲁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首领。他因右的论调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论调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无法肯定。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里也把他的角色演得过火了。不久他就成了对内阁来说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以致禁止他再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红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就依然是未来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烦，缔结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条约。福格特非常明显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普隆征服了德国大陆上的第一议会岛巴拉塔利亚，就让醉鬼们^②住到那里去，并且让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原文中用的是 *Sch-Oppenheimer* 这个字，此处是文字游戏：*Oppenheimer*（奥本海姆）是姓，《*Schoppenheimer*》系由《*Schoppen*》（“酒杯”、“ $\frac{1}{4}$ 公升”）而来，这个字可以转意成“醉鬼”、“嗜酒者”。——编者注

他的福斯泰夫作该岛的摄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内阁首相，并把有关决斗的最高裁决权交给他，并且让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①，把他提升到愚人公爵的爵位，最后，他在他管辖的岛屿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的白铁^②上刻铸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普隆的摄政福格特，左面是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题词：

“我和你嘴
靠嘴向我的世纪挑战。”^③

① 见小册子《Auch eine Charakteristik des liberalen Abgeordneten von Vincke und erbauliche des Sprochhövel-Elberfelder Wegbaues》. Hagen, 1849 [“对自由派议员冯·芬克的又一评论和施普罗赫费耳—爱北斐特的道路建筑的有教益的历史”1849年哈根版]。

② 文字游戏：《Blech》意思是“白铁”，也有“胡言乱语”的意思。——编者注

③ 此处讽刺地套用了席勒剧本“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一幕第九场中的话。——编者注

十一 一件诉讼案

1860年1月底,伦敦收到了两号柏林“国民报”,报上有两篇社论,第一篇的标题是“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国民报”第37号),第二篇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国民报”第41号)。弗·察贝尔用这不同的标题发表的两篇社论,不过是福格特的“主要著作”加过工的 in usum delphini⁵⁹⁰的版本。伦敦是在很久以后才得到这一著作的。我决定马上在柏林对弗·察贝尔的诽谤提起诉讼。

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诬蔑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

这一次,情况并不是这样。察贝尔攻击我进行了一系列犯法的和可耻的活动,而且是在那些因怀有党派偏见而轻信荒唐透顶事情的读者面前攻击我的。另一方面,由于我离开德国已有十一年之

^① 法国谚语,直译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编者注

久，这些读者根本缺乏判断我这个人的标准。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为了妻子儿女，我也有责任使察贝尔破坏我名誉的攻击受到法庭审理。

我提起的诉讼方式，一开始就排斥了像福格特反对“总汇报”诉讼案中出现过的那一类错中错的法庭喜剧。即使我异想天开，想在那个因袒护福格特而撤销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法济法庭上去控告福格特，那末有些极端重要的也只能在普鲁士、而不能在日内瓦弄清；相反地，察贝尔提出的唯一论点（他可能在福格特那里为这个论点找到证据），是以一些假文件为根据的，而这类文件，察贝尔在柏林能够像他的朋友福格特在日内瓦一样轻而易举提供出来。我控告察贝尔的“控诉书”包括下列几点：

(1) 察贝尔在 1860 年 1 月 22 日“国民报”第 37 号上的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文章里硬说：

“福格特在 136 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这些同行们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幻想开始不仅迷惑了一些较优秀的流亡者，而且还迷惑了维利希志愿军中的一些工人。他们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的事业，该报在 1849 年曾进行反对参加运动的宣传，并且一贯地攻击所有议员，因为据说运动仅仅是以争取帝国宪法为目的的。**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就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而人们预料这种革命随时都可能重新爆发，因此必须把革命的士兵准备好，以便把他们投入战斗。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中间，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这个人怀疑另一个人是间谍和反动分子，谁也不相信谁。**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

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的一封长信，信中描述了‘无产者’的原则、阴谋、纠纷和勾心斗角的秘密同盟，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为了便于理解下一部分，这里必须指出，察贝尔在上面引证的一段摘录中仿佛是转述了福格特的“报道”，往下他为了更好地说明硫磺帮，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接二连三地抬出了巴黎的舍尔瓦尔案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我写的有关该案件的小册子，李卜克内西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和通过我建立起来的李卜克内西同“总汇报”的关系，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个渠道”，最后还有 1859 年 10 月 20 日比斯康普给“总汇报”的信，然后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

“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表示愿意向该报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件事我们也许下次还会谈到。‘总汇报’的那些通讯员就是这样。”

从第一号整篇社论中，我只把作为第一点加以转载的摘录拿来当做起诉材料，而且只从那里拿来下面这几句：

“（由马克思操纵的）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我在这里当然要察贝尔提出**真证据**，来证明他的论点。我在给

我的律师、柏林的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的第一封信里说，我向察贝尔不是要“几百封恐吓信”，甚至也不是一封信，我只要他哪怕是提供出一行字，能揭发我党的某一个著名同志参与过察贝尔所指的可耻行径。察贝尔不是只要去找一下福格特，就能马上得到成打这样的“恐吓信”吗？万一福格特不能从几百封恐吓信中提供出一行字，那末他总该能说出遭到过上述勒索的几百个“住在祖国的人”的名字。既然这些人是住在“德国”，那末，柏林的法院无论如何要比日内瓦的法院更易于找到他们。

总之，我控告察贝尔，只就他的第一号社论的一点——用在政治上败坏住在德国的人的名誉的办法，来勒索他们的钱。同时，为了反驳他的第一号社论的其余论点，我列举了一些事实。在这里我没有要求真证据，而是引用了假证据。

关于**硫磺帮**或者也就是制刷匠帮的问题，**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已讲得够清楚了。要弄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性质和我同这个同盟的关系，可以把科伦的**亨·毕尔格尔斯**，即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判刑者之一，传到柏林去做证人，要他在法庭上发誓作证。其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一封写于1852年11月的信，这封信的**真实性**可由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证明。我在信里对他谈到了根据我的建议解散同盟一事，也谈到了在解散决议中所列举的理由：自从科伦的被告被捕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这样一个宣传协会在目前根本不合时宜了。至于察贝尔无耻地说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这一点，似乎一部分可由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来证实，一部分可由巴黎的舍尔瓦尔案件来证实。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谈后一案件。关于前一案件，我已把我在1853年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寄给

我的律师，并请他注意：可以把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传到柏林，要他发誓作证，证明我曾参与过揭露警察的下贱勾当。察贝尔断言，好像我和我党同志曾以对“不尊重”我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我对这种断言提出了相反的事实：除了“新奥得报”以外，我从来没有——不论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国外向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寄过通讯。根据我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必要时也可根据该报的编辑之一埃尔斯纳博士的证词，——就能证明，我从来不认为有必要提及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至于谈到“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那末，他给该报撰稿开始于1855年春天，即在同盟解散三年之后，而且我事先一无所知；此外，在这些通讯中——像“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证明的，——对英国政策作了符合他的党的观点的阐明，但是只字未提“民主主义者”。如果李卜克内西在我离开伦敦时给“总汇报”寄去过一份伦敦出现的反对“民主主义者”福格特的传单，那末，他是有充分权利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这份传单的出版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福格特曾亲自邀请他参加他的“民主主义的”宣传，从而，把他看成是跟他本人相等的“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把我变成“‘总汇报’通讯员”的这种可笑的捏造，奥尔格斯先生已在奥格斯堡案件开始前几天写给我的一封信（附录10）中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反驳；顺便说一句，他在这封信中竭力要消除他所想的我对“总汇报”的“自由主义”偏见。最后，察贝尔说“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的谎言也就不驳自倒了，因为比斯康普的信是在1859年10月20日写的，而我根据奥尔格斯的请求转寄“文件”时所附去的短笺，1859年10月24日已经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了，那就是

说,这一短笺不可能是 1859 年 10 月 29 日在伦敦写的。

为了便于法庭审理起见,我认为有必要给我提出的证据补充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将把“民主主义者”察贝尔企图对我在流亡者中间的地位和我在国外的“阴谋”所进行的丑恶而卑劣的诬蔑,奉还诬蔑者。

最初,即从 1843 年底到 1845 年初,我都住在巴黎,一直住到基佐把我驱逐出境。为了说明我居住巴黎期间我在法国革命党内所处的地位,我把**弗洛孔**的一封信寄给了我的辩护人,他以 1848 年临时政府名义取消了基佐把我驱逐出境的命令,并且邀请我从比利时回到法国(附录 14)。从 1845 年初到 1848 年 2 月底,我都住在布鲁塞尔,一直住到罗日埃把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后来,布鲁塞尔市政当局把因驱逐我出境而逮捕我和我的妻子的那个警官撤职。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国际民主协会⁵⁹¹,协会的名誉主席是从荷兰人手里救出了安特卫普的一位年老的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担任过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一位律师**若特兰**;波兰人的副主席是前任波兰临时政府委员**列列韦尔**;法国人的副主席是 1848 年二月革命以后成了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的**安贝尔**;德国人的副主席则是我,我是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和全体德国流亡者参加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被选上这个职位的。若特兰(若特兰属于所谓的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也就是我不熟悉的派别)在“新莱茵报”创办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和我的朋友列列韦尔写的无关紧要的短笺,都足以说明我在布鲁塞尔民主派中间的地位。因此,我把它们都附在辩护文件里(附录 14)。

1849 年春我被赶出普鲁士,1849 年夏末被赶出法国,随后我到了伦敦,在那里,在同盟解散(1852 年)和我的多数朋友都离开

伦敦以后，我脱离了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团体，甚至脱离了一切交际活动，虽然——经“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许可——还经常向一部分优秀工人作政治经济学的义务讲演。我是在1850年9月15日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它在1860年2月6日庆祝成立二十周年；我被邀请参加这次庆祝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福格特的下列说法“痛斥为”一种“诽谤”，因为他硬说我“剥削”德国工人，特别是“剥削”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当时担任工人协会主席的弥勒先生，1860年3月1日曾请弯街治安法庭证明这项决议真实无误。除了这一文件以外，我还给我的律师寄去英国律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一封信（附录14），他在信里对“国民报”上的《infamous articles》（卑鄙龌龊的文章）表示愤慨（厄内斯特·琼斯是在柏林出生和受教育的，他比察贝尔更懂得德文），同时他还顺便提起我多年给宪章派在伦敦出版的一些机关报无酬撰稿一事。我在这里也不妨提一下，当工人议会⁵⁹²1853年底在曼彻斯特开会时，伦敦的流亡者当中只有路易·勃朗和我收到了作为名誉会员出席会议的邀请书。

最后，因为正直的福格特确信，我是靠“工人的血汗过活”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工人的一个生丁，或者向他们索取过一个生丁），因为“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硬说我在政治上“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所以我请求“纽约论坛报”——这是第一流的美国的英文报纸，它有20万订户，因而它几乎同俾尔“推销员”或察贝尔的“民主派机关报”一样畅销，——的managing editor（主编）查理·安·德纳先生，要求他对我十年来给“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书”等等有酬撰稿一事提出书面证明。他写给我的那封满纸赞扬的信（见附

录 14), 是我认为必须把它寄给我的律师以回击福格特—察贝尔的第一号臭气弹的最后一个文件。

(2) 我们在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中读到:

“天知道, 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人民报”)弄到钱: 人们知道, 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一段话孤立起来看, 可以看成是惊奇的真诚流露, 就如我说: “有一个胖子, 我在柏林念大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已经堕落了蠢材——他办过一家孤儿院, 他在1848年革命以前的创作活动仅限于给一个小地方的文学小报写过几篇匿名文章——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编、股东和‘有多余的钱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晓得。而读过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⁵⁹³和研究过曼托伊费尔时代的那些人是能领会这一点的。”

但是, 察贝尔的上一段文字, 是在他说我同法国和德国的秘密警察有联系, 说我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而写了许多恐吓信以进行勒索的一段文字之后写的, 并且它把那一段文字同我给法庭的控诉书的第三点中提到的“大量制造假钞票”这句话直接衔接起来, 因而他的那段话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恶毒的含义。那就是在毫不掩饰地暗示说, 我是用了某种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从曼彻斯特得到的1860年3月3日的 affidavit, 可以用来在法庭上驳斥察贝尔。这一 affidavit 中说, 由我转交给“人民报”的全部钱——除了我自己付出的几笔钱以外——都不像福格特所说的是“从拉芒什海峡彼岸”弄到的, 而是从曼彻斯特, 从我的朋友们的腰包弄到的(见“奥格斯堡战役”)。

(3) “为了说明”“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

略”，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等等。”

察贝尔就这样把福格特的关于舍尔瓦尔的冒险事件的说法加以改造，把我变成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道义上的祸首和有罪的同谋者。我所掌握的可以用来驳斥“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种说法的证明材料，包括了从舍尔瓦尔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他在1854年逃出日内瓦的整个时期。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 affidavit，证明舍尔瓦尔是先于我加入伦敦的同盟的，他从1850年夏到1852年春都住在巴黎，他在巴黎不是同我有联系，而是同我所敌视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反同盟有联系的；在他假逃出圣伯拉惹监狱和重返伦敦（1852年春）以后，参加了当时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从1850年9月起就已不再属于该协会），一直到他在那里终于被揭发、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并被开除为止。其次，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能够发誓作证，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对舍尔瓦尔所进行的揭露，即揭露他同伦敦的普鲁士警察有联系等等，是由我发起的。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证明，我在案件结束以后公开地揭露了他。最后，约·菲利浦·贝克尔的信提供了有关舍尔瓦尔在日内瓦生活时期的材料。

（4）“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以大笨蛋的逻辑，对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胡讲了一大堆废话，并且拚命散布流言蜚语，使人怀疑我寄给“总汇报”的费格勒所提出的关于该传单来源的证词的可靠性之后，结尾这样说：

“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

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等等。”

察贝尔在这里攻击我，说我用布林德的名义伪造了文件，即传单“警告”，说我后来寄给“总汇报”一份假证词，把布林德说成是我所伪造的传单的作者。从司法上对“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些攻击加以反驳，既是致命的又是简单的。这些反驳就是上引的布林德致李卜克内西的信、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维耶和费格勒的两份 affidavits (附录 12 和 13) 以及印出来的医学博士沙伊伯勒的声明。

大家知道，在“研究”里嘲笑巴伐利亚政府的这位福格特，在 1859 年 8 月底对“总汇报”提起诉讼。“总汇报”在 9 月就已设法使法庭对案件的审讯延期，然而，尽管予以延期，案件仍然在 1859 年 10 月 24 日审理了。如果在黑暗的王国巴伐利亚发生这类事，那末什么事不会在光明的王国普鲁士发生呢，“柏林有的是法官”这句谚语当然更不用提了。

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是这样草拟我的法庭控诉书的：

“‘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在登载在本年该报第 37 号和第 41 号的社论里，一再公开地诽谤我，并且特别攻击我：(1) 竟说我现在和过去都用不名誉的和犯罪的办法弄钱；(2) 竟说我伪造匿名传单‘警告’，并且不仅明明违背事实对‘总汇报’说某位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且企图用一个似乎我相信其内容虚假的文件来为此作证。”

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起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就是说，他

把察贝尔的诽谤通知检察官，要当局对察贝尔提出追究。1860年4月18日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

王国市法院检察官

签名：利佩

4月18日于柏林”

我的律师向检察长上诉，1860年4月26日上诉法院作出了第二个“决定”，内云：

“致王国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在此地的受托人。兹退回您今年4月20日控告察贝尔博士进行诽谤的控诉书以及附带的一些文件，并说明：毫无疑问，检察官在行使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所授予的自行决定权时，他所遵循的唯一考虑是：是否有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使之有必要进行追究。我在本案中必须与王国检察官一致地对这个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因此我不接受您的控诉书。

王国上诉法院检察长

签名：施瓦尔克

1860年4月26日于柏林”

我认为检察官利佩和检察长施瓦尔克的这两个驳回，是完全合理的。在世界各国，即是说也包括普鲁士国家，所谓的公众利益也就是政府利益。普鲁士政府，在追究“民主主义者”察贝尔对我进行诽谤一事上，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倒是在相反的方面。加之，检察官没有法官的那种表示自己意见的权利；他必须盲目地服从——甚至违反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他的上司的命令，归根到底是司法大臣的命令。因

此,我事实上是完全同意利佩和施瓦尔克两位先生所作的决定的,但是我怀疑利佩援引 1851 年 4 月 14 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在法律上是否正确。没有一条普鲁士立法责成检察机关要说明理由:为什么它不使用它的进行追究的权利。而且在利佩援引的第十六条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援引它呢?

于是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诉,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来进行自卫。现在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出现。只要能使弗·察贝尔受到公开审判,至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我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当我得知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诉,而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时,请想一想我是感到多么惊讶啊!

根据普鲁士的审判程序,任何一个原告在法官办理控告以前,即在对实际宣判进行准备以前,都必须向法官陈述自己的案件,使他深信你是有起诉权的;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感到很惊奇。在预先审查案情时,法官可以要求提出新的证据,或者不接受一部分旧的证据,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起诉权。如果法官愿意承认有起诉权,那末他就办理起诉,开始辩论的程序,而案件将由作出的判决解决。如果法官否定起诉权,那末他就简单地 per decretum (用命令)、用决定的方式来驳回原告。这种诉讼程序不仅是诽谤诉讼所固有的,而且是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诽谤诉讼也像其他一切民事诉讼一样,由各审级用这类官方的决定驳回,也就是说,永远不予审理。

应当承认,不承认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诉权的法律,也就破坏了市民社会的最起码的根本法。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

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站在私人 and 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门之间，并随心所欲地把门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譬如说，站在控诉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讯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诉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自己的预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负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乙在报刊上公开地诽谤甲，而司法官员也许悄悄地“作出决定”，认为甲无权对乙提出控告。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诉讼程序，就是在纯粹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也会闹出什么样的怪事来。至于各个政党在报刊上相互攻击时所进行的诽谤，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普鲁士，法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要知道，甚至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之一哥采博士先生也曾在普鲁士贵族院说，1848年、1849年和1850年的内乱，使普鲁士的法学陷于混乱状态，需要一些时间来为之确定方针。谁能担保哥采博士没有算错确定方针所需要的时间呢？在普鲁士，起诉权——例如对诽谤者的起诉权——是以一个官员的预先“决定”为转移的，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谓的“违反职责”（见1849年7月10日暂行条例和1851年5月7日惩戒法）而受到政府惩罚，即予以警告、罚款、强迫调任他职或者甚至带有侮辱性地撤销其司法

职务。这样的事，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就是要他们大致相信，也是很难的！

问题是，我打算发表一本关于我 contra (反对) 弗·察贝尔的 casus (诉讼案件) 的英文小册子。艾德门·阿布在写他的“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时，如能向他指出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内，除了受 Code Napoléon “恩施的”莱茵省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起诉讼权，他会不惜付出一切！⁵⁹⁴人们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国家里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我向普鲁士法院对察贝尔提出的诉讼，必然暗中变成我因察贝尔而同普鲁士法院打官司了。但是，且撇开立法在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词句不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在应用中的实际妙处。

1860年6月8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关于1860年6月5日马克思控告察贝尔进行侮辱的决定

1860年第三十八号案件

(1) 起诉因缺乏犯罪构成而予以驳回，因为此间‘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只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态度和匿名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而两篇社论中所包含的言论和论断，既然是作者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末它们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因而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四条的规定，不能认为是应受惩罚的，因为不论从这些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或者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侮辱的意图。

王国市法院刑事庭

处理侮辱案件问题第一委员会 L. S. ①

1860年6月8日于柏林”

① loco sigilli——盖章。——编者注

于是，市法院就禁止我对弗·察贝尔起诉，并且使察贝尔从而摆脱了他要对自己的公开诽谤负责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缺乏犯罪构成”。检察机关拒绝为我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任何明显的公众利益。而市法院禁止我自己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犯罪构成。为什么没有犯罪构成呢？

首先，“因为‘国民报’的两篇社论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因为察贝尔事先无中生有地把我变成了“‘总汇报’的通讯员”，所以他也有权把我变成他同“总汇报”的带有竞争性的狗打架中的替罪羊，而我甚至无权对权大无边的察贝尔的这一“决定”提出控告！硫磺帮，制刷匠帮，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日内瓦制造假钞票，“莱茵报”的事业，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察贝尔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当然没有！这位好心肠的小子只有想用谎言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杀害我的意图。

如果“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国民报”上说大量制造伪币，说我以第三者的名义伪造文件，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用揭发来勒索他们的钱等等，——那末，从法律上讲，察贝尔这时的目的只能是二者居其一：不是诽谤我就是揭发我。如果是前者，察贝尔就应受到法庭的惩罚；如果是后者，他就有责任在法庭上证明他的话有凭有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其他主观意图同我有什么相干呢？

察贝尔进行诽谤，但“没有侮辱的意图”，他想像一位土耳其人一样破坏我的名誉：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但没有

使他感到疼痛的意图。

察贝尔“侮辱的”特殊“意图”，——仅仅根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诽谤性地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卑鄙齷齪行为来说，就可证明“侮辱”和“侮辱的意图”，——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的恶毒的意图，从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社论的字里行间全部流露出来了。

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连同附录在内，不下 278 页。而习惯于《to draw out the thread of his verbosity finer than the staple of his argument》（“胡讲比说理更高明”）^①的弗·察贝尔，废话连篇的弗·察贝尔，愚蠢的察贝尔，居然能把这 278 页压缩成报纸上的五栏文字，而没有漏掉福格特对我和我党的任何一点诽谤。弗·察贝尔把该书最肮脏的部分编成文选，从不太刺鼻的部分中作出内容摘要。弗·察贝尔习惯于把两个毫无价值的思想——molecules（分子）拉长到 278 页，现在把 278 页压缩成两篇社论，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没有丢掉一个卑鄙的原子。Ira facit poetam（愤怒出诗人）^②。要把察贝尔患水肿病的脑袋像变魔术一般变成具有如此巨大压力的水压机，需要多少愤恨啊！

另一方面，愤恨使他的眼睛发黑，因而他只要能再增加一点卑鄙的诋毁，就不惜把一种神奇的力量，真正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从描述由我操纵的硫磺帮开始，并顺利地把我和我党同志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同时，他还说，“这些人”痛恨福格特，因为福格特同他们相反，经常地拯救瑞士，然后，他继续写道：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当福格特去年对‘总汇报’提起诉讼的时候，该报曾收到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的一封信……写信人竟无耻透顶地自己提议愿做像李卜克内西先生一样的第二个通讯员。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表示愿意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关于这个（指文件，证据还是福格特？），我们也许下次还要谈到。”

察贝尔是1月22日许下这个诺言的，他1月25日在“国民报”第41号上就兑现了，在那里，他这样写道：

“因此，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10月24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说他是传单的作者……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马克思于10月29日写信给‘总汇报’。”

由此可见，弗·察贝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初是在1月22日，后来是在1月25日，即在经过了三天考虑之后，——把一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使我有可能1859年10月29日在伦敦写了一封信，而它在1859年10月24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而且，这两次他把这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都是为了要说我寄给“总汇报”的“文件”同比斯康普致“总汇报”的不光彩的信之间有联系，为了把我的信说成是比斯康普的那封信的 *pedisequus*（续篇）。除了愤恨、咬牙切齿的愤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位弗·察贝尔变成能够相信奇迹的、愚蠢无比的大傻瓜呢？

但是，市法院“继续辩护”说，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只以匿名的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作为对象？应该说是借口。

艾塞勒·柏塞勒，这一次以“祖国之友”这一名义为掩护，看来在1859年11月寄给民族联盟一封“公开信”⁵⁹⁵，反动的“新汉诺威报”转载了这封信。“公开信”超出了察贝尔的“民主”的尺度，这种民主用对霍亨索伦王朝表现的卑躬屈节来同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

表现的狮子般勇猛相平衡。“公开信”使“新普鲁士报”有机会作出了决不是独创的发现：如果民主一旦开始，它完全不一定就在弗·察贝尔身上和他的“民主派机关报”上了结。察贝尔大动肝火，写了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察贝尔说道：“在我们邀请‘十字报’同我们一起根据福格特所指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来审阅传单（“警告”）的产生经过时，我们希望该报最终承认：当我们在两个月以前说给民族联盟的公开信适用于该报而不适用于我们，写这封信是为该报的篇幅而不是为我们报纸的篇幅时，我们毕竟是说得对的。”

所以，福格特 radicaliter (激进地) 使“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知道了激进主义的秘密，察贝尔打算使“十字报”也知道“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秘密，或者像市法院所说的“只以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察贝尔究竟是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的呢？

他是从“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开始的。他先讲“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隐藏在一个工人协会的背后，但以该协会名义从伦敦同国外的各工人协会通讯，“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从事“阴谋活动”，组织秘密同盟等等，最后还伪造一些“必然要引起警察”对各协会进行“迫害”的“文件”，“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于是，为了开导“十字报”“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察贝尔首先解释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怎样伪造警察性质的“信件”和“文件”，但决不是“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继续叙述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2年在日内瓦怎样“大量制造假钞票”，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9年在洛桑中央节上怎样采用一些敌视瑞士和败坏工人协会名誉的“手腕”，即

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说，“比斯康普和马克思”怎样用只有“天”才知道其来源的钱出版“人民报”，仍然不是“激进传单”，而是周报；但在这一切以后，他竭力为福格特的招募局的洁白无瑕的纯洁说好话，但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就这样占用了“怎样制造激进传单”这篇文章的三又四分之一栏中的两栏。这样一来，对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栏来说，匿名传单的**产生经过**，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借以叙述“朋友”和同谋者**弗·察贝尔**在“‘总汇报’的政治态度”这一标题下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的那些福格特的卑鄙齷齪的东西。只是在最后，这位邓斯第一才谈到“伪造激进传单”的艺术，即谈到关于传单“警告”的“产生经过”。

“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10月24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厚颜无耻地说他是传单的作者……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马克思**于10月29日写信给‘总汇报’说：“因为布林德拒绝证实他对我和其他人所说的话，我弄到了**随信附去的文件**。”

察贝尔之所以觉得这一文件的真实性可疑，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这是察贝尔的原文中原来有的问号）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无误”——而察贝尔永远决定除了柏林市政府以外，不承认其他市政府。察贝尔接着谈到了费格勒的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促使布林德把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明寄给“总汇报”作证，证明**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布林德写的，同时他还说：

“始终随机应变的**马克思** 11月15日对‘总汇报’作了答复。”

察贝尔列举了我的答复中的各点。马克思说了这……马克思说了那……“**除此以外**，马克思引证”。这就是说，既然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说，那末，察贝尔当然应把我的答复中的各点告诉

给他的读者？你们不太了解察贝尔！他故意不提掩盖和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主要一点。我在11月15日的声明中列举了不同的各点，即(1)……(2)……最后，(3)“……‘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这一点决定整个问题，察贝尔对自己说。我的读者们不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就这样巧妙地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反而硬说我有令人可疑的随机应变。可见，察贝尔在叙述“传单的产生经过”时，进行了两次捏造——头一次是日期，另一次是我在11月15日发表的声明的内容。他通过**双重捏造**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伪造了**”传单，而且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布林德的“作品”；我还给“总汇报”寄去了一份假证词，冒充费格勒的证词，而且完全是故意这样做的。攻击别人伪造文件，并把伪造文件的责任诿罪于第三者，在柏林市法院看来，“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更不包含“侮辱的意图”。

察贝尔在他的“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个处方的结尾，突然想到他还没有把福格特的一个无耻的臆造说出来，他即刻在他的第二号社论的结尾赶紧加了这样一个注解：

“1850年曾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认为)是议会的狼，alias(或者说)**被囚的狼**起草的，该通告同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

察贝尔这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和民主主义者，报道了“新莱茵报”一位前编辑的这一警探轶事以后，就笑嘻嘻地向他的读者告别了。“被囚的狼”这几个字并不属于福格特，而是属于弗·察贝尔

的。他的西里西亚的读者想必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所谈的是他们的同乡、“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之一威·沃尔弗。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是多么煞费苦心地去想知道“新莱茵报”同法国和德国警察当局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啊！他的西里西亚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所谈的是他的、察贝尔自己的伯·沃尔弗，是察贝尔的天然上司（natural superior），大家知道，这个人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伦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结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电报传播世界的重大事件。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尔弗—路透—哈瓦斯这个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统一。

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没有侮辱的意图，柏林市法院还是声称，在察贝尔的两篇社论里到底还是“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的言论和论断”，也就是应受“惩罚的言论和论断”，无论如何是可以成为**起诉对象**的。那末，察贝尔就出来吧！把察贝尔交给我，让他在法庭面前发抖吧！别动！——**市法院**喊道。市法院说，两篇社论里所发表的“言论和论断，既然是作者（察贝尔）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不是“应受惩罚的”，因此，不仅不能惩罚察贝尔，而且不能向法庭对他提出控告；“案件应当终止，费用应由原告 a conto（负担）”。总之，察贝尔的“言论和论断”的诽谤性部分是“**简单的引证**”。Voyons！（我们走着瞧吧！）

你们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就说，我对诽谤的控告是以察贝尔的两篇社论中的四点为基础的。在关于“人民报”的钱的来源一点中（即上述控告各点的第二点中），**察贝尔本人并没有说他是引证**，而且的确也不是引证：

察贝尔(“国民报”第 41 号):

“天知道是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人民报”)弄到钱的;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福格特(“主要著作”第 212 页):

“‘总汇报’的常任通讯员是这家报纸(“人民报”)的撰稿人,该报是用来历不明的款项创办起来的,因为不论比斯康普或者马克思,都没有为此所必需的资金(即为了用来历不明的款项创办报纸吗?)。”

在第二个被指控的地方(上面,第四点),即攻击我以布林德的名义伪造文件的地方,察贝尔甚至明确地声明,他是以自己的,即察贝尔的名义说话的,而不是以福格特的名义说话的。

“我们”,一身为 Dulness 王国的统治者,察贝尔当然要用 pluralis majestatis(至尊的复数),——“我们觉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马克思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国民报”第 41 号)

我应当把我所指控的第三个地方(上面,第三点)重新全部“引证”一下:

“因此,1852 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

难道这就像市法院断言的那样是“简单的引证”,或者这是一般的引证?这部分地是从福格特那儿抄袭来的,但决不是引证。

首先,察贝尔本人说他不是引证,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的,他在括弧里向他的读者说:“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地方吧!日内瓦人都知道:舍尔瓦尔是 1853 年春才到日内瓦的,他的“密谋”和逃亡是在 1854 年春发生的。因此,福格特在日内瓦不敢说“密谋”是在“1852 年……策划”的。他把这个弥天大

谎留给了柏林的好心肠的察贝尔。福格特接着说：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票等等)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主要著作”第175页)

可见,已经为制造假钞票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但是还没有伪造出钞票和国库券来。与此相反,在察贝尔笔下,已经“制造了”,而且“大量”“制造了假钞票”。福格特说,按照章程,舍尔瓦尔的密谋的“目的”是:

“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即通过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来同专制作斗争。”(同上)

察贝尔抹去同专制作斗争,只留下“大量制造假钞票”。在察贝尔笔下,这便成了普通的刑事罪,甚至是没有用虚伪的政治借口为“秘密同盟”盟员稍加掩饰的刑事罪。察贝尔用这种手法一般地“引证”“主要著作”。福格特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因此,他详加铺叙,造谣诽谤,涂涂抹抹,乱画一顿,大肆渲染,任意涂改,胡吹乱扯,随便发挥,故意搅乱,引经据典,无中生有,fa del cul trombetta(把臀部也变成了喇叭)^①。这样一来,福斯泰夫的靈魂也就透过这些虚构的事实到处显现出来,而他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又无意识地把这些事实变成原来的一无所有了。察贝尔本来要把这本书压缩成两篇社论,并力图不漏掉一点儿卑鄙龌龊的东西,现在却除了每一个虚构的“事实”的caput mortuum^②以外,他抛掉了一切,把这些诽谤的枯骨一颗接一颗地联成一串,然后虚伪地热心地一颗一颗数弄这些念珠。

我们不妨举出我们正在考察的一件事做例子。我首先揭发出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一首歌。——编者注

② 直译是:骷髅;转意是:残骸。——编者注

来的事实是：舍尔瓦尔是一名外国使馆雇佣的秘密警探，一名 agent provocateur (奸细)，福格特竟把自己的臆想同这一事实搅在一起。他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票)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还没有制造出来的)假钞票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但是接着就发生了向警察局的告密，同时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进去，等等。”(“主要著作”第 175 页)

因此，在福格特笔下，当舍尔瓦尔还仅仅准备好了为制造假钞票所必需的铜版和石版的时候，当他的密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当还缺乏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的时候，当除了他本人以外，谁的名誉也还没有受到败坏的时候，舍尔瓦尔就已经把他自己的行动向警察局告密了。但是福格特的舍尔瓦尔急忙“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到他的“密谋”中去。利用舍尔瓦尔的效劳的外国使馆，就像舍尔瓦尔一样愚蠢，一样急忙地

“在秘密询问中要瑞士警察当局注意工人协会里正在进行着某种政治阴谋活动，等等”。

同时，这帮愚蠢的公使们，没有耐心等待他们委托舍尔瓦尔孵出的密谋成熟起来，而且由于幼稚急躁，竟徒劳无益地败坏了自己代理人的名誉；他们在“边境上”布置下宪兵，以便——“如果事情发展到”他们不让它发展的“地步”，——“抓住”这帮携带他们曾阻止制造的“假钞票”的舍尔瓦尔的特使们，

“并利用这一事件来进行一次大搜捕，在搜捕时，大批无辜者要为几个坏蛋干的勾当受到惩罚”。

当福格特往下说到“这整个密谋计划订得极其可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这个计划是订得极其愚蠢的，而当福格特大

言不惭地结束说：

“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

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懂得这种意见的 *pointe* (要点)^①，并且一定会对我们这位快活的家伙捧腹大笑。现在我们把察贝尔的像和尚的编年史一样索然寡味的说法同这比较一下吧！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

在这里，一大堆同样索然寡味的、同样可耻的事实都被装在一个短句里。这些事实是：1852年出现的“极端可耻的密谋”；“大量制造假钞票”，即普通的刑事罪；蓄意败坏“瑞士各工人协会”的名誉，即背叛自己的党，可能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即为了大陆上各暴君的利益而反对瑞士共和国的 *agent provocateur* (奸细)；最后是“密谋被及时揭发”。批评在这里失去了福格特叙述中所有的一切据点，——它们完全被巧妙地除去了。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察贝尔用这种方式把整个“主要著作”中只要涉及到我和我党同志的地方都加了一番工。海涅说得很对：没有一个人像一头发狂的驴子那么危险。

最后，察贝尔在我指控的第四个地方（上面，第一点），即第一号社论中开头揭露硫磺帮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察贝尔在这里不说他是否在归纳或引证。他避免使用引号。事实上，他不是引证。这是应当预料到的，因为察贝尔把“主要著作”的第136、137、138、139、140和141页压缩在

① 直译是：中心点。——编者注

大约每行由 48 个字母组成的 51 行句子里，这些句子排得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白，相反地，他把句子挤压得就像荷兰青鱼一样，加之还要在这 51 行句子中为自己的创作找到地盘。他要是碰到一个特别齜齜的句子，他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放进他的这一包东西里面去。可是，他把这些摘录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不按“主要著作”的页码顺序，而照他的目的所需要的那样排列。他把福格特一个句子的末尾按在另一个句子的开头。为了构成一个句子，他又利用成打福格特句子中的小词。凡是福格特笔下的有碍鲜明地表现诽谤的那些修辞学上的废物，察贝尔都省去了。譬如福格特说：

“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

察贝尔却说：

“败坏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

在其他场合，察贝尔认为在福格特的缺少风格的叙述里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都加以改动了**。例如福格特说：

“……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

察贝尔则写道：

“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

最后，察贝尔整句整句地加进自己制造的句子，譬如：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同时“他们”——即“这些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事业的同行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可见，在我提出指控的四个地方当中，**根据察贝尔本人的说法，就有三个地方是属于察贝尔的，而第四个所谓的“引证”，尽管它同其他引证混在一起，但它决不是引证，更不是像市法院所说的**

是“简单的引证”，尤其不像同一个市法院所说的是引证许多“别人（多数）”的引证。相反地，在察贝尔所有谈及我的“言论和论断”里，没有一行包括“批评和判断”（“容许的”或“不容许的”）的话。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市法院的事实前提的真实程度，同它实际上的虚假程度一样；我们姑且假定察贝尔只是引证了一些对我的诽谤性声明。难道这种情况真使市法院有禁止我对弗·察贝尔提出起诉的合法权利吗？在我下面即将引证的“决定”里，普鲁士王国上诉法院相反地解释说：

“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六条，无论上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实是否是作者本人说的话，还是从第三者说的话中引证出来的，均不能使犯罪构成问题有**任何**改变。”

因此，是引证或者不是引证，“民主主义者”察贝尔都要对他“说的话”负责。市法院已经解释说，察贝尔对我说了本身就“应受惩罚的”话，但只要这些话是引证，因此就保了险。打倒这种法律上虚假的借口！——上诉法院喊道。这样，我终于能够把察贝尔抓住了，法院的大门敞开了，Italiam, 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①

我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控告市法院的决定，而在1860年7月11日得到了如下的“决定”：

“今年1月22日和25日‘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上发表的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两篇社论，不能看成是对原告、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诽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六条，无论上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实是作者本人说的话，还是第三者说的话，均不能使犯罪构成问题有任何改变，但仍不能阻止报刊讨论和批评党派的活动及其政论性的争论，只要论战形式中没有侮辱的意图。而本案中是不能认为有侮辱意图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

的。

上述文章主要说明了：卡尔·福格特博士为一方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为另一方，在最近战争引起的支持意大利人利益或支持奥地利人利益问题上的看法上的冲突；支持奥格斯堡‘总汇报’反对福格特的所谓伦敦德国流亡者参加了这一冲突；这些流亡者的党派纠纷和互相倾轧！

如果在叙述过程中，把原告对这些党派的态度和他部分地参加这些党派的勒索，特别是他提供实际材料来竭力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进行论战都归入所考察的问题之内，那末，两篇社论中的有关各点，按原告本人的控诉书里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了原告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如果他进一步断言，说人们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的阴谋等量齐观（上述文章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那末，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有所根据的。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说，‘1894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而在谈到泰霍夫的信时说：‘……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那末，这里实际上只是对福格特所称的硫磺帮作一评定，而不是对马克思的攻击，在这里反而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人的人；文章更没有把地个人同那些被控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同样地，第二篇文章根本没有提到原告硬说上述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是深信他不是的，也没有提到原告把第三者的分明是不可靠的证件转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至于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值得争议的，原告在控诉书里引证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耶的相反说法时，自己也承认这点。此外，根据原告自己的记述，后来有一位叫沙伊伯勒的人承认自己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而且是在‘国民报’发表两篇文章以后。

因此，必须认为上月21日对王国市法院于同月8日所作的否决决定提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予以驳回。由于没有根据的控告被驳回，应立即——为了避免强制追缴，——向市法院收费处缴纳25个银格罗申。

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第二处

古特施米特 舒尔采

1860年7月11日于柏林

由此地的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转交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

当从我的法律顾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初看时看漏了开头和结尾；由于我不熟悉普鲁士法律，我竟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递交上诉法院的一份为自己辩护的文件的副本。我自言自语地说，察贝尔关于“卡尔·福格特博士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看法”（见附录 15）和“意大利人利益和奥地利人利益”所说的那些话，显然是从供“国民报”用的一篇文章中错放进他的 plaidoyer（辩护词）里去了。

“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写的两篇社论几乎共占了六栏，然而，他在专谈我的四栏中只字未提这些看法和利益。察贝尔在他的 plaidoyer 中说我

“提供实际材料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进行论战”。

他把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之为“总汇报”同福格特的论战。如果诉讼和论战是同一个东西，那末，难道我需要得到检察官、市法院和上诉法院等等的允许来进行我同察贝尔的论战吗？但是，察贝尔甚至要人相信，似乎他的两篇社论谈到我对“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按我本人“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我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与其说——不如说？jus（法律）只知道：非此——即彼。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究竟是些什么呢？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指出我同“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是：

(1) 据说李卜克内西是由于我正式给了他一项证明文件，才成了“总汇报”的通讯员的。我给法院的控诉书已揭发了察贝尔的谎言，但是我认为再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这种荒谬是多余的。(2) 察贝尔说我在 10 月 29 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一项“司法文件”，

这项文件在 10 月 24 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他并且认为我举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察贝尔从我给法院的控诉书里举出的事实中看出来：的确，不问政治见解如何，在福格特还没有提出诉讼以前就企图公开硬把我说成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以后，我寄出有关传单来源的文件就成了必需的了。（3）察贝尔说我是“总汇报”的通讯号的那“一点”，我已用确凿的文件驳倒了。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里，像早已指出的，谈到我同“总汇报”的关系时，只有以下“有关各点”，即说我自己伪造了“警告”，把它嫁祸于布林德，并企图通过费格勒的假证词来证明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这些“有关各点‘按我的控诉书里’所举出的事实来看”是不是“与其说遭到了我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呢？察贝尔本人所承认的则与此相反。

察贝尔是否知道沙伊伯勒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察贝尔是否相信，根据我自己也承认“值得争议的”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可靠的吗？但是，从哪里看得出，我曾硬说察贝尔知道这些和相信这些呢？“相反地”，我的控诉书倒同察贝尔的“有关各点”——即说我“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说我后来企图通过费格勒的证词来证明它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等等有关的。

最后，我发现察贝尔提出来给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

“如果”，——他说，——“如果他（原告马克思）进一步断言，说人们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的阴谋（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上述文章（即察贝尔的社论）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那末，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根据的……文章更没有把他个人同那些被指控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们谈论罗马人说：《memoriam quoque cum voce perdidissimus》（“但愿我们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显然，察贝尔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改变硫磺，而且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汽态，以使用这种红色汽体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汽变成硫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1860年“国民报”第37号）里，是从称“马克思”为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指出硫磺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证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会晤的。察贝尔说后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尔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密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这个李卜克内西，in nomine omen（从名字上就可看出）^①，是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一到达，就为马克思效劳，并且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

李卜克内西后面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提出了硫磺帮的一个成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alias（或者说）被囚的狼”，——他受托办理“分发通告”这件重要事情。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

^① 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后一半——克内西(Knecht)，按德文是“奴隶”、“仆从”的意思。——编者注

人们谈论罗马人说：《memoriam quoque cum voce perdidissimus》（“但愿我们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显然，察贝尔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改变硫磺，而且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汽态，以使用这种红色汽体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汽变成硫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1860年“国民报”第37号）里，是从称“马克思”为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指出硫磺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证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会晤的。察贝尔说后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尔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密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这个李卜克内西，in nomine omen（从名字上就可看出）^①，是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一到达，就为马克思效劳，并且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

李卜克内西后面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提出了硫磺帮的一个成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alias（或者说）被囚的狼”，——他受托办理“分发通告”这件重要事情。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

^① 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后一半——克内西(Knecht)，按德文是“奴隶”、“仆从”的意思。——编者注

“阴谋”，它的“主要职业”，它作为一个帮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它的首领的命令进行的，并被察贝尔故意描写成非常严酷地对待该帮的首领干的事情。究竟这个帮的所谓职业是些什么呢？

“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任何反对这些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者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等等。”（“国民报”第 37 号）

察贝尔关于硫磺帮的这些“有关各点”，是从说我是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的。他在逐一列举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即勒索金钱和进行告密等等以后，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他对硫磺帮的一般描述：

“……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筹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察贝尔描述硫磺帮时，开头是“推崇”我为该帮的“著名首领”，后来他又担心读者可能以为在著名首领的后面还有一位不著名的首领，或者可能以为我因被“推崇”为达赖喇嘛而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在描述的结尾，把我（已经是用他自己的话，而不是用福格特的话）由“著名”首领变成了非常严酷的首领，由达赖喇嘛变成了硫磺帮的拿破仑。而他在他的 plaidoyer（辩护词）中，正好提出这个地方作为证明，证明他没有把我同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等量齐

观”，而他在他的文章里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不，不完全是这样！他把我“等量齐观”了，但不是以“侮辱我的名誉的形式”。“相反地”，他给了我荣誉，把我提升为勒索者、写恐吓信的人、mouchards (间谍)、agents provocateurs (奸细)、伪币制造者等等的拿破仑。察贝尔的荣誉概念，显然是从十二月帮辞典中借来的。那里也有“拿破仑式的”这个形容词。但是，我对他提出起诉，正好为了他给了我这种荣誉！我在我的控诉书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地令人信服，以致察贝尔怎么也不愿接受我要他出庭的邀请，——我证明了：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全是福格特的捏造，察贝尔“引证”这类捏造不过是为了有可能把我“推崇”为这个硫磺帮的拿破仑。但是，难道他不是把我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人的人吗？难道我(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使这个帮服从纪律吗？他自己叙述了这种驾驭、优越性和纪律表现在哪里。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就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里面，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

但是，对于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承蒙他把我同这些阴谋“等量齐观”），察贝尔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描述。

“马克思派的著名成员”、“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的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蓄意用“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来败坏瑞士工人们的名誉，在那里他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交到”正在等待的“宪兵的手里”。“科伦案件期间，硬说是”这“某一位李卜克内西编写了假记录本”（察贝尔当然忘记说，施梯伯的这

个捏造的虚假性，早在案件审理期间就由官方证明了)。“新莱茵报”前编辑之一沃尔弗，从伦敦寄出一份“告无产者的通告”，这个通告“他同时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局”。

察贝尔一方面把如此“著名的”同我有联系的一些人描绘成秘密警察局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还把我同一个“著名的”秘密警探、agent provocateur (奸细)和伪币制造者者舍瓦尔联系起来。他对硫磺帮作了一般描述以后立刻叙述说，“有几个人”，其中包括舍尔瓦尔，怎样“以工人的革命煽动家和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这种双重身分”从伦敦去巴黎，怎样在那里搞“所谓共产党人案件”等等。他在第二号社论里继续写道：

“因此，1852年，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

如果“国民报”的读者答应了察贝尔的坚决邀请，看看福格特著作里的详情，那末，他们会找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舍尔瓦尔是由我派别日内瓦去的，在我的直接领导下策划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被察贝尔引向福格特那里去的读者还会找到下列东西：

“然而，马克思的个人态度在这种场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已经指出过，有些事情不管是马克思自己干的或是通过他帮里的某个成员干的，都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他反正无条件地统治着他的人。”

但是，察贝尔仍然不满足于自己所干的。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两篇社论的结尾低声地对他的读者讲出他最后的话。他说：

“他（布林德）声明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后者（亲马克思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

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那末，这就是说，是“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alias（或者说）硫磺帮把传单伪造成像是布林德的作品一样的？察贝尔叙述了这种假定之后，就用下面一句话干巴巴地概括它的意思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

那就不是马克思派或者布林德，也不是布林德或者亲马克思派，vulgo（俗称）硫磺帮，而是布林德或者马克思，sans phrase（干脆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派，亲马克思派，硫磺帮等等都不过是对马克思、马克思其人的泛神论的称呼。察贝尔不仅把马克思同硫磺帮的“党”“等量齐观”，他还把硫磺帮化为马克思这样一个人。这位察贝尔竟敢在司法机关面前说，他在他的社论里……没有以“侮辱荣誉的形式”把“原告”马克思同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他捶胸顿足地发誓说，他“更没有”把我个人同被他“指控为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心里想，察贝尔在法庭当众开庭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角色啊！我舒畅地喊了一声，再一次拿起我的法律顾问寄给我的文件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我在末尾看到了弥勒、舒尔采一类的名字，于是我马上就确信我弄错了。摆在我面前的材料根本不是察贝尔的 plaidoyer（辩护词），而是由古特施米特和舒尔采签署的上诉法院的“决定”，这项决定剥夺了我对察贝尔的起诉权，而且，因我提出“控告”，罚我 25 个银格罗申，并应立即交给柏林市法院收费处，以免强制追缴。我真是 attonitus（大吃一惊）。但是，当我重新细看“决定”时，我就不再

感到惊奇了。

例 一

察贝尔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社论中写道：

“福格特在第 136 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上读到：

“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说：“1849 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察贝尔说：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一群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的人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我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笔下，察贝尔却是这样说的：1849 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这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纽约和泽稷岛等地），并把我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人们没有给过我这种荣誉，察贝尔和福格特也没有强加给我这种荣誉。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这里决不是在归纳，而是在引证，因为他们把察贝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表过的词句放在引号内，当做他第一号社论中“根据福格特的叙述”“归结的”一点。显然，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面前的是一份我和读者不知道的“国民报”第 37 号秘密版。这就是产生这一切误解的原因。

“国民报”第 37 号秘密版同该号公开版的区别，不仅是一些句子中的异文。公开版的第一号社论的全部内容同秘密版的该社论的内容，除几句话以外，毫无共同之外。

例 二

察贝尔在把我推崇为硫磺帮的首领以后,在“国民报”第37号上写道:

“这些同行们(硫磺帮)……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的事业……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无产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进一步说明(说明这个“硫磺帮”还是“无产者”),引证了……泰霍夫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无产者’的原则、阴谋等等;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在察贝尔把我封为1849年流亡者的首领以后,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国民报”第37号上读到:

“如果它(“国民报”的第一篇文章)往下谈到泰霍夫的信说:‘从信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如果法官们拥有给予或剥夺私人起诉权的大权,那末,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承认我有对察贝尔起诉的权利。他们在nuce^①报道的“国民报”第37号秘密版社论的内容,完全排除了任何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的确,察贝尔在秘密版上发表了什么呢?首先,他给予我不应得的荣誉,使聚集在伦敦的1849年的全体流亡者把我“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难道我是因为这点“控告”他的吗?其次,他给予我同样不应得的荣誉,说我“非常严酷地对待”某一个同我毫无联系的硫磺帮,譬如说,就像我在1848—1849年非常严酷地对待察贝尔之流那

① 处于萌芽时期;这里的意思是:简略地。——编者注

样。我是因为这点“控告”察贝尔的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如果立法允许司法官员“决定”，而且是秘密“决定”某个人是否有权控告另一个人（譬如因在“国民报”上进行诽谤），那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原告根据也许有一万份发行量的“国民报”第 37 号公开版提出控告，而法官则根据为他准备的一份该号“国民报”秘密版作出决定。用这种程序，甚至 *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的同一性也很少有保证了！

普鲁士立法在每个案件中都使私人的起诉权取决于法官的裁夺。它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国家是慈父般的政权，应当保护和管理国家的孩子们的私人生活。但是，甚至从普鲁士立法的观点来看，上诉法院的“决定”也是令人奇怪的。普鲁士立法显然是想消除各种琐碎无聊的控告。因此，——如果我对普鲁士立法的精神的理解是止确的，同时有充分理由假定它的目的并不是系统地拒绝审判，——因此，它给法官以驳回起诉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对 *prima facie*（初看起来）没有起诉的对象，因而对起诉 *prima facie* 缺乏根据而言的。这是否适用于本案呢？市法院承认，察贝尔的社论实际上针对我说了一些“侮辱荣誉的”，因而是“应受惩罚的”话。它保护弗·察贝尔以对抗我的合理报复，只是因为弗·察贝尔“简单地引证了”自己的诽谤。上诉法院说：不论是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从法律观点来看，侮辱荣誉都应受惩罚；但是它否认察贝尔的社论中有侮辱荣誉的话——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侮辱我个人的话。因此，市法院和上诉法院对犯罪构成本身的看法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一个发现有侮辱我的话，另一个却说没有。法官在对犯罪构成的看法上的这种矛盾，确凿证明了在这里 *prima facie* 起诉对象是有的。如果帕庇尼亚努斯和乌尔皮安努

斯说，报上的这些话是侮辱荣誉的，可是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相反地却说，报上的这些话是不侮辱荣誉的，那末，奎里特⁵⁹⁶的人民将会怎样想呢？为什么人民不应该同乌尔皮安努斯和帕庇尼亚努斯一起相信，察贝尔在“国民报”第 37 号和第 41 号上发表的东西是侮辱我的荣誉的呢？如果我要奎里特的人民相信：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给了我一份秘密证词，从这一证词来看，察贝尔的“侮辱荣誉的”一些言论和论断根本不是说我的，那末，奎里特的人民就会耸耸肩，好像在说：à d'autres!（你讲给别人听吧！）

因为上诉法院是决定犯罪构成问题的最后一个审级，也就是说，它应当最终决定：察贝尔的两篇社论实际上是不是侮辱了我的荣誉，有没有侮辱我的意图，因为上诉法院否认这种犯罪构成，所以，就只留下一个问题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即上诉法院的决定实际上是不是建立在法律的错误基础上的？上诉法院在“决定”中**实际上确认**：察贝尔硬说**硫磺帮**进行“无原则的、不体面的密谋”、“告密和勒索金钱”；这个**硫磺帮**，就是同一个察贝尔在同一篇社论里直截了当地称做“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的，而马克思则被认为是该派著名的和非常严酷的“首领”。上诉法院是否有合法的权利不认为这是侮辱我荣誉的做法呢？我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尔先生**在他递交最高法院的控诉书中对这一点指出：

“诚然，（察贝尔）在哪儿也没有直接说马克思勒索金钱，从事告密和制造假钞票。但是，难道在下面一句话里这点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马克思是追求上述犯罪的和不道德的目的的一个派的首领？任何没有成见的、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否认，要是某一个团体的目的和主要活动是违法乱纪。这样一个团体的首领就不仅会赞同该团体的阴谋诡计，而且会亲自布置和指导这类阴谋诡计，并享受它的成果；毫无疑问，这个首领不仅作为参加者，而且作为思想上

的鼓舞者，负有双重责任，即使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直接参加了某种违法乱纪行动。在（上诉法院的）值得争议的决定中表明的观点，可能造成如下的结果：一个人的好名声在想要败坏它的人们面前是没有保障的。诽谤者为了诽谤甲，不必说甲杀了人，只需说某处有一个干杀人勾当的帮，而甲是这个帮的头子就够了。上诉法院的观点会保障这个诽谤者逍遥法外。如果诽谤者违背事实地把第三者诬称为强盗或者强盗头，这个诽谤者都应受到诽谤罪的惩罚，那才是正确的。”

从常人的理智来看，诽谤实际上是存在的。从普鲁士立法的观点来看，这种诽谤是否存在呢？上诉法院说：不存在，我的辩护人认为：存在。如果上诉法院不顾市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引证形式不能使诽谤者免受追究，那末，为什么最高法院不应当不顾上新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千头万绪的缘虫式的诽谤形式也不能使他免受追究呢？我的辩护人就此法律问题的法律，就上诉法院在犯罪构成问题上所犯的这一法律的错误，上告到最高法院，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上告到“阿雷乌泊果斯”^①。最高法院作了如下“决定”：

“（一）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二）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三）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四）您须将这项决定的费用25个银格罗申在一周内交本地王国市法院收费处。

王国最高法院

冯·施利克曼

1860年10月5日于柏林

交本地法律顾问维尔。”

^① “阿雷乌泊果斯”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意指最权威的审判。——译者注

为了便于审查起见，我把最高法院的“决定”的各个组成部分编上号：

在第一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说，对上诉法院的申诉已被“驳回”。在第二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对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相互之间的职权范围讲了一些有教诲作用的但显然同案件无关的空话。在第四点中，命令维贝尔在一周内把 25 个银格罗申交柏林市法院收费处，这是“决定”的结果，但当然不是决定的原因。

然而，决定“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我的辩护人的极其详尽的控诉书的答复是什么呢？这就是：

第三点：“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

如果把第三点这句话里的那个词儿“没有”去掉，那末理由就是：“但本案中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到那时，上诉法院的决定就会被宣告无效。因此，这项决定之所以仍然有效，仅仅因为上面一句话里插了一个词儿“没有”，而冯·施利克曼先生就借助这个词儿代表最高法院“驳回”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的控诉书。

⊗ （他自己说的）。没有！冯·施利克曼没有反驳我的辩护人所阐明的法律理由，他没有讨论它，他甚至没有提到它。当然，冯·施利克曼先生有作出他的“决定”的充足理由，但是他避而不谈。没有！这个词儿的证明力仅仅依靠了权威，即依靠说这个词儿的人的等级地位。“没有”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没有！”
⊗

最高法院就这样禁止我控告“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
我同普鲁士法院的官司也就到此结束。

十二

附 录

1. 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了非议员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①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 *intermédiaire* (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 *dénonciateur* (告密者) 叫来。于是他对我说:《*Vous avez l'air de vouloir vous interposer comme ambassadeur entre moi et ces réfugiés, pour traiter de puissance à puissance*》。(“您似乎想

① 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编者注

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J'en'ai pas l'ambition d'être accrédité ambassadeur près de vous》·（“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 ad latus（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Non,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ici》·（“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 gentle pressure（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命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Quelles tartines（真是胡说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许的 aura popularis（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联邦委员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和日内瓦国务会议的议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生来糊涂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Providentia Dei et confusione hominum Helvetia salva fuit（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维第）。”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赞（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 faiseurs（耍花招的）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接受。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法院侦查员雷赞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 1851 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出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 300 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 *flagrante delicto*（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 le refrain du danger, je le sais par cœur*》。（“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 300 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给我 100 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d'arracher la peau à qui que ce soit*》（“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笼络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乱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J'en étais donc pour mes frais et honoraires（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在监

狱古塔 de profundis (深处) 给他写了一封信, 请他给我一点欠我的钱, 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 (指我的被捕等), 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 但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数月后, 科 (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 写信告诉我, 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 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 mordicus (确凿) 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 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 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 使他自己像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的化身那样坐着, 而 entre poire et fromage (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 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 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 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 但是, 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 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吗? 我倒是认为, 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 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 由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 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 (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 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 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 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手工工人们说得好, Is fecit cui prodest (对谁有利, 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 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 他们曾利用过 aurem principis (上司的耳朵), 总之, 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 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是很方便的, 特别是, 他们不止一次地在 princeps (首领) 图尔特的周围聚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 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 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 有一天, 奥里珈公主

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室旅馆里进餐。Entre poire et fromage. (同可怕的莱纳赫 sans comparaison (不能相比)), 公主对她的对方说:《Eh bien, Monsieur le baron, avez-vous encore beaucoup de réfugiés ici?》(“哦, 男爵先生, 你们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 那一位回答说:《Pas mal, Princesse, bien que nous en ayons déjà beaucoup renvoyé. M. D ruey fait de son mieux à cet égard, et si de nouveaux fonds nous arrivent, nous en renverrons bien encore》· (“不少, 公主, 虽然我们已经送走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 如果我们得到新的救济金, 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 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 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 他曾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在席利被驱逐的时候, 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 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车厢, 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 把我们遣送到哈佛尔, 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至今还是一个谜; 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哈佛尔领事——商人万纳尔更清楚这事, 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赔偿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 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 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 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1856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 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 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 如果同遣送所谓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 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机会, 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 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 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伟大’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qui aime bien châtie bien* (爱得深, 责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咨询,德律埃在 1852 年 4 月 9 日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所以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咨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经过德律埃先生的检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Vae victis*》(“呜呼,战败者”)。于是,德律埃在 1852 年 4 月 19 日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给雅^①先生的信中说：《Vae victis》……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骗性的攻击，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 1852 年 4 月 21 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欺骗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残酷。”^②

1852 年 3 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窝藏着 84 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现象；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⁵⁹⁷在 1852 年 3 月 25 日第 72 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

① 雅科比。——编者注

② 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⁵⁹⁸，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Tantaene animis celestibus irae?》（“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①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在穆尔顿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议员）“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的一段：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接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册。——编者注

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驱逐出境,如果这种驱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暴行的话。这样或许有人要对我们指出外交的意义,说出于尊重强邻和保持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其的新月后面吧,后者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门时给他看它的双角,而不是出面认罪;要是这样,那就发给我们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把开瑞士的自由堡垒的那些钥匙当做 *feudum oblatum* (采邑从属关系)的标志交给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可以把这些钥匙当做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勋章来佩带,上面的铭文是:Finis Helvetiae! (海爾維第的末日!)”

3. 舍尔瓦尔

我从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现在居住在伦敦的施泰歇尔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别人。虽然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对他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赞扬,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本人的荣幸。由于只克尔的信,我们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友”写给我的一封信。

“1860年10月14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17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问题为您提供一些说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个工作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们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

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当时所听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和蔼、勤劳但同时也非常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组在这伙人中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后来福林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认出他们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别人通讯。根据以上所说情况，至少可以做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的战友’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纽金特曾邀请其他任何人到巴黎去过。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家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赫·卡·施泰歇尔”

4.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伦案件期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和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是以奥·维利希在“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⁵⁹⁹为根据的。这是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莱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伪记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句话：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米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担任 mouchard（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能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 39 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莱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 par ordre（按官吏式）修剪的联鬓胡子——上唇髭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紧张……格莱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概认为首先必须考验我一番……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要我向他精确地报告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莱夫向我介绍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的人，并接着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三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莱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果搞不到它们，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维提希主编的‘德勒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组织民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员会设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他的真姓是克劳泽；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泽，在15—18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弗略里-克劳泽常常对我说，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伦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泽，直接在格莱夫手下任普鲁士警察密探。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⁶⁰⁰：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 [Fleur de 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①，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 fleurs-de-lys (百合花)^②。”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刺处几年 hrllks (在作监狱用的船上服苦役)。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莱夫的右手，当格莱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

① 文字游戏：《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 是姓。——编者注

② 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 T·F. (travaux forcés, 即苦役) 称之为 Fleurs-de-lys (百合花)。(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加的注。)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渥特·迪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密探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给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去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目’提出来作证……1851年秋，弗略里曾经同格莱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说，同约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贝克曼^①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议，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讥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伦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唯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大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信赖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莱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莱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议”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说：“à tout prix（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超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

① 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现的那个人物。（马克思在“揭露”1875年版上加的注，本附录4作为补遗附在那里。）

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曾担任“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对马克思的注所作的补充。）

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说，格莱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谓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监狱的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格莱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莱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议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是，

“进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伦的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有无获释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侦查而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莱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 tout prix（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莱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作担保”。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布莱顿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莱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传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是有教益的。请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业无产阶级’；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莱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做马克思派的东

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报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品，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为一次格莱夫先生把谁说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

舍尔瓦尔在所谓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 1 镑 10 先令的工资为格莱夫工作；

“为此，他有责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 mouchard (密探) 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莱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闵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伦案件。

“格莱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伦案件的，已经起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莱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国家检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真的，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伦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这些钱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伦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辛凯尔迪之托应当在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①等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莱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

^① 豪普特。——编者注

这就必须得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这项建议；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伦出现……当我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莱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丝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莱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记录中则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麦尔等）的真实签名在伦敦治安法庭立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d. d. ^①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维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生的非议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详尽说明’**……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

^① de dato——即日。——编者注

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弄到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绝望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弗略里告诉我，手稿的字迹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伦）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莱夫从伦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莱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伦带来所谓的记录本原稿呢？……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别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科伦日报’上读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败坏了’……德·弗略里先生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 1852 年 10 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 1852 年 11 月底；而 1853 年 3 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谋）^①。

① 恩格斯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 3 版（1885 年）上，给马克思在第 2 版（1875 年）增加的附录 4 添了下面一段话：

读者看一看施梯伯本人给他的两个同谋者弗略里-克劳泽和希尔施下的评语、那是很有趣的。“黑书”⁶⁰¹上对头一个人（第 2 卷第 69 页）这样说道：

“№ 345. 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德勒斯顿人，1834 年由于参加谋杀德勒斯顿的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前管家、以后（处死以后？）为粮食经纪人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现在还活着的他的未亡人约翰娜·罗津（父姓居尼茨）的儿子；他于 1824 年 1 月 9 日生在离德勒斯顿不远的科斯维希附近的魏茵贝格豪泽。1832 年 10 月 1 日进入德勒斯顿的贫民学校，1836 年被德勒斯顿附近的安东城的孤儿院收容，1840 年受坚信礼。后来到德勒斯顿的商人格鲁勒那里当学徒，但是次年就因多次偷窃而受到德勒斯顿市法院的侦讯和判处徒刑，审前羁押期间也计入刑期之内。获释后，住母亲处，没有任何职业。1842 年 3 月，由于撬锁行窃又被抓起来解送法院并判处四年苦役。1846 年 10 月 23 日出狱后回至德勒斯顿，同一些惯盗来往。后来为被释犯人收容所收留，把他安置在雪茄烟工场作工。他在那里连续工作到 1848 年 3 月，表现一般。但是，很快他又游手好闲起来，开始访问起政治团体来了（充当政府密探，如他本人在伦敦向希尔施说的；见上面）。1849 年初，任德勒斯顿的共和主义者文人埃·勒·维提希（现在住在美国）编辑的‘德勒斯顿日报’的送报员，1849 年 5 月，参加德勒斯顿起义，为索菲街街垒上的指挥员，起义被镇压后，逃往巴登，1849 年 6 月 10 日和 23 日受巴登临时政府全权委托组织民军并为武装起义者征收给养。后来为普军俘掳，1849 年 10 月 8 日自拉施塔特逃出。（完全同后来舍尔瓦尔从巴黎“潜出”一样。但是往下才是真正的芳香的警察的花束，——不要忘记，这是在科伦案件两年后付印的。）据 1853 年 5 月 15 日柏林‘政论家’第 39 号刊登的摘自纽约印行的汉堡商店伙计威廉·希尔施的著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的报道（施梯伯，你真真是个有预见的天使！>，1850 年底或 1851 年初，克劳泽化名为查理·德·弗略里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出现于伦敦。他最初颇为潦倒，但自 1851 年起，景况好转，当他被共产主义者同盟接收为盟员之后（施梯伯臆想的接收），开始曾充任

5. 诽 谤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以后，有人大肆散布——特别是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福格特式的诽谤，说我对工人们进行“剥削”。我的几个住在美国的朋友——约·魏德迈、阿·雅科比博士（纽约的私人开业医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和阿·克路斯（华盛顿合众国海军部职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反驳这种荒唐诽谤（注有：1853年11月7日于纽约），同时指出，如果问题是要博得小市民的欢心，那我有权对自己的私事保持沉默。“但是，

②③ 务各国政府的代理人；但因进行欺诈而遭到多方责难。”

施梯伯就这样酬谢他的朋友弗略里；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科伦案件结束后几个月，他因伪造罪在伦敦被判几年苦役。

关于可敬的希尔施，同书第58页上说：

“№ 265. 威廉·希尔施，汉堡商店伙计。他大概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作为流亡者去伦敦的。（这种毫无目的的谎言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戈德海姆曾经想在汉堡逮捕他！）在伦敦同流亡者来往甚密，参加了共产党。他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大陆各国政府效劳，充当对付政治犯和伪币制造者的密探。他在后一种职责中采用极卑鄙的欺诈、撞骗、甚至伪造，因此必须对他严加防范。他甚至同一些家伙勾结伪造纸币，目的似乎只为向警察当局揭发有人伪造货币，以取得优厚的奖赏。双方（警察的和非警察的伪币制造者）逐渐看出他的原形来了。他从伦敦转到汉堡，生活极为潦倒。”

施梯伯关于他的伦敦的下手们就是这样写的，他曾经不断地发誓保证他们“诚实和可靠”。而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典型的普鲁士人绝对不可能说出简单的真理。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不能不在从文件中引来的真假事实之间插入一些毫无目的的谎言。根据这种职业谎言家——现时这种人比任何时候都多——的证词，成百成千的人被判处监禁。这也就是现时人们所谓的拯救国家。

当自己应该面对 crapule (恶棍)、小市民和堕落的游荡者时,我们认为沉默对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我们打破了沉默。”⁶⁰²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的第5页上,可以看到: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争中拔剑相斗。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⁶⁰³

我并不想在这里细述“这次光荣的战斗”,也不想详谈代表流亡者协会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代表新旧大陆的革命同盟的阿·戈克于1852年8月13日达成的“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以这个标题 verbotenus (全文)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仅指出一点,除了少数例外,双方的全体议员流亡者都参加了化

装舞会（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福格特之流的名字）。

德国庸人的西番莲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结束他的愉快的革命周游美国的乞讨旅行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贷款的札记”（注有：1852年2月22日纽约州埃耳米腊），其中表示的观点，至少具有极其简单的好处。哥特弗利德认为，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可以得到铁路，要革命就可以得到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里则应当有现金，因此，一切都要看是否有“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的、有大笔金钱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使这些庸俗的头脑有了多么荒唐的思路。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public opinion》（“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

科苏特当时同样在美国为革命求乞，哥特弗利德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颇为文雅地说：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哥特弗利德向执政者保证，如果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给他，那末他，哥特弗利德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给执政者。七年后，这个哥特弗利德在他自己创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说，他是一个罕见的始终如一的人，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皇帝，他就经常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执政之一、革命贷款的出纳员奥斯卡尔·赖辛巴赫伯爵，于1852年10月8日在伦敦公布了一份收支决算，声明他将

辞去这一事务,并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钱移交给金克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议股东们把贷款的临时收据兑换库存现金。他说,辞去出纳员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贷款的设想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着手贷款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贷款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是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钱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利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到了一个“决议”,使他能够用另一种招牌来继续他的事业。

赖辛巴赫的那份决算中包含着有趣材料。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负责,这一点我已经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根据他的 *compte rendu* (决算),收入共有 1587 镑 6 先令 4 辨士,其中有伦敦 2 镑 5 先令,有德国 9 镑。支出共计 584 镑 18 先令 5 辨士,开支项目如下:金克尔和希尔盖特纳尔的旅费 220 镑;其他人的旅费 54 镑;石印机 11 镑;印制临时收据 14 镑;石印通讯、邮费等 106 镑 1 先令 6 辨士;根据金克尔的指示等支出 100 镑。

革命贷款只有 1000 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把它存入韦斯明斯特银行以备即将成立的德国临时政府最初的支付需要。尽管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成立呢?或许德国认为,现有的 36 个政府已经够它受的了。

未落入伦敦中央金库的一些美国贷款至少在某些场合找到了爱国用途,例如,1858 年春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交给卡尔·布林德先生 100 镑,要他把这笔钱变成“激进传单”等等。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考恩西耳大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 exposé (叙述)，鉴于您对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热烈的感谢。

谨致

敬礼

书记 威·赛普尔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8.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安·谢尔策尔先生自三十年代起就参加工人运动，享有声誉，1860年4月22日他从伦敦写信给我：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诬蔑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不对此提出抗议。在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刊印的文件库7号中这样说：‘我们知道，目前伦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骤。有安·谢·……签名的信件从该地寄给各个团体和个人等等’。看来，这些‘信件’使卡·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1859)年初似乎出现了政治宣传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说的“谁都一点也不

^① 原著所附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分发信件等等。经过这种方法的试探之后,有几个“流浪弟兄”在一个地区内出现了,他们立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几个人搞团体的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警察侦讯,也往往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7号中所引用的**信件全部转载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探测’一下呢?他本来不难了解,公开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末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是荒谬的了。由我签名的信总是起草得任何人也不会因之受到丝毫损害。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敌对阵营的雇佣文丐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想到去为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进行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物。我们肯定比福格特先生更为憎恨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为自己开脱,那末,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安·谢尔策尔”

9. 刊登在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上的布林德的文章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①

A Correspondent, who encloses his card, writes as follows:—

Sir, — 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last meeting in the Music Hall, I heard the statement made concerning the Grand-Duke Constantine. I am able to give you another fact:—

So far back as last summer, Prince Jérôme Napoléon detailed to some of his confidants at Geneva a plan of attack against Austria, and prospective rearrangement of the map of Europe. I know the name of a Swiss senator to whom he broached the subject. Prince Jérôme, at that time, declar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lan made, the Grand-Duke Constantine was to become King of Hungary.

I know further of attempts mad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year, to win over to the Russo-Napoleonic scheme some of the exiled German Democrats, as well as some influential Liberals in Germany. 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 I am glad to say that these offers were rejected with indignation.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得到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通知,说您愿把一份关于反对福格特的传

① 马克思在本章内引用的英文文件,他本人已在其他章内全部译出,这里把文件用原文刊出;文件的译文见本卷第 514 页。——编者注

单的来源经过的司法文件提供我们使用。我恳切地请求您尽速把这一文件寄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提交法庭。寄时并请挂号,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此外,敬爱的先生,自由党有时对“总汇报”是估计不足的;我们(编辑部)在忠实于政治信念方面已经受了各种考验。如果您的判断不是根据一篇文章,而是根据我们的全部工作,那您就会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像我们这样从容不迫地但是坚持不懈地为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强盛和文明、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进步,为提高他们的民族感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工作,也没有一家报纸获得比我们更大的成果。您必须根据效果来判断我们的活动。再次恳求您盛情地满足我的要求。

顺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海尔曼·奥尔格斯

10月16日于奥格斯堡

同一天写的第二封信只是第一封信的摘要,如奥尔格斯先生所说:“为更慎重起见,也已寄走”;这封信中包含同样的要求,即请把“李卜克内西先生所说的、您要提供我们使用的一份关于反对福格特的著名传单的来源的文件立即寄来。”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这里只引用我在1860年2月4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①的最后一段: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

^① 见本卷第762—764页。——编者注

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续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预谋的造谣者**。

卡尔·马克思”

摘自 2 月 3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①

Vienna, January 30th.—The Swiss Professor Vogt pretends to know that France will procure for Switzerland Faucigny, Chablais and the Genevèse, the neutral provinces of Savoy, if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will let her have the free use of the Simplon.

12. 费格勒的 AFFIDAVIT

特此声明如下:

经“人民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后来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第 7 号上转载并再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林斯堡报”)上转载的德文传单“警告”,部分是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排版的,部分是当时在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的我本人排版的,而且这一传单是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印刷的。

^① 译文见本卷第 601 页。——编者注

上述传单的原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亲笔。我曾看到，菲·霍林格尔先生把传单“警告”的样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菲·霍林格尔先生最初曾犹豫是否要把校样交给威·李卜克内西先生，在李卜克内西先生离开以后，他就向我和我的同事约·弗·维耶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1860 年 2 月 11 日在密多塞克斯郡弯街治安法庭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首都治安法官托·亨利。

阿·费格勒^①

盖 章

13. 维耶的 AFFIDAVIT^②

One of the first days of November last—I do not recollect the exact date—in the evening between nine and ten o’clock I was taken out of bed by Mr. F. Hollinger, in whose house I then lived, and by whom I was employed as compositor. He presented to me a paper to the effect, that, during the preceding eleven months I had been continously employed by him. and that during all that time a certain German flysheet 《Zur Warnung》(A Warning) had not been commposed and printed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In my perplexed state, and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I complied with his wish, and copied, and signed the document. Mr. Hollinger promised me money, but I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During that transaction Mr. Charles Blind, as my wife informed me at the time, was waiting in Mr. Hollinger’s room. A few days later,

① 费格勒的 Affidavit 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② 译文见本卷第 521—522 页。——编者注

Mrs. Hollinger called me down from dinner and led me into her husband's room, where I found Mr. Charles Blind alone. He presented me the same paper which Mr. Hollinger had presented me before, and entreated me to write, and sign a second copy, as he wanted two, the one for himself, and the other for publication in the Press. He added that he would show himself grateful to me. I copied and signed again the paper.

I Herewith declare the truth of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that:

1) During the 11 month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I was for six weeks not employed by Mr. Hollinger, but by a Mr. Ermani. 2) I did not work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just at that time when the flyshe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was published. 3) I heard at the time from Mr. Voegelé, who then worked for Mr. Hollinger, that he, Voegelé, had, together with Mr. Hollinger himself, composed the flysheet in question, an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in Mr. Blind's handwriting. 4) The types of the pamphlet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I returned to Mr. Hollinger's service. I myself broke them into columns for the reprint of the flysheet (or pamphl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in the German paper 《Das Volk》 published at London, by Mr. Fidelio Hollinger,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The flysheet appeared in No. 7, d. d. 18th June, 1859, of 《Das Volk》 (The People). 5) I saw Mr. Hollinger give to Mr. William Liebknecht, of 14, Church Street, Soho, London, the proofsheets of the pamphlet 《Zur Warnung》, on which proofsheets Mr. Charles Blind with his own hand corrected four or five mistakes. Mr. Hollinger hesitated at first giving the proofsheets to Mr. Liebknecht, and when Mr. Liebknecht had withdrawn, he, F. Hollinger, expressed to me and my fellow workman Voegelé his regret for having given the proofsheets out his hands.

Declared and signed by the said Johann Friedrich W ieh e at the Police Court· Bow Street this 8th day of February, 1860, before me T h. Henry, M agistrate of the said court·

Johann friedrich W ieh e
L. S.

14. 摘自诉讼文件

临时政府。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1848年3月1日于巴黎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举的人们敞开着大门。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 斐迪南·弗洛孔^①

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我非常高兴，从我们的朋友维尔特那里获悉您准备在科伦出版“**新莱茵报**”，该报的计划他已经给我了。必须让这一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了解到德国民主事业的情况，因为从“科伦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我们在布鲁塞尔能够得到的德国其他贵族报纸以及从我们的“比利时独立报”（该报的所有特约通讯都是以符合我们的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观点写成的）上都不可能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可靠消息。维尔特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去科伦同您一起参加创办“**新莱茵报**”的工作。他以您的名义答应把该报寄给我，由我寄“**社会辩**

^① 原著所附的弗洛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论报”⁶⁰⁴给您作为交换。我也非常希望就我们两国的共同事业和您变换信件。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须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因为正在法国酝酿的事件必将提出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在巴黎呆了十来天后回到这里，在那期间我曾经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这个伟大首都的情况。在那里停留的最后几天，我了解到了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内情。我甚至出席过国民议会的会议，正好在开会时人民闯进会场里来了……我观察了巴黎人民所采取的立场，听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当前的主要活动家的讲演，于是我明白，资产阶级情绪中将出现对二月事件的强烈反应；毫无疑问，五月十五日事件将会加速这种反应。但是，这又无疑将很快引起新的人民起义……法国不久就会求助于战争。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我们应当考虑在这里和在您那里我们的共同行动。如果战争首先向意大利发动，我们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战争的矛头立刻指向我们的国家，那末我还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听取德国人的建议……现在我准备在星期日的“社会辩论报”上发表您即将出版新报纸的消息……我打算今年6月底去伦敦。如果您有机会给您在伦敦的朋友写信的话，劳驾请他们接待我。

最忠实于您的

律·若特兰律师^①

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很久没有得到您的消息，接到您最近的来信非常高兴。您抱怨事情进行缓慢和我没有立即答复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岁数愈大就愈懒得动笔了。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观点和感情是始终未变的。我看到，您的最近一封信是由您口授而由您的亲近的秘书，您的可爱的夫人笔录的，那末，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忘记这个布鲁塞尔的老隐士。请向她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同志，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

致兄弟般的敬礼

列列韦尔^②

① 原著所附的若特兰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② 原著所附的列列韦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国民报”上读到反对您的一些卑鄙齷齪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的谎言和恶意使我深为震惊。我认为，每个认识您的人都有义务——尽管这种证明是多么多余的——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给以应有的评价。我感到自己有双重义务：我记得，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型杂志“寄语人民”⁶⁰⁵、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是非常宝贵的。请允许我表示这一希望：请您严厉地惩罚那对您进行诽谤的卑鄙和怯懦的人。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请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敬意

厄内斯特·琼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1860年3月8日于纽约“论坛报”编辑部

敬爱的先生：

在答复您的要求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个人知道您同美国的各种出版物有联系。大约在九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您不仅是我们的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丰厚的撰稿人之一。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这一点在对俄国和法国问题上都表现出来过。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了过多的兴趣和过大的关心。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问题上，这一点大概表现特别明显。在同情意大利人民方面，我和您是完全一致的；我和您一样不信任法国皇帝的诚意，一样不相信他会给意大利自由，但是，我并不像您和其他德国爱国者那样，认为德国的情况令人耽心。

我必须补充一点，您在所有经过我手的您的文章中，对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您的许多文章都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

^① 原著所附的琼斯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近五六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充当中间人,把您的作品交给“普特南氏月刊”⁶⁰⁶(一家水平很高的文学刊物)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我也是它的编辑,您曾经给它寄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的说明,我乐意为您效劳。

现在仍然忠实于您的

“纽约论坛报”主编 查理·安·德纳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经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一达从中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则汲取“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本来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最近一篇社论中的用语。法国人自己怎样评价和认识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1860年10月14日第42号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报上谈论起北方各大国之间的秘密会谈,谈论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了吗?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给他一本按格朗基奥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其响亮的标题是‘联合’。利美腊克先生对同英国结盟也许表示过不满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哥里大帝勋章的沙特勒(从他的风格判断,他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载了或者转载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报告。‘吉耳里教父’⁶⁰⁷的作者(艾

^① 原著所附的德纳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德门·阿布)已经认为必须用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们,他在剧院遭到惨败后又来向柏林议会提出明智的建议。据说,克莱维尔先生最近打算澄清被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马地峡问题;毫无疑问,在10月21日的王公会晤之后数日,我们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会出现一种华丽的玫瑰色的小册子,它的标题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见记’。

文学小神们之侵入政治领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许多原因有联系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智慧和感情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读者开心的可悲职业的先生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唤醒他们的读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他们老一套的幽默歌曲和笑话。他们自己也像他们要为之解闷的那些人一样受到苦闷、悲伤和沮丧的煎熬。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才在绝望中有的去写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认真研究过一小时政治的和内心根本没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要笔杆的冒险家突然对自己说:‘我得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要使那些本能上回避我的人都来注意我,我该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列奥塔尔事件的小册子还是关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应当向惊异的世界去揭露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问题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风格来表露自己对名声败坏的女人们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风格来表达对于受到伊斯兰教的狂热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马龙派的悲哀?应当写里格尔博什小姐的赞美诗还是教皇世俗政权的辩护书?我坚决选择政治。我用国王和皇帝来娱乐我的读者,比用荡妇好得多。’我们的名士派的编外人员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就去翻阅‘通报’,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蹉跎了几天,拜访了一些官吏,终于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宫廷的兴致的风向;然后就选择这股风可以适当吹满的一个标题,于是他的大功就告成了。现在他的书可以认为已经写好了;因为目前在小册子里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题,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间可能有的那种关系。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场的小册子的价值加以说明吗?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为它们的作者所表现的空前无知、不可容忍的轻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异不止。这里我所说的还不是其中最坏的……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现象,每年都增加一些使我们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

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吗？”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关于“拿破仑的救世政策”的一段话。“曼彻斯特卫报”⁶⁰⁸——它以报道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闻名全英国——驻巴黎的一个通讯员以独特的方式报道了这样一则趣闻：

《Paris, November, 8... 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 the《National-Zeitung》》. (路易-拿破仑在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方面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金钱。)(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这一次却弄错了。据说，弗·察贝尔为了证明他没有被奥地利收买，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阵营。至少柏林是这样告诉我的。同邓斯之歌中的简直一模一样！

16. 补遗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正当最后几个印张付印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了“时代呼声”(1860年)10月号。流亡的议员的机关报“德国月刊”过去的出版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文化上司的阿·科拉切克，在第37页上谈到他的朋友卡尔·福格特时说：

“日内瓦‘水泥’股份公司(参加经营的不是别人，正是卡尔·福格特先生自己)建立于1857年，而1858年股东们就已经一文不名，检察官立即以欺诈罪监禁了一位经理。进行逮捕的时候福格特先生正在伯尔尼，他急忙赶回

来,被捕者被释放了,案件暗中了结,‘以免出丑’,但股东们却损失了一切。照这个例子来看,不能说财产在日内瓦是受到足够保护的,卡尔·福格特先生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显得更奇怪了,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上述公司的理事之一**;然而,在法国如有这类案件就到理事中间去寻找罪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用他们的财产来满足股东们在民事诉讼中的要求。”

约·菲·贝克尔在他的信中(第十章)谈到使**詹姆斯·法济**先生投入十二月怀抱的银行事件,那就用它来同这事比较一下吧。这种细节极有助于解决小拿破仑如何成了他那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谜。大家知道,小拿破仑本人不得不在 *coup d'état* (政变)和……克利希⁶⁰⁹之间进行选择。

(b)科苏特

下面摘录的同科苏特谈话的记录确凿地证明,科苏特对俄国是匈牙利的主要危险这点了解得多么清楚。这篇记录是现在 House of Commons (下院)的最有名的激进派议员之一作的。

“1854年5月30日晚在……同科苏特先生谈话的记录

……恢复匈牙利的严格法制(他说,即科苏特说)可以重建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联盟并**阻止俄国在匈牙利找到同盟者**。他(科苏特)将丝毫不反对恢复法制。他准备劝告他的同胞,当这种恢复可以达到的时候,就要充满信心地接受它,他保证自己决不会妨碍这种转变。他本人不打算返回匈牙利。他本人不想促使奥地利采取这种方针,因为他不相信奥地利将回到法制,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允许我说这就是他的观点,必要时,他将公开证实这种观点,但是由于他不指望奥地利会自愿放弃它那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他不会提出任何建议……要是1848年,他是会同意派遣匈牙利军队去击退皮蒙特人的攻击的(科苏特先生在1848年走得更远,他靠在佩斯的议会中的一篇激烈讲话,做到派匈牙利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叛乱者”),但是,他不

会利用这些军队来占领奥地利的意大利，就像他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匈牙利一样。”^①

一切时代，人民创造神话的幻想力都表现在发明“伟人”上面。最有说服力的这类例子毫无疑问是**西蒙·玻利瓦尔**。至于**科苏特**，例如，他被人颂扬为消灭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人。然而他同三项伟大措施（实行普通征税、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无偿地取消教会什一税）毫无关系。**普遍征税的法案**（首先免除了向贵族征税）已经由瑟美列提出；废除徭役等法案由萨博耳奇的议员**博尼什**提出，而什一税则是教会通过它的叶凯尔法鲁希神甫自己放弃的。

(c) 艾德门·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

我在第八章末尾表示了这种看法：**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或如最初用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是重新译回法文的达-达·福格特用德文编写的丹屠小册子的摘要。对这种看法所能提出的唯一怀疑是，这位遭受失败的喜剧作家**艾·阿布**根本不懂德文。但是，难道吉耳里 *compère*（教父）不能在巴黎找一位 *commère allemande*（德国教母）吗？谁可能是这位 *commère*，还是一个谜。大家知道，“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这一小册子是作为路易·波拿巴的巴登-巴登之行 610 的记要发表的；这本小册子应当事先把他的建议告诉摄政王并向普鲁士说明，像小册子的结束语中所说的，普鲁士有十二月二日制度这个《*un allié très utile qui est peut-être appeié à lui (Preußen)*》《*rendre de grands services*,

^① 同科苏特会谈的记录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pourvu qu'elle s'y prête un peu》(“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普鲁士〉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话”)。《pourvu qu'elle s'y prête un peu》译成德文就是:“在普鲁士把莱茵省卖给法国的条件下”;这个秘密已被艾·阿布在1860年春天用法文(见第九章“代理机构”)在“民论报”上透露。在这种足以加重别人罪过的情况下,我不应当根据简单的猜测,就把某人说成是艾·阿布这位失败的喜剧作家和丹屠出版的小册子的作者的德国提词人。但是,现在我有权声明,吉耳里 compère (教父)的德国 commère (教母)不是别人,正是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对阿布的小册子写过著名的回答的那位伦敦的德国流亡者^①未必猜到了这一点!⁶¹¹

^① 西·路·波克罕。——编者注

卡·马克思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 [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
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①。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载于1859年10月27日
“总汇报”第30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① 有关此点见本卷第514—517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
“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⁶¹²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我从汉堡的一位朋友寄给我的“自由射手”第132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责任以他那公认的权威干预**福格特**案件。他的逻辑的 Horsepower（马力），或者更正确些说，他的逻辑的 donkeypover（驴力）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极妙的论断上：既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给他寄去匿名传单的副本，可见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的原本一定是 falsum（假货）。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他是转弯抹角地说的。

不过，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能够证明我的时间毫无价值，因此，我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来把它浪费掉。

从1850年底起，我就同伦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个团体团结的唯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团体就立即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的努力，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的过程就特别加速了。那以后的9年中，我一直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有20万订户，读者范围大致同“自由射手”相同。我是否有一次

提到过哪一位德国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语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5年中，德国报刊，特别是美国的德文报刊，曾满纸是这些英雄好汉们对我的攻击。

不错，这期间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责对之敬仰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没有诽谤过他们。例如，我攻击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的派系不同的报纸——从宪章派的“人民报”到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闻”都刊载了我的“诽谤”，而且伦敦、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没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15000个单行本，我的罪过就更加不可宽恕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虽然在德国境内到处遭到没收，但在美国流传很广，当时伦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⁶¹³。我直到今天还在“论坛报”上“诽谤”“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财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法，他的 *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给“纽约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谢它对这些“诽谤”攻击进行了反击。七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该书在巴登—瑞士边境上被毁掉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得谅解我的。现在这种诽谤是符合民主作风了，因为它是在“上司的恩许”下散布的。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以外，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①也证明我常常弄错时间。1848年和1849年，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来维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嚣得最凶的是谁呢？不正是的约瑟夫·

① “科伦日报”。——编者注

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吗？不错，当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没有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至于“新莱茵报”过去的编辑们始终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从前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现在的朱泽培·德尔·蒙特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争初期发表的“波河与莱茵河”，一书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狭义的”爱德华·梅因式的民主，我在经过九年的不加理睬之后，只不过表示了两次（而且是最近）：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的确，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漂亮词句从纯粹文法观点上提出过一些意见。除了那篇标题为《Quid pro quo》的论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文章⁶¹⁴以外，这就是我给“人民报”写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善良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的”规则，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阵营转向保皇主义阵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处于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开头时所处的正好相反的窘境。他是想从“有”到“无”，而就则想从“无”到“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费笔墨，现在向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问题：

(1) 5月9日在乌尔卡尔特所组织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没有把内容同“警告”这个传单完全符合的关于福格特的一些消息告诉我？

(2) 布林德是不是在5月27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其内容基本上同传单“警告”的一样，只是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

(3) 布林德有没有委托别人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大街3号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自费印刷上指的那个传单？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伟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约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谁叫印刷“警告”这个传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传单而受到法庭追究。福格特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这个传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传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说的：three courses open to himself(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谎。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利印刷这个传单的消息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该进行解释。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由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结这全部事情，并且用宽宏大量的谦逊精神来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清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德国帝国摄政和 de facto (实际的) 法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该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吗？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改革报”
第 139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6 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卡·马克思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露他的来源从所谓民主营垒转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对助长这种 *quid pro quo*（概念的混乱）一点也不感觉兴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总汇报”第 313 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

(1) 5 月 9 日在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曾把在传单“警告”上对福格特提出的全部指控告诉过我。这些细节他也告诉过别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语言上来看，他的口头讲述和印出的传单完全相同，所以 *de prime abord*（一开始）便很自然地认为传单是他写的。

(2) 在 5 月 27 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传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认识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议他们宣传波拿巴主义以获取《*large bribes*》（“巨额贿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诉讼的时候，“自由新闻”的主编多·科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请求我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为谁所写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生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谦恭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勒

特先生也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

(3) 菲德利奥·霍林格爾的声明简直可笑。菲德利奥·霍林格爾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所以他擅自给自己造了一个同这个 pecadillo (小过) 毫不相干的证明。“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爾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 是偶然的。这样一来, 也不用证词, 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 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爾印刷所”。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 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 mystère (秘密) 就都揭穿了。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
园格拉弗顿坊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36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
第325号附刊

卡·马克思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⁶¹⁵

1860年2月4日于伦敦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致“自由新闻”编辑

阁下：

您记得，在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上曾有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文章。这篇文章用德国流亡者所熟悉的形式揭穿了日内瓦的福格特先生，虽然文章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它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意大利战争爆发时，曾建议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德国民主派接受《large bribes》（“巨额贿赂”）。作者为这种行贿企图遭到愤怒的反击感到非常高兴。我肯定，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如果我弄错了，您可以反驳我。不久以后，在伦敦散发了德文的匿名传单，标题是《Zur Warnung》（“警告”）。这个传单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自由新闻”上那篇文章的翻版，只是引用了较多的细节和福格特的名字。伦敦的德文报纸《Volk》（“人民报”）转载了这个匿名传单，后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奥格斯堡报”）又从该报把它转载了，这以后，福格特认为该报诽谤他而提出控告。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当时在

“人民报”的承印人霍林格尔那儿工作的排字工人费格勒先生的书面声明，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并且是**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我当时已经通知您，这份声明已转寄给“奥格斯堡报”了。在奥格斯堡法院拒绝对这一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布林德先生**终于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了文章。他不仅断然否认匿名传单是他写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称，传单根本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为了证实后面这一点，他发表了霍林格尔本人和自称在霍林格尔印刷所连续工作了十一个月的一个名叫维耶的排字工人签过字的声明。我已经在“奥格斯堡报”上^①对布林德、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联合声明作了答复，但是**布林德**再一次提出反驳并且又举出霍林格尔和维耶作证。一开始就从个人目的出发把我看做是传单的匿名作者的**福格特**，当时发表了用最下流的造谣中伤来攻击我的**小册子**。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的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续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

^① 见本卷第760—761页。——编者注

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预谋的造谣者。

如果我说得不对,那他可以通过英国法院很容易地驳倒我。

卡尔·马克思

1860年2月4日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6年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

卡·马克思 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因为为此需要询问一些现时不在欧洲的人。

因此，暂时我只谈谈下面的情况：

(1)根据“国民报”所编的文选来看，——尽管我作了一切努力，但直到现在无论在伦敦书商那里或者在以前曾收到过福格特寄的所谓“研究”的熟人那里，我都没有能够找到福格特的这本小书——福格特所写的胡言乱语不过是他九个月前在他私人的“通报”即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的进一步发挥。当时我让伦敦转载他的诽谤书，不加任何评论。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在一个了解人而且知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地方，就足够评定一位教授先生的了。

(2)福格特先生对我的征讨的借口，同意大利征讨的借口一样，是“观念”。这就是，似乎我是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根据我用英文发表的通告（我附上一份）您可以看出，我找到了办法迫使

布林德先生和他的娄罗们或者默认这个借口是谎言,或者由英国法院来揭穿他们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载于1860年2月10日“人民报”第35号;1860年2月10日“科伦日报”第41号;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第18号;1860年2月17日“总汇报”第48号附刊(有歪曲)和其他德国报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36年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

卡·马克思 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

阁下：

您在您今天的报上刊登了一封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信，充满了对我的诽谤和诬辱。这封仿佛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写的信，事实上是在柏林写就的，它实质上不过是1月22日和25日柏林“国民报”上登载的两篇文章的荒诞而冗长的重述而已。这家报纸得为自己的诽谤行为而受到普鲁士法院的审理。福格特发表对我的诽谤书的**虚伪借口**是：好象我是匿名的德文传单《Zur Warnung》（“警告”）的作者。这种传单起初是在伦敦流传，后来由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从附上的报上的消息可以看出，我已向我的对手们提出把这个问题提交英国法院审理。

最后我要求：如果您不希望作为一个犯诽谤罪的被告而被传到法庭，那您就得在下期报纸上刊登一项对您的轻率行为 *amende honorable*（表示歉意）的声明，因为您竟敢轻率地侮辱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人格品德、过去的政治活动、他的著作和他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您应该承认——都是您毫不了解的。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4年版第25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私人性质的信

我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收到注明日期是1859年10月16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有这么一些话，原话如下：

“请您相信，我们将以特别的感激利用一切机会，要向您，可尊敬的马克思先生，表示我们的谢忱。”

我并不希望也不期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谢忱”和“特别的感激”，这一点，我的10月19日的复信^①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了。但是，我在这种情形下特意期待的是什么呢——最低限度是 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

“特别的感激”和“谢忱”表现如下：

(1) 我的第一个声明没有被刊登^②，而是登载了布林德的无耻的声明以及用 conspiracy（阴谋）手段弄得的两份伪证。汉堡的“改革报”却立即刊登了我的声明。

① 见本卷第75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56—759页。——编者注

(2)我曾不得不采用 *douce violence* (温和的压力) 使我答复布林德的声明能够被刊载。^①

但是,我的合法要求被忽视了,我的声明不是刊载在刊登布林德的攻讦的同一地方,即主要的一号报纸上。

(3)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了布林德的第二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恬不知耻地称我说的话是明显的谎言,并且又引用了维耶和霍林格尔的那两份应受刑事处分的证词。该报声称它认为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从而剥夺我的答复的机会。

(4)2月6日我把最近一个声明连同用英文写的通告^②一并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非常可敬的编辑部把我的声明置之不理,但却刊载了布林德的声明,而他的声明却是由于有了我的通告才写的。不错,报纸避免转载这位伟大的外交家附上的 *billet doux* (情书)。其次,它刊载了注明的日期比我的声明迟三天(就是:2月9日于伦敦)的比斯康普的声明。最后,在该报深信“科伦日报”、“人民报”等等早已刊载了我的声明以后,它才决定登载我的声明,但是……同时却殷勤地竟自负起了**书报检查**的责任,对我的声明作了任意的修改。1842—1843年我在科伦遭受过普鲁士王国的双重书报检查616,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1860年我还得受到科尔布博士先生及其同伙的书报检查。

我认为对这种行为作更详细的说明是毫无益处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版第2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见本卷第760—76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62—76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给“自由射手”和“改革报”
编辑部的信⁶¹⁷

爱德华·梅因先生在“自由射手”第 17—21 号上大放厥词，对此我只谈下面一点：

我正在进行的控告柏林“国民报”诽谤的诉讼，就足够从法律上说明福格特的小册子了。他的同谋者爱德华·梅因不能企求同样的荣誉。我能够为爱德华·梅因做的是：在那本将在诉讼结束后出版的小册子中，分配给爱德华·梅因先生一个合乎他身分的席位。

卡尔·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28 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 1860 年 3 月 7 日“改革报”
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卡·马克思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⁶¹⁸

1860年2月初,承蒙“总汇报”编辑部发表了 my 的声明。这个声明开头几句话如下: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①

1860年2月,我在柏林对“国民报”的主编弗·察贝尔的诽谤行为起诉。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最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检察官在1860年4月18日作出决定拒绝“干预”弗·察贝尔,因为据说**缺乏公众利益**,所以没有理由这样做。1860年4月26日,他的拒绝为检察长所批准。

于是我的律师提出**民事诉讼**。王国市法院在1860年6月8日决定**不受理我的起诉**,因为弗·察贝尔的确实有侮辱名誉的“言论和论断”,似乎是由**简单地引证别人的词句**构成的;并且其中并没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1860年7月11日的决定又宣布:**引证的形式丝毫不能改变文章的应受惩罚与否的问题**,但是文章

^① 见本卷第765页。——编者注

中有侮辱名誉的地方同我“个人”没有关系。此外，“本案中”“不能认为”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这样就承认了市法院不承认我有起诉权的决定。今年 10 月 23 日我收到王国最高法院 1860 年 10 月 5 日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没有“发现”王国上诉法院有任何“法律的错误”。因此，不受理对弗·察贝尔起诉的决定仍然有效，案情也就没有得到公开审理。

我对福格特的答复将在近日问世。

卡尔·马克思

1860 年 11 月 24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载于 1860 年 12 月 1 日“总汇报”
第 336 号附刊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弗·恩格斯写的“军队”这一条目是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首批条目之一。出版百科全书的发起人之一查理·德纳于1857年4月邀请马克思参加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意见，同意为百科全书撰写若干条目。同时恩格斯也答应帮助马克思写一些军事和军事史的专题条目。以后恩格斯为了给马克思创造条件去完成经济研究工作，而把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起来。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许多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恩格斯在这方面也帮助马克思阐明军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中的合作，正如他们长期共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一样，是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间的友谊的光辉范例之一。

在德纳和马克思预约的、由恩格斯承担写的首批条目中就有“军队”这一条。这个条目要概括叙述武装力量、军事学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的历史，同时还要评述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军队的状况和组织。恩格斯在写这个综合性条目的同时，还必须写预约的首批条目中的其他许多条目，所以这个任务就更加复杂了。尽管如此，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于1857年7月着手收集资料，8月动手写，不超过9月24日就完成了这个条目。在“军队”这一条中，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军事、军事史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各次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深刻的研究。为了写这个条目，恩格斯利用了许多专门的资料，从古代历史家和军事著作家（希罗德德、色诺芬、萨吕斯提乌斯、波利比乌斯、维格齐等）的著作到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威金逊、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和吕斯托夫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利用了各种参考书刊。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提到了其中一些资料。在恩格斯的准备材料中保存下来的，有他从1855年在哥达出版的吕斯托夫的“尤利乌斯·凯撒时代的军事和他的统帅

艺术”（《Heerwesen und Kriegführung G. Julius Cäsars》·Gotha, 1855）一书，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7版（1842年版第3卷）的“军队”这一条中所作的摘录。马克思为了这个条目也从有关战争史的各个问题的科学著作和参考书刊中作了摘录。他从1837年在伦敦出版的威金逊的三卷集著作“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Manner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London, 1837）以及从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波利比乌斯、约瑟夫·弗拉维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所作的摘录也保存下来了。马克思收到已写好的这一条目之后，在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给以极高的评价。他着重指出，恩格斯在这一条目中以军队史为例成功地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马克思也对古代雇佣军队（迦太基人的雇佣军队）的产生以及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和东方各民族军事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马克思认为这些问题在条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后来，恩格斯在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军队”的补充条目“炮兵”、“骑兵”、“筑城”和“步兵”时，都很认真地考虑到了这些意见。

“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是一部科学参考书，它是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些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出版的。百科全书的编辑是查·德纳、里普利少校和其他一些人。百科全书由纽约的出版公司“丹·阿普耳顿公司”于1858—1863年出版，共16卷，1868—1869年按原版重印。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就它包罗的各部门知识的广博和参考资料的丰富来说，这是当时最好的书籍之一。虽然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一样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新百科全书”仍然收进了许多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在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不顾编辑部向作者提出的不得阐明党派观点的条件，而采取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写这些文章。

“美国新百科全书”的条目是不署名的。只是在第二、五和十六卷上附有篇幅最大的条目的作者名单。名单上提到马克思是“军队”、“炮

兵”、“贝尔纳多特”、“玻利瓦尔”、“骑兵”、“筑城”、“步兵”和“海军”等条目的作者（实际上，这些条目除了“贝尔纳多特”和“玻利瓦尔”之外都是恩格斯写的）。至于其余的条目，则根据他们之间的书信、查·德纳给马克思的信件、马克思登录寄往纽约的条目的笔记本和其他档案材料（为写这些条目所作的提要 and 摘录等）来确定出自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手笔。共发现有 67 个条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另外还有两个短条目——“阿本斯堡”和《Cartouch》——很可能被百科全书的编辑部大大删节过了。编辑部在条目发表时常常改动原稿。这两个短条日本卷没有收入正文，而收入相应的注释中（见注 53 和 252）。

“毕洛夫”这个条目没有收入本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的这一条目的原稿，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条目的准备材料来判断，已被百科全书的编辑部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在本卷准备过程中，查明了一系列至今仍被某些西欧书志学家毫无根据地硬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的真正作者。例如，被人们硬说是马克思写的“阿布德-艾尔-喀德”和“宪章主义”这两个条目的作者是某个威廉·汉弗莱，“伊壁鸠鲁”这一条的作者是德国自由派记者海尔曼·腊斯特，“社会主义”这一条的作者是 P. 葛德文，“黑格尔”这一条的作者是亨利·斯密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从 1857 年 7 月继续到 1860 年 10 月，就我们所知道由他们撰写的条目刊载于百科全书第一至五卷、第七卷、第九卷和第十二卷。1868—1869 年百科全书重印时，这些条目没有改动，以后在作者在世时就没有再印过。苏联在 1933 年才第一次把“美国新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收集在一起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一卷第二部。本版刊印的这些条目是最完全的。——第 5 页。

- 2 恩格斯在这里把古埃及步兵的战术单位假定为“营”。——第 5 页。
- 3 Testudo（直译是：“龟甲”）——在攻城槌破坏敌人要塞的围墙时以及其他的围攻作业中，为了保护围攻者而采用的一种遮棚。

接近车（vinea——直译是：“葡萄园”）——在古代围攻要塞时用树条编成并复以湿皮革和草皮的一种护棚。——第 6 页。

- 4 指约·加·威金逊“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1837年伦敦版第1卷第67—68页(J. G. Wilkinson·《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Vol. 1, London, 1837, p. 67—68)。——第6页。
- 5 “圣经”,“以西结书”第21章第22节和第26章第8节。——第7页。
- 6 希罗多德“九卷史”第7卷。——第8页。
- 7 指希腊波斯战争(公元前500—449年)时期规模最大的几次会战。在希波战争中,希腊城邦保卫了自己的独立,回击了征服小亚细亚各希腊城市并多次征讨巴尔干半岛(其中主要的几次发生在公元前492、490、480和479年)的波斯强国。从公元前479年起,希腊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于公元前449年与波斯王缔结和约,迫使他放弃侵略爱琴海区域的野心并承认小亚细亚希腊人的独立。在战争过程中,古希腊的主要奴隶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
 公元前490年9月,米太雅第统率的雅典人和普拉迪人的军队在马拉松盆地(阿提卡)击溃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这次会战决定了波斯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失败结局。
 公元前480年7月在温泉关会战中,希腊一支人数不多的同盟军在斯巴达王勒奥尼达斯的指挥下两天内英勇地击退了薛西斯的庞大的波斯军队的进攻,阻挡了他们通过温泉关峡谷进入希腊中部的道路。第三天,波斯人绕过了希腊人。勒奥尼达斯将主力撤出战斗,而率领300名斯巴达人继续防守山道,在众寡不敌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了。
 公元前479年秋季在普拉迪(希腊中部)会战中,斯巴达人包散尼和雅典人亚立司泰提统率的希腊联合部队大败波斯军队。同年,希腊登陆队在米卡列角(小亚细亚沿岸)击溃了波斯军队,并且毁坏了被拖到岸上用以构成营垒的波斯船只。这些胜利彻底消除了波斯侵犯巴尔干的威胁。——第8页。
- 8 公元前334年5月,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格拉奈卡斯河地区,马其顿军队和波斯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结果马其顿军队击溃了波斯军队。——第 8 页。

- 9 从梭伦改革时期(公元前 594 年)起,雅典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根据每年农田收入的多寡划分为四个财产等级。这种等级划分也是雅典军事组织的基础。头两级的人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但必须服兵役,并且开支很大(第一等级的人要建造战船,第二等级的人要当骑兵)。第三等级的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限制,但他们组成军队中的骨干——重装步兵。第四等级(贫民)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公民,长期被剥夺担任任何职务的权利,最初不服兵役;但是后来由他们组成轻步兵。——第 9 页。
- 10 恩格斯所说的“雅典同盟者”是指加入雅典海上同盟(最初叫做提洛同盟)的希腊各城邦(主要位于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雅典海上同盟是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在公元前 478 年建立的。这个同盟起初具有平等国家联合的性质,但是随着雅典力量的增长,雅典使同盟者屈服于它的权势下,并把它们变成纳贡者。雅典海上同盟于公元前五世纪末瓦解。公元前 378 年,雅典人又局部地恢复了同盟,但新的同盟仅存在到公元前 355 年。——第 10 页。
- 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是希腊城邦的两个集团——雅典海上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雅典和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希腊城邦的贸易竞争以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和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寡头制之间的政治矛盾所引起的。雅典奴隶制国家的内部危机和雅典同盟者对雅典独裁统治的不满的增长,终于促成了斯巴达的胜利。根据公元前 404 年的和约规定,雅典应交出几乎整个舰队并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第 10 页。
- 12 西西里远征是雅典人于公元前 415 年为了征服西西里的希腊各城邦,首先是叙拉古而举行的。雅典指望通过这次远征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权,扩充资源以打击其主要竞争者——斯巴达。西西里战争持续到公元前 413 年,以雅典海军和陆军围攻叙拉古遭到惨败而告终。这次惨败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使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集团处于有利

地位。——第 11 页。

- 13 珀里俄科是古代斯巴达的无全权的特殊等级。珀里俄科占有土地和财产，而他们当中最富裕的还占有奴隶。他们享有人身自由，甚至享有某些自治权，但是被剥夺了其余的一切政治权利。——第 13 页。
- 14 赫罗泰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赫罗泰是斯巴达国家的财产，他们耕种归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纳国家规定的地租（约占收成的一半）。赫罗泰不断举行起义，但都被奴隶主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 13 页。
- 15 列夫克特累（贝奥提亚）会战是贝奥提亚战争（公元前 378—362 年）期间忒拜军队和斯巴达军队之间于公元前 371 年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战争中，民主派执政的忒拜对寡头政体的斯巴达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在希腊建立的霸权进行了斗争。在列夫克特累会战中，忒拜统帅埃帕米农达斯在战争史上第一个采用“斜形战斗队形”，不沿正面平均分配兵力，而把强大的突击力量集中在左翼，即主要突击方向上。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术规定防御战和进攻战相结合，骑兵和步兵协同动作。列夫克特累会战的败北摧毁了斯巴达的威力并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瓦解。忒拜在希腊暂时取得了优势。——第 13 页。
- 16 忒拜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在埃帕米农达斯的统率下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岛时，于公元前 362 年在曼提涅亚（伯罗奔尼撒）采用列夫克特累会战所采用的战术，击败了斯巴达军队。但是，忒拜人遭到的惨重损失及其统帅的阵亡，使得他们不能巩固胜利。忒拜未能保持住在希腊的霸权。——第 13 页。
- 17 指公元前 440 年雅典军队对塞莫斯城（在爱琴海东南部的塞莫斯岛上）的围攻。加入雅典海上同盟的塞莫斯岛的居民对雅典的专横统治不满，并为了脱离同盟而举行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者，雅典派出了以伯利克里为首的强大的海军远征队。经过数月围攻，塞莫斯城被迫投降，塞莫斯岛上重新建立了雅典的更为专横的统治。——第 14 页。

-
- 18 恩格斯所说的希腊的被征服在这里是指希腊各城邦屈从于马其顿王的统治。菲力浦二世在位时，马其顿强国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力图征服整个巴尔干半岛。菲力浦依靠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寡头，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并干涉他们的冲突，从公元前 357 年起逐渐地巩固了自己在希腊的地位。公元前 339 年，形成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的同盟，以对抗马其顿。同盟的军队于公元前 338 年被菲力浦的军队击溃。结果，希腊反马其顿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希腊各城邦的政权落入了菲力浦的傀儡们手中。公元前 337 年，在科林斯召开的全希腊会议通过决议宣布马其顿王为全希腊军队的统帅，从而巩固了马其顿对形式上仍然被认为是“独立的”希腊城邦的统治。——第 16 页。
- 19 公元前 331 年在阿尔贝雷（说得确切些，是在亚述城市阿尔贝雷西北的高加米拉村）进行过一次古代规模极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击溃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军队。马其顿军队在阿尔贝雷取得了胜利，并夺取了波斯兵营及其全部辎重和钱财，这对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 16 页。
- 20 亚该亚同盟是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奴隶制城邦为了对抗马其顿以及镇压奴隶和城市贫民的运动而于公元前 280 年成立的同盟。该同盟拥有雄厚的兵力，并且摆脱了马其顿君主国的控制。公元前 146 年该同盟的军队被罗马人击溃，它的领土并入马其顿，后者从公元前 148 年起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第 18 页。
- 21 特里布斯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王实施改革的时期（公元前六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划分为 4 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划分（“特里布斯”一词的原意是“部落”）。这种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第 19 页。
- 22 在古罗马史的早期把构成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并须在骑兵中服役的富裕公民叫做骑士。后来，属于骑士阶层的、罗马奴隶主中的商业高利贷者，也叫做骑士。——第 19 页。

- 23 古罗马的第一次国内战争(公元前 88—82 年)是由两个敌对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引起的。一个集团以奴隶主贵族的走卒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为首,另一个集团则以依靠商业高利贷阶层并讨好城乡平民的凯尤斯·马利乌斯为首。这次战争是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以及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的民主阶层之间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以马利乌斯派的失败和苏拉专政的建立而结束。这是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帝国的一个步骤。——第 20 页。
- 24 指穆士拉河(北非)地区的会战。在公元前 109 年的这次会战中,由昆图斯·采齐利乌斯·梅泰鲁斯统率的罗马军队击败了努米迪亚王尤古尔塔的军队。这是罗马人在他们一开始失利的尤古尔塔战争(公元前 111—105 年)中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后来,尤古尔塔在战争中被罗马人打败。
-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罗马历史学家萨吕斯提乌斯的著作“论尤古尔塔战争”第 48—53 章。——第 20 页。
- 25 罗马的每一级军事单位都有特殊的军徽。从凯尤斯·马利乌斯时代起,军团的军徽是固定在矛杆上的银鹰。——第 20 页。
- 26 罗马和伊皮罗斯(希腊西北部)王皮洛士之间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80—275 年。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不论罗马或是打算在西方建立庞大帝国的伊皮罗斯王,都力图征服这些城市。战象的使用在皮洛士的战术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战争初期罗马遭到两次惨败,但后来在迦太基的援助下击溃了皮洛士的雇佣军队、并把他逐出了亚平宁半岛。对皮洛士的胜利加速了罗马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第 21 页。
- 27 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00—197 年)时期公元前 197 年的基诺斯克法耳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罗马军队在梯特·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的指挥下击溃了马其顿王菲力浦五世的军队。马其顿在失败后军事力量被摧毁了,而罗马在希腊的势力则巩固下来了,这就使罗马后来在希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第 22 页。
- 28 同盟战争(公元前 90—88 年)是罗马同反抗罗马统治而举行起义的意大

利各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些部落和罗马共和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罗马奴隶主统治他们所征服的部落和民族的一种形式）。脱离罗马并结成联盟的古意大利人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罗马不得不满足他们所提出的给予他们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一主要要求（最初采用只向“忠实的同盟者”让步的办法以瓦解联盟）。起先加入罗马国籍是有一定政治限制的，后来渐渐地所有自由的古意大利人都可以加入了。——第 22 页。

29 罗马高卢（相当于法国南部的旧行省——普罗瓦斯）是高卢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被罗马人占领。——第 22 页。

30 指罗马作家维格齐的著作“军事简述”（《Epitome rei militaris》）。——第 26 页。

31 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是德意志封建主为掠夺意大利城市和霸占土地而举行的侵略性远征。首次举行远征的是 962 年在罗马登上帝位（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的皇帝奥托一世。这种远征在十至十三世纪最为频繁，后来虽然德意志帝国已衰落，国内封建割据加剧，但是这种远征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

十字军远征是西欧的大封建主，骑士阶层和意大利商业城市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打着把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的基督教圣迹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宗教旗帜而向东方进行的军事殖民运动。十字军远征的倡导者和鼓舞者是天主教会和力图取得世界霸权的罗马教廷，而主要军事力量则是骑士阶层。想要借远征摆脱封建主压迫的农民也参加了远征。在历史上有名的八次十字军远征是：1096—1099 年、1147—1149 年、1189—1192 年、1202—1204 年、1217—1221 年、1228—1229 年、1248—1254 年和 1270 年。在上述几次远征中，十字军对它所到的国家的居民，不论是伊斯兰教居民或天主教居民，都进行了抢劫和蹂躏。十字军的掠夺目标不仅仅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十字军在东地中海沿岸占领的地区并不巩固，不久就被穆斯林夺回去了。——第 26 页。

32 指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的几次大规模会战。战争的起因是两国

封建贵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间争夺佛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觊觎法国王位。在战争初期，英军占领了法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十四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被占领的领土几乎全部被收复了。英国封建主趁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法国封建主发生内讧的机会，于1415年恢复了军事行动，并且很快就占领了包括巴黎在内的整个法国北部。但是，在法国展开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终于把侵略者逐出了法国领土。英军手中只剩下一个加来港。

在文中所提到的几次会战（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会战、1356年9月19日的普瓦提埃会战和1415年10月25日的阿津库尔会战）中，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巧妙地利用英国大弓对法国弩的优势，并利用下马的骑士同弓箭手之间的紧密的协同动作，击败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第26页。

- 33 指蒙古征服者在进犯俄罗斯领土（1237—1240）后，于1241—1242年侵入中欧时期，欧洲各国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战争。除了波兰的领土以外，莫拉维亚、匈牙利和达尔马威亚也都成了这次战争的战场。蒙古人在与欧洲骑士作战时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的先遣部队几乎到达了威尼斯。但是，由于在征服俄罗斯各公国时所遇到的抵抗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同时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退回到他们在东欧和亚洲的领地。——第28页。
- 34 指十四至十五世纪瑞士各州反对外国侵略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以及1474—1477年瑞士人同企图并吞瑞士联邦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瑞士人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并表明由自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组织严密和团结一致的步兵比骑士队优越。——第28页。
- 35 指马基雅弗利于1519—1520年写的“兵法七卷”（《I sette libri del'arte della guerra》）一书。——第30页。
- 36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在他的威尼斯同盟者的支援下，于1515年9月13—14日在马利尼亚诺（意大利北部）击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

佣军队。这是 1494—1559 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所。除意大利各公国君主外，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参加过这一斗争。这一斗争的最后结局是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而意大利陷入西班牙的统治。——第 30 页。

- 37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和查理五世（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军队于 1525 年 2 月 24 日在帕维亚会战。法军惨败，法王弗朗斯瓦本人被俘。这次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中的最后胜利（1559 年法国才最后放弃了统治意大利的野心，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中）。在帕维亚会战中，在查理五世的军队中服务的德国雇佣兵和有效地使用火器抵抗法国骑士队的西班牙步兵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31 页。
- 38 指 1566—1609 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在十六世纪统治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专制的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尼德兰的北方行省荷兰和西兰是革命的堡垒，后来成为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的核心。荷兰在对西班牙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于 1609 年获得了独立（尼德兰南部仍处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1621 年，荷兰和西班牙之间又发生战争，这一战争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交织在一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的独立于 1648 年最后巩固下来。——第 31 页。
- 39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加战争的欧洲国家组成两个阵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同德意志天主教诸侯打着天主教的旗帜并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进攻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

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主要的斗争是在捷克新教徒和皇帝天主教阵营之间进行的,结果捷克战败。1625年,英国、荷兰和丹麦在法国的协助下结盟,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丹麦时期(1625—1629),这个时期一开始,战争就具有全欧洲的性质。但是,丹麦军队被皇帝天主教的军队击溃。1630年,瑞典参战,它在保护新教诸侯的旗帜下,力图在波罗的海南岸站住脚。瑞典时期(1630—1635)以瑞典军队的一连串胜利开始,但在1634年瑞典军队被皇帝和西班牙的联合部队击溃。1635年法国公开站到瑞典和新教诸侯方面。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战争在第一阶段具有反抗封建专制欧洲的反动势力的性质,最后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外国侵略者对德国的一系列入侵。这次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这一和约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第33页。

- 40 上面提到的是三十年战争瑞典时期中的三次会战。

古斯达夫-阿道夫的军队于1631年9月17日在莱比锡(即在布雷滕费尔德)和1632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的雷赫河地区击溃了由梯利统率的皇帝天主教军队。1632年11月16日,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吕特岑(萨克森)击败了由华伦斯坦统率的皇帝军队。——第34页。

- 41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那里的居民(边屯区居民)必须服边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35页。

- 4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莫耳维茨(西里西亚)击败了奥地利军队。

1740—1748年的战争是由于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引起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逝世后因没有男嗣而由其女儿玛丽-泰莉莎继承王位。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追求者拒不承认玛丽-泰莉莎的继承权。在这次战争中普鲁士的主要同盟者是法国和巴伐利亚,萨克森在1742年以前也

是普鲁士的同盟者，但后来参加了奥地利阵营。英国因力图削弱其贸易和殖民的竞争者——法国的势力而站在奥地利一边，撒丁、荷兰和俄国也给予奥地利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援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次战争中曾两次背叛自己的同盟者，单独与奥地利媾和（在1742年和1745年）。战争结果，普鲁士获得了它所占领的西里西亚，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领地仍属于玛丽-泰莉莎。——第36页。

- 43 指欧洲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也积极参加组织反革命的同盟。1792年2月，开始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缔结了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和1793年1月法王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小邦于1793年都公开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对这一同盟（即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的战争延续到1797年。

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行的解放的正义的战争，自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于1794年夏天掌握政权后就开始具有征服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的性质。——第38页。

- 44 指英国的13个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解放战争（1775—1783）。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的原因是：已形成的美国资产阶级民族渴望独立和力图扫清英国殖民统治给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障碍。因此，这次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由于北美人取得了胜利，就建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38页。

- 45 七年战争（1756—1763）是由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两国的殖民竞争引起的。英国联合普鲁士共同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1756—17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这次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告终。根据巴黎和约，法国必须把它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让给英国，这就巩固了英国的殖民势

力和海上势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等国战前的疆界。——第41页。

- 46 因克尔芒会战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时期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于1854年11月5日(10月24日)进行的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俄军的积极行动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的惨重损失,迫使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在恩格斯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42页。
- 47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时期,巴达霍斯要塞(西班牙西南部)两次遭到由威灵顿统率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的围攻。在这次战争中,在英国与拿破仑法国作战的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半岛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在许多地方采取游击战的形式)。1811年3月被法军占领的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达霍斯要塞在同年5月遭到同盟国军的围攻。围攻持续到1811年6月初,由于围攻部队伤亡重大和法国预备队开到而撤除(在恩格斯的这一条目的末尾不确切地指出,围攻是在1811年5月16日阿耳布埃拉会战后过了几天撤除的——这一不确切的地方在该条目刊出后被发现,从1858年2月18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恩格斯使用的一个资料有错误)。1812年2月巴达霍斯要塞再次遭到同盟国军的围攻,在同年4月6日的强攻胜利以后,就转到同盟国军的手里。——第53页。
- 48 郎卡斯特王室的远亲亨利·都铎的部队与约克王朝的英王理查三世的军队于1485年8月22日在博斯威尔特(英国莱斯特郡)进行会战,会战以理查的失败和阵亡而告终。胜利者被宣布为国王亨利七世。蔷薇战争(1455—1485)——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世系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他们的徽章上饰有白蔷薇)和郎卡斯特族(他们的徽章上饰有红蔷薇)之间的战争——以这次会战而结束。这次战争使古老的封建世系几乎完全灭绝,结果新的都铎王朝获得政权,在英国建立了专制政体。——第60页。

- 49 指爱·霍尔的编年史：“高贵而光荣的郎卡斯特王室和约克王室的联合”（《The Union of the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Lancaster and York》），1542年在伦敦出版。——第60页。
- 50 英国内战是力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的贵族保皇派与议会拥护者之间在十七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行的。在第一次内战（1642—1646）初期，主张与国王妥协的分子领导下的议会军遭到失败。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克伦威尔领导的较为坚决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克伦威尔成功地改组了议会的武装力量。在“新模范”军里，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阶层的、要求采取有力的革命措施的民主主义分子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内战有了转机，国王被战胜。但是由于保皇派叛乱和苏格兰封建贵族支持查理一世，1648年春天爆发了第二次内战，这次内战于1648年8月以革命军队的新的胜利而告终。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在英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第61页。
- 51 从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根据许多英文资料作出的摘录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写“艾雷”这一条目时，在选择需用材料方面，马克思给他很大的帮助。在这些摘录中有下面这本小册子的摘录：理·艾雷“向切尔西军事委员会的申述”1856年伦敦版（R. Airey. 《A dresses before Military Board at Chelsea》. London, 1856）。条目后面部分的引文即摘自这本小册子。——第63页。
- 52 大军（Grande armée）是指从1805年起在拿破仑战争的主要战区作战的法兰西帝国武装力量的主要集团。在大军的编成里，除法军之外，还有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意大利、荷兰、德国、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第64页。
- 53 指1809年奥法战争时期在阿本斯堡、兰德斯胡特、埃克缪尔和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五天的会战（1809年4月19—23日）。在战争过程中，拿破仑法国遭到奥地利军队的顽强抵抗，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之后取得了胜利。奥军的顽强抵抗说明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累根斯堡会战虽以奥军的

败退而结束，但奥军的战斗力却保存下来了。

恩格斯大约在写“阿斯佩恩”这个条目的同时，还写了一条题为“阿本斯堡”的短条目，叙述累根斯堡会战的一个阶段，即阿本斯堡会战。该条目 1858 年刊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 1 卷，它很短，估计原稿可能被百科全书编辑部删节了许多。“美国新百科全书”刊载的全文如下：“阿本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 1200 人。有人以为此地就是罗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和华丽的古城堡废墟。1809 年 4 月 20 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下与奥军会战，并将奥军击溃；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 12 门，兵士 13000 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和埃克缪尔会战胜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第 64 页。

- 54 1815 年 6 月 18 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国和荷兰军队以及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这次会战在 1815 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定了第七次反拿破仑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最后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同盟国军在滑铁卢会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英国步兵顽强作战，经受住了拿破仑军队多次的攻击，同时还因为布吕歇尔军队及时赶到，援救了英国和荷兰军队。——第 66 页。
- 55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4—7 日）的莱比锡会战，这是第六次欧洲国家（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同盟的军队与拿破仑法国的军队在 1813 年战局中的一次决战。在这次历史上称为“民族之战”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达 50 万人。同盟国军队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整个战局中的最后胜利，并使德国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第 70 页。
- 56 1812 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恢复它在十八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丧失的在北美的统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复辟的危险，并把这次斗争看做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却把向邻国扩张领土的计划同这个战争联系

起来。1812年，战争的形势有利于英军，但是，1813年美军终于肃清了同加拿大接壤的密歇根州的英军。1814年，英国虽然暂时还占领着华盛顿，但是由于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力量消耗殆尽，并由于美国海军的顺利行动而遭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地位的基础上在根特缔结和约。军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第73页。

- 57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42）时期，法国军队在萨克森的摩里茨的指挥下，于1745年5月11日在丰特努瓦（比利时）会战中击溃了英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联军。

在英美战争期间，英美军队于1814年7月5日在契珀瓦（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进行会战，结果美军获胜。——第74页。

- 58 恩格斯用流行于西欧的“克兰”这个术语表示组成阿富汗各部落的大的氏族联合组织（贺利）。——第78页。

- 59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在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奠基人的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之间发生内讧后于七世纪形成的。——第78页。

- 60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欧洲人称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为大莫卧儿，而他们自称为鉢谟沙赫）。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已完全瓦解。——第78页。

- 61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

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筋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79页。

- 62 锡克教徒是十六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们旨在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和解的平等教义成了从十七世纪末起来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农民的指导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谢尔达尔）领导了锡克教徒各公国。十九世纪初这些公国在一个谢尔达尔朗吉特·辛格的统治下联合了起来，由他治理的锡克教徒国家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1845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1846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成了一个藩属。1848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1849年被完全征服。——第80页。
- 63 还在1837年11月就开始的伊朗军队对赫拉特的围攻一直持续到1838年8月。伊朗的沙赫穆罕默德向赫拉特的进军不仅是伊朗和阿富汗，而且是英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英国政府力图加强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和削弱俄国当时在伊朗已经巩固的势力，并且力图把不利于伊朗的贸易条约强加于伊朗，因此它声称，沙赫的行动是敌视英国的行动，要求撤除对赫拉特的包围。由于沙赫拒绝这个要求，英国政府就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并于1838年派分舰队开入波斯湾，以战争相威胁。伊朗的沙赫被迫撤除围攻，后来又被迫同意与英国签订贸易条约。

马克思写的“对波斯的战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27—132页）叙述了对赫拉特的围攻。从恩格斯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阐明这次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战争的主要资料是下面这本书：约·威·凯“阿富汗战争史”1851年伦敦版第1—2卷（J.W.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Vol. I—II, London, 1851）。——第81页。

- 64 1838年准备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经过与阿富汗接壤的信德地区（印度西北部），这给以后英国殖民者侵占该地区造成了方便。对阿富汗的战争开始时，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强暴的手段迫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军通过他们的辖区。1843年英国人要求当地的封建主承认自己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且在镇压了举行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该地区并入不列颠印度。——第81页。
- 65 西帕依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他们受英国军官指挥。在英印军队中的西帕依部队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对印度邻近国家（阿富汗、缅甸等）进行侵略战争。然而成为英国统治的支柱的西帕依却受到印度人民群众对殖民制度共同的不满情绪的侵袭，这在1857—1859年印度规模极大的民族解放起义期间尤其明显。——第83页。
- 66 指科尔蒙太涅的著作“军事建筑学即筑城法”1741年海牙版（《Architecture militaire, ou, l'art de fortifier》· La Haye, 1741）。——第89页。
- 67 1703年11月15日在斯赫尔巴赫河（德国西部）会战中，法军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军队；法国步兵的刺刀冲杀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这次会战发生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而这次战争是由于西欧国家为瓜分已经衰落的封建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和它的殖民地的斗争以及英、法在海上的竞争和对殖民地的竞争引起的。法王路易十四力图吞并西班牙君主国，而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断绝了男嗣以后，达到了选自己的孙子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目的。英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王朝的代表也是德意志皇帝）、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就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它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虽然西班牙王位已保留给菲力浦·波旁；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哈布斯堡

王朝。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英国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的目的，获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尔卡岛屿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第90页。

- 68 从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手写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巴克莱-德-托利”这一条目是他们的共同著作，虽然最后文字上的修饰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作者在编写该条目时所利用的资料，除了参考书刊以外，还有马尔田斯条约和协定汇编、1827年巴黎出版的若米尼的著作“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4卷（《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Tome 4, Paris, 1827）、1856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的著作“托尔伯爵生平事迹”（《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rafen von Toll》·Leipzig, 1856）。在这些书中，对1812年卫国战争历史的叙述是带有片面性的，有时还作了极大的歪曲，这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对这段历史的某些方面所作的阐述，因为他们在当时缺乏比较客观的资料。这一条目也未能例外，其中不确切地说明了任命米·伊·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的原因、库图佐夫放弃格查茨克附近（确切些说是察沃沃-宰米舍附近）阵地的动机以及他在指挥俄军后来的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这里无根据地把巴克莱-德-托利与库图佐夫相对立。巴克莱-德-托利虽然是俄国的杰出的军事长官和爱国者，但是他在战略上的天才、对战争性质的理解、作战经验以及在军队和人民中的威信方面都远远不如伟大的俄国统帅。正是因为这些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收敛起自己对统帅库图佐夫的反感，同意任命他为总司令。——第92页。
- 69 指1807年2月7—8日（1月26—27日）法俄军队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鲁士）会战——第四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战争中最残酷的会战之一。1806年普军被拿破仑军队击溃以后，东普鲁士就成了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拿破仑的武装力量在那里遇到了同盟国俄普军队的顽强抵抗。拿破仑在普略西什-埃劳尽管伤亡巨大，但是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结果，法军暂时中止了行进，而且它截断俄军和俄国边境的联络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第92页。

- 70 在俄国和瑞典战争（1808—1809）期间，俄军在巴克莱-德-托利的统率下于 1809 年 3 月从芬兰开入瑞典本国领土，这使瑞典贵族为贵族寡头政治的利益而限制王权的反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密谋提前实现。古斯塔夫四世在 1809 年 3 月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宣布为国王查理十三。同年 9 月，瑞典被迫与沙皇俄国缔结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把芬兰割让与俄国。
- 恩格斯把俄军横渡波的尼亚湾的进军比做过去瑞典人自己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小的类似的军事行动，亦即 1657—1658 年丹麦和瑞典战争期间 1658 年 1 月底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的军队横渡封冻的大、小贝尔特海峡向丹麦领土的进军。查理-古斯塔夫入侵丹麦迫使丹麦签订对瑞典有利的和约。——第 92 页。
- 71 指“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 年巴黎版（《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Paris, 1823）。——第 92 页。
- 72 根据富尔的计划，拿破仑一旦入侵，俄国的武装力量应分为三个军团，其中第一军团应依靠 1811—1812 年在德里萨（立陶宛）特别构筑的营垒，顶住敌人的主力突击，而第二军团应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机动。根据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普鲁士陈腐的战略和策略的精神制定的这个计划分散了俄军的兵力，使他们必然被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各个击破。拿破仑的战略意图基本上建立在富尔计划的错误上。但是，俄国指挥部（其中包括巴克莱-德-托利）对于这个计划的错误是清楚的，它在支持富尔计划的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不参与指挥作战以后，就及时下定决心放弃德里萨营垒并退向俄国内地以便俄国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第 93 页。
- 73 1812 年 8 月 16—17 日（4—5 日），拿破仑军队同掩护巴格拉齐昂和巴克莱-德-托利军队（这两支军队于 1812 年 8 月 3 日（7 月 22 日）会合）的

主力退却的俄国部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生会战。拿破仑想强使俄军进行决战没有成功。他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领了俄国后卫部队在主力被击退以后所放弃的城市。斯摩棱斯克会战是 1812 年卫国战争中著名的会战之一，这次会战表明了俄国军队和人民抵抗入侵的征服者的力量的增长，也显露出拿破仑迅速歼灭俄军的图谋的破产。会战以后，拿破仑试图缔结和约，但没有成功。——第 93 页。

- 74 指在格查茨克西南的察列沃-宰米舍附近的阵地，俄军于 1812 年 8 月 29 日（17 日）抵达该地。俄军根据上任不久的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的决定放弃了这个阵地，库图佐夫打算在兵力较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法军进行决战，而这需要赢得时间，并需要预定的援军与主力会合。由于这个缘故，俄军从察列沃-宰米舍退到博罗迪诺。——第 93 页。

- 75 这里提到的是在第六次欧洲国家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中 1813 年战局的一系列会战。1812 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的溃败成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起义信号。1813 年 2 月，在俄军进入波兰和德国以后，缔结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俄普同盟。1813 年春天，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组成了反拿破仑同盟，同年秋天，奥地利也公开参加了同盟。在 1813 年战局中，拿破仑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的军队已被同盟国军击溃，并被赶出了德国。

1813 年 5 月 20—21 日（8—9 日）在包岑（萨克森）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战胜了同盟国俄普军队，但是同盟国军在巴克莱-德-托利统率的俄国后卫部队的掩护下秩序井然地撤退。次日，从包岑撤退的俄国部队在格尔利茨附近与法军进行后卫战，俄军取得了胜利。

在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4—7 日）的莱比锡会战（见注 55），巴克莱-德-托利指挥同盟国军的中路。——第 94 页。

- 76 见注 44。——第 95 页。

- 77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 年 10 月 5 日和 6 日从巴黎走到凡尔赛的人民群众与国王近卫军发生流血冲突，结果迫使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从而粉碎了宫廷在凡尔赛准备的反制宪议会的反革命阴谋。

1791 年 2 月 19 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国王眷属试图逃往国外

是这次骚动的起因。——第 95 页。

- 78 万第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793 年 3 月在万第省发动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引起的。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的教士和贵族唆使和指挥的当地一部分农民。英国政府的代表给予叛乱者积极的帮助。1793 年 6 月万第人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缪尔城，但不久就遭到一连串失败。叛乱于 1795 年被平定，但是在 1799 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第 95 页。
- 79 热月九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是颠覆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政变。——第 95 页。
- 80 这里列举的是 1796—1797 年战局中的一系列会战，在这次战局中，由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北部，击溃了同盟国奥地利和皮蒙特（撒丁）军队。在前面提到的蒙多维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大败皮蒙特军队，从而迫使皮蒙特国王单独媾和。由于奥军在洛迪的失败，波拿巴军队占领了米兰。波拿巴获得胜利的里沃利会战（1797 年 1 月 14—15 日）在夺取意大利北部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后决定了整个战局有利于法国的结局。奥地利人被迫将曼都亚要塞交给法国人，并于 1797 年 10 月缔结有利于法国的和约，这一和约意味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彻底瓦解。——第 95 页。
- 81 波拿巴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利用反法同盟失败后在意大利加强起来的反专制制度运动，在支援意大利共和派的幌子下力求在意大利以“女儿”共和国的形式建立法国的统治。1798 年 3 月，在法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下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教皇庇护六世逃跑。但是在 1799 年，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各国军队进入意大利以后，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被推翻，并在罗马地区恢复了教皇的政权。随着法国在意大利统治的恢复，拿破仑先把一部分教皇国领土并入附庸的意大利王国，而于 1809 年又把教皇国划入法兰西帝国。——第 96 页。
- 82 远征埃及是 1798 年法国陆海军在波拿巴将军统率下向埃及的进军，其目的是要在近东确立法国的殖民统治，侵占当时属于土耳其的埃及和叙利亚，并且在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线上打击英国。由于法国舰队于

- 1798年8月1日在艾布基尔被英国纳尔逊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歼灭，由于亚·瓦·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奥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法军以及海军上将费·费·乌沙可夫指挥的俄国分舰队在地中海的胜利行动，波拿巴在埃及的胜利就化为乌有。1799年秋天，波拿巴把军队留在埃及，自己返回法国，而在1801年这支军队被迫向英军投降。——第96页。
- 83 雾月 18—19 日（1799 年 11 月 9—10 日）波拿巴将军和他的拥护者实行政变，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展进程。政变的结果建立了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 96 页。
- 84 在 1800 年 6 月 14 日马连峨会战（意大利北部）中，得到关于奥军部署的不确实情报的拿破仑的军队受到突然的攻击。尽管如此，奥军仍然遭到了失败。马连峨会战的胜利以及法国另一支军队在德国西南部与奥军作战的胜利，促使 1798 年底由英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瓦解。由于这次胜利，拿破仑的政权得到了巩固。——第 96 页。
- 85 大军——见注 52。——第 96 页。
- 86 在第三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时期，1805 年 10 月奥地利马克将军的军队在乌尔姆地区被法军包围，结果被迫投降。——第 97 页。
- 87 拿破仑反对第五次同盟（奥地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时期，在 1809 年 7 月 5—6 日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战胜了奥地利军队。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贝尔蒂埃获得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奥地利在这次失败以后，承认自己为战败国，并于 1809 年 10 月在苛刻的条件下与拿破仑缔结了和约。——第 97 页。
- 88 指拿破仑军队被击溃和同盟国军进入巴黎以后，1814 年 4 月由参议院建立的、达来朗担任主席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促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第 98 页。

- 89 “贝尔蒂埃元帅回忆录” 1827年巴黎版第 1—2 部（《Mémoires du maréchal Berthier》· Part, I — II, Paris, 1827）。——第 98 页。
- 90 恩格斯写的“阿尔及利亚”这一条目被“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作了某些修改。从 1857 年 9 月 22 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们未曾获得的该条目的原稿中有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进行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战争的记述和关于毕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的评述。大概由于在百科全书中已经列入关于阿布德-艾尔-喀德的专门条目，并且预定把向马克思预约的“毕若”一条（见本卷第 221—224 页）也列入，所以这些地方都被编辑部删略，该条目的内容就受到了损害。在条目中还有编辑部篡改的其他痕迹。
- 恩格斯在写这一条目时，纠正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和参考书刊——当时他唯一能够弄到的资料——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所作的有偏见的说明（其中他利用了 1846 年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百科辞典”第 1 卷（《Wigand'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 I, Leipzig, 1846）里的“阿尔及尔”这一条目，第 108 页上的引文看来是从这一条目中摘录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对非洲国家的历史根本没有深入研究，个别问题上某些陈腐的片面的论点就必然会从恩格斯掌握的资料渗入到他写的条目中，例如，在说明基督教国家在与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斗争中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些国家本身就广泛地从事海上掠夺）以及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和动机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情况。——第 99 页。
- 91 库鲁格鲁人是土耳其人与阿尔及利亚妇女结婚所生的后代。——第 100 页。
- 92 欧洲人过去称位于埃及西部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为贝尔贝莱国家或巴巴尔国家。——第 102 页。
- 93 1827 年 4 月 30 日，阿尔及尔的德依侯赛因在他的官邸举行的招待会上，因法国政府未偿还欠阿尔及利亚臣民的债而与法国总领事德瓦尔发生争执，并且为了反击德瓦尔的横蛮无礼的挑衅行为，用蒲扇打了他

的脸。这一由法国领事挑起的事件成了查理十世政府于 1827—1829 年对阿尔及利亚海岸实行封锁的借口。封锁以后，法国殖民者于 1830 年开始征服这个国家。——第 103 页。

- 94 这里说的是查理十世政府打算在法国政府实际控制阿尔及利亚并使奥斯曼帝国本身在财政上更加依赖法国的条件下，在形式上将阿尔及利亚交给土耳其政府管理。根据这些条件，在阿尔及尔打算建立特别政府（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软弱和它没有管理远方领地的能力，这个政府必然成为法国的傀儡）；阿尔及利亚的四个港口交给法国，并给予法国经营珊瑚业的权利；苏丹对于法国在把阿尔及尔“归还”苏丹的问题上的“援助”应付给法国 2000 万法郎。利用土耳其军队征服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统治集团的打算。但是由于 1830 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使得奥尔良王朝替代了波旁王朝，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就停止了。七月王朝走上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法国的直接统治的道路。——第 104 页。
- 95 在克洛塞尔元帅指挥下的法军向控制在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手中的康士坦丁区的远征是在 1836 年秋天进行的。法军试图以强攻占领康士坦丁城，但被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击退。次年秋天，接替克洛塞尔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当雷蒙将军率兵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法军以强攻占领了康士坦丁，但付出了很大伤亡的代价。法国兵士对该城居民进行了残暴的迫害。——第 108 页。
- 96 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斗争从 1832 年持续到 1847 年。阿布德-艾尔-喀德依靠阿尔及利亚广大的居民，在他的控制下联合了一些阿拉伯部落，取得了战果，因而迫使法国人于 1834 年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几个沿海城市除外）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法国殖民者经常违反与阿布德-艾尔-喀德签订的条约，一再侵入阿尔及利亚西部。1839—1844 年期间，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经过了顽强的斗争以后被征服，他自己也不得不退到摩洛哥。1845—1847 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在阿尔及利亚西部重新领导群众的解放起义。这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他在撒哈拉绿洲区继续领导进行反对法

- 国侵略者的游击战。1847年阿布德-艾尔-喀德被俘。然而在这以后，不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还是东部，阿尔及利亚人反殖民主义的起义都没有停止过。——第108页。
- 97 马拉布特是伊斯兰教派的代表，修道士；他们积极参加北非各国人民反对欧洲征服者的解放斗争。——第109页。
- 98 Bureau A rabe (阿拉伯局) 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名称。在每个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的区都设有这种局，它们拥有极大的权力。——第109页。
- 99 从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摘自若米尼写的1827年巴黎出版的“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V 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Paris, 1827) 等书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编写的。初稿由马克思补充了取自法国参考书刊1854年巴黎出版的“传记集”第3卷(《Biographie universelle》·T. 3, Paris, 1854)、拿破仑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Paris, 1823) 等书的材料，并经他校阅后寄往纽约。——第112页。
- 100 指俄土战争(1787—1791)时期，1788年俄军对黑海北岸的土耳其人的据点奥查科夫要塞的长期围攻和占领。——第112页。
- 101 在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1794年6月卞格先的部队在奥什米亚纳和索雷附近击败了波兰军队。同年8月，俄军击破了防守维尔诺(维尔纽斯)城的波军抵抗，进入该城。
由于起义被镇压，1795年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这次瓜分使波兰国家最后灭亡。——第112页。
- 102 指1796年俄军围攻和占领杰尔宾特城，这是对波斯沙赫阿加-穆罕默德于1795年入侵格鲁吉亚时大批屠杀和奴役居民的报复。——第113页。
- 103 围攻但泽(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仑第一同第四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战

争时期拿破仑军队于 1807 年 3 月发起的。由普鲁士军队和同盟国俄国部队组成的要塞守军对占优势的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要塞于 1807 年 5 月底投降。——第 114 页。

- 104 “彗星”（《Der Komet》）是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日报，1830—1848 年在莱比锡出版。

“晚报”（《A bend-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学报纸，1817—1857 年在德勒斯顿和莱比锡出版。——第 117 页。

- 105 莱比锡的席勒协会和德国文学家联合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了决心为德国的出版自由和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而斗争的德国作家。——第 117 页。

- 106 “萨克森祖国报”（《Sächsische Vaterlands-Blätter》）是德国自由派的报纸，从 1837 年起在德勒斯顿出版，而从 1841 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 117 页。

- 107 “德国天主教”是 1844 年在德意志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神秘主义和伪善的各种极端表现，并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第 117 页。

- 108 在萨克森军队枪杀莱比锡的人民示威后的第二天，即 1845 年 8 月 12 日在莱比锡的练马场上举行了市民大会。这次示威旨在反对萨克森政府迫害“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参加者，而这次示威的导火线则是萨克森皇太子约翰到莱比锡时举行的军事检阅。约翰太子被认为是这次迫害的祸首。——第 117 页。

- 109 祖国联合会是一个广泛的民主组织，它是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三月革命所引起的革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于 1848 年 3 月底在莱比锡建立的。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勃鲁姆、卢格、叶凯尔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该联合会在萨克森各地都

设有分会。——第 117 页。

- 110 预备议会是指 184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这些代表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在全德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将预备议会成为制宪机构的提议。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一部分共和派由于自己的提议未获通过而离开了预备议会，但是以勃鲁姆为首的一部分比较温和的共和民主反对派仍然留下，并且参加组织自由派提出的五十人委员会。温和的共和派在委员会中一共只得到 12 个席位。该委员会必须根据与联邦议会（旧德意志联邦的反革命机关）的协议，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法兰克福议会是指 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多数是由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以及依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左派的温和和激进分子聚集在罗伯特·勃鲁姆的周围。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而且变成了失去实际权力、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1849 年夏天议会停止了活动。——第 118 页。

- 111 1848 年 10 月 6 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革命保皇派试图消灭 1848 年奥地利资产阶级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皇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的命令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 1848 年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 日的激烈战斗之后，起义被德皇军队镇压。维也纳人失败的原因在于起义者阵营中缺乏统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优柔寡断以及由于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而使支持维也纳的运动削弱。维也纳的十月起义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中的最高峰。——第 118 页。
- 112 1792 年 6 月 20 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群众冲入

- 了王宫。这次发动是由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党派）组织的，其目的是对国王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迫使他撤销关于吉伦特派内阁辞职的决定，但结果成了反对王权和反对宫廷与外国干涉者勾结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表明了人民群众反君主制度的情绪的增长。后来事件发展为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义，结果在法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第 119 页。
- 113 指反对第二次同盟战争时期，1800 年拿破仑对意大利北部的进军，这次进军以马连峨会战（见注 84）的胜利而告终。——第 119 页。
- 114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于 1806 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第 119 页。
- 115 关于临时政府，见注 88。——第 120 页。
- 116 马克思指 1829 年巴黎出版的“布里昂先生关于拿破仑、督政府、执政时代、帝制时期、复辟时期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M. de Bourrienne sur Napoléon, le Directoire, le Consulat,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Paris, 1829）。据推测，这些回忆录的大部分是过去拿破仑的外交官维耳马雷写的，他专门编造这类著作。——第 120 页。
- 117 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见注 45）期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 1757 年 12 月 5 日在西里西亚莱滕（吕廷）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第 122 页。
- 118 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军队于 1757 年 6 月 18 日在科林（捷克）被奥地利军队击败。
1759 年 8 月 12 日（1 日）库奈斯多夫（普鲁士）会战，是七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俄国军队大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普军失败的后果是 1760 年俄国军队暂时占领柏林。只是由于俄国同它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登上俄国王位，普鲁士才免于复灭。——第 122 页。
- 119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刊登这一条目时，百科全书编辑部把它

与另一作者写的“浮动炮台”(《Floating batteries》)一条合并在一起,作为专门的一个条目。看来这一条目是由某个美国专家编写的,其中包括了恩格斯在写完《Battery》这一条目并寄往纽约后的时期关于美国造船的资料。——第 125 页。

- 120 见注 31。——第 128 页。
- 121 1805 年 12 月 2 日(11 月 20 日)俄奥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奥斯特利茨(莫拉维亚)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结束。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于 1806 年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第 128 页。
- 122 本条目的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写的。他对贝姆作了政治上的评定,以及对条目全文进行了最后校订和文字上的润饰。同时马克思几乎一字不改地转抄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恩格斯为马克思而写的专题短评中对作为军事活动家的贝姆的评定,以及对他在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期和 1848—1849 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的估价。此外,恩格斯帮助马克思选择和校正传记材料。——第 132 页。
- 123 指 1813 年保卫由拿破仑军队占领的但泽(格但斯克),当时该城被普俄军队包围。该城被围困十一个月半,在此期间,守军(其中有波兰军队)经受住了三次正规围攻,但是最后被迫投降。——第 132 页。
- 124 指下面这本书:约·贝姆“1819 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 年魏玛版(J. Bem.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n. Artillerie gesammelt》. W. eimar, 1820)。——第 132 页。
- 125 指 1825 年 12 月 14 日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第 132 页。
- 126 1831 年 5 月 26 日(14 日)在沃斯特罗仓卡附近由吉比奇统率的沙皇军队击败了波兰起义军。

1830—1831年波兰起义是由沙皇制度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小贵族的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133页。

- 127 这里说的是贝姆没有实现的参加葡萄牙内战(1828—1834)的打算。这次内战是在以1828年夺得葡萄牙王位的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主义者(封建教权派)和聚集在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女王及其父亲唐·彼得鲁周围的立宪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第133页。
- 128 维也纳流动自卫军是贝姆在维也纳1848年十月起义(见注111)的日子里组织的。它表现出自己是一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和最勇敢的起义武装部队;其成员大多数是维也纳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第133页。
- 129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honvéd》——“祖国保卫者”)是中世纪匈牙利步兵的名称。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848年夏天由匈牙利政府组织的匈牙利和民族军队的兵士在匈牙利开始被叫做洪韦德。——第134页。
- 130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134页。
- 131 贝姆军队向巴纳特(塞尔维亚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的进军是在1849年举行的。1848年革命初期,在伏伊伏迪纳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加强了,同时也掀起了城乡民主阶层反封建的斗争。但是由于当地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软弱和叛变,民族运动不久就被与奥地利反革命结成同盟的反动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控制。塞尔维亚人争

取自治的运动被哈布斯堡王朝利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1848年夏天,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之间发生战事,而这由于巴纳特(那里除了塞尔维亚人外,还住了相当多的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塞尔维亚居民与非塞尔维亚居民之间的冲突而复杂化。1849年春天,贝姆和匈牙利将军佩尔采尔的军队在巴纳特多次击败奥军和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但是这些胜利并不能影响以后对匈牙利人不利的革命战争的总进程。在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当时属于匈牙利的民族地区,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由于匈牙利资产阶级贵族革命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而受到阻碍,他们懂得与被压迫民族合作的必要性太晚,直到1849年7月28日才颁布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第135页。

- 132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海瑙统率的奥军在1849年8月9日泰梅希瓦拉(提米希瓦拉)会战中击败了力图扼守自己的阵地直到与匈牙利总司令戈尔盖率领的北方军团会合的匈牙利南方军团。在这次失败以后过了四天,北方军团就向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第135页。
- 133 1850年秋天,在阿勒颇(哈勒布)城阿拉伯居民起来反对当地的基督教徒和土耳其当局,后来发展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被土耳其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135页。
- 134 “立宪自卫军”是按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过的1791年宪法,在废除过去的国王近卫军以后担负保卫国王及其宫廷的职责的特种部队。1792年5月,立法议会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解散“立宪自卫军”的法令。——第136页。
- 135 吉德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的向导的部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军队中,吉德担任拿破仑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他的私人卫队。——第136页。
- 136 这里列举的是法国反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时期的一系列会战。

在波拿巴将军统率法军向意大利进军时期,1796年9月4日法军

在罗韦雷托（意大利北部）附近击败了奥军。

1798—1799年波拿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时期，他的军队从1799年3—5月围攻曾属于土耳其的叙利亚要塞圣让得阿克（阿克），但是没有成功。

就在这次远征时期，在1799年7月25日艾布基尔会战中由英土舰队运送到埃及海岸登陆的土耳其登陆队被法军歼灭。

在1806年10月14日耶拿（绍林吉亚）会战中，法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击溃了一部分普军。就在同一天，拿破仑的元帅达武的部队在奥埃尔施太特附近击败了普军的主力。普军在这两次会战（这两次会战常常通称为耶拿会战）中遭到的失败使法军占领了普鲁士大部分领土，并使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

里沃利会战——见注80，马连峨会战——见注84，奥斯特利茨会战——见注121，埃劳会战——见注69。弗里德兰德会战在本卷正文中有记述，见第114页。——第136页。

- 137 指第五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战争时期，当拿破仑的主力因同奥地利作战而被牵制住的时候，英国舰队于1809年7月向些耳德河口进行的远征。英军在夺得伐耳赫伦岛以后，未能利用它作为对安特卫普以及法军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其他据点展开军事行动的基地，而且4万名登陆部队由于饥饿和疾病损失了约1万人，因而被迫于1809年12月撤离该岛。——第136页。
- 138 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俄普军队在吕特岑（萨克森）的会战发生在1813年5月2日（4月20日）。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代价迫使俄普军队退却，这次退却秩序井然。——第137页。
- 139 从保存下来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条目的前面部分是马克思写的。条目中关于博斯凯参加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一节是恩格斯写的（参看1857年9月22日他给马克思的信）。——第138页。
- 140 俄军和英、土、法联军于1854年10月25日（13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进行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英军尽管占了有利阵地，但是由于指挥不当而遭到很大损失，英方很大一部分轻骑兵被歼灭。在恩格斯的“巴拉

克拉瓦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第139页。

- 141 指1855年9月8日（8月27日）英法军队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采取的强攻。这次强攻的结果是，法军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领了马拉霍夫冈。经过11个月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战斗，俄国守军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放弃了这座城市，因为指挥部认为继续保卫该城已没有意义。恩格斯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和“战争的决定性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89—593页，第614—623页）两篇文章中叙述了9月8日的强攻。——第139页。
- 142 “农村和城市总汇报”（《Journal génér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是法国贵族的日报；从1789年9月15日到1792年8月10日在巴黎出版。在1789年10月30日以前，布律恩是这家报纸的编辑。——第140页。
- 143 科尔德利俱乐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0年在巴黎建立的人民俱乐部之一。俱乐部的这个名称是从它的集会地点过去的法兰西科教派科尔德利修道院而来的，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它与雅各宾俱乐部同样地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科尔德利俱乐部最初联合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及后来组成雅各宾集团的右翼（丹东派）和左翼（阿贝尔派）的各派小资产阶级代表。随着革命的深化，左派分子在俱乐部取得了优势。在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建立于1793年6月2日）时期，俱乐部是阿贝尔派的堡垒，它一直存在到1794年3月阿贝尔派被击溃。
- 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都用“科尔德利”这个词称呼属于雅各宾左派的或是接近他们的革命者。——第140页。
- 144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1年7月17日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的反君主制度的示威。科尔德利俱乐部的首领们领导了这次发动，他们草拟了向制宪议会提出的要求国王退位的请愿书。示威遭到军队和拉斐德率领的巴黎资产阶级区的国民自卫军部队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的事件表明人民群众和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与

转到反革命方面的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为另一方之间的深刻分裂。——第 140 页。

- 145 由于外国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跃，1792 年 9 月 2—5 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巴黎群众占领了监狱，设立了对被监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积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这次红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第 140 页。
- 146 在革命法国同第一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军队紧张作战时期，1793 年 9 月 6—8 日在冈德斯霍特（弗兰德）会战中法国军队击败了同盟国英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的军队。——第 140 页。
- 147 1793 年夏天，吉伦特派（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党派）联合反革命保皇党人在吉伦特省发动反革命叛乱，并且在前面提到的卡耳瓦多斯省和法国西部、西南部和在南部的其他许多省发动叛乱。吉伦特派在保护各省自治权和联邦权的幌子下反对雅各宾政府，反对支持政府的革命群众。1793 年秋天，吉伦特派的反革命“联邦制”运动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镇压了。
- 社会拯救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是 1793 年 4 月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 1795 年 10 月被解散。——第 140 页。
- 148 在丹东和他的战友被处死之后幸存的、代表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所谓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丹东派，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积极地参加了 1794 年热月九日的政变（关于政变见注 79）。——第 141 页。
- 149 指 1795 年葡月 12—13 日（10 月 4—5 日）保皇党人在巴黎的暴动被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政府军队镇压。——第 141 页。
- 150 指 1796 年秋天巴贝夫派（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拥护者，他们力求以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在巴黎格

列涅尔兵营的起义。1796年5月巴贝夫和他的亲密战友被捕以后，巴贝夫派试图从监狱把被捕者拯救出来，并且试图在推翻督政府和恢复1793年雅各宾宪法的口号下在格列涅尔兵营（他们在该兵营的兵士中间进行了革命宣传）发动起义。巴贝夫派的起义被军队残酷镇压了。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行政领导机关，它是根据1794年雅各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在1790年波拿巴政变以前，督政府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141页。

- 151 1797年10月17日的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同参加第一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根据条约，法国得到了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协助将莱茵河左岸让给法国，并且放弃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地，这块土地划入在法国保护下成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过去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曾属于这个共和国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的一部分土地让与奥地利。——第141页。
- 152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时期，1799年8—10月布律恩将军率领的法国和荷兰军队对在荷兰登陆的英俄军队进行的成功战斗。英俄远征的目的是要把法国人赶出荷兰（荷兰被法国占领并宣告成立傀儡的巴达维亚共和国以后，已成了依附于法国的国家），在该国恢复革命前的君主制度和夺取荷兰的舰队。同盟国军总司令约克公爵被布律恩军队击败以后，不得不于1799年10月18日签订阿尔克马投降书，根据投降书他必须遣返8000名法国和荷兰的战俘，并且从荷兰撤走自己的军队。——第141页。
- 153 布伦兵营是拿破仑第一为了通过拉芒什海峡入侵英国而于1803—1805年设立的军事基地。兵营内集中了12万名登陆部队。由于法国舰队在同英国作战中失败，并且在欧洲又组成了有俄国和奥地利参加的新的即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被迫放弃了他的入侵计划。——第142页。
- 154 指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同盟的军队进入巴黎以后，法国参议院通

- 过的关于废黜拿破仑和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法令。——第 142 页。
- 155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从厄尔巴岛回到巴黎起，到同年 6 月 22 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 142 页。
- 156 1832 年秋天，英法舰队封锁荷兰港口，法军围攻安特卫普的城砦，企图迫使荷兰履行 1831 年伦敦条约的条件，即承认在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脱离尼德兰王国的比利时独立和把安特卫普交给比利时人。虽然被围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要塞在 1832 年 12 月底仍然投降。——第 144 页。
- 157 瓦朗西恩剂是由硝石、硫磺和火药制成的混合燃烧剂；在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时期，1793 年奥英军队围攻法军防守的瓦朗西恩城时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混合燃烧剂。——第 144 页。
- 158 指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1854 年 9 月 13 日（1 日）至 1855 年 9 月 9 日（8 月 28 日）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第 148 页。
- 159 指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1855 年 8 月 9—11 日（7 月 28—30 日）英法舰队对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俄国要塞斯维阿波尔格（苏奥缅林纳）的不成功的炮击。关于这次炮击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英法对俄战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559—560 页）。——第 148 页。
- 160 从 1857 年 9 月 18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参与了这一条目的材料挑选工作，他从关于军用桥的参考书刊中做了许多摘录，并把这些摘录寄给了恩格斯。——第 152 页。
- 161 希罗多德“九卷史”第 4 卷第 83 章；第 7 卷第 36 章。——第 152 页。
- 162 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5 册第 3 章。——第 152 页。
- 163 纪元前 55 年，在凯撒征服高卢时期（公元前 58—51 年）罗马军队追击溃败的日耳曼人，在莱茵河的中游地区渡河，在右岸停留了 18 天。渡

莱茵河是为了显示罗马的军事威力和恐吓日耳曼部落，在凯撒的高卢战争札记第四册中记载了这次渡河情况。——第 152 页。

- 164 “福拉尔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短评” 1754 年巴黎版第 3 卷第 82 页（《A bregé des commentaires de M. de Folard sur l’Histoire de Polybe》·Vol. 3, Paris, 1754, p, 82）。——第 153 页。
- 165 1846—1848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侵占了墨西哥几乎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北部、新墨西哥等地区。——第 154 页。
- 166 恩格斯对马克思写“贝尔纳多特”这一条目给予很大帮助，他在 1857 年 9 月 21 日和 22 日的信中，向马克思提供了关于贝尔纳多特的军事活动（其中包括他参加拿破仑于 1806 年对普鲁士的战争和 1809 年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许多实际材料。恩格斯对贝尔纳多特在这些战争中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几乎被马克思一字不改地抄在他写的条目里了。
马克思为了对这个首先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贝尔纳多特作出全面的评述，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材料，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从参考书刊和历史文献中所作的摘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第 157 页。
- 167 在 1794 年 6 月 26 日的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茹尔丹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奥地利军队。这个胜利严重地打击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国的革命军队因而能够占领比利时，并在荷兰和莱茵河西岸发动积极攻势。1794 年 10 月初，法国军队渡过鲁尔河，占领幽里希要塞；并于同年 11 月 4 日迫使马斯特里赫特要塞投降。——第 157 页。
- 168 法国军队于 1796—1797 年在意大利北部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期间，在波拿巴将军的倡导下于 1797 年入侵伊斯的利亚（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省）。根据同奥地利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波拿巴让出了包括伊斯的利亚在内的威尼斯的最后一部分领土。——第 158 页。
- 169 果月十八日（1797 年 9 月 4 日），根据波拿巴将军所支持的督政府成员

的命令，政府军占领了立法团大厦，逮捕了勾结流亡贵族和准备君主制政变的保皇党议员。督政府本身也进行了改组，对保皇党分子采取镇压措施。具有政变性质的果月十八日事件反映了督政府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不稳固和它的左右动摇；它在遭到保皇党威胁时向左转，而在畏惧民主运动时又向右转。——第 158 页。

170 指所谓牧月三十日（1799 年 6 月 18 日）政变。在政变期间，由于法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以及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就迫使立法团更换了督政府的成员，把三个露骨的反动分子赶出了督政府。——第 159 页。

171 奥埃尔施太特会战——见注 136。——第 160 页。

172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

法国同丹麦的反对瑞典的军事同盟于 1807 年 10 月 31 日在枫丹白露签订。——第 160 页。

173 见注 137。——第 161 页。

174 雪恩布龙——维也纳的一座宫殿，奥皇的夏宫；奥地利军队在 1809 年的战争中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一于 1809 年秋季在这座宫殿里迫使奥地利接受媾和条件。——第 162 页。

175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见注 70。——第 163 页。

176 布加勒斯特和约是为结束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而于 1812 年 5 月 28 日（16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贝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省份割给俄国；土耳其应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确认从前同俄国所

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同土耳其签订这一和约，是由俄军的胜利和俄军司令官米·伊·库图佐夫的外交手腕所促成的，它使俄国能够抽出大量兵力去对付拿破仑法国。——第 164 页。

- 177 指俄国和英国之间以及英国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旨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和平和同盟条约。——第 164 页。
- 178 指俄国和瑞典于 1812 年 8 月 30 日（18 日）在亚波（土尔库）签订的公约，这个公约实际上形成了两国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公约还规定，如果丹麦拒绝把挪威让给瑞典国王，那末俄国有义务给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而瑞典也有义务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 165 页。
- 179 英国和瑞典之间的军事同盟条约于 1813 年 3 月 3 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该条约规定，瑞典军队去欧洲大陆参加反拿破仑军队的军事行动，而英国资助瑞典以实现这一目的。条约的第二条规定英国有义务支持瑞典占有挪威的要求。——第 165 页。
- 180 指俄国和普鲁士同拿破仑第一于 1813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休战协定。休战的最初期限到 7 月 20 日，后来延长到 8 月 10 日。在休战期间，亚历山大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贝尔纳多特于 1813 年 7 月 12 日在特拉亨贝尔格（西里西亚）城堡会晤，同盟国对今后的作战计划达成了协议。在休战期间进行的和谈破裂以后，奥地利正式加入了反拿破仑的同盟。1813 年 8 月恢复了军事行动。——第 165 页。
- 181 “西班牙舰队”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大部分根据马克思收集的材料编写的，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材料是他从各种资料中所作的附有评注的摘录。在马克思的这些准备材料中有几段话，恩格斯一字不改地收入了本条目。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写好的稿子以后，校正了一些实际材料，把这个条目的最后定稿转寄纽约。——第 168 页。
- 182 原文书名是《Expeditio Hispanica in Angliam. Vera Discription》，A. D. 1588。——第 168 页。

- 183 彼·帕斯·萨拉斯“我国元首唐·菲利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口集结的最幸运的舰队。关于海轮的综合报告”1588年里斯本版（P. Paz Salas·《La felicissima armada que el rey don Felipe nuestro Señor mando juntar en el Puerto de Lisboa·Relación sumaria de los nauios》·Lisboa, 1588）。——第168页。
- 184 原文手稿叫《Details of the English Force assembled to oppose the Spanish Armada》。——第169页。
- 185 “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舰队从苏格兰海岸的北部岛屿向西班牙航行中，在爱尔兰西海岸附近遭到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1588年伦敦版（《Certaine Advertisements out of Ireland, concerning the losses and distresses happened to the Spanish Navie, upon the West coastes of Ireland, in their voyage intended from the Northerne Isles beyond Scotland, towards Spaine》·London, 1588）。——第171页。
- 186 在“艾阿库裘”这一条目中对会战的叙述，是恩格斯使用马克思收集的材料编写的，马克思把这些材料连同1857年9月21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一起寄到曼彻斯特。条目的结尾部分是马克思写的。这里对埃斯帕特罗及其拥护者的评述，同马克思在1854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埃斯帕特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1—408页）中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第172页。
- 187 在1824年8月6日的胡宁（秘鲁）会战中，玻利瓦尔指挥的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军队勇敢地越过安第斯山脉，击败了西班牙军队。这一会战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最后阶段。在斗争的第一时期（1810—1815），解放运动导致某些独立共和国（委内瑞拉等国）的成立，但是由于它们彼此隔绝和克里奥洛贵族上层脱离人民，几乎又到处恢复了西班牙的统治。自1816年起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新阶段。在过去的总督管辖地拉普拉塔宣告成立了独立共和国。西蒙·玻利瓦尔重新恢复了争取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基多（厄瓜多尔）独立的战争，这一战争促使这些地区于1819—

1822 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 年，墨西哥的解放战争重新恢复。在拉普拉塔（阿根廷）共和国军队的支持下，智利于 1817 年宣告独立，而秘鲁则于 1821 年宣告独立。玻利瓦尔的哥伦比亚军队于 1824 年为支援秘鲁共和国军队的进军，彻底打击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西班牙残余部队于 1826 年被赶出了秘鲁沿岸地区。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在过去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成立了独立共和国：墨西哥、中美合众国（后来分裂为五个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后来分裂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秘鲁和智利。——第 172 页。

- 188 指霍·塞·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J. S. Florez: 《Espan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 y Polí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áneos》）。这部四卷集著作的第一版于 1843 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用的是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于 1844 年，第三卷和第四卷出版于 1845 年。

米·奥·普林西佩、R. 希龙、R. 萨托雷斯、阿·里博特“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 年马德里版（M. A. Principe, R. Giron, R. Satorres, A. Ribot. 《Espanero: su pasado, su presente, su porvenir》·Madrid, 1848）。——第 173 页。

- 189 本条目的主要传记材料是马克思收集的。他还对全文作了最后校订和文字上的修饰。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军事活动家布吕歇尔作了总的评价并评述了他在他所参加的主要战局中的行动。马克思把恩格斯的信中的这些意见写入了本条目的有关部分。这一评述经马克思用事实材料以及对军事长官布吕歇尔的活动更详细的分析加以补充后，就构成本条目的基本内容。恩格斯从本条目中引证的缪弗林所著关于 1813 年和 1814 年战局的一书（这本书也是马克思的主要参考资料）中所作的摘录，也证明他看参加本条目的写作。——第 174 页。

- 190 指 1787 年普鲁士在英国政府支持和资助下对荷兰的武装干涉，这次武

装干涉的目的，是使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五世重新执政。后者在 1784 年由于革命运动而被逐出荷兰。这次革命运动旨在反对贵族和商业寡头的联盟，是由主张对殖民对手——英国进行积极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爱国者”领导的。荷兰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对恢复总督权力和寡头政治制度的普鲁士军队没有能够认真抵抗。——第 175 页。

- 191 格·勒·布吕歇尔“1793 年和 1794 年战局日志” 1796 年柏林版（G·L·Blücher·《Kampw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Berlin, 1796）。

1794 年战局中，普鲁士军队参加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同盟军队作战，在摩塞尔河以南地区和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获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因同盟国英奥军队在比利时被击溃以及奥军在德国西部败北，普军司令部不得不在 1794 年秋天将它的军队撤到莱茵河右岸。——第 175 页。

- 192 指 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是法国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法国与普鲁士媾和是反法同盟瓦解的开始。1795 年 7 月 22 日，西班牙在巴塞尔也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和约。——第 175 页。

- 193 “道德协会”——普鲁士爱国团体之一，于 1806 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 年，对协会活动十分担心的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协会。然而协会继续秘密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第 176 页。

- 194 1813 年 5 月 26 日（14 日），布吕歇尔指挥的俄普军队派骑兵埋伏在海瑙城（西里西亚）附近，击溃了拿破仑军队的前卫。——第 176 页。

- 195 见注 180。——第 176 页。

- 196 缪弗林“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 1813 年和 1814 年战局的回忆” 1853

年伦敦版第 225 页 (Muffling.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London, 1853, p. 225)。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来看,他们使用的是缪弗林的书的上述英译本。该书德文第一版于 1851 年在柏林出版。后面一段引文 (在第 183 页上)也是引自缪弗林的这本书 (英文版第 327 页)。——第 177 页。

- 197 在 1813 年 8 月 26—27 日 (14—15 日) 的德勒斯顿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击败了奥地利元帅施瓦尔岑堡指挥的同盟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军队 (波希米亚军团,即主力军团)。同盟国军在会战中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瓦尔岑堡没有采纳巴克莱-德-托利提出的反击拿破仑军队的翼侧的计划。波希米亚军团在困难条件下退却时受到俄军后卫的成功的掩护。——第 178 页。
- 198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 16 个邦 (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 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 (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 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这些邦的军队都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包括 1812 年对俄国的战争。1813 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联邦便瓦解了。——第 182 页。
- 199 1814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9 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国代表同拿破仑第一的全权代表在夏提荣城 (塞纳河畔) 举行和议。同盟国提出媾和的主要条件是拿破仑放弃法国征服的一切领土以及法国恢复到 1792 年的疆界。由于拿破仑坚决拒绝这个条件,和谈破裂。——第 183 页。
- 200 拿破仑的皇家近卫军的新编部队自 1807 年起称为新近卫军,以区别于以前组成的近卫部队,即所谓老近卫军。对编入新近卫军的兵士和军官要求的条件较低,另一方面,新近卫军是补充老近卫军的固定后备部队。——第 183 页。

- 201 指反法同盟战胜拿破仑后，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同法国于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根据这个和约，法国丧失了自1792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领土，仅边境附近的几个要塞和西萨瓦除外。这些地方后来根据第二个巴黎和约又从法国手中夺过来，第二个巴黎和约是在拿破仑短期重新执政和第二次被推翻后，原来那些战胜国同法国于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第二个巴黎和约使法国恢复到1790年1月1日的疆界。——第190页。
- 202 大概是指下面这部著作：帕拉韦“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笔记”1850年巴黎版（Paravey. 《Mémoire sur la découverte très ancienne en Asie et dans l'Indo-Perse de la poudre à canon et des armes à feu》. Paris, 1850）。——第193页。
- 203 指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国家并建立阿拉伯伊斯兰教王国的时期。——第194页。
- 204 恩格斯指拜占庭炼丹家马可·格雷克的著作“制敌之火”。——第194页。
- 205 指“罗吉尔·培根修士论艺术和自然界的秘密以及论魔法的荒诞的信”（《Epistola Fratris Rogerii Baconis 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 et de nullitate magiae》）。这一著作的写作时间，像作者的诞生年代一样，至今没有确凿查明。在十九世纪军事学术史方面的文献中，往往将这一著作的写作年代确定为1216年。在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也沿用这一年代。但根据后来的查考，这一著作是写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该书第一版于1542年在巴黎发行。——第194页。
- 206 霍·安·孔代“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史，根据阿拉伯人的各种手稿和回忆录写成”1820—1821年马德里版第1—3卷（J. A.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á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 T. 1—3, Madrid, 1820—1821）。

1118年，阿腊贡国王阿尔丰斯一世的军队围攻自712年以来被穆斯林侵占的萨拉哥沙城（阿腊贡）并收复了它。收复萨拉哥沙是雷允吉斯达（即收复八世纪初阿拉伯人侵入时期被阿拉伯人和非洲柏伯尔人（“摩尔人”）所侵占的比利牛斯半岛领土）的一个阶段。在八至九世纪就已开始的雷允吉斯达中，西班牙的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两国以及葡萄牙起了主要作用。十二世纪下半叶，由于阿里莫哈德王朝侵入比利牛斯半岛，雷允吉斯达曾一度停止。阿尔摩哈德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它联合了周围山地的柏伯尔部落，并且在第一个伊玛目-哈利发阿卜德-艾尔-穆敏时期曾统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伊斯兰教地区。十三世纪初，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在其他国家的十字军的支援下，击溃了阿尔摩哈德王朝并恢复了雷允吉斯达。1236年，加斯梯里亚人收复了哥多瓦——以前的哥多瓦伊斯兰教王国（于1031年崩溃）的首都，而到十三世纪末，伊斯兰教的统治地区只限于南部的格拉纳达伊斯兰教国。西班牙人继续同这个伊斯兰教国进行斗争，于1492年终于占领这个国家。恩格斯在后面提到的是雷允吉斯达历史中的一系列事件。——第194页。

- 207 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条顿骑士团的骑士。十三世纪，骑士团通过征服和残杀东普鲁士的立陶宛居民而侵占了东普鲁士，使东普鲁士成为骑士团侵略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条顿骑士团和另一个德意志骑士团（即利沃尼亚骑士团，它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合并。1242年楚德湖会战（冰上激战）以及1410年格吕沃尔德大战中，骑士团都被击败，于是逐渐衰落，后来仅保存了一小部分领地。——第195页。
- 208 1495年7月6日在福尔诺沃（意大利北部）会战中，意大利北部封建国家的军队进攻法王查理八世的军队。法王查理的军队在对意大利进行掠夺性的征讨之后，经过亚平宁山脉返抵法国。拥有强大的炮兵的法军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这次会战发生在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36）初期。——第197页。
- 209 见注35。——第197页。

- 210 在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联合德意志新教诸侯共同反对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时期,在1554年8月13日朗蒂(弗兰德)会战中,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撤除了对朗蒂城的围攻并退回法国边境。——第197页。
- 211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见注38。——第198页。
- 212 指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见注39)中的瑞典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之间的会战。1630年12月,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逼近奥得河畔的格累芬哈根要塞,并在两次强攻之后迫使守军放弃了要塞。1631年4月,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以猛攻夺取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在这两次会战中,瑞典炮兵起了很大的作用。——第200页。
- 213 1709年9月11日马尔普拉克(比利时)会战是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67)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英奥荷联军在萨瓦亲王奥伊根和马尔波罗公爵的指挥下击败了维拉尔元帅的法军。——第201页。
- 214 指圣雷米编的两卷集“炮兵学笔记”1697年巴黎版(《Mémoires d'Artillerie》·Paris, 1697)。文集中包括经过编者系统整理和校订的法国炮兵军官的许多著作。——第201页。
- 215 卡·奥·斯特伦泽“炮兵学原理”1760年利格尼茨版(C. A. Struensee. 《Anfangsgründe der Artillerie》·Liegnitz, 1760)。格·弗·泰佩尔霍夫“普鲁士炮手,或论炮弹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1781年柏林版(G. F. Tempelhoff: 《Le Bombardier prussien ou du mouvement des projectiles en supposant la résistance de l'air proportionnelle au carré des vitesses》·Berlin, 1781)。——第203页。
- 216 指夏恩霍斯特的著作:“炮兵手册”1804—1814年汉诺威版第1—3卷(《Handbuch der Artillerie》·Bd. 1—3, Hannover, 1804—1814);“军官手册——军事学的实用部分。第一部分:炮兵”1787年汉诺威版

(《Handbuch für officiere, in den anwendbaren Theilen der Kriegeswissenschaften·Erster Theil von der Artillerie》·Hannover, 1787)。——第 203 页。

- 217 格·维加“射击教范(附射表)”1787年维也纳版(G.Vega·《Praktische Anweisung zum Bombenwerfen mittelst dazu eingerichteter Hilfstafeln》·Wien, 1787); 托·摩尔拉“炮兵论文”1784年塞哥维亚版(T.Morla·《Tratado de artilleria》·Segovia, 1784); 约·哥·霍伊尔“常用炮兵辞典”1804—1812年杜宾根版(J.G.Hoyer·《Allgemeines Wörterbuch der Artillerie》·Tübingen, 1804—1812); 弗·古·鲁弗鲁瓦“炮兵讲义”1811—1814年德勒斯顿版第1—3部(F.G.Rouvroy·《Vorlesungen über die Artillerie》·Th. 1—3, Dresden, 1811—1814)。——第 203 页。
- 218 在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欧洲同盟战争时期, 1793年9月14日在皮尔马森斯(德国西部)会战中, 普鲁士军队击败了法国摩塞尔军团。在这次会战中, 普军成功地使用了大量炮兵。——第 206 页。
- 219 马克思在写本条目时使用的主要资料, 从保存下来的他的摘录来看, 有以下著作: 摩·瓦格纳“阿特拉斯上空的三色旗, 或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征服”1854年伦敦—纽约版(M.Wagner·《The Tricolor on the Atlas; or Algeria and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New-York, 1854); 丹·斯特恩“1848年革命史”1850年巴黎版第1卷(D.Stern·《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Vol. 1, Paris, 1850)。可能马克思还使用了关于毕若在阿尔及利亚活动的材料, 这些材料在恩格斯写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条目的初稿中曾引用过, 但在刊印时被百科全书编辑部删掉了(见注 90)。从恩格斯在 1857年9月17日和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 恩格斯也曾为本条目收集过材料。——第 221 页。
- 220 奥尔达耳(卡塔卢尼亚)会战以及上述的围攻战发生于 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期间(见注 47)。——第 221 页。
- 221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第 221 页。

- 222 百日——见注 155。——第 221 页。
- 223 指法国军队为了镇压 1820—1823 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对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 1822 年 7 月 7 日试图占领革命的马德里遭到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 1815 年结成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援助他镇压革命。根据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的决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昂吉列姆公爵指挥的法国军队于 1823 年进入西班牙，在该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们在西班牙一直驻留到 1828 年。——第 221 页。
- 224 指巴黎工人和站到工人这一边的巴黎小资产阶级阶层于 1834 年 4 月 13—14 日举行的反对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争取成立共和国的起义。巴黎事件是对当时在里昂爆发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起义的响应，里昂起义还引起了法国其他一些城市的革命发动。正像里昂起义一样，巴黎起义也是由秘密组织——民主共和的人权社领导的。起义者的主力是巴黎工人，他们同政府的军队进行了两天残酷的街垒战。与镇压起义同时发生的是军人集团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和政府对民主派的迫害。——第 222 页。
- 225 塔弗纳条约是毕若和阿布德-艾尔-喀德之间于 1837 年 5 月 30 日在塔弗纳河地区签订的。1835 年法国殖民者破坏 1834 年同阿布德-艾尔-喀德所签订的和约，重新向他发动了战争，以夺取被他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西部。由于没有取得重大结果，同时又需要抽调兵力去镇压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起义的地区，法国政府只得批准毕若所签订的新和约。根据塔弗纳条约，法国被迫再次承认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不包括法国控制的某些沿海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阿尔泽等）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的独立。1839 年，和约再一次被侵略者背信弃义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对法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 96）。——第 222 页。
- 226 到 1844 年，毕若和其他的法国将领通过收买当地封建主和采取恐怖手段对付阿尔及利亚部落的方法，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西部。毕若以摩洛哥苏丹拒绝交出转到摩洛哥的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借口，率领军队侵入

摩洛哥领土。1844年8月，毕若通过背信弃义的进攻，在伊斯利河地区击溃了摩洛哥人的武装力量。同时，法国舰队毁坏了丹吉尔城和摩加多尔城。但是，在英国对在北非的法国领地扩大的趋势感到不安而进行干涉的威胁下，法国殖民者被迫暂时放弃对摩洛哥的占领。毕若根据1844年9月10日的丹吉尔条约，迫使苏丹逐走阿卜德-艾尔-喀德和解散摩洛哥的边防部队，然后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摩洛哥领土。——第223页。

- 227 毕若和基佐之间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毕若想利用镇压1845—1847年阿尔及利亚起义的机会，进一步侵占北非（他于1847年5月远征卡比利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和再度入侵摩洛哥。一贯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的基佐政府当时怕毕若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很尖锐的英法矛盾。——第223页。

228 指1848年2月24日七月王朝被推翻后所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政府成员极大多数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224页。

- 229 马克思指在各个时期出版的毕若的著作，这些著作叙述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各次战争和对这个国家实行侵略和殖民化的计划。——第224页。

- 230 “玻利瓦尔-伊-庞特”这个条目是马克思在拉丁美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史（1810—1826）还没有被人深入研究的时期写的。当时相当流传的是一些出于自自动机而参加这一战争的欧洲冒险家所出版的书籍和回忆录。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拉丁美洲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后来就对独立斗争进行歪曲。这一类书有：法国人杜库德雷-霍尔斯坦的回忆录（这个人一度是玻利瓦尔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他的私敌），英国人希皮斯利的著作（这个人是从玻利瓦尔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和“密勒将军回忆录”（这是曾参加秘鲁独立斗争的威廉·密勒的一本札记，但它已被他的兄弟约翰别有用心地修改过了）。这些书对拉丁美洲人民及其许多领导者所进行的运动作了极片面的评述。例如，在这些书中给玻利瓦尔硬加了许多捏造的坏品质（奸诈、傲慢和怯懦），而他确实存在的

缺点（在他晚年依靠保守的贵族和僧侣的时候特别明显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摆排场和贪恋权力的作风）就更被大大夸张了。玻利瓦尔为反对联邦分离主义分子、争取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被说成是独裁意图的表现，此外还公然歪曲事实，如杜库德雷-霍尔斯坦错误地硬说玻利瓦尔在1810年拒绝参加争取委内瑞拉独立的斗争等等。

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客观的研究所证实的，西蒙·玻利瓦尔在争取拉丁美洲独立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在这个斗争中一个时候曾团结了克里奥洛地主（西班牙人血统的拉丁美洲人）中的爱国分子、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玻利瓦尔的活动尽管有很大的矛盾，但仍然促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压迫，并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了共和政体，实行了某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改革。

马克思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以外没有别的资料，而这些书的作者所采取的偏袒态度当时知道的人也不多。因此马克思对玻利瓦尔个人就不免有了片面的看法，这反映在他写的条目中。上述著作过分夸大玻利瓦尔追逐个人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马克思对玻利瓦尔的态度。在玻利瓦尔的政策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波拿巴主义的特点非常明显。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玻利瓦尔活动的进步的一面（例如他解放了黑奴），并且整个说来，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评价很高，认为这是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第225页。

- 231 指宣布拿破仑皇帝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仪式，意大利王国于1805年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以代替被消灭的意大利（旧称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拿破仑妻子的前夫的儿子欧仁·博阿尔奈被任为总督。——第225页。
- 232 1810年4月19日在加拉加斯城推翻了殖民制度，成立了由克里奥洛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政府。在米兰达和玻利瓦尔领导的激进爱国社的影响下，1811年7月5日在加位加斯召开的议会宣告成立独立的委内瑞拉共和国。加拉加斯事件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信号。从墨西哥到智利，到处展开了拉丁美洲起

义者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邻近委内瑞拉的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西班牙人的政权在首都波哥大、海港城市卡塔黑纳和基多省(现在的厄瓜多尔)的同名首府被推翻了,但西班牙人的政权不久又在基多省的首府恢复。在委内瑞拉共和国于1812年7月覆灭以后,卡塔黑纳成了为恢复委内瑞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个堡垒。在后来进行的斗争中,第二委内瑞拉共和国(1813年8月—1814年7月)的成立是个鲜明的事件,但斗争的结果在大部分殖民地(不包括拉普拉塔)暂时恢复了西班牙人的政权。这个时期民族解放力量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运动的克里奥洛地主实行了狭隘的阶级政策,他们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仍然保持黑奴制度和不对等地对待印第安人。——第225页。

- 233 马克思从1829年伦敦出版的“密勒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277、278页(《Memoirs of General Miller》·Vol. II, London, 1829, p. 277, 278)引录了蒙特威尔德的话。在这本书(关于该书见注230)中对玻利瓦尔参加逮捕米兰达的动机作了片面的说明。从玻利瓦尔对蒙特威尔德的回答来看,他当时真诚相信米兰达可能叛变。——第226页。
- 234 引自杜库德雷-霍尔斯坦“忆西蒙·玻利瓦尔”1830年伦敦版第1卷第170—171页(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ívar》·Vol. I, London, 1830, p. 170—171)。该书于1829年在纽约写成,在法国和英国用不同的书名出版。从马克思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是上述英译本。——第228页。
- 235 新格拉纳达联邦共和国是在新格拉纳达各城市和省份进行反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之后于1813年成立的。共和国统一了控制在起义者手里的地区,这些地区根据联邦条约互相联结在一起,并承认新格拉纳达国会的最高权力。由于西班牙人从本国获得大量增援部队而在兵力上占优势,以及各地区自治政府之间内部的纷争,共和国于1816年覆灭。——第229页。
- 236 指海地共和国,它的成立是由于圣多明哥岛(岛的西部属于法国,东部

- 属于西班牙，西班牙于 1795 年把东部让给法国)的黑奴和黑白混血种人起义，以及他们从 1790 年起对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殖民者不断进行解放斗争的结果。1804 年该岛宣告独立，1806 年在岛的西南部成立共和国。——第 231 页。
- 237 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ivar》. Vol. II, London, 1830, p. 10—11. ——第 232 页。
- 238 指的是委内瑞拉起义军和在新格拉纳达的西班牙军队之间的会战。在 1816 年宣告成立第三委内瑞拉共和国以后，玻利瓦尔领导的委内瑞拉爱国者继续为委内瑞拉的解放进行斗争，于 1819 年 5—7 月进行了通过安第斯山脉到新格拉纳达的解放进军。8 月 7 日在波亚卡河地区发生了决战；西班牙军队在决战中被击溃。玻利瓦尔军队的胜利使新格拉纳达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并于 1819 年 12 月成立了大哥伦比亚联合共和国。加入联合共和国的有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而基多(厄瓜多尔)在赶走西班牙人以后于 1822 年也加入了大哥伦比亚联合共和国。——第 235 页。
- 239 累翁岛的革命是由里埃哥和基罗加上校领导的有革命情绪的军官于 1820 年 1 月在累翁岛南部发动的反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恢复 1812 年宪法(这一宪法在 1814 年被斐迪南七世的政府废除)、取消宗教裁判所和召开议会。起义的领导者利用了政府为镇压拉丁美洲的爱国者而调集列加迪斯(累翁岛的港口城市)地区的远征军兵士的不满情绪。累翁岛事件是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的开端，这次革命遭到国内反动势力和法国干涉军的镇压(见注 223)。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没有满足农民群众的土地改革的根本要求，从而使农民群众脱离了革命。1820—1823 年的革命打击了西班牙专制制度，粉碎了西班牙派遣庞大武装力量去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镇压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计划。——第 236 页。
- 240 草原牧民是居住在南美北部草原上的自由牧民，大部分是印欧混血种人。西班牙代理人博韦斯利用草原牧民对克里奥洛地主的敌视态度，招募他们参加军队，这支军队在 1813—1814 年与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

的爱国者作战。1816年，草原牧民的队伍在他们的新的领袖印欧混血种人帕埃斯的领导下，加入了答应给农民分土地的玻利瓦尔的解放军。草原牧民的骑兵参加了玻利瓦尔军队的许多次会战，其中包括上述1821年6月24日的胜利的卡拉博博会战，由于这次会战，西班牙人几乎完全被赶出委内瑞拉。——第236页。

- 241 1821年，西班牙殖民政权在中美一些地区（西班牙的镇守司令区危地马拉）由于当地爱国者的起义而被推翻。这些地区的拉丁美洲国家宣告独立，在短时期归并于墨西哥以后，于1823年成立联邦即中美合众国，这个联邦于1839年分裂为5个共和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新格拉纳达总督管辖地的组成部分）由于1821年的起义而加入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第237页。
- 242 指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于1826年秋天通过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宪法。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书”。这部法典对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欧洲许多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立法影响很大。——第238页。
- 243 巴拿马大陆会议于1826年6月22日至7月25日举行。会议通过了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永久邦联”的决议、互相防御条约和军事协定。但是会议的决定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批准。同召开会议有关的建立拉丁美洲联邦的计划，正像后来由玻利瓦尔提出的规模较小的成立“安第斯联邦”（由他统治的三个共和国——秘鲁、玻利维亚和大哥伦比亚组成）计划一样，由于缺乏实现计划的经济前提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互相冲突而遭到破产。在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发生了斗争。随着这些矛盾的尖锐化，玻利瓦尔的政权于1827年在秘鲁和1828年在玻利维亚被推翻了，而大哥伦比亚也由于委内瑞拉于1829年和厄瓜多尔于1830年脱离它而瓦解。——第238页。
- 244 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ívar》. Vol. II

. London, 1830, pp. 232—236. —— 第 241 页。

- 245 书目是马克思按照查·德纳的要求附在条目里的(见马克思于 1858 年 2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查·德纳于 1858 年 1 月 25 日给马克思的信)。在这个书目中有杜库德雷-霍尔斯坦的著作的法文本(《Histoire de Bolivar, par le général Ducoudray Holstein; continuée jusqu'à sa mort par Alphonse Viollet》. T t. I—II, Paris, 1831.)。在对第二本书的说明中有一个因疏忽而产生的错误:该书的作者是约翰·米勒,但是在秘鲁共和国军队中服务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兄弟——威廉·米勒将军,这本书是以后者的名义写的。正确的书名是:J. Miller. 《Mémoires of General Mill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of Perú》. Vol. I—2, London, 1828—1829. 第三本书的全名是:古·希皮斯利“南美俄利诺科河和阿普雷河地区远征记;远征军于 1817 年 11 月离开英国而加入委内瑞拉和加拉加斯的爱国者的队伍”1819 年伦敦版(G. Hippiusley. 《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s Orinoco and Apure, in South America; which sailed from England in November 1817, and joined the Patriotic Forces in Venezuela and Caraccas》. London, 1819). —— 第 241 页。
- 246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国家同盟战争时期于 1800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霍根林登(巴伐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莫罗指挥的法国军队击败了约翰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第 242 页。
- 247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战争”(《Vom Kriege》)一书的第二部分开头说明了这一思想。该书第一版于 1832—1833 年在柏林出版。—— 第 242 页。
- 248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该条目的末尾补充了一些关于美国马枪改进的情况,并举出了该条目写成以后出现的一些事实。—— 第 246 页。
- 249 1854 年英国军队采用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像法国的米涅式步枪(1849)一样,都运用扩张式弹丸的原理:底部掏空的弹丸通过枪口部分进入枪膛,在射击时弹丸由于火药的作用而扩张,然后被压进膛线,膛线使弹丸具有旋转运动。—— 第 246 页。

- 250 指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见注 44）。——第 247 页。
- 251 见注 56。——第 248 页。
- 252 恩格斯在写“霰弹”这一条目的同时，还对它最靠近的术语《cartouch》写了一个短条目。下面是在 1859 年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第 4 卷上刊印的这个短条目的原文（可能已被删节）：
“Cartouch（法文是 cartouche）这一术语在旧的军事著作中有时作为‘霰弹’的同义词使用。在其他场合这个术语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弹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cartouch》是檐口的砌体或装饰横撑，以及一般上面刻有某种标志或题词的各种浮雕装饰物。”——第 249 页。
- 253 在 1701—1714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元帅维拉尔指挥的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于 1703 年 9 月 20 日在霍赫施泰特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第 257 页。
- 254 恩格斯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清楚地说明了这次大会战的巨大规模和双方军队在会战中所表现的顽强和坚毅精神，并且比许多西欧军事历史著作的作者更客观地描述了这次会战的经过，但是在阐述这一事件的某些方面不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写的论托尔将军一书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在本条目的末尾提到这本书，而这本书里包含托尔本人和他的传记作者的许多片面看法。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中的不确切地方主要是对会战结果的估价（恩格斯倾向于认为这次会战对拿破仑军队来说是一次胜利的会战），以及对俄军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在这次会战中的作用的估价。库图佐夫所选定的阵地和俄军的部署决不是像条目中所说的那样是错误的。俄军的左翼最为薄弱，但库图佐夫在会战中巧妙地使用了他所留下的大量预备队，可靠地支援了俄军左翼。拿破仑被迫放弃迂回俄军左翼而把主攻方向转移到俄军阵地中央附近，其原因就在这里。库图佐夫在会战中不是被动的，他不断地影响会战的进程，他打乱和打破了拿破仑的计划。俄军骑兵根据库图佐夫的命令成功地袭击法军左翼的后方从而减弱了法军的压力，特别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战的

总的结局对拿破仑是极为不利的。他未能消灭俄军的主力,而自己却遭到巨大的损失。会战表明,俄军不仅能够坚守阵地,而且能够进行歼灭性的打击。会战的结果为战争朝着有利于俄国方向转变和拿破仑军队失败准备了条件,在当时条件下俄军放弃莫斯科尽管是被迫的,但是合适的。

后来经过研究调查对有关双方兵力和损失的资料也作了重大的更正。根据这些资料,法军在会战时有 135000 人和 587 门火炮,俄军有 120000 人和 640 门火炮;法军死伤 58000 人;俄军损失约 40000 人。——第 258 页。

255 见注 74。——第 259 页。

256 指库图佐夫为了迂回法军左翼的进攻部队而派乌瓦罗夫的骑兵军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军进行袭击。俄国骑兵在法军的侧翼和后方出现,迫使拿破仑停止在中央的攻击,这就使库图佐夫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来反击拿破仑以后的攻击。——第 261 页。

257 指泰·伯恩哈尔迪“俄罗斯帝国步兵上将卡尔·弗里德里希·托尔伯爵生平事迹”1856 年莱什锡版第 1—4 卷 (Th. Bernhardt.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 russ. Generals von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 Bd. 1—4, Leipzig, 1856)。——第 263 页。

258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1808—1814) 期间,威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在 1813 年 6 月 21 日的维多利亚会战中,击败了约瑟夫·波拿巴的法国军队。这次会战是争取比利牛斯半岛摆脱拿破仑军队控制的斗争中的重要阶段。——第 264 页。

259 这里刊载的示意草图是弗·恩格斯根据对 1813 年比达索阿河地区会战的记述和这些会战的计划而画的,取材于 1840 年伦敦出版的威·弗·帕·纳皮尔“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的战争史”第 6 卷附录 5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 Vol. VI, London, 1840. Explanatory Sketch №5)。在恩格斯的草图中作了如下标记：乌罗尼埃、鲁涅、长裤汉、普埃托、巴荣讷特、霍格斯巴克、科米萨里、克鲁瓦-德-布克、比里阿图、比耳多克斯、曼达累、贝腊、萨利纳斯、伊龙、圣马尔西亚耳、累萨卡、阿亚山。右下角写有“比达索阿战场”的字样。——见第 268—269 页间的插图。

- 260 指公元 300 年左右编写的一本名叫“安敦尼旅行指南”（《Itinerarium Antonini》）的书；在这本书中指明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交通线、交通线上的地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第 271 页。
- 261 阿·戈尔盖“1848—1849 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 年莱比锡版（A. Görgel.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Leipzig, 1852）；格·克拉普卡“回忆录。1849 年 4—10 月”1850 年莱比锡版（G. Klapka. 《Mémoires. Avril bis Oktober 1849》·Leipzig, 1850）。——第 271 页。
- 262 洪韦德——见注 129。——第 273 页。
- 263 约瑟夫·弗拉维“犹太战争”第 3 册第 5 章。
在由犹太人反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引起的犹太战争（公元 66—73 年）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维·韦斯帕西安于公元 68—70 年围攻耶路撒冷，在韦斯帕西安称帝以后，围攻战由他的儿子梯特指挥。罗马人占领了城墙，被围者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和城内街道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第 276 页。
- 264 利未人是古犹太人神职人员的特别等级。
会幕——据圣经上的传说，是一种流动神庙。
在圣经中记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见摩西第四经民数记第 1—2 章。——第 278 页。
- 265 占卜官——古罗马的祭司，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在国家采取每一个重要行动之前，他们都要依据鸟鸣和鸟飞等等来占卜凶吉。
日晷——古代的天文仪器。——第 279 页。

- 266 指公元前 101 年韦尔切利（意大利北部）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罗马统帅马利乌斯战胜了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这一胜利结束了罗马人同多次入侵高卢南部与意大利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斗争（公元前 113—101 年）。——第 280 页。
- 267 所列举的一系列战事发生于 1672—1679 年法国联合英国（英国于 1674 年脱离联盟）和瑞典对荷兰、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时期。这次战争是由法国和荷兰之间进行商业竞争和路易十四企图侵占尼德兰南部（属于西班牙）和北部引起的，战争的结果是：路易十四王朝夺得西班牙领土，扩充了领土，但是法国人没有达到击溃荷兰这个主要目的。——第 281 页。
- 268 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政府 1678 年同荷兰和西班牙以及 1679 年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和约，这个和约结束了自 1672 年开始的这些国家同法国之间的战争。根据这个和约，法国获得了弗兰契康帖和西属尼德兰的几个城市，并把战时所占领的马斯特赫赫特城堡和奥伦治王室的世袭土地归还给荷兰；荷兰则承认法国在圭亚那和塞内加尔侵占的殖民地。——第 281 页。
- 269 指 1688—1697 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间的战争头三年的军事行动，欧洲同盟就是所谓的奥格斯堡同盟，其成员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战争于 1697 年以签订皇斯维克和约而告终，和约确认作了某些变更的战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 1688 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王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的王位。
下面提到的是这次战争以后几年的事件。——第 282 页。
- 270 1701—1714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 67。——第 282 页。
- 271 M. Coehoorn. 《Nieuwe Vestingbouw》. Leeuwarden, 1685. ——第 282 页。
- 272 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是十二世纪至十五纪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

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第 286 页。

273 指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北部作战期间,法国军队于 1797 年对威尼斯的占领,这一占领招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于五世纪)的灭亡,法国和奥地利根据康波福米奥条约(见注 151)瓜分了它的领土。——第 286 页。

274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征服缅甸。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的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姆省以及沿海的阿拉干和典那沙冷,根据 1826 年 2 月 24 日签订的英国人强加于缅甸人的极端波条约,上述地区脱离缅甸。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缅甸还赔款 100 万英镑。第二次缅甸战争(1852)的结果。英军占领了勃固省。——第 287 页。

275 H. Yule. 《A 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sent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55》. London, 1858. ——第 294 页。

276 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的初稿经马克思作了重要补充后,作为定稿寄到纽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摘录以及恩格斯于 1858 年 3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写这一条目,从各种资料中收集材料。恩格斯主要是利用纳皮尔写的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一书(见注 259),而马克思则利用各种参考书和百科全书。——第 296 页。

277 列举的是英国几次征服殖民地的远征:贝雷斯福德参加了这些远征。

1806 年,英国利用当地荷兰移民布尔人的反荷兰殖民政权的起义,占领了好望角(海角殖民地)周围的南非土地。他们以荷兰(当时拿破仑的附庸)参加拿破仑反英战争为入侵的借口。海角殖民地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正式归并英国。

1806 年,由波彭上尉和贝雷斯福德将军指挥的英国远征军企图夺取属于西班牙(当时拿破仑法国的盟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贝雷斯福德的队伍没有遭到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严重抵抗,而占领了布宜诺斯艾

利斯，但是后来被阿根廷爱国民军包围而不得不投降。1807年英国人向拉普拉塔河口派出的新的远征军也遭到了失败。

贝雷斯福德的部队于1807年底借口保卫葡属马德拉岛不受法国人的侵略而占领该岛。英国人控制该岛一直到1814年。——第296页。

- 278 辛特拉(葡萄牙)协定——英军总司令达尔林普尔和法军总司令茹诺于1808年8月30日在葡萄牙签订的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应从葡萄牙撤走自己的部队(这些部队于1807年秋天进入该地)。这个协定是1808年法军被英葡军队击败和比利牛斯半岛到处爆发拿破仑统治的人民起义胜利的结果。1808年夏天，法国占领军几乎完全被赶出了西班牙。虽然法军的处境危急，但是根据协定会条款，英国有义务用自己的军舰把茹诺的部队送回法国。茹诺的这些部队回法国后被拿破仑编在二十万军队里，这支军队1808年11月由拿破仑率领再度入侵比利牛斯半岛。

在法军再度入侵比利牛斯半岛期间，穆尔将军指挥的撤退的英国军队于1809年1月16日在科鲁尼亚(西班牙)击退了苏尔特元帅的部队的进攻，并在贝雷斯福德师的掩护下于1月17日和18日在科鲁用亚港搭上舰船，开往英国。——第296页。

- 279 指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后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由威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击败了法军。

在1812年7月22日萨拉芒卡会战中，威灵顿的部队击退了遭到巨大损失的马尔蒙元帅的军队。在1813年6月21日维多利亚会战(见注258)之后，法军主力被逼退到比利牛斯山脉，到1813年底，战争转到法国领土上了。在1813年12月9—13日贝云(法国西南部)城郊的战斗中，威灵顿的部队向苏尔特元帅的军队的营垒进攻，迫使法军后退。

1814年春天，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军队在法国发动总攻期间，威灵顿的进攻部队于2月27日在奥尔特兹和4月10日在土鲁斯战胜了苏尔特的军队。4月18日在拿破仑退位以后，苏尔特同威灵顿签订了休战协定。——第297页。

- 280 指贝雷斯福德参加镇压 1817 年在巴西东北部的佩囊布库省爆发的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宣布为成立独立的共和国而斗争的起义者遭到了失败。后来领导争取脱离葡萄牙的运动的地主贵族分子于 1822 年宣告成立独立的巴西帝国，他们在巴西保持了反动的君主制度和黑奴制。——第 297 页。
- 281 指贝雷斯福德帮助唐·米格尔亲王领导的葡萄牙反动的地主教权派镇压 1820—1823 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823 年 5 月受英法外交唆使的反革命将军和军官发动叛乱，在葡萄牙恢复了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第 297 页。
- 282 指托·霍普的小说：“阿纳斯塔西乌斯，或希腊人的回忆录（写于十八世纪末）” 1819 年伦敦版第 1—3 卷（《A nastasius: or Memoirs of a Greek; written at the alo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V ol. I—III, London, 1819）。——第 297 页。
- 283 意大利是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的主要战场。公元前 218 年，汉尼拔率领雇佣军队由西班牙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北部进军。公元前 218 年 10 月，汉尼拔在提契诺河打败了前去迎战的执政官的军队之一的先头部队，同年 12 月又在特雷比亚河击溃了两支联合军队。汉尼拔突入意大利中部后，于公元前 216 年 8 月在阿普利亚的坎纳迎头击溃了罗马军队（恩格斯在下面详尽地叙述了这三次会战）。然而，罗马军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胜利以及它在北非的登陆，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从意大利召回汉尼拔，从而使汉尼拔的胜利化为乌有。公元前 202 年，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战败。战争以迦太基接受苛刻条件签订和约而告终。——第 301 页。
- 284 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241 年、218—201 年和 149—146 年）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果，迦太基被迫把对西西里和附近岛屿的统治权让给了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丧失了舰队和所有非洲以外的领地（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等）并必须向罗马缴付巨额赔款。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果，

- 罗马人粉碎了迦太基的实力，消灭了迦太基国家；迦太基城被毁灭。——第 304 页。
- 285 指 554 年的卡西里努姆河（在意大利西南部的卡普亚城附近）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拜占庭统帅纳尔塞斯打败了日耳曼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会战一开始，法兰克人便深深地插入拜占庭军队的中央，但后来，纳尔塞斯的骑兵从翼侧迂回并从背后攻击，结果被围歼。纳尔塞斯军队打退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侵袭，并消灭了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王国（493—554 年）的残余兵力（其主力早在同法兰克人作战前就已被摧毁），在短时期内在意大利确立了奴隶制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统治。——第 305 页。
- 286 德意志国王捕鸟者亨利希一世的军队在梅泽堡会战（933 年）中以及他的继位者奥托一世的军队在雷赫河会战（955 年）中打败了十世纪侵入德国领土的匈牙利人。这两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亨利希一世改组了德国骑士队而取得的。——第 305 页。
- 287 1241 年 4 月 9 日在利格尼茨（累格尼察）城附近的瓦尔施特会战中，波兰和德国封建主的联军被入侵中欧的蒙古征服者打败（关于这次入侵见注 33）。——第 305 页。
- 288 在 1513 年 6 月 6 日的诺瓦拉（意大利北部）会战中，为米兰公爵服务的瑞士雇佣军队打败了以骑士为主力的法军，并迫使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退回法国。因此，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于 1513 年对意大利进行的侵略性征讨就告失败。这次征讨是 1494—1559 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外敌对亚平宁半岛多次入侵中的一次（见注 36）。——第 307 页。
- 289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 1644 年 7 月 2 日马尔斯顿穆尔（约克郡）会战和 1645 年 6 月 14 日诺伊兹比（北安普顿郡）会战中，议会军击溃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反革命军队。在这两次会战中，克伦威尔率领的骑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支骑兵的核心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队伍，他们有优良的战斗素质，严明的纪律和对革命职责的认识。这两次会战，特别是第二次会战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议会军在 1642—1646 年第一次内战（见注 50）的胜利。——第 308 页。

- 290 西里西亚战争是全欧性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 42）的一部分。它包括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入西里西亚起到他与奥地利人缔结第一次单独和约为止的普奥战争（1740—1742），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以及从 1744 年 8 月重新爆发战争时起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缔结新的单独和约为止的普鲁士与奥地利及其同盟者萨克森之间的战争（1744—1745 年），即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这两次战争反映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中欧霸权的斗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并控制波兰富饶的西里西亚省。——第 309 页。
- 291 恩格斯用自己的话引用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的各种守则中的一系列规定：如引自 1742 年 3 月 17 日的“骑兵战斗守则”，1742 年 3 月 21 日的“骠骑兵团团长和全体军官守则”，1744 年 7 月 25 日的“骑兵军官与敌人遭遇时的行动守则”，1748 年 8 月 14 日的“骑兵少将守则”等。——第 310 页。
- 292 这里列举的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所发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骑兵的行动起了极大的作用。
- 1745 年 6 月 4 日在西里西亚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有时叫施特里高会战）中，普军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率下打败了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1745 年 12 月 15 日在凯塞多尔夫（萨克森）会战中，普军击溃了萨克森军队，使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可能与奥地利和萨克森在德勒斯顿签订和约，结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见注 290）。
- 1757 年 11 月 5 日在罗斯巴赫（普鲁士梅泽堡区）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打败了法国以及同普鲁士为敌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军。
- 关于莱滕会战（1757 年 12 月 5 日），见注 117。
- 1758 年 8 月 25 日（14 日）在措尔恩多夫（东普鲁士）附近，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军作战，结果双方损失惨重，未分胜负。俄军的抵抗，打破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关于各个击破敌人的计划，并为后来俄军的顺利进攻准备了条件。——第 310 页。
- 293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1796 年 9 月 3 日在维

尔茨堡（巴伐利亚）会战中，奥军在卡尔大公的统率下打败了茹尔丹将军的法军，法军被迫退到莱茵河西岸。奥军使用大量骑兵作战对这次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 310 页。

- 294 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第一在 1807 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划出原先归并普鲁士的波兰领土的一小部分所建立的附庸国；1809 年，奥地利被击溃后，又把奥地利占有的波兰领土的一部分并入华沙大公国。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被普、奥、俄三国瓜分。

莱茵联邦——见注 198。——第 311 页。

- 295 1813 年 4 月 5 日（3 月 24 日）在萨克森的丹宁科夫（或默克恩）附近，同盟国俄普军队在俄国将军彼·赫·维特根施坦统率下打败了欧仁总督的法军。——第 312 页。
- 296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II, London, 1831, p. 272. ——第 313 页。
- 297 拉罗什-艾蒙“骑兵，或骑兵部队的编成、组织和训练方面的必要改革”1828 年巴黎版第 1 部第 140 页（La Roche-Aymon. 《De la cavalerie, ou des changements nécessaires dans la composition, l'organisation et l'instruction des troupes à cheval》. 1-re partie, Paris, 1828, p. 140）。——第 315 页。
- 298 451 年在卡塔洛温平原（现在法国的马尔纳河岸夏龙城附近），阿梯拉率领的突厥游牧掠夺者——匈奴人——与西罗马统帅艾修斯率领的军队展开了激战。艾修斯的军队由日耳曼人、罗马人、高卢人等族的兵士组成；阿梯拉的军队中也有被匈奴人征服的欧洲很多部落的战士。匈奴骑兵击溃了艾修斯军队的中央，但后来因翼侧受到攻击，遭到很大伤亡而被迫撤退。艾修斯军队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内部不和而未能把匈奴军队全部歼灭。

西帕依起义是 1857—1859 年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次规模极

大的人民起义。起义于 1857 年春天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编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中爆发，并蔓延到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的贫苦手工业者。本地的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区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到失败。——第 320 页。

299 见拿破仑回忆录“对 1816 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刊载于《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e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Tome premier, Paris, 1823, p. 262 (书名的翻译见注 71)。——第 320 页。

- 300 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铁卢会战（见注 54）中，德尔隆将军所统率的一个军奉拿破仑的命令以它的 4 个师（每师编成 1 个纵队）向威灵顿的同盟国军左翼攻击。纵队中各营前后配置。这种队形在一开始攻击时就使该军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第 323 页。
- 301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期间，1812 年 7 月 23 日在加尔西亚-埃尔南迪斯会战中，编入威灵顿的英国军队的德意志军团的骑兵袭击了在萨拉芒卡会战（见注 279）中失败而后退的法军的后卫，这支骑兵突破并冲散了步兵的方队，捕获了数百名俘虏。——第 325 页。
- 302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 1859 年将本条目刊载于百科全书第七卷时，附上了美国已有的和正在修建的筑城工事一览表，该表根据 1859 年 10 月的材料制成。在表内还注明用于建筑、修理和改进这些工事的费用。——第 327 页。
- 303 指德国工程师丹·斯佩克尔和他的著作：“要塞建筑学”1589 年斯特拉斯堡版（《Architectura von Vestungen》· Strassburg, 1589）。——第 329 页。
- 304 指 1554 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尼·塔尔塔利亚的著作：“各种研究和发明”（《Quesiti et inventioni diverse》）第 6 册。该书第一版于 1546 年在威

尼斯发行。——第 334 页。

- 305 加·阿尔吉西“论筑城”1570年威尼斯版(G. Alghisi: 《Delle fortificazioni》. Venetia, 1570); 吉·马吉和札·卡斯特里奥托“论城市筑城”1564年威尼斯版(G. Maggi e J. Castriotto. 《Della fortificazione delle città》. Venetia, 1564)。——第 335 页。
- 306 见注 38。——第 338 页。
- 307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在法国人手中的兰道要塞(德国西部)于1702年受到德意志帝国军队围攻并被占领。1703年法国人又占领这座要塞,次年帝国军队再次围攻该要塞,经过三个月的围攻,要塞被迫投降。1713年兰道城又被法军占领。——第 343 页。
- 308 指 1683 年 7 月抵御土耳其军队围攻的维也纳防御战。这次防御战以 1683 年 9 月 12 日奥、德、波联军击溃土耳其军队而告终。在这次击溃土军的战斗中,由杨·萨比斯基率领前来援救奥地利首都的波兰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也纳会战阻止了土耳其军队向中欧推进。——第 344 页。
- 309 蒙塔郎贝尔在筑城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垂直筑城即研究直线、三角、四角及各种多角形筑城方法的经验”1776—1786年巴黎版第 1—5 卷(《La Fortification perpendiculaire, ou Essai sur plusieurs manières de fortifier la ligne droite, le triangle, le carré et tous les polygones》. Tt. 1—5, Paris, 1776—1786)。——第 346 页。
- 310 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是 1828—1836 年按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德斯特的专门设计修筑在林茨城周围的 32 座塔楼。这些塔楼是准备用作独立堡垒来进行防御的。——第 347 页。
- 311 崩采耳维茨营垒是构筑在西里西亚的野战筑城工事,是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令从 1760 年开始修建的。1760—1762 年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数次在该营垒内进行防御,抵抗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

托列斯-维德拉斯(托列治-维德拉什,在里斯本附近)营垒是1810年根据威灵顿的命令修建的,它用来掩护英葡军队抵抗法军。这一营垒有三列坚固的工事,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10—1811年,依靠这座营垒阻止了马森纳元帅的法军对里斯本的进攻。

法国魏森堡防线(亚尔萨斯)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时期由维拉尔元帅的军队于1706年修建的。维拉尔元帅的军队曾在这里进行防御,抵抗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以后,科尔蒙太涅将这一防线加以改进。在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792—1797)期间,法军和奥军曾为争夺这一防线进行过特别激烈的战斗。

关于维罗那前面的奥军事及其在1848年奥地利反革命军队对应蒙特军队作战时的作用,见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和“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和第213—220页)。——第352页。

- 312 1848—1849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匈牙利军队于1849年7月2日和11日凭借科莫恩(科马罗姆)要塞的营垒两次抗击了奥军的优势兵力。要塞本身于1849年两次(1—4月和7—9月)抵御了长期的围攻,直到9月27日才被奥军攻占。——第353页。
- 313 多立斯人是古希腊部落的主要集团之一,于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从北方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南部岛屿。与早先走居在希腊的部落(亚该亚人、伊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比较,多立斯人在社会制度方面保持较多的古老的父权制特点。然而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使得多立斯人也分化出了氏族贵族,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其中以斯巴达为最强大。——第354页。
- 314 珀里俄科——见注13。——第354页。
- 315 希腊波斯战争——见注7。——第355页。
- 316 赫罗泰——见注14。——第355页。

- 317 伯罗奔尼撒战争——见注 11。——第 355 页。
- 318 萨姆尼特战争（公元前 343—341 年、约 327—304 年和 298—290 年）是在罗马争夺意大利中部统治权的斗争时期罗马人和萨姆尼特人（居住在亚平宁中部山区的意大利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战胜萨姆尼特人是巩固罗马奴隶制国家和使意大利各部落统一于罗马政权之下的重要里程碑。——第 359 页。
- 319 指波利比乌斯的“四十卷通史”第 6 卷。
布匿战争——见注 284。——第 359 页。
- 320 1339 年 6 月 21 日在劳平（伯尔尼附近）会战中，由自由农组成的瑞士步兵击败了奥、德、意封建主的同盟军。这次会战是瑞士各州争取独立的斗争（见注 34）的重要阶段。——第 366 页。
- 321 指 1481—1492 年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联合王国（西班牙君主国）对格拉纳达伊斯兰教国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从摩尔人手中夺回比利牛斯半岛，即雷克吉斯达（见注 206）的结束阶段。这次战争以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而告终。——第 367 页。
- 322 边屯区——见注 41。——第 376 页。
- 323 1775 年 4 月 19 日在累克辛顿和康克德（马萨诸塞），英国正规部队被成散开队形作战的美国起义者打败。这次战斗揭开了英国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的序幕。——第 376 页。
- 324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到 7 月 8 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

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

特罗塔“关于迄今使用的远射程小型火器对步兵战斗行动的影响问题的研究”1857年维登堡版（Trotha: 《Beitrag zur Erörterung der Frage: Welchen nothwendigen Einfluß haben die bis jetzt gebräuchlichen weittragenden Handfeuerwaffen auf das Gefecht der infanterie?》Wittenberg, 1857）。——第381页。

- 325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本条目末尾附加了一段叙述美国海军从1775年起发展情况的资料。其中引用了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出版时（1861年）为止有关美国海军编成的资料。恩格斯写的这个条目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是在该卷出版前几个月写成的。——第382页。
- 326 公元前264—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见注284）中罗马人最初无力对付迦太基的庞大海军，后来他们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舰队，并借此屡败迦太基舰队。结果迦太基的海军被击溃。战船上的接舷跳桥帮助罗马人取得了这一胜利。——第382页。
- 327 指1844年出版的茹安维尔亲王的小册子“论法国海军的现状”（《De l'état des forces navales la France》）。——第389页。
- 328 克里木战争（1853—1856）期间，保卫德涅泊—布格湾入口处的一座俄国的小要塞金布恩，于1855年10月17日（5日）遭到英法联合舰队的轰击。参加这次轰击的有法国三个装甲浮动炮台。——第391页。
- 329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对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著作“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福格特的这一著作是反对马克思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12月，而在1860年1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用两篇社论转述了该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用文字回答福格

特，而对“国民报”所进行的诽谤则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起，马克思就着手为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和对“国民报”提出诉讼收集材料。为此目的，他写信给许多同他在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有过联系的人，请他们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从1860年2月中起，马克思开始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员尔的材料寄往柏林，寄给他的法律顾问维尔贝律师。但是在1860年4—10月这一期间，马克思的起诉却被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毫无理由地拒绝了。

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继续撰写抨击福格特的著作。他研究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论述外交政策问题的书籍和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并且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以便查阅由恩格斯保存的那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以及他们同各种敌对派别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1860年9月，马克思基本上写完了这一抨击性著作；但是，在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驳回了他对察员尔的控诉书之后，他又补写了“一件诉讼案”这一章，对普鲁士的司法制度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评。马克思于11月写完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把它题为“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于1860年12月1日问世：它由伦敦佩奇出版社出版，由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印刷。该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再版过。“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曾被转载，被当做187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经作者同意的（第二）版本的补充。1885年出版“揭露”的第三版时，恩格斯对这一附录稍微作了补充。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第一个俄译本是在1933年出版的。——第397页。

- 330 “人民报”（《Volk-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

“改革报”（《Die Reform》）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401页。

- 331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401页。

- 332 C. Vogt: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im Dezember 1859.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401页。

- 333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同拉萨尔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的分歧（见本卷说明第XXVIII页）。

关于意大利战争，见注324。——第403页。

- 334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语。——第404页。

- 335 马克思经常用卡尔·福格特的姓同中世纪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州官（叫做“福格特”或“兰德福格特”）——名称的巧合来嘲笑他。“疑虚堡的世袭州官”，即世间不存在的一个城堡的州官（nihil按拉丁文的意思是一无所有），是约翰·菲沙尔特的讽刺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的卷头提到的人物。菲沙尔特的这部作品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的德文改写本，于1575年问世。马克思在下面引用了这部作品中的话。——第404页。

- 336 马克思这样来称呼他所分析的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以别于福格特用同一题目在报刊上发表的其他一些单篇文章。——第404页。

- 337 马克思指福格特的“警告”一文，该文写于5月23日，发表在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是资产阶级日报，在瑞士的俾尔城（在伯尔尼州）出版。1853—1909年用这一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反映了波拿巴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有时讥讽该报为俾尔“推销员”。——第405页。

- 338 巴登共和派起义发生于1848年9月底,是由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并押往布鲁赫萨尔城(在巴登)监狱去执行。1849年5月,巴登爆发新的起义,司徒卢威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起义者释放。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宪法)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的否决。1849年5月,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1—104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10页。

- 339 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成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派别的影响。——第410页。
- 340 烧炭党人(carbonaro——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解放、恢复意大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们抱着推翻波旁王朝的自的。——第410页。

- 341 马克思把拉德马赫尔称为庸医,是暗示他的一本书名:约·哥·拉德马赫尔“为不被学者们承认的一位从事炼丹术的老庸医的合理的实用医学辩护、对二十五年中采用这门学科的临床结果所作的真实说明”(J.G. Rademacher. 《Rechtfertigung der von Gelehrten miskannten, versandesrechten Erfahrungsheillehre der alten scheidekünstigen Geheimärzte und treue Mittheilung des Ergebnisses einer 25 jährigen Erprobung dieser Lehre am Krankenbette》)。——第410页。
- 342 马克思把参加1851年12月2—4日波拿巴派政变的人称为十二月帮,这次政变的结果是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个帝国(1852—1870)的反革命制度。在策划这次政变中,1849年创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的十二月十日会(这样称呼这个会,是为了纪念该会的庇护人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12月10日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下面对该会作了评述。——第411页。
- 343 马克思在摘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把“会”均改为“帮”。——第411页。
- 344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经过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无期徒刑,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412页。
- 345 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法国临时政府(其中大半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想使路易·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而且国家工厂的工人更加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因而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关闭这类工厂的措施。这种做法引起了巴

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无产阶级 6 月 23—26 日起义的原因之一，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利用了国家工厂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 1848 年 2 月 25 日下令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 1848 年的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第 412 页。

- 346 指 1715—1723 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利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 414 页。
- 347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 415 页。
- 3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5 页和第 225—227 页。——第 415 页。
- 349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 1859 年 5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 1 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 2 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报纸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 6 月 11 日的第 6 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和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从 7 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了16号。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417页。

- 350 说战场上有两个里士满，或还有一个里士满，指出现意料之外的第二个敌手。原出处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第417页。
- 351 1848年4月，巴登爆发了共和派的起义，弗·卡·黑克尔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黑克尔的队伍和其他起义队伍都被政府军队击溃了。起义遭到了失败。有一些参加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参加了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战士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在1849年初津贴便停发了。后来这支队伍编入了志愿军分队，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了1849年5—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作战行动。——第418页。
- 352 马克思用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来讽刺福格特在报刊上予以支持的法国拿破仑第三和波拿巴主义集团想夺取莱茵河左岸的企图。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者的这些计划同莎士比亚“终成眷属”一剧中的一些滑稽可笑情节（第三幕第五场和第六场，第四幕第一场和第三场）相处拟。在该剧中，巴洛队长去寻找一面失去的战鼓，而终于被他的老同事揭穿是一个胆小鬼、吹牛家、出卖灵魂的人。马克思用巴洛来指福格特。——第419页。
- 35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

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确定报纸对异常重要的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实行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的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419页。

- 354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争取脱离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848年3月开始，打打停停，一直进行到1850年6月底。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便于1848年4月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使其终于遭到了失败。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1849年5月17—18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赶到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419页。

- 355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是法国的双周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它是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联合组成的秩序党的机关刊物；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之后，它成了波拿巴主义

者的机关刊物。

爱德华·西蒙写的“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一文，刊载在1860年2月15日出版的一期“现代评论”上。马克思对该文的评论见本卷第480—481、502—504和第616—619页。——第420页。

- 356 指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421页。
- 357 这里提到的“鞋会”，原来是1525年农民战争前夕在德国活动的一个秘密的革命农民协会；席利用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席利强调硫磺帮成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并无任何联系。——第423页。
- 358 Cercle social（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几年在巴黎进行活动。Cercle social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克·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大胆得多的言论。大多数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对Cercle social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疯人派”所表露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都持否定态度。——第425页。
- 359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1901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而在1925年最终同它融为一体。“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强调该组织的瑞士民族性。据传说，1307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草地集会，缔结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统治，包括反对奥地利的州官。马克思用这一事件来讽刺福格特。——第426页。
- 360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
-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

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第428页。

- 361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中，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353)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 1850 年 3 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中，总结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 年 3 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派的分裂。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 1850 年 12 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6—629 页）。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 429 页。

- 362 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1—522 页）。这一著作于 1853 年 1 月在瑞士巴塞爾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上陆续发表，到 1853 年 4 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所引证的“揭露”，根据的是波士顿出版的小册

- 子。——第 429 页。
- 363 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绰号普隆-普隆）的公馆。——第 429 页。
- 3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2 页和第 525 页。
“德美革命贷款”指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 1851—1852 年企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的贷款，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贷款，金克尔于 1851 年 9 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贷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 430 页。
- 365 1848 年 5 月 18 日至 1849 年 5 月 3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会议。——第 431 页。
- 366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第 433 页。
- 367 “独立报”（《L'Indépendant》）是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周报，1851—1852 年用这一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 434 页。
- 368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名称。——第 435 页。
- 369 1851 年 9 月，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成员在法国遭到了逮捕；该集团是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这一集团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策略，无视现实形势，打算立即组织起义，因而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得以在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的帮助下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案件。1852 年 2 月，被捕者被判罪，罪名是策划政变。警察当局给奸细舍尔瓦尔安排了越狱潜逃。普鲁士警察

当局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德法密谋的参加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了。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所提供的旨在证明被告们参加德法密谋的种种假证词，马克思已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中驳得体无完肤了。——第437页。

- 370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从1802年起用这一名称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胆怯的和叛变的政策。——第437页。
- 371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被分别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和第457—536页）。——第437页。
- 37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页。——第437页。
- 373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

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438页。

374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是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第439页。

375 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从1848年6月起存在于德国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的所谓中央政权，它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在保守派议员和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议会之后，议会有被解散的危险，因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于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440页。

37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41页。

377 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42页。

3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448页。

379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的简称。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

马克思指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该文发表在这家报纸的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两号上。——第448页。

- 380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 449 页。
- 381 拉登多夫案件是 1854 年在柏林举行的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人的审判案；他们是因投向警察局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汉茨的告密而于 1853 年被捕的。他们被诬告进行阴谋活动，被判处期限不同的徒刑（从 3 年到 5 年）。
死人同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存在于不来梅的一个密谋组织。1852 年为警察局破获。——第 449 页。
- 3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32—533 页。——第 450 页。
- 3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30 页。——第 450 页。
- 384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下面两句话：（1）“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普鲁士大臣舒连堡-克涅特在耶拿之役战败后于 1806 年 10 月 17 日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说的话）；（2）“你将在这一标志下获胜”（据罗马历史学家克萨里亚的尤西比亚斯的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 312 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前夕，据说在天空中看见了一个带有这样题词的十字架）。——第 451 页。
- 385 《Das Centralfes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e in der Westschweiz (Lausanne, 1859)》·Genf, 1859, Markus Vaney, rue de la Croix d'Or. ——第 452 页。
- 386 暗指 1851 年出版的卡·福格特“兽国研究”一书的书名，该书是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 453 页。
- 387 Jacob Venedey. 《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Hannover, 1860.
科贝斯第一是费奈迭的绰号，由亨·海涅的诗“科贝斯第一”而来。海涅在这一讽刺诗中嘲笑雅科布·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在科伦的方言中意思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

伦)。——第 454 页。

- 388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十七世纪至 190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455 页。
- 389 讽刺地指 1855 年出版的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纳的“力和物质”一书的名称。毕希纳和福格特同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第 455 页。
- 390 “日内瓦席勒纪念会。附本年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 1859 年日内瓦版（《Die Schiller-Feier in Genf. Nebst einem Nachtrag enthaltend die diesjährige Todtenfeier für Robert Blum》·Genf, 1859）。——第 456 页。
- 391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 1859 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C. Vogt.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 1859）。——第 456 页。
- 392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一家反动透顶的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的称呼（因在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章图形）；该报从 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第 458 页。
- 393 指“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 1848 年苏黎世版（《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 Wörtlicher Abdruck des Kommissionsberichtes an die H. Regierung des Standes Zürich》·Zürich, 1848）。报告人是约·卡·布伦奇思。——第 464 页。
- 394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或称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建立的，其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团结比利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并同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

以后,由于该协会会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的活动即告停止。——第 464 页。

- 395 宗得崩德(特别联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 1850 年 9 月 15 日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第 466 页。

- 396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1848—1849 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 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而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事件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镇压者的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宣布动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没有经过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 466 页。

- 397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第 467 页。

- 398 马克思引自“国际述评(三)”,该文发表在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合刊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35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创办、1850 年 11 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 1850 年 3 月至 11 月总共出了 6 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

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67页。

399 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850年8月底举行的。——第470页。

40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2—553页。——第470页。

40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7页。——第470页。

402 在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该信写于11月22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567页）。——第472页。

403 暗指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宣传协会和流亡者俱乐部（马克思在这里称它为流亡者协会）以及对这两个小资产阶级的流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0—380页）。——第474页。

40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0—502页。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均引自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一版。——第476页。

40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476页。

4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第477页。

40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8—479页。——第477页。

- 408 马克思引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页)。——第477页。
- 40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5页。——第477页。
- 4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第477页。
- 4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页。——第478页。
- 412 马克思引他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02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1849年2月8日举行的。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认为这是动员群众起来反对普鲁士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一种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这次审判的记录登载在1849年2月19、25、27和28日“新莱茵报”第226、231、232和233号上,并且还发表在下列小册子中:“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伦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新莱茵报”出版发行社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rbeitsen in Köln》·Köln, 1849,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第478页。
- 413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2、263和264页)。——第479页。
- 414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0页)。——第479页。
- 4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第480页。
- 416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社会拯救委员会)——见注147。——第480页。
- 417 “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是民主派日报。该报从1848

年7月1日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瑟夫·魏德迈是该报编辑之一。——第483页。

- 418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2页）一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受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金克尔的那种卑鄙行为的。金克尔在他的1849年8月4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483页。

- 4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24—232页。——第484页。

- 420 马克思讽刺地把金克尔的机关报“德国通讯员”同法国政府的报纸“通报”相提并论。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该报从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正式的政府机关报。——第484页。

- 421 马克思为了讥笑福格特，把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为“劳斯之歌”（《Lausiade》），即“虱子之歌”（来自德文《Lause》——“虱子”），这是同十八世纪末英国诗人彼得·品得的一首讽刺诗（The Lousiad）——“劳兹之歌”（来自英文《louse》——“虱子”）相类似的东西。

“卢兹之歌”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卡蒙斯所写的叙事诗。——第487页。

- 422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地位比作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桑科·判扎在巴拉塔利亚岛上虚构的总督职位，以讽刺他身为帝国摄政（见注375）的表面权力。——第488页。

- 423 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87—189页）。——第489页。

- 424 1848年8月26日，丹麦同只是虚张声势地参加了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战争（见注 354）的普鲁士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葬送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而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那里的统治权。1848 年 9 月 16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坚持要对丹麦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斗争的一部分）的德国民主力量的反抗，以 21 票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一决定引起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极大愤慨。1848 年 9 月 17 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东北郊的普芬斯特魏德草地举行了很多人参加的人民集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把投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的那些议员宣布为卖国贼，要求左派分子退出国民议会。当许多极左派代表同意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的上述要求时，卡尔·福格特出来反对接受这些要求。由批准停战协定所引起的人民运动，9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转变为起义，结果遭到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 492 页。

- 425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 1848 年 10 月 9 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会议员或中央政权机关代表的人（帝国摄政、他的大臣和官员们），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 492 页。
- 42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它们的目的是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人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 492 页。
- 427 引自卡·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94—396 页）。——第 494 页。
- 428 见卡·马克思“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24—425 页）。——第 494 页。
- 429 见恩格斯的著作“爱北斐特”（“马克思恩格斯会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96—599 页) 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40—153 页)。——第 494 页。

- 430 指 1848 年 11 月—12 月初普鲁士发生的政变, 它以反革命势力得胜告终。普鲁士政变的结果是: 成立了极端反动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 解散了国民议会。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见注 392。——第 494 页。

- 431 见“十字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85 页)。——第 495 页。

- 432 见注 389。——第 495 页。

- 433 告德国人民书是诗人乌良特只温和的民主派的名义草拟的; 他们的意图是, 使自己的政治路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接近。在这一告人民书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 而只限于软弱无力地呼吁德国人民支持实施帝国宪法。

第二个告人民书是由国民议会三十人委员会提出的, 它同样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呼吁书, 其内容是: 要求不承认国民议会及其决议的那些德意志邦的军队, 宣誓矢忠帝国宪法。

三十人委员会是 1849 年 4 月 12 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的, 以便制订使帝国宪法付诸实施的种种措施, 原因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议会加在他头上的皇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起初表示他是否同意, 要看德意志其他统治者的态度而定; 1849 年 4 月 28 日他声明, 拒绝接受帝国宪法, 放弃皇冠。——第 496 页。

- 434 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论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地方, 马克思所利用的速记记录, 后来以单行本出版, 题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8—184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第 496 页。

- 435 1849年5月初，位于法兰克尼亚中部地区的巴伐利亚的纽伦堡，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抗议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帝国宪法。1849年5月13日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巨大的人民集会运动的高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5万人。卡尔·福格特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用一套虚假的革命词句作掩饰，规劝人民抛开坚决的行动。福格特的叛卖行为以及领导运动的民主派的动摇态度使人民遭到了失败。
-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民主共和派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称呼，而后者则把前者称为煽动者（Wühler）。——第500页。
- 436 马克思讽刺地这样称呼路易·波拿巴，因为波拿巴曾经在瑞士的土尔高州受教育，并获得了土尔高州名誉公民的称号。——第501页。
- 437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501页。
- 438 “晨报”（《Morgenblatt》）是文学日报“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的简称，1807年至1865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1841年，该报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几篇有关文艺问题的通讯。——第503页。
- 439 指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亨·海涅从巴黎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的文章，以及四十年代初德国东方学家雅·法耳梅赖耶尔在同一报纸上刊登的特写。海涅把他在“总汇报”上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编成单行本，书名是“法国纪事”（1832年）和“吕太斯”（1854年）。法耳梅赖耶尔的特写于1845年编成两卷集，取名为“来自东方的片断”。——第505页。

- 440 马克思对“总汇报”亲奥立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1—315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1841年至1924年出版的美国报纸。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过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蓄奴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的。——第505页。

- 4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6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这本小册子中的对“中欧大国”论的批评见第249—251页。——第505页。

- 4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页。

《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在历史文献中有时用来代表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以后逐渐成了代表正在衰落和瓦解中的国家的普通用语。——第 506 页。

- 443 1859 年 4 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第 506 页。

- 444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是关于英国议会两院会议的报告；因出版者为托马斯·寇松·汉萨德而得名，从 1803 年起定期出版。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 507 页。

- 445 见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是宪章派的周刊，1852 年 5 月由革命宪章派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从 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以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 年 6 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 507 页。

- 446 指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05—417 页）；1853 年 11 月 26 日“格拉斯哥哨兵”用“帕麦斯顿与俄国”的标题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一个出版物的目录中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注 295）。——第 507 页。

- 447 卡·马克思的“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人民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页）。

外交事务委员会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 是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阿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 507 页。

- 448 卡·马克思曾经计划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这里指该著作的未完成的导言；1856 年 6 月—1857 年 4 月首先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以《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十八世纪外交史的内幕”）为题发表。1899 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在伦敦出版单行本，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1855—1865 年在伦敦出版）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1851—1857 年在设菲尔德出版）是阿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第 508 页。

- 449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 年至 1869 年在伦敦出版。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这个集团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508 页。

- 450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一家工人报纸，由德国流亡者主办；1858 年 6 月至 1859 年 4 月在伦敦出版。

“海尔曼”（《Hermann》）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简称，1859 年起地伦敦用德文出版；1859 年 1 月至 7 月，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该报编辑。——第 508 页。

- 451 “大胡蜂”（《Die Hornisse》）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文报纸，1848—1850 年在加塞尔出版；1848—1849 年比斯康普曾为该报撰稿。——第 509 页。
- 452 摩门教徒 是 1830 年在美国成立和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门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的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 509 页。
- 453 这里马克思写得不够确切。这句话不是出自缪尔纳，而是出自格里耳帕尔策。见弗·格里耳帕尔策“女始祖”第三幕。——第 511 页。
- 454 1859 年 6 月 7 日“总汇报”第 158 号发表了雅科布·费奈迭的一封信，其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同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的联系。——第 512 页。
- 455 见注 387。——第 512 页。
- 456 马克思讽刺地把福格特称作“帝国缩小者”（《M indrer des Reichs》）与中世纪德国帝王常用的称号“帝国扩大者”（《M ehrer des Reichs》）相对照。并参看本卷第 566 页。
- 小德意志派报刊是反映主张建立小德意志的人的观点的报刊，他们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 513 页。
- 457 见 1859 年 10 月 27 日“总汇报”第 300 号。——第 519 页。
- 458 “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月刊；自 1858—1862 年由阿·科拉切克首先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海德堡和维也纳同时出版。
- “月刊”（《M onatsschrift》）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杂志“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Deutsche M onatsschrift für Politik, W is-

senschaft·Kunst und Leben》)的简称,1850年由阿·科拉切克在斯图加特出版,1851年在不来梅出版。——第519页。

- 459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520页。
- 460 指德意志联邦——见注396。——第527页。
- 461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1859年1月至5月。按女王陛下手谕在1859年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January to May 185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9》·London)。——第528页。
- 462 圣马丁门剧场是巴黎的一个剧院,1851年十二月政变时,在该剧院附近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殴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528页。
- 463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42。
七年战争——见注45。——第528页。
- 464 巴塞尔条约——见注192。——第529页。
- 465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于1815年1月3日在维也纳会议时期签订的关于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一个秘密同盟条约,其目的是不让普鲁士完全占领萨克森国王的领地,并且阻挠把前华沙大公国的全部土地并入俄国。这一秘密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以往参加反拿破仑同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几乎发展成公开的冲突。——第529页。
- 466 指1821年10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访问汉诺威时,由梅特涅和卡斯尔里签订的奥地利和英国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旨在反对俄国在希腊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第529页。
- 467 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324。——第530页。

- 468 指萨特马尔和约,这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贵族于1711年5月1日在萨特马尔城(匈牙利)所订立的一项协定。萨特马尔和约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而且也加强了匈牙利贵族统治农民的权力。同时,按照萨特马尔和约的规定,贵族还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得到了一系列政治上的让步。——第530页。
- 469 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1840年7月15日所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去反对幕后受到法国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伦敦公约反映了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俄国在争夺近东霸权中的竞争。——第531页。
- 470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定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果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自己的决定,英国政府于1840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实现了英国的要求。——第531页。
- 471 1858年8月,俄国和撒丁王国达成了一项协定,使俄国的一家轮船和贸易公司暂时享有利用皮蒙特港维拉弗兰卡东部的权利,该港位于地中海岸尼斯附近,是专供船只停泊和修理以及装添燃料用的。
1853年,普鲁士向奥登堡公国购买了亚德湾的一部分岸边地带,用于建立军港(军港取名威廉港,建于1855—1869年)。——第532页。
- 472 《La vraie question. France—Italie—Autriche》. Paris, 1859. ——第533页。
- 473 1846年2月,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阶级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按照维也纳

条约于 1815 年宣布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城的克拉科夫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 534 页。

- 47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05—417 页。——第 534 页。
- 475 《La foi des traités, les puissances signataires et l'empereur Napoléon III》·Paris, 1859. ——第 534 页。
- 476 指 1847 年 11 月 8 日（20 日）的敕谕；根据该敕谕规定，地主领地凡因债务而拍卖时，农奴有权赎买自己和土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23—724 页）。——第 535 页。
- 477 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 年圣彼得堡版第 11 卷第 1 章第 23 页。——第 536 页。
- 478 P. Dolgoroukow. 《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Paris, 1860. ——第 536 页。
- 479 俄国竭力要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因而支持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同也想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的法国一起，共同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愿望。1859 年 1 月，在俄国和法国的协助下，库扎上校被选为这两个公国的君主（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建于 1862 年。——第 536 页。
- 480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周报，1851—1861 年在柏林出版。——第 536 页。
- 481 涅米罗夫会议从 1737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1 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涅米罗夫举行，它是在俄土战争时期（1735—1739）由土耳其倡议召开的，1737 年奥地利站在俄国一方参加战争。俄国代表团提出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订立和约的条件之一。土耳其拒绝了在会议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重新采取了军事行动。

福克夏尼会议从 1772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28 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 1768 年发动的俄土战争。俄方在会议上同时也提出了让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获得独立的建议，然而土耳其拒绝了俄国代表们提出的这一要求及其他要求。会议毫无结果，战争又重新爆发。——第 537 页。

- 482 见注 176。——第 537 页。
- 483 1831 年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 1829 年缔结的阿德里安堡和约规定的条件，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按照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的建议通过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由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同时，规程列入了若干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在 1848 年革命时期，组织规程被废除。——第 537 页。
- 484 “赫特里”（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费里克·赫特里”）是希腊的一个秘密团体，成立于 1814 年，中心在敖德萨，在希腊各大城市均有支部；该团体的目的是准备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沙皇政府曾暗中支持“赫特里”。——第 538 页。
- 485 关于路易十八干涉西班牙，见注 223。——第 538 页。
- 486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 1827 年 10 月 20 日土埃舰队同由英国海军上将爱·康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之间的一场会战。欧洲列强把该联合分舰队开进希腊领海，是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在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进行残酷迫害以后开始的这一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战争中俄国取得了胜利。在纳瓦林会战中起了杰出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由米·彼·拉扎列夫指挥的“阿速夫号”旗舰。——第 538 页。

- 487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一家最大的保守派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 539 页。
- 488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 1831—1848 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 539 页。
- 489 指在尼古拉一世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所进行的谈判，其目的是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由于黑森选帝侯国（见注 396）和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了冲突之后，更加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同丹麦在 1850 年 7 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情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圣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对。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1850 年 11 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按照 1850 年 11 月 29 日签署的奥里缪茨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贪求，并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让了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派奥地利的一个军团前往霍尔施坦。——第 540 页。
- 490 指 1825 年 10 月 16 日（4 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 8 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 1825 年 8 月 18 日（6 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外交路线的意见。——第 541 页。
- 491 Th. Lapinski. 《Feldzug der Ungarschen Hauptarmee im Jahre 1849》. Hamburg, 1850. ——第 544 页。
- 492 B. Szemere. 《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 London, 1860. ——第 545 页。

- 493 指的是“斯拉夫各国”地图，是捷克斯拉夫学家巴维尔·约瑟夫·沙德里克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Slovánský národopis》）一书绘制的，该书出版于1842年。——第548页。
- 494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 下面引证的马志尼的宣言，由马克思译成了英文，并加上了简短的引言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550页。
- 495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881年打败了诺尔曼人。——第551页。
- 496 1849年6月11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赖德律-罗兰在立法会议上提议把路易·波拿巴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因为他们违背宪法，即派法国军队包围罗马，以便消灭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一提议之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在1849年6月13日组织抗议违背宪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被政府军队驱散。山岳党——立法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党团——的一些著名活动家被剥夺了议员的权利并遭到了迫害；其中一部分流亡国外。6月13日事件暴露了山岳党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以及他们领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9—73页）。——第552页。
- 497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554页。
- 498 1852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把黑人迁移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

卖的计划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第 555 页。

- 499 马克思所指的《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社会治安法)即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的所谓“嫌疑犯处治法”。该法律授予政府和皇帝以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法国领土。——第 555 页。

- 500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按照西班牙(在西班牙，军区的司令——镇守司令握有绝对权力)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在 1858 年 2 月 1 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为枢密院成员之一，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第 556 页。

- 501 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即 1806—1810 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 1851 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同盟国俄奥军队的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 年 12 月 2 日)的周年纪念日。——第 556 页。

- 502 曾发表文章谴责第二帝国制度的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在 1858 年底受到了法庭审讯。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但是，蒙塔郎贝尔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作是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 1636 年曾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对汉普敦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

蒲鲁东于 185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Église》)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 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是拿破仑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于 1815 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条例。——第 556 页。

- 503 指 1858 年 3 月 6 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 发动遭到了失败。——第 556 页。
- 504 因法国政府曾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 故帕麦斯顿在法国的威胁下于 1858 年 2 月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 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 同英国人一样, 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 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 556 页。
- 505 指 1858 年 7 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撒丁政府首脑卡富尔在普仑贝尔(法国)签订的一项关于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在对奥地利作战中结成同盟的秘密协定。拿破仑第三答应给卡富尔以军事援助, 以便使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并把它们并入撒丁王国, 王国应为此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在普仑贝尔会晤期间, 决定了法国和撒丁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 这场战争爆发于 1859 年 4 月(见注 324)。
- 1858 年秋, 帕麦斯顿(他当时领导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 到贡比昂去阐明他对行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 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第 557 页。
- 506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Napoléon 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 一书。——第 558 页。
- 507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 1843 年起在伦敦出版, 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558 页。
- 508 《Napoléon III et la question roumaine》. Paris, 1859. ——第 561 页。
- 509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1860 年巴黎版(E. About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 561 页。
- 510 《Correspondence secrète et confidentielle de Napoléon》. 7 vols. Paris,

1817.——第 562 页。

- 511 马克思用腊肠阅兵来讥讽路易·波拿巴总统于 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萨托里平原(凡尔赛附近)举行的总阅兵。在总阅兵时,路易·波拿巴用腊肠、冷盘野味、香槟酒和雪茄烟款待士兵和军官们,企图借此收买军队,以便来日发动政变。

关于波拿巴的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见注 80 和 82。

关于路易·波拿巴的斯特拉斯堡冒险和远征布伦,见注 344。

雾月十八日——见注 83。——第 562 页。

- 512 指巴黎条约,即 1856 年 3 月 30 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约,也就是结束了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在会议上,法国不支持英国要高加索脱离俄国的要求,不支持奥地利要贝萨拉比亚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俄两国的接近,后来有了加强。——第 562 页。

- 513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第 1—2 卷(Bazan-court:《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Tomes I—II)。第一版 1856 年出版巴黎。——第 562 页。

- 514 三十年战争——见注 39。——第 568 页。

- 515 暗指 1797 年 10 月 17 日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 151。——第 572 页。

- 516 《La politique anglaise》·Paris, 1860.——第 576 页。

- 517 联邦院 是瑞士联邦议会(国会)的两院之一。另一院为国民院。——第 576 页。

- 518 纽沙特尔(德国称作:诺恩堡)从1815年起是瑞士的一个州(过去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公国),同时又隶属于普鲁士君主国。由于1848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发生了普鲁士同瑞士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于1856年秋在瑞士当局把得到普鲁士国王支持的、没有成功的纽沙特尔保皇党人暴动的参加者逮捕以后,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1857年春,由于其他列强(其中包括法国)的外交干涉,冲突才得到解决;普鲁士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纽沙特尔的要求,而瑞士政府也释放了被捕的保皇党人。——第577页。
- 519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路易-菲利浦政府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达普谷地是位于瑞士瓦得州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山谷。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承认它是瑞士领土,但后来法国拒绝承认这一决定。1862年以前,达普谷地由于其战略意义历来是法国和瑞士必争之地。1862年,瑞士把这个谷地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从路易·波拿巴政府得到了领土赔偿。——第578页。
- 520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1859年3月14日发送给一些国家的照会中声称:意大利境内一旦发生战争,瑞士将维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和保持中立,并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将占领萨瓦中立地区(北萨瓦)。
- 宣布瑞士“永久中立”的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6月9日的最后决议案中,宣布北萨瓦的沙布累省和弗西尼省为非中立地区,并规定,在出现战争威胁或同瑞士为邻的各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瑞士有权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占领这两个省,而责成撒丁王国在上述情况下必须从这些省撤出自己的军队。——第578页。

- 521 马克思引用“哀歌”（《Klage》）作为本章的题词，这是十二世纪一位佚名作者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马克思可能引自“尼贝龙根之歌”的附录。
“伊威恩，或狮子伴随的骑士”是中世纪德国诗人哈特曼·冯·奥艾的一首华丽的叙事诗，该诗的基本思想是为荣誉牺牲个人幸福；作者是根据十二世纪法国作家克雷田·德·特鲁瓦的同名小说改写成德文的。——第 588 页。
- 522 “帝国大事记”是十二世纪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以半神话的形式叙述了从凯撒到 1147 年的罗马和德意志帝王的历史。我们现有的该诗印本的作者据估计是十二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康拉德。——第 589 页。
- 523 “世纪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了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591 页。
- 524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591 页。
- 525 “日内瓦评论”（《Revue de Genève》）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的简称。该报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 年起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该报用这个名称出版到 1861 年。在法世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波拿巴派的倾向。1861 年与“瑞士民族报”合并。合并后改名“瑞士民族报”，副标题是“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纸”。——第 592 页。
- 526 拿破仑亲王于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他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没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脱军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第 594 页。
- 527 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仑第三是非婚生子的传言，他的父亲被正式认为

- 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第 595 页。
- 528 国民院——见注第 517。——第 597 页。
- 529 昂·佩特丹“论萨瓦的合并”1859 年巴黎版 (A. Petétin. 《De l'annexion de la Savoie》. Paris, 1859)。——第 598 页。
- 530 柯利班是古代崇奉女神基别拉的祭司；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奏乐舞蹈，兴奋若狂。——第 599 页。
- 531 “祖国报” (《La Patrie》) 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 年创刊；1850 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602 页。
- 532 V egezzi-Ruscalla. 《La nazionalità di Nizza》. 3ed. Nizza, 1860. ——第 604 页。
- 533 “窝州新闻” (《Nouvelliste Vaudois》) 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798 年创刊，1914 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新苏黎世报” (《Neue Zürcher-Zeitung》) 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 年开始用这个名称在苏黎世以德文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 604 页。
- 534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贝列拉兄弟在 1852 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公司。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它大规模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1867 年该公司破产，1871 年倒闭。——第 604 页。
- 535 “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的简称，1855—1988 年在伦敦出版。——第 606 页。
- 536 指瑞士的大学生联合会“海尔维第”，于 1858 年由阿劳、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的同名联合会 (以伯尔尼为中心) 合并而成。在瑞士的许多城市

都有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的联合会,而有的联合会甚至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第一个“海尔维第”联合会于1832年在苏黎世建立)。马克思提到的“海尔维第”联合会曾于1859—1860年反对过波拿巴派把萨瓦划归法国的计划。

“阿尔高消息报”(《A argauer Nachrichten》)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1854—1918年在阿劳(阿尔高州)出版。——第611页。

537 “希望报”(《L'Espérance》)是波拿巴派的报纸,1859—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1页。

538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613页。

539 “两大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14页。

540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奥尔良派的机关报。——第614页。

541 联合派(《fusion》——“联合”)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人即奥尔良派联合。

Collège de France(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

Memb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兰西研究院是法国最高的科学和艺术机关,由包括法兰西科学院在内的许多最重要的科学院联合组成。——第614页。

542 “欧洲评论”(《Revue européenne》)是波拿巴派的月刊,1859—1861年在巴黎出版。1862年与“现代评论”杂志合并。——第614页。

- 543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1848年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第615页。
- 544 “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创办于巴黎;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615页。
- 545 科伦大教堂中有一个三圣王的圣堂,按基督教的说法,他们是到伯利恒来朝拜刚降生的耶稣的三个星相家。根据传说,这三个星相家的遗骸就保存在这个圣堂里(参看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第617页。
- 546 鼠塔是位于宾根城下莱茵河中间的岩石上的一个塔;那里,河水经过岩石而形成的狭窄的河身被称为宾根之穴。有人认为,塔的名称同关于美因兹主教哈托(十世纪)的传说有关,他由于把饥饿者烧死而受到惩罚,在这个塔中被老鼠吃掉。——第620页。
- 547 见注491。——第623页。
- 548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1847—1849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1850年8月15日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London)。——第625页。
- 5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2—415、443—444页。——第626页。
- 550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

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4—625页)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第626页。

- 551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不一的组织存在得不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628页。
- 552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第628页。
- 553 见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628页。
- 554 见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9—180页)。——第629页。
- 555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1846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629页。
- 556 见卡·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08—515页)。——第629页。
- 557 宗教条约是天主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与某些国家的政府签订的条约,这一条约确定了天主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与特权。根据1855年奥地利和罗马之间签订的宗教条约,奥地利的天主教会获得了自治权、与罗马直接联系的权利、承受财产的权利,设立了最高宗教检查机构并对学校施加巨大的影响。——第631页。
- 558 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60年10月20日颁布的十月宣言,宣言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宣言对联邦国家制度的拥护

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不彻底的让步,但对集权派、主要是奥地利德意志人来说,则是对立的。然而,翌年初,十月宣言就由于颁布了 1861 年 2 月 26 日的特许状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中制原则。——第 635 页。

- 559 《In usum delphini》——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意是:经过删削、篡改。1668 年,为法国的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书中“可非难”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第 635 页。
- 560 1849 年 8 月 13 日,匈牙利革命军队在维拉戈什向尼古拉一世派往匈牙利镇压革命的沙皇军队投降,虽然匈牙利军队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并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源,但是,军队总司令戈尔盖,为了匈牙利贵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温和的自由派分子的利益而叛变投降。——第 635 页。
- 561 见注 261。——第 636 页。
- 562 《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 642 页。
- 563 “国民报”(《Le National》)是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642 页。
- 564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 1820 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立的德文日报,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奉行保守派的方针。——第 647 页。
- 565 见卡·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34—246 页)。
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纪末流传在德国民间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 648 页。
- 566 “新莱茵报”用这一称呼来讽刺“国民报”的读者,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供有

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1813—1818年夫赖堡和康斯坦茨版(K·Rotteck·《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18)。——第648页。

- 567 这一首两行的短诗是马克思从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于1728—1743年所写的讽刺诗集“邓斯之歌”(《Dunciad》)第一册中引来的。诗集的名字来自英语《dunc》，意即：蠢货、笨蛋。作家在诗中辛辣地描绘了他的论敌，把他们安顿在Dulness(愚昧)的王国里。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主题：理智对愚昧和野蛮的斗争是“邓斯之歌”的基础。——第649页。
- 568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该报是在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发生分裂之后于1849年3月创办的。“新奥得报”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针，在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报纸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后者从1855年9月起任该报主编)。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650页。
- 569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742年起在布勒斯劳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君主立宪集团的机关报。——第650页。
- 5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55—356页(“施泰因”一文)。
协商派议会(协商议会)即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5月为“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在柏林召开。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变时被解散。
钦定宪法是在1848年12月5日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颁布的。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因年龄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成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1848年12月6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第二议院议员的两级选举。按照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并且明文规定，可以修改宪法条文，这一切

便利了反革命势力以后的进攻。——第 651 页。

- 571 1849 年 4 月 28 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第二议院,这个议院是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反民主的钦定宪法选举出来的。解散的原因是:在第二议院里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分子,特别是他们赞成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第 651 页。
- 572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 年起在伦敦出版。
“喧声”(《K ladderatsch》)——讽刺性漫画周刊,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第 651 页。
- 573 旨在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从 1815 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贸易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他们终于使谷物法在 1846 年被废除。——第 651 页。
- 574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6 月 14—17 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 89 个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梅因,当选为候补委员的有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的。——第 652 页。
- 575 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的诽谤性文章“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马克思派的斗争”,载于 1860 年 2 月“自由射手”第 17—21 号。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偏重文学和艺术,1825—1878 年在汉堡出版。——第 652 页。
- 576 “九月党人”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的敌人对雅各宾党人的称呼,这些人诬蔑雅各宾党人在 1792 年九月的日子里极

端残酷无情(见注 145)。——第 656 页。

577 利未人——见注 264。——第 659 页。

578 Magistrat 在德国是市政府;在英国, magistrates 是治安法官,也是高级警官。——第 661 页。

579 艾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降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目的是对 1374 年猖獗过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感谢。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一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 662 页。

580 “去意大利,好啊!”1859 年伯尔尼和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版(《Juchhe nach Italia》·Bern und Genf: Vogt's Verlag, 1859)。班贝尔格尔的这本“去意大利,好啊!”在出版时并没有标明作者。——第 663 页。

581 马克思讽刺地套用了唐·吉珂德的绰号愁容骑士,把芬克叫做笑容骑士。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是中世纪法国骑士比埃尔·杜·特赖耳·巴亚尔的绰号,后来已经成为普通用语(无论在直接意义上或是在讽刺意义上)。——第 665 页。

582 马克思指弗·恩格斯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第 665 页。

583 1848 年 7 月 11 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保守派为表示对他尊敬,举行宴会,芬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第 666 页。

584 Corpus juris civilis (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第 666 页。

585 联合会议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

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667页。

- 586 指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在对待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注111)问题上的反革命立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和中央政权的活动中特别表现出这种立场,它们以调停为借口实际上阴谋抵制对革命的维也纳进行援助。苏克狂热地支持了这种立场。——第669页。
- 587 见注456。——第669页。
- 588 大名是中世纪日本的大封建主、领主诸侯。——第671页。
- 589 “行动内阁”是人们对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从1848年6月执政到同年9月的普鲁士奥尔苏瓦特—汉泽曼内阁的称呼(见弗·恩格斯的文 章“行动内阁的垮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0—462页)。——第672页。
- 590 In usum delphini——见注559。——第675页。
- 591 指民主协会,该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产阶级一翼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

上已告停止。——第 680 页。

- 592 1854 年 3 月 6 日至 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是鉴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而由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宪章派分子发起建立的。这一批人早在 1853 年底(马克思在这里把这一日期当做召开工人议会的日期是不确切的),就提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工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名誉代表的马克思曾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33—134 页),在 3 月 10 日的会上宣读了这封信。马克思在信里提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任务。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不给以支持,同时都对政治斗争抱有成见。1854 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1854 年 3 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第 681 页。

- 593 看来是指巴尔扎克的小说“失去的幻想”。——第 682 页。
- 594 Code Napoléon(见注 242)曾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地区实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第 688 页。
- 595 祖国之友协会——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协会;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政党,它主张在君主专制的普鲁士领导下把德国统一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 1859 年 9 月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

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

祖国之友协会致民族联盟的“公开信”1859年11月发表在德国的一些报纸上。在这封信里，用模糊不清的说法谴责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王朝计划。——第691页。

- 596 奎里特——这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第714页。
- 597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2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723页。
- 598 席利套用了已经成为谚语的著名说法“惋惜埃及的肉锅”。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第724页。
- 599 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发表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各号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726页。
- 60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5页。——第728页。
- 601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734页。
- 602 马克思指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这篇声明载于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第736页。
- 603 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736页。

- 604 “社会辩论报”（《Le Débat social》）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年至184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747页。
- 605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是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748页。
- 606 纽约的一家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曾经发表过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文章“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63—538页），这篇文章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向马克思约的稿。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为他在英国博物馆搜集资料。——第749页。
- 607 指艾·阿布的三幕喜剧“吉耳里”。——第749页。
- 608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751页。
- 609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752页。
- 610 指拿破仑第三为了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会晤所作的巴登-巴登之行；会晤在1860年6月举行。——第753页。
- 611 指西·波克罕的匿名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艾德门·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Napoleon III. und Preuß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die Broschüre 《Preuß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 London. 1860》）。波克罕的小册子是在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第754页。
- 612 马克思的这个声明没有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发表。——第756页。

-
- 613 1852年12月11日和18日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第32号和第33号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评论。评论中摘要引证了这一著作。——第757页。
- 61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Quid pro quo》）和第684—695页（“报刊述评”）。——第758页。
- 615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把这个作为传单单独发表的声明称作通告，因为他曾经把这个声明连同1860年2月6日的声明（见本卷第765—766页）一起寄给几家德国报纸。——第762页。
- 616 指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于1842—1843年编辑的“莱茵报”实行的特别严格的双重书报检查。——第769页。
- 617 从马克思的1860年札记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把这个声明寄给“自由射手”报。但是，这家报纸没有发表这一声明。——第770页。
- 618 马克思也曾经把这个声明寄给“人民报”和“改革报”。——第771页。